

大众科学的文化意义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POPULAR SCIENCE

〔英〕罗杰·库特 著

in Barry Barnes and Steven Shapin, eds., *Natural Order: historical studies of scientific culture* [1979]. "Phrenology and British Alienists, 1825-45" (now reprinted in Andrew Scull, ed., *Madhouses, Mad Doctors, and Madmen: the social history of psychiatry in the Victorian era* [1981]) deals with an area of phrenology's history that is possible to refer to only in passing in this study, while "Phrenology: the provocation of progress" (*History of Science*, 1976) critically reviews some of the secondary literature on phrenology that reappears in the Introduction and Chapter 1.

I am lastingly obliged to the Canadian Branch of the Imperial Order of the Daughters of the Empire for providing the initial funding for my research; thereafter, generously the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 (SSHRC) made the completion of the study possible. A Fellowship in 1979 with the Calgary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Calgary, and a Killam Fellowship at Dalhousie University in 1980 allowed the writing to be undertaken in highly congenial atmospheres. The final drafts of this book were written while I was based at the Wellcome Unit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Oxford, engaged in new research funded by the SSHRC and the Wellcome Trust and made all the more pleasant by being a Fellow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颅相学是研究性格的大脑科学的综合理论，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受人欢迎的“自然知识”。库特对这个生物思想体系的普及进行了研究，目的是分析这门科学对维多利亚社会从知识团体到工人阶级自由思想家和欧文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受近年来历史和社会科学研究著作以及福柯、批判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的影响，本书关注的中心问题是科学在城市工业社会整合时期所具有的社会、意识形态功能。

由于本书对那种试图隔绝科学观念与其哲学、神学和社会之背景的做法表示质疑，因此本书研究与其研究对象颅相学本身一样，几乎涉及所有学科。在关于历史现实的社会阐释中，把科学仅仅当成一个塞入其中的附加“因素”，其弊端不言自明。本书第一次对科学在工人阶级激进派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翔实的资料基础上，揭示了在前达尔文时代的英国，科学已经对大众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作用。

<http://www.cp.com.cn>

ISBN 978-7-100-08345-4



9 787100 083454 >

定价：43.00 元

大众科学的文化意义

——19世纪英国颅相学及其认同组织

[英] 罗杰·库特 著

张卫良 施义慧 译

施义慧 校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众科学的文化意义/(英)库特著;张卫良,施义慧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ISBN 978 - 7 - 100 - 08345 - 4

I. ①大… II. ①库…②张…③施… III. ①颅相学 IV. ①B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937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大众科学的文化意义
——19世纪英国颅相学及其认同组织
〔英〕罗杰·库特 著
张卫良 施义慧 译
施义慧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8345 - 4

2011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0%

定价: 43.00 元

Roger Cooter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POPULAR SCIENCE

Phrenolog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Consent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Copyright © 1999 by Roger Cooter.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11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9 年英文版译出



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提供部分出版资助



中文版序言

能够把这项研究呈现给中国的读者，这是一种荣誉和荣幸，也是一种挑战，因为中国读者将赋予它不同的体验和历史认识。事情本该如此。书籍就像孩子，需要超越其父辈所开辟的道路，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在这里，我只需说几句关于这个孩子出生的情况。

《大众科学的文化意义》是在西方科学史刚刚从几十年狭隘的“主观精神”研究中脱离出来时写就的。当时，在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4年)一书的激发之下，有关科学的社会研究正开始挑战迄今为止被传统观念所支配的领域，这些传统观念简单地认为科学发现产生于受到灵感启发的思想——尤其是像牛顿或达尔文那样“伟大人物”的思想。到了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的生平及其思想开始回归人间。人们不再超越他们的社会背景把他们当作似乎凌驾于历史之上的人物来对待；相反，他们被视为历史环境的产物。这不仅仅涉及把“外部”事件添加到其他的内部说明之中。意义更深远的是，它认为科学(关于自然的知识)本身是由它产生于其中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背景所构成的，而不是与之分离。换句话说，现代科学

(及其所提出的世界观)逐渐被当作是由人们创立的,而不是由人们发现的。科学不再是单纯的价值无涉的事实渐进积累的过程,令人称许地分离于权力关系之外;相反,它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特性,无论它采取别的什么形态。因此,我们需要把(由科学家及其理论辩护者所写的)科学史的历史传奇就当作**传奇**来对待。就像所有的传奇故事一样,我们可以理解其政治目的,就是赋予当前(经过科学合理解释的)事物秩序以理性的合法性,以此造成那种秩序似乎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道德上正当的,也是不可改变的。

与这种关于科学及其历史的思维革命同时发生的是六七十年代西方所发生的更加广泛的文化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一些著名的机构、专业权威和知识精英团体受到了冲击。整个历史领域向“新社会史”转变,其特点是渴望严肃认真地对待普通人的生活 and 奋斗,或者像迄今为止对统治者阶层的关注那样,给予普通人同样的关注。在诸如 E. P. 汤普森、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已故的《历史工场杂志》创始人拉斐尔·撒缪尔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鼓舞下,新的“自下而上的历史”完全颠覆了对过去进行阐释的传统方法。

《大众科学的文化意义》是把这些科学史和社会史的新方法结合起来的一种艰辛尝试。本书研究的中心是 19 世纪最受欢迎的自然知识(即作为“大众科学”的颅相学)。本书摒弃了传统的史学方法,因为传统史学方法为了强调科学作为历史胜利者的道德优越性、本质的正确性以及自诩的公正性,在其历史叙述

中把颅相学仅仅当作“伪科学”而不予理会。但是，我的目标不是赞美颅相学知识，而是对颅相学的产生及其在大众中（尤其是在工人阶级激进分子中）的应用进行详细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说明，以便从总体上展示科学经过意识形态调和的起源和功能。我避开了（经济简化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接纳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思想，因为他精辟地阐释了知识分子如何在无意之中认同与其阶级利益相反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意识形态。拙著的副标题“认同组织”与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是同义词。

自从70年代中期我写本书（当时是作为博士论文）开始，历史著作的总体倾向是分类越来越细、方法论越来越碎化。随着柏林墙倒塌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崩溃，左翼批判理论随之萎缩。在“后现代”时期，阶级和社会结构的概念似乎日益受到冷淡，“社会”（the social）作为一个自诩的客观分析范畴，其有效性开始遭到严峻的质疑。^①然而，大众科学的历史研究仍不断结出硕果，包括几种把对科学史的理解与对工人阶级激进主义的修正主义历史考察相结合的研究^②，既有方法论的总体评价

① 见：Roger Cooter, “Framing” the End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in Frank Huisman and John Harley Warner (eds) *Locating Medical History: The Stories and Their Meanings* (Baltimore &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4), 309—337。

② David Stack, *Nature and Artifice: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Thomas Hodgskin, 1787—1869* (Bury: Boydell Press, 1998). 也见, Jonathan Rose,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与分析^①，也有关于维多利亚时期的详细案例研究^②。

颅相学历史已经成为人们深入研究的主题。约翰·范怀伊的《颅相学和维多利亚时期科学自然主义的起源》(2004年)加深了我们对被称之为颅相学之“父”的弗朗兹·约瑟夫·高尔的著作及其影响的了解，而且对苏格兰的颅相学福音传道者乔治·库姆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在传播世俗的科学自然主义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提供了更详细的内容。但是，如果说范怀伊的研究在这些方面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颅相学社会史和文化史增添了内容，那么在历史方法论上他的研究则是一种相当大的倒退，因为他试图用个人的独立作用来辩驳我书中所提出的社会合力的观点。^③ 与其形成对照的是戴维·斯塔克关于颅相学的研究，其专著即将出版。^④ 斯塔克批评我的研究过于狭隘地把颅相学解读成一种宣扬资产阶级的工业资本主义秩序的意

① 参见，例如，Roger Cooter and Stephen Pumphrey, 'Separate Spheres and Public Places: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Popularisation and Science in Popular Culture', *History of Science*, 32, (1994), pp. 237—267; and Mary Fissell and Roger Cooter, 'Exploring Natural Knowledge: Science and the Popular' in Roy Port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vol. 4, *Eighteenth-Century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29—158.

② 参见，例如，James Secord, *Victorian Sensation: the extraordinary publication, reception, and secret authorship of 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02)。新的观点也见 Bernard Lightman (ed.), *Victorian Science in Contex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③ 参见我对他研究的评论：'Scratching Heads', *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58 (2004), 316—317。

④ 在斯塔克的一篇论文中就有这种重要的迹象：David Stack, 'William Lovett and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Improvement of the People', *Historical Journal*, 42 (1999)。

识形态手段。他指望他的“颅相学新历史”有所超越,一方面是通过使用经济史中的修正主义方法,另一方面是通过话语分析。这种“颅相学新历史”在内涵和解释上有什么不同(以及能维持多久),只有时间才能检验。从现实意义来看,或许值得指出的是,《大众科学的文化意义》仍将在这个历史领域中起着分析和批评的基准作用。再者,即便这意味着生出的“孩子”也起着父母的作用,事情本该如此。

最后,我要对张卫良和施义慧表示无尽的感谢,他们承担了翻译本书的艰难任务。在此,我也要感谢南京大学历史系沈汉教授,他在2001年邀请我去南京大学讲学,使我有幸在那里面对一群朝气蓬勃且挚爱历史的学者表述本书的一些观点。

罗杰·库特

伦敦大学学院韦尔科姆基金医学史中心

伦敦,2005年12月



献给玛格丽特和塞巴斯蒂安
以及我的老师罗伯特·M.扬



诚然，科学史同议会史一样，不是 19 世纪英国历史的真正中心。但科学史不比议会史更糟。从哈勒维开始，议会史学家或政治史学家就有充分的机会去创作详尽而令人信服的历史，但是他们却失败了。“社会”史学家也是如此。试图只从文本文化的基础上去建构“文化”史也不是很有前途。重写历史的领导工作将由历史学家承担，对他们来说，过去的完整性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压力，它为英雄人物提供了个体存在的舞台，也为他们太过人性化的行为找到了理由，但与此同时，它也限制和界定了英雄人物，就像它对待所有人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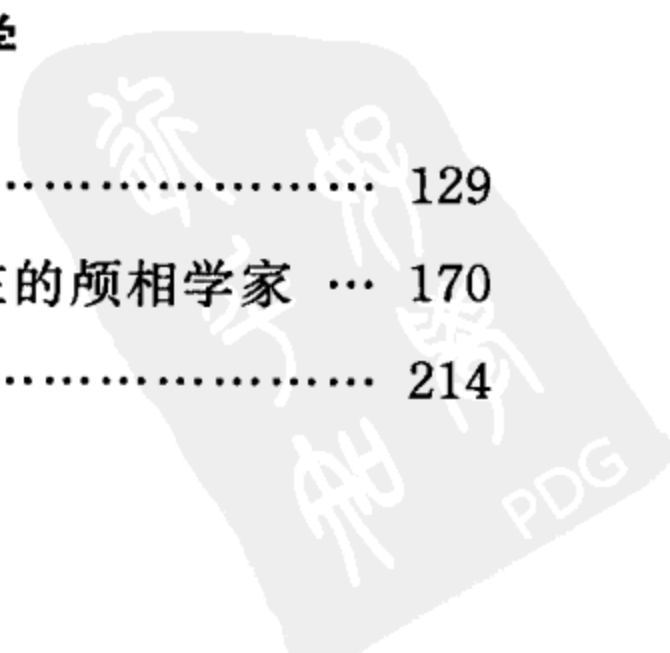
苏珊·坎农：《文化科学》，
（纽约，1978 年），第 257 页。

很多力量造就了历史。但没有哪一种力量能比对意义的渴求更能造就历史，它是人类所有其他动机的原因和活力。在它的驱使下，人们杀戮与死亡、建设与毁灭。人们甚至能面对自己的噩梦，勇敢面对再生的恐怖。

西奥多·罗斯扎克：《个人/行星：
工业社会的创造性分裂》，（赫特福德郡，
圣奥尔本斯出版社 1981 年），第 53 页。

目 录

前言	1
关于原始资料和缩写的说明	5
导论	7
第一部分 历史编纂学	
第一章 源于大脑井	23
第二部分 科学与社会利益	
第二章 大脑的社会意义	51
第三章 通过仪式	85
第三部分 大众科学	
第四章 乔治·库姆与人类体格的重塑	129
第五章 偷猎者变成猎场管理员：无处不在的颅相学家	170
第六章 世俗卫理公会	214



2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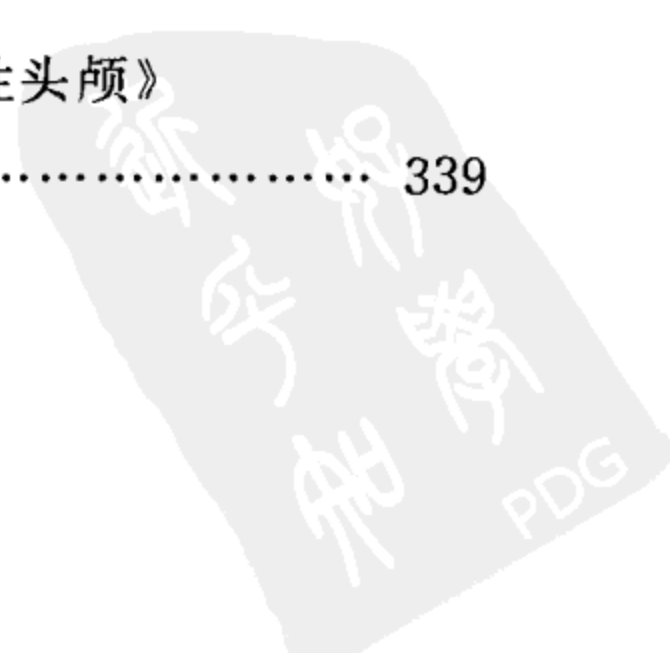
第四部分 激进派的挪用与批判

第七章 理查德·卡莱尔和异端科学·····	255
第八章 彻底颠覆社会主义·····	284
结语·····	323
附录:截至 1860 年英国的颅相学公众演讲人·····	344
注释·····	405
手稿资料和公共文献·····	592
颅相学杂志·····	596
文献索引·····	600
总索引·····	624
译后记·····	642



插图目录

- 1 《内外科医学和哲学周刊》扉页,1823年2月22日 43
- 2 施普茨海姆博士1827年4月在伦敦学院关于颅相学演讲的内容说明书..... 97
- 3 J. G. 施普茨海姆《人相体系》(1815)卷首插图中的颅相学头颅..... 98
- 4 乔治·库姆《颅相学原理》(1824)卷首插图中的颅相学头颅..... 99
- 5 J. N. H. 托马斯牧师1836年10月11日在爱丁堡进行反颅相学布道的海报 166
- 6 牧师伊顿博士在班伯里的技工学院作催眠术和颅相学系列讲座的海报,1847年4月 197
- 7 布谢伊博士实用颅相学的海报,1846年 198
- 8 R. B. D. 韦尔斯的《颅相学图表和象征性头颅》(1878) 339



前 言

xi

本书研究的这门知识是现代历史中最重要的学科交叉的产物之一。但是,与它所探索的历史一样,本书也是学科交叉的产物。1974年到1978年间,我在剑桥攻读博士学位,受到玛丽·道格拉斯把信仰类型与社会结构的显著特征联系起来研究的影响,对颅相学的热情上升,本书就是当时研究和写作的博士论文。与此同时,随着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跨越大西洋所产生的影响,再度出现一种强调科学知识的知识社会学。从海峡对岸,《精神史》、结构主义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天才米歇尔·福柯悄然袭来。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推动下,反对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盛行起来,愿意深入考察科学和文化,就在这个圈子里,出现了一批充满活力的社会史学家,其中一部分人超越经验主义,致力于重新发现意大利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有关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思想。所有这些事情都对本研究的成果产生影响,也对处理本书核心问题(即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的方法产生影响。

在把博士论文改写成书的过程中,我删除了一些材料,又增加了其他材料,尤其是第二章和结论部分(现在已把本课题的历史拓展到19世纪末)。注释也做了修改、精减和更新。但是,为

2 前言

为了让复杂的历史更加清晰,一些细微的差别更加明显,我只求对资料及资料的安排进行推敲。发表论文对此有所帮助,但是读者会发现直接从本书(第一章和第三章)引用资料的唯一已发表
xii 论文是“利用‘伪科学’:当时与现在”(收录于 M. P. 汉南等编的《科学、伪科学和社会》,1980年,该文的节略本收录于帕特里克·格里姆所编《科学哲学和神秘之事》,1982年)。论文“身体力量”的写作(收录于巴里·巴恩斯和史蒂文·夏平所编《自然秩序:科学文化的历史研究》,1979年)非常重要,它使我能够阐明各种解释性问题。“1825—1845年间的颅相学与英国精神病医生”一文(现在重印于安德鲁·斯卡尔所编《精神病院、精神病医生和精神病人:维多利亚时代精神病学的社会史》,1981年)论述的是颅相学历史的一个领域,在本书中可能只会顺便提及;而“颅相学:挑衅进步”一文(发表于《科学史》,1976年)批判性地评论了本书导论和第一章中再现的一些颅相学二手文献。

最后,我要感谢帝国修女会加拿大分会(the Canadian Branch of the Imperial Order of the Daughters of the Empire)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启动资金;其后,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理事会(SSHRCC)的慷慨资助使本研究得以完成。1979年卡尔加里大学人文学院的奖学金和1980年达尔豪西大学的基拉姆奖学金使我能够在非常舒适的环境中改写本书。当我完成本书的最后一稿时,我供职于牛津大学韦尔科姆医学史研究中心,在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协会和韦尔科姆基金的资助下从事新的研究,而且更加愉快的是成为圣安东尼学院的一名研究员。对于如此多的支持,言语的感谢总不足以表达内心

的感激。而我从爱丁堡的威廉·拉姆齐·亨德森基金获得的一小笔旅费资助所带给我的快乐也远非言语所能表达,因为这个基金是在1832年亨德森去世时为了促进颅相学的普及而创立的(参见第五章)。

很多图书馆和档案馆的馆员曾经不得不忍受我没完没了的查阅请求和咨询。他们非常宽容,因此我要特别感谢剑桥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博德里亚图书馆、苏格兰国家图书馆以及伦敦韦尔科姆和不列颠图书馆的职员们。一些机构为我提供照片并允许我复制,对此我要特别感谢:苏格兰国家图书馆的保管人(图5);伦敦城行会大厦图书馆(图2);牛津博德里亚图书馆约翰·约翰逊收藏品的保管人(图6,图7);伦敦韦尔科姆学院图书馆(图1,图3,图4);不列颠图书馆(图8)。

在我研究和写作过程中给我鼓励、建议和支持的人知道我多么感激他们,但我仍要特别感谢卡尔·菲格利奥、比尔·勒金、基思·麦克莱兰、特里·帕西南、罗伊·波特、蒂那·波斯纳和史蒂夫·沙平,他们的帮助总是多于我的期望。能够在韦尔科姆中心无穷无尽地吸收我同事的历史敏锐性和良好的历史感觉,我深感幸运,琼·奥斯托克、佩内洛普·戈克、欧文·劳登、玛格丽特·佩林和保罗·温特林帮助我避免了很多令人尴尬的错误,琼·劳登在本书附录上也给予了帮助;而查尔斯·韦伯斯特阅读了整部手稿,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对于有时候精神萎靡的我来说也是很好的帮助。

对于本书要致献的人,我最感激。在鲍勃·扬的建议下,我开始了这项研究计划;在漫长的酝酿阶段,他始终耐心地听我阐

4 前言

述想法并提出激励性的建议。我的良伴、知友和诚恳的批评者——玛格丽特·库特，为我提供了持续而毫不保留的支持，而我的儿子塞巴斯蒂安也有力地激励着我，对他深深的爱和歉疚促使我完成本书。这个最终产品不足以表明我的感激之情。

本书的不足之处都由我负责。

R.J. 库特



关于原始资料和缩写的说明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参考了 4000 多种已经出版的颅相学原始资料。要把这些资料连同我查阅过的相当数量的其他参考资料列举出来,显然不切实际,而且我所引用的参考书目也显得冗长。因此,原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的索引就包括了能够让读者快速找到注释中所引著作的完整参考书目。在本书末尾也提供了一个手稿资料列表以及英国颅相学杂志的编年表。除非特别说明,参考书的出版地皆为伦敦。在本书的正文和注释中,“库姆”指的是乔治·库姆。

缩写

- BAAS** 英国科学进步协会
DNB 《英国人名传记词典》
DSB 《科学家传记词典》
EPS 爱丁堡颅相学学会
LPS 伦敦颅相学学会
NLS 苏格兰国家图书馆
NMW 《新道德世界》
PA 颅相学协会



6 关于原始资料和缩写的说明

- * 表示在关于颅相学的公众演讲附录中有条目(本书原版第272页到第300页)



导 论

科学、医学和技术习以为常地矗立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仅仅了解它们的现实作用，对其社会和文化作用的历史却令人奇怪地知之甚少。关于科学机构、学会和专业团体的社会史是确实存在的，因为有关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及科学和哲学之间相互作用的社会研究是存在的。有一份重要文献把科学“时代”看作概念性的社会世界观（Weltanschauung），还有一种正在迅猛发展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正延伸到被遗弃的科学和医学观念的社会建构方面，这种科学知识社会学破坏了科学作为“中立”和/或“可靠、适度、不带情感和本应该有益的”传统观点。现在，即使是在伟大科学家的传记以及其他关于某个特殊学科兴起的范围狭窄的研究中，人们至少可以发现对科学的象征性认识，即科学是特定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中的人（主要是男人）的偶然历史产物。^[1]

但是，如果科学被褻渎成只是另一种社会产物，它的一些种族中心主义的偏见就会暴露出来，通过把科学与历史的其他部分分割开来以及提升科学本身地位的非常做法，就可以发现科学与其创造者的权力关系不可分割。结果，我们很少去关注科学在大众通俗文化中的作用与后果（尽管所有的著作在标题中

很明确地把科学、文化与社会联系起来)。^[2]迄今为止,我们还无法超越这样的认识,“被阿尔伯特·索布尔、乔治·鲁德、路易斯·舍瓦利耶和 E. P. 汤普森等人令人信服和令人同情地加以论述的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中卑微的男男女女,在科学史中还找不到一个。”^[3]科学在社会中如何发挥实际作用,其程度如何,何时、通过何种手段、起着何种作用,我们几乎还没有开始考虑这些问题。人们对科学的真实想法以及他们怎样利用科学已经被作为问题提了出来,而且被认为“在每一点上都和科学家构想的科学一样具有历史的重要性”,但是这些问题的答案还没有出现。^[4]所有人都公然声称,科学“在设计政治学的心理学和哲学基础方面具有支配力量”,^[5]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对设计过程本身所表现出的兴趣少得可怜——关于 19 世纪早期的最少,而那时科学正开始超越宗教成为主要的文化力量。现有的著作很少超越出科学和技术使人们思想世俗化、科学化的论断。只要我们没有大胆重申“人类大众不过是被理性主义知识分子严格训练出来的受骗者”,^[6]这样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对于那些置身于科学史分支学科以外的人来说,在集体行为社会学和科学思想史之间似乎存在着一块名副其实的不毛之地。^[7]

本研究努力通过考察颅相学来开垦这不毛之地的一部分。颅相学在 19 世纪是最受大众欢迎的通俗“科学”,也是在前达尔文时期生命力最旺盛的科学之一。但是,本研究不打算做不可能之事,即直接估量这种知识对意识和行为的影响力。与政治学、经济学或宗教一样,科学从来没有作为独立的力量存在于真

空之中。科学思想也和其他思想一样,其影响只能在科学思想及其坚持者被降黜到驯服物的地位时才能量化。这是我们的标题中为什么会出现“文化的”这个字眼的一部分原因:正如特奥多尔·阿多诺所提出的,“文化……可能就是排除一种能够衡量其心态的先行条件”——一种或许可以解读为玛丽·道格拉斯的文化定义,“一片空白,是一个极其受人尊重的空荡的文件架”的情感。^[8]

这里所使用的“文化的”一词特指包含在科学知识而且经由科学知识传播的标准化假设。由于我们对科学的这方面的兴趣与本研究中理解颅相学知识的方法密切相关,先对这个课题本身进行一些描述是恰当的。

对课题本身进行概括是轻而易举之事。18世纪末,在弗朗兹·约瑟夫·高尔*这位成功的维也纳医生的发扬光大之下,颅相学(或者高尔所说的“头骨学”)成为一种有关大脑和性格科学的综合理论,它建立在下列信条的基础上:(1)大脑是思想的器官;(2)大脑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而是精神器官的一种集合物;(3)这些精神器官或生理官能在大脑上位于不同的功能区;(4)如果其他因素相同,某一个精神器官的相对大小就被看成该器官表征的能力大小的指数;(5)由于头盖骨在婴儿发育时期骨化并覆盖住大脑,所以外部的头骨学方法可以用来诊断精神官能的内部状况。^[9]

虽然今天人们普遍记得住的只是高尔学说的最后一部分,但在两个世纪前,其学说的所有内容和整个体系都激发了人们的热切关注。正如医学史家所指出的,高尔的学说标志着与早

期关于大脑及其功能的著述的重大分离,关于思想和大脑的问题第一次被简化到动态生理学和生物学的单一领域。然而,正如高尔本人所注意到的,无论是把大脑当作思想器官的观念还是大脑定位的思想都可以在古代找得到,^[10]但高尔第一次把精神现象以及(先前被放在心脏和其他地方的)人类感情看作纯粹的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的器官问题。他也是第一个认为大脑功能的定位必须取决于对社会中的人类和自然中的物种所进行的经验性的自然主义研究。如果有人追溯“功能”概念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心理学现象和社会现象中的应用,人们就会在高尔及其追随者的著作中发现其起源。^[11]高尔在神经解剖学方面的开拓性工作进一步确定了他在医学史上的地位。直到1810年他的《图集》出版,这才清楚地证实,“大脑的脑回并不像肠子或通心粉那样随意地盘绕,而是具有确定模式的结构”。^[12]

然而,使得高尔的历史贡献复杂化的部分原因在于,他的学说并没有建立在他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研究的基础上。作为一种以先天的精神官能为前提的行为主义心理学,颅相学的可信性仅仅来自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联系,高尔的神经病理学和人相学之间大范围的相互关联就是如此。高尔对其实验方法的自我描述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在我的房子里召集了許多人,他们来自社会最底层,从事各种职业,如小型出租马车车夫、街道搬运工等等。我取得了他们的信任,给他们一些钱,还给他们分发葡萄酒和啤酒,诱导他们坦诚地谈话。当我看到他们情绪不错时,就要

求他们告诉我他们所知道的彼此间的一切事情,无论是好的品性还是坏的品性,而我则仔细检查他们的头颅。这就是被公众如此热切使用的头骨学图表的起源;甚至艺术家也接受了这种图表,把它制成各种面具在公众中大量销售。^[13]

因此,尽管颅相学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前提使它比维也纳人的另两项成果(催眠术和精神分析)更具有科学外形,但是根据现代生理心理学可以追溯到高尔的事实而推断出高尔的头骨学及其名望依赖于他的医学成就,则是相当错误的结论。

高尔最初没有打算把性格与人相学的标记或“符号”联系起来。在亚里士多德学说中,这种联系表现得很明显,亚里士多德关于四种典型的脾性描述至今仍是对人进行分类的出发点。吹捧高尔的传记作者很重视这样的事实,即高尔还是9岁孩子的时候,就已经观察到,他的同学中记忆力好的都是那些眼睛大而突出的人。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另一个事实,即在高尔生活的时代,把人相学与性格直接联系起来在民间文化中很普遍。与高尔同时代的瑞士牧师约翰·卡斯珀·拉瓦特尔(1741—1801)所写的人相学著作就置身于这样的传统中,这些书在18世纪末很受欢迎。拉瓦特尔虽然是一个福音派信徒和坚信奇迹的人,也是敏锐的医学观察者,在他的思想中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头骨腔的观念,

(头骨腔)显然正好包含了它里面的大量物质,随着人们生

命的每一个阶段的不断成长而一起成长。因此,大脑的外部形状完美地印在头骨的内部表面,同时也是外部表面的轮廓模型。^[14]

- 5 拉瓦特尔的理论也基于大量的经验观察,但是他和高尔不同(高尔的学说不依赖于拉瓦特尔的理论),他不打算去解释那些与面部征候有关的人性的诸方面,也没有人普遍认为他有这样的打算。正如一位 19 世纪早期的评论家所说,人相学从不自称“去辨别别人的最初习性,更不去说明有关我们天性的简单的基本官能”。^[15]

高尔对解释人类天性的关心使得颅相学不仅仅是另一种有关性格的学说,甚至不仅仅是一种大脑理论,它最终成为评估和研究人们在自然和社会中所处地位的一种世俗工具。无论人们有没有从把大脑作为思维器官的观念向前迈进一小步,转向把思维作为物质大脑的观念,高尔把精神现象归纳为有机物质的功能破坏了心与物或身与心之间的二分法,从而动摇了笛卡尔哲学中上帝存在的理论基础。根据笛卡尔的机械论哲学,精神是有感知力的,思考和意识的行动可以证明这点;心不像无感觉的物质只有通过粒子的碰撞才能激活,有感知力的生命需要的是非物质信念,机械论者把信号归之于上帝。^[16]心间接地证明了上帝。相反,把心仅仅作为身体的一部分或仅仅是有机物质的功能,会消除对非物质信念的需求,因而会藐视上帝赐予人类的唯一天赋,进而藐视上帝本身。高尔在这一点上努力掩盖(见第一章),但是在别人看来,他的学说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是否定

上帝的。

这不是说高尔在这些问题上完全是孤军奋战，他只是在努力规划人相学科学方面单打独斗。^[17]唯物主义理解自然的方法在 18 世纪很普遍，甚至用这些术语去了解大脑的方法也并不陌生。实际上，就在高尔开展研究的同时，法国思想家也在设法用纯粹的生理学术语来论述精神现象。当时一些人试图找到一种能把外部面貌与内在特性联系起来的科学，卡巴尼斯就是之一。^[18]高尔与法国思想家不同的是，他坚持天赋心理学，其矛头直接针对感觉论者或洛克式的环境主义心理学；更不同的是，他所采用而且详细阐述的神经病学，与法国思想家依赖的神经病学是冲突的。但是，就高尔对大脑进行自然主义研究的潜在目的来说，高尔及其理论与法国思想家的著作一样，都是时代的产物，因为对大脑和行为（尤其是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兴趣日益浓厚是 18 世纪晚期的知识氛围。^[19]

因此，使高尔的学说出类拔萃的，既不是它研究大脑的方法，也不是它的潜在动机；而是该学说使得方法和动机不能被人忽视这个事实。就像伽利略的直言不讳粉碎了 17 世纪早期已经残破不堪的亚里士多德宇宙论一样，高尔的学说通过把注意力集中于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方法和直觉，同它们进行了毫不含糊的战斗。无论处于什么情况，他的学说总是一方面能激起大众的兴趣，另一方面能打倒传统权威的势力，而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这种反应是确实存在的。由于该学说的抱负是在经过等级分工的脑力劳动基础上全面阐释人类的天性，由于该学说承诺，通过一次抚摩头颅能解释人们的性格、个性、有无

天赋、犯罪和疯狂等方面的秘密(因而,能暗中直接操纵和控制行为),同时也由于该学说乐于理解乃至最平庸者的智力,因此,在剧烈而广泛的社会、经济变化导致各种各样的社会、心理、知识、政治和宗教的问题已经恶化和加剧的情况下,高尔的学说把这些问题都纳入它的轨道之中。对于那些易于接受该学说潜在价值的人而言,它似乎提供了一种构思和组织社会生活的革命性的新基础。颅相学与行为学和精神分析学的通俗版本类似,甚至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马克思主义形式类似(但是它比这些形式中任何一种都更为普及、更有用),对于某些人而言,颅相学既是一种启蒙和希望的信条,也是一条能涤荡混乱与迷惑从而使人精神振奋的河流。然而,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该学说的普及性和教条主义,高尔的思想在其他人看来是那个时代最大的骗局,蛊惑大众并使他们产生徒劳无益而危险的期望。但是,无论人们接受还是拒绝,无论是整体还是局部,无论是在特殊的社会、政治、科学、医学、哲学、宗教的基础上还是在心理的基础上,颅相学都把“人类思维”的抽象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在理性时代与资本时代的中间时期,不管是作为目的还是对象,这种抽象已成为权力斗争的焦点。

高尔的《解剖学和生理学》(1810—1819)直到1835年才被翻译成英语^[20],因此高尔本人的著作在英国几乎没有人参考过,但是他的思想至少自1800年起就在英国为人所知,那时《医学和身体杂志》认为高尔的思想“值得好奇者的关注”。从那以后,在人们对后革命的剧烈动荡和城市工业未来感到震惊的背景下,高尔的思想广为传播,几乎所有的医学、文学和通俗杂志

上都展开激烈的辩论。^[21]从 1810 年代中期起,经过 J. G. 施普茨海姆* 及其后的乔治·库姆* 的普及工作,高尔的思想在英国得到了进一步传播。施普茨海姆,曾经是高尔的学生和合作者,1813 年回英国之前与高尔分道扬镳。库姆,一位青云直上的爱丁堡律师,主要对颅相学应用于社会和道德改革感兴趣。为了吸引更多的具有实践精神的改革者关注颅相学,他们在不改变高尔学说的基本要点的情况下,以不同于高尔的方式对颅相学进行详尽阐述。因此,正如许多学术性出版物所证明的,颅相学将成为英语世界中自由思想的重要媒介,有助于促进刑罚学、教育和治疗精神病患者等方面的重大改革。^[22]早期维多利亚文化的杰出人物,如撒缪尔·柯勒律治、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哈里雅特·马蒂诺、撒缪尔·斯迈尔斯、乔治·亨利·刘易斯、奥古斯特·孔德和亨利·圣西蒙,在某些方面已成为颅相学知识的保护人。对于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罗伯特·钱伯斯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的进化生物学以及詹姆斯·亨特和皮埃尔·保罗·布罗卡的体质人类学而言,颅相学是其基础。颅相学也在英语的文学作品中留下了印记,尤其是在夏洛特·勃朗特、爱德华·布尔沃-利顿、乔治·艾略特、埃德加·爱伦坡、沃尔特·惠特曼、纳撒尼尔·霍桑和赫尔曼·梅尔维尔的作品中,人们曾经从他们的颅相学兴趣的角度对他们加以研究(近似于辩解)。^[23]

以任何标准来看,应该承认,颅相学对早期维多利亚文化的各种知识和社会层面所作的贡献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就像把当代神经学和心理学的某些方面追溯到高尔一样,简单地依据

颅相学对现代学术优先考虑的零碎之事所作出的贡献来研究颅相学是危险的做法。一方面,这样的研究使得这门学科惹上了年代错误的麻烦,另一方面,它模糊了颅相学作为知识主体所具有的持久而不太明显的政治意义:自17世纪以来,在社会关系和社会价值发生最剧烈变动的时期,在人类探索自己在自然中的真实地位方面,颅相学傲立顶峰。研究19世纪颅相学的社会史仅仅根据一场改革运动来想象这个学科,同样无助于恢复这门知识的广泛现世意义和政治意义。当然,在19世纪的确有一场重要的颅相学“运动”,它有自己的杂志、学会、追随者和“影响”领域;但是当颅相学被这样零散地研究时,它作为一门有关人类天性的科学,实际上仍然只是社会的附带现象,或者只是对社会有一点影响的外来事物。^[24]

虽然本研究旨在提供一种全面的颅相学历史,它受到的却是另一种颅相学历史价值观的激励和鼓舞,即知识和知识所处的社会是互为彼此的重要部分。因此,本研究在强调颅相学作为一种自然知识主体的情况下,通过考察颅相学中的人、思维和自然的观念,大略说明这些观念与相互关联的经济、政治和宗教领域的关系特征。

独特之处在于,颅相学欢迎这种方法,同样的原因也曾经使得颅相学要么成为一个不值得进行认真的历史考察的古旧话题,要么只适合对现代性进行零碎的考察。由于颅相学徘徊在科学与伪科学、自然与文化、科学与社会所树立的知识界限之间,它促使人们去揭示和评价那些界限。颅相学在这方面具有双重的启发作用,因为颅相学家实际上使这些界限通俗化了,他

们把当时人对这门知识的反对当作一种社会“杜撰”来加以回应。因此,透过这种被遗弃的有关人类天性的科学知识的历史,⁹我们能够拥有一面镜子,不仅可以照出科学的现代形象,而且可以看到其界限的形成。

由于颅相学现在在很多方面似乎是一幅狄更斯式的科学漫画,所以颅相学研究不仅能放大科学蕴涵社会和思想意义的途径,也能放大人们根据社会背景重新界定这些意义的途径。在英国,颅相学作为具有夸张的象征符号的科学体系而被接受,它展示了这些符号是怎样起着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另一类编码透视图(也即“调解”)的作用。正如第四章所要揭示的,在颅相学通过科学来揭示社会利益的表现形式的众多途径中,没有一种能像头颅符号及其内部映射那样清楚。

颅相学是对科学史重新进行社会解释的一个有益例证,这一点并没有被忽视。史蒂文·沙平在一系列论文中,非常出色地利用了他在爱丁堡的颅相学事业,揭示了社会背景支配着科学的应用以及对特殊的自然现象进行理解的方法。^[25]沙平的研究是一个更加令人信服的阐述,它特别针对的是这样一些历史学家,他们把“社会”(the social)仅仅看作塞入科学知识的历史阐述或评价中的一个附加因素。

本书从第一章到第三章的部分目的就是为沙平所勾勒的颅相学兴趣及方法进行详细阐述。然而,贯穿始终的潜在想法是推翻沙平的观点。从第四章到第八章,历史叙述的目的完全不同。本书主要针对以下人士而作,即那些在解释历史现实的社会原因时倾向于把“科学因素”仅当作塞入其中的一个附加“因

素”的人,以及那些倾向于认为这些科学因素在前达尔文时期仅仅偶然地出现在大众思想和文化中的人。颅相学在19世纪普通人中的广泛普及和流行(包括在不太普通的激进工匠中的流行)使得“达尔文产业”的企业家们精心打造的居高临下的地位被动摇。19世纪早期成千上万的颅相学出版物和成百上千的颅相学演讲者的存在,清楚地说明把“达尔文”视作解读维多利亚时代科学的神奇密码是天真的想法。这些资料表明,早在“进化论”出现之前,在各种各样的社会、道德、政治和进化的思想中世俗地应用科学自然主义的闸门已经打开。1838年,当达尔文刚刚从“小猎犬”号航行归来,着手整理他关于“物种转化”的第一本笔记时,颅相学理性主义者已经为大众和神学哲学界从思想上接纳达尔文学说做好了充分准备,而且不断地培育着这种氛围。社会和道德方面的颅相学扛鼎之作是库姆的《人类体格》(将在本书第四章中讨论),该书已出版了十多年,自1835年起其廉价的普及本已经售出4万多册。历史对于1860年托马斯·赫胥黎在牛津与威尔伯福斯主教的对证所进行的小题大做的研究完全遮盖了这样的事实:库姆的这本书所产生的理智和情感热度远远超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1859年出版时所唤起的热情;它同样遮盖了下面的事实,1844年(库姆的朋友,同为颅相学家的罗伯特·钱伯斯)匿名出版的《天地万物自然沿革的痕迹》引起的讨论比《物种起源》多得多。然而,与《人类体格》相比,《痕迹》引发的争议更少,其读者也更少。^[26]转动历史的望远镜,与其说达尔文是大众对科学自然主义进行争论的出发点,不如说达尔文是人们最终转向这种争论的进一步表现和源泉。

正如欧文·查德威克所指出的,达尔文的工作不是启蒙理性主义的“起因”(cause),而是其进一步发展的“诱因”(occasion)。^[27]

这并不是说,在达尔文之前的英国,颅相学是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唯一传播者(也不是说,那就是颅相学所传播的全部内容)。当时的地质学、植物学和心理学以及更为普遍的边沁主义研究者和普及者也为这项事业助了一臂之力。颅相学家仅仅是19世纪初这类思想最显眼、声音最响亮的代言人。法国大革命之前,人们相信科学和进步是不可避免的;(由马尔萨斯等人所发起的)对这种信仰的早期反应也被逆转过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颅相学家。但是,通俗的颅相学除了重新开启18世纪英国曾经存在过的对科学和进步所抱有的温和而又明白无疑的非浪漫性的理性人文主义信仰之外,还做了很多:它的特别成就在于,对那些因人生地位和等级或政治面貌而迄今为止回避这种信仰的人,它向他们打开了信仰之门,并促进了其进程。这类公众与其年长者相比,一般不太了解也不太关心自然哲学讨论中的神学细节。对他们而言,颅相学把精神活动归纳到受自然法则支配的自然物的范畴,是把科学当作一种宇宙决定论哲学或是由自然引起的宇宙论的主要手段。

本研究关注的就是这种感知,而不是为申明颅相学在这种感知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辩护。对颅相学历史作用的申明将在探讨这种感知的意识形态特性的过程中不证自明。这又把我们带回本书的标题,因为研究人们通过大众科学进入一系列独特的现实感知的问题,意味着不仅仅要处理科学的社会应用问

题以及对科学的普及进行定性、解释其原因等问题。与那种告诉我们“好与坏、允许与禁止、美好与丑陋、神圣与亵渎”^[28]的文化定义相结合,它将从根本上探索人类对现实的重新审视以及重塑社会和个人意识所产生的后果。通过聚焦于工业革命中在社会上广泛传播而且意识形态复杂的事件,对颅相学的历史追溯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广角的多棱透镜。



第一部分

历史编纂学

什么样的手能够掌握居于人的头骨之下、头脑之中的东西！什么样的血肉之指能够从外部掌握休眠或燃烧于内部的力量深渊？神性本身已覆盖了这座圣山，它是人类的奥林匹斯山或黎巴嫩山，有着一片隐藏其秘密并将成为其住所的小树林，它是最能隐遁能量的实验室。我们战战兢兢地认为地球是圆形的天体，其中居住着一种生物，从混沌中出现的一束光可以使世界生色和明亮，或使世界荒凉和崩溃。

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人相学颂词”，
载 J. C. 拉瓦特尔：《人相学片段》，莱比锡，
1775—1778 年，翻译在《分析评论》
1789 年第 5 期，第 457 页。

第一章

源于大脑井

恼怒来自于大脑井，看其表面，它是一种地貌，人性栖息于千座帐篷之中，依据激情、官能和力量而安排有序。第一个到达表层的人所获得的收益非常多，在那里人性由表象来说明；但是当大脑解剖开始时它又再度丧失。

詹姆斯·约翰·加思·威尔金森：《人的身体及其与人类的联系》，1851年，第22页。

真理无疑是那种不能被反驳的谬误，因为它在长期的历史烘焙过程中被硬化成一种不能改变的形状。此外，真理问题，它适于反驳谬误并反对其外观的权力，它发展的方式……难道这一切没有构成一种历史，一种我们称之为真理的谬误史？

米歇尔·福柯：“尼采、谱系学和历史”，载《语言、反记忆和实践》，牛津，1977年，第144页。

历史学对颅相学的兴趣几乎与颅相学本身一样古老,颅相学研究在很多方面具有启迪作用。凭着自身的文本资料,颅相学被当作一个选题加以研究。这种历史兴趣的历史几乎同颅相学的实际历史一样复杂。毫不奇怪,这种(历史兴趣的)历史与当时颅相学的多种用法一样,具有不同的定位。它的一个极端是对生理学的心理学起源所作的严肃的哲学思考,比如 J. D. 莫雷尔(1840)、乔治·亨利·刘易斯(1857)和弗雷德里克·兰格(1881)等人,这些思考在人们对于颅相学的科学性所进行的最初论战还没有尘埃落定的时候就已经写成了;^[1]另一个极端是有关头骨学的补白式的文章,在通俗的商业杂志以及古董式的
16 过往科学和医学杂志都对头骨学展开过讨论;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则是关于颅相学和颅相学家丰富信息的最新社会史。

但是,如果有关颅相学的二手文献所处的立场完全不同,那么从读者的观点来看,它就卷进了一种常见的解释性难题,即社会意识形态的利益在哪里终结,独立的历史分析和反思从哪里开始。在我们对颅相学作为 19 世纪初社会意识形态的知识资源进行考察之前,也要考察这些颅相学的历史或明或暗地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利益的知识资源的方式。由于本章的潜在目的是阐述社会学方法的必要性,我们可以用它去了解过去的人们是否相信颅相学的真实性,因此,有关颅相学历史的其他论述不仅可以使我们自己的方法更加突出,而且也非常好地预示着,人们赞成 19 世纪早期颅相学的真实性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具有相对性。对以前的历史论述进行考察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在后面的探讨中我们将用这种方法去表述一些最基本的历史和

传记信息。

辉格派和修正派

直到最近,对颅相学的历史研究有两种方法。虽然这两种方法并不互相排斥,但在多数情况下还是能够加以区分的。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称之为“辉格派”和“修正派”。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在《辉格派的历史解释》(1931)中为颅相学的辉格派诠释贴上了标签,设定了标准。毫不夸张地说,该书对迄今为止的历史所进行的解读,以及它所坚信的“与现在相冲突的过去的历史都是不真实的”观点,使它充满了自以为是、过分简单化和公然的道德说教。虽然自巴特菲尔德发表他的小册子以来,辉格派对颅相学的诠释已经在缩小阵营,但它们绝非销声匿迹。我们经常在一些“业余”作品中觅得其踪迹,这些作品都是从事科学和医学专业的人利用“业余时间”写就的,但是人们觉得(或期望)他们的权威延伸到历史领域。一位医学荣誉退休教授在1977年的《皇家内科医学院杂志》论及两位19世纪的杰出医生(恰巧也是颅相学的积极支持者)时,指出:“这样高智商的人竟然相信颅相学这种无稽之谈,真是非比寻常,但是在一段时期里颅相学诱惑了整个国家,尤其是上层阶级,他们的事例绝非公众和医学界受骗上当的唯一例子。”^[2]这位荣誉退休教授错误地把他的论据与颅相学的流行联系起来,只能更突出地说明他们在评判过去时所带有的自以为是的傲慢自大,这是辉格派著述的特征。

但是,这还只是辉格派史学不太重要的缺点。更严重的是,辉格派史学把现代科学和医学看作是客观的和中立的,并在暗中使之合法化。由于辉格派对颅相学的描述大都是由那些关注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所写的,毫不奇怪他们的观点会偏向该方面。实际上,许多从事现代科学和医学研究的人撰写颅相学著述,就是专门为了捍卫科学的中立性(就像其他与此类似的人为此目的而沉溺于李森科学说*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对于这些人而言,颅相学似乎是一个现成的例子,说明知识因为科学范围外的因素而产生明显缺陷,因而与“真正的”科学形成了有力而鲜明的对照。通过参照“正确的”科学,循环往复,人们形成了一种关于“错误”科学的观点。但实际上,把颅相学教条地解释成错误的科学或“伪科学”,其结果与其说是对过去人们相信颅相学的解释,不如说是一种科学资本的积累,它将被用来支撑现代科学及其从业者不带社会和意识形态利益的形象。^[3]

这种源自颅相学的资本经常被夸张地用来攻击其他所谓的科学妖怪。例如,在1955年《美国心理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心理学家卡尔·达伦巴赫(Karl Dallenbach)通过把精神分析简单地类比成颅相学,来嘲笑被他称作科学虚妄的精神分析。近来,诺贝尔奖得主彼得·梅达沃(Peter Medawar)爵士从科学家转行为作家之后,也利用颅相学来反对精神分析。他在一个宏大的计划中试图确立划分科学和神话之间的明确界限,利

* 李森科学说(Lysenkoism)是由特罗菲尔·李森科发展起来的生物学理论,认为在后天环境中获得的特征有可能被继承。——译注

用颅相学来反对精神分析“极其有力的花言巧语”是其计划的一部分。批评家和生物学家史蒂文·罗斯(Steven Rose)为了动摇智力测试的科学有效性,在最近一篇论文中两次把汉斯·艾森克(Hans Eysenck)挑选出来,说他用“19世纪颅相学家的方式”来进行智力测试,似乎这样一比较,艾森克的可信性就被摧毁了。罗斯显然忘记了他的对手已经出了这样一张牌:在关于心理学的事实与虚构的通俗著作中,艾森克称赞了达伦巴赫的文章,并同样通过与颅相学的比照来反击罗斯之流,证明自己的科学性。^[4]

对于这种利用和反利用颅相学的现象,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其利用者显而易见想要获得的评价。更确切地讲,值得注意的是对颅相学的这些利用使得引导这些评价的机制——即真相与价值、科学与神话、科学与社会、自然与文化、科学与科学主义、科学与意识之间的二分法——在暗中得以合法化的方法。这些划分在现代思想中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一般的历史学家很少认识到它们是如何构成在历史上偶然出现的、人为创造出来的形而上学的核心部分的,而这种形而上学自19世纪初孔德的著述以来已被人们称为“实证主义”。^[5]有趣的是,虽然孔德本人在学科发展过程中为了进一步区分“形而上学”阶段与“科学”阶段,大量利用高尔的颅相学(参见第四章),但是二分法的起源却要追溯到更远的历史。正如埃弗里特·门德尔松(Everett Mendelson)试图解释的,为了确立其他知识体作为价值超凡的真理试金石的印象而鉴定某些知识体为“谬误”的过程,在17世纪资本主义秩序出现时就是“社会强加于人而人们又自觉接受

的”。^[6]当时,认识外部自然的新的计量体系正处于扩张之中,同时出现了一种新的状况:一个阶级的支配地位由其在劳动过程中作为控制者的作用所决定。正是在那个时期,秘术、炼金术和魔术(认知的内在形式)作为异常和反文化的形式被迫转入地下活动。^[7]形而上学把科学或关于外部自然的新知识与可能会超越其政治权威的一切事物隔绝开来,这么做的原因也成为对新变动了的社会秩序及其思想控制进行理性化和合法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乔治·卢卡奇早在1923年指出的,现代科学及其方法论在对现代科学赖以产生的社会关系进行具体化并使之显得自然、客观或非形而上学方面是主要工具。^[8]经过现代科学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关系被隐藏起来。因此,正如R.M.扬简短有力的格言中所说,现代科学“是社会关系”,或是植根于其历史起源中的社会关系。^[9]

从这个角度来考察,那些把颅相学作为一种渗进社会的知识例证来看待并试图直接或间接对价值无涉的现代科学智慧进行合法化的人,完全是在从事一场意识形态的运动。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区分是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知识分子的能动创造,忘记了这点而去评价颅相学知识,或评估性地利用这门知识,只会进一步掩盖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主观地“被客观化了”的领域。我们将会发现,这种意识形态运动也是19世纪资产阶级颅相学家亲自发动的意识形态运动的一部分,当时他们试图使颅相学从表面上“漏洞百出”的形象中分离出一种“纯净”的形象,当时他们也猛烈地攻击教会中的对手,说他们不过是“形而上学论者”。如果有人被认为是“以19世纪颅相学家的风格行

事”，那么，与其说是批评他或她的工作恰巧（或被希望是）在伦理上过时了，不如说是那些通过鞭挞实证主义颅相学阐释来利用这门被围攻的头骨学说的人过时了。

从表面判断，辉格派颅相学史观的整个基础已经被专业的社会史学家和医学史学家著述中的修正派史观所摧毁。^[10] 这些历史学家对于人们避免对颅相学进行认真的历史探讨的状况作出了反应，他们通过揭示颅相学在知识分子和大众层面所具有的深度和深远的意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我们还不能说，²⁰修正派史学家在挑战辉格派史观显而易见的民族优越性方面，已经成功地动摇了颅相学研究中不太明显的实证主义现状。相反：修正派为了自身的利益，更加关心历史背景的精确描写，而不是关心辉格派研究科学的方法所带有的社会形而上学含义，因此他们也在不经意中使得这种现状及构成这种现状的社会关系合法化。修正派关注的焦点是颅相学作为社会医学“运动”的作用，对于这门知识本身则未加质疑也未加考察。修正派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把颅相学当作一种“科学主义”而进行了片面的研究。^[11] 换句话说，他们大体上只对人们大概推想出来的这门科学的社会应用以及功能进行了考察，（就像那些讨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性质却没有同时讨论达尔文思想的社会性的人一样）他们没有触及对这门知识进行“纯净”与“被社会滥用”之分的形而上学，因而使之得以维持下来。

当修正派试图解释颅相学“运动”在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兴衰时，他们含蓄的实证主义观点变得明白无隐。因为这个原

因,他们部分地接受了辉格派总是认为不证自明的观点:颅相学是一种“时尚”。因此,修正派也在不同程度上通过社会描述来逃避社会解释。然而,修正派通过特别关注态度更认真的颅相学提倡者,驳斥了辉格派显然自以为是的观点,即所有相信颅相学的人都是无知而轻信的时尚追随者。正如他们所看到的,颅相学运动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这样的事实来解释,即在当时的背景中,颅相学至少是一种具有准合法性地位的科学。毕竟,当时科学界和医学界批判颅相学的许多人士接受了高尔学说的某些内容。随后,修正派进一步解释(19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以知识精英形式表现出来的颅相学运动的衰落,认为其部分原因是颅相学作为时尚已日益衰竭,部分原因是知识的增长最终把颅相学赶下了科学舞台。因此,在触及“科学真理”方面,修正派对颅相学的解释实际上只比辉格派“胜利者的
21 宣传者”的解释稍微复杂一点。与辉格派一样,他们也相信,通过科学不可避免的进步,从前的颅相学支持者最终将“恢复其理性”。^[12]

事实上,只有经过19世纪后半期神经生理学研究的进步,颅相学的某些方面才第一次获得了科学可信性。正是在1861年的巴黎人类学协会的一次著名会议上,皮埃尔·布罗卡(1824—1880)展示了他在“语言脑回”上的重大发现。此后,布罗卡通过进一步观察,证明了大脑前额第三脑回的后部是言语表达能力不可缺少的脑部结构。鉴于他的出发点是反驳颅相学家,具有巨大讽刺意味的是,今天被我们称之为“布罗卡脑回”的区域就位于高尔所标注的语言官能区。除了这种一致性之外,

布罗卡的发现证实了颅相学关于大脑功能分区的概念在总体上是正确的,而且大大加快了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13] J. 休林斯·杰克逊、约翰·巴克尼尔、詹姆斯·克赖顿—布朗、戴维·费里尔和查尔斯·谢林顿等人在 19 世纪末的研究实际上确认了颅相学的基本原理。克赖顿—布朗在 1924 年甚至写道,“颅相学家是正确的,……今天我们都是颅相学家……因为我们已经接受颅相学家所坚持的所有重要原理。唉!即使他们最薄弱的地方——他们的头骨学说……已经做得很好。”^[14] 就像同时代的神经生理学家都注意到的,当人们开始讨论大脑皮层的结构时,高尔和颅相学家的影响依然存在。^[15]

因此,颅相学在 19 世纪晚期非但没有离开科学舞台,实际上是被推上了科学舞台。但是对修正派关于颅相学兴衰的历史图解形成挑战的是,颅相学在被如此“科学地”发展之后,它并非以社会的和科学的方式获得发展。虽然维多利亚晚期的一些人把新的科学发现欢呼为新的颅相学运动的基础,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几乎完全没有回报。^[16] 到了 20 世纪,唯一幸存的大众化颅相学是通过头部的隆起解读性格和预知未来,它们在二战之前的布莱克浦、布赖顿和莫克姆的码头上仍然可见。

在 19 世纪下半叶,颅相学事业凸显了关于颅相学的两种不 22
和谐的认识,一种是把颅相学当作一门科学,另一种是把颅相学当作一门与社会相关的学科,而辉格派和修正派都没有对此进行解释。但是造成这种有待解释的不和谐状况的,并非只是 19 世纪下半叶的颅相学事业。在 19 世纪上半叶,也可以发现矛盾的存在,它建立在与颅相学的正确性及其科学无用性之间的上

述关系正好相反的基础之上。为了编年的需要,同时为了(在下面两章中)证明在辉格派史学家所坚持并被修正派史学家部分重申的真理效用图式之外进行历史阐述的必要性,我们有必要就这个问题解释清楚。

英国对颅相学的接纳

颅相学在 19 世纪早期远没有被当作完全可信的科学,从它在英国发端开始,就常常被当作伪科学和伪哲学。1802 年,《每月评论》发表了医学博士约翰·耶洛利关于这门科学的最早评论,为该科学被当作“不切实际的空想”树立了一个永久的先例。^[17]其他杂志对颅相学的态度与人们对 18 世纪卫理公会的反应没什么两样,都赞成这样的观点,即颅相学的传播者是一些愚蠢的狂热者和诡计多端的骗子,轻易地得到了头脑简单者、行为古怪者、好奇者以及容易上当受骗者的青睐。根据 1805 年《文学杂志》的说法,成群结队去欧洲大陆听高尔博士演讲的人正是后者,他们天真地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解开人类能力之谜这一伟大发现的钥匙”。^[18]1808 年,当高尔和施普茨海姆把他们关于大脑和神经系统的《论文集》呈交给法兰西学院时,一些医学界人士对于高尔学说是异想天开的胡思乱想的想法有了一时的改变。^[19]尽管如此,高尔被当作“哲学骗子”的总体形象在报刊中并没有发生迅速改变。1820 年以前,在《爱丁堡医学和外科杂志》、《伦敦医学丛报》、《英国批评家》、《每月批评公报》、《批评杂志》、《文学杂志》、《每月评论》、《季度评论》、《奥古斯都

评论》、《折衷评论》、《爱丁堡评论》、《绅士杂志》、《新月刊》、《布 23
莱克伍德杂志》以及《文学报》中，颅相学是被蔑视的对象，而上述所列举的还只是发行量最大的一些杂志。综合它们对颅相学的评价，颅相学被赋予那个时代所造就的一切恶劣特性，从粗鲁、浅薄、幼稚、乏味、教条、荒谬、愚蠢和放纵到科学闹剧、最无耻的骗局等等，不一而足；而那些正开始漫游全国的“狡猾的头骨学家”则被看成骗子、江湖庸医、冒牌货以及巡游江湖郎中，被蔑视为“与其说是傻瓜还不如说是无赖”。^[20]在乔治·克鲁克香克的《颅相学图解》(1826)中，或在 E. F. 兰伯特和 R. 科金等人以霍加思的“人相学家”风格所描绘的怪诞漫画中，颅相学被当作“发烧病人的胡思乱想”的形象(边沁曾经如此批评过)也以生动的双关语的形式而存在。^[21]对于那些喜爱讽刺诗和打油诗的人来说，则有托马斯·胡德的“头骨学”和查尔斯·坦尼森的“颅相学”(两者的著作均出版于 1827 年)^[22]以及据说是由《爱丁堡评论》的编辑弗朗西斯·杰弗里在约翰·戈登的帮助下所写的《头部：一首庄严而诙谐的诗歌》(1816)和长达 90 页的《头部；施普茨海姆的图解》(1817)。一位城市哲学学会的成员还出版了《一个见识普通的朋友在三次滑稽演讲中所讽刺的头骨学》(1816)。早在 1805 年，艾萨克·迪斯雷利的“一篇关于头骨的论文：拉瓦特尔、坎珀、布卢门巴赫和高尔”，也显现了同样的风格；其后，让人感到愉快的书包括《大脑学》(1824)^[24]、约翰·特罗特以笔名出版的《在颅相学中漫游》(1825)、《城市季刊杂志》中发表的文章“颅相学的历史”(1826)和卫理公会传教士詹姆斯·埃弗雷特以笔名出版的《头脑；小詹姆斯论反对神启的颅相

学》(1828)及其续篇《戴在头脑上的头盔;先知丹尼尔论与理性冲突的颅相学》(1828)。迟至1830年,就在理查德·科布登(后来成为颅相学的支持者)的幽默讽刺剧《颅相学家》遭到皇家歌剧院拒绝后不久,^[25]《爱丁堡文学杂志》评论该剧院上演的托马斯·韦德的戏剧《颅相学家:一场两幕滑稽剧》:“尽管颅相学本身就是一出极好的滑稽剧……它却无法促成其他出色的滑稽剧。”^[26]简而言之,正如1806年的《绅士杂志》在前言中对这个主题的评价,人们一致认为

24

通过认真地研究和分析大脑

我们获得愚人的尊严

及人生的巅峰^[27]

辉格派史学家完全有可能认为,以这些讽刺作品为基础给颅相学贴上“伪科学”的标签是合理的。但是完全没有这种必要。因为,在重申现代科学的统一性方面,已经存在着一批更有说服力似乎也更有权威的文学作品:大量基于科学和医学的著作与那些讽刺作品共存,并滋养了后者。当时一些最杰出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对于这门科学所作的否定性表述也被恰如其分地收录到这些作品中。

1803年4月的《爱丁堡评论》中就出现了最早的这类表述。^[28]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后来成为爱丁堡道德哲学学会主席的托马斯·布朗,文章的起因是查尔斯·维勒斯就高尔学说致乔治·居维叶的公开信。尽管布朗(1778—1820)在1803年刚刚

取得爱丁堡医学博士的资格,他已经因严厉批评伊拉斯谟·达尔文的心灵哲学而出名。^[29]与《爱丁堡评论》中的大多数文章一样,布朗的文章语调平和,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这篇文章的写作只是为了推动该杂志的知识整合,从而使它成为受过教育的大众所信奉的“可兰经”,除此之外并无其他目的。对于人们给这门学说贴上“唯物主义”的标签而进行的指责,布朗在文章中未予理会,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布朗文章的上述印象。由于布朗把唯物主义当作一种把人的精神状态与身体器官联系起来的学说,因此他找不到理由来解释为什么高尔对人的精神官能的划分会使他更像唯物主义者而不是更像身心二元论者。尽管事实上高尔在唯物主义问题上努力做一名不可知论者,但这并不为布朗所知,也不为他的同时代人所了解。^[30]而且,布朗本人和其后的大多数反颅相学家不同,他对某些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思想有着浓厚兴趣。^[31]他试图要说明的是,对隐含着唯物主义或否定灵魂的高尔学说的谴责主要基于一种宗教感情,这种宗教感情在严肃的理性讨论中本应无立足之地。^[32]他声称,对这个学说进行真正的知性批判必须完全建立在对该学说的实际哲学主张和科学抱负进行考察的基础上,而这正是他自己应该致力的方向。 25

从哲学层面上来说,布朗对高尔的批判在于,高尔通过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错误地把精神官能具体化为一种有形物,而这种精神官能在里德和斯图尔特的形而上学体系中仅仅是反射性的概念。尽管高尔给他的生理官能所起的名字中有70%与苏格兰常识哲学家的概念相类似,但是布朗并没有像某些现代

学者那样去谴责高尔盗用了他的术语。^[33]相反,他指责高尔无意之中否定了精神哲学的反射范畴所具有的合理意义,并把这些范畴转变成位于大脑表层的离散的运行向量。^[34]布朗意识到,高尔的头骨学理论实际上是一种“人相学”,它并非源于高尔所提出的令人称道的解剖学原理,而仅仅源于“检查头骨所得出的推论”。同样,生理学的前提以及所有用来证明这些前提的证据给布朗留下的印象是:尽管高尔学说中许多内容在原理上是正确的,但是更多的内容存有严重缺陷。在完整地考察了该学说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该学说的确“不太可信”。

12年之后,《爱丁堡评论》发表了一篇关于高尔和施普茨海姆学说的文章,文章基于似乎常识性的普遍的逻辑推理基础,论证了颅相学的伪科学性。这篇文章发表的诱因主要是施普茨海姆出版了备受争议的著作《高尔博士和施普茨海姆博士的人相学体系》(1815),文章作者是医学博士约翰·戈登(1786—1818),爱丁堡皇家学会和外科医生学会的会员,发展势头正劲,正成长为可与约翰·巴克莱匹敌的爱丁堡医学演讲者。^[35]戈登此文的写作正值拿破仑战争刚结束之际,亲英倾向开始强烈,“唯物主义”也由于人们对法国革命“过度享乐主义”的反感而失去了与正统牛顿学说和笛卡尔哲学之间能被人们接纳的许多联系,逐渐具有更多的社会、政治颠覆意义的无神论内涵。^[36]然而,正如布朗的文章没有明显地受惠于法国启蒙思想的迹象,戈登的文章也很少表现出公开宣传反法、反唯物主义情绪的迹象。但是与布朗相比,戈登的语调不太平和。例如,他忍不住要评论高尔和施普茨海姆的观点

纯粹是一堆谬误,没有真理、联系或一致性;是一支语无伦次的狂想曲,在教导大众的伪装下,没有什么能够诱使人把它呈现给公众,不过是一种纯粹的疯狂、十足的无知或最无可比拟的狂妄。^[37]

但戈登的重点是怀疑高尔和施普茨海姆在生理学以及解剖学方面的推论,在这方面他很好地实现了辉格派的历史目标,因为他非常详细的技术性的批判仍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虽然戈登事实上并没有引用可以反对该学说头骨学内容的最珍贵证据,即前窦的存在阻碍了对头颅该区域下面所谓的颅相学器官的直接解读,但是他确实提出了颅腔这个普遍问题。他研究并有力地驳斥了那种认为头脑的大小与智力的高低相称的观念;批评高尔和施普茨海姆没能详细说明每个精神官能的生理限制以及各个精神官能之间的精确界限;指出高尔和施普茨海姆的比较解剖学作为一种测定他们对大脑各部分进行辨别和计数的方法的不足;还提出了许多实质性问题。戈登对高尔和施普茨海姆的解剖方法以及他们对已知大脑结构和大脑组织性质方面所掌握的实际知识的完整性也表示严重怀疑。最后,戈登着力研究他们对大脑的图解。他解释道,他们“关于大脑表层外部或内部的描述”没有一个“是正确的”;“有好几处出现了重大的遗漏;有许多地方的错误很严重”。总之,戈登的结论是,高尔和施普茨海姆

没有给我们的知识库增加一个有关人体结构或功能的事

27 实……,[却提供了]包含着严重错误、极度荒谬、明显的虚伪陈述以及多此一举的引用圣经的混合物,我们认为,那些诚实而聪明的人能够毫无疑问地认识到这两位作者真正无知、伪善和经验主义。^[38]

两年以后,戈登在爱丁堡发表论文《对大脑结构的观察,兼评高尔博士和施普茨海姆博士对该器官解剖的发现》,对该学说进一步进行批判。^[39]因此,一年以后,即1818年,当生理学家和博学者彼得·马克·罗热开始为《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版的增补卷撰写“颅相学(cranioscopy)”条目时,他能够在布朗和戈登所提出的许多同类证据的基础上表达自己作为聪明人的观点,认为该学说是“荒谬的”。和布朗一样,罗热也希望显得完全不受一切“非理性”宗教偏见的影响。因此,他在文章开篇就坚称,他的兴趣仅仅在于评价该学说的生理学观点。他说,把这门知识当作唯物主义和宿命论而加以反对的“愚蠢的”宗教诉求与他的目的没有关系。关于罗热文章的详细内容我们无需多费笔墨;需要说明的仅仅是,罗热的文章正如布朗的论文或1824年由牛津大学钦定医学讲座教授约翰·基德所发表的颅相学评论那样,把颅相学的生理学前提以及高尔和施普茨海姆的大脑解剖学方法挑选出来作为值得称赞的主题,不过这却是在彻底谴责大脑区位理论和与之伴随的头骨学的过程中作出的称赞。^[40]因此,罗热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高尔和施普茨海姆的学说中某些部分(特别是那些较少产生社会争议的部分)要比其他部分具有更多的合法性或“科学性”。罗热引导其读者相信,有些基本

合理的生理学原理已经被不幸地推进到相当荒谬的程度。

到 1842 年,当《不列颠百科全书》第 7 版在新的“颅相学 (phrenology)”标题下原封不动地再版罗热的文章时,对该文章观点的权威性支持已经得到扩大,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步。^[41]在布朗和戈登的评论之外,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和约翰·巴克莱于 1821 年和 1822 年的评论指出了该学说的哲学弱点和解剖学谬误。^[42]埃弗拉德·霍姆爵士在 1821 年为伦敦皇家 28 协会的演讲中对高尔的神经解剖学进行了诽谤,两年以后,查尔斯·贝尔为同一个团体作了类似的演讲,1833 年约翰·基德在他的布里奇沃特论文中重复了类似的诽谤。^[43]此外还有另一篇发表于《爱丁堡评论》的论文,是该杂志编辑弗朗西斯·杰弗里于 1826 年撰写的。此文不仅煞费苦心地汇集了此前对颅相学所进行的所有哲学、解剖学和神学方面的批评,而且还有明显的排外情绪。^[44]至于某些从学术角度对颅相学进行的最严厉的责难,我们可以举出威廉·汉密尔顿爵士* 在 1825 年和 1829 年间向爱丁堡皇家协会提交的论文。^[45]1828 年和 1829 年,医学新贵托马斯·斯通博士也向爱丁堡皇家协会和爱丁堡皇家医学协会递交论文对颅相学提出了其他方面的批评。^[46]

法国生理学家弗朗索瓦·马让迪和 M. P. J. 弗卢朗、柏林生理学家卡尔·鲁道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生理学教授托马斯·休厄尔所从事的研究也进一步使得罗热没有必要改变他在 1818 年的观点。同样,约翰·博斯托克博士、詹姆斯·科普兰博士和詹姆斯·考尔斯·普里查德博士*, 以及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伦敦皇家协会的重要人物威廉·托马斯·布兰德也对颅相

学进行了批评。^[47]到了 19 世纪 40 年代,许多先前支持颅相学的人声称由于该学说没有充分的“科学性”而与之脱离关系(见第 3 章),这也使得反对派的力量进一步强大。

因此,无论辉格派史学家的动机是多么误入歧途,从颅相学在其鼎盛时期被当作不足信的知识这个意义上来看,他们称颅相学为“伪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正如赫兹利特在 1829 年所说,很显然有“上千个记录在案的例子说明这门科学与事实相矛盾”。^[48]可以说,辉格派的唯一错误是他们仅仅看到了硬币的一面而回避了另一面,因此他们能够得出结论:颅相学缺乏重大的历史价值。当我们翻转硬币,注意到修正派证明颅相学运动兴起的那类证据时,这个推论的错误就显而易见了。

医学界和颅相学

在 19 世纪初的几十年里,颅相学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来自医学界。这充分反映在 1840 年以前英国大约 28 个颅相学学会的成员构成上,其中有些学会几乎完全由医务人员构成,极少数几个学会中的医学界人员少于注册成员的 1/3。迟至 1838 年,在医学界人员补充已经下降之后,颅相学统计学家休伊特·沃森* 仍可以有点精确地声称,在英国当时可以确定的 100 个颅相学作家中至少有 1/3 是内外科医生,1000 个颅相学会成员中至少有 1/6 是内外科医生。^[49]诸如约翰·阿伯内西、阿斯特利·库珀爵士、威廉·劳伦斯^[50]以及约翰·埃利奥特森这样杰出的医学权威也对颅相学表示支持,尽管这种支持并不总是很

直率。及至 19 世纪 20 年代中期,在高尔访问伦敦及其全部演讲稿被《内外科医学和哲学周刊》刊载以后^[51],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医学杂志都对这门科学表现出强有力的支持。《内外科评论》断言颅相学是“迄今为止心灵哲学提供给好奇之人研究的最明白易懂、最有条理的体系”,该刊编辑詹姆斯·约翰逊在别处也公开支持颅相学;《海内外医学评论》还发表了几篇高度称赞颅相学的文章,其编辑约翰·福布斯是颅相学学会的理事之一;而《柳叶刀》杂志从 1823 年创刊到 1851 年竟把 600 多页的篇幅奉献给这门“最美好、最有用的”科学,其编辑托马斯·沃克利从 1824 年起就是伦敦颅相学学会(LPS)的成员。^[52]

医学出版物上连篇累牍的报导造成的结果是,当时的医学研究者几乎没有机会避开这个主题;他们不仅发现重要的学术杂志鼓励讨论颅相学,而且还发现医学教材和他们课程中的许多讲座也推荐颅相学。1832 年伦敦医院的外科医生亨利·霍尔姆* 在一所医学院中开设了第一个完整的颅相学课程,到这时,颅相学实际上已经成为医学教育的一个常规内容,甚至有人向罗伯特·皮尔爵士提议把颅相学作为医学教育的正式内容。^[53] 约翰·埃利奥特森是伦敦医科研究者中的佼佼者,他于 1823 年创立伦敦颅相学学会,他所编医学教材的很多版本都收录了颅相学论述,他在圣托马斯医院和萨瑟克的格兰杰解剖室 31 (其所有者理查德·格兰杰从 1825 年起是伦敦颅相学学会成员)的教学中也讲授颅相学。^[54] W. W. 斯莱和约翰·埃普斯* 就像伊拉兹谟斯·威尔逊在米德尔塞克斯学院做过的那样,在德莫特医学院的演讲中可能也包含了有关颅相学的讨论。约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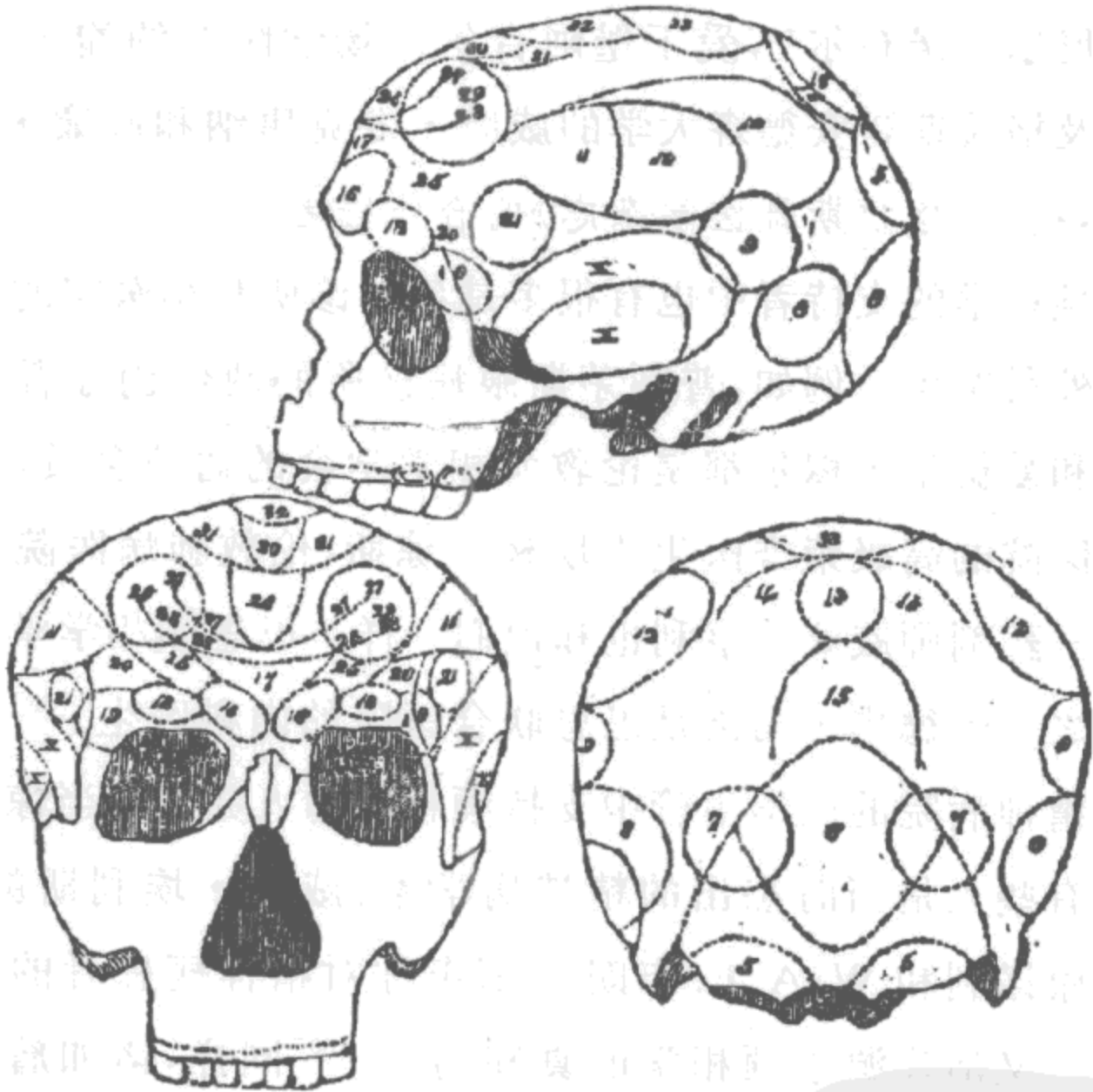
夫·H.格林是圣托马斯医院的解剖学示范教师,后来担任外科学院的解剖学教授。他在1820年《解剖学家手册》中第一次收录了有关高尔和施普茨海姆大脑解剖方法的摘要;在随后的几个版本中,他的朋友——伦敦颅相学学会理事、圣托马斯医院解剖学讲师约翰·弗林特·索斯帮助他扩充了这个摘要。^[55]1825年,沃克利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施普茨海姆讲授颅相学课程的全部讲稿18篇;1836年发表了法国医学权威弗朗索瓦·布罗赛讲授这门课程的全部讲稿20篇。^[56]到1836年,当时担任新伦敦大学临床医学教授的埃利奥特森把颅相学带到了大学医学院,在那里给迄止当时人数最多的医科学生做演讲。伦敦医院的高级医生和讲师阿奇博尔德·比林,早在1833年霍尔姆在该医院演讲之后就加入了伦敦颅相学学会,他可能也像他在所编教材《医学基本原理》的第二版中所做的那样,向学生传授了颅相学。

具有改革思想的威斯敏斯特医学会也对颅相学进行了大量讨论,约翰逊、埃普斯和颅相学家福布斯·温斯洛、爱德华·赖特、罗伯特·邓恩*以及约翰·S.斯特里特都是该学会成员。在埃利奥特森、劳伦斯、邓恩以及颅相学家托马斯·福斯特*和约瑟夫·穆尔所属的皇家内外科医学会,穆尔和斯特里特所属的盖伊医院生理学会,以及颅相学家爱德华·穆尔所属的伦敦医院医学会,可能也进行了类似的讨论。在改良主义的药剂师和外科药剂师协会的议事日程中,颅相学可能也被列入其中,因为它的主席约瑟夫·海斯是19世纪20年代伦敦颅相学学会的重要人物,曾经热衷于颅相学的普及。^[57]

THE WEEKLY
MEDICO-CHIRURGICAL & PHILOSOPHICAL
MAGAZINE.

No. III. SATURDAY, FEBRUARY 22, 1823. Price 4d.

"FLORIFERIS, UT APES, IN SALTIBUS OMNIA LIBANT
OMNIA NOS, ITIDEM, DEPASCIMUR AUKEA DICTA."



EXPLANATION OF THE PLATE.

1. Organ of the tenacity of life.—2. Of the organ of self preservation.—3. Organ of the choice of nourishment.—4. Cerebral organs of the external senses.—5. Organ of sexual gratification.—6. Organ of the reciprocal love of parents and children.—7. Organ of attachment and friendship.—8. Organ of courage.—9. Organ of the instinct to assassination.—10. Unknown organs.—11. Organ of cunning.—12. Organ of circumspection.—13. Organ of the instinct of rising in rank or estimation.—14. Organ of the love of glory.—15. Organ of the love of truth.—16. Organ of the sense of locality.—17. Organ of the sense for collecting and retaining facts.—18. Organ of painting and the perception of colours.—19. Organ of the arithmetical sense.—20. Of the musical sense.—21. Of the mechanical sense.—22. Organ of verbal memory.—23. Organ of the disposition for learning languages.—24. Organ of the memory for distinguishing and recollecting persons.—25. Organ of liberality.—26. Organ of the genius for comparison.—27. Organ of the metaphysical genius.—28. Organ of the spirit of observation.—29. Organ of wit.—30. Organ of goodness.—31. Organ of music or theatrical talents.—32. Organ of holiness.—33. Organ of perseverance.

VOL. I.

c

图1 《内外科医学和哲学周刊》扉页, 1823年2月22日

在伦敦之外，颅相学也在医学院得到了类似的宣传，其宣传者几乎都是各个颅相学学会的领袖或颅相学团体的发言人。这些人中有些是内外科医生，如纽卡斯尔医学院的约翰·法伊夫*和 T.M. 格林诺，设菲尔德解剖学和内科医学院的科登·汤普森，巴思医学院的查尔斯·考恩*，曼彻斯特查塔姆街医学院的丹尼尔·诺布尔*，爱丁堡阿吉尔广场学院的约翰·麦金托什以及格拉斯哥安德森大学的威廉·麦克唐纳和威廉·韦尔*（韦尔也是《格拉斯哥医学杂志》的合作编者）。^[58]

颅相学的支持者中也有很多是各种诊所和小医院的高级荣誉内外科医生。例如，普利茅斯眼病诊所的两位创办者约翰·巴特和爱德华·穆尔都是伦敦颅相学学会的通信会员，切斯特综合医院的高级荣誉医生卢埃林·琼斯、伦敦肺病医院的外科医生—药剂师威廉·亨利也和他们一样。巴思颅相学学会的创立者之一爱德华·马洛是巴思联合医院的内科医生。^[59]各郡和私人精神病院的医学主管中支持颅相学的人数也相当惊人。他们中有些人是当时杰出的精神病学家：威廉·埃利斯爵士、约翰·康诺利和 W.A.F. 布朗，* 都声称对精神病患者的改造和人道主义治疗源于颅相学的真知灼见。^[60]同样，诸如詹姆斯·克拉克爵士、詹姆斯·斯图尔特、安德鲁·库姆和威廉·奈顿爵士这样的宫廷医生对颅相学的赞许和支持也值得注意。^[61]

要想解释为什么在 19 世纪早期有如此多的医学界人士赞成颅相学并不困难。他们所留下的大量文献使我们几乎毋庸置疑地相信，他们第一次感到精神的秘密已经向他们公开。例如，对于福布斯·温斯洛这位未来的《心理医学杂志》编辑来说，高

尔的生理心理学一方面把与神经学结合起来,另一方面把心灵与适应性生物学结合起来,似乎获得了最高层次的概念性胜利,因为它把有关心灵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改造成实用主义者感兴趣而且能够理解的器官体。^[62]这样,托马斯·布朗和苏格兰 33 官能心理学系其他学者所反对的心灵具体化被这些人作为庆祝的理由。他们声称,模糊的形而上学所产生的仅仅是大量“粗糙而难以消化的形而上的思辨”以及含糊、矛盾而无用的理论;但是由于有了颅相学,大脑现在成为“人类器官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和肝脏、肺脏等一样,[适合于]……类似的法则和感应”。^[63]丹尼尔·诺布尔解释道,“除非与其余组织的生理学不同的大脑生理学应用了调查规则”,否则颅相学的原理不可能被否定。^[64]因此,《柳叶刀》杂志在 1825 年得出结论,“由高尔和施普茨海姆所教授的大脑生理学是……唯一与真理有着最细微类似之处的学说,或者说是致力于解释各种精神现象的科学。”^[65]颅相学对于医学理解所具有的假设的效用本身可以被看作衡量这门科学的真实性的标准,因为正如“培根因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无效果而推论其错误,……根据同样的原理可以合理地推论,因为颅相学是有效的,因而它是正确的”。^[66]这种培根式的衡量真理的标准可以进一步应用于高尔和施普茨海姆的经验主义方法论,因为据称他们的研究并没有从“创造或支持一种有利的假设这种预想的角度出发;而是把研究导入……一系列对大脑功能的观察;最终从中引导出那些推论。”^[67]

事实上,所有支持颅相学的重要人物同样坚称,他们只是在接受了一系列类似的经验主义的相互关系之后才被颅相学所征

服,这通常发生在他们最初把颅相学当作“伪科学”而加以拒绝之后。例如,戴维·尤温斯曾被其他医学界人士看作“非常博学和有经验”的人,他就声称当他于1815年在《折衷评论》上写了一篇敌视颅相学的文章之后,曾被“颅相学反咬一口”。和爱德华·巴洛于1834年在新成立的省级内外科协会的致词一样,尤温斯在1836年叙述了他对颅相学的怀疑是如何在无可争辩的颅相学“事实”面前轰然倒塌。他在《伦敦百科全书》(1829)和《新月刊杂志》(1832)发表的几篇支持颅相学的主要文章和他先前对颅相学的反对一样,看起来是建立在公正的医学证据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对“特别的信条和职业”进行评判的基础上,他现在已把这种评论归之于反颅相学家的著作。^[68]

有一点补充说明一下也没什么不好,尤温斯在别处曾直率地说,颅相学家的主张是否正确对他而言并不重要。他认为,重要的是他们已经竭力把生理学应用于“道德、伦理和医学”,而且他们通过这么做已经揭示了“引导人类精力和官能的恰当模式”。^[69]关于这一点,也可以举出其他明显证据来说明颅相学在为医务人员提供观察个人和社会行为的“正确模式”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但是,最好在后面谈论这一点,因为尽管它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即支持颅相学的依据从语境上来看也可以合理而合乎逻辑地被当作反对它的理由,这样的证据还是太容易模糊同样重要而且值得强调的内容:颅相学的科学—医学反对者经常撇开科学和医学的证据而去抱怨,“接受这样的学说是一种罪过”,“夸耀它是十足的蠢事”。^[70]特别是后一类证据有助于解释下面一点,即,把颅相学论战当作对先验的真理和理性产生威胁

的粗俗的大众科学态度的例子,不仅扭曲了历史真相,而且也表现了高度主观和不一致的行为方式。在思考反颅相学家的主张时按照推测来选择合理的科学事实和方法,而在思考颅相学家的主张时仅仅选择“超理性的”社会价值,很显然是固执而错误的方法。但是,修正派通过颅相学家的理性主义来努力“纠正”辉格派的历史记载,很显然也一样固执错误。这两种史学方法事实上都是我们的文化要求令人惊异的反映——说它令人惊异是因为,除了有关颅相学的论战,可能没有更好的例子让我们以后见之明发现论战双方都没有掌握关于大脑状态的“正确”知识。

由于缺乏绝对真理,有关颅相学历史思考的真正价值就不在于它有意或无意地强化了“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分界,而在于使我们相信,当它接近关于自然和人性的真理时,除了历史参与者(包括那些写颅相学历史的人)头脑中所存在的思想以外没有其他的检验标准。如果情况真的像从帕拉塞尔苏斯到马尔库塞这样的思想家自始至终认为的那样,其结果就是,研究所谓伪科学的史学家所面临的不是进一步扩大实证科学的特权,而是判定某些现实的概念是如何以及为何会获得客观科学真理的外衣并成为常识,而其他概念则被视为彻头彻尾的胡说的。^[71]

第二部分

37

科学与社会利益

科学概念不仅仅是了解根本真理的渐进方法。它们是特殊社会结构的产物，会依次重新加强或挑战社会现状。在一个按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里，不仅日常行为和社会效用会有差异，而且科学的内容也不相同。

诺曼·戴蒙德：“科学概念化的政治学”，
《为人民的科学》1976年第8期，第14页。

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方式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性的暂时的产物。

马克思致安年柯夫的信(1848年12月28日)，
载索尔·帕多弗编：《卡尔·马克思书信集》，
新泽西，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
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



大脑的社会意义

如果这仅仅是解剖学家关于大脑特殊结构的问题，或是医学哲学家关于某种发现的诉讼权的争论，那么它几乎引不起普通读者的兴趣：但颅相学(Cranioscopy)体系与此完全不同，就像它在结论中所涉及的，最重要的道德后果需要每个人……进行严肃而耐心的调查。

“对高尔和施普茨海姆体系的解剖学特征的评论”，《格拉斯哥探索者》，第1期(1820年11月)，第33页。

事实上，除了某些例外，“精神”这个术语根本没有作为一个科学概念起作用，而是作为一种修辞方法，即使在它的用法被禁止的时候也是如此。更确切地说，它没有被用来界定一个过程，而是被用来交流(有时也利用)一种恐惧，对主观主义的恐惧。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发展和精神的演进”，载J.M.谢尔编：《精神理论》，

纽约(1962年),第714页。

在我们所知无几的关于高尔构建其科学的动机中,我们至少知道:他对科学奇闻感兴趣的迹象源于他对哲学和社会的兴趣。即使在他开始解剖学研究之前,他已经在他出版于1791年的第一本医学哲学著作中记下了关于心与物、身体以及灵魂的观点。^[1]他一方面驳斥把思维独立于大脑的理论,另一方面否认经验是思维内容和思想组织的唯一源泉;也就是说,他既是反主观论者又是反感觉论者。1796年以后,高尔在维也纳的一系列公共演讲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但由于他过于关注社会敏
40 感领域,这些思想不久即被奥地利皇帝以助长了唯物主义、不道德和无神论为由禁止。这种谴责造就了高尔的名声,他的理论得以迅速广泛传播。高尔出生于天主教家庭,由一位神父教育,原指望成为一名教士,但他死时著作被列入天主教禁书录,而且被埋葬于(显然经过选择的)非宗教圣地。^[2]

因此,尽管英国对于高尔的实际著述一直很不了解,但是对于高尔自称其学说是“真理,但反对长期以来的哲学”,任何人都很难意识到高尔学说的社会非正统性。^[3]如果从反对者们把高尔学说纳入“迅速发展的斯宾诺莎、哈特利和达尔文学派”来看,高尔学说的离经叛道并不是很明显;那么从支持者声称其哲学“反对所有政府的原则、惯例以及几乎所有的法律和制度”来看,这就很明显。^[4]

然而,如果高尔的思想真的与社会非正统性和异端是同义

的,并且因此暗示着变化,那么其思想中就没有任何称得上特别的异端内容或说明任何特殊变化的内容。高尔并不像他的很多诽谤者和赞颂者所说的那样,他本人既不是空想家,也不是社会教条主义者。他的思想是模糊的,因为他的哲学不像他的大脑理论,其反动性大于其建设性。从知识论和社会角度来看,他的学说能够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当然,该学说的某些支持者所拥护的激进唯物主义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实际上,在整个19世纪,颅相学与非唯物主义传统(神秘的、隐修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和浪漫的传统)有着联系。的确,高尔本人有时被视为“浪漫派”的代表人物以及创造了“以实证主义者的语言和方法论表达出来的浪漫心理学”混合物的代表人物。^[5]很显然,正是浪漫的约翰·赫尔德使高尔相信他应该研究比较解剖学;而且,尽管这种研究的重要性与颅相学的有机论者的进化结构有更多的关联,而与反唯物主义或反理性主义没有特别的关联(见第四章),高尔的思想确实对歌德和其他德国人的永恒自然法则有着某种强烈爱好。^[6]在英国,具有神秘倾向的雕刻工、雕塑家同时也是威廉·布莱克朋友的约翰·弗拉克斯曼(1755—1826),像其他各类斯威登伯格信徒^①所做的那样,乐于把颅相学纳入他的反牛顿学说的作品计划之中。柯勒律治起初⁴¹也表达了相当大的兴趣。^[7]

上一章所提到的大多数颅相学支持者可能非常理解年轻的

^① 斯威登伯格(1688—1772),瑞典科学家及神秘主义宗教家,他的通灵幻象及著作启发他的信徒们在他死后建立了新耶路撒冷教会。——译注

理想主义的浪漫派对理解人性新途径的人迷。然而，他们自己通过信奉高尔的异端学说来反对一致同意的哲学准则和智力规范的动机却不能被描述为浪漫主义。这些动机是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集中比较研究他们的传记及其学说反对者的集体传记来确定。为此，我们将把范围只限定在那些有权从事科学或医学研究的人当中支持或反对颅相学的人。此外，我们在取样中将只包括那些在 1835 年前支持或辩驳这门知识的人，在此日期之后颅相学获得了广泛认同并被用作自由派社会改革运动的传播媒介（这种认同主要是通过库姆《人类体格》一书的普及而获得的）。因此，用智性论历史学家的观点来说，我们把对英国颅相学家和反颅相学家的下列比较确定在这门知识显示其社会和意识形态“污染”之前的年代顺序来排列的。从一份列举了 133 位支持颅相学的科学—医学界人士的集体名单中排除了那些没有充分的传记资料可资比较研究的人之后，下面的分析基于^[8]60 位颅相学支持者和 17 位反对者，包括上一章所提到的所有重要人物。^①

① 反对者（注：其选择标准见第 1 章）：马修·贝利（1761—1823）、约翰·巴克利（1758—1826）、查尔斯·贝尔（1774—1842）、约翰·博斯托克（1773—1836）、托马斯·布朗（1778—1820）、詹姆斯·科普兰（1791—1870）、约翰·戈登（1786—1818）、威廉·汉密尔顿爵士（1788—1856）、埃弗拉德·霍姆爵士（1756—1832）、弗朗西斯·杰弗里（1773—1850）、约翰·基德（1775—1851）、爱德华·米利根（1784—1833）、詹姆斯·考尔斯·普里查德（1786—1848）、P. M. 罗热（1779—1869）、迈克尔·瑞安（1800—1841）、托马斯·斯通（1793—1854）、约翰·耶洛利（1774—1842）。

支持者（注：在正文[见索引]或附录所列的演讲中没有提到的那些人[*]，选在这里的标准包括：颅相学学会的成员和/或颅相学的出版物和/或来自《颅相学杂志》的证据）：迪斯尼·亚历山大*、爱德华·巴洛（1779—1884）、阿奇博尔德·比林

颅相学家和反颅相学家：一幅社会地图

42

在我们的样本中，颅相学家和反颅相学家之间最显著的差异是年龄。在约翰·戈登去世的那一年，即1818年，样本中有明确出生日期的16位反颅相学家的平均年龄是41岁，而样本中有明确出生日期的51位颅相学家的平均年龄是24岁。在1818年，只有11位颅相学家超过30岁，6位超过40岁。尽管有好几个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年龄差异远远小于一代（以25年计算），年龄上的总体差异仍足以说明存在着代沟。实际上，对于支持者中的许多人，特别是福音派倾向更浓的人来说，这点很清

(1791—1881)、W. A. F. 布朗*、约翰·巴特(1791—1877)、G. D. 卡梅伦*、理查德·切尼维克斯(1774—1830)、詹姆斯·克拉克(1788—1870)、安德鲁·库姆(1797—1847)、约翰·康诺利(1794—1866)、查尔斯·科恩*、罗伯特·邓恩*、约翰·埃利奥特森(1791—1868)、威廉·埃利斯(1790—1868)、W. C. 恩格尔杜*、约翰·埃普斯*、约翰·法伊夫*、约翰·福布斯(1787—1861)、T. M. I. 福斯特*、理查特·格兰杰(1801—1865)、T. M. 格林豪(1791—1881)、威廉·格雷戈里*、约翰·哈里斯(1804—1848)、约瑟夫·海斯(1769—1830)、G. C. 霍兰*、H. H. 霍尔姆*、罗伯特·亨特*、詹姆斯·约翰逊(1777—1845)、威廉·奈顿爵士(1776—1836)、威廉·劳伦斯(1783—1867)、威廉·麦克唐纳(1804—1874)、乔治·麦肯齐爵士*、威廉·麦肯齐*、约翰·麦金托什(死于1837年)、G. 米勒*、爱德华·穆尔(1794—1858)、约瑟夫·穆尔(死于1855年)、D. 诺布尔*、H. 奥弗伦*、理查特·普尔(1783—1871)、约翰·P. 波特(1771—1855)、J. Q. 朗鲍尔*、T. 桑德威瑟*、詹姆斯·斯科特*、约翰·罗伯逊·西鲍尔德(1799—1868)、约翰·弗林特·索斯(1797—1882)、J. G. 施普茨海姆*、约翰·索珀·斯特里特(1802—1873)、E. 斯威特洛夫*、戈登·汤普森(1793—1876)、戴维·尤温斯(1780—1837)、托马斯·韦克利(1795—1862)、H. C. 沃森*、W. 韦尔*、查尔斯·惠特斯通(1802—1875)、罗伯特·威利斯*、W. J. 伊拉兹马斯·威尔逊(1809—1884)、福布斯·温斯洛(1810—1874)、爱德华·赖特(1791—1859)。

楚。他们就像 19 世纪后期达尔文理论的积极支持者或 19 世纪 40 年代柏林的生物学简化论的支持者那样,也觉得(正如我们样本中一位在 1818 年年方 24 岁的颅相学家所说),“我们必须期待这年轻的一代……能相信并最热切地耕耘于新知识中的新学说”。^[9]然而,在所有由年轻一代所维护的新知识的例子中,无论是 17 世纪的清教思想,还是 18 世纪晚期的德国浪漫主义自然法则,抑或 20 世纪 30 年代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论战者之间的年龄差距并不具有解释力。^[10]引用代沟冲突仅仅为鉴别现存权力机制的潜在不满提供了普遍征兆和线索。正如蒂莫西·勒努瓦所指出的,在考察与社会、科学变化有关的代沟因素,乃至大致同龄的个体有着同样的社会和历史经历这个代沟事实时,年龄本身并不重要。^[11]

我们样本中的颅相学家在经历上的类似可以反映在他们相对于反颅相学家的经济、社会地位方面。到 1830 年时,反颅相学家中的大多数人在收入、社会权力以及所获得的声望方面达到或超越了其职业的巅峰时期,而大多数颅相学家仍在为创业而奋斗。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永远也得不到大多数反颅相学家所获得的社会声望;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假如他们的生命突然在 1840 年终结,那么他们中的所有几乎都会被世纪末的《英国人名词典》精心编结的网络所遗漏。其实,《英国人名词典》仅仅遗漏了我们名单中的 2 位反对者,而 60 位支持者中只有 27 人被收录进去(在 133 名支持者的名单中选留这 27 人就是因为《英国人名词典》有他们的条目)。撇开对颅相学的回顾性评判,《英国人名词典》之所以排斥颅相学家,部分原因是那些决定谁

有资格进入《英国人名词典》的人从社会经历上看更接近于反对者而不是支持者。^[12]例如,从60位支持者的受教育程度来看,没有一人在牛津学习过;只有埃利奥特森、T. M. 福斯特(《英国人名词典》中有这两人的条目)以及约翰·哈利斯在剑桥学习过,理查德·切尼维克斯和阿奇博尔德·比林(《英国人名词典》中也有这两人的条目)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学习过。^[13]其他人中的大多数出身于相对穷困的社会背景,不得不为支付其医学教育费用而努力;他们早年在药剂店当学徒,然后成为外科医生,或者就像约翰逊和克拉克(他们因为忠诚而遇到机会发财致富)一样,在医学界最底层如海军外科医生工作以后获得或购买大学的医学文凭。^[14]康诺利、约翰逊和尤温斯都是在失业时期因为金钱的原因而从事写作;马修·艾伦* 一度通过讲授颅相学来维持生计;W. A. F. 布朗* 也以同样的方法养活自己;而福布斯·温斯洛(他肯定是支持者中最穷困的一位)为了交学费,在做学生时撰写了他的1832年论文《颅相学原理》。

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反颅相学家都没有经历过社会、经济 44
不安全感的体验。大多数反颅相学家受到的是适合有头衔的富家子弟的庇护式抚养和绅士教育,其家族关系能够大大方便《英国人名词典》的编纂者们寻找合格者的机会。他们中没有人是在剑桥接受教育,只有4人毕业于牛津,而爱丁堡大学以相似的特权方式为其他人中的大多数提供了教育。事实上,爱丁堡大学对他们而言就像一个封闭的作坊:斯图尔特、布朗和约翰·威尔逊(《布莱克伍德杂志》的共同编辑,他也反对颅相学)三位道德哲学教授职位的持有者先前都在这所大学上学;而且,布朗、戈

登和杰弗里都是斯图尔特的学生，而戈登也是巴克利的学生。正如乔治·库姆*在1836年参加该大学逻辑学教授职位的“公开”竞聘时所感悟的，他的外来者身份使他没有实际机会；当这个职位最终授予当时里德和斯图尔特常识哲学的杰出阐释者——直言不讳的反颅相学家威廉·汉密尔顿爵士*时，没有人感到惊讶。^[15]

正如前一章所指出的，在颅相学家中有大学教授和医院讲师。但与样本中有9位反颅相学家在有名望的机构中担任教授和讲师相反，颅相学家中只有比林任职于伦敦医院，查尔斯·惠特斯通任职于伦敦国王学院，埃利奥特森和康诺利任职于新的“高尔街不信神机构”伦敦大学学院。无论是圣巴塞洛缪医院的劳伦斯，还是刚成为圣托马斯医院解剖学讲师的理查德·格兰杰，抑或刚成为皇家外科医学院外科教授的约翰·索斯，当时都不是颅相学的公开支持者，而惠特斯通显然是把他对颅相学的支持与其职业职责区分开来的。^[16]安德森大学是威廉·韦尔*、罗伯特·亨特*和威廉·麦肯齐*讲授医学的地方，也是威廉·格雷戈里*于1837年成为化学讲师的地方，它主要是一个学术地位较低的普及和实践训练的地点。

与反颅相学家相比，颅相学家的社会地位和知识水平都较低，这幅图景也可以通过分析他们当中谁是伦敦和爱丁堡皇家学会的成员而得到进一步说明。在1835年以前的支持者中，
45 60人中只有9人拥有这种荣誉（其中3人在熟悉颅相学之前已经是会员了），而17位反对者中不少于12人在积极反对颅相学以前或其过程中获此殊荣。要是因为这些学会的遴选取决于内

部赞助者身份、资助及经济名望,那么反对者当选会员的巨大优势就像科学机构所反映出来的情况一样,如《英国人名词典》条目的遴选,也反映了反对者在占据主导地位的利益和社会规范方面所具有的巨大一致性。尽管埃利奥特森、惠特斯通和克拉克成为伦敦皇家学会的会员,格雷戈里成为爱丁堡皇家学会的会员,但在支持颅相学方面,只有埃利奥特森在当时以颅相学的提倡者而著名。^[17]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在1835年以后当选为会员的颅相学家(比林、W. A. F. 布朗、格兰杰和 W. J. 伊拉斯谟斯·威尔逊),都是在他们遮掩或掩藏了对颅相学的兴趣以后才当选的。在这方面,他们和阿斯特利·库珀爵士一样,后者在1802年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之前压抑了自己的激进思想;他们也和劳伦斯一样,他在1846年当选为皇家外科医学院院长之后,就对他的激进唯物主义三缄其口。^[18]

在我们所关注的这个时期,尽管难以获得有关宗教信仰方面的比较数据,但仍可以把宗教信仰分成类似的两个派别。在6位明确属于英国国教徒的颅相学支持者中,有4人(H. C. 沃森*、康诺利、戈登·汤普森和威廉·埃利斯)以其背教出名,康诺利和汤普森皈依了一神论教派,埃利斯皈依了卫斯理公会派。卡尔弗特·霍兰*是一位设菲尔德工匠的儿子,他的教育受到了一神论教派信徒的资助。关于其他支持者(除了查尔斯·考恩*、J. Q. 朗鲍尔*以及约翰·弗林特·索斯之外。查尔斯·考恩是一位牧师的儿子,活跃于低教会派的政治中;J. Q. 朗鲍尔是主要的反唯物主义者;约翰·弗林特·索斯在晚年成为一名狂热的国教徒),我们所知道的是,他们显示了反宗教的唯物

主义的健康语调(如埃利奥特森和威廉·恩格尔杜*的表述)、直率的理性主义(如布朗《关于宗教狂热》[1835年]的思考或霍尔·奥弗伦*从贵格会皈依到“自由思想”的声明中所证实的),
46 或坦率的异端思想(如埃普斯*在《英国国教提出的一些谬误以及非国教派的职责》[1834年]还有迪斯尼·亚历山大*为卫斯理派所做的世俗布道中所表达的思想)。

在颇相学的反对者阵营中,除了一神论派信徒约翰·博斯托克之外,他们更坚定地公开信奉既定信仰和不受社会干扰的自然神论。巴克利是佩思郡一位牧师的儿子,在从医之前他本人也是苏格兰教会的牧师;与埃弗拉德·霍姆在18世纪头十年的皇家学会中并肩反对颇相学的马修·贝利,是一位担任格拉斯哥大学神学教授的长老会牧师的儿子;查尔斯·贝尔是一位杰出的英国国教教会牧师的儿子。这些人和许多颇相学家不一样,他们中没有一人背叛其父辈的信仰。颇相学反对者中唯一的贵格会信徒詹姆斯·普里查德*因其皈依圣公会(很显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牛津大学的学位要求)而引人注目,而约翰·基德和贝尔则是《布里奇沃特论文》的作者,这些论文旨在揭示“《创世记》中所表明的上帝的权力、智慧和完美”(皇家学会的主席受委托执行布里奇沃特的遗愿,完成这些论文的写作计划)。贝尔也与亨利·布鲁厄姆合编了佩利《自然神学》(1835)的一个版本。虽然这些反对者中没有人希望自己被看成是纯粹从宗教角度来反对颇相学的,但他们可能都同意汉密尔顿把该科学当作“含蓄的无神论”的观点,几乎不会反对从这些角度来攻击颇相学。^[19]当劳伦斯和阿伯内西在19世纪一二十年代之交围绕

生命理论展开著名的论战时,并不是所有的颅相学家都全心全意地赞成劳伦斯,而颅相学的反对者们却没有一个愿意与唯物主义有任何牵连。^[20]

与颅相学家的宗教异议纠缠在一起的是他们的政治自由主义,韦克利为托尔普德尔蒙难者和宪章运动者所做的辩护堪称典范,而约翰·法伊夫*从事改革法案运动及其对“反谷物法同盟”的支持更具代表性。诚然,颅相学家和反颅相学家之间的政治界线并不容易划分,辉格派、激进派和自由派的说法只是一个粗略划分,隐匿了政治和社会选择的广泛多样性。^[21]在某种程 47
度上,颅相学家和反颅相学家之间进行清晰的政治界定所面临的困难是因为他们思想中有某些共同因素,关于这个主题我们将在下一章展开。目前可以说的是,大部分颅相学家在19世纪20年代是激进派,后来通常变成了自由派,而大多数反颅相学家支持辉格派(通常是改革派)的现状,这是弗朗西斯·杰弗里在《爱丁堡评论》所作的描述。

概而言之,通过对论战双方的集体传记进行考察,一场表面上由无政治偏见的科学和医学代言人所展开的关于科学真理的知识性辩论揭示了它与论战者的社会经济经历和社会政治利益有着密切关系。能对那些受颅相学吸引的人进行大体上区分的是,他们近来对于和自己在社会进程中的地位与权力不相称的社会价值已经提高了认识。那些被看成是颅相学“中坚分子”的人尤其如此。颅相学的支持者们多多少少把自己隶属于某个知识团体,这些团体拒绝承认社会权力和权威的统治哲学基础,并对操控和组织社会生活的主导形式构成现实挑战(意图使人民

预知和控制行为的能力最大化)。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以一种适合其职业期望的知识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渴望完全整合到改良过的新社会的需求,在这个新社会里他们将主宰自己的更加精英化的价值。另一方面,可以认为反颅相学家是那些一直急于保留制度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利益的人。他们企图证明颅相学是“错误的”或显示颅相学家是“三流知识分子”,这也说明了他们期望通过“科学的”模式使他们对新兴价值的归并进行限制得以合法化。这些反颅相学家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功利主义社会政治改革的强大潮流,与此同时也意识到面对科学经验主义的冲击,里德和斯图尔特形而上学的吸引力已经明显下降;这样的事实足以解释他们为了证明颅相学的错误而愿意竭尽全力。尤其是在爱丁堡,正如沙平所说明的,驱使威廉·汉密尔顿爵士致力于解剖学研究的,并不是无聊的好奇,而是不顾一切捍卫既定价值和利益的需要,他只是为了证明颅相学是“嫁接在经验主义之上的极端愚蠢的行为”。^[22]

集体传记的局限性

揭露颅相学家和反颅相学家之间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的相对差异动摇了那些可能最适宜论战者学术独立的观点,而且(鉴于论战的知识类型)可能使得论战的任何一方置身于社会利益结构之外都变得特别困难。然而,在最终的分析中,对知识分子论战者的集体社会传记(最广义的“人学”)进行对比的技术价值通常仅仅是启发性的。它迫使我们以更广于知识分子历史以及

伟大人物的心理历史所能允许的范围来思考知识和知识的要求,知识分子的历史所强调的是自主的认知事件,而伟大人物的心理历史则坚信个体人的个性是所有思想的源泉。因此,从方法论角度来看,把某些抽象概念排列成社会利益网络的人学方法回答了曼海姆的悲叹:当哲学家通过把概念抽象为天上掉下来的实体而使得思想史显得人为地相似和混杂时,文学和“伟人”史学家则使其雾化。^[23]人学超越了这两者,以某种方式满足了社会思想史家在知识和权力之间建立联系的需要。

然而,作为一种被动的方法论手段,人学也有其局限性,并且可能产生潜在的误导作用。一方面,尽管阿诺德·莫明格利阿诺是在比较严格的家庭联系的意义上来思考人学的,但他却批评人学不恰当地承认具体情形的价值并推测而不是去真正解释各个人群的物质和精神需求。^[24]另一方面,查尔斯·罗森伯格更加老套地断定

人们不该相信任何识别不出人类在任何文化中都分成各种心理类型和心理能力的方法。那种想当然地认为通过把群体当作显而易见的无差别的个体可以解释群体行为的分析方法,没有一种能在知性上证明是令人满意的。^[25]

尽管人们可能恰好对任何声称知道什么是或不是“知性上令人满意的”观点表示怀疑,尽管人们鉴别出某种思想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具有共同的社会利益绝不意味着他们在心理上的同质状态,但论战的双方几乎总是有似乎例外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利益

与大多数人并不一致,他们的支持或反对从具体的情况来看可能是独特的。

在我们的反颅相学家中,例如詹姆斯·科普兰,可能有必要做特别的说明,作为白手起家的年轻人,他与很多颅相学家的共同之处远远多于大多数反颅相学家。^[26]无论是一神论派信徒约翰·博斯托克还是他的朋友 P. M. 罗热,都不能轻易地纳入大多数爱丁堡反颅相学家所在的与教会联系起来的上层阶级的社会圈子中。虽然罗热是撒缪尔·罗米利爵士的侄子,是一位英国国教徒,在皇家学会里是一个有权力的人,但他通过结交与联姻,与资产阶级的财富、地位和权力等商业资源有着更密切的联系,而且他(和博斯托克一样)对哲学激进主义有着意识形态上的共鸣。^[27]像下面这样的反颅相学家,如那些活动于地方上的文学和哲学学会以及皇家协会中的人,那些身为新伦敦和地方性医学院、学会和医院的重要人物,那些与伦敦大学评议会以及亨利·布鲁厄姆的实用知识传播学会的理事会结有深交者,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一方面与很多颅相学家很类似,另一方面与爱丁堡的汉密尔顿和杰弗里斯所生活的世界(它对大众激进主义和哲学激进主义的痛恨非常突出)有着相当大的差别。^[28]另一个不同的人反颅相学家约翰·基德。根据他的家庭背景,他在盖伊医院阿斯特利·库珀爵士指导下学习的经历,他作为高教会派教徒的反加尔文主义,以及反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哲学,可以认为他与反对者和支持者两方都有着共同特征,然而却与任何一派都没有密切的社会政治关系。^[29]

50 诸如这些人的例外情况并没有使探讨科学知识和科学论战

的社会学方法失去效力。相反,这些例外除了提醒我们记住不能总是为了使某个总体性的发现保持正确而把得出这个总体性概括所遇到的特殊个例排斥在历史真相之外,他们只能凸显我们在应用方法论时的某些生硬做法。显而易见的粗糙之处首先是试图覆盖 35 年中关于颅相学的曲折的论战(自 17 世纪以来至少 20 次与社会中最深刻的经济和意识形态分裂相符合的最后一场论战);其次是试图把英国作为一个完整的分析背景。颅相学家和反颅相学家之间的社会差别贯穿了整个这段时期、跨越了广阔的背景,这样的事实对于这场论战的社会阐释应该颇具分量,应该可以充分证明阐释过程的正确性。但是,在这方面被完全忽略的是,对这门知识的不同理解如何与地方经济和阶级关系的结构差异联系起来,如何与当地承袭性的政治、宗教、知识和文化方面的传统与制度中的差异联系起来,如何与监管那些传统和制度的差异联系起来,最重要的是如何与人们所感觉到的所有这一切正在发生变化的程度差异联系起来。正如关于颅相学的好几个区域性研究所展示的,在我们任取的论战者的样本截止期——1835 年之前,这些变量相当重要。^[30]

此处没有篇幅容我们讨论或尽力补充关于 19 世纪早期颅相学的地方性研究的内容。然而,比较这些地区性研究,有几点是成立的,即:(1)科学从不直接反映意识形态,因此它总是对一系列知识论立场和政治立场敞开怀抱;(2)与此相关,科学的效用从不局限于某个演讲或某个社会政治传统;(3)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关于这点也可以通过聚焦于颅相学的少数早期支持者以及(按照我们的社会学标准)“例外的”支持者来加以说明。

只有这么做,我们才与本章的大纲保持一致,即解释个人之所以通过接受颅相学试图使自己反对约定规范的原因,或者解释为什么他们通过那些手段试图表现他们的反对。

51 早期信仰的多样性

但是必须承认,刚开始时,通常无法知道为什么某个人选择从事或不从事某种特别的智力活动。不仅多数人对于在某个时期接受或拒绝某种思想的广泛历史决定因素并不清楚,而且人们也没有说明对某种知识感兴趣的合理原因。由于完全缺乏传记方面的背景信息,我们不可能对人们的动机进行推测。这样的限制即便是对于 1800—1813 年间曾是高尔合作者的 J. G. 施普茨海姆* 也表现得很明显。我们对他所知无几,只知道他被培养成一名路德教徒,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到维也纳学医之前,他在特里维斯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有人曾说他“可能太过相信自己的观点”,这还是较为宽容的说法;无疑,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对他所称的“好家庭”很孝顺,对穷人的苦难漠不关心,对法律和秩序的坚信一如他对“自由原则”的坚信。但是,他为什么就讨厌(高尔的)解剖学研究的机械方向?他为什么憎恶圣西门而把罗伯特·欧文推崇为教育家?或者,他为什么渴望指出一种高尔从没期望过的“自然道德的标准”?由于缺乏合适的传记资料,所有这些问题都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31]饶有趣味的是,柯勒律治在 1817 年曾把施普茨海姆称为“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人相学家”,但到 1830 年时他的判词

是,尽管他讨人喜欢,“他是个愚蠢的人,他是我所认识的德国人中最无知的一位”。^[32]柯勒律治的评价就和其他关于施普茨海姆的评论一样,没告诉我们多少关于施普茨海姆的信息,却让我们了解了评论家本人以及他对该科学态度的转变。这充分说明,施普茨海姆需要脱离高尔独立出来;相对于库姆及其追随者在倡导颅相学时所具有的明显的社会宗教和意识形态动机而言,施普茨海姆倡导颅相学的深层动机仍不清楚。^[33]施普茨海姆更主要是颅相学概念的传播者而不是其发明者,他游移于多种文化之间,他之擅长使自己及其思想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犹如他擅长不断改变自己的中名(从克里斯托夫到加斯帕,有时也称卡斯帕),所有这些都增加了我们了解其倡导颅相学的真实的社会、政治动机的难度。 52

关于约翰·埃利奥特森,在很多方面也同样不清楚。除了施普茨海姆和库姆之外,他对颅相学在英国的传播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埃利奥特森研究颅相学大约是在1822年,当时他加入了爱丁堡颅相学学会(即他兄弟托马斯加入该组织一年以后),1823年当他身为年轻人竟毫无困难地获得了医学界高级职位之后,他成立了伦敦颅相学学会。促使他赞美颅相学的是一种顽童似的冲动,这种冲动不断地打击着令人尊敬的学会,并且持续地考验着他的医学界同道的宽容极限。他获得了医学界的诸多第一:第一个抛弃长袜穿上裤子,第一个提倡拉内克的临床诊断方法并使用听诊器,第一个推荐针刺疗法,第一个否定斑疹伤寒症的传染性,第一个给病人服用大剂量的杂酚油。他公然为高尔学说进行唯物主义辩护,随后又谴责施普茨海姆为了

讨好习俗和时尚而曲解删改高尔学说,他的这些做法很难不让人认为这是一种更加以自我为中心的满足于冒犯传统的手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与此同时没有真诚地相信高尔学说的正确性)。只是在19世纪40年代,当他因拥护催眠术和颅相—催眠术而丢掉大学学院的工作时,我们才看到埃利奥特森开始(有点迟地)感受到先前那些被他所倡导的颅相学所吸引的人所共同体验的社会不安全感。但在此之前,我们很难用任何令人满意的政治或心理方法来解释他致力于研究非正统学说的行为和动机。或许,他父亲是一位事业有成的伦敦药剂师这个事实能为我们提供一种线索。也许埃利奥特森超乎我们想象,在他身上也体现了在社会和知识方面向上流动所特有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期望通过学识的外衣掩藏曾与粗鄙的重商主义相联系的过去,另一方面又竭力否定那些生来拥有传统特权和强权的人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并向那些试图重塑传统职业行为模式的人发出挑战。无疑,埃利奥特森身高几乎不超过5英尺的事实也说明了他的某些举止。但是,与施普茨海姆的情况一样,由于缺乏必要的自传材料,对于动机问题,我们只能推测而已。^[34]

对相关的传记片段探查来源也能使我们从社会和政治角度了解那些似乎是社会“特例”的早期颅相学支持者,这是我们把目光转向颅相学历史上一个非重要人物的原因。此人是海军少将约翰·罗斯(1777—1856),一位探航北极和南极的航海家。由于缺乏更多的资料,我们只能断定:罗斯在1823年1月加入爱丁堡颅相学学会仅仅是出于把颅相学实际应用于海军纪律这种利己的兴趣,关于这个主题,他在1825年写了一本小册

子。^[35]在罗斯这个例子中,在对颅相学的支持和对正统的种种反对这两者之间,联系似乎很遥远,而且罗斯与反颅相学家的共同点似乎(至少在表面上)多于与颅相学家的共同点。他比大多数颅相学支持者年纪都大,作为皇家海军的一名指挥官,很显然他在传统的权力机制中拥有权力和地位。^[36]他与那个时代的科学精英也有着良好的关系,他的朋友中包括皇家学会主席约瑟夫·班克斯爵士以及被苏珊·坎农称为“剑桥网络”中的各种其他人物。^[37]正是通过那些关系,罗斯被任命为1818年探险活动的领导,受命去寻找西北通道。

罗斯和埃利奥特森非常不同,他没有一点偏执行为的倾向。他在1825年小册子的附录中对政治激进分子约瑟夫·休姆进行了直言不讳的颅相学描绘,而在小册子的内容中却没有显露出后来的颅相学作家们关于监狱纪律这个相关主题的人道主义者的“进步的”修辞。^[38]罗斯的小册子支持并合理论证了当时通行的海军纪律惩戒方法的必要性,他表达了利用颅相学以便使惩戒效率最大化的愿望:他相信,通过颅相学的分析可以找出水手违纪的心理原因,然后就可以对违纪水手实行最合适的常规惩罚。罗斯身为牧师之子,也信奉正统宗教,对于他声称自己起初因为高尔和施普茨海姆的学说与宿命论和唯物主义的联系而拒绝这种学说的说法,我们没有理由表示怀疑。很显然,他是在读了施普茨海姆的著作、《爱丁堡颅相学学会会刊》上的作品以及库姆的早期论文以后,才得出结论:通过揭示人的不完美,颅相学实际上暴露了人们“对救世主耶稣的迫切需求”。^[39]在种种方面,他研究颅相学的方式与苏格兰教会某些成员没什么差别,

后者就像罗斯所相信的那样，

在传闻以及认为[颅相学]是一种危险学说的观念下，他们研究颅相学是出于一种责任，即他们更能把它“粉碎在萌芽之中”，[但在研究过程中]他们皈依了这门科学，其中有些人已经成为最内行的专家，他们毫不犹豫地宣称该学说不仅与基督教的教义和谐一致，而且(仅次于圣经)是基督教教义最理性、最自然的支撑。^[40]

在指出了这一点并坚称颅相学维护了“基于事实并得到良知和观察所证实”的真理后，罗斯相当自觉地试图预防把“滥用于颅相学支持者”的非难抛在他本人身上。

但是，如果罗斯认为颅相学在社会上是离经叛道的，那么他为什么会如此费事地加入颅相学学会呢？可以认为，当他心满意足地从社会和宗教角度合理地阐释了信奉这门科学并不是异端之后，对于支持这种被认为强化了正统行为和信念的学说，他并没有发现矛盾之处。然而，就算对他这一连串推理的描述是正确的，仍无法回答：在完全可以把他对颅相学实际价值的信仰隐而不宣的情况下，他为什么选择加入颅相学的行列？当我们回想他在19世纪20年代初发现自己所处的特殊环境时，对他公开支持颅相学的更合理的解释就出现了(这个解释也表明对他推理的描述是不正确的)。

在1818年的北极探险活动中，罗斯声称经北极水域前往太平洋的通道由于他称之为“克罗克山脉”的存在而被堵塞，他因

此铸下大错。探险家威廉·帕里和天文学家爱德华·萨拜因爵士都曾随同罗斯一起探险,但他们怀疑克罗克山脉的存在,而帕里在 1819—1820 年指挥的探险证实了他们的怀疑。同时,萨拜因发表了一篇文章猛烈批评罗斯,在帕里返回之后,罗斯作为探险家和地理学家的声誉被摧毁了。^[41]政府和科学精英不再向他咨询有关海军探险的事务,也不再资助他的任何进一步探险航行。罗斯在科学界的身份和地位因此变得含糊不清:即便他不完全是一个“外行”,他也肯定不再拥有“内行”的地位和权力。

在公开信仰颅相学方面,可以认为罗斯的行为方式与加入颅相学学会的很多年轻专家是类似的,他们在社会、经济方面的不安全感是由其出生背景所预定的。对于排挤他的权力垄断者,罗斯似乎既对他们表示怨恨,又企图向他们发起挑战。有一个事实从表面上看证实了这一点,即一旦罗斯(在 1829 年通过对蒸馏制酒者费利克斯·布思提供私人经济援助)恢复了名誉并费尽周折重回权力走廊,他就不再保持与颅相学和颅相学家的任何公开联系,但他仍继续在私下里追随颅相学。^[42]罗斯与颅相学学会中大多数人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他并不寻求利用颅相学手段去挑战权威,他没有任何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政治野心。和很多在库姆详细阐释颅相学之前涉足该领域的人一样,罗斯与这种知识的联系更主要是个人机会主义性质而不是社会机会主义性质。但这恰恰是“政治性”的。^[43]

假设罗斯不能恢复其名誉和自尊,可以想象他会保持与颅相学家的联系,并且可能会接受颅相学学会中大多数人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态度。对于这种最终对抗社会背景的态度,库

尔地区的乡绅乔治·麦肯齐爵士也有着同样的接受过程。他是一位业余爱好科学的绅士，是沃纳自然史学会创建者、地质学家罗伯特·詹姆森的朋友和学生。由于他在矿物学方面的研究以及他曾参与对冰岛进行的颇有价值的地质勘察工作，他在1799年当选为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员并于1815年当选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

1816年，在戈登与施普茨海姆在爱丁堡展开论战期间，麦肯齐开始对颅相学产生兴趣。他随后向爱丁堡皇家学会分篇递交了后来于1817年发表的论文《关于味觉的相关课题》，在这篇论文中，他不仅大胆地质疑杜格尔德·斯图尔特的某些看法，而且大胆解释了斯图尔特的形而上学已经落伍的原因。他得出结论：由于形而上学不能提供任何能够加以实际利用的确切的东西，因此是无用之物。鉴于此，麦肯齐不可避免地对取代形而上学的激进颅相学产生兴趣。的确，根据他递交给皇家学会的论文的结论，他热情地赞成施普茨海姆的学说，把它当作“关于味觉的差异以及味觉本身的唯一正确的解释”。在奠定了与颅相学家的友谊基础之后，麦肯齐于1817年成为库姆的知己之一。此后不久，当他体验了一次对他的头颅令人信服的描述（这种体验在颅相学狂热者中是常见现象，但是正如麦肯齐的思想活动所显示的，它对于追随颅相学的愿望来说并不是必要条件）之后，他对颅相学的信仰得到了巩固。^[44]1820年，他出版了一卷本的《颅相学图解》，并且加入了爱丁堡颅相学学会。

麦肯齐和罗斯不同，显然不能把他对颅相学的公然赞赏与某个单一的或突发的与其科学和社会同道疏远开来的经历联系

起来。然而,一旦他信奉了这个学说,就要经受许多体验,这些体验只会促使他对颅相学的反形而上学兴趣流归清晰的反精英主义,并因此强化他与库姆及其他资产阶级社会改革家在思想上的默契。^[45]1825年,爱丁堡皇家学会否决了麦肯齐对汉密尔顿提交给该学会的反颅相学系列论文进行回应的特权。1829年12月当他最终被允许进行回应时(即汉密尔顿有了更多的机会发表反颅相学论文之后)该学会对他态度冷淡的接待,该学会拒绝在他们的官方刊物上发表他的回应文章,以及他们随后对他所递交的有意挑起争论的几卷《颅相学杂志》的蔑视,等等,进一步促使他转向和认同库姆式颅相学家所持有的非贵族的、公然的企业家(即功利主义资产阶级)自由思想。有两个事实突出强调了这一点:正是在1832年3月,即《改革法案》三读的那月,麦肯齐把几卷《颅相学杂志》递交给皇家学会;同时,正是爱丁堡新中等阶级的喉舌——自由派的《苏格兰人》杂志,发表了他给汉密尔顿的回复。^[46]因此,麦肯齐与伦敦皇家学院某些具有进步倾向的地主没有什么区别,由于他们在科学活动中缺乏敏锐的政治经验,他们都相似地采纳了客观上并不“属于”他们的意识形态立场。^[47]当颅相学与社会异化和思想异化的联系隐匿不见时,颅相学本身也变得异常;只有当颅相学也变得异常时,麦肯齐的“错误意识”才是异常的。

尽管在清楚地表述以及完全接受库姆式颅相学思维方式这两方面麦肯齐都是唯一最优秀者,至于把对这门知识的旨趣与传统科学的旨趣相结合,以及通过对前者的反应使得后者的社会意义得以修正等方面,麦肯齐并不是孤军奋战。化学家兼矿

物学家理查德·切尼维克斯尽管远非麦肯齐那样的业余科学爱好者,却也是另一位似乎沿着类似轨道前进的人。切尼维克斯曾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化学,1801年获得了皇家学会的金质奖章,并且获得皇家学会提供给他进行第一次科学交流的奖学金。皇家学院也邀请他担任其化学分析委员会的委员,种种方面都注定他会在科学界享有较高的声誉。^[48]

根据《颅相学杂志》的记载,切尼维克斯首次对高尔的思想感兴趣大约在1802年,那时他28岁,这使他成为第二位“信奉”颅相学的英国人。根据他自己的陈述,他1807年11月才在巴黎带着“浓厚的兴趣”听了高尔的系列演讲。^[49]人们推测,1803年围绕着钡元素的发明问题,他在皇家学会的失言使他对颅相学的兴趣得以加强(和罗斯类似)。尽管没有证据来支持或反对这样的推测,但是有清晰的证据表明,他对催眠术的信仰(自58 1816年起)加强了他与科学权威的对立,因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和他们对颅相学的态度一样顽固保守。^[50]值得注目的是,切尼维克斯开始实施催眠术并请求公正地调查催眠术的那年(1828),正是他主动在《外国季度评论》发表了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颅相学论文的同一年,在这篇论文中他表达了对颅相学主张的强烈支持。^[51]第二年5月,他向皇家学会(正值罗热担任皇家学会《学报》编辑之时)递交了施普茨海姆关于大脑解剖学的论文。鉴于切尼维克斯对到那时为止的整个颅相学论战,尤其是罗热和皇家学会在这场论战中的角色非常熟悉,当宣读施普茨海姆论文的秘书表态,由于“这篇论文没有任何新东西”,不能在学会的官方学报中发表时,切尼维克斯几乎不可能忽视这

一表态的涵义或者不对此感到震惊。正如戴维斯·吉尔伯特(1830年切尼维克斯去世时他是皇家学会的主席)粗鲁坦率的表达,切尼维克斯身陷其中的理论“在这个地方是完全不值得关注的”!^[52]

切尼维克斯出身于一个流亡到爱尔兰的富裕的胡格诺教徒之家,这种背景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会权威所迫害的知识给予支持,为什么他会友好对待埃奇沃斯和其他改革家,以及为什么他乐于反对在他看来通过自然哲学而与反革命的政治学产生联系的德国化学。^[53]然而,同样的背景为他提供了同一位女伯爵的婚姻,并且使他成年以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大陆度过;这样的事实使我们不能把切尼维克斯对颅相学的支持纳入任何狭隘的社会政治学派。他的例子也突出显示了对某些特殊思想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进行社会学图绘的生硬性和被动性所固有而且也被其抹煞的问题,如他们对这种思想的认可程度。很显然,切尼维克斯同情颅相学家并对他们给予支持,但是不能把他称作这门知识的“强烈”支持者。没有证据表明他曾经归属于某个颅相学学会,而且,尽管他的遗作《论民族特性》被颅相学家当作对颅相学原理的详细阐述,该书实际依赖于颅相学的内容微乎其微。^[54]切尼维克斯的例子证明,与正统科学社团的决裂和对异端知识团体具有社会意义的兴趣这两者之间,有着一致性。尽管如此,切尼维克斯的例子也表明,留心这种关系之间另外的复杂因素,如情绪、时间和空间方面的因素,也很重要。

同样的因素也适用于托马斯·伊格内修斯·玛丽亚·福斯特*对颅相学的兴趣,他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最后一位颅相

学支持者。他不仅是把“神秘”器官添加到颅相学图表(后来被贴上了“超自然”的标签),并第一个在爱丁堡就此问题开设讲座的人,而且也是在1815年造出“颅相学”(phrenology)这个新词汇的人。福斯特的背景与切尼维克斯类似,他有着足以过上舒服生活的财富,其家族与当时科学界、医学界和文学界的许多重要人物的联系对他很有价值。他是个异教徒。他的祖先本杰明·弗利(1636—1714)是贵格派商人,也是洛克的朋友,在被流放到鹿特丹期间为激进的共和派知识分子和自由思想家提供了避难之所。在靠近埃平森林的家族地产上,福斯特接受的是受到卢梭思想影响的家族教育,他的父亲、祖父和叔叔们都参与了对他的教育,他们都坚持了家族传统:开办商业银行业务,追求科学(特别是植物学),信奉英法启蒙思想,致力于人道主义事业(尽管这个家族似乎日益倾向于非教派,他们中很多人还是与贵格会派信徒有着联系)。^[55]20多岁时,福斯特在开始到剑桥学医之前就已经被视为英国“自然科学最孜孜不倦、最成功的耕耘者”之一。^[56]他已经写了关于气象学、鸟类学、精神病学和植物学等方面的著作(植物学著作使他获得了林奈学会的会员资格),还开始培养自己对于医学、天文学、航空学、素食主义和戒酒等其他方面的毕生兴趣。1817年,他与亨利·博福伊的女儿结婚,而博福伊是一位业余物理学家,也是皇家学会会员。

然而,福斯特不同于切尼维克斯,他信奉颅相学是极其公开而不含糊的。在他的自传中,他声称首次被高尔的学说所吸引是在1806年(可能是在阅读了《医学和生理杂志》那年发表的赞许颅相学的文章以后),此后就忠诚地追随这门科学的发展进

程。1814年,他通过劳伦斯介绍,在伦敦见到了施普茨海姆,并且让施普茨海姆对他的头颅进行颅相学解读;直到此时他才成为一名热情的皈依者。施普茨海姆待之如友,指导其研究大脑生理学;福斯特则把施普茨海姆介绍给他的家族朋友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和其他专家,有时还陪同他在英国旅行。1815年,福斯特在剑桥似乎对约翰·赫谢尔、巴巴奇和休厄尔进行了颅相学指导;1816年6月,他向爱丁堡沃纳学会递交了他有关颅相学的论文,此举促成了一个一个月以后在该市发生的一个重大学术事件:在巴克利的阶梯教室中,施普茨海姆一手拿着《爱丁堡评论》,另一手拿着一个头骨,发表了著名演讲,逐条批驳约翰·戈登对该学说的批评。1825年3月,福斯特当选为伦敦颅相学学会的荣誉会员。^[57]

由于福斯特有很多科学通信和颅相学著述都发表在同一杂志上,即他曾造出“颅相学”(phrenology)这个新词汇的《哲学杂志》,因此把他与该杂志公开声称的目标联系起来并非没有理由:“通过在每一个社会阶层中传播哲学知识”,使它更加“有用……尤其是对于大不列颠的艺术和制造业而言”,以此来展示这门科学。^[58]更显著的是,我们可以把福斯特与伦敦阿斯克西学会^①和伦敦哲学学会的会员并列,因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喉舌就是《哲学杂志》。阿斯克西派于1796年成立了自己的学会,其中大多数人是“新人”,他们基本上靠自我奋斗获得成功,

^① 阿斯克西学会是一个科学思想家的辩论俱乐部,1796年成立于伦敦。这个名词来自于希腊术语 Askesis,指“训练”和“应用”。——译注

思想活跃,社会流动性强,专注于实践而不是沉思。尽管该学会中非国教徒医务人员占有优势(主要是贵格派信徒和一神论派信徒),但是身为《哲学杂志》编辑的报业企业家亚历山大·蒂洛赫却是早期成员的一个典型。^[59]蒂洛赫(1759—1825)是一位格拉斯哥烟草商的儿子,早年就读于格拉斯哥大学,之后于1787年移居伦敦,并在伦敦购买了《星报》,加入了桑德曼学会。到18世纪末,他已经确立了自己的经济地位,而且和其他阿斯克西成员一样,不仅关注地位,也关注通过科学活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即在一个比现在稍微民主的社会、文化权力结构中进行迁就融合的愿望。阿斯克西学会在1807年与地质学会合并以后,蒂洛赫加入了伦敦哲学学会,该学会成立于1811年,稍微有点激进,但仍完全属于资产阶级性质。该学会的公约刊载于《哲学杂志》,学会的目标是“根除非哲学的偏见……但首要目标是去除迂腐的学究们对常识性知识所设立的障碍,因为这些常识性知识把团体精神引入哲学,使哲学成为一个流派而不是世界的希望。”^[60]伦敦哲学学会与阿斯克西学会不同,它支持颅相学;而且,尽管《哲学杂志》自1802年起就对高尔和施普茨海姆的学说进行了不偏不倚的报道,但是直到19世纪头10年,这些报道才从反文化意义上被人解读。^[61]1815年之后,福斯特在该杂志上发表的多篇关于颅相学的论文可以视为蒂洛赫欣赏颅相学的证明,因为这些文章不仅仅是对颅相学的阐释,而且也是对颅相学过分的称颂,以至于使人毫不怀疑这门知识对公认思想的挑战程度。正如福斯特在1815年的一篇颅相学文章中谦虚地提到的:“我只希望激励别人抛弃旧哲学家的概念,就像我

曾经做过的那样,放弃所有先前的观念,用能够证明的事实来进行推理。”^[62]

但是,仅仅根据福斯特在《哲学杂志》上所做的这些表述,绝不会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本人之于这门科学的意义和那些利用这门被他贴上标签的知识的人一样重要。福斯特既不是一个阿斯克西派,也不是哲学学会的成员,尽管众所周知他与激进的出版人理查德·卡莱尔有通信往来,但通常他似乎更乐于与更离群索居的约翰·阿伯内西为伍,而不是与激进分子威廉·劳伦斯为伍。^[63]与麦肯齐不同,福斯特对于利用颅相学来发展功利主义精英领导的社会哲学几乎没有兴趣;福斯特也和埃利奥特森不同,他对于通过对精神进行唯物主义的颅相学研究来攻击传统土地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体系即国家宗教实际上也没有兴趣。正如施普茨海姆所感觉到的,福斯特在某些方面更像高尔,因为他既是启蒙运动的追随者,但从启蒙思想的一些基本哲学前提来看,他又是一位浪漫的持不同意见者。^[64]而且,他和高尔一样,从未真正失去政治上的清白,或者曾经企图把哲学上的异端思想运用到社会变化思想中。由于他在社会地位和经济上相对有安全感,他没有必要这么做。他也没有因任何与其同道疏远的体验而被迫这样做:作为一个表面上思想自由的班克斯式知识精英,他会因为皇家学会的某些规则而在1816年拒绝皇家学会所提供的会员资格,但是却又继续参加主日早晨在梭霍区举行的班克斯私人聚会。^[65]

因此,企图把福斯特不理睬贝克莱哲学“荒谬性”(即“休谟的故意诡辩和杜格尔德·斯图尔特的空话[原文如此]”)理解成

通过攻击他们的哲学基础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和精英主义者来表达他自己改变社会关系的愿望,是错误的做法。^[66]福斯特完全不赞成阿斯克西派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修辞,他一直为自己对形而上学所作的贡献而感到自豪,正如他为自己对实践科学和艺术所作的贡献而感到自豪一样。^[67]的确,有线索表明他摒弃了前人哲学,也有线索表明他对颅相学的兴趣和本章所提到的其他人对颅相学的兴趣之间有着差异:对于福斯特来说,虽然他具有改革思想,但他对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概念的攻击不是对现存社会关系的消极反应,而是有目的地探求(至于他所关心的,则完全是形而上学)对与自然有关联的人和思想进行非唯物主义的整体论的理解。和柯勒律治一样,福斯特有可能从他在剑桥的理想主义者同事(特别是休厄尔)那里获得了反笛卡尔和反牛顿的**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ie)的基础,因此他一直在寻求那种被称为“不同现象间相互联系的法则”的东西,或者那种超越物质世界的精神现实。^[68]他的永不满足的百科全书式的求知欲反映了他的这种探求,而且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对颅相学的赞美才可以理解,因为对他来说,高尔学说的优点在于,通过揭示心与物质大脑之不可分割,从而超越笛卡尔心与身二分法。对于福斯特而言,赞美高尔是因为高尔揭示了人类心灵的微观世界,在这个微观世界里日益完善且相互影响的各个器官是有机统一的。

尽管福斯特对颅相学的这种兴趣与库姆和埃利奥特森对颅相学的兴趣有类似的地方,但总体而言是不同的,反映了非常不同的哲学前提和哲学要求,也反映了政治意识的程度差异:福斯

特同当时的社会联系网络的关系破裂是植根于经济并在政治上得到证明的,可以认为他所从事的所有研究与这种关系破裂之间是互相影响的,但是,福斯特仍意识不到他的知识活动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政治意义。只是在19世纪20年代初,在劳伦斯和阿伯内西的论战之后,对政治性煽动言论的谴责开始针对心理学和生理学唯物主义,当颅相学也以同样的速度被动员起来从事激进的社会抗议时,福斯特才开始认识到他所倡导的颅相学所具有的政治共鸣和社会蕴涵。值得注意的是,当他有了这种意识之后,他开始放弃颅相学。尽管他和罗斯一样,从没有否定颅相学的科学基础,也没有否定颅相学的实际价值,但是不再像过去那样关注这门科学,他曾确实关注的问题也主要是把他对颅相学的兴趣与那些刚开始从事颅相学研究的人区分开来。他之反对被他称为纯粹唯物主义的颅相学的“错误解释”,以及他用无政治意义的非唯物主义者理由为自己的颅相学兴趣所做的辩白,都是他在1835年撰写自传的主要动机。在他的自传中,他特别责备了那些“苏格兰解剖学家”。在他看来,他们的职业使他们误入歧途,以至于认为,通过对大脑肉体部分的颅相学描述,他们能够理解精神。福斯特摹仿托马斯·布朗写道,这样的人通过把物理学推向极致而使人性具体化;他们所显露的对颅相学感兴趣的理由,从哲学层面来看,与导致他倡导颅相学的理由完全相反。^[69]

对反唯物主义哲学进行了这样的辩护之后,福斯特无意中被推到了与埃利奥特森或劳伦斯的支持者相关的保守立场上。而且,他被迫在社会政治上清醒地认识这一点。就像早前的戈

德温和华兹华斯那样,他现在开始积极地捍卫保守的政治利益。1827年,他以欣赏的口吻描写了首相坎宁;1830年,他描写了威灵顿统治下英国的自由和繁荣。^[70]然而,正如把福斯特对高尔思想日益浓厚的兴趣直接与他关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联系起来是错误的,过分简单地把“放弃”颅相学直接与他要
64 保持政治现状或更加关注社会尊严联系起来也是错误的。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他放弃颅相学不是因为颅相学与激进唯物主义的联系,而是因为当他从天主教(他于1824年皈依了天主教)教义中发现了他一直寻求的“一致的核心”之后,他对颅相学不再有任何需求。^[71]这种解释比较引人注目,因为一方面这个解释的唯一困难在于,把福斯特在19世纪20年代进行的科学活动与他对社会异端学说的高度关注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在19世纪20年代早期,在英国拥护天主教几乎很难不被看成异端,其非正统性并不小于倡导颅相学。

实际上,福斯特从天主教中求得慰藉以及他与激进的颅相学唯物主义的分裂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相关部分。这两个方面都可以追溯到1823年,当时他在巴黎拜访了他的“朋友”高尔,并对“精神”仅仅是大脑物质组织的一种功能的观念表达了他的不同意见。^[72]同一年,他出版了《躯体心理学》(*Somatopsychologia*),他在书中捍卫劳伦斯针对阿伯内西的反活力论生命理论的同时,也指出科学本身对理解人类存在的真理是不相关的。^[73]相反,他仿照16世纪人文主义者的样子,列举理由说明回归纯粹的天主教信条的必要性,因为在纯粹的天主教信条中,理性和信仰是可以交织在一起的。第二年,他皈依了天主教,声

称通过宗教义务已经找到了获得“事物新秩序”的途径。^[74]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已经实现了使他自己的世界完整统一的雄心。因此,无论是讨论福斯特放弃颅相学是否决定于他个人的“精神”发展,还是讨论这种精神发展是否决定于他对心理学唯物主义新生的社会政治意义的反应,都毫无意义。更重要的是从他的事例以及本章所讨论的其他人的事例中认识到,人类现实是“完整的”,在具体的社会政治考虑和精神或思想的考虑之间进行分隔的任何尝试,只会造成令人误解的历史概括。^[75]

更普遍的是,对这些颅相学早期支持者事例的考察可以清楚:求助并利用高尔的异端思想会有许多特殊的个人动机,就好像这个社会存在着似乎需要面对的令人不满的特殊环境一样。这种知识本身并没有什么地方决定了利用该知识来表述的反对意见(尽管正如我们将会发现的,存在着一种经过该知识调和的特殊秩序)。在传记信息许可的范围内,我们聆听了这些早期主张,所听到的是不和谐之音:在演唱同一首抗议之歌时,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直接需要和利益来决定所唱的曲调。然而,承认个人在动机和表达方式上的不同,并不是否认研究成果的社会性质以及这门知识的用处,也不意味着“个人”因素在解释人们对该知识的兴趣方面能够和“社会”因素等量齐观。即便我们可以这么评价这些早期支持者,即他们对于表达以及通过表达来处理他们个人的痛苦、挫折和渴望的兴趣要比他们对社会和社会事实的兴趣更加浓厚,^[76]但是这未必使我们(即便是在那些事例中)丧失对整个心理学问题的社会思考。我们怎么能达

到这一点实际上是不可能明白的,因为在所有的事例中,对该知识的探求并不是非政治性地出于该知识自身的原因(或者,至少不仅仅是因为其自身的缘故),而是一直作为一种不赞同事物的现存知识秩序的表达方式,因此也是不赞同社会秩序的现有理论基础的表达方式。

对于这些颇相学的早期支持者,我们不能说他们预知或必然会预知该知识在未来所具有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意义和用处。即便埃利奥特森把高尔的反理想主义与激进的唯物主义密切联系起来,他可能也没有理解其行为的全部社会意义,因为在19世纪头20年没有一个人拥有可以对即将到来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形态进行构想的能力。他对该知识的特殊征用对于新兴的社会团体而言是重要的,因为它唤起的反抗清楚地揭示了把颇相学应用到对变化的反传统的、反权威的意识形态的正当性。但是,埃利奥特森最初对该知识的利用更主要是受到自身利益而不是社会意识的推动。同样,我们可以说,早期宣传高尔思想的其他人给进口的种子施了肥,使其鼓动性功能表现出来,但是对于决定植物生长方式以及植物的种类、质量和果实的可销售性的土壤成分,其改变却完全不是他们的成果。



第三章

通过仪式

因此,为实施知识分子功能,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些专门的范畴。它们的形成是与所有社会集团相联系的,特别是与更重要的集团相联系,而且在与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联系中,这些范畴得到了更宽泛、更复杂的阐述。任何正朝着统治地位迈进的社会集团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在意识形态上”同化和征服传统知识分子的斗争。

Q.霍尔和 G.诺埃尔·史密斯(编):《安东尼·葛兰西狱中札记选》(1971),第 10 页。

当一门新科学表明自己有能力面对怀有反对它的意向的强大的斗士,当它要么通过自己的手段解决了他们所提出的重大问题,要么以断然的方式证明这些问题是伪问题时,它就证明了它的效力和生命力。

同上,第 433 页。

现在人们将明白,颅相学到底是一种“假货”,一种“华而不实的骗子行为”,一种关于“头骨隆起和肿块”及“发现这种所谓发现的哲学骗子们”的体系,还是一种基于自然并了解自然基础的体系。

《柳叶刀》,1825年4月16日,
第41页(论施普茨海姆的演讲)。

“谁能想到,”理查德·切尼维克斯在1828年《外国季度评论》的文章中评论道,

一个体系会产生于一个年仅9岁的乳臭未干的小孩的感觉?而且,在施普茨海姆博士的控制之下,这个体系竟会在1826年,不仅让伦敦学院的大讲堂,而且让通向大讲堂的所有楼梯、走廊和过道站满了听众?^[1]

虽然这是一个修辞说法,但事实是从19世纪20年代初起,许多
68 英国人已经“痛苦地相信,在科学知识很少得到传播以及把似是而非的主张等同于可靠学问的圈子中,这种错误的学说正广泛传播”。^[2]而且,大多数同时代人清楚地知道,主流中等阶级团体对颅相学兴趣的增长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对头骨、头盖学以及大脑生理学的迷恋。虽然好奇和新鲜为施普茨海姆在伦敦学院的演讲吸引了学院历史上最多的听众发挥了重要作用,^[3]但是,对颅相学的兴趣就是在那种论坛、就是在那种特殊的历史时刻被

唤醒的,这个事实剥夺了好奇和新鲜(或仅仅是时尚)本身所具有的解释力。我们也不能把这种现象完全归因于人格力量,因为施普茨海姆不是唯一获得讲演成功的人,这种成功往往就发生在先前摒弃这种知识的地方。^[4]最后,当我们的确能够把这种兴趣的增长与人们对颅相学科学精确性的信仰增长联系起来时,很显然,只有最似是而非的因果关系式的事后逻辑可以允许后者去解释前者。1825年,伦敦星相学家协会在把其杂志的主要部分用来赞美颅相学的实际益处之前,其成员花了4个晚上讨论这样的问题——“有理由相信颅相学是建立在真理基础上的学说吗?”这件事和其他例证一样,证明了具有科学性和真实性的形象是至关重要的。^[5]但是,要是这样的讨论发生在完全清楚有关这个话题的禁忌的更具权威性的机构中,而且被假设成一种社会讨论,那么颅相学的真实性问题就必然会被看作回避了怎样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其真实性得以构建的问题。

这就是本章的概要。然而,由于我们的论点之一是,对于有关社会现象的历史问题,其答案不会完全在现象本身之中找到,也不会在隐藏于其后的思想力量中找到,因此,我们的叙述将从颅相学知识开始被详细阐述和应用的社会和制度总体背景开始。

科学活动的社会前景

没有社会能置身于“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之外,尽管如此, 69
从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社会从很多方面来

说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无序状态。尤其是 19 世纪 20 年代,几乎每一种曾与前工业社会想方设法结合在一起的文化组织都处于解体状态,而能够与工业社会结合起来的新文化组织还只是处于形成时期。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术语**组织危机**(*organic crisis*)(无意之中)很好地描述了这种状态的特征,因为这个时期集中发生的社会转型尽管是彻底的、系统性的,却没有引发与过去的革命性决裂。^[6]这个时期更主要是体验和感觉的时期,而不是公开展示和直接观察的时期。礼仪、习惯和态度等所有方面的变化,像所有公开和隐蔽的政治活动一样,都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于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变(其本身是一种缓慢的转变),都是以阶级为准的,不过在缺乏审慎考察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中却是显而易见的。就像有机体由于新的外力作用无意之中从遗传和设计强加于它的惯常限制中解放出来一样,当社会阶级结构呈现出新的内外辩证束缚形式时,社会阶级结构本身也处于释放的时刻。

说工业革命时期科学活动的快速发展是阶级“形成”过程的一部分就和 E. P. 汤普森的观察一样让人怀疑:“[17 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科学革命……很显然绝不仅仅是好朋友”。^[7]尽管历史学家基本上回避了这样的任务,即用阶级术语来分析所谓第二次科学革命时期的经济活动和科学活动之间的关系,然而他们还是清楚地说明,在诸如伦敦学院或地方的文学和哲学学会这样的场合对科学的兴趣尽管是工业革命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在该兴趣和工业生产的科学—技术的需求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联系。对于大多数栖身于这些机构的新一代专业人员

来说,科学和经济之间的联系是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联系。^[8]虽然伦敦学院是一群来自于皇家学院、具有商业头脑的持不同意见者在1805年成立的,他们试图为梅费尔区^①的地主阶层的科学问题提供伦敦城的答案,但是这个学院也和地方的文学和哲学学会一样,对“实际”知识的追求与该知识的技术效用或有效性是不相关的。^[9]科学知识在这些论坛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提供一种文化空间来间接表达并合理化解释与前工业化时期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中相关方面的差距,包括优先发展的事物、潜在的价值观、隐含的假定及其合法性等。通过追求表面上实际而合理的知识,对沉思和内省的方法就形成了一种或明或暗的挑战,无论这些方面是知性论—形而上学的还是精神—宗教的,由此,传统的权力结构被看成合法的权力结构。因为这种“自然知识”被用来解除传统社会结构暗含的“不自然的”基础的合法性,所以,它也被用来证明向社会世界(social world)的转型是合法的,在这个社会世界里,城市功利主义价值观和精英主义价值观将占据主导地位。

在这些特殊的论坛中,对这种社会世界的需求被强烈地表达出来,但我们不能把这种情况与很多成员置身于现有的社会精英群体之外或仅仅处于其边缘状态的事实相分离。从一定程度上说,他们在自己历史的某些时刻和这些机构本身很像,即他们总是试图与地位较高的群体合作。典型的是,这种向上移动

^① Mayfair, 位于英国伦敦西区的高级住宅区。因1708年以前在这里每年举行的展览会而得名。——译注

经常伴随着那些地位较高群体的一致谴责。但是,并非所有成员都能被描述为社会的“局外人”或“边缘人”或文化上的“阈限”人,而那些可能被这样分类的人通常对他们所渴望的社会中心舞台怀着一种矛盾心理,这样的事实意味着,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这些机构的存在理由并不仅仅是使得向上移动更为便利。^[10](毕竟,比起加入一个地方的文学和哲学学会,还有更为有效的途径来寻求绅士的地位和权力。)甚且正如伊恩·英克斯特最近对他先前观点所作的修正,人们对这些机构的理解应该更主要依据这些机构为那些身份的边缘性并不主要由其阶级和社会地位所决定的人提供身份这一点,而不是根据这些人“既不是明显的资本家,通常也不是确定的工人大众”这个事实。^[11]总之,对于年轻的医务人员来说,社会地位不确定,这种意识可能是强烈的。通常,他们在医务室和诊所的经历也强化了这种意

71 识,那里外行的管理者把他们视为“可与工厂管理者或工程师比较的人,即他们具有技能,却身为雇员或工匠,而不是资本家”。^[12]在18世纪,医学、法律和教会中的专业人士有着学识渊博、生活悠闲和富有文化情调的“绅士”地位,这种地位是由地主阶级授予的;但是新一代的专业人员(按照人数比例,比以前人数更多)与其18世纪的先辈们不一样,为了获得地位,他们不得不更加依赖于职业资格和个人实力。^[13]按照前工业化时期的英国标准来衡量,他们甚至都称不上“专业人员”,因为他们不得不采用收取费用来提供专业服务这种非绅士的方式,不得不在竞争激烈、几乎完全城市化的市场中这么做。而且,他们和其他企业家一样,不得不经常向怀疑心很重的公众出售他们称之为“安

全而合理的”产品。因此,在 19 世纪早期的新科学机构中思想上最活跃的就是这些医学界专业人员,就没什么令人惊讶了;^[14]他们倾向于夸大资产阶级的愿望和竞争性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并坦白无隐地表达他们对社会变化的赞成,同样也无需震惊。^[15]

通过在文学和哲学学会以及类似的地方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些新的专业人员利用自然知识和实用修辞证明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自我标榜为“有理性阶级(thinking class)”的“新人”也相应地证实了他们自己的精英身份以及他们被整合到正在重组的统治阶级的事实。因此,这些机构的成员们从价值中立的外表后面,以“礼貌”的方式(如接受皇家学会禁止公开讨论政治和宗教的规则)通过与激进的持不同社会政见者相联系的知识,参加了一场阶级形成的斗争,这场斗争与资产阶级工业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命运是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

培根学说的神化

如果“科学和积极的善行”大体上为这些人提供了“话语权”(如同颅相学家查尔斯·考恩博士所说的),那么,颅相学就特别为他们的目的提供了明白无误的表述。^[16]随着颅相学在 19 世纪 20 年代由于(而且也为了)新的城市专业人员而得以“复兴”,无论是从隐喻意义还是字面意义来看,它使得这些人的社会抱负达到了顶点。^[17]颅相学不仅赞美智力,而且通过对大脑本体

的生理学阐释来赞美智力,这种生理学解释把智力和道德官能定位于身体器官中具有价值等级的思想器官的顶层。颅相学作为这样的自然知识,实际上几乎成了讽刺“有理性阶级”抱负的漫画。颅相学朴素的经验主义方法论,即通过头骨学的构成形态对心智功能假设性的观察,突出了与形而上学论者的差异,也挑战了形而上学论者内省的智力过程及其产物。通过对比,颅相学的方法论使后者的成果显得故意模糊不清——是“学究式的莫名其妙的话”、“晦涩而荒谬的迷宫”。^[18] 罗伯特·钱伯斯很典型地写道:“对我来说,颅相学似乎与最近的形而上学论者的学说之间有着[像]哥白尼天文学和托勒密体系之间一样的关系。”^[19] 颅相学和神秘论不同,神秘论排斥杰出的精神哲学家的方法(颅相学家把他们与炼金术相比),颅相学对所有人的观察意见和一般见解都民主地敞开怀抱。^[20] 由于颅相学的结论是看得见的,因此其理论和实践也容易把握。这样,捍卫颅相学总是与捍卫“人民”反对特权集团统治的权利是不可分的。^[21] 颅相学以同样的反神秘主义的方式,拥护现实的物质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几乎没有精神的空间。尽管颅相学的复兴者(正如精神的复兴者)的确正通过一面玻璃试图清楚地感知真实,但他们企图直接把握的真实以及他们的追求手段,是完全不同的。颅相学与通过感情或精神感知的经验和/或盲目信仰来追求内在真理相反,19世纪20年代颅相学的主流辩护者(与早期的浪漫主义者和后来的社会主义者不同)通过知性和“理性”的方法来追求一种完全可以计量的外在真理。^[22] 用1835年一份以宗教为导向的教育杂志的话说,“颅相学对应于精神科学,就如同占星术对

应于天文学或炼丹术对应于化学；根据这种差别，颅相学试图通过假设的事实而不是超自然的神秘物来实现神秘化。”^[23] 赞美心智组织的生理学“事实”改善了人们的社会条件，从来没有阻挡住颅相学家把他们的信息传播比作基督的传教。^[24] 他们也间接地从受到传统精神激励的反经院哲学中汲取并获得修辞的力量。但是，当这些颅相学家藐视精英蒙昧主义的死语言^①、经典和其他象征的时候，他们几乎不认为自己属于加尔文、路德、卫斯理或身为补鞋匠和神秘家的雅各布·伯麦的传统。^[25] 他们也没有从更为自然主义、反权威主义和反智的帕拉塞尔苏斯和范·黑尔蒙特的传统，来看待他们对朴素而清教徒式的理解的追求。更准确而且几乎更排他性地讲，他们认为自己在追随弗朗西斯·培根的足迹。通过强调观察，并强调可接近性、实践性和进步，把“客观的事实”绝对化，他们扩大了培根式的科学形象，为的是重申培根对所有基于纯粹政治和宗教权威的观点的抵制。不仅如此，对于培根的方法被当成“上帝为了英国人的缘故而赞成的方法”（查尔斯·金斯利的话）这个观念的形成和传播，颅相学家们也负有责任。^[26]

这种培根主义所具有的一个特征是，它很少关注培根著作中那些支持详细分析和归纳逻辑的方面，而这些方面正是培根在知性上吸引约翰·赫西尔和威廉·休厄尔等自然哲学家的地方。实际上，正因为颅相学忽视了学术的精确性，或把学术精确性当作学术性炫耀而予以摈弃，才使得颅相学更加吸引那些主

① dead languages: 没有人用来交谈的语言，如拉丁语。——译注

要从事实际事务的人以及那些很少或根本不愿意进行批评性反省的人。颅相学使精神具体化以及对智力功能完全经验主义的理解,使得通过否定积极的认知原则来放弃反省变得合法化。^[27]更概括地说,也就是,颅相学吸引人是因为它一直过分简单化:因为它是心理学简化法的终极形式,所以它导致了对所有知性社会现实的彻底简单化理解。这种对现实的简单化使得人们可以在一个有利于不确定性和含糊性进一步加强的社会环境中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和含糊性,尽管颅相学就此而言并非独一无二,我们仍可以从个人层面上把马林诺夫斯基归因于巫术以及帕森斯从整个社会层面上扩展“伪科学”的相同功能归因于颅相学。^[28]我们将在讨论乔治·库姆之学的吸引力的章节被详细

74 阐述颅相学的这种心理学功能;此处,我们只需要指出,颅相学大众化历史所要动摇的,正是马林诺夫斯基和帕森斯有关“非理性”的功能主义解释意欲加强的对思想体系进行“科学”和“非理性”区分的实证主义划分法。无论它多么有可能被一些同时代人嘲笑为胡言乱语,毕竟,它绝非“不可思议的”或“非理性的”知识体。如果颅相学是特别的,那么它就不是帕森斯意思上的“伪科学”,而是“超科学”,因为鉴别它的魅力的东西是极端理性主义和极端反超自然主义,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它的极端实证主义。我们不能充分强调:通过这些术语来研究颅相学的解释意义和魅力,我们不是在揭示一个异常的知识体,而是在揭示一个极端象征性的知识体。

制造超科学

文学和哲学学会同那些完全致力于颅相学的学会一样,在这样的学会里,为其他成员相信颅相学的科学完整性提供最大的合法性支持的,往往是医学发言人的证据。让我们回想一下,对于大多数外行而言,由科学精英写的反颅相学作品既不容易找到,也不那么有趣。更容易找到而且更让人激动的往往是受到宗教推动的偏执的攻击。因此,对于那些寻求在更为“理性的”立场上建立其学会的人来说,拥有大量的医学界支持者不仅可以增强其信服力,而且也可以摈弃对该学会的谴责,即颅相学的支持者都是不懂解剖学和生理学的人,比如“对大脑一无所知的律师、牧师和商人”。^[29]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所谓医学知识的价值中立性。由于颅相学的主要反对者也不得不依赖医学知识,因此揭示医学知识是社会地构成的就不是反对者的专享资格。医学科学的尊严仍神圣不可侵犯(就像很多医学史那样),因为每一个人的利益都要求它以如此形象出现。因此,诸如《绅士杂志》(它在18世纪20年代开始迎合文学和哲学学会中的新 75 生代)这样的刊物能够完全吸收医学界专家的意见,来证明他们对颅相学的新的推荐是正当的。^[30]

在演讲厅里,对颅相学的科学鉴定和所谓颅相学的客观性被医学科学的人造物品即那些环绕在演讲者本人周围的头骨、半身像、塑像和大脑图表等以直观的方式进一步加强。施普茨海姆在19世纪20年代对于在文学和哲学学会中传播颅相学所

作出的贡献要大于任何其他巡回演讲者,他就特别喜欢这样来装备自己,而且正如批评者所指出的,“根据先前了解的知识,几乎没有人准备去评估他那些示范物的真正价值”。^[31]正如施普茨海姆在伦敦学院的讲课大纲所显示的(图2),看起来他只是通过事实来谈论颅相学的情况,并加上听起来通情达理的实际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重要的颅相学实际图解——颅相学头颅,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被科学化。尽管在高尔和施普茨海姆的早期图表中,头颅以一种自然的块状方式被描绘,面孔是一个真人的面孔,但是到了19世纪20年代,头颅变成了一个固定形状的球体(参看图3和图4)。它所提供的科学精确性、权威性和确定性的形象因为重新描绘界定精神官能的线条而被进一步强化。1815年,头骨形貌图在约翰·戈登看来“如同革命化的法国地图”或“如同被放大的鲑鱼鱼鳞”;由此,它也被演绎成某种更能使人联想到物理学或机械学插图的东西。^[32]无论这是否给颅相学带来一种无法预料的、相称的简洁性(就像罗兰·巴特对于 $E=mc^2$ 的贡献一样),可以毋庸置疑地认为,从意象上看,这是一种使人类品性服从于数学量化的行为,或者说是割裂与曾经被整合到拉瓦特尔相面术中的艺术、宗教、意识和精神之间联系的行为。^[33]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颅相学的科学化外表可以视为对施普茨海姆1825年在伦敦学院演讲中蒙受的指责所作的肖像学意义上的回应,当时施普茨海姆曾无意中提到了“颅相学的发明”。“可以确定地说,”《月刊》反驳道,“无论发明的是什么都不是科学。发明属于艺术,属于天才的创造。科学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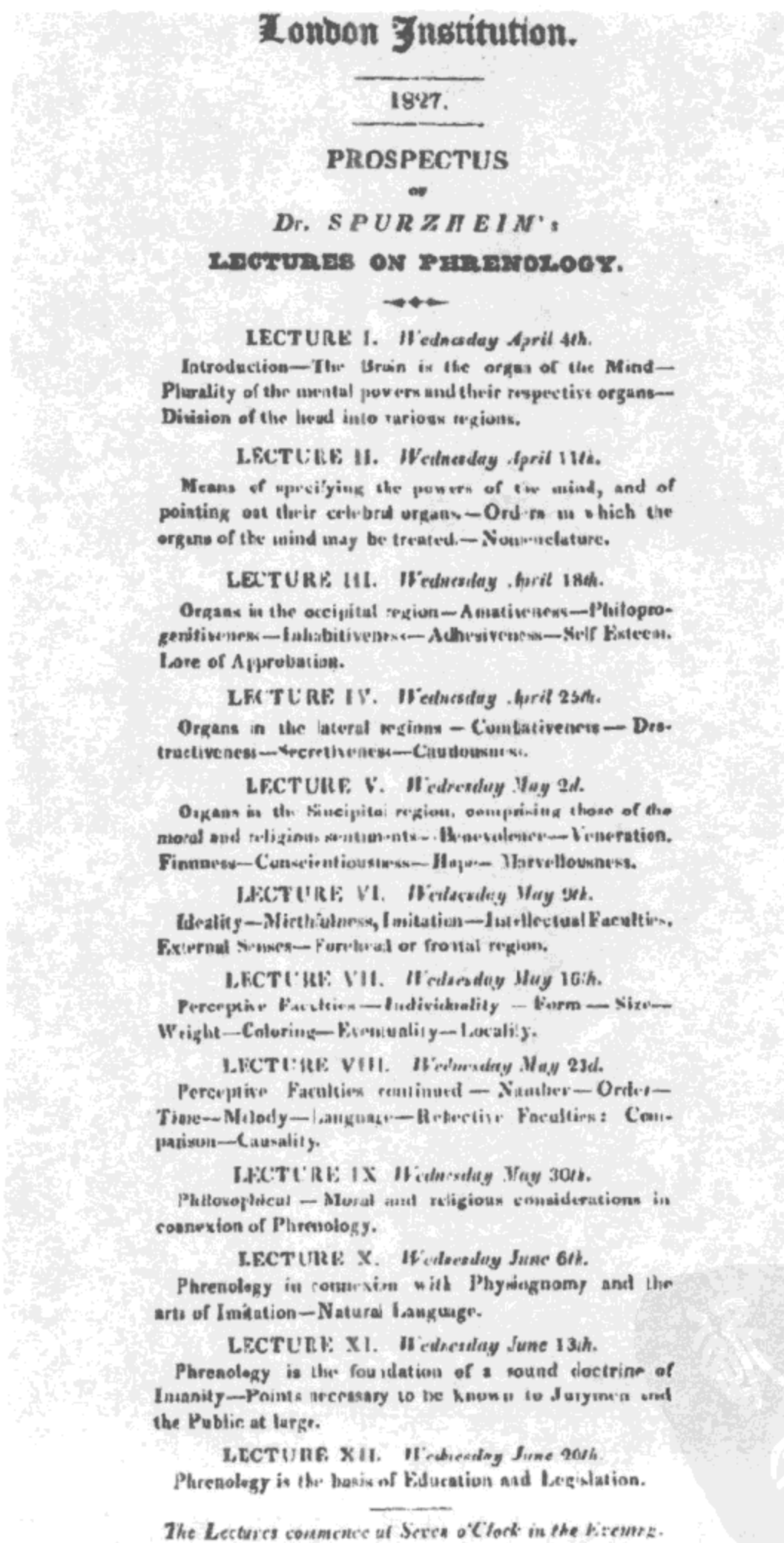


图2 施普茨海姆博士1827年4月在伦敦学院关于颅相学演讲的内容说明书(资料来源:伦敦学院,1819—1874年讲课大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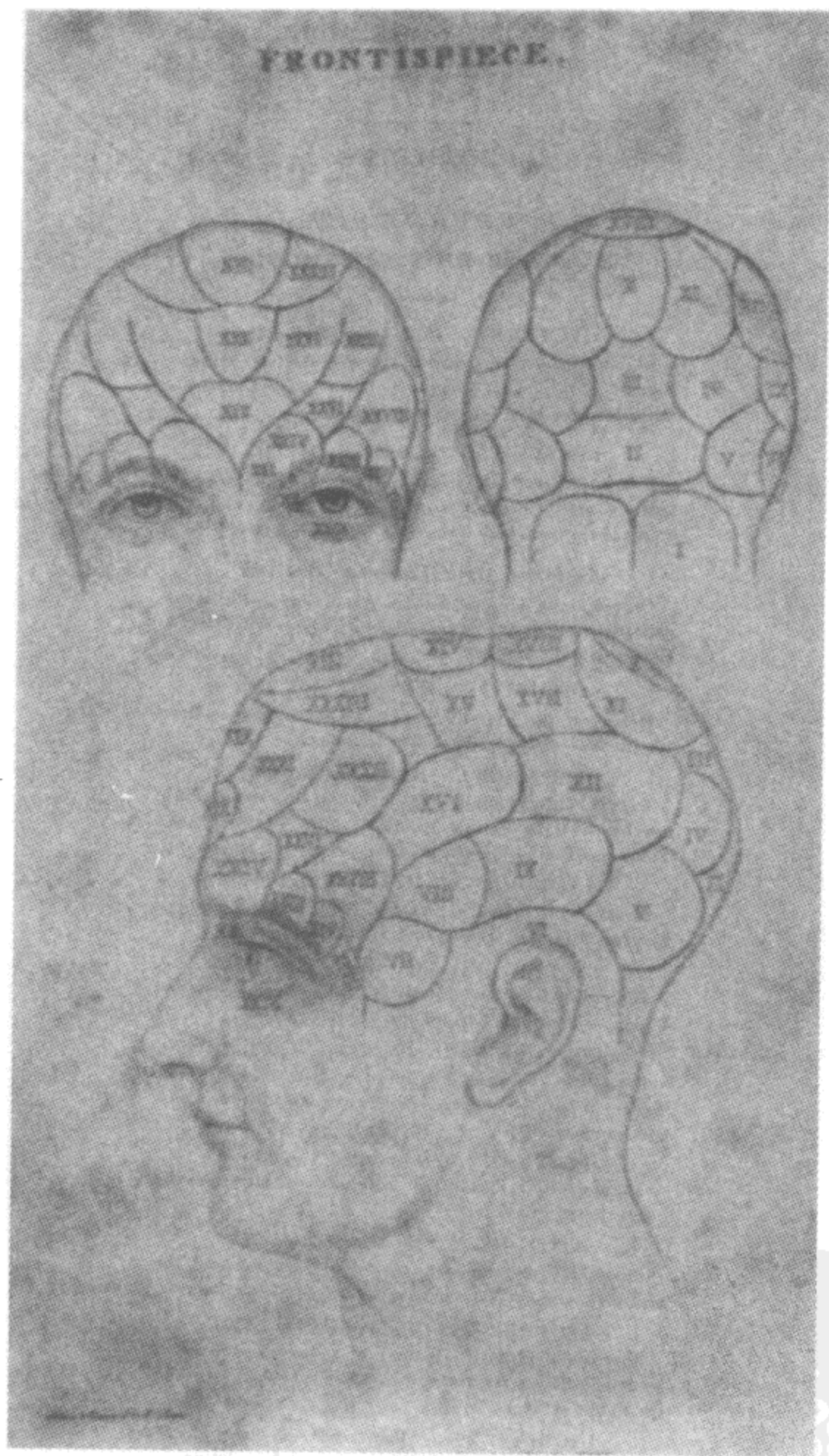


图3 J.G.施普茨海姆《人相体系》(1815)卷首插图中的颅相学头颅(经伦敦韦尔科姆图书馆同意使用)

科学
人文
PDF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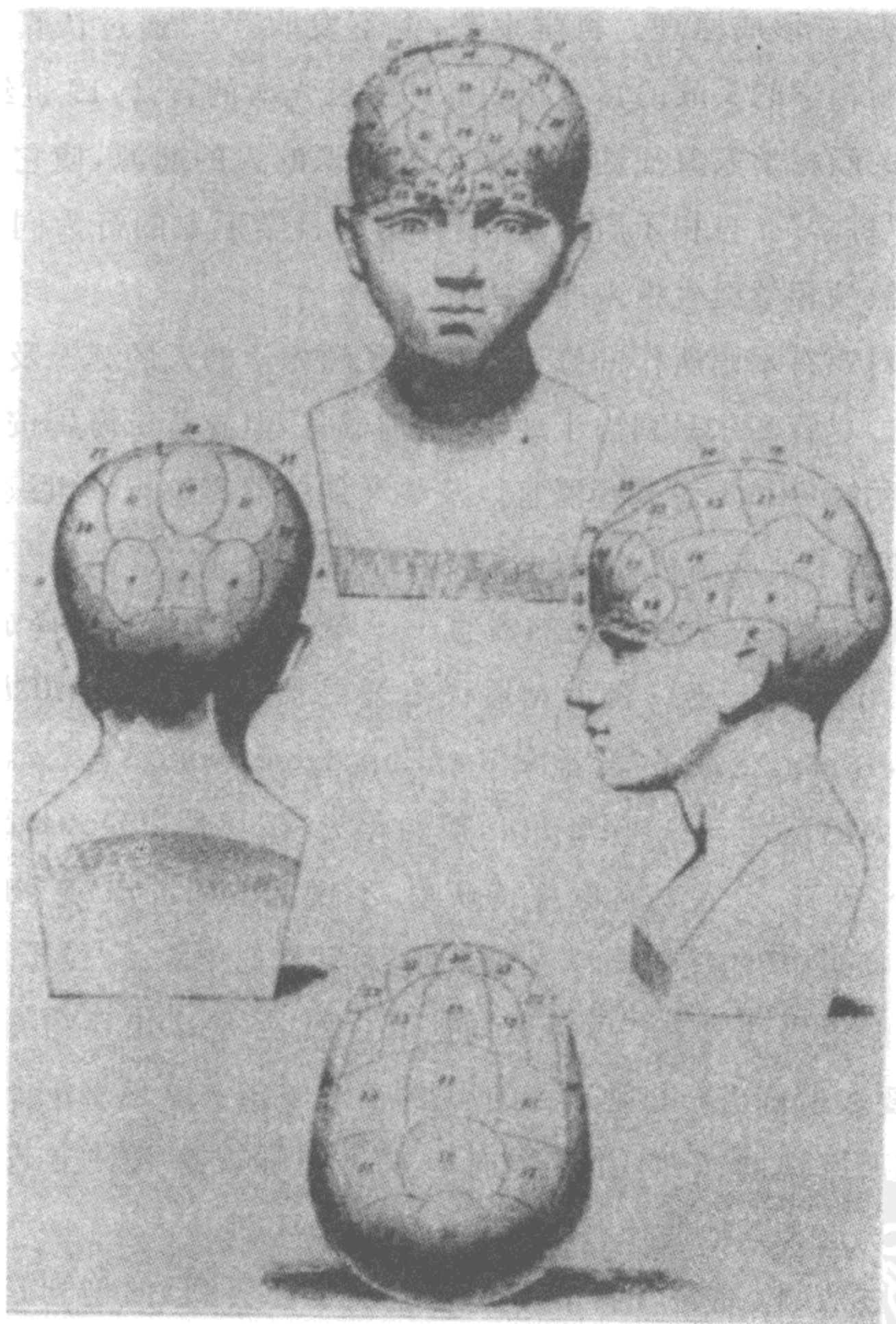


图4 乔治·库姆《颅相学原理》(1824)卷首插图中的颅相学头颅

77 析事实,并形成原理。科学发现,但不发明。”^[34]通过认真地给原始颅相学的头颅的真实相貌涂抹一层光滑的石膏,19世纪20年代的颅相学家象征性地隐藏了其知识的人的起源,使它神圣化为“科学”。自相矛盾的是,制作这种科学形象的行为同时也是抹煞颅相学诞生由来的行为。

78 对原有术语所作的修正也隐藏了颅相学的人的起源及其科学性。尽管高尔只列出了27个精神器官,但施普茨海姆按照植物学的顺序和类对这些器官以及他增加的器官进行了组织。此外,他为了适应文明社会的需求,也把器官名称“植物化”了:这样,高尔用来表示性快感的器官——*Zeugungstrieb*,被译成“色情”(Amativeness);表示对后代之爱的器官——*Jugenliebe* 和
79 *Kinderliebe*,变成了“爱子女”(Philoprogenitiveness);表示有谋杀倾向的器官——*Würgsinn*,被弱化为“破坏性”(Destructiveness),等等。^[35]颅相学家坚持认为,不仅这些词汇像“矿物学乃至植物学中”的任何词汇一样合理,而且它们中除了“爱子女”源自希腊语之外,都是“由英语词汇复合而成,要么出自约翰逊词典,要么出自当今非常通用的用法”。^[36]颅相学家总是试图仿效他们所鄙视的东西,并且同时以模仿和鄙视这两种方式拥有它——这和其他拥护新知识的人没什么区别。

1821年“官方”的《爱丁堡颅相学学会会刊》的创刊是颅相学走向科学性的另一个精心准备的行动。这份《会刊》有意识地模仿其他科学精英机构已出版的文献汇编,征集关于颇有社会名望的科学的各种评论。限制太多的《爱丁堡颅相学学会会刊》后来被四先令季刊《颅相学杂志》所取代。与《会刊》类似,《颅相

学杂志》在其编排上呈现出一种糅合了著名的《爱丁堡评论》和《爱丁堡哲学杂志》编排方式的混合风格。《颅相学杂志》(1823—1847)一直亏本经营,在颅相学家眼中,在它作为科学地位的象征变得日益重要的背景下,更多是作为一种科学地位的象征。^[37]

但在创造颅相学的科学形象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辨别和隔离那些倡导“错误百出的”颅相学说法的人,尤其是下层社会中贪财的颅相学实用专家以及为了无神论和社会主义的利益而利用颅相学的工人阶级斗士。^[38] 尽管对这些人的攻击更主要是回应形势的发展,而非中等阶级颅相学家精心谋划的策略,但是通过把注意力引向“滥用者”并嘲笑“肿块学”和“颅相学手相术”的卑俗,那些企图独占颅相学社会资源的人能够敏锐地使得这样的思想高尚起来:即,从根本上说确实存在着一种“纯粹的”颅相学,而他们,值得尊敬的颅相学家则是它合适的捍卫者。他们努力获得听众的认可。通过向听众展示科学的色情文学或“唯科学主义”,来自新兴专业阶层的颅相学家迎合并强化了听众及其自身的诚实、客观性和精英主义,其方法基本上和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家把真正的色情文学当作自我辩白的“否定类比”一样。^[39] 尽管精英颅相学家们在聚会中除了头骨学以外几乎不进行别的实践,他们所有的实用评论都基于对头颅的解读,他们的社会改革方案中所有独特的地方都根据颅相的诊断得以合法化,他们因自己能够“以惊人的准确性”解读头颅并告诉听众通过观察自己的头颅去寻找该科学的真正证据(当然,通过这种方式也获得了其听众最狂热的皈依)而得意忘形;尽管这些颅相学

家借着“人民”的名义并从颅相学更接近现实的角度发动了对老精英主义者晦涩难懂、内省、神秘的方法论和研究成果的攻击；但是，他们通过隔离江湖骗子和政治鼓动家的“错误的”、“伪科学的”颅相学，能够进一步强化这样的印象：颅相学并不是一种解读性格的肤浅方法，而是一门需要进行深入理论研究的深奥的人类生理学分支。^[40]例如，理查德·比米什在1841年切尔滕纳姆文学和哲学学会给听众阐述颅相学的深奥之处时，清楚地表明，他，作为皇家学会的一名会员，不会去触摸头骨的隆起，但他恳请那些试图通过个人体验来感知这门科学的真实性的人去咨询可靠的实践颅相学家威尔逊先生，他就住在附近。^[41]

因此，“体面的”颅相学家和寻求体面的颅相学家竭力保护自己及其知识免受“肤浅、夸夸其谈”的指责，这不仅使得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的概念得以普及和强化，即科学是可以迅速同“意识形态”、“科学主义”或“伪科学”区别开来的与价值无涉的客观知识，而且坚定地证实了这种区分是对阶级利益的保护。结果，追求颅相学纯洁性的运动成为追求这门“科学”本身神圣性的运动的急先锋，就没什么惊奇的了。

即便如此，在宗教仍比科学更重要的文化背景中，如果以为科学性的形象便足以确保颅相学的社会成功，将会犯时代错误。颅相学家意识到，不顺从正统宗教的惯例，他们就不能指望在令人尊敬的团体中获得发言机会。因此，《颅相学杂志》在1823年11月的“引言”中努力向读者保证，“我们将不放弃任何机会去消除那些厌恶我们科学的不公正立场，因为这些立场产生于错误的信念，认为颅相学会导致唯物主义、宿命论、道德败坏或反

宗教。”^[42]该杂志也确实没有放过这样的机会。一方面，它无休止地反复重申，颅相学将不管这些问题；另一方面，它坚持认为，这种科学“与灵魂不朽的学说是完全一致的，也是最有利于这种学说的，……而且，它与神圣信仰的戒律是完美地和谐一致的”。^[43]1834年，爱德华·特利*给伍斯特文学和科学学会作的颅相学演讲颇具典型意义，他断言：

如果我认为颅相学研究会动摇信仰之链中的一环，即万物受惠于造物主的慷慨、智慧和力量的信仰，——或者，如果我认为颅相学研究会放松道德和宗教之间的纽带，那么如果我有力量，我会猛烈地砸烂颅相学魔鬼，驱散它的残片，直到空间的尽头。但是不，从审视大脑奇妙而美丽的结构来理解基督教……并不比从审视一片草叶的结构和特性来理解基督教更危险。^[44]

到了19世纪40年代，19世纪头10年广泛传播的观点，即颅相学是“隐蔽的无神论”，已完全被颠覆；从都柏林主教到夸夸其谈的《新教杂志》的下流编辑以及各类非国教派信徒，对于颅相学与宗教和谐一致的怀疑在各地几乎都被消除。^[45]很显然，要不是因为社会重心在19世纪前25年已经转变，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毫无疑义地认为，对颅相学态度的修正也取决于颅相学家有意识地把他们的知识（以及他们自己）与先前的反文化唯物主义支柱区别开来的工作。实际上，当大多数颅相学家从旧秩序的反反对者摇身而为新秩序的

辩护者和保护者时,他们努力擦除其变身痕迹。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仅仅把颅相学与正统自然神学并列起来远远不够(而且对于某些颅相学家来讲也是不恰当的)。^[46]更有效、目的性更明确的方法是构建颅相学科学性形象时所使用的这种方法,即,对那些扭曲这门科学去实现离经叛道目的从而滥用这门科学的颅相学“异端”进行鉴别和有说服力的宣传。的确,颅相学的宗教一致性运动及其科学纯洁性运动,都属于一个同时发生的过程。“我们的读者可以放心”,《颅相学杂志》的“引言”继续说道,

他们不仅永远不会发现本刊灌输或支持与正统道德和纯宗教不一致的原则,而且相反,他们会发现,本刊会对任何试图通过相反的过程来误解这门科学的伪颅相学作者进行快速的判断。^[47]

宗教为什么和科学的纯洁运动联系在一起?那些最容易被当作“褻渎者”而受到谴责的人是工人阶级中的颅相学支持者,绝不是这个问题的原因。我们在下文会发现,当这个以阶级为导向的运动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因为某些中等阶级颅相学家打乱队形、过分坦率地把这门知识与唯物主义相联系而受到破坏时,颅相学作为一场资产阶级精英运动也受到了严重损害。这种行动使得纯洁者与褻渎者之间广受欢迎的对比也被破坏了。

刻画鲜明的对比以便有说服力地宣传这种对比,最典型的做法莫过于强调颅相学家自己所受的迫害。和鉴别运动内部的离经叛道者一样,鉴别外部迫害者可以对某些问题进行迂回包

抄并把关注焦点放在其他地方。对运动内部的“伪颅相学家”进行鉴别起的是次要的巩固作用，而对外部迫害者的关注却是这场运动兴起的必不可少的原因。特别是，对迫害的夸大其词可以转移反颅相学家的明确要求，即颅相学家必须按照反颅相学家的条件来“证明”其理论。和大多数反叛知识分子一样，大部分颅相学家非常清楚其反对者的认知方式和所涉术语的主观性，他们认识到，直接回应对“证据”的要求将意味着默认反颅相学家的主观主义。详细阐述颅相学所受的迫害，将会避开这个陷阱，同时还能区分社会和意识形态观点上的差异并使之合法化。^[48]

颅相学家揭露了高尔在独裁的奥地利如何被禁止演讲，还揭露了愚昧的法国的罗马天主教机构近至 1824 年如何因为禁止未获特殊许可的颅相学演讲而暴露了他们对于科学真理的恐惧。通过这些揭露，颅相学家吹捧了其听众的理性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与伽利略命运的对比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这种对比过于简单以致不能做，同时又过于诱人以致不能抵挡——在颅相学被谴责为“与道德和天主教义相违背”以及颅相学著作被列入天主教的禁书目录后更加如此。^[49]这与“最自由国家”的事态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切尼维克斯评论道，在这些“最自由的国家”里，

对人的研究将激发最大的兴趣。实际上，如果没有这样的知识，自由将不复存在。这是颅相学在英国的支持者中受到热情接纳的一个原因，也恰好是其反对者激烈反对的原

因。反之，颅相学在法国也获得了不太热情的关注；因为，无论那里的自由采取何种形式，自由精神仍有待产生。因此，美利坚合众国对这种学说会采取什么状态，很容易猜测。^[50]

这意味着，只有在最落后的隐秘之处，对颅相学的反对才会盛行——比如，像皇家学会这样的地方，“重要人物”的偏见处于支配地位；或者像牛津这样的地方，迟至 1830 年仍不准施普茨海姆演讲；或者在英国国教神职人员的谋略堡垒伦敦国王学院，某些生理学家“被束缚的思想状态”使得颅相学没有发言机会。^[51]

人们进一步指出，恰恰是在这些地方，实用主义和人道主义没有培养起来；对于颅相学这种最能够实现对精神病患者的最佳管理和治疗、对罪犯进行最有效的放逐和改造以及能确立最可靠的教育基础的知识，这些地方的人不仅表示反对，而且，他们为了反驳颅相学的大脑理论，竟不得不诉诸残酷的活体解剖方法。^[52] 因此，颅相学得不到科学机构的支持，其“主要支持者……来自有学问者中的最低层次”这个事实，迅速变成那些旧

84 机构之外的人支持颅相学的理论基础。那些老朽的“科学绅士”对这种最实用的知识不太赞成，只会强化这个理论基础。切维尼克斯非常准确地捕捉了这种双面性，如他所说，

我们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科学中的时尚；我们也无法把如何去选择真理想象成一位年轻的情妇如何选择她的睡袍或一位花花公子如何选择他的胡子那样。如果时尚的人不相

信颅相学,糟糕的是他们;颅相学没有他们能行。然而,如果时尚和体面是一回事,那么剑桥大学[1826年施普茨海姆在那里给一大群听众做过演讲]可以说明某些事情,而且保全了很多人的脸面,这些人现在因为承认了自己的信念而害怕被称作怪人。^[53]

从社会角度来看,对于那些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边缘性”并心生怨恨的人来说,对迫害和“合理异议”的夸大其词,其意义在于,通过人为地极化这种“边缘性”而阐明了现实。大部分反颅相学家实际上与颅相学家持有同样的乐观主义均变论,相信渐进性、社会同质性、稳定性以及等级秩序;对于圣经问题,他们与颅相学家一样,不拘泥于字句;他们都信奉合法理性的宇宙观,相信宇宙由一位仁慈的神所主宰。两者的话语碰撞与反弹,使得反颅相学家看起来完全是停滞不前的贵族特权社会的扈从,这种社会与继承的农业财富相关联,而颅相学家看起来完全是开放社会的进步论者,这种社会与流动的商业财富相关联。在大多数情况下,原本是同一阶级的不同派别对于社会重组的程度和社会变化的速度的不同意见,在争论过程中被解释成关于完全不同类型的社会秩序的对抗性的阶级观念(这与城市工业社会的进一步出现有关)。对颅相学的争论愈加剧烈,每个方面、每个人就愈加政治化,人人都自称可以有权威地谈论人类、思想和社会。因此,处于碰撞中的不连贯的世界观在外表上就愈加披上了真实的外衣,颅相学不仅开始作为新的进步性的象征,而且加剧了新旧之间的分裂。因此,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

积极支持颅相学就不仅是从事一场现代版的 17 世纪的培根式“今古”论战,而且也是从事一场受到高度关注的论战,其社会重要性并不亚于牛顿主义—笛卡尔主义者与 18 世纪晚期法国的雅各宾派自然哲学家之间的斗争。^[54]换句话说,在缺乏革命性的阶级冲突或者政治结构和社会关系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明显断裂的社会环境里,社会的迅速转型最引人注目。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颅相学家与反颅相学家之间的论战(或者是资产阶级的变化理论家对这种论战的利用)有利于对社会现实的漫画式或概要性的理解,它可与那种通过知识本身对个体心理学的理解相媲美。因此,19 世纪 20 年代复兴的颅相学之所以是“危机知识”,不仅在于它是那个时代机体性危机的产物,而且也在于它通过对现实中的灰色进行黑白分明的揭露而消除了模糊性。^[55]

然而,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个层面的颅相学评价所反映的现实,与这些人在颅相学辩论中通过雄辩的阐释而加以渲染的情形完全相反。颅相学家对这场关于颅相学的战斗所作的漫画描述,呈现出不连续的形而上学两极对立(而且通过对那场论战的狭隘的知性论描述无意中再现了这点)。^[56]而这种不连续的对立两极之间的简单碰撞,掩饰了对颅相学的主观评价增长的背后远非不连续也远非机械地偶然起交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从历史角度来看,这种主观评价的增长见证了一种辩证运动。在社会变化弥漫一切、某些社会群体的社会抱负日益上升的背景下,一种新的“自然知识”尽管受到迄今为止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和知识群体的抵制,仍与新兴的处于次要支配地位的精英领导阶层的利益进行互惠性的互相影响,从而加深并加强了有社会抱负

群体的社会重要性和社会可信度。^[57]因此,一种新的“思想风格”或想象、感知和呈现现实的新途径,通过颅相学知识及其相互作用而日益被界定清楚。当然,就像一种新兴的因而与众不同的绘画风格(借用曼海姆的类比)那样,在19世纪20年代通过颅相学的复兴而得到详细阐述的新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思想风格,也是慢慢被当作共同的社会经济利益、期望和感悟的结合体来感知和评价的——新的风格与人们对它的认识相互支持维持生存。^[58](当然,一旦这种新的思想风格一直培养到幼儿期结束,对它赖以为基础的社会利益进行直接的颅相学合理化也就变得多此一举。)对于许多新兴的城市专业人员来说,通过颅相学家对现实的积极操控和分化,思考和感知现实的新方法在生活中萌芽并定型。但是这种新方法从来不会迫使所有慢慢采用这种新风格的人必须在有关生存的自觉的政治层面上以相同的方式采取行动。1825年,一位颅相学家评论颅相学与政治自由的关系时说,“颅相学家本身还没有达到……全体一致”。无疑,这种评论有点轻描淡写。^[59]颅相学家在党派政治事务中也从未获得一致。然而,对于不一致的预感,即便在这个层面上,也表达了颅相学家对于集体性的与众不同的社会文化态度和观点越来越强的意识。

到了19世纪30年代,很少有人不曾察觉到,颅相学家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知识精英思想风格的主要代表和代理人。“由于颅相学家似乎是把社会放在改良地位的最热情的鼓吹者,就像现在一样,”边沁主义的《审查者》杂志在1831年10月陈述道,

我们要说,所有憎恨当前权力和知识的不平等以及不自然分布的人,应该感谢他们的努力……如果颅相学会导致现在这种观念的形成或传播,那么颅相学严格来讲就不可能是坏东西。^[60]

在随后的十年中,社会上认为颅相学是“好东西”的观点可以从无数刊物中找到,其中很多作者曾经在早期表达过对颅相学的轻蔑。对于这种转变,人们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切尼维克斯式的推论,即,尽管该学说已经“遭受的言语攻击足以瓦解任何爱尔兰律师的辩驳力”,但是它并没有像约翰娜·索斯科特和托马斯·斯彭斯的学说一样湮没无闻,而这两种学说曾被用来与颅相学进行比较。^[61](就像大多数的商业产品一样,颅相学的耐力被作为一种价值尺度。)同样,这种论点的出现频率更高,

许多人已经习惯于把[颅相学]作者当作不切实际的狂热者或狡猾的骗子,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被迫让颅相学成为更严格考察的目标的,因为他们发现那些有才华的、敏锐的人狂热地支持它,这些人也许做错了,但肯定远不至于遭到轻蔑。^[64]

一旦对颅相学社会价值的支持以这样的方式得以合理化,那么对颅相学的公开赞扬就只需迈出简单的一步。这种公开赞扬甚至可以像1841年的《国内外评论》改正它以前对颅相学的敌视时那样,不仅默认“我们[现在]认为还是比较合理、比较温和的颅

相学观点”，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头颅的特征”。^[63]因此，正如《汉普郡电讯报》在埃姆斯沃思文学学会主席于1842年做完颅相学演讲后所指出的，可以真实地说：

在自由询问面前，流行的偏见正在迅速消失……人们开始发现，如果颅相学与事实是一致的，那么不管它采取何种外表，它应该拥有最终对人类有益的有利条件，而这种有利条件将使所有真实的东西表现出特色。^[64]

或者，就像埃德加·爱伦·坡大约6年前所说的，

颅相学不再被嘲笑。它不再被智力平平的人嘲笑。它成为科学的最高权威；作为科学，它列身于能够吸引思想者关注的最重要的科学之列。^[65]

“坦率、文明之人”的这种赞扬被颅相学家恰当地用作证明其知识已经得到人们正确评价的证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恰恰在这个时期，正如查尔斯·布雷在1842年指出的，“证明颅相学的真理或谬误”在“消息灵通的公众”中已经不太重要，颅相学本身在那些只对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感兴趣的人中也变得不太重要。^[66]颅相学只是自由资产阶级思想风格出现时的知识接生婆，随着那种思想风格及其伴随的社会关系在人们看来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对颅相学的兴趣也相应减弱。但是，由于这种认知取决于受社会支配的对这门知识的个人感知以及先前信奉它的

程度,因此并不存在支持者放弃它的某个瞬间。1836年,就在爱伦·坡颂扬该知识的同一年,也是埃姆斯沃思的颅相学启蒙运动开始前的5年,一位评论者在一份一神论派杂志上还能够这么表达:“在我们年轻时,颅相学光明正大地携我们出逃;但她带我们经过如此崎岖的土地,进入如此浓密的大雾,以致当我们变得日益坚强时,我们开始渴望得到解放,最终从她迷宫般的幽穴中急速四散逃开。”^[67]

但是,对于那些深陷颅相学宣传之中的人而言,“急速四散”的同时还能保持面子就不太容易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对他们来说,也有不这么做的其他理由)。更典型的是慢慢放弃对颅相学的公认兴趣,19世纪30年代晚期的《柳叶刀》就证实了这一点,那时(同样引人注目)新式的异端知识如顺势疗法和催眠术,开始被当作在社会上渗透的“伪科学”而遭受攻击。^[68]

关于早期资产阶级自由派对颅相学兴趣的退潮,一个近便而且具有社会启发意义的基准点是一篇题为“真伪颅相学”的重要文章,此文发表于1842年7月的《国内外医学评论》。然而,在我们研究这篇文章之前,还是值得简单地谈谈颅相学学会,因为从狭隘的制度层面上来看,学会的历史在很多方面预示了广义的社会领域中所证实的东西。此外,在微观和宏观层面的事件之间,存在着直接而显著的历史联系。

颅相学学会

颅相学学会主要由“有理性阶级”的先锋队构成,特别由那

些渴望表现自由主义行为模式的年轻内外科医生构成。这些学会通常是文学和哲学学会成员的小团体。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利物浦和纽卡斯尔的颅相学学会就与文学和哲学学会同处一个屋檐下。成员们每年支付象征绅士地位的1几尼会费,努力遵守精英科学机构“不谈政治、不谈宗教”的原则。^[69]此外,颅相学学会同文学和哲学学会一样,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和30年代早期达到了人数的顶峰。1826年,也就是特许的爱丁堡颅相学学会(由乔治·库姆、安德鲁·库姆和另外三个人在1820年2月创立)达到120名会员的那一年,人们评论道,“我们这个有着一所大学的城市或者说城镇从来没有以拥有一所精神病医院而自豪,但是却增加了**颅相学学会**这样的有益机构!”^[70]十年以后,29个这样的学会诞生了,到那时为止,人们在任何大城市的市中心都不难找到诸如打着“向所有成员开放的优秀的、内容丰富的**颅相学博物馆**”广告的利物浦文学、科学和商业学院(创建于1835年)这样的地方。^[71]

对于所有这些学会来说,最重要的是它们形成的事实。只要存在着这样一些人,比如时刻准备咒骂“头骨学学校! 头骨学讲道台! 头骨学托儿所!”的英国国教《基督徒观察家》编辑们,那么,颅相学学会的形成对于那些有意于挑衅和变革的人来说就是有价值的。^[72]但是,由于“它们的最大目标”不是大脑生理学的改进,而仅仅是“战胜对手”,一旦学会形成,那么其存在的理由多多少少已经实现。^[73]因此,除了重申会员的信仰之外,颅相学学会几乎没有其他功能。虽然有几个颅相学学会迫于压力的努力对颅相学宣传实行某些控制,但是大多数学会认为转向

福音传道者有失身份。结果,大多数学会在建立以后不久就衰微了。都柏林的颅相学学会秘书写道:“我们都对颅相学的真理深感满意,除非有些新问题需要讨论,会员们很少聚会。”^[74]到1830年,爱丁堡颅相学学会每周一次的会议到会者不足一打;10年以后,伦敦颅相学学会因“萎缩到只剩几个喝喝茶、品品咖啡的同行在埃利奥特森博士的房子里聚会”而受到嘲笑。^[75]在其他地方,对反复讨论罪犯和名人头骨的厌倦不久也开始出现,聚会慢慢中止(但是应该记住的是,大约在这个时期建立的地质学及类似学会一旦最初的热情消退,通常命运也相仿)。^[76]有几个颅相学学会努力维持运转,但大多数学会直到19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才建立(或重建,就像设菲尔德、格拉斯哥和利物浦那样),而且那时的学会与早期学会的建立基础大不相同,其会员主要来自较低的社会阶层。在沃里克、沃灵顿、布莱克本和贝尔法斯特,原先的学会通过把自己改编或并入当地的地质、考古或自然史学会而维持下去,其他的地方性颅相学学会也被要求以相似的方式拓宽自己的范围。然而,在重建的所有学会中,关于颅相学的讨论本身变得越来越少。^[77]简而言之,人们发现颅相学的制度化弄巧成拙,因为它束缚了对颅相学所受迫害的利用,束缚了改革思想家在其社会成功背后的潜在诉求。

但是,我们也可以正确地说,颅相学学会挣扎前行是因为其会员不久就认识到,颅相学会会员资格在他们获得社会地位更高的精英科学学会的认同以及融入这些学会中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正如《颅相学杂志》在1840年对颅相学学会的“非持久性”问题的反思,

对于我们来说,[这]似乎主要是因为对于会员个人来说缺乏足够的个人优势而引起的……颅相学学会的会员资格目前还不像我们首都受到特许的科学学会那样,在某种程度上为会员个人提供任何标志或声望。^[78]

尽管加入颅相学学会的目的更主要是挥动反文化的旗帜和互相支持,而不是直接谋求社会地位,但是大多数会员是向上流动的,他们在可能的情况下日益关注其精英身份的确立。有观点认为,颅相学学会的失败部分是因为它们不能实现这种功能。证明这种观点的最好证据就是最后也是最大的颅相学机构——颅相学联合会(PA)的历史。

颅相学联合会筹划于1835年3月,是对英国科学促进协会(BAAS)排斥颅相学的策略回应。与颅相学和皇家学会之间的关系不同,颅相学与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因为英国科学促进协会通过颅相学家所宣扬的社会、意识形态利益方面的科学活动象征着同样的神圣性,至少在表面上如此。⁹¹ 尽管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实际上(颅相学家不久就发现)掌控在由少数出身名门的知识分子所构成的小圈子手中,该会却诞生于(1831)同文学和哲学学会以及地方的颅相学学会一样的异教发源地。和后者一样,英国科学促进协会清楚地表明,科学既是一种社会镇痛剂,也是城市专业人员在正在重组的工业资产阶级秩序进行社会调节的代理人。^[79] 因此,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颅相学家希望他们的主题成为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正式“部分”,也并非没有道理。然而,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英国科学促

进协会为了隐藏其起源背后的社会利益,竭力在其范围内做好颇相学家在自己的领域内曾经做过的事:一方面,为了加强科学的价值中立的形象,明确区分科学与社会利益;另一方面,为了加强其活动的合法性和社会名望,拼命把有头衔、有学问的人塞进他们的委员会。休厄尔曾威胁,如果允许像罗伯特·欧文和查默斯博士这样“声名狼藉的人”加入,他就辞职。这件事证明了英国科学促进协会试图确立其形象自我意识的自我意识,而且充分说明休厄尔和该协会的其他理论家竭力把颇相学这样具有社会、科学争议的话题排斥在外的原因。^[80]虽然英国科学促进协会没有利用颇相学作为自己的“负面对比物”(部分原因是它的会员中有很多人是很相学支持者),但是,颇相学家很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知识以及此后他们的地位,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以及所有未经改革的科学机构中都受到了威胁。^[81]然而,有关颇相学的讨论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会议中仍在开展,这是由协会内的颇相学家发起的;但是,和在皇家学会的会刊中一样,这些讨论在正式出版物中受到了压制。^[82]此外,当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于1834年在颇相学的雅典—爱丁堡集会时,协会主席亚当·塞奇威克明确表示,会员必须“把他们的研究限制在无感觉的事物上,不要涉足任何有关智慧生物的思考”。塞奇威克的补充说明好像是专门针对库姆(他刚刚被接纳为会员)的,“胆敢逾越本协会规定界限的人,将沾上叛逆者的污名。”^[83]

92 颇相学家不敢。相反,根据乔治·麦肯齐爵士的倡议(在他当着塞奇威克的面维护颇相学家的利益但被拒绝以后),成立一个独立的颇相学联合会并与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同期召开会议

想法开始浮现。^[84]该联合会的会员资格将限制于各个颅相学学会成员或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会员,每年会费为10先令。联合会的目标并不是对英国科学促进协会进行报复,更主要是对它的效仿,通过效仿和证明勇气,期望实现最终的融合。当然,颅相学联合会也通过模仿来嘲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而且,当颅相学联合会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时,它对很多会员同样渴望的精英主义者的虚荣提出了批评。

1838年,当颅相学联合会在纽卡斯尔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大多数先前的颅相学学会正处于垂死之中。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正因为颅相学联合会在地位和功能上的模糊性,才使它获得了大量的支持者。在第一次会议和1841年伦敦第四次会议之间,有300人的名字出现在会员名单上,包括出版商罗伯特·钱伯斯、精神病学家约翰·康诺利、统计学家威廉·法尔、教育家托马斯·巴斯塔德和托马斯·科茨,身为作家、改革家并在1832—1837年间代表设菲尔德的下院议员约翰·西尔克·白金汉、下院议员弗朗西斯·比米什以及道格拉斯·G.哈利伯顿勋爵。^[85]尽管其成员来自全国各地,但主要来自伦敦、格拉斯哥、爱丁堡、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其比例也以此为序),本文所附表格表明,共计219位成员有信息可资查询,其职业的详细分类也是普通颅相学学会的典型分类。只有不到20个会员的名字后面附有代表其身份的字节,也证实了颅相学家相对较低的社会地位。

1839年在伯明翰召开的颅相学联合会第二次会议是一场灾难,原因是该市缺乏颅相学组织,会议组织工作糟糕,以及英

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出席者相对较少(这是近来宪章运动造成的后果)。尽管如此,基于纽卡斯尔第一次会议和格拉斯哥第三次会议,颅相学家已经有理由感到满足。不仅是他们的会议备忘录得以在报刊上报道,就好像他们是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一个正式部分;而且,因为公众似乎对“人性科学”的兴趣远远大于对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枯燥内容的兴趣,他们似乎获得了与其地位不相称的新闻覆盖面。在格拉斯哥,库姆完全抢了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镜头,而且当他对着 600 多名听众公开演讲国民头盖骨的问题(即他在 1834 年提交给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但遭到拒绝的选题)时,他也向英国科学促进协会报了一箭之仇。^[86]

1839—1841 年颅相学联合会成员的职业

医务人员	74	生意人和工匠	7
工厂主和商人	47	土木工程师	6
律师	20	牧师	6
作家、新闻记者、出版商和印刷工人	12	公众演讲者	5
职员(法律和商界)	8	建筑师	3
独立的富裕者	8	陆军和海军	3
学校教师	7	牙科医生	3
艺术家	7	下院议员	2
		会计	1
		总数:	219
		会员总人数:	300

但是,这种成功如事实所示,不过是昙花一现;而且就像人

们最初想象的那样,这种成功本身也是造成颅相学联合会寿终正寝的一个因素。由于成员众多,而且绝大多数成员来自伦敦,颅相学联合会遂决定,在格拉斯哥会议以后,颅相学联合会不再与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同时同地召开,而是约定另外的时间在伦敦召开。对库姆而言,这使他最糟糕的担忧变成了现实,也是他对颅相学联合会的支持从来都很冷淡的原因:在埃利奥特森的支持之下,伦敦的颅相学在特征和目标方面一直不同于爱丁堡所作的界定,部分是因为伦敦的规模对颅相学家造成的社会压力比较小,但更主要是因为埃利奥特森本人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使他获得了一批追随者,这些人倾向于轻视施普茨海姆和库姆的社会宗教主张,公开赞成关于人和自然的彻底唯物主义观念。^[87]伦敦颅相学家在颅相学联合会中的强大阵容意味着,在联合会内部也存在着关于形象塑造和社会地位的紧张关系,而它正是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和颅相学联合会所存在的紧张关系的复制品。随着颅相学联合会以伦敦为基地,这些紧张关系将会显露出来几乎不可避免。

虽然埃利奥特森的外交技巧使得 1841 年的会议没有发生 94
意外而平静地结束,所有颅相学家都同意在舆论上为颅相学是一种规范的科学辩护很有必要;但在第二年的会议上,颅相学家之间脆弱的一致性被击碎了。当时,埃利奥特森的同事、28 岁的朴茨茅斯医生威廉·恩格尔杜在开幕演讲中不仅不妥协地维护“大脑生理学”的唯物主义,而且强烈支持催眠术这种最新的社会异端思想。^[88]恩格尔杜精心算计去赢得异教工匠们的同情(见第八章),他的演讲不出意料地强烈震撼了以爱丁堡为方向、

寻求尊严的颅相学家，他们立刻看到了二十年来仔细复述、不断重申并且成功散布的关于颅相学与社会宗教观点相和谐的说辞被暗中破坏。甚至颅相学(*phrenology*)这个词的拉丁文虚饰也没有留给他们。因此，毫不奇怪，一些颅相学家为了挽救形势做了不顾一切的努力。苏格兰的拥护者詹姆斯·辛普森和《泰晤士报》在当地的编辑马默杜克·桑普森(库姆的另一位密友)迅速拿出了一份“应急宣言(Declaration of Expediency)”，在否定唯物主义是颅相学唯一基础的同时，指出恩格尔杜的指责不应该成为“轻率警告”的理由。颅相学联合会 71 位会员签署了这份宣言，尽管恩格尔杜和埃利奥特森在其新唯物主义杂志《活力论者》(*Zoist*)上对此冷嘲热讽，它确实在事实上促成了 1843 年 7 月在伦敦召开的第六次颅相学联合会会议。^[89]然而，这次会议的出席者很少，通过制度化的途径使得颅相学获得精英主义科学团体的承认、颅相学家被这些团体整合的任何残存的期望，都被重申异端性的唯物主义和催眠术所摧毁。

“发烧病人胡思乱想”的第一个目标

就在导致颅相学联合会分裂的第五次会议以后两个月，《国内外医学评论》发表了“论真伪颅相学”一文。这篇文章清楚地表明，在通俗的“颅相学理论”和社会上受尊重的“科学”颅相学之间已经形成一个分水岭；而且，进行抉择的时间已经到来：要么从这门科学中清除“半信半疑的真理和空洞的推测”并抑制其科学发展的不恰当的通俗装饰，要么就统统放弃。^[90]很多人认

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该杂志的编辑约翰·福布斯，他曾经是颅相学联合会的重要人物，在恩格尔杜演讲以后退出了颅相学联合会；实际上，这篇文章是由福布斯的同事兼密友丹尼尔·诺布尔*所写。迄至当时，诺布尔也是一位重要的颅相学支持者；他曾经担任 1835—1838 年间曼彻斯特颅相学学会的主席，在他深深专注于各种地方性和国家层面的社会医疗改革运动时，曾经写了几十篇支持颅相学的论文，还在曼彻斯特文学和哲学学会作关于颅相学的演讲。^[91]和福布斯一样，诺布尔与安德鲁·库姆、撒缪尔·索利、乔治·麦肯齐爵士等人一道，在听了恩格尔杜的演讲后退出了颅相学联合会。

如果认为诺布尔文章中通过医学方式所表达的情绪以及对脱离颅相学所作的辩护从历史根源上看取决于或者直接归因于恩格尔杜的演讲，这是错误的。毕竟，大多数医学界人士到 19 世纪 30 年代中期已经离开了颅相学学会，就在恩格尔杜演讲的前两年，《颅相学杂志》编辑、植物学家休伊特·沃森已经辞职，他突然相信“颅相学家著作中表述的很多东西即便不是错误的，也是可疑的”。^[92]沃森和大多数脱离颅相学的人一样，没有解释为什么他直到 1840 年，也就是在他领导了 30 年代对罗热和威廉·汉密尔顿爵士的反颅相学的攻击以后，才把颅相学当作“伪科学”。^[93]但是，如果说他背离他父亲的托利主义以及他不赞同曾培养自己的英国国教，暗示了他为什么在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颅相学反文化主义先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么他于 1846 年申请爱尔兰植物学教授职位则为他放弃颅相学背后的必要转变提供了一种暗示。^[94]

因此,恩格尔杜的演讲能与二三十年代对颅相学家同反颅相学家的论战所作的漫画描述进行类比的地方是,它并没有导致观念的转型,甚至也没有增强对个人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方式⁹⁶的意识,并通过这种意识的加深促进强制选择。无论恩格尔杜的演讲在当时是多么让人尴尬,现在看来,想必演讲一定为先前的颅相学支持者提供了一个适合时宜的借口,他们正好可以切断与这种社会资源的联系,因为它已经有效实现其目标,而且现在只会让人觉得是一种威胁。当福布斯于1841年被任命为阿尔伯特亲王和女王家族的医生时,他无疑认识到这一点。下面的推论也应该是有把握的,即,当诺布尔在19世纪40年代已经被提升为一个郡的行政长官而且成为曼彻斯特最重要的医生和顾问之一时,他不再希望被人提及他曾经起过平等派的作用——为曼彻斯特颅相学学会搞到一座威廉·科贝特的头像。^[95]诺布尔意识到,如果颅相学过于明显地成为制造分裂的政治信条的工具,那么颅相学凝聚思想的功能(与职业声望一道)就被摧毁了;因此,诺布尔在他发表于福布斯杂志的文章中,为他的同行放弃先前的信仰提供了一种保全面子的托辞:他指出,这不是因为他们以前支持颅相学是受到了误导,而是因为这种“真正的大脑理论”由于落入“肤浅”和“浅薄”之人手中而变得堕落了。面对这种科学上的矫枉过正,那些曾经“摆脱了意识形态”、仅仅对“中立知识”感兴趣的人与之脱离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几年以后,诺布尔遵循自己的忠告,选择了他的主要批评者威廉·卡彭特的令人尊敬的大脑生理学。^[96]

很多前颅相学家的传记也为我们讲述了类似的故事(正如

很多正统“自然知识”的前拥护者的历史那样)。^[97]在方法上稍微不同的是,这个故事是通过颅相学讲座基金来复述的,1845年12月,安德森大学设立了颅相学讲师职位。这种做法(一位富裕的颅相学早期资助者的遗嘱所提供的资金使得这种做法有可能实现)是出于一种预测,即那时候“年龄在40到50岁之间”的从业医生由于自己曾经在二三十年代从颅相学中获益,会迫切希望把自己的儿子送去接受一门颅相学课程的培训。但是,当只有12个学生报名时,很显然,这种讲师职位完全成为颅相学过去实用性的证明。^[98]与其父辈相比,儿子的社会基础要坚实得多。因此,到1845年时,儿子们(现在与他们的父辈一道)能够一本正经地点头同意本杰明·特拉弗斯(他是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的特派外科医生)经常被引用的话,颅相学的存在应归功于“微弱的真理所提供的支持,尽管它仅能作为灯塔照亮笼罩在其周围的谬误”。^[99]

大约在这个时期,科学和医学界其他重要人物(例如,本杰明·布罗迪爵士、乔治·利菲弗爵士、威廉·托马斯·布兰德和M.P.J.弗劳伦斯)以及重要杂志上的文章(比如爱丁堡精神病学校的创立者戴维·斯基在《英国评论季刊》上的文章),都有过关于颅相学的类似评论。^[100]然而,把本章中我所说的全部内容综合在一起来考察就会清楚地证明,只有坚定的孔德实证主义者或彻底的韦伯论者能够辩称,以前支持颅相学的人赞成这样的评论,与其社会利益网络及文化成就感的改变毫无关系。^[101]当然,除了社会原因以外,还可以找到其他理由来解释这些人对颅相学态度的改变。但是,由于大脑生理学并未发生大的变化,

无论那些其他理由是什么,都不能把它们当作纯粹的知识理由来接受,除非我们愿意接受颅相学家们曾经胡说八道的科学知识的纯洁形象。当然,更明智的做法是,把以前拥护颅相学的人与颅相学脱离干系当作导致资产阶级大众颅相学兴起的同一个社会过程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根据 40 年代的成就标准,去衡量 20 年代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还有待争取的成就以及在最令人震惊的社会紧张和矛盾状况下 30 年代已经获得的成就。

论理说,应该可以这么认为,在资产阶级改良集团内,颅相学可能会被完全当作“伪科学”,因此可能像 17 世纪对隐修主义、炼金术和魔术的攻击那样,起着同样的巩固社会功能。关于这些,前面已经讨论过了。由于这也有可能是 19 世纪一二十年代现状的卫道士们部分策略的排演,我们才有可能只用**万变不离其宗**(*plus ca change, plus c'est la même chose*)来总结这一章。但是这样的结论不仅会显得愚蠢,而且也可能是错的;因为在 19 世纪中期以前事实上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说明,颅相学确实
98 曾被完全当作“伪科学”,而且曾以那种方式代表新现状的利益。^[102]实际上,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发生只是看似合乎逻辑,因为我们把注意力仅仅局限于颅相学在 19 世纪早期同传统社会集团的形而上学(及形而上学者)斗争中的作用以及有关这一斗争的颅相学思想成果。这样做的代价是,我们的写作将忽略这场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其他重要方面——即,颅相学在试图对不同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社会意识形态利益进行非自然化方面所起的作用。资产阶级颅相学这种另外的、从不完全孤立的功能取决于它被当作权威的人性科学受接纳的程度。因此,对于城

市工业资产阶级改良集团来说, 颅相学的目标是维持其作为“科学”的地位, 尽管事实是, 到 19 世纪 30 年代末期, 大多数中等阶级观察家非常清楚, 颅相学作为资产阶级精英主义改良运动已经没有作用, 颅相学团体, 比如文学和哲学学会, 已经成为“已逝时代的残骸”。^[103] 正如一神论派评论家引述他在 1836 年提出的不再需要颅相学的观点时赶紧补充说明的, “我们仍相信她是有价值的。”那种“价值”或者是对颅相学在确立资产阶级霸权的知识合法性方面的用处所作的评价, 实际上到 19 世纪 30 年代中期才开始普遍起来, 我们将会第五章了解这一点。^[104] 在此之前, 我们有必要认识乔治·库姆, 因为他对其他人形成那样的评价起着最重要的影响。



第三部分

99

大众科学

有时我们对一些问题探根究源也是很有意义的，譬如，自然是什么？人类是如何改变自然的？这种经过强力改变的不自然状态是否违背自然？这种违背自然，硬性的曲解是否有违常理……唉！在这世界上还存有最不自然但同时却又最自然的事物吗？对我们来说，这个世界上，最自然的和最不自然的事物能有什么？

——查尔斯·狄更斯：《董贝父子》

(1848)，第 750 页。

有关人的总体看法，仅从对自然的考察中就妄下结论，是极端错误的。相应的，有关社会和人的问题，最终直接放在社会和人的维度去讨论，是最佳的方式。

——雷蒙·威廉斯：《社会达尔文主义》，

参见乔纳森·本索尔编：《人性的局限》

(1973)，第 130 页。

乔治·库姆与人类体格的重塑

我们既不能把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变化割裂开来，也不能把……历史发展中个人生活的性格危机与时代的危机割裂开来，因为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界定的。实际上，心理与社会、历史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定义为“社会心理相对论”。因为性格形成具有原型意义。

埃里克·埃里克森：《身份：
青春和危机》(1968)，第 23 页。

文明社会当中，科学是最具特色的。科学不仅给生活的急速变化提供了精神和物质上的手段和方式，而且创造了许多新的观念。事实上，人类改变环境、改变自我认识的速度现在变得如此之快，每一代人关于美好生活的行为准则差别都很大。前人的聪明才智对于后人来说，在许多方面并没有多大的作用和意义。

雷纳·杜博斯：“科学和人的天性”，载 G.
霍尔顿编：《科学和文化：一种内聚力和

分离力的研究》(波士顿,1965),第 252 页。

102 颅相学逐渐从关于大脑和性格的神秘理论转变成关于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进化”观念的一个重要社会科学传媒,对于这种转变,没有人比乔治·库姆更重要、更引人注目。他是 19 世纪早期颅相学领域的赫胥黎主义者,人们评价颅相学的社会、思想和文化意义时绝不能忽视他的作用,这就好像谈起 19 世纪的地理学,不能不提查尔斯·莱尔或休·米勒。但是,如果过分关注库姆身上所具有的非凡、独特的品性,并由此认为正是这些品性使他能够广泛传播颅相学,反而会适得其反。哈里雅特·马蒂诺认为库姆不是“思想家,也不是诗人、演说家,更不是狂热的人,抑或江湖术士”。这种看法的言外之意是乔治·库姆既不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也不是社会空想家。^[1]由于库姆的思想几乎在各个方面都缺少原创性,他在历史上其实是一位对已知思想进行道德教化的普及者。他的颅相学以及他关于颅相学实际应用的观点来源于施普茨海姆,他关于教育、罪犯以及其他方面改革的观点都是通过颅相学来复述当时流行的观点。一位激进的颅相学领袖曾经向他指出:“你提倡的观点中没有一个是杰里米·边沁和詹姆斯·密尔会不愿意赞同的。”^[2]

但我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库姆的意义在于:他值得我们的关注恰恰不是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先知,而是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产物。就如同颅相学本身夸大了科学的社会性质和用途一样,库姆作为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社会典型也夸大了他那一代

人的许多要求和期望。库姆苦心钻研的颅相学对大众产生了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却不能证明他的“影响”有多大,只能证明在历史的某一特殊时刻他与其他人共同感受的体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思想领域中,个体的人除了在生活空间上没有自主权以外,在其他方面都享有自主权。但库姆对颅相学的兴趣却颠覆了这种观点,人们获得思想的方法与生病极其相似,都是通过带有传染性的传播方式来获得的。为了说明对知识与社会文化领域进行区分是一种错误,我们将对库姆及其颅相学进行研究。但在此之前,让我们还是先留意一下库姆当时所生活的社会背景,同时也要考虑到当时人们试图把个人心理与社会以及文化隔绝开来的谬论,这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

阅历与身份

库姆 1788 年出生于爱丁堡的一个苏格兰低地人家,父亲是个小啤酒厂老板,母亲则是佃农的后代。两口子共育有 13 个孩子,库姆就是其中之一。尽管他们住得非常狭小拥挤,家里还是雇有佣人。只有一次例外,就是 1800 年苏格兰发生饥荒,家里不得不控制开销而解雇了佣人。用库姆后来的话说,这么做是为了维持他们家中等阶层的地位。库姆父母都是加尔文教徒,对孩子们抱有很高的期望,从不干涉子女对职业的选择。库姆的哥哥有两个做了啤酒工人,两个做了制革工人,一个做了面包师;而乔治则跻身于法律界,小他 9 岁的弟弟安德鲁则当了医生。^[3]

尽管库姆的父亲身材高大魁梧、令人望而生畏，却面慈心善。幼年时被虐待的经历，改变了库姆父亲棍棒教育的方式。但是另一方面，他似乎对乔治的一位以棍棒教育出名的老师的教育方法，表示一定的认同。库姆在自传中顶撞道，“您坚守了您的诺言，不打我们，却又总是对我们吆三喝四；如果我们不小心违背了您的意愿，您就威胁要严惩我们。”乔治的母亲一点也不温柔。她甚至比父亲还冷峻威严，很少对他们表示温情，是一个缺乏母性慈爱的严母。库姆说她从来没有让她的孩子享受到“母爱佑护下的快乐”。库姆认为母亲很少对孩子们表示出体贴和同情，她教育孩子们“不要对‘上帝赐予’的苦难表示怨愤”。她也不主张孩子们之间要互助友爱。因此，乔治和安德鲁后来承认说，他们内敛的情感以及对感情外露的反感，其实都是“年幼时父母严格的戒律教导所致的令人痛苦的后果”。^[4]对照一下他们幼年的生活，这样的描述毫不令人奇怪。这种教养方式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他们对互助与合作产生怀疑，使他们倾向于独立和竞争，显然是很难回答的。这些个性可能在乔治·库姆身上得到的体现远比在他的兄弟安德鲁·库姆和艾布拉姆·库姆身上要明显得多。安德鲁自小就被送到别处寄养，养母是个慈祥和蔼的人。艾布拉姆是家中的第二个儿子，热衷于体验集体生活。^[5]这些特殊的经历使他们没有过多地受到家庭影响。但根据汤姆金斯的理论，乔治·库姆比他的兄弟们要好得多。汤姆金斯认为：社会化的人，就是那些在人际交往中表现较为自如的人。这样的人最适合那种“强调等级观念、秩序和可预知”的人际交往。^[6]由于苏格兰加尔文主义盛行于这种社会化最浓厚、

最冷峻的氛围中,难怪当时一些因鼓吹遵守等级和独裁制度以及工业资本主义关系而比库姆声名更为显赫的人,如詹姆斯·密尔、乔治·伯克贝克、安德鲁·尤尔、托马斯·查默斯、亨利·布鲁厄姆以及撒缪尔·斯迈尔斯,都是苏格兰人。 104

就像所有基督教和犹太教文化中遵守第五戒律的人一样,库姆最终为其父母的冷酷找到了借口,并压抑了自己的叛逆情感。对于生活在一个有着十七个孩子的大家庭中(到1807年时,只有十三人还活着),因母亲“没有表现出对自己特别的溺爱,仅表现出一般的母爱和公正”的做法来编撰出一个原谅的理由显然并不困难。但是,家庭人口众多并不是唯一可以抱怨的理由,当库姆试图对他弟弟安德鲁的感情拘谨进行分析的时候,他明白地提到:

原因很简单。部分是由于年龄的原因;部分是因为他一直处于父母严管之下,根本没有机会与父母进行情感交流。而且,在整个家庭里,一旦涉及责任问题,很少会考虑到家人的感情。……由于父母总是担心过分溺爱会宠坏子女,而子女也担心如果抱怨会引起父母的误解,因此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着无法交流的感情障碍。^[7]

但是,如果说库姆把他的情感冷漠脱罪于苏格兰社会化的加尔文主义的话,那么可以说他从未摆脱掉这种宗教思想下形成的价值观影响,而且他也从未打算这样做。他一直为自己是这个以严肃的个性和强烈的道德责任感而著称的民族之一员而

感到自豪。他的朋友们形容他是一个“严厉”、“呆板”、“冷漠”的学究，有着“高大的身材和新教徒般拘谨刻板的面容”。他一生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执着地追求节俭、勤劳和服从的美德。^[8]当他与著名女演员莎拉·西登斯夫人年已 39 岁的女儿塞西莉亚·西登斯结婚时，他已 45 岁，生活已趋于安定。西登斯夫人 1.5 万英镑的身家财产使得库姆能够在 1837 年从法律界退隐，专心致志于颅相学的研究和推广工作。由于他的吝啬与他的不好色一样出名，有人开玩笑说他有充足的理由忽视西登斯面相和颅相的普通。^[9]夫妻俩终身无嗣。

库姆不仅在许多方面保留了苏格兰加尔文教徒教育子女的价值观，而且还坚持着这种宗教信仰。在幼年时，他就憎恶加尔文教在安息日举行的各种严肃的仪式及其清规戒律，讨厌那些有关人的原罪和苦难的布道，更对背诵没完没了的《简明教义问答》深恶痛绝。库姆大胆表达了这种情感，但他并不是在反抗加尔文教的教义，也不是对加尔文教本身的权威进行挑战，这和他反抗加尔文主义的制度化如出一辙，因为这种制度化使得宗教对他不起作用。^[10]加尔文主义世界观在他的思想中已经定位，他不可能再把宗教信仰当作一种行为准则以及个人追求秩序过程中不断调整的手段。或者说，加尔文主义从玛丽·道格拉斯发展到清教历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尽管其措辞发生了改变，但这一切已不能减轻库姆内心因为离乡背井和孤独所带来的恐惧和不安。^[11]随着库姆社会地位的日益上升，加尔文教苍白而“始终如一”的教义对他这样有着“严肃和暴躁倾向”的人来说，似乎只是受虐狂对纪律的沉迷——空洞而毫无意义的宗教文化

体制提供不了自我启示和理解宇宙的方式。他痛苦地表示：“无论是在教会、学校，还是在家庭，没有人告诉过我关于我的本性、人与事物的本性或者我与他们的关系等方面的理性观念。”^[12]这非常典型地暴露出库姆心中的孤寂和痛楚，迫使他产生出改变这一切的冲动和欲望。这与潜藏于哈里雅特·马蒂诺、查尔斯·布雷、亨利·巴克爾以及赫伯特·斯宾塞等人的成就背后的动机一样，也与约翰·埃普斯、罗伯特·考克斯、休伊特·沃森以及 W. B. 霍奇森等人普及“库姆颅相学”有着相同的动因。库姆和这些人一样，都背叛了严格而虔诚的家教。^[13]但他在摆脱原来文化的同时，也失去了这种文化从机制上可能给予他的慰藉，因此他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孤独和迷失。没有一个逻辑体系能够支持他对世界的认知，为此他感到恐惧。青春期的普遍特征在库姆身上也因此加剧。正如他自己对年轻时代的描述：¹⁰⁶“在我的思想内外，没有任何连续性，也没有善良和真理，只有同别人在思想和感情上持续不断的冲突。那时所有的一切真是一团糟。”^[14]

库姆不仅背叛了苏格兰加尔文主义的文化内涵，同时也违抗了他所生活的家庭礼教。库姆对于家庭的违抗和背叛应该从把家庭看成一个文化媒介的角度上来理解，而不是仅仅把它当成一个人的心理问题来看。尽管库姆在通过颅相学的成就摧毁父权制上帝的绝对权威方面所作的贡献的确要比任何前达尔文时代的人巨大得多，尽管库姆的确是在父亲去世后的那年才开始致力于颅相学研究的，对他的发展用恋母情结来解释似乎从来没有得到确证。尽管在一个有着 13 个孩子的家庭中，库姆为

了获得母亲的关爱必须同父亲争宠无疑是事实,尽管我们也不怀疑有人说库姆想得到妈妈的爱而进行的争宠讨爱,是出于一个孩子的天性,^[15]但事实依然是,库姆的母亲并没有对竞争给予爱的奖励。库姆与其兄姊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追求的职业使他能够获得比他的父母更高的社会地位,他在刚刚能够独立的时候就离开了家庭。这些相当有力地说明了他首先考虑的是社会因素,即与向上进行社会流动相关的一些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在库姆对早年生活的回忆中,他从不认为他的父亲或母亲在哪一方面比他更聪明。相反,他认为他父母的智慧同他们家庭所处的较低的地理位置一样,也处于较低的水平。库姆正是用了一种与邦德比和拉尔夫·尼克比类似的方法,才能够重点强调他自己是如何成功地创造自己的命运的。同时,也才能责备他的兄弟艾布拉姆等人,说他们不仅自己没有留心“正确的”社会价值,还强迫那些留心这些社会价值的人去供养被他们遗弃的贫困家庭。^[16](艾布拉姆在创建一个社会主义团体的时候不幸去世。)因而不难发现,库姆对父母的贬损是他对某些社会政治利益合法化过程中的一部分。正如布鲁赫·马兹利什在论及詹姆斯·密尔时所写:“‘靠自己力量成功的人’往往也是一个抨击自己先辈的人,他把这种行为视作追求权力和社会地位的正当理由。一个人否定自己的祖先,是否定其他人祖先的前提。当所有人都没有父母的时候,才能‘所有人生而平等’。”^[17]

为了塑造自我奋斗的形象,库姆在自己的姓 Comb 后加了一个字母 e,这是他否定自己家庭出身的另一个证明。和亚历山大·蒂洛赫(Tilloch,原来的姓是 Tillock)、詹姆斯·密尔

(Mill,原来的姓是 Milne)以及库姆的侄子罗伯特·考克斯(Cox,原来的姓为 Cocks)等人改姓一样,库姆对自己家系的改革表明他与教会、社会以及家庭曾有的权威脱离关系,也表明了他作为改革家对这些权威的攻击。其实,通过改名,他表达了自己希望通过这些变化建立一个更有意义的私人社会关系网的愿望。但是,这些社会关系网与他所抛弃的那种社会关系网有多大的差别,值得怀疑。确实,像库姆这样的人改变名字中的一两个字母却又从来不采用一个全新的名字,是意味深长的事情。人们很想知道他们到底会不会完全改变自己的姓名。如果说追求另一种社会的潜力在孩提时代就已经包含在有关财产、信任和爱的母权制伦理中,当这些“另类社会”就是由这些没能享受到在母亲膝前承欢之乐的人所提倡的,这些所谓的“另类社会”如何能够真正名副其实呢?^[18]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库姆对颅相学的迷恋和专心致志,就能够深刻了解真相并对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意识形态生理学的诱惑

工业革命造成父母与子女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出现新的巨大的紧张状态,库姆的童年、青年和成年初期乱糟糟的经历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库姆之所以痴迷于颅相生理学的研究,与他为了个人身份所进行的奋斗以及他追求一种稳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当然和他的经历一样似乎是不可否认的事实。^[19](值得注意的是,詹姆斯·密尔也正经历着和加尔文教徒

的狂热一样的压力和需求,他也把自己最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人类思维现象的分析》[出版于1829年]一书的写作中。)然而,几乎没有任何相关的传记资料可以证明库姆的社会心理学认识同他对颅相学的兴趣有直接联系。尽管库姆写过自传,但是这个
108 自传只写到自己的28岁,他本人就与世长辞了,而他正是在28岁时首次了解颅相学。因此,他的自传也不能帮助我们证实上述联系。

我们能从档案记录中弄明白的是,库姆最初是跟着《爱丁堡评论》嘲笑颅相学的。1816年施普茨海姆来到爱丁堡,为他的理论进行辩护。库姆应朋友之邀与施普茨海姆见了面,并且当面观察他解剖一个大脑。从那以后,在爱丁堡大学求学的两年之中,库姆曾经有缘观察约翰·巴克利做同样的解剖,也曾经接触过里德和斯图尔特的官能心理学,他开始欣赏施普茨海姆的解剖技巧并对解剖学和心理学产生了兴趣。此时,库姆已经开始对颅相学表现出热情,但并没有沉溺于其中。他从伦敦订购了一些颅骨进行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当这些颅骨到达时,他发现他也俘获了一位听众,像他自己一样急切地想了解颅骨与头骨学及性格之间的关系。更深层次地研究这门科学并获得一定的声誉对他来说非常诱人。他很快就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并陷入痴迷境界。1817年4月,他在《苏格兰杂志和爱丁堡文学杂记》中首次发表了题为《对高尔博士和施普茨海姆博士关于人相系统的解释》的论文。一年以后,他到巴黎拜访了施普茨海姆。之后,他在《苏格兰文学和统计杂志》上发表了关于颅相学系列论文中的第一篇,这些论文后来在1819年收集在一个单行

本中。^[20]

这些早期的出版物对于库姆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使他获得了觊觎已久的“世人的尊重”。“对名望的渴求应该是应该获得这种声望者的追求目标”，他曾经在一篇开始于1811年的日记的开头如是写道。接着，他又说：“我想，以我的智慧足以写出一些关于人性的有价值的著作，尤其是关于社会中等阶层的教育和智力状态的著作。”^[21]他根本没有想到，在他写出这些话的时候，另外几个正在努力奋斗的专业人士，例如查尔斯·莱尔和罗伯特·钱伯斯等人，也正在他们的日记中奋笔疾书几乎同样的志向。他们和库姆一样，也急于成为“人们眼中……值得尊敬的中等阶级作家”。^[22]库姆在后来的生活中，对于一些该有的尊重却总是得不到，经常感到非常苦恼。

但是此后不久，颅相学、社会改革和世俗名利就在库姆那里 109 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那个时候，施普茨海姆也为库姆提供了理论思辨和哲学准备。首先，施普茨海姆在《基于人性研究的基本教育原理》（1821）一书中把科学、宗教和道德融合在一起；其次，他在《人类自然法则概述》（1825）中提出了伦理原则。在这种条件下，库姆已经从纯粹阐释施普茨海姆等人的思想中摆脱出来，他越来越多地谈及颅相学与政治、社会和宗教的联系。^[23]高尔和施普茨海姆把重点放在解剖学上面，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解剖学是其发现的源泉，而是因为解剖学能够强有力地证实他们的观点。但库姆几乎一点也不依赖解剖学。对他而言，颅相学首先是个“伦理道德领域的重大发现”，对大脑的解剖学分析和对生理学的研究不起多少作用。正如他早在1823年第

一次给爱丁堡颅相学学会发表演讲时所说,颅相学的真正价值,是作为“对道德、伦理和政治经济学进行探究的强有力的工具”。^[24]

施普茨海姆的《人类自然法则概述》是库姆创作《论颅相学影响之下的人类职责》一文的诱因。这是一篇在1826年私下传阅的论文,两年后库姆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人类体格》一书。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施普茨海姆通过自然法则把颅相学和社会伦理联系起来的诱因,在库姆的思想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接纳条件。最重要的准备条件是,他在1805年前后已经读过佩利、马尔萨斯和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那时他年仅17岁,刚刚结束两年普通的大学人文课程学习,开始为期五年的学习法律的生涯。可以确切地说,那个时候的库姆满怀疑惑,无所适从。尽管库姆当时身处启蒙理性主义的核心地带,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强化库姆对于加尔文主义的信仰;尽管他在1805年前后就成为《爱丁堡评论》和科贝特的《政治纪事》的热心读者,但这两份杂志也没有让他找到归属。^[25]虽然他从政治和理性的角度高度意识到要向上爬,但其实他没有明确的方向。因此,毫不奇怪:他会从马尔萨斯揭示的“绝对”自然法则产生特别深刻的印象;110 会从佩利对等级制度和适应自然的肯定中寻求“慰藉”;(在接受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处于自然中不平衡状态的悲观性教导之后,)他又被斯密通过扩大劳动分工实现文明进程这一预言所鼓舞。^[26]和许多同代人一样,由普遍的决定性法则支配人生和社会中自然而然的劳动等级分工的衍生观念,日益成为他学着根据变化而生活的一种固定观念。在施普茨海姆的帮助下,库姆

在颅相学中辨别出关于“自然法思维模式”的最终符号及其表达方式。可以这么说,通过颅相学,库姆将踏上一条畅通无阻地通往他那个时代的阳关大道——那是一个被卡莱尔严厉斥责为“机械的”时代,一切事物,“包括我们的思维和情感的方式”,都被认为可以计算,也可以加以统治。^[27]

因而,在对库姆的一生进行历史描述的时候,对于库姆通过颅相学沉湎于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和自我主义的原因,就不能仅仅解释为一种巧合。实际上还有很多原因,但为了正确揭示这些原因,我们必须去看看颅相学本身的实质:不仅仅考察这门科学的话语环境,也要考察这种话语的本质是什么,以及颅相学的基本形式和内容所具有的象征和隐喻意义是什么。要完全理解库姆对颅相学的痴迷,我们必须问,一个像他这种背景的人,凝望着施普茨海姆关于大脑实质的地图和指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换而言之,我们必须努力对这门科学的符号和标记进行解码,发现它们是如何在揭示现实的时候分配、限制并渗透入现实渠道的,从而重现库姆的那种凝视。^[28]

颅相学的第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它是一种关于头脑的学说。但这个特征和这门科学的其他本质特征一样,因其过于显而易见,经常在人们的不经意当中被忽视了。只有当我们驻足思考并认识到这门科学的重要性在于文化而不在于我们自己身体的其他部分时,对大脑的赞美才具有重要意义。^[29]设想一下,假如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发生了逆转,那么19世纪最流行的大众科学可能就不是颅相学,而是手相术。但这种假设并没有出现。在身体的各个部位中,被人们赞美的是头脑,而不是生

殖器、乳房或心脏。在身体的等级分类中处于顶端的是智力，而
111 不是人类的劳动、爱、情感或灵魂的重要性。高尔日益与天主教疏远，毫无疑问地把大脑看作思想的器官，是否与此是一种巧合呢？这似乎不太可能，因为我们发现，把思想重新置于大脑之中，罪恶也从它在灵魂深处的宗教领地中被排除出去，从而获得了一种完全生物性的世俗解释。如果我们可以把高尔的做法称为一种策略的话，那么他的策略就是把理性奉为神圣，从而质疑依赖于盲目信仰、迷信的习惯力量和无理性的行为。因此，受到冲击的是统治阶级理论宝库中进行社会控制的最重要的武器——神学永久惩罚的可信性。对头脑地位的提升因而可以说是理智和理性战胜过去依赖迷信进行压制的标志。与此密不可分的是，这种提升也象征着人类为了理解和控制与超自然力量相对的大自然所进行的斗争，象征着人类同基于财产和继承权而获得特权的群体所进行的斗争，他们的特殊利益不是通过智力而获得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提升象征着人类为实现智力劳动对体力劳动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30]

但是，颅相学的头颅显然并不是指某个具体的头颅。它特指人类的大脑思维，这种大脑思维揭示了关于人类智力实际状况的特别完美的观念。观察颅相学的头颅就如同透过敞开的大门观察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玩偶之家，不仅可以看到最精致的排列和分类，也可以看到以特别功能和职责为基础的清晰的空间层次划分，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中等阶级家庭处理实际家务活一样。人类行为和活动中没有任何一个方面是不可以在分类表中进行划分的，每一个人都有他或她恰当的位置和职责。哈

钦森等人在地壳中发现了水平成层、对称和规则性的现象,但这一切又使他在反思上帝的自然秩序时发现了无序、混乱和不规则。^[31]与此相似,颅相学承认环境中的嘈杂、模糊和随心所欲能够反过来映射出人类思维在自然状态下的理性秩序。

既然在颅相学的头颅中,人的经历被量化和整合进逻辑类别中,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这种功能方式与工厂处理原材料和劳动的机械化情况是相类似的。实际上,颅相学的头颅揭示现实的方式与安德鲁·尤尔的经典著作《制造业哲学》(1835)中描述工厂的内部状况非常相似:在那里,平衡(在颅相学中,所有的器官都是成双成对的)、有序、对机械复杂性的理性理解,以及通过劳动分工而进行的有目的的活动,都成为引人注目的特征。与工厂内部状况一样,颅相学的头颅向人们展示的情况,一方面不太让人费解,另一方面更加自动化,在这里性格本身简化为图表上的数字。 112

尽管机械功能是颅相学意象和话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针对大脑功能多样化的显性比喻仍然是关于身体的(其中也包含着关于机器的比喻)。毕竟大脑不是一个机器,而只是一个器官,是有助于成功的活生生的现实工具。把大脑定义为一种器官或“思维主体”,^[32]远比把它比作机器要好,能有助于理解对不同功能的整体发展所作的描述,也可以改变人们把人看作劳作机器的任意妄断。此外,它还使每个人都去理解“组织法则”,比如常规运动、营养、锻炼、运用、吸收、平衡、和谐等等。颅相学体系是有关精神活动的,它缺少的是那些关于行星和微粒子的撞击模式以及能够适应早期社会需要和社会发展节奏的机械

学、物理学和化学的比喻。^[33]行星体系周而复始的运转以及微粒哲学中相互竞争的社会原子之间的碰撞冲突,被生命的有机法则——生命的生长和发展、生态、调适、结构和功能——所取代,这些有机体的存在与发展并不是混乱无序的,而是根据有规律的自然法则和谐地存在与发展。规律中透着变化,秩序中透着进步,这是颇相学所赞美的有机论比喻的作用。因此,人类本应该通过有机论解释模式而不是颇具影响力的机械论解释方法被送入机械时代,并不像起初那样显得荒谬可笑。部分而言这是因为它把机械功能纳入生命力理论的框架之中,^[34]有机论比喻使人们可以逃避由于新技术和商业发展而产生的令人恐惧的113 社会和精神的影晌;但与此同时,恰恰因为这种比喻缺乏牛顿机械论那种轮廓分明的、因果式的、具有还原性质的唯物主义维度,它更容易使人们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新兴结构和关系采取容忍和妥协的态度。这并不是说颇相学为新兴的社会体制“辩护”,也不是说它的有机论平息了长期以来人们对死气沉沉而充满愤怒的上帝主宰之下的“死水一潭”般的世界的反感(尽管有时颇相学确实产生了其中一种作用,或者同时产生这两种作用)。^[35]相反,颇相学用思维组织和思维功能的描述性解释语言来阐释工业资本主义的新兴结构和关系,被人们普遍接纳。因而,这些结构和关系被看作“我们自身的事物”,或者被看作与已知的关于人类内在本性的“事实”相符合的事物,而与这些相背离则开始被认为不合理。^[36]事实上,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功能主义社会理论的根源所在;而且毫不奇怪,有重大影响的功能主义理论家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颇相学。赫伯特·斯宾塞从这门

科学中引申出人类具有能够适应器官需求、心理需求和社会需求的能力的观念；圣西门根据这门科学认定他对社会的生物学分类是正确的；奥古斯特·孔德也一样，他也认为高尔觉察到了男人具有内在的社交性格。^[37]从这些理论家向外延伸，在一个从未中断的对有机论模式进行清晰阐释的生物学推论传统中（最为杰出的是 20 世纪 30 年代涂尔干和拉德克利夫—布朗），有机论比喻在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和工业心理学的主要理论中获得了主导地位。^[38]乔治·亨利·刘易斯并不是颅相学的信徒，当他在 19 世纪 50 年代思考孔德和斯宾塞从颅相学中得益的问题时，他得出一个相当正确的结论：高尔“大胆地把明确的功能分配给确定的器官”是革命性之举，因而高尔理应被誉为“心理学的开普勒”。^[39]

但除了用这种肤浅的方法之外，如今我们不太容易理解为什么高尔关于人类心理学的“大胆分配”竟会被认为是“革命”的。尽管我们能够提醒自己，在高尔之前不存在现代分析性的心理学——如果不相信哈特利的非分析性的联想心理学或者感知主义心理学，就只有黏液质、多血质、胆汁质和神经质之间的传统的体液区分——我们已经对现代生活的专业化和碎片化习以为常，而且已经把很多关于经济体制的设想变成了现实，以至于高尔的基本理念根本没有让我们产生“革命”的印象。因为“应该存在这样一种关于人类性格的科学”作为一个理念，其本身（在我们考虑它之前）已不太可能让我们感到荒谬可笑，那种认为“这样的科学应该基于把各种个性分裂成对应于大脑特殊部分”的理念又会在多大程度上让我们觉得荒谬呢？甚至像威

廉·赫兹利特这样较为激愤的当时人也只能使我们想起 19 世纪初人们对颅相学的震惊在于：它“声称可以用一种简单而没有争议的方式说明天赋与性情之间的差别，这种方式就是进行劳动分工，或者说把不同类别的智慧和才能分别归功于不同的器官。”^[40]然而，这正是刘易斯以及那些努力在 19 世纪建立社会科学的人们所欣赏赞同的地方。他们认为高尔对心理功能的辨别不仅仅是超越传统体液分类体系的量变；而且他们还预言和欢呼，当高尔详细论述心理活动的分工时，他就像亚当·斯密一样，实际上在理解人类心理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因为通过揭示心灵的物理结构，高尔把心灵放在资本的类别中，这种资本对于那些建立或评价（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的人来说，已经开始成为“自然而然”之事。即便当时并不是从政治角度来这么理解，人们赞赏的仍然是，高尔使得心灵成为资产阶级天性观的一部分。

但是高尔把心灵归于“天性”所使用的是一种特别适合 19 世纪初的方法。因为他所揭示的智力活动中各个思维部件之间的关系在工业生产中也有其对应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高尔所描述的大脑中的劳动分工在工业中就是剥夺工人参与全部生产过程的权利，（如果我们把劳动作为生命存在的本质）使他们的劳动与他们自身分离开来。因而，工业资本主义通过把劳动人民的劳动化约为工资商品，来异化和污蔑劳动人民，这种方法可以看作颅相学的头脑作为媒介所促成的结果。在颅相学的头脑中，人的心理，即人之所以为人的思想和情感的本质，被具体化为许多相互作用的大脑组织区，除了在不正常的偏执狂状态下，

没有一个组织区可以对人的全部思维产生作用。人类思维在被具体化之后,其本质或主观性渐渐枯竭,资本的“客观”关系占据了这一真空。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因而开始界定人性概念化的条件,人类思维的意象开始对人类退化的现实产生作用。因而,从根源上来说,颅相学对于心理学理论的人性所具有的意义,就如同资本主义对于现实中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意义一样。从历史角度来看,用这些客观术语来描述人的头脑与把人类当成纯粹的客体来看待,两者之间没什么差别;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方面,感知和处理对待是相互构成的。在变化迅速的时期,人们更愿意与物而非人打交道,无论这点对于某些人类学家来说是多么“自然”,^[41]但是在19世纪初期,对石膏头颅和符号般的头颅图表的热情却不能与当时正在发生的社会经济变化的类型脱离开来。当然,一旦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被移植到“思想活动(cerebration)”(这是颅相学家发明的一个词)中,那么关于性格的科学就可以多多少少堂而皇之地用来证明这些社会关系的特性是合理的。例如,社会理论家夏尔·傅立叶就倡导“劳动是人的内在能力的唯一形象”。^[42]这种论调的社会、政治内涵我们在后边的章节中会进行分析;为了更好地理解颅相学对库姆所具有的吸引力,这儿只需说,颅相学中大脑的生理组织正确地解决了人本身的劳动分工问题,而这种劳动分工在卡莱尔看来是“关乎整个未来的难题,也是自命为未来统治者的人所面临的问题”。^[43]

我们已经注意到,颅相学的官能不仅分类整齐,而且按等级排列有序。需要补充的是,对这些官能进行评估和数值分配的

依据是它们在身体等级中的位置：比如，后脑最下面代表的是动物性的好色倾向(no. 1)，而前额代表的则是思考和感知的智力能力(nos. 22—35)。这种排列使得古老的“自然等级”(salala naturae)观念和它在18世纪的衍生物——亚瑟·洛夫乔伊所描述的“生命序列”观念获得了一种新的形式。和这些古老的观念形态一样，颅相学不仅强化了“有些人必然比其他人要伟大”^[44]的观念，而且通过强调这种排列所带来的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心理上的好处，使得权力的等级分配这一赤裸裸的事实显得较为正当，不那么露骨。^[45]经过颅相学的等级排列之后，人们必然会认为每个人和每个阶层在一元化世界中都可以实现其由自然所决定的作用。

但是，在其他方面，生命序列和颅相学头脑中智力官能的等级分工在重要性上有着根本差别。生命序列的关系是确定而稳定的，而颅相学头脑中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却是功能性的，整个大脑的完美运作取决于各部分之间和谐的相互作用。尽管施普茨海姆(以及继他之后的库姆)从高尔的实体模型推导出一个观念：智力和道德官能在功能上优越于其他官能，但这种优越性并不是因为与上帝的某种特殊而神秘的关系而主观存在的，而是始终由自然来公正地裁定的。此外，尽管颅相学认为这种官能具有遗传性，传统身份和权力的持有者从来没有认为这门科学有助于证明他们的“自然”特权和权利是合理的。相反，很大程度上由于施普茨海姆在英国普及颅相学的方式，使得颅相学被看成是猛烈抨击世袭权力和财富的学说，因为颅相学断言它优先考虑的是“能力的遗传”、理论上的变化以及永无止境的进步。

而且,当颅相学用“真实的”生物学方面的智力能力的遗传取代“写在羊皮纸文件上的”“人为的”财产遗传的时候,它也在一定程度上用自我奋斗和勤劳的观念置换了原先关于遗传的全部看法。施普茨海姆发扬光大这门科学的方式又一次表明,只有那些勤奋工作而且(或者)充分发展其道德和智慧天赋的人有可能在社会上处于高人一等的地位。实际上,施普茨海姆在高尔的官能序列中加入了主管“谨慎”、“时间”和“秩序”的器官,留给库姆去增加的只有“专心”了。^[46]颅相学认为天性具有启迪意义, 117 就是通过这些个性品质,时间和工作纪律的概念被赋予生物特性;通过斯迈尔斯式的科学化术语,加尔文教派所倡导的勤劳被看成世俗美德,而更为悠闲的农业价值观念受到了挑战。因此,生理必然性展示了改革人类的平面图,这就像人类对于人的神经生物学的了解为人们充分发挥其能力和倾向提供了可能,颅相学的生理必然性也为社会的重组提供了一种自然动力,它基于个人的那些能力,而不是通过遗传获得的神裁的社会地位。因而,颅相学头脑不仅摧毁了农业贵族关于个性的传统直觉认识,而且也与此相联地摧毁了长期以来他们关于社会权力等级制的强大而悠久的合法性思想。

颅相学最后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本质特征是,只有通过抚摸头盖骨的表面才能读出人的心理。这也是对传统思维和传统社会的全面颠覆,因为在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中,所有普通人对于事物真相的认识都很模糊,只有那些特权者才能了解那些真正重要的问题。通过头部表面可以知道人的性格,这样的观念

令那些处于特权地位的精英人物惊恐不已,不单单是因为它使得人们的头颅任由其他观察者摆布(尽管颅相学通常因为这一点被人们攻击)。相反,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所提出的,从头颅表面“很快读出”那些迄今为止被认为非常神秘而且需要深刻研究的东西,标志着精英阶层赖以确定其身份地位的智力活动和成果变得毫无价值。知识精英、社会精英和宗教精英阶层奉为神圣的“内心世界”被亵渎,他们的社会优势受到了挑战。史蒂文·沙平指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爱丁堡的反颅相学者竭力披露介于头盖骨表面和大脑之间存在着前窦,并强调它的重要性。沙平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47]如果一门科学让人们相信其科学性是建立在对现实长期不懈的观察之上,并且能够让人们认识自然,了解人性,同时,又让那些少数特权者深藏不露的学问成为空洞乏味的无聊之谈的话,那么,这样的科学显然具有强大的思想力量。^[48]对于像库姆这类社会背景的人来说,通过头颅的外观展示就可以进行直观的认识,这样的做法是具有革命性的,不亚于加尔文进行宗教改革所表现出来的抱负和雄心,加尔文就是想让人们不用求助于神父或学者就明白他们灵魂的道德状态和上帝的意愿。就像加尔文教和清教切断了上帝和人类之间的联系一样(或者就像无政府主义切断了人和人之间的联系,神秘主义和唯灵论切断了灵魂和自我之间的联系一样),颅相学声称可以从人的颅骨看出人的天性,因而消除了介于人和自身真相之间的迷惑。颅相学极大地还事物的“真相”以本来面目。

对头颅外观的研究所得,解开了自我的神秘性,也使得“情

感淡薄”变得合理化。对于那些情感压抑、畏惧社交活动的人来说，这是一门很有吸引力的科学，因为它主张的是“眼不见心不烦”。但是，在通过把头脑的秘密铭刻在头部表面来披露这些秘密的过程中，混乱、焦虑、内疚和虚弱等令维多利亚时代人焦虑不安的情感仅仅因为它们不符合颅相学的考虑范围而被掩饰起来。正如库姆在自传中所揭示的，颅相学承认维多利亚时期中等阶级思想中存在着某些黑暗面，比如对本体的不安全感、情感混乱、审美观和享受观，以及其他一些不能归为理性范畴的动机和人性。性格的“表面化”使得人们合理地压抑强烈的感情，抑制纯理论的抽象思想和对灵魂的形而上学关注，控制身体中混乱的感知部位。这些，尤其是人道主义者、新柏拉图主义者和浪漫主义叛逆者的思考，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遵守纪律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需求并不协调一致。因而，尽管颅相学从来没有刻意赞美不耽于酒色的人性，但通过灌输“人生之著作完全由其封面来判定优劣”的观点，公开致力于证明和归化工业社会剥夺人性的力量以及因此而滋生的社会现实。颅相学曾经被看作一种心理学因而具有明显的讽刺意味：就像糟糕的社会史一样，颅相学在任何方面都与外在现实有着联系，而与思维的内在结构毫无关联。

与颅相学其他特点一样，通过头盖骨表面预测性格的方法 119 也带来了明显的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意义。它所提供的不单是，甚至未必是，为早期工业经济和社会状况辩护的方式，而是理解那种现实的合理结构。由于人类有着不断寻求“自我和世界的有意义的内在表达”的基本需求，因此人类的行为，

甚至冲动,与“外部”世界有着某种“和谐”。既然如此,颅相学也可以非常恰当地被理解为一种多面的象征资源,它使得人们在可能会导致道德失范和言行不一的状况下保持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协调。^[49]大脑的等级结构既是人们在支离破碎的社会生活中进行自我定位的地图,也是其指南针,允许人们可以交换对愚蠢、盲目以及有关秩序、类型和控制等混乱状态的看法。用一种符合狄更斯笔下描写人物的方法来看,一切都很明白:头脑不再是教皇所说的“混乱不堪的激情”,它是一种生理学结构,按一种有序的方式发生着作用。与此相关,颅相学的一个意外收获是,它清楚地解释和证明了资产阶级男性在心理和生理上的优越地位,妇女、儿童、工人以及其他人的特殊作用和职责,以及对社会叛逆者进行刑事处罚的需要。

就像库姆肯定经历过不和谐的经历一样,他通过这种虚拟内省的方法来理解外部世界,肯定也使他找到了一种令他满意的和谐。单从他那本名著的标题——“人类体格及其与外部事物的关系”(1828)^[50]——就能发现内外世界和谐的线索,而这本书的内容也体现了库姆各种心理的交叉重叠,既有社会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和强烈的怀疑,也有通过颅相学头脑所显示的有关确定性、秩序和意义的结构混乱感。据说温斯顿·丘吉尔和艾萨克·牛顿把他们自己非常强烈的个人神经感应转变成强有力的社会力量 and 知识力量,也可以认为库姆把他自己的神经感应转变成控制现代生活混乱状态的强有力的世俗神学方法:换句话说,他阐明了华兹华斯在1814年感觉到的主题:“人类从未听说过——外界与心灵共处”^[51]。

《人类体格》

120

在把人的思维形态图翻译成直白的社会和道德语言时,库姆使用了从一种现实形态前进到另一种现实形态的方法,单是为了弄清这种方法就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研究他的作品。但是,对于一位研究思想的社会文化史学家来说,这么做还存在更有说服力的原因:即《人类体格》是19世纪中期最受好评的畅销书之一。到1847年,这本书的总销量超过了8.05万册。到1860年,该书在英国销售了大约10万册,在美国发行了20多版,销售了20多万册。^[52]从畅销(和赢利)的角度来说,《物种起源》到19世纪末只销售了5万册,根本无法与《人类体格》同日而语;罗伯特·钱伯斯的《天地万物自然沿革的痕迹》在1844—1860年间发行了11版,销量超过2.5万册;休·米勒于1847年出版的著作《岩石的证据》据说卖出了4.2万册,但这些都无法与库姆的《人类体格》一书相提并论。在销量以及真正价值方面能够与库姆的著作一较高下的著作,一是撒缪尔·斯迈尔斯的《自助》,在1859—1905年间售出了25.8万册;另外就是经常与《人类体格》一起受到抨击的托马斯·潘恩的《人权》(1791),据称到1793年其销量达到了20万册。^[53]有人说,在19世纪中期,《人类体格》一书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天路历程》和《鲁滨逊漂流记》,而且更确切地说,该书往往出现在这种人家的书架上,那里除了上述几本书之外别无其他书籍。^[54]“如果在一个制造业地区你遇到一个工匠,他睿智的谈话和整洁的外表使你

相信他是他所在阶层中比较让人称许的例证”，1841年的《旁观者》杂志这样写道：“进了他的家，十有八九你会在书架上找到库姆的《人类体格》。”^[55]正因为这个原因，哈里雅特·马蒂诺会在她的《传记概略》(1865)中把库姆放在“科学”部分，位列冯·洪堡之侧。在她看来，库姆与其他向劳动人民传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的人一样，就算库姆“不是该书的作者，单从他作为民众思想伟大革命的代言人角色”，也会受到人们的仰慕；^[56]实际上，他是传播世界观的成功人士，这些世界观是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的哲学所预言的，也被马尔萨斯和佩利等人所采纳和应用。因此，马蒂诺确信，库姆的伟大著作让人们第一次看到了“人在宇宙中的‘适当’位置”。后来，其他杰出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实证主义的辩论家也用同样的语言赞美《人类体格》的作者库姆，但他们和马蒂诺一样，要么避免谈及库姆的颅相学，要么根本不理会库姆的颅相学，他们很少流露出阅读这本书曾经在他们的生活中标志着一个“时代”。正如约翰·莫利在他的传记中描述库姆的朋友理查德·科布登时说，“二流作家中很少有人能写出比《人类体格》更好的作品”，这些被人赞美的原则“现在已经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成为所有有理智的人能够接受的常识”。尽管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本书“对人们的健康、道德和心理修养”所产生的效果和好处，但是从马蒂诺等人的观点来看，这本书“极大地满足了当时人们的要求和愿望”，这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57]

尽管从表面上看《人类体格》一书是对人与周边环境之间自然关系的客观描述，实质上它是关于日常生活、生产方式和社会

关系的一个科学规范——它是社会行为在文字上的“构成”，建立在精神组织的政治象征性构成之上。它鼓吹节欲、整洁、良好的习惯、工作纪律、核心家庭、个人主义、财产权利和自由贸易；谴责吃辛辣食品、生活一成不变、懒惰、缺勤、反抗、放荡、早婚和多生等习性。在他的笔下，劳动阶级生存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不良恶习，“与其说他们是有道德和智慧的人，还不如说他们是组织有序的机器”。他们一方面被看成对“过去美好时光”持有“错误看法”的人，另一方面被看成是永远梦想未来幸福的人，以此来补偿现实中的苦难，而且“他们自己行为的重大失误导致了”体制性的“灾难”。^[58]这本书所提倡的一个观点是，结婚应该在心智发育成熟的基础上进行；惩罚罪犯不应该是把他们处死或罚以劳役，应该是将他们单独囚禁，这样他们头脑中的邪念、欲望和狂热才会被粉碎，新的道德影响才可以灌输进他们空虚的头脑之中。

对所有这一切的阐释和理性思考是自然的道德原则。与孔德及其追随者斯宾塞一样，库姆尝试解决的是迄今似乎还不可能（也不必要）解决的事情：“证明道德是一种科学”。^[59]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的当然是颅相学——“关于人性最清晰、最完全、最有基础的体系”，因为对大脑构成及功能的真正认识可以衍生出关于人性的真实的科学原则。正如库姆所见，颅相学提供了科学证据来证明，“恰当的行为”就是“道德和心智能力共同认可的、开悟的、二者合一的行为”。^[60]（既然和谐“与生存的快乐是同义词”）因而可以得出，快乐的最大化取决于智力和道德情感的文明程度和对兽欲的抑制。这样就形成了库姆的道德自然法

则。但是在库姆所利用的自然哲学中，“法则”通常是一种用来描述一致的物理现象的比喻（比如引力“法则”），由于这样的法则必须加以遵从，它其实与自由意志毫无关系。有鉴于此，在库姆的著述中，“自然法则”就成了道德规范，如果逾越这些规范，就会产生“令人惊骇的可怕”后果。^[61]对于库姆来说，不相信道德的自然法则，而去听信其他判断是非的标准，其后果不堪设想，就像一个人试图在空中飞翔，在水中呼吸游弋一样。

引人注目的是，《人类体格》从最初出版开始，就因为把约定俗成的道德原则与描述性的自然法则融合在一起而招致强烈的批评，^[62]但是，自然法则之所以在英语世界中广为流传，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书。库姆的朋友和同道，颅相学家罗伯特·钱伯斯，在他的著作《痕迹》中宣称：

毋庸置疑，一旦精神活动被证明是在这种法则之下实施的，就立刻被归入自然事物的范畴当中。这时，它原有的隐喻特性顷刻之间消失，自然和道德之间通常存在的差别也被取消。^[63]

123 早在 1833 年，威廉·惠威尔反对的正是道德原则和自然法则的结合。但是直到 19 世纪后期，这个问题才被人们认真加以考虑，主要是刘易斯、威廉·卡朋特和赫胥黎等人，后者在 19 世纪 80 年代把颅相学当作伪科学的典型。^[64]在这些世纪末的批评中，至关重要的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论文《论自然》，这篇文章写于 19 世纪 50 年代，但是直到 1874 年才出版。密尔是

想揭示,当人们把自然当作道德的外在衡量标准的时候,自然具有主观性。他特别挑出库姆的著作,作为混淆探索自然和观察自然的罪魁祸首,“这种混淆从这本书一直蔓延到通俗文学,到现在我们还能不断地读到要求遵守宇宙自然法则的训谕,就某种意义来说它和道德法则一样带有强制性。”^[65]

但是,密尔等人可以任意进行逻辑思考,而库姆却只能进行现实的考虑。作为法律工作者,他不用提醒就知道,法律的禁止和批准是统治的工具和确定社会关系的途径。为了废除传统权威,重新调整社会秩序,库姆用科学来裁定和统辖一种绝对的道德规范,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既然他的对手们把上帝当作他们所信奉的真理和权威的仲裁者,库姆也需要把自然法则般的权力和权威归因于他所支持的道德法则。因而他和所有致力于改革社会道德状况的人一样,在面对对手时需要一种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这种检验标准应该来自于自然,不受传统权力持有者的文化习俗的腐化影响。^[66]因此,库姆在为他的著作辩护时总是回避人们对利用自然法则概念的批评,也就不足为奇了。

鉴于库姆利用自然法则来完成反对既有社会秩序的使命,《人类体格》为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中具有改革思想的人所接纳也就不足为奇。然而,要想全面理解这点,还必须补充说明,只是在后来标准的城市工业资产阶级价值中,《人类体格》才在灌 124
输这些价值方面显得有些愚钝。从上下文看,该书对许多人来说的确呈现出不同的见解,就像瑞典文译者给该书另起的书名“人间幸福原理”。库姆的颅相学表明“它是一个关于自然的法则,只有当人们的智慧已被全面激活,道德情感得到不断的发挥

时,人的动物习性才能被绝对控制;只要这些动物习性还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么痛苦还会依旧。”当然,这门科学也带来了健康、繁荣、个人幸福以及“文明的优越性”。^[67]幸福所需要的不过是,人们与思想和道德的自然法则协调一致,并遵从这些自然法则。难道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们未曾乐观地预言过,一旦自然被正确地理解,社会本身将处于和谐状态?利用颅相学,库姆似乎提供了那把理解自然的必备的钥匙。从此以后,人类将免除过去错误的世俗和宗教束缚,也不用再经受“当今野蛮而不文明的生活状况”。人类(终于)在自然进化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现在可以继续向未来迈进,那是一个永远在进步的完美而和谐的世界。

因此,《人类体格》最显著的特征是人道主义,而不是压制;是自由,而不是屈从。有人认为库姆对待他所信奉的这些品质并不虔诚,他甚至把这些品质与惩罚罪犯联系在一起。这种想法显然是错误的。实际上,特别是在关于罪犯这一问题上,库姆完全有理由相信,他的方法与当时盛行的野蛮“肉体惩罚体制”相比,是相当仁慈的。和对人类的总体改造一样,库姆的“道德体制”是为了教化罪犯的思想,恢复他们的心智和谐,确立道德和智力官能的支配地位。既然这些官能的活动被认为是“快乐的源泉”,库姆使得这些官能生效的方法(洗脑)看起来也是合理的。惩罚罪犯的“道德体制”除了让罪犯“为了自己的幸福重新变得顺从”之外别无其他目的。库姆相信,从任何理由来看,罪犯都应该感谢这种惩罚方法。^[68]

125 当然也可以说,库姆对于教化罪犯所表现出的极大兴趣,反

映了 19 世纪早期城市资产阶级对私有财产日益上升的不安全感,库姆仁慈的改革姿态仅仅是一种打乱社会根本性不平等的方式。库姆的思想中当然也有这样的恐惧心理,因为《人类体格》每次再版时,扩充最多的部分就是有关惩罚的章节。^[69]就像库姆的著作确实有助于淡化罪与罚背后的阶级现实一样,库姆对于罪犯带着人道主义色彩的关注,有助于加强对惩处罪犯的控制。^[70]但库姆本人并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他的这种兴趣。他也没有意识到,由于对罪犯的特别关注,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对精神病患者的注意,使他参与到重新界定社会一致性的过程当中,但福柯却让很多人明白了这一点。^[71]库姆不会知道(要是他知道,他会察觉到的),任何社会都需要叛逆者的存在,因为对叛逆者的排斥能让所有其他人,尤其是那些排斥叛逆者的人,有一种社会归属感。库姆对罪犯心理的重新界定以及相关康复要求——与他对颅相学的总体兴趣是他赞美常态与变态的方法一样——不仅被认为是“局外人”企图获得“局内人”的地位,而且不可避免地被当成反传统主义者对社会凝聚力的特性进行现代化解释的要求。对个体的恰当惩罚,既反映了理想的个人主义社会的一种方式,也是其象征性表现。但是对于这一点,库姆还不如杰里米·边沁明白;对于库姆来说,以人性的名义创造一个更合理的社会是他的宏伟计划,而改革对待罪犯的方法不过是这一计划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对工人阶级的关注也是如此。

尽管库姆在美国铁路的巨额投资可能会被当作其身份的重要标志,但《人类体格》一书的作者既不是以资本家的口吻来表

述的,也不是以一个企图使工人接受剥削人的、非人道的经济体制的人这一身份来阐释的。^[72]库姆和比他年轻的同时代人安德鲁·尤尔不一样,并没有为制造业体制进行辩白,而是批判它“不断地增加由它造成的罪恶”。^[73]他控诉制造商们被膨胀的贪欲和自负心理所驱使,使工人除了满足于最基本的技能之外一无所用,这是违背自然法则的。由于政治经济学家们认为财富的积累是人类的最高欲望,他们也同样受到了库姆的谴责。在库姆看来,罢工是对制造商的贪婪行为实施的“本能的遏制”,因此,库姆在安排合理的社会中对工会给予了应有的地位。^[74]

自然,我们不能从这些观点的表述跳到相反的结论上,认为库姆赞成原型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批判——这就如同我们不能根据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关于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的同样偶然性的否定观点就得出斯密赞成原型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个结论一样。在思想史中更合适的应该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因为库姆(和斯密)揭露制造商贪婪的根本点是禁欲般地反对感官满足,这种感官满足在柏拉图看来是金钱欲的最终目标。^[75]库姆的观点无论如何都不是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是对这种体制理论上的不完善予以揭露,如果这些地方得到了修正,这个体制将更为健全。^[76]《人类体格》一书提倡缩短工时、改善工作条件的背后动机绝不是为了工人阶级自身的利益,更准确地说,它希望可以让工人阶级分享作者理性主义者的心境:毕竟,工人们在工厂中劳动的时间减少了,他们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颅相学和“自然法则”!

因此《人类体格》在最后的分析中直接加以合理化的并不是

社会经济体制,也不是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的城市工业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该书努力宣扬的是启蒙理性主义本身;在库姆的思想中,理性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的结构和关系之间并没有清晰可见的思想联系。库姆和孔多塞或德斯蒂·德特拉西一样,从来没有怀疑他所赞美的理性思维的力量;和他们一样,库姆意识到他所赞美的理性源于统治他人的强烈欲望,但是他对于了解和控制自然与人性的强烈欲望认识不清。^[77]这不是说库姆不能像孔多塞那样认识到自然在造成政治不平等的罪恶中通常充当从犯的角色;也不是说他本人没有企图为某些特殊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观点进行辩护。^[78]很显然他这么做了。更准确地说,库姆与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不知道他关于“自然”的概念是如何历史性地成为神人同形同性的状态的。库姆完全不知道,“自然是一个社会类别”,是在政治条件下构成的,具有历史特殊性;^[79]他完全不知道,颅相学对人性的揭示在他看来是中性的,其实也是社会性产物,并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他也完全不了解,他在那种人性——现实的调和物——基础上形成的道德法则仅仅是科学的欺骗,使得他的颅相学和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的哲学之间可以互相证明。由于库姆也不知道休谟和斯密的哲学是反对霍布斯等社会契约论者的,最后,就如同他并不了解他为之辩护的世界观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质,他也不清楚其疏漏会使世界观产生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变化。可以确切地讲,要是他在写作《人类体格》时有了这样的清醒认识,其最终成果将会是另一种面目,人们对这本书的接纳程度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

库姆确实已经意识到的是正统宗教派别的力量，由于库姆对这种力量进行了挑战，这也正是《人类体格》的读者通常自觉地予以回应的地方。涉及这个问题，这本书可以说是毁誉参半。然而该书还不完全是一部无神论著作。尽管库姆在私下里比较倾向于休谟式的不可知论，在公开场合他仍以自然神论者自居。^[80]这有利于他在销蚀“高尔的思想遗产”方面的兴趣，这种思想遗产就是颅相学与政治上危险的激进无神论之间的联系。库姆几乎和同时代的所有人一样（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认为无神论是一种令人震惊的、危险的、攻击道德直觉的思想。为了抑制这种思想，他暗示这是（颅相中）“崇拜”功能的退化或功能障碍。^[81]库姆公开承认自己信仰自然神论，这使他能够用佩利的人格化方式，把上帝作为终极权威，强制要求人们遵从这种移植而来的秩序。因此，他在19世纪30年代向爱丁堡的“劳动阶层”鼓吹，

128 造物主造人之同时，进行了劳动分工，方法简单有效。不同的人赋以相对不同程度的官能，因而让他们立刻产生了从事不同工作的欲望和能力。^[82]

在《人类体格》中，上帝从生物学角度证明了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合理，因为他从生物学角度证实了贫困存在于贫民的思想 and 道德中，通过贫民自己的努力可以减轻贫困的程度。从这方面来看，库姆的著作与托马斯·查默斯的布里奇沃特征文《外部自然对人的道德和心智构成的适应》在风格上非常接近，这篇论文是

在库姆的《人类体格》出版5年之后发表的。查默斯(把“思想和道德”换成了“心灵和习惯”)以旧约的风格进行布道,他期望读者能遵从他的训谕,因为这些训谕来自至高无上的上帝;而库姆则期望他的读者能够理智地去理解这么做的理由。^[83](正是这种较高的理性要求把库姆的《人类体格》和施普茨海姆的《人类自然法则概论》区别开来。)

然而,从上下文来看,库姆和查默斯之间的差异不仅仅是风格上的不同。尽管库姆努力与19世纪初的自然神学家保持步调一致,认定上帝与自然法则是一回事,但是他天真地认为,通过对上帝身份的认定,他就能和他们一起迈向更为合理的基督教世界,在那里“神的意志和人的责任”更加清晰,不那么复杂。^[84]库姆几乎完全不能理解的是:第一,正统的自然神学家们非但把上帝等同于自然法则,而且把这些法则用神学引向了上帝;第二,自然神学家谨慎小心地不去否认神意对自然的干预,也不怀疑圣经的实用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激进无神论者在社会中广为宣传科学,面对如此情况,(在布里奇沃特伯爵等人的支持下)19世纪初整个自然神学界试图证明宗教和科学并不是一对冤家,教会也可以利用科学来对吵吵嚷嚷的知识分子进行社会压制。^[85]库姆认为他所抨击的不过是囿于门户之见的教派荒谬而独断的权力——即他身为加尔文教派的过去,但他却在无意之中破坏了自然神学家精心维护却又有有意模糊的细微之处:他的上帝不仅不能创造奇迹,而且深深地跌入了培根式的原动力天堂之中,以致上帝和自然之间可以进行实质上的互换;^[86]圣经多多少少被降黜到神话故事的

地位；而他的自然法则并没有通过目的论的方法指向上帝，而是把人类放在进化体系之中，上帝的智慧和意志与这个体系毫无关联。毕竟，与人类体格相关的不是上帝，而只是“外在的物体”。因此，库姆通过自然神论的理性主义否定了来生，也否定了原罪是人类堕落的起因，他所做的并不仅仅是对宗教的宗派主义发起挑战。他也揭示出合法的社会自然资源是如何轻易地从上帝那儿剥夺和分离过来的。^[87]

因而，可以预见，《人类体格》一书造成了宗教界的“恐慌和愤怒”。^[88]在查默斯和大卫·威尔什牧师领导下的苏格兰福音派的反应尤其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包括查默斯和威尔什）以前曾从自然神学的角度对颅相学表现出非常浓厚的兴趣。^[89]在自然神论（托马斯·潘恩的信仰）仍然被看成对社会和政治具有威胁的时期，人们看待库姆就仿如 18 世纪 90 年代的维也纳社会看待高尔一样：他把原本健康安全、有着正常知识的人驱逐到不仅粗鄙和错误而且非常危险的方向上。这本书从整体上来看具有法国特征，即伏尔泰、百科全书学派及那些公认的异端沃尔尼和米拉波等革命哲学家主导下的法国特征，为此，爱丁堡颅相学学会的早期成员威廉·斯科特曾悲叹不已。^[90]正如一些较为温和的批评家所指出的，这本书“谈论自然法则实在太多，而谈论上帝的训诫实在太少”。^[91]但是大众对这本书的关注使得库姆对异端思想的科学提炼面临更加糟糕的状况，为了对抗库姆的影响，宗教主义者对这方面的关注不断加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人类体格》所引起的宗教争论，才爆发了所谓的 19 世纪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随着 19 世纪的慢慢过去，随着权

力从教会向市政厅的世俗化转移,这种冲突越来越不切合实际,最后导致这种冲突的人格化出现明显的自相矛盾。^[92]然而,在 130 真实当中,这些冲突与其人格化形式一样,不过是进一步实证性地树立了科学作为客观真理与人类的主观意志相分离的独立地位,而且它同时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再关注冲突两方其实是站在同一个社会经济立场上对同样的社会经济领域进行支配的事实。通过公开展示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人类体格》标志着对工业资本主义体制中的权力进行社会合法化的分水岭。正是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对钱伯斯的《痕迹》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同样的反应(但是程度较小),世俗化的社会文化权力才得到巩固,实证主义者的“科学宗教”才得到肯定。^[93]

尽管《人类体格》在关于颅相学的斗争中失败了,但是它站在理性主义这一边却获得了彻底的胜利。因此,人们很容易用科学反对宗教的术语来看待这本书中的争论,或者用理智、理性、科学自然主义和自由思想等术语来对抗迷信、超自然主义、教条主义以及宗教独裁的教派压制等术语。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该书的写作方法和人们对这本书的回应方法。1847年,库姆 131 给他的著作《人类体格》增添了一个新的章节,概括了他的立场:

目前,加尔文教派的领导者们竭尽所能要把大众的情感带回17世纪初的观念之中;如果他们失败了,那完全是因为科学阻止了其目标的实现。^[94]

我们在这儿重点讨论的是,对库姆的著作仅仅进行背景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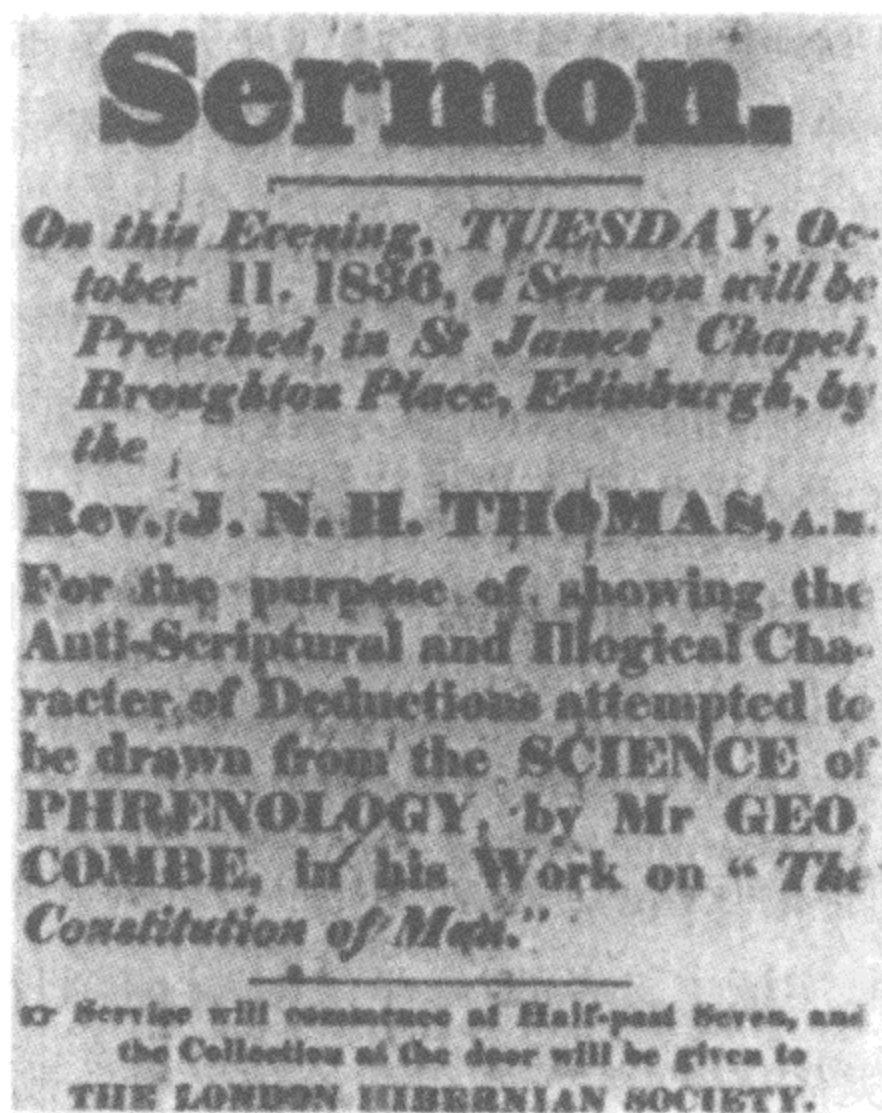


图5 J.N.H.托马斯牧师1836年10月11日在爱丁堡进行反颅相学布道的海报

析(也和这些著作赖以为基础的颅相学一样),就其本身而言,从历史观点上来说是不完善的。不仅总论点模糊不清,即科学和宗教能够产生同样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功能,^[95]而且它的一个特殊观点也晦涩难懂:《人类体格》是对库姆所背叛的加尔文教的复兴而不是加尔文教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使得社会标准和价值变得神圣化,而这些社会标准和价值最适合正在进行工业化变革的经济秩序。这本书颠覆了父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宣告了世俗的自然法则的新权威,新兴资产阶级个体可以直接或“合理地”与这种自然法则联系在一起。实际上,由于库姆

诉诸自然和宇宙的终极权威,使得被加尔文系统整理过的上帝的控制法则得以现代化,或者说看起来更为合理。在加尔文教义以及库姆的哲学思想中,人与人之间相互疏远,却与至高无上、表面上中立、绝对而又永恒的权威彼此和谐。同样,由于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个体对于赎罪的责任,使得阶级利益被伪装起来。对于贫困、疾病、无知、酗酒等大众性问题的广泛批评和指责,也从剥削性社会结构转移到被剥削者的良心和勤劳上来,认为这一切是他们像以前违抗上帝的意愿一样违抗了自然所造成的。库姆的思想体系和加尔文教义一样,都认为上帝选民之门实际上不是向所有人打开的,它只对那些出身高贵而富有的阶层开放,或者对那些天资“最优秀”的人开放(但是加尔文教义中上帝选民也是被救赎者的双重标准,由于救赎的世俗化或尘俗化而弱化了,因而从理论上对所有愿意让自己的大脑符合正常程序的人开放)。诸如钱伯斯兄弟、休·米勒以及撒缪尔·斯迈尔斯式的英雄人物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被救赎者的俗世王国的明证,而且也是世俗的拯救或幸福只能通过勤奋劳动来获取的明证。为了获得幸福——或者至少避免苦难,必须与新的世俗牧师所规定的社会、政治和外在的法律关系协调一致,找到自己适当的社会地位并加以充分利用。

由于《人类体格》以世俗加尔文主义的面目出现,我们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一旦库姆把已经得到生物学确证的颅相学作为理论武器,他就成为一位世俗加尔文主义者,在脑中再现许多结构与此相同的思想和价值。韦伯非常谨慎地指出,加尔文教徒为了确保自己在天堂中能有一席之地,必须终身对上帝进行有

条不紊、一心一意地歌颂。^[96] 颅相学致力于精神的自然科学研究,它是另一种形式的“条理化”过程——然而,它不是为了歌颂上帝,而是为了追求抽象的未来王国或者说理想中的合理秩序。库姆通过颅相学对这个王国进行了描绘和洞察,由此,他也和加尔文一样成为新生的福音派分子,从传统结构和关系的角度来考察,他宣扬的是一种革命伦理(即便这种伦理所歌颂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几个世纪中深深触及了资本主义的根源)。^[97] 库姆用他一贯的反传统主义者对世界进行改造的指导性语言写道:“现在迫切需要进行第二次宗教改革,而且这一切正在酝酿准备着。”^[98] 然而,在对生命周期进行合理化解释之时,库姆和加尔文一样,去除了所有在他看来不合理的仪式和令人困惑的地方,因为这些都象征着过去的奴役,是改革的障碍。加尔文和库姆相继迷恋于物质形式和感观的**表面形式**。加尔文去除了生活中的仪式之后,用一套正式而明确的规则对生活进行重新规范。在《人类体格》中,库姆重复了这一过程,而且像加尔文那样有效地诉诸终极权威,使得道德决定论合法化。最后,库姆动摇了孝心和偶像崇拜的根基,以此来加强在更“合理的”世界中为了自我奋斗而进行禁欲修行的动力。在这方面,库姆充当了加尔文的角色。取消谷物法一个月之后,科布登给库姆写信说:“约翰·加尔文和乔治·库姆之间唯一的区别是,他们的理论基础不一样,他们的行为动机不一样,起始的逻辑前提也很不一样,但是,用世俗的语言来讲,他们都认识到了完全相同的结局,而且我不能反对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99]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科布登那样来理解库姆,也没有必要

像库姆那样认识颅相学。正如这门科学的某些早年支持者所表明的,对颅相学的兴趣与各人的宗教社会阅历密切相关,如果这种阅历与库姆的阅历不同,将会导致各人对颅相学的用处和意义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因此,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是,当我们把目光转向颅相学的普通追随者时,他们当中谁能反对库姆和颅相学?



偷猎者变成猎场管理员： 无处不在的颅相学家

对普通人进行(科学教育)所带来的可能后果是,让他们的思想变得狭隘,让他们比以往更加轻视那些得不到的知识。同时,他们对政治的反应可能比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民还要愚钝,在这些农民心中可能还留有一些历史回忆以及相当不错的审美感觉。

乔治·奥威尔：“什么是科学？”《论坛》
(伦敦),1945年10月26日,载于《论文集》
(哈蒙兹沃思,1971年),第4卷,第29页。

科学的价值不仅在于使我们有所为,而且在于使我们有所不为。

《关于地质学、化学和颅相学演讲课程的
初步详细安排的委员会报告》
(爱丁堡,1832年),第3页。

到维多利亚时代早期，英国社会受到“理性主义者”影响的程度在阿尔弗雷德·W.本的著作《19世纪英国理性主义发展史》(1906)中仍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他只能猜测，如果不存在真实的需求，这些理性主义者的影响就不会这么大。^[1]

将近一个世纪以后，很难说当年阿尔弗雷德·本所坚持的立场更加坚定了。对于19世纪一系列诸如宗教福音主义、千禧年至福思想、唯美论以及各种各样类似的非理性主义学说，历史学界现在日益清醒地认识到其顽固性。正是由于这点，对于19世纪理性主义在英国社会得到广泛传播的说法实际上已经不那么肯定了。^[2]然而，奇怪的是，尽管上面所说的这些因素使得阿尔弗雷德·本所津津乐道的辉格派观点黯然失色，即19世纪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获得了“必然的胜利”，但是它们并没有使人对最基本的历史话题产生兴趣：理性主义者的认知模式最终居于主导地位，通过个人对自我行为的规范促进了社会的运转。尽管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认知和控制的典型模式获得主导地位的历史过程会因为它并非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而更加值得人们的研究，事实上，最基本的历史问题本身已经开始衰微。

显然，对于这类问题——从根本上说，即我们是如何像现在这样思考问题的——我们不能指望从仅仅分析一个历史现象中得出结论，即便这一现象是真正的启蒙理性主义的缩影，就像被称为“伪科学”的颅相学(带有库姆颅相学的形式)那样。然而，颅相学作为资本时代的黎明时期最重要的“大众科学”，能够重新激发阿尔弗雷德·本对理性主义在大众中普及的时机及理性主义的性质与发展进行更适度的探究，并予以阐明。这就是本

章我们要讨论的主题，颅相学普及的主要形式和历史轮廓是从文化角度评价其普及的基本前提。

普及

早在 1826 年，“头骨学狂热”据说就已经“像瘟疫一样……迷住了从下到上每一个社会等级”。据 1834 年估计，颅相学的“发展比其他任何类别的科学都要迅速……是知识界的蘑菇或红花菜豆*”；随后，到 1845 年时，据称它已经到了“万众注目”的地步，已经融入了寻常百姓的语言和思维之中。哈里雅特·马蒂诺回忆道，头骨学在发展最鼎盛的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势不可当”。^[3]

《人类体格》一书就处在这种狂热的中心地带，1841 年的《旁观者》杂志发表评论认为，库姆的这部著作直接或间接地使得颅相学渗进大众观念的每一条缝隙和每一个小孔中。^[4]但同样重要的是，颅相学实际上是随处可见的，这与它所刮起的精神风暴几乎无法分离。正如一位在 19 世纪 30 年代中期到伦敦参
136 观的人所指出的，行走在大街上，很难“不被沿途叫卖的颅相学头像和石膏模型数目之多而震惊”。对这位特殊的评论家而言，这一切

确实令人惊讶。其他大多数商品一般仅限于一两个系列，

* 红花菜豆，即知识界发展最快的类别。——译注

颅相学的用品却琳琅满目，种类繁多，成为人们争相购买的商品。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更令人信服的证据是这样一个事实：你根本不可能在大街上边走边看，也不能进入银行或交易所，你只能不断地应付那句非常熟悉的搭讪语，‘买颅相学的用品’，然后就挤进人群去察看颅相学的头像和解剖图解，丝毫不会有人注意你。这些都是最充分有力的事实，比说上一堆描述性话语更能说明问题。^[5]

同样具有说服力的是一些报告，比如 1832 年有一名爱尔兰乞丐在都柏林的一家法庭请求宽恕，因为一位绅士对他非常吝啬，结果他在那人代表仁慈官能的部位狠狠地打了一拳；再如，1828 年一些钉马掌的铁匠用颅相学的方法描绘他们的马。1831 年《幸福农夫》对卡梅斯老爷褒奖有加，原因是他有着“非常宽的前额”；1837 年一位在曼彻斯特图书馆演讲的人觉得有必要给他的论文取名为《一篇非颅相学的教育哲学论文》，这些进一步证明了这门科学对日常文化和意识的影响之深，也使得 19 世纪的自学者著作中自觉应用颅相学的频率之高不再令人震惊。^[6]

到了 19 世纪 40 年代，报纸因颅相学受到牵连，被指责为“把库姆哲学体系的毒害传播到全国每一个角落的媒介”。^[7]当然，到了这个时候，认为“颅相学的某些知识在所有阶层中的全面传播……是当今引人注目的时代特征”的说法由来已久，已经远不是颅相学家的自吹自擂。然而，正如发表这种言论的《大众颅相学杂志》的通讯员进一步指出的，熟悉这门科学的人主要是操作工人，而不是他们的雇主。^[8]实际上到那时，颅相学已经在

注重自我修养的识字者阶层中找到了自己受欢迎的位置，这个阶层尽管也包括了像查尔斯·布雷这种开明的绸缎制造商，主要还是由一些具有造反倾向、头脑清醒的工匠和工人所组成。1826年，邓迪市的亚当·比德和费利克斯·霍尔特等人聚集在
137 一起，成立了他们自己的“技工颅相学学会”，在十年时间内类似的研究团体遍布全国。^[9]到1836年，关于人们对颅相学的痴迷，各种描述都有。它们说明了

技工们在生产操作过程中谈论着颅相学，在下班后的休息时间里也津津乐道于颅相学的原理、能力以及它带来的希望和前景，在他的膝边围绕着嬉戏欢笑的孩子。耳闻目睹这一切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在工匠的协会中，颅相学成了人们最经常讨论的话题，与颅相学有关的书籍非常畅销，专门针对这些团体的演讲也趋之若鹜。^[10]

意识形态结构

虽然工匠对颅相学的探究是否真的这么令人乐观值得怀疑，但可以确定的是，人们对颅相学的兴趣是真切而狂热的。正如特别针对这个听众群体的颅相学书籍和演说中所提及的，工人群众对颅相学的“自发需求”常常也是平民和工匠文化之外的人不懈努力的结果。这些人追随库姆并抢在J.S.密尔之前，对平民文化的各种独立形态表示强烈的反对。尽管大多数中等阶级颅相学家很少公开表白，他们其实是赞同爱丁堡的颅相学鼓

吹家詹姆斯·辛普森的观点的，即，劳工实际上是“一个长过了头的孩子”，他并不知道

如何通过对因果进行理性反思来改善自己的人生命运，……[因为]他是感觉和冲动的傀儡，是感官欲望的温顺奴隶，是江湖骗子的现成欺骗对象，是极端狂热者的奴仆，最重要的是，他是政治鼓动家的温顺工具，他根本不能辨别这些政治鼓动家邪恶的观点和谎言。^[11]

最终，正是为了向这些工人们传授必需的理性的（反无政府主义和非平等主义的）思考，使他们适应和地位高贵的人进行友好交流，而不致成为“野蛮无知”的人（或者用库姆的话来说，使他们有资格被委以仲裁自己命运的权力），^[12]各种各样的中等阶级人士一直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仍坚信这门科学，其时，他们自己利用这门科学对抗旧秩序的文化主张早已实现。在某些情况¹³⁸下，他们简直是把他们的演讲台、颅相学装备以及他们的支配个性都从文学哲学研究会搬到了技工学院。^[13]

然而，试图对下面两者进行严格区分会导致错误：一方面，面对老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崩溃，利用这门知识去合理解释人们的野心；另一方面，利用这门知识向工人灌输资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实际上，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的社会进取心，都是为了实现社会和文化霸权而接纳新兴价值与利益这个单一运动中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在实践中这些进取心并不是孤立的，讨论这些倡导变化的颅相学家的行为，不能仅仅用没有阶级之分的“边缘

化”、社会“流动”和世系轮换等术语来引导——至少不能避免对历史进行严重的政治歪曲。然而，鉴于这些人向工人阶级伸出了援助之手，向他们传授了理性观念，其努力程度让我们觉得，对某些在今天回想起来可以作为颅相学动机加以提炼的历史和性质表示特别关注是完全可能的，也并非不合适，因为它们的目的是巩固新兴的社会权力关系。

演进和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颅相学家对于塑造想象中的“社会下层人民”的感官的非理性的零散的思维的非比寻常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彼得卢时期。库姆在那年出版的《颅相学论文》中写道：

如果我们能够对技工的道德情操进行培育，他的比较低的官能将会随着这些方面能量的逐渐增加而得到相应的控制。如果我们对他们的认知和反应官能进行培育，就为他们打开了获取更高天性的快乐源泉，并赋予他们越来越多的有用的力量和采用恰当方式达到目标的能力，这不仅有益于他个人，而且使他成为更为有用的社会成员。^[14]

撇开颅相学不谈，这类表述，因其反映了人们对于加强工人（或者精神病患者、罪犯以及儿童）社会化的兴趣，在1819年都被看作极端自由主义的言论，因为当时正值强权统治盛行。四年以后这种行为控制方式才通过中等阶级领导的技工学院运动得以

认真实行；又过了七年，“实用知识传播学会”才成立。这些事实提醒我们，库姆的思想虽然从来就不是原创的，却总是领先潮流。他在“实用知识传播学会”的第一个小册子出版前六个星期就向爱丁堡颅相学学会宣读了他关于《人类体格》的论文，这一事实进一步提醒我们，在中等阶级自由派狂喜地欢呼他们“对于人类社会的伟大试验”之前，库姆的思想已经形成。^[15]

然而，直到《人类体格》出版以后，尤其是 1832 年政治解决*之后，库姆的颅相学才开始被广泛当作一种教育方法。尽管许多颅相学家在 19 世纪 20 年代已经开始追求和布鲁厄姆勋爵及其同事们同样的目标，在此之前，许多倡导“实用知识”的重要人物对颅相学家的成果仍持怀疑态度。库姆等人的思想源于一种天真的观念：利用启蒙理性主义的力量来动摇传统社会态度和社会关系；由于布鲁厄姆等人致力于获得那些想重申父权制权威的地主和教士们的支持，因而库姆等人的成果主要被用来孤立权力机构，并利用它们来获得工人的支持。此外，布鲁厄姆等人为了利用科学作为道德仲裁者，正试图传播科学的神圣形象，而颅相学知识令人怀疑的地位却有损于科学在人们心目中的这种神圣形象。^[16]如果颅相学是“科学”，那么道义和真理本身就可能不是永久的，成为人类可以探讨的事物。因此，在改革法案通过以前的当权者看来，颅相学教育家更接近于那些需要“教育”的人，而非那些引领思想潮流的人。而那些引领思想潮流的人，正试图根除工人的“懒惰无为、无序混乱和争强好胜”

* 1832 年政治解决：即 1832 年议会改革。——译注

的特性,向他们灌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并让他们欣然接纳
140 (进而通过温和的改革维持其统治的社会秩序)。对他们来说,
异想天开的颅相学空想家似乎成了最糟糕的叛逆者。因此,当
库姆于 1825 年提出要在爱丁堡文学院(这是早期的技工学院之
一)讲授颅相学课程时,他的要求被“婉言拒绝”,因为这是一所
由爱丁堡的大学精英和法律精英把持的学院,老板是辉格派官
员伦纳德·霍纳。同样,当乔治·麦肯齐* 爵士在 1832 年试图
向“实用知识传播学会”的杂志《一便士小百科》提交一篇颅相学
文章时,他被告知,“由于他们[编辑们]对于颅相学及其与道德
和理性科学之间的联系抱有成见,所以不能接受他这个善意的
举动”。^[17]在布鲁厄姆担任“实用知识传播学会”的领导人,他的
朋友杰弗里和罗热把持学会的地方机构的情况下,这样的反应
是完全可以预料的。

然而,当《一便士小百科》在 1838 年出版到 G 卷时,情况发
生了彻底变化。那时人们预测该杂志将会出现一个关于高尔的
条目,高尔的一生作为一个资产阶级自立自助的神话传奇也是
合适的:在面临巨大困难的情况下,他有着“不可征服的坚韧意
志和勤奋精神”等等。^[18]我们还可以列举出许多理由来解释颅
相学命运发生转变的原因。然而,这些都不是彼此排斥的,都
与社会权力关系中的经济变化联系在一起,这种社会权力关系在
30 年代形成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社会秩序。从历史观点来说,
任何试图割裂颅相学普及过程中各种关系的做法都是武断的。

人们宣传《人类体格》的积极性对于广泛理解库姆颅相学具
有非常明显的重要意义:库姆的颅相学不仅成为从事工人教育

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成为有益于工人消费的商品。因此,这种积极性本身不仅是这种理解的原因,也是这种理解的反映。1830年,时任爱丁堡技工协会中央委员会秘书的印刷工威廉·弗雷泽为了吸引技工的注意力,让他们关注库姆的书以及《颅相学杂志》,他签发了一个通知,声称“这些著作就是为他们理解自己的天性和职责提供现实有用的观念而创作的”。^[19]威廉的态度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颅相学的理解。无独有偶,威廉·拉姆齐·亨德森*在1832年去世时,留下5000英镑遗产用于颅相学宣传。这笔遗产中的一部分直接用于出版《人类体格》的“简装本, 141 以便贫困阶层和技工学院中更多有才智的人能够买得起”。^[20]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亨德森遗产中的一部分分给了库姆的两个朋友——威廉和罗伯特·钱伯斯的出版社,而这两个人在大规模生产和传播“实用知识”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本身就证明了库姆著作中所宣扬的自助哲学。钱伯斯用铅版印刷的《人类体格》“大众版”(价值1先令6便士)在1835年10月和1840年10月之间卖出了64000本,占了我们前面章节提到的销售量的绝大部分。同时,亨德森的遗产也用来补助因降低《人类体格》标准版价格而产生的费用,这个版本在1835年到1837年间,共售出了约11000本。^[21]

如果没有这种对《人类体格》的资助,库姆的颅相学学会有怎样的发展还很难说。值得注意的是,1828年,该书发行了第一版,1835年该书获得亨德森的补助,但在此期间,该书的销售量还不到1500本。鉴于1835年是宪章运动开始的年份,认为颅相学著作的销售量和影响力增加仅仅是因为书籍降价,是短

视的。明摆着的是，颅相学的宣传和资产阶级的欣赏就像这本书的写作一样，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事件；此外一些必然的辩证条件也有助于解释这样的现象：中等阶级人士在 1828 年时（就算他们知道颅相学）可能对库姆的颅相学毫无兴趣，而且由于不同的原因，在 1848 年时他们也可能发现颅相学不合时宜，但是在改革法案和布里斯托尔骚动之后，人们却发现他们在自己的出版物上用热情的笔触来介绍库姆的著作，并且在工人阶级居住区兜售该书的廉价版本。^[22]

最为重要的事实是，到那时为止，人们发现颅相学已经成为自我修养过程中受人欢迎的精神食粮。人们认为教育上的成就将因其疏漏而受到损害，大众指南和娱乐杂志开始担忧带有反颅相学的情绪将会损害其赞助人的利益。^[23] 颅相学受到大众欢迎很显然造就了它在大众中的成功普及。但与此同时，由于人们普遍意识到“实用知识传播学会”的工作特别失败，颅相学和颅相学家实际上是不战而胜。1832 年爱丁堡两百多名“技工、小店主和职员”要求库姆对他们进行颅相学的指导（结果，库姆在三个月中每周两次去给他们作夜校讲座），这仅仅是人们热衷于颅相学的许多例证中的一个，而这又与实用知识传播学会的传播活动所遭到的冷遇和敌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24] 面对这些相关的命运，毫不奇怪库姆的颅相学开始获得人们的关注与敬重，这些人的数量日益增加，不仅包括了寻求新秩序的政府职员，还包括了与传统精英人物结合较为紧密的人物。例如，1836 年，辉格派法官亨利·考克本在日记中写道：

人们[对于颅相学以及“类似信仰”的]这种兴奋和激动是大有裨益的,尽管这里面有着许多无知和幻想,但是至少在有关人的身体或体力方面,这些讲座和著作中仍有相当一部分合理而又有价值的东西。甚至[颅相学家等人的]道德观念以及他们所提倡的教育体系(不管从哲学上看是多么的不完善甚至显得荒谬可笑),也极力要唤醒民众的注意力,把他们的思想引导到知性事物上,并使他们信服自我修养的价值。^[25]

最后,连《爱丁堡评论》(布鲁厄姆是它的合伙人之一)也情不自禁地承认,库姆正在从事的传播“真理”的工作是“对人类有益的贡献”,这些真理“即便不是全新的,也是许多人还不了解的,是所有人几乎没有注意到的”。到1823年时,库姆已经开始用颅相学来反对欧文的合作运动,可能正是出于对这门科学的布鲁厄姆式教育效益的认识,才使得弗朗西斯·杰弗里(他对民众的恐惧超乎寻常)在1826年很快承认,起码“[库姆]的颅相学第一次呈现出并非绝对荒唐的一面”。19世纪40年代,库姆成为《爱丁堡评论》的撰稿人,这一事实不仅标志着正统派关于颅相学的观念发生改变以及正统本身发生转变的原因,也标志着这种转变的过程。^[26]

一些中等阶级颅相学家毫不隐晦这样的事实:他们的根本利益和实用知识传播学会的目的几乎一样,这个学会就是希望人们正确理解颅相学的教育价值。例如,1841年理查德·比米什*为切尔滕纳姆文学和哲学学会开颅相学讲座,他讲到了兰

开郡棉纺主的故事,这些棉纺主通过给工人创办学校,向工人证明攻击工业结构是完全愚蠢的事情,因为这个工业结构“给予了他们充足的生存机会”。^[27]这样的奇闻逸事否认了工人阶级不满的所有合法性,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发展,在颅相学讲座中不绝于耳。同样,这种频繁性也成为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反工会宣传的公开的自然抗辩。例如,乔纳森·巴伯*于1841年在布里斯托尔所作的演讲中(就在罗伯特·欧文和反颅相学者、反社会主义者约翰·布林德利之间发生激烈争论之后不久)强调,人类被赋予爱乡情结的官能(或者说人类定居在一个地方的倾向),上帝作出这种设计是为了促进资本的积累,进而促进工业、文明和行之有效的殖民化进程。^[28]几年以后,詹姆斯·辛普森*在爱丁堡专门作了一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讲座,目的是让工人阶级听众彻底明白,“当某个工人(无论是以个人的形式还是以集体的形式)阻止其他人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去工作或不工作的时候,上帝的法则和人类的法则立刻就受到了侵害”。“工人们要牢牢记住一个事实,”他补充道:“历史上所有有案可稽的大罢工在制造了巨大的痛苦之后都以失败而告终。它们的失败就是因为违背了自然法则。”^[29]欧文的社会主义思想经常成为刺激这种公开声明的背后因素。尽管许多颅相学家都是欧文主义者(参见第八章),但库姆的大多数追随者可能会同意1837年《分析家》杂志一位作者的观点:“像《人类体格》或者高尔的不朽之作《大脑的功能》将会比一打新拉纳克(New Lanark)更有益于人类;因为前者会使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走上获得后一种利益的道路,不需要任何个人的力量。”^[30]确实,正如放弃颅相学

的颅相学家亚瑟·屈维廉在 19 世纪 40 年代早期向他的颅相学朋友所指出的，他们中的许多人过于急切地利用这门科学“来支撑一种已经导致最大不幸和不公正的教义”。屈维廉这里所指的主要是把颅相学应用到基督教教义中（相关内容参见下文），¹⁴⁴但是作为欧文和谐大厅的赞助人，也可以认为他的评价从本质上看包含把颅相学更广泛地应用到工业资本主义的需求。^[31]1836 年威廉·亨特* 确定无疑地告诉库姆：“人们发现，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中的颅相学原理极其有用，最近听我讲座的绅士们愿意证明这点。”^[32]

然而，这些后来的评价并没有解释中等阶级越来越欣赏颅相学的原因。这些评论最大的功用就是向那些已经欣赏颅相学的人证实颅相学家的社会正统性，因此，也带着很大的偶然性。它们根本没有展示颅相学的一般特征，这种特征（就像《人类体格》中所体现的）并不是对工业资本主义的直接辩护，而是使工业资本主义体系得以繁荣的自助或自我服务思想的现实手段。从根本上说，颅相学家并不是用安德鲁·尤尔式的语言来认识自己的作用的，尤尔曾呼吁“征服工人桀骜不驯的性情，他们习惯于无规则的突发性的勤奋工作”；相反，颅相学家从向人民灌输“合理”利己主义的人道主义角度来认识自己的作用，因为这种“合理”利己主义是人们在资本主义的竞争社会中追求成功所必需的。^[33] 颅相学家欣赏自由主义观点，认为个人有权实现他或她自己命运的要求，而不必屈从于其他人的精神力量或物质力量。可以看出，颅相学家正在设置最有效、最持久的保护屏障来对付资产阶级工业资本主义的异己者：使工业资本主义秩序

的发展最适合的(最“自然的”)态度、反应和职责得以内在化。由于他们常常不清楚事实,他们就去追求这样的哲学:(不同于那种仅仅停留在“形式上”或工厂式的从属关系)通往“真正”的从属关系之路就是重塑人民的“现实想象力”,使得被统治者对统治感到神秘。^[34]因此,正如库姆所说,实现“社会上习俗和嗜好的重大变化”,甚至让“文明国家也遵守系统的自然法则”,根本不需要任何压力。^[35]这里所需要的东西,正如威廉·埃利斯在《社会经济学概论》的“致老师的题词”中异常直白地表达的:是教育人民(这里指的是学生)

145

自己去观察,不幸、痛苦和困难几乎总可以追溯到对这些[自然]法则的忽视……不要让任何事物引诱你容忍它们对自己职责的“天性”熟视无睹。造物主的法则就是要让“他们在生活中充满了挫折和困难”。^[36]

确切地讲,了解那些被“按照模子塑造”的人的思想当然是探究颅相学的一个好理由,^[37]但是就大多数颅相学家而言,这是他们为什么首先被当成“无处不在的教导者”的原因。但是对于其他多数教育家(尤其是像埃利斯这种在“实用知识传播学会”中体验过失败的功利主义者)而言,真正起激励作用的并不是颅相学本身,甚至也不是库姆对自然法则的利用,即用它来阐释和灌输大脑中自律的具体形式。自然法则不仅使得颅相学的资产阶级行为基础变得神秘莫测,而且证明了颅相学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得以广泛传播是合理的。

同样，如果认为某种特殊逻辑或精心策划的过程使得那些意欲成为工人阶级指导者的人诉诸颅相学，也可能是错误的。不管资产阶级教育家显得多么后见之明，他们并没有正确地评价“实用知识传播学会”的缺点，因而在评价大众对于颅相学的热情时，他们的看法是，库姆的颅相学是实现“社会控制”的便利方法。策略方法总是以零碎的形式出现，很难知道其总体形式是怎样的。^[38] 尽管对于许多教育家来说，《人类体格》是一本颇具启发性的著作（尤其是在运用颅相学方面具有现实的思想价值），但是也只有资产阶级自由派权力形成过程中以及人们对颅相学兴趣日浓的背景下，它才如此。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847年，埃利斯提到库姆时说（特别针对他所发觉的“人类在经过教育和训练之后，使自己与自然法则协调起来”），“我崇拜和敬畏他”。^[39] 早些时候，包括大多数颅相学家在内的绝大部分教育家，基本上是在新工业秩序的晦暗灯光下摸索前进；尽管他们受到意识形态上的促动，但还不是意识形态上的战略家。颅相学在技工学院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以例证的形式详细说明了这点。

技工学院

总的来说，随着中等阶级从技工手中夺取了技工学院的控制权，在技工学院专门为技术工人（即，有技术的工人或者工匠）所安排的课程中，颅相学所占的比例在不断增加：19世纪20年代后期，颅相学成为技工学院经常讨论的课题，到30年代中期

差不多已经成为学院的必修课程。^[40] 1825年,布鲁厄姆和乔治·伯克贝克从伦敦技工学院的创办者以及管理人——经济激进主义者托马斯·霍奇斯金和约瑟夫·罗伯逊手中夺取了该学院的控制权。两年之后的1827年,罗斯海兹和伯蒙德西技工学院的一位技工(在霍奇斯金和罗伯逊广为流传的《技工杂志》中)抱怨说:“上个月大会在连续四个时间段中的讲座题目竟都是关于造船学、颅相学!植物学!!以及鸟类学!!!”他随后补充道,“伦敦以及附近所有的技工学院”都是这种情况。^[41] 尽管中等阶级从一开始就基本上控制了地方各省的学院,情况也与此类似。

但是颅相学在20年代没有被纳入课程体系,只是或者必定是因为,中等阶级管理者的兴趣在于,用全新的、借用过来的浅薄知识来取代工匠传统的思想和权利。当时正苦苦支撑的机会主义正统派杂志《伦敦技工纪事》在1825年和1826年所发表的颅相学文章也表明,^[42] 对技工学院课程的大规模介绍至少部分地反映了当时已开展的救援学院行动的性质。

尽管布鲁厄姆已经预料到,如果在技工学院的管理中把缰绳拴得太紧,将弄巧成拙(因为到技工学院上学完全是自愿行为),^[43] 但是大多数中等阶级管理者最初所做的仅仅是急切地向技工灌输有用的知识。他们很晚才发现这些学生既不温驯也不愚蠢,相反,他们非常擅长写文章,例如,《揭露谬论:我们知识的提供者正努力割破我们没有智力天分的织工们的喉舌》。^[44] 许多技工由于对“实用知识传播学会”所提供的插科打诨般的知识并不满意,就此永远放弃了学院学习。罗斯海兹的技工学院最为典型。1825年,这所学校在激进的造船工匠和工人组织者

约翰·盖斯特的帮助下创办起来；到 1826 年，学院的学员从 300 人跌至 100 人，被迫增加学员每个季节的捐助费，甚至到了令人不敢问津的 16 先令，这又进一步导致学员数的减少。^[45] 147

因此，到 19 世纪 20 年代后半期，学院管理者最关心的问题不是运用什么样的技巧来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而是如何吸引或留住学员，并在不严重危害意识形态训令的情况下维持学院的运转。正是这种根本性的生存难题，日后给修正派争论最合适教育方法和学习科目留下了口舌——这种争论，通过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阶级对抗及其处理办法等表象问题，无意之中起到了完全消弭对抗的作用。因此，罗斯海兹和伯蒙德西的技工所关心的问题与人们经常听到的情绪截然相反。人们经常听到的是，“在工厂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就不应该再让工人学习什么有关机器之类的东西了”，^[46] 这种情绪通常也是技工自己的感受。但是，正如库姆用颅相学对此所作的分析，其麻烦在于，对工人阶级总体而言，“学校教育或者工作中的实际教育”并没有培养他们的智力官能，因此当他们面对“那些只和智力官能相关的纯科学”时，很快就失去了所有兴趣^[47]（诚然，在 19 世纪 30 年代末和 40 年代，中等阶级对于科学的兴趣也降低了^[48]）。人们把工人的思想与迄今为止的教育设施联系起来考虑，由此得出结论：作为工人教育的场所，学院的成功所需要的正是中等阶级教育家认为适于提供给工人的东西：从理想的角度来说，这种教育指导应该是既能提升修养又不枯燥乏味，既引人入胜又现实、合理和知性，既饶有趣味又能提升道德水平，而且最重要的是，既不像有意去满足社会稳定的需求，又把个人的注意力引导

到自身及其自我改造的益处上。^[49]可想而知,大概因为颅相学的普及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这种理想,库姆的颅相学最接近于这个目标的实现。

148 向技工学院全面介绍颅相学的唯一障碍就是,颅相学与宗教正统派之间关系暧昧。然而,这个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因为“有理性阶级”倾向于把这门知识看成与自己观点相关的象征性社会政治表述。正是因为这种关联(以及颅相学家在成人教育中的地位)^[50],基督教性质的颅相学观点与圣经及宗教信仰在技工学院里和谐共处,这才迅速消融了各种反对意见。实际上,颅相学与资产阶级需求的无情逻辑相符合,已经成为对抗背信的有用之物。例如,1836年,约翰·法伊夫博士为纽卡斯尔文学哲学学会一批有头有脸的人士作了两场讲座,受到了称赞,主要是因为他向他们介绍颅相学是“一门能够教授道德哲学体系的科学,对于实现教育的现实目的最为有用,也最令人满意,因为颅相学从哲学上为抵御唯物主义教条提出了抗辩”。^[51]作为纽卡斯尔技工学院的院长,法伊夫曾经在过去4年里领导人们猛烈攻击托利党反对派的改革法案。3年以后,他因为镇压了纽卡斯尔的宪章运动而被封为爵士。他和其他颅相学家的观点是,颅相学是纠正工人阶级无宗教信仰的解毒剂,那些受人欢迎的颅相学“教授”的登台亮相充分反映了这种观点的受欢迎程度,比如说,像亨利·布希亚*之流,迫不及待地(为了金钱)去揭示颅相学与圣经之间的和谐,驳斥共和派无神论者和世俗社会主义者的观点。

经过宗教正统派社会语言的武装,教育家们可以安全地把

布鲁斯特和布鲁厄姆之流对颅相学的反对意见抛在一旁。但是，这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例如，在希钦技工学院，他们竭尽全力，动用了所有教育措施和手段来招募和留住学员。1840年，在面临倒闭的情况下，学院管理层决定租用市政厅，并聘请专业人士来讲授演讲艺术和颅相学。此举获得巨大成功，学院竟因此苟延残喘了四年，直到互教互学的实践开始实行为止（当时在又一次聘请了一位颅相学家作讲座的情况下，学院管理者发现学员数持续增加）。设菲尔德技工学院在19世纪30年代也同样面临困境。眼见颅相学在城中其他面向无产阶级的商业性更浓的学院中大受欢迎，该学院也开始向学员介绍颅相学，目的是也想插手老百姓的“道德和智力官能”的发展。直到19世纪50年代，颅相学仍然是设菲尔德技工学院最成功的教学科目。实际上，这门科学在整个约克郡技工学院联盟取得了巨大成功，单是1842年，在六个比较大的学院中就相继举办了32场颅相学讲座。^[52] 149

毋庸置疑，财务清偿能力是部分技工学院生存斗争中的重要内容，同样也是它们必须求助于颅相学的重要原因。1831年，“实用知识传播学会”的《教育杂志》评论说：“造成五分之四的[技工学院]倒闭的原因是它们陷入债务之中。这些学校在闪亮登场之后，很快陷入财政窘境，每个人的热情都冷淡下来。”^[53]一些学校由于得不到中等阶级的赞助，财政困难更加严重，正是这些学院，从赤裸裸的商业角度来看待颅相学。1835年，身为欧文主义者控制下的伯明翰技工学院的副院长，霍克斯·史密斯*说：“一所经营很好的技工学院往往是一所颅相学

学校。”尽管他说这话并不是指学院的生存需要从财政上利用颇相学，但是他的话很容易让人这么理解。仅仅过了几年，史密斯自己的例子就可能让人这么来理解了。由于学院资金匮乏，他聘请了反颇相学家布林德利*来接替库姆的讲座课程。^[54]苏格兰工人早在1827年就认识到颇相学具备这种财政潜力，当时一个救济特困工人的委员会利用威廉·汉密尔顿*和库姆之间的争论进行资本运作。他们以2先令6便士的价格出售汉密尔顿反颇相学讲座的门票。一周以后，委员会租用市政厅礼堂，并印发传单，宣传库姆“关于颇相学的通俗演讲”，门票价格和前面一样。^[55]整整过了20年以后，颇相学的受欢迎程度以及它所具有的财政诱惑力仍很明显，比如，当非宗教性的芬斯伯里技工学院因为资金筹措困难面临“被转手给一个宗教团体”的命运时，为了解决困境，该校的管理者策划了一场彼得·琼斯*和反颇相学的基督教辩护士W.贝克*之间的争论。^[56]

19世纪30年代末，技工学院开始举办公开展览，其动机同
150 样是财政刺激，许多这样的展览是以颇相学为主的。1842年有5000多名参观者到邓弗里斯技工学院参观由邓弗里斯颇相学学会举办的颇相学展览；1844年圣诞节，曼彻斯特当地的颇相学家威廉·巴利*在曼彻斯特技工学院举办的颇相学特别展览吸引了10万多名参观者。^[57]

1843年，随着颇相学催眠术的出现，许多学院才真正获得生命之吻。设菲尔德技工学院恰好就是第一所获益的学校。1842年11月，颇相催眠术这门混合科学的主要推广者斯宾塞·蒂莫西·霍尔*在设菲尔德技工学院演示其原理。此后，

颅相催眠术被当成“新科学”、“新的生活哲学”而受到欢呼，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迅速普及到英国的每一个角落。由于颅相催眠术迫切希望在自助文化中得到认可，发展过猛，以致迅速衰竭（它的第二波高潮直到 19 世纪末才到来）。尽管如此，它仍然向许多人表明自己就是颅相学的终极证明。除了托马斯·瓦克利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等有着强烈怀疑主义倾向的人之外，触摸被催眠者的颅相器官并让他或她做一些与智力官能相关的行为动作，似乎雄辩地证实了颅相学的正确性。正如埃利奥特森指出的（稍微有点夸张），以前皈依颅相学真理的是一个人，而现在通过催眠术，皈依颅相学的是一百人。技工学院的管理者也可能以同样的口吻说，即便颅相催眠术改变了其办学宗旨，却极大地增加了学院的美好前景。^[58]

从 19 世纪 20 年代末开始，学院的管理者意识到，从学院生存及其意识形态功能这两个角度来看，颅相学具有现实意义。然而，要强调的是，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满足学院赞助人的好奇心，学院管理者除了追随颅相学的流行大潮之外别无选择。正如《旁观者》杂志所描述的，

一个人的性格是否可以从他的头部形状中看出来，这是一个相当新颖的问题，那些熟石膏模型[是如此]……有趣的玩具，以至于所有的技工学院，无论它们被道德和政治包裹得多么严实，都不能反对其学员去听一两次关于这些奇思怪想的讲座以此作为一种消遣。^[59]

151 一方面是把颅相学与“消遣娱乐”牵扯在一起,另一方面是把颅相学与“道德和政治”联系在一起,这种事实告诉我们,管理者无需受到什么压力。他们显然知道,这门科学既不用打破闲散慵懒的禁忌,也不用打破公开谈论政治和宗教的禁忌,就不仅能满足消遣的需要,也能满足人们讨论具有社会和宗教意义的当代话题的需求。这是一种完美的象征性姿态,换句话讲,颅相学满足了这些需求,既没有推动科学与激进的政治、宗教之间任何实质性的重新联合,也没有支持任何可能被批评为自我放纵的事物。因此,管理者不打算接纳布鲁厄姆的建议,允许其学院讨论某些政治话题;但是他们却认为自己已经从颅相学那儿找到了最理想的替代品。1837年,当西布罗姆维奇知识促进学院创办时,它所购买的第一批物品中就有库姆的《颅相学体系》,^[60]这反映了当时已经成为常规的教育观念:不要去抵制大众的要求,而应该理解并利用大众的要求。

讲座

没有哪一项事业所产生的需求可以与颅相学讲座数目的成就相提并论。1860年以前,有两百多场颅相学讲座可称得上有积极作用(其中大多数是在1825—1845年间举办的)。历史上任何时期似乎都没有哪一门学科的讲座数目能够超越这些数字;^[61]确实,这些数字表明,如果把颅相学与宗教福音主义进行比较可能更合适些。这种比较也不仅仅是从数字上来看的:尽管科学和医学年鉴中记满了各式各样抱负远大的人,但是在那

些年鉴中(与福音派宗教的年鉴相比而言),我们看不到如此多的穷苦人、激进者、诧异者、空想者以及投机者。前面已经指出,虔诚的库姆信徒声称,他们可以愉快地完成目标而不需要上述这些人。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成为一名颅相学传道者既不需要进行很深的研究,也不需要授任圣职,或宣誓。只要脸皮稍微厚一点,几乎任何人都可以从事这个行业。他们确实这么做了,至少尽力这么做了。^[62]他们中有各色人等:鞋匠、小店主、教师、牙医、银行职员、麻布裁剪工、被哈佛开除的人、诈骗犯、天主教徒、卫理公会教徒、斯威登伯格信徒、自由思想家、宪章主义者、欧文主义者、女权主义者、跛足男人以及高深莫测的人、头脑简单的人和“极端自负的人”。

这些人中大多数是志愿者,出身于正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的中等阶级下层,是这个阶层的思想先驱,同样他们也担当了技工协会和文学协会的领导者或主要倡议者。如果他们与前面已经提到的狂热的库姆信徒有什么不同的话,其差别仅仅在于,他们中许多人更加狂热地相信(就像布雷*很恰当地描述他自己的作用),必须用“口头语言”对那些还不习惯阅读的人进行“信仰皈依”。^[63]他们与库姆相似,而与布雷不同,他们并没有从事或了解工业生产的实际经历,而这种工业生产正是他们所支持的社会秩序的根基;(除了库姆)他们当中最狂热、闻名全国的人中有一位法官(辛普森*)、一位精神病院行政官(W. B. F. 布朗*)、一位教育家(W. B. 霍奇森*),以及一位内科医生(约翰·艾普斯*)——他们是真正起作用的人,用葛兰西的话来讲,他们与生产世界的关系,“受到了整个社会结构以及复杂的上层建

筑的‘居中调和’”。^[64] 还有一些地方知名人物，如：威廉·洛厄*，药品批发商（后来破产），也是伍尔弗汉普顿的市镇议员；威廉·卡吉尔*，在东印度公司工作的纽卡斯尔商人；T. S. 普赖德奥克斯*，有独立收入的南安普顿人；约瑟夫·拉康*，不仅是一名初级律师和作家，也是利物浦星相学家学会的主席；还有马默杜克·B. 桑普森*，曾任英格兰银行财政委员会书记，后来（在欺骗行为被曝光之前）担任《泰晤士报》的财经编辑。这些地方名流和全国知名人物共同构成了一个文化黑手党。他们在家长式冷酷作风的驱使之下（这种冷酷通常与生活中的不安全、不稳定相联系，他们中许多人的出身背景和库姆一样，父亲都曾经是商人或者技术工匠），通过颅相学宣传对自私自利的个人进行“有序管理”的思想。

和所有决心扩大其支配权的人一样，慷慨大方是这些颅相学运动的教父从不曾或缺的品质。不过到了19世纪30年代中期，人们就不太容易听到他们来宣讲颅相学了，代之以巡回的“演讲者”。这些巡回演讲者当然是福音传道者，但他们和理论家的区别在于，他们把布道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大多数人似乎在努力维持中等阶级下层的外表）。除了那些利用这门科学在政治上有所图的人，多数人并不关心或者意识不到这门科学的政治和文化意义。尽管其演讲也有意识形态因素，但是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生存，这与他们在技工学院作讲座如出一辙。为此，少部分人几乎并不在意别人把他们看成通俗表演者，而非科学宣讲者。尤其是那些颅相催眠术讲座或示范颅相催眠术效果的讲座更适合娱乐消遣的目的。颅相催眠术除了偶尔现身于私

人宴会或会议等场合外，也无数次延伸到医学活动中，比如无痛拔牙或治疗瘫痪、失明、铅中毒绞痛、子宫疾病和腰痛。到 19 世纪 50 年代，宣传海报经常用“精彩、有趣而令人惊异”等字眼来宣传颅相催眠术，而且通常都同台穿插其他引人入胜的即兴表演：例如，1850 年欧文博士在摄政街的图片展览大厅作讲座，同台演出的还有“雷诺德森先生率领的著名残疾人体操表演”。^[65] 有几位巡回演讲者（如 H. W. 杜赫斯特*、威廉·理查森*，以及 W. H. 克鲁克*）不太用这种表演的方式来演讲，他们把颅相学包括在科学和辩术讲座中。其他人则从颅相学拓展到生理学和催眠术，或者成为戒酒禁欲的倡导者（如 J. L. 列维森*）或取消谷物法的鼓吹者（如西德尼·史密斯*）。^[66] 继施普茨海姆之后，英国第一个巡回演讲者马休·艾伦* 是一个语速很快、稍微有点古怪的人，他挥金如土，追逐女色。1816 年他开始传播这门科学纯粹是为了金钱。他从这门科学的新颖奇异中捞到了第一桶金，后来（根据卡莱尔的说法）他开始介绍自己的宇宙空想论和科学奇迹。到 1825 年时，他不再从事颅相学演讲，而是在埃平森林投资兴建了一家私人精神病院（据说这家精神病院就是根据颅相学原理来指导其工作人员的，后来这家精神病院被评为同类医院中的模范）。^[67]

艾伦并不是唯一试图通过颅相学暴富的人，也不是唯一导致颅相学被嘲讽的演讲者，这些嘲笑者讽刺颅相学是“多数人的愚蠢成就了少数人利益”的科学。^[68] 然而，多数人还是真正坚信这门科学的具体内容的，他们为了微薄的生计在这个竞争已经日益激烈的领域中辛勤劳作，因为在 19 世纪 40 年代人们对其

他科学讲座的需求和支持已经衰微。斯威登伯格信徒 J. J. 加思·威尔金森是一位顺势疗法医师,19 世纪 40 年代末他开始在技工学院讲授“人性自然哲学”,他认为自己特别幸运,因为他有爱默生在前面引导,而且还向经理推荐了他。即便如此,这项工作的激烈竞争仍使威尔金森认为,“除了在异教国家宣传现行的基督教思想和教义这项工作之外”,没有哪项工作比普及科学并让整个世界理解它更加困难。^[69]毫不奇怪,许多巡回演讲的颅相学家(可能比我们知道的还多)并不成功;许多人只是在短期内获得成功,很快就被那些宣传草药医术、顺势疗法、戒酒等等的人所取代;^[70]而更多的人则状况不佳。即便辅之以颇为刺激的表演和娴熟的演技(例如,人们在皇家阿德莱德画廊听完 W. J. 弗农* 讲座之后,还有机会观看斯坦德豪森透镜以及比尔菲尔德光学望远镜,又如由艾特肯夫人负责演讲的艾特肯夫妇联袂表演),这些演讲者中几乎没有人能够达到库姆的三位数的收入水平。^[71]1827 年 2 月, W. H. 克鲁克* 在伦敦的河滨马路作关于“王权和航海”讲座时,三讲讲座的收费是每人半几尼;但是到 40 年代,听一次颅相学讲座的收费是一便士,诸如 C. 多诺万*、D. G. 戈耶德* 以及 A. 福克纳* 等巡回演讲者每次从技工学院经理那儿获得的演讲报酬不超过一几尼。^[72]到这个时期,通俗颅相学教授的主要收入来源并非来自演讲,而是来自与演讲有关的其他收入,比如兜售颅相学图表、手册和宣传册,以及向顾客兜售颅相学头像示意图(每张头像示意图的价格大约是 2 先令 6 便士乃至更多)。^[73]出于这些目的,尤其是为了兜售头像示意图,至少有 6 位巡回演讲者采取了 18 世纪江湖郎中的传

统：开办商店，并在窗前展示其物品以吸引顾客。^[74]当然，对于30年代以后的颅相学家来说，要想成名，仅仅表现出20年代“坚定不移的颅相学家”已经被人认可的普遍而必需的特征——贪得无厌的辩论欲望，是远远不够的；^[75]现在他们还必须是娴熟的绘图者。

至于演讲内容，库姆和这些不知疲倦、到处巡回演讲的颅相学家几乎没什么区别，比如E. T. 希克斯*、戈耶德*、多诺万*、E. T. 克雷格*、J. L. 列维森*、F. 布里奇斯*以及J. W. 杰克逊*等人，都被指责为完全在照本宣科库姆和施普茨海姆的观点，因为他们所借鉴的主要就是这两人的著作。^[76]直到19世纪中期，美国颅相学家奥尔森和洛伦佐·奈尔斯·福勒的简装本著作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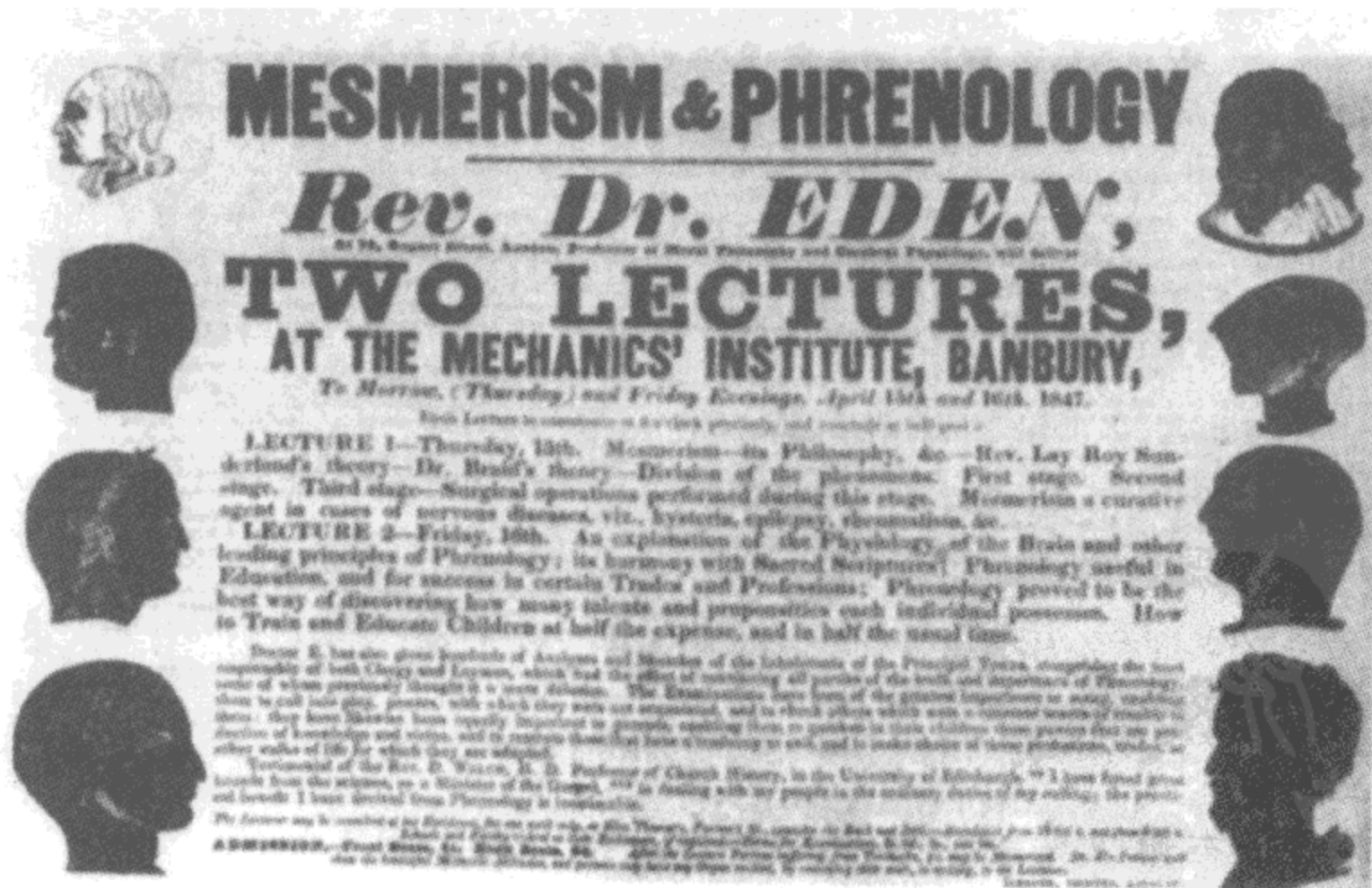


图6 牧师伊顿博士在班伯里的技工学院作催眠术和颅相学系列讲座的海报，1847年4月

是在福勒的演讲之后，这门科学才在非知识分子群体中得到健康发展——受到培育浇灌，硕果累累、遍地开花——这种近乎原教旨主义的语调，描述了这门科学此后的大众普及性。

前面提到的大多数演讲者都习惯于在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机构中演讲。显然，还有其他的演讲场所，既有层次高的，也有层次低的，但遗憾的是人们对此所知甚少，甚至对它们所讨论的内容也知之甚少。1836年，A. 詹姆斯·德奥赛，格拉斯哥的颅相学家和狂热的教育家，应福弗尔地方法官之邀作了一次演讲，其内容人们不难猜出。但是，当年过六旬的乔治·麦肯齐于1840年在王室游艇俱乐部演讲时，人们却很难把握他强调的重点。我们也不知道，当欧文主义社会宣传者约翰·格林在英格蘭中部演讲时，那些听众泪流满面的准确原因到底是什么。^[77]与格林类似，而又处在麦肯齐谱系另一端的是汉密尔顿夫人，她曾在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公开场合合作免费演讲。库姆的朋友形容她是一位“算命巫婆”，日记作家伊丽莎白·伊斯雷克认为她是一个“卑鄙的老可怜虫”，“无知而且庸俗”（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她于1843年投入汉密尔顿的怀抱）。欧文主义者称赞汉密尔顿夫人是一位坚定不移的女权主义宣传者：她在演讲时用手帕包了一把弹子来说明人的大脑，当她证实男性和女性在智力方面是平等的，并进而认为颅相学赋予人们“打破[男性]独裁者、压迫者的束缚，彻底解放[妇女]的力量”时，^[78]她的讲台前听众如云。

我们并不确定像汉密尔顿夫人这样巡回演讲的颅相学家是否还有很多，但是通过机构性的搜索网显然不能查明真相，就好

像它不能充分揭示这些讲座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一样。詹姆斯·迈尔斯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弥补工作(并表明这种印象远非肤浅),他在自传《邓迪的工厂童工》中对一位在乡村宣传颅相学的颅相学家进行了独特的评论。书中的颅相学家是邓迪颅相学学会的书记,威廉·麦格拉尚。19世纪30年代中期,他来到了迈尔斯所居住的福弗尔郡的一个村庄。迈尔斯写道,把颅相学介绍给这个村庄是

我们村庄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是我们村庄最美好的时期,以至于今天[1850年左右]的村民们经常听人们说,“颅相学到这儿的那年真是破天荒的一年!”令人奇怪的是……这种关于大脑科学的宣传会在我们的小村庄如此轰动。

我至今仍能回忆起那个重要的夜晚,教区学校成了礼堂,演讲者是一位瘦得皮包骨头的裁缝,叫麦格拉尚,这位关于头骨隆起的哲学家出生在邓迪……他走进教室的时候随身带着一尊半身雕像和人的头盖骨,看起来就好像刚从古代的坟墓中逃跑出来的,农夫们对他的出现充满了敬畏。他关于器官和头骨的讲解让我们目瞪口呆,几乎完全否定了我们关于人的尊严的脆弱观念。^[79]

158

这段描述更具价值的地方在于它提醒我们,19世纪30年代,还是有一些大众没有被科学理性主义的大潮所浸染,他们仍然会受到颅相学的鼓舞,不是因为他们把它看作是大胆理性主义,相反是因为他们感觉到了颅相学与颠覆性的非理性神秘知识之

间的联系。这段描述也提醒我们，无论演讲者身在乡村还是城镇，无论他个性胆怯还是粗野，激进还是恭顺，虔诚还是投机，最终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仍不是演讲者自己。真正重要而且像镜子般俘获并把握听众注意力的，是这个话题本身，即“人的思想”——（正如几乎所有演讲者都强调的那样）这是人类所有快乐和痛苦的源泉：抽象中的本体。^[80]

研究团体

对颅相学的兴趣一旦产生，互教互学班里这种浓厚兴趣就不足为奇了。这种互教互学班一般设在技工学院，通常得到管理者的鼓励。在纽卡斯尔，学院的领导们（法伊夫是主席，阿瑟·屈维廉是管理委员会成员）在其年度报告中声称，在法伊夫和库姆的演讲结束之后，“除了成员中日益增强的调查精神外，必须提到的是，他们中一部分人已经组成了一个研究颅相学的团体”。^[81]在德比，多诺万“[在演讲结束之后]滞留了……一段时间，以满足学院部分成员的愿望，教他们通过实际操作掌握观察颅相学科学的实用技巧，等”。^[82]1833年，J. R. 斯泰宾在南安普顿技工学院讲课结尾总结时，提议应该在该镇的文学和科学学会中建立颅相学社团。结果，技工学院的成员“立刻效仿，组建了他们自己的颅相学研究班”，规定只有该学院的成员可以加入。有特色的是，当文学和哲学学会的颅相学团体“因为成员缺席而逐渐衰落”时，技工学院的颅相学团体继之而起兴盛起来。^[83]1846年，克莱克希顿技工学院成立颅相学班；1843年，北

安普顿在霍尔授课之后建立了颅相催眠术班。人们经常提到，这些班的所有成员都是工人阶级。^[84]

据我们所知，几乎所有技工学院在开设颅相学课程之后都成立了这样的研究团体。很显然，建立这样的团体也是巡回演讲的颅相学家补充其微薄收入的另一种方式。19世纪40年代戈耶德曾放言，如果任何团体有意于组建这样的研究班，他将免费为其授课。显然，他这时考虑的无疑是这门科学的未来收益。^[85]这些研究班通常由10到60人组成，每人交几个先令的报名费，每周或每两周聚会时还须交几个便士的费用，但有的班只需在聚会时交几个便士的费用。^[86]其成员大多是成年男子，只要经济许可，他们会尽可能参加定期聚会，或者一直到完全掌握这门科学的实际应用和一些操作技巧时为止。1830年，在J. L. 列维森演讲之后，伦敦技工学院成立了颅相学研讨班。据估计，该研讨班在其后十年里曾为300多人传授了颅相学基础知识。其书记兼领导者，埃斯林顿的法律书籍出版商E. J. 海奇*说：“他们中的多数人一直坚信颅相学教条，其中有些人作为颅相学传播者，在颅相学界已小有声名。”^[87]除音乐班之外，这个班规模最大，出勤人数一般保持在34人左右，他们负责向学院主管推荐颅相学讲师的聘请人选。^[88]每周六晚上，在一个堆满了颅相学石膏模型和书籍的教室里，研讨班定期聚会，讨论诸如莎士比亚的《麦克白》、罗伯特·欧文的原理与精神结构、颅相学在自治政府中的应用、颅相学发展中的障碍、癫狂与文明等等话题，这些都是颅相学精英们讨论的主题，或者是《颅相学杂志》正在讨论的内容。^[89]通常情况下，学员们如果遇到不能用库姆的

《颅相学体系》来解决的问题，就用《人类体格》中的原理来解决。这些研究团体的宗旨和圣经班一样，不是去质疑颅相学的信条，即库姆的自由主义哲学（其中包括“不唯教条是信”的教理），而是去发现与之和谐共处的乐趣。围绕着“颅相学是真理吗”而进行的无休止争论造成了调研的幻觉，即不要“盲从于他人的教条”，同时却又再次肯定了颅相学主要倡导者所宣扬的特殊的社会观点。^[90] 160

学习的热情：一种尝试

人们普遍认为，技工学院以及其他为工人阶级开办的中等阶级教育机构没能实现其社会、思想目标，因为他们没有影响到工匠阶层，而这个阶层却是他们最初设想的追随者。对技工学院的最新评论表明，在课程表中，自然知识比政治经济学更为重要。尽管如此，这些评论也只是承认技工学院扩大了追随者队伍，正是这些人能够证明城市工业资产阶级的价值和利益的合理性，并予以支持；同时，这些评论也承认，自然知识的传播提供了一种理性主义论述的框架，“在此基础之上，将最终建立重新整合过的稳定社会的文化”。^[91] 正如我们所见，技工学院在推广颅相学过程中，失去了许多具有传统思想和政治思维的技工的支持，但也从中等阶级下层获得了大批追随者。到19世纪30年代，与其说学员们来自某个神秘的社会阶层或者职业阶层，不如说他们来自“人民”。许多例子说明，把“技工学院”改名为“文化科学学院”更合适。因此，可以说，管理层对颅相学的热情是

他们(尤其是当某些工人识破其阶级野心的情况下)与不如意的失败现实相妥协的手段:通过人们对颇相学的反应,资产阶级教育家深信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他们的劳动超然于“自私的阶级动机”之外。

但是这一点仍有待商榷,因为其前提是错误的。它忽略了下列事实:19世纪早期,无论是机械化行业还是非机械化行业,161 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的人数都大为增加。因为这种情况,同时也因为其就业门类相对增加,许多工匠对于惯有权利或者保护这些权利缺乏强烈的政治感(然而,并不是说这样的工人必然就是政治无能者)。从技工学院的学员资格中可以看出,到19世纪中期,学员中有大批“非传统行业的”工匠(即“工人阶级上层,每周的收入介于1英镑到30先令之间”),同时还有大批年轻人。^[92]我们不能说技工学院的管理者们是因为考虑到这些人可能成为劳动大众中优秀的第五纵队,才有意把他们挑选出来。然而,我们可以说,由于这些工匠和年轻人更熟悉城市工业社会的秩序及其主导价值理念和社会关系,在技工学院的引导下,他们比父辈更易于接纳这种新秩序,并视之为自然而然的事。同样,鉴于英国到1851年时已有700多所“人文技工学院”以及超过12万的学员,因此,似乎没有理由说他们是“失败”的。^[93]同样,值得追忆的是,这些学院的毕业生中涌现出一些工人代言人,如E. T. 克雷格*、A. R. 华莱士*和G. J. 霍利约克*,他们都是颇相学的研究者。库姆、巴克尔和斯宾塞等人的观念是,通过对技工学院施加影响,能够有效地触及人民的生活。这样的思想似乎并不像人们最初想象的那样,是自欺欺人的

思想。^[94]

如果说，技工学院的颅相学成就对于平静资产阶级管理者的心理要比平静劳动者阶层中传统工匠领袖的政治要求所起的作用大得多，那么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由此认为，这些成就没有得到下层民众的支持。技工学院并不是简单地强加给接受能力不强的、恭顺的大众的，颅相学也是如此。^[95] 颅相学研究班和主日学校一样，即便受到了大力提倡，仍由“下层民众”自愿报名。工人阶级追随者赠与颅相学演讲者的殊荣（甚至到了蒙特罗斯的技工给布朗赠送银茶具的地步）是慷慨而真诚的，即便达勒姆的高级行政长官亨利·维特翰姆煞费苦心去“教导穷人，把道德和知识进步的方法置于自己触手可及的范围内”，情况仍是如此。^[96] 最典型的例子大概是欧文主义者给予辛普森的溢美之词。辛普森坦言，没有一样东西“比家中佣人的进步”更能让中等阶级“每天都能从启智教育中收获满足的快慰”；在他看来，下等阶层品性卑劣、没有教养、不适合自由进入公园，他们酗酒成癮，而且习惯在“主日狂欢滥饮”。^[97]

劳动人民学习颅相学是自愿的，他们不断地自发组建学习场所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如，技工学院的分院、“民众学院”、欧文主义者科学会所、合作夜校以及无数的互教互学团体。这些自发的工人阶级组织和团体成为“或明或暗对技工学院和其他中等阶级资助创办的教育团体进行反面评价的证据。”^[98] 1839年，伦敦第一个技工团体（1820年创建）的创立者蒂莫西·克莱斯顿在他的《就自学和互学给技工们的建议》一书中，建议把讲授颅相学作为工人独立发展的手段。这个观点在当时其实

已经是老生常谈。^[99] 因为,当托马斯·库珀对于给莱斯特的宪章派讲授颅相学进行反思时,互教互学团体则认为,颅相学作为每个人应该接受的基本教育是理所当然的。^[100]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设菲尔德的欧文主义者科学会所,为了鼓励人们讨论政治和社会道德问题,有意不谈科学,但颅相学是唯一的例外。^[101] 亚历山大·贝恩发现,1835年成立于阿伯丁的互教互学协会是另一种风格迥异的“严格的正统派”,但是那儿也有许多人“偏爱遭到其他人怀疑的……颅相学。”^[102] 20年代后期,罗瑟海兹和伯蒙德西的技工对颅相学持蔑视态度;但是三四十年代的互教互学团体却大相径庭,他们认为颅相学是一种哲学,不适合那些粗野的流浪者和游手好闲的贵族,也不适合工人阶级中“谄媚奉承的走狗”(金斯利的《艾尔顿·洛克》中受颅相学影响的宪章派桑迪·麦凯的话)。

人们从宗教和政治角度对颅相学进行了不同的阐释(但是从未改变它的基本原理),这使得颅相学成为几乎所有互教互学团体屈指可数的必修科目之一——截至19世纪30年代,英国几乎所有的村庄都至少有一个这样的团体。^[103] 有些团体的成立确实是为了学习颅相学,有些团体则是在某人来传播过颅相学信条之后才沉迷于此的。迈尔斯所在的福弗尔郡小村庄在麦格拉尚演讲过后的情况就是这样:迈尔斯的雇主,一位典型的思想激进的鞋匠,在听完麦格拉尚演讲后,深受其“正确”思想的影响,成了当地的“颅相学狂”。^[104]

全英国像迈尔斯雇主这样的人,还有其他没有政治头脑或者不太富裕的人,大都是在技工学院、互教互学团体、主日学校、

激进俱乐部和酒吧等场所接触颅相学的。他们当然只是工人阶级的一小部分，却构成了成千上万舍得花 1 先令 6 便士的收入来购买《人类体格》的大军。也正是有了他们的零钱，休伊特·沃森才能在 1838 年宣称：“颅相学入门书籍的销售远远大于其他任何非职业教育的科学书籍。”^[105] 好几份颅相学通俗杂志也在这些自学者中拥有了自己的读者，其中就包括《钱伯斯家族》杂志，它在 19 世纪 40 年代每周的发行量稳定在 9 万册左右，当时《人类体格》的原理已经“暗中”得到传播（罗伯特·钱伯斯后来这么解释）。^[106]

至于说技工学院和互教互学团体之间的差别，这并不重要；就传播颅相学而言，许多人把“实用知识传播学会”的出版物称为“辉格派施舍”的“没有汁的谷糠”，也把钱伯斯兄弟的出版物称为中等阶级自由主义“戛然而止的超前哲学”的证明。^[107] 工人阶级杂志无意于为中等阶级价值观辩护，却也支持和拥护颅相学：例如，约瑟夫·莱文西的《道德改造者》或织工约瑟夫·巴克的《人民》，后者（副标题为“颅相学专刊”）的每周读者有 3 万人，他们职业低贱，具有反抗压迫与空洞说教的大无畏的反叛精神。鉴于《人民》杂志经常刊登工人来信，声称拥有一本《人类体格》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认为，“巴克派”和“钱伯斯派”在劳动人民中传播颅相学并发行《人类体格》廉价版本的“煞费苦心”都是值得的。^[108]

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颅相学的这种热情从动机上来说和资产阶级思想对于这门科学的希望大相径庭。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普通民众对这门学科的热情随处可见。唯一的哀叹似乎

来自那些与颅相学毫无干系的人。例如,1834年《爱丁堡新闻》的一封来信谈及苏格兰南部的操作工人时,认为他们才开始认识到颅相学的价值;信中补充说道,

工人们需要的是关于这门科学的廉价信息,除此无他。关于这门有趣科学的一次公开演讲必将获得成功,而且也应该获得成功。在这个地区,你们的许多读者对于该学说理解不多,在报上阅读你们的观点阐述使我们获得了无法言喻的好处和快乐。^[109]

4年后,编辑才回信,在这4年的时间里自由派颅相学观点得到了普及,因此这封编辑回信是这种观点的典型表述:

我们(这份报纸的编辑们)个人有自己观察和评价颅相学演讲效果的方法。这些演讲的对象是工人阶级,演讲作为一种手段可以开启他们的思想,使他们了解教育的需求,以及学习物理学和其他科学所具有的好处,因为这些科学能够促进道德和智慧的进步。我们发现,没有哪种事物能够和颅相学的快速而发人深省的影响相提并论……但凡在工人阶级已经接受了颅相学教育的地区,颅相学的效果最为显著,它拓展了工人阶级关于人类天赋的观点,传播了人们对这门知识的益处所留下的深刻印象,它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们非常急切地参加其他学科的科学讲座,并对人类的进步产生了普遍的兴趣(最有价值的那种)。^[110]

换句话说，在新的制造业体制产生了不平等，而一些辩护士公然无耻而虚伪地为之辩护的情况下，除了颅相学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能够吸引那部分既想着形成系统的经济批判，又想着能对其他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改造的劳动者的注意力。科布登曾经在他和库姆的每周通信中说过，颅相学的成功与“淘汰人民先人为主的观念”密切相关；^[111]可见，这门科学的胜利在于，它让许多平常对无处不在的教导者持怀疑态度的人心甘情愿而且充满激情地阔步迈进这种重新思考人性的事业中。

理解通俗颅相学的前奏

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果颅相学为了赞同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原则而扮演着日渐保守的角色，那么它是如何以及为何在甚至是最激进的工人群众中茁壮成长起来的？在探究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花点时间详细阐述这方面的历史发展以及我们正在探讨的观点。

从本质上说，我们的前提是：要想理解维多利亚中期资产阶级的霸权，就需要对维多利亚早期的思想和制度进行一次深入的去除其神秘性的思想启蒙。当然，非神秘化启蒙的把戏现在已经司空见惯，没有什么比维多利亚时代的圣人及其完美无瑕的制度轰然倒塌的声音更加不绝于耳。过去被人们无比尊崇的人道主义长袍，如今缠绕在那些曾经喃喃细语博爱和慈善的人的脚踝上。但是，这样富有特色的结局并不让人惊奇：一手高举鞭子，一手拿着装满金子的钱包。例如，“实用知识传播学会”迟

至 1964 年还在很严肃地争辩,其利益是纯粹利他主义的,如果认为该学会打着宣扬道德的幌子来掩盖阶级冲突,并为下层社会的分裂思想和行为提供永久的止痛剂,则“完全是臆想”。^[112]

但是,如果停留在后一种观点,弊则大于利: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利益是等同的,只要这些利益不太明显(就像大脑解剖课上),意识形态的利益就会被认为是虚假的。换句话说,社会政治分析(打个比方)就会因为“实用知识传播学会”所倡议的有用知识而得到扩展,但是不会因为它所散发的化学、植物学或者流体静力学方面的小册子而扩展(这些学科仍被看成是价值中立的,只有科学用途及/或科学的偏离用途)。怂恿这种严格分析的正是那些“修正派”历史学家,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分析是建立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简单的观念之上的。由于他们(修正派)不能对这种简单进行准确定位,就想方设法抨击“马克思主义者”!^[113]但是许多左翼历史学家的观点似乎同样目光短浅。他们暗中接受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方程式,试图抓住工人中任何能够暴露教育者花言巧语的证据,以此来证明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自主性。^[114](这就步了恩格斯的后尘,他相信无产阶级的教育场所和技工学院相反,是“不受资产阶级任何影响的地方”。^[115])当然,如果历史描述的目的仅仅是描绘 19 世纪初工人阶级的崇高,那么没有什么比引用工人揭露尤尔、布鲁厄姆和沙特尔沃思的花言巧语这样的例子更容易或者说更令人愉快的了。但是如果历史描述的目的是解释维多利亚中期稳定的根源,或者工业资本主义持续生存的根源,意识形态就不能成为充分原因,因为在社会稳定所依靠的因素中就有对

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接纳或者至少是能容忍它的日常要求。

如果现在假设，工人是在贸然之中接受了让他们蒙羞的意识形态，而他们早先曾在一定程度上拒绝过这种意识形态，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观点。^[116]但是，这不是按照约翰·福斯特的样子来寻找答案的理由，比如，他声称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如果仅仅在经济战线上展开就必定会遭到失败，因此他进一步陷入了庸俗马克思主义，并从中寻求最后的庇护。福斯特会使人们相信，19世纪中期的社会稳定完全依赖于资产阶级马基雅维里式的操纵：“革命”之所以没有发生，是因为资本家一直掌握着权力，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向工人阶级妥协并作出让步，什么时候该紧急分化他们。福斯特利用了列宁论述“工人贵族”具有关键分化作用的论点。尽管这富有启发意义，但是用它来解释19世纪中期工人阶级丧失改变社会结构的雄心壮志，就会因为缺乏目标而失败，就像人们在经济萧条和19世纪初兴起的激进主义之间寻求单纯的因果联系一样。^[117] 167

当然，经济，或者更明确地讲，资本对生产中各种形式的劳动进行控制的历史，是理解维多利亚中期稳定的根本原因。但是革命与否远非面包问题。在颅相学的头颅图表中已被调和并神秘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可以凭借其自身的能力成为决定“上层建筑”内部意识的重要力量，对经济的强调低估了这种力量的强度。这不是说我们会选择“上层建筑”这个术语；如前所述，它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区别，以及经济“基础”反映在“上层建筑”之中而“上层建筑”反过来又对经济“基础”起作用的观点

(就像福斯特所认为的),人为地将历史现实分成两部分,并且呆板地通过人们更容易理解的机械性因果关系对它们加以归类,这在本质上是辩证的。如果我们接纳某种类似于韦伯的观点,即价值观是起点,它包含在意识形态之中,那么我们将发现决定“基础”的是“上层建筑”;而在“上层建筑”中我们将发现隐藏在中等阶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背后的价值和假说。^[118]简而言之,认为经济能够从所有“活生生的经历”(经济原本也接近于“活生生的经历”)中独立出去,是一种错误的历史理论。

鉴于这样的目的,我们最好主要用宗教术语来思考意识形态:把它看成一种共享的现实,或者是一种关于现实及其交流手段的思想体系。^[119]由于库姆派颅相学家基于他们对人性的系统理解,清楚地阐明了自律、自制的宗教信仰以及对新经济体制急需的惯例最有利的个人职责,因此,用这些术语来看待颅相学(就像当时人所做的那样)是完全合适的。^[120]更明确地讲,我们可以把这门科学的通俗形式当作一种世俗卫理公会,它提供了一个到达价值中立的知识通道,而这种价值中立能够抑制反资本主义的逻辑和团结的形成。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用这种观点看待这门科学,这能在多大程度上使我们把颅相学和 E. P. 汤普森所描述的作为精神剥削手段的卫理公会并列起来,仍然有待观察。^[121]此处只需说明,汤普森把卫理公会与工人阶级相关联,而卫理公会与颅相学的联系不仅仅来源于他对“安抚”的理解——这种“安抚”带有从内部削弱民众力量并使其落入工头之手的崇拜形式。这种联系也来源于他意识到,安抚(即精神的放纵和来世的希望)的需要是当时社会经济背景下的特效药——

在这种社会经济背景下，其他的俗世期望和政治追求都遭到了失败。^[122]用这种方式分析卫理公会，更广义地讲，分析维多利亚中期英国工人阶级的沉寂，既不会陷入经济主义，也不会陷入知识分子的凭空抽象（就好像卫理公会的神学信条自动具有一种力量）。相反，这是把宗教体系看成社会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进行的调和，并根据阶级对立和协商的特殊背景来考察大众对它们的支持。

与此类似，我们可以着手分析颅相学在大众中的传播发展，以便更好地理解新兴统治阶级是如何通过争取被统治者的认同而实现社会稳定的。因此，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把有关经济和意识形态之间未经调和的关系暂且搁置一旁，同样也将放弃这样的观念，即某些人关注其他人的思想意识必定是另有所谋，或包藏祸心。^[123]我们希望说明，经过生命科学结构的神秘化和调和，宗教体系的圣餐面包出现了，而且它就是圣餐。



世俗卫理公会

马克思的名言“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经常被人们断章取义，巧妙地赋予它不同于马克思原义的含义。至少在那个场合，马克思并没有说，宗教不过是由上而下传递下来的麻醉剂；他说的是，宗教是一种人们为自己创造的事物，用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在马克思看来这种需求是真实存在的。“宗教是无情世界中灵魂发出的叹息。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马克思除了说人并不能仅靠面包而生存之外，他又说了什么呢？

乔治·奥威尔：“途中记言”，《时代与潮流》，
1940年4月第六期，载于《论文集》（哈蒙德
沃思，1970年），II，第33页。

思想意识就是相信你所经历的事情是真理，而且是唯一的真理。

如果社会关系是不言自明的，那么，社会科学就没有必要存在。人们可以认为事物和关系的外在表象是不言自明的，或者人们可以追寻表象背后的真实。这么做或那么做

之间的差别是判断和调查之间的差别,思想性的多与少之间的差别。思想话语由现实范畴中的外在表象构成。

斯蒂芬·福伊希特万,“调查宗教”,载莫里斯·

布洛赫编:《马克思主义分析和社会人类学》

(1975年),第70—71页。

我们认为,对大众科学的全面理解取决于我们透过经验性的历史表象进行深刻的洞察,这并不是要求我们应该放弃那种表象去独自探询某个深刻的领域。相反,按照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说法,“任何……历史如果不是从井沿(译按:即历史的表象)和井深(译按:即历史的深度)这两个方面来书写的话,将会出现论述很不全面的可怕危险”,它表明我们既要探究井沿,也要探究井深。^[1]存在这种需求的原因非常简单,那是因为,人们通常认为应该从科学信息中获得的東西与人们实际(或者额外)接受的东西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例如,较为全面的生态学知识,尽管表面上看来只是鼓励人们不让环境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污染,其实它也暗示人们要保护“自然界”不受污染。同样,人们支持遗传学家为提高美洲黑人普遍较低的“智力水平”而进行的善意研究,其实是对种族区分以及优胜劣汰的社会竞争伦理的认可,因为在事实上正是它们造成了“这个问题”,并且对它进行了界定,使得它得以维持下去。^[2]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对那些公然标榜“人道”和“进步”的科学活动或科学普及进行深层次的批判分析。就通俗科学而言,

只揭示其接受者能感觉或体验到的好处仅仅是历史研究的一半职责。我们同样需要探究清楚,这种科学知识是以何种特殊方式对那些不太明显的社会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产生好处的。

这将永远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尤其是在生命科学中,对生物学的漠然总是与人们对自身社会生活的兴趣混杂在一起。在大众颅相学方面,由于社会的结构性流动,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19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是资产阶级稳定发展的关键时期,这种知识对大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生活和思想的各种层次、各个方面随处可见的紧张、冲突、模糊和矛盾情绪也反映了当时发生在社会结构方面的变化。因此可以理解,当我们试图解决人们为什么相信这种能胜任各种角色的科学就是精神科学的问题时,这种困惑也暴露出来。我们不能指望对此进行单一的解释;对于某些解释中的矛盾和不连贯,我们也不必感到惊讶。所有事情都不相吻合,对于正在形成中的对抗性社会来说,也不该指望会出现这种吻合。人们的动机和解释因其背景、经历以及期望的不同而各有差异,而且在这些动荡的年月里还继续发生着变化。

171 然而,大众颅相学中的“大众”在某种程度上与20世纪中期致力于摇滚乐、占星术或阿尔都塞主义的人没有本质的差异。我们已经知道,颅相学家能够对某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主要是工人阶级中注意自我提高的年轻人——产生深刻的影响,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自己是“社会底层和中等阶级之间的联结纽带”,而且其他人也是这么看待他们的。1840年,他们被描写为“上个世纪最后25年中开始崛起的无数新阶层”的一员,“而且

他们是由技工阶层中比较有知识的成员构成的”。^[3] 尽管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会在拥有一本《人类体格》之后,宁愿再买一本《天路历程》,而不是《人权》,但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严格区分。毕竟,在工业化早期(和以往一样),《天路历程》和《人权》一样,都是面向普通人民的,这些人希望从中得到一种更强大而且有助于他们消除贫困、无知和耻辱等障碍的精神力量。^[4] 此外,尽管一方面确实存在着“真正的异端”,如 1847 年有人给《理性人》(*Reasoner*)写信声称自己是“乔治·库姆的信徒,却不是伏尔泰或欧文的信徒”;^[5] 但是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比较活跃而且阶级意识通常更加明显的卡莱尔主义者、欧文主义者和宪章主义者中,也有许多人信奉颇相学。虽然,恰当的方法应该是对作为少数派的后者进行单独研究(第七章和第八章),实际上所有这些人共享同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深深扎根于以潘恩和科贝特为标志并受到他们保护的傳統之中,但是到了 19 世纪 30 年代,它不再像以往那样以思想独立、双手布满老茧的手工工匠为中心。新政治经济学和工联主义这两者的崛起,虽然使得财产和资本具有更加突出的新的重要性,它们也使得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界限更加尖锐分明。越来越依赖于工厂的生产工艺削弱了手工工匠对生产的控制力。“双手布满老茧”者的文化与他们对自己手艺和工艺秘诀的骄傲之间曾经是和谐完整的,但是随着工厂生产工艺的发展,这种完整性遭到了侵蚀。因此,工匠以往社会地位的确定性如今在许多方面遭到了质疑。

尽管过分笼统地进行概括是危险的做法(因为“工匠”仍然 172
远非一个同质群体,而且工业化的影响也很不均衡),^[6] 但是在

19世纪第二个25年中,工匠是专断的工业世界中第一批精神受害者,这种看法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工匠的斗争和非技术工人的斗争不一样,非技术工人仅仅是同赤裸裸的剥削进行斗争,而工匠的斗争所反对的是伴随着技术化降低的过程而出现的人的自主权的丧失,这种斗争没有多少物质上的悲惨因素,但由于其社会性的含混或者说缺乏准确的敌人而更加令人痛苦。^[7]虽然大多数工人仍对自己身为工人感到骄傲,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也显示出一种与新兴的“成熟”工业工人阶级的“群体”意识相称的政治态度,但是,工匠或技工通常发现自己实际上置身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两大冲突阶级正在发展中的意识形态之间,进退两难。

尽管颅相学并没有企图或者故意利用工匠处境的摇摆不定,却对他们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推动了对工人阶级的局部剥削。倡导变革的激进理论家宣称,这门科学,正如我们所见,是特别针对工匠的——他们为整个工人阶级的行为定下了基调,而且用约沃思·普罗瑟罗的话来说,他们是“19世纪上半叶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有组织的工人群体”。^[8]颅相学赞美工匠在劳动力自然等级中的独立状态,而且通过生物学的验证,促进了工匠据以获得社会地位的手段在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下发生转型,由传统的依靠手艺和技能来获取社会地位的“体面性”转向依靠展示个人价值或道德价值来获取社会地位的体面性。颅相学使后者看起来是由人的大脑结构所决定的自然而然的事情,通过这种方法,它向工匠解释了他们之所以要接纳更具个人主义色彩的个人修养的原因,而这种个人修养

的总体后果是使得工匠与其他体力劳动者之间的价值观差距比工匠与中等阶级之间的差距还大。^[9]

然而,工匠信奉颅相学并不是为了接受这样的教导。相反,在颅相学家开始向工匠伸出援手的同时,工匠也正竭力寻求一种专门知识,以此来理解、改善和合理解释他们所认识的自身处境。这门科学因为其自身的原因而越来越有意义。因而,以改革法和废除谷物法运动之间的阶段为中心,在巨大变化所导致的混乱和移位之中,对这门学问的兴趣开始出现汇合:理论家努力在识字的工匠中传播颅相学,与此相符,工匠也正迫切需要这一知识。 173

正是在这样的总体背景下,我们才能书写人们接纳颅相学的进程本身。

魅力之处

无论颅相学对于那些迫切想要破解人类心理之谜的人多么具有说服力,大多数人被它吸引最初仍是出于好奇和娱乐的心态。从这方面来看,颅相学作为一种新鲜可及的消遣,与18世纪下半叶G. A. 史蒂文斯广受欢迎的“关于头脑的演讲”几乎没什么区别。拉瓦特尔的相面术尽管与史蒂文斯的幽默讽刺作品没什么类同之处,但它也有助于提高普通民众对头脑问题的兴趣。^[10]然而,在对待头的内部结构并把这种结构和它的功能与外部形式联系起来等方面,颅相学从本质上说是一门非常令人着迷的学科。实际上,颅相学的主题在广告界仍然非常活跃,因

为这种外在与内在协调一致的观念仍然非常引人注目(同时也非常有趣,也有点令人满足)。^[11]不为别的原因,单从它宣称能够对知名人士以及臭名昭著者进行全新的内心洞察这一点,这门学科很显然已经让 19 世纪的读者兴奋不已。^[12] 颅相学中始终有各种头盖骨(通常排列起来展示动物和人类大脑的进化),有时也会有令人恐怖的用甲醛防腐的医学标本。^[13] 颅相学对性也不回避,在讨论“色情”官能时很少加以掩饰(人们已经出版了多部讨论这个想象中的大脑官能的专门著作);^[14] 由于颅相学
174 认为随意瞥一眼过路人的头顶就可以判断其性欲,这种描绘为人们了解性欲提供了前所未闻的机会,要不然人们只有通过不被认可的身体接触来探知这一切。

在引起人们的注意之后,颅相学的简单易学也增加了它的魅力。颅相学“具有和欧几里得的任何问题同样的逻辑连贯性”,它应用的基本原理很少,但足以说明问题;它对书籍、石膏模型以及学习班所需的投资不多,只要人们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这门知识就行。^[15] 因此,评论家嘲讽道,“理发师、木匠、细木工人、各种类别的工匠,‘他们吵闹杂乱的嗓音使得人群更加拥挤嘈杂’,他们不断地追逐一个又一个讲演者”;颅相学“使思想浅薄的人非常高兴,因为它告诉这些人他们也能成为哲学家,而且‘花费如此之少!’”萨姆·斯赖评论道:“‘自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对自我的追寻过程并没有多少快乐和满足与之相随。但是‘他知’没有这么困难,而且一点也不缺乏快乐和轻松。”^[16] 只要人们忘记了物质和精神的匮乏、体力劳动招致的阴暗后果和工人生活中利己官能空间非常有限这些背景,工匠的这种谦卑

态度就显得理所当然。尽管有诸如詹姆斯·迈尔斯、亚历山大·贝恩或约瑟夫·格特里奇这些认真的自学者，他们面对极端贫困，会贪婪地阅读吉本、伏尔泰、边沁、密尔、莱尔、孔狄亚克等人的著作，但仍然有许多“目瞪口呆的技工和年轻学徒”，就像迈尔斯的鞋匠老板一样，虽然也像库姆那样迫切期望拥有哲学的深邃，却缺乏从事这项研究的毅力。^[17]只有“思想坚定而热情”的人，“会在力量刚刚觉醒时为任何展现于他们面前的新思想而欢呼雀跃”，^[18]他们相信在这个充满科学奇迹的时代，他们已经突然发现了人性的真正原理。他们何必怀疑它呢？罗伯特·钱伯斯等人消除了他们的疑虑，指出颅相学“是非常优秀的……针对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心智理论体系”。他切身体会到，由于“颅相学没有其他[体系]抽象……普通百姓在第一次尝试进行心理研究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双脚踩在了可供休息的土地上”。^[19]与牛顿学说这一“迄今最简单的科学”相比，颅相学不复杂而且容易理解的特点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它的真实性。^[20]“真理=简单”的等式蕴涵着对其他知识体系和个体精英私人[知识]积累的排他性的总体批评，因此，必须把侵占“知识领地”的所有借口必须与共和党人意欲摧毁这些领地的障碍并敞开特许学问领地的愿望放在一起考察。颅相学就是这样一个领域，它让普通民众似乎可以打破这些障碍，并重新获得他们的某些祖先曾经知道的参与权利。^[21]

与上述这一切以及颅相学所有其他魅力密不可分的一点是它所传递的一个基本信息——即，在极其复杂困惑的人类情感以及乱七八糟的生存现实中，一切都可以通过对人的智力官能

进行精确图绘来加以解释和理解。T. S. 普里多回忆 1806 年前后他发现高尔和施普茨海姆的体系时,记载了自学者从中感受到的兴奋心情:

对人类体格的这种揭示就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这真是一把了解我周围人的性格和动机的钥匙,是一盏新的阿拉丁神灯,照亮了比黄金还珍贵的知识财富。我立刻被深深地迷住,怀着巨大的好奇心想要了解我自己以及所有生活在我周围的人的个性发展情况。^[22]

在颅相学通过大脑的微观世界所打开的“新大陆”中,以前似乎毫不相关的事物现在联结在一起。正如我们谈及库姆被这门学问所吸引时所说,颅相学对反常者进行的分类生理疗法,以及它使得不可捉摸的情感世界变得可以感知,有助于使经验拥有精确性,使现实变得有序,使矛盾找到其必然联系。对于爱默生来说,无疑正是“这种源自大脑分类的快乐使得加尔文教、天主教以及颅相学迅速发展繁荣”。^[23]随着心智的真实性可以因此推导、统一、标记并组织,人生也可以脱离其社会背景,完全像心理学家那样来加以理解。直到 19 世纪后期赫伯特·斯宾塞的著作发表(这些著作也部分地依赖于颅相学),人们才感觉到——或者说觉得有必要去感受——他们对理解是如此沉醉。^[24]

颅相学的另一个主要魅力在于它非常明显的实用性。颅相学 176 学和占星术(初学者能够掌握而且也能解释一切)颇为类似,它所研究的学科据说是所有其他事物的基础,它在实际应用领域

从不排斥任何事物。^[25]实用性的颅相学著作把目光从天空转移到头脑,就像占星术阅读星星一样阅读头骨的隆起,它通常以历书的形式着手解决所谓哲学的第一问题:“不是‘宇宙是什么?’,而是‘我们该对自己的生活做些什么?’”^[26]在那些迅速发展的工业城镇,所有人都是门外汉,都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合理而现实的建议:自己最适合做什么?怎样才能最好地发挥个人的潜能?什么样的人可以信任并成为朋友,怎样把这些人 and 大批流浪汉、败家子以及窃贼、痴迷者、乖戾者和精神病人区分开来?该和什么样的人结婚,怎么抚养自己的子女?只要去咨询一次有经验的颅相学家,让他的手触摸一下头颅,所有这些令人痛苦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据记载,1843年有365名格拉斯哥人被戈伊德用手触摸过头颅,其中大部分是年轻的技工,其余人中的多数是仆人,他们是被主人送来鉴别其性格倾向的。^[27]而我们直到现在这个时代——通过触摸计算机的键盘——对于这些长期导致优柔寡断神经症的根源,似乎才找到解决方案,或者怀着科学信心来加以处理。^[28]

颅相学对于非常艰难的自我修养这一任务似乎特别有用。这不只是因为颅相学通过“在每个人的手中”放置一面可以解释其优点和弱点的“镜子”,能够让每个人发挥其优势;由于颅相学中“大脑带有组织系统的一般性特征,而且其功能的强化所用的方式与其他器官一样”,因此克服人的个性弱点也变得可能而且可行。自知——“最难获得但对持有人也最有裨益”——因而完全有效地与自我修养结合在一起。^[29]

颅相学也不仅仅是对自己管用:正如颅相学家伊登博士*

的巡回演讲海报中所指出的,也是解决许多问题的手段,不仅可以“在训练和教育孩子所需的费用和时间上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能让父母“在子女的心中激活那些能够产生知识和美德的力量,抑制那些有邪恶倾向的力量,并为他们选定能胜任的
177 工作、手艺或其他职业”。正是由于父母们的这种担忧,邓迪市技工颇相学学会才得以成立。这个协会的书记官在1826年告诉库姆:“从我们的立场来说,我们肯定对接受[颇相学的]启发感到满意,如果我们能在约束人的习性、陶冶人的情操、把年轻人的能力训练成行为,进而使他们成为品德高尚、对社会有用的公民等方面产生实际有用的效果,我们将非常高兴。”^[30]像克里斯托弗·汤姆森这样的工匠,已经感觉到自己被雇为赛马场的马夫是一桩错误,他们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错误所带来的后果。“毋庸置疑,许许多多的人已经犯了同样的错误”,他想到,“其祸首就是父母在送自己的儿子去做学徒时的习惯性做法,他们根本不考虑他们选择的职业是否适合子女,只看重这个行业的酬劳是否不错。”因而很自然,“如果颇相学或者任何一种其他科学知识能够向我们揭示在未来生活中避免失败的方法,我们当然应该非常仔细地听从她的忠告”。在查尔斯·布雷等诚实的慈善家再三确证“我们可以轻易地自欺欺人,却不能轻易地欺骗有经验的颇相学家”的时候,^[31]正如汤姆森已经意识到的,当时还没有另外可供选择的行为学。

人们认为,颇相学最重要的实用性馈赠是它所提供的有关保健的信息。例如,这可能会是一节关于酒精对智力官能影响的课程(尤其是关于酒精如何麻痹自尊官能),因而从生物学

的角度使人们明白戒酒的合理性。或者,它可能会展示一些似乎无可辩驳的证据如性癫狂者的大脑验尸报告,用以说明性放纵是如何通过耗竭其他精神器官的元气而摧毁人的健康的。^[32]然而,颅相学从健康的角度引起工匠注意的,并不仅仅或者未必是这类特殊的行为禁戒。更加重要的是,它所蕴藏的关于所谓健康自然法则的信息系统或者总体阐释,看起来像力学原理一样不可驳斥,而且也像刚刚发现的一样。这是安德鲁·库姆在《生理学保健原理》(出版于1834年,到1847年已印刷13版)中的特殊使命,这本书把颅相学定位于大脑中的诸多守法功能延伸到整个身体,并且谆谆教诲:为了达到各个器官的和谐和快乐,同样需要遵从那些法则。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位所谓的“人类生理学的洛克”的著作和他哥哥的著作《人类体格》差不多一样,都是颅相学课本。^[33]由于这两部著作基本上仅局限于对这些功能进行生理描述,因而更加靠不住。但是,它们却因为把战胜疾病(因而也就是健康)的责任强加于个人身上(不用为造成许多疾病的环境条件去辩解)而完全成了强制性的社会药方。身体健康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克服对自然法则运行规律的无知以及学会遵从规律。库姆之类的颅相学家如此简单清晰地说出这一思想,以至于他们(尤其是库姆兄弟)开始被看成这一思想的独立倡导者。正如原子理论家撒缪尔·布朗在1852年的《威斯敏斯特评论》上所写的:

有谁没有注意到颅相学家是如何有效地把生理学的基本原理以及基于这门科学的生活艺术反复灌输到大众的思想

中？那两个热心公益的兄弟，乔治·库姆和安德鲁·库姆，难道没有让这个民族最有学识的那部分人熟知“身体健康绝对取决于对器官功能法则的遵从”这个观念吗？^[34]

确实，他们做到了，而且直接或间接地拓宽了使颅相生理学著作容易流通的渠道。其中美国人西尔维斯特·格雷厄姆对于把这个渠道由小溪变成湍流作出了贡献。他在著名的《关于人生科学的演讲》(1839)中特地挑出《人类体格》，认为这部书比其他任何著作更能激起大众对生理学的兴趣。在英国，勤奋的全科医师撒缪尔·斯迈尔斯是一位较早追随生理学普及潮流的人，他的第一本著作《体育》(1838)被人们恰当地描绘为“库姆著作有益的附录”。^[35]

为什么像织工贝恩之类的自学者会“贪婪地吸收”安德鲁·库姆著作中的营养，并虔诚地学习健康自然法则，这并不难理解。我们只需回顾一下两方面的事实：一方面是城市生活日益恶化的现实特征——糟糕的住房条件，令人震惊的婴儿死亡率，霍乱、斑疹伤寒以及其他传染性疾病的肆虐，性病，慢性肺结核，酗酒，职业病和职业性毁容，等等；另一方面是疾病可能导致工人家庭的财政破产。这两方面的事实使我们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密切关注任何关于健康的规则。这种关注绝不仅仅是对流行医术的恐惧(贝恩是这么说的)，^[36]防范疾病的科学护身符严格来讲是生死攸关之事。即便是对科学普及者比较警惕的科贝特，也想出版美国颅相学家阿马赖亚·布里格姆关于心灵修养的著作的廉价版，因为在他看来布里格姆的著作为母亲们提供了她

们迫切需要的防止婴儿死亡的合理指导。^[37]

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其他人努力把这种学问拓展到医学以外的领域去。正如 1835 年的《都柏林医学杂志》在赞扬《生理学保健原理》时所指出的,

尽管近年来“实用知识传播学会”进行了孜孜不倦的努力,尽管近年来智慧在它引以为自豪的征程中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人类对他们最关心的事情依然特别无知,这就是他们自己身体的结构和功能。^[38]

尤其是对于性功能,“道德学家缄默不语,慈善家也闭口不言”(就像巴克所说的),只有“颅相学打破了沉默”。^[39] 颅相学家并没有借助通常的宗教安慰和劝诫来传播其“真正有用的知识”,他们成功地突破了假装正经的障碍。很显然,他们把头脑和身体的清洁看得很重要,这不是因为肮脏是一种致命的罪恶,而是因为生理学合理地解释了肮脏、性放纵、饮酒过度或肮脏的环境等以特殊的方式导致疾病和身体衰弱。现在剩下下来的就是读者自己拟定性行为准则,虽然他们对此可能没有什么疑问。正如一位颅相学家所说,这门科学“已经使我们醒悟到,在皮肤洁净和问心无愧(即肮脏的衣物和肮脏的思想)之间存在着联系,这是造就和维持健康心灵的健康身体所不可或缺的东西”。¹⁸⁰ “乔治·库姆先生不仅教导我们,‘清洁近乎圣洁’”,19 世纪另一位颅相学家评论道,“他还教导我们,‘清洁就是圣洁’”。^[40]

最后,尽管所有这些关于身心健康的著作悄悄推动人们去

注意生理上的自我反省,但是并不能明显看出(真实情况就是如此),这种悄悄推动表明人们的注意力远离了社会性身体或者开始否认对这个问题进行反思的必要性。尽管人们希望生理学能够教导民众“抛开毫无根据的担忧”和“无知的想象去生活”,并指导他们自我协调,但是这些著作很少引导人们:去遵循自然法则,而不是去努力改变社会。^[41]这就是它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推理,也是它的倾向,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因为这种选择从来没有明确地以非此即彼的形式出现。其外观完全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知识,直接贴近个人的幸福,即自我修养的前提。因此对工人而言,如果他们意识到对他们的帮助并不是由别人提供的,而是来自他们自己,看来颇相学家(以“万分的诚挚”)所提供的并不是对工人阶级政治失势和文化适应的探源,而是工人阶级有目的地干预自己命运的手段。要不然,另外一种选择就是继续被动地被个人无法控制的环境所愚弄。

对人生的把握以及对自己的境遇承担责任引导出颇相学另一个方面的魅力所在(这是颇相学带有最明显的宗教含义的魅力):非常奇特,这就是大脑决定论的观念所伴随的人的无可责备。在这一方面,颇相学也与占星术比较类似:如果行为过错是与生俱来的体质造成的——无论是由内在的官能还是由星星先天决定,很显然个人无须为其错误行为承担责任,也无须接受惩罚。“对于宿命论者来说”,小说家亨利·考克顿嘲笑道,颇相学“为他们带来巨大的安慰:对于所有那些完全不希望由自己主宰命运——即去除那种有时极其麻烦的责任——的人来说,颇相学绝对是神的赐福”。^[42]尽管颇相学家对于自由意志和贫困等

敏感的社会问题持有不同的观点，这门科学似乎已经让大多数工人相信：他们的缺点并不是自己的过错造成的，而是那个需要改良的社会体制造成的，也是他们的父母造成的，由于他们不了解遗传的自然法则而使得自己的罪恶报应到子女身上。^[43] 颅相学的“旨趣”，正如库姆在他第一本著作中提出的，就是“使我们认识自己并对我们的同类表示宽容，因为它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成为衡量整个人类的标准”。由于大脑的畸形并不是个人的过错，因此人们可以对精神病人甚至对罪犯表示同情。^[44] 181

然而，宿命论并不能毁损颅相学作为一门改善人类状况的学说的地位。和占星术中的星星一样，颅相学的天赋使人性带有一种先天倾向，但不是先天注定；因而颅相学和占星术一样，对克服大脑天生不足所需要的补偿行为的准确性质进行了深刻的洞察。尽管有遗传特征，尽管头部有其特定的形状，人们仍可以努力改变最基本的天性。^[45] 就像人们可以克服身体的残疾一样，克服或改善人的智力天赋也是极有可能的：当科学的可预言性代替了机遇对人的折磨，生活就处于人们的控制之中。对于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人们没有责任（就像加尔文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那样）；但是对于自己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人们不是对上帝负责而是对自己负责（就像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那样，而不是加尔文主义的思想）。^[46] 既然人们不再因为亚当的罪恶遭到惩罚，也就不存在罪恶的报应了。^[47]（实际上，这不仅是在正统基督教的文化背景中处理不可知的存在的方式，而且也是人们沉溺于希望中的方式。）如果人们在这种生活中失败了（即违背了自然法则），人们会自责并遭受这种生活的苦难。但由于世俗

的自然法则不同于专横的神的旨意，它可以被人们理性地加以理解并合理地予以坚持，因此罪恶带来的苦难也可以最小化。正义也不再是海市蜃楼。由于颅相学让无知者“对自己的精神和道德健康负责”，无疑，它“对于这些无知者来说就好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生存空间”。^[48]

到了 19 世纪后期，当工人阶级自我修养的乐观主义风潮开始消退时，颅相学日益成为那些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没有能力在社会上获得成功之人的精神安慰。随着颅相学越来越像世俗加
182 尔文主义，它也越来越成为绝望者的宗教，一种安抚和调和人们接受不惬意现实的无为主义，其方法类同于某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计划。时至 1858 年，设菲尔德的世俗论者亨利·特纳仍认为，颅相学揭示了“人可以通过其劳动实现一切”的秘密。^[49]但是在 19 世纪最后 25 年中，颅相学所起的作用更主要是安慰而不是解放，它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仍在于它同时在上述这两方面发挥作用。^[50]它非常适宜地介于主张白板论的宿命式的环境决定论与脱离肉体的思想或自由意志的学说之间。生物学的天赋加上勤劳使人们避免走上极端，却提供了必要的自我修炼的安慰剂或“继续奋斗”的自愿主义：这是一种精英领导阶级的宪章，也是行为研究者的理性解释。

颅相学最后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是它对民主的建议。在这里，颅相学也把两条路都切断了，理解这门科学的人们想说的内容与这门科学本身所隐含的内容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紧张状态。对于亨利·特纳这样思想激进的人来说，宁愿强调颅相学曾“宣告所有人生而平等”；而像邓迪的技工等不太激进的人则

宁愿强调颅相学证明了“诗人观点的正确，即‘自然对特殊思想的影响/留下了不同偏好的烙印’”。^[51]实际上，它说出了两个思想：由于人们拥有同样多的心智功能，因而人是平等的；但由于每个人的心智功能在出生时就有不同的相对潜力，而且在不同的人生经历的影响下会有不同的发展状况，因而人又是不平等的。但即便这种关于不平等的解释也显得民主而人道，因为它突破了平常的阶级划分，而且不禁止穷人向上流动。正如巴克在《人民》中对这个问题的总结：

这门科学并不否认人与人之间在心灵素质上存在巨大差异……但是每个人都拥有人类特有的智力天赋和情感……颅相学家声称，没有一个精神病人拥有常人所没有的某种天赋——颅相学家承认程度的差异，但不承认种类的不同。^[52]

因此，评价一个人价值的唯一参考标准不是地位，不是财富，不是（从理论上讲）性别、种族或国籍，而是智慧。托马斯·杰斐逊等人已经从卡巴尼斯的大脑演讲中得出了几乎同样的启示。^[53] 183
也许通过其他方法从教堂或小礼拜堂中也会得出同样的启示：难道在上帝的眼中不是所有人都平等的？难道上帝没有赐予某些人更强健的体质、更多的智力天赋？在颅相学中，上帝的选民是由自然选定的，而且关于内在资质差别性的行话也与人们在日常所说的“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所有的事情”相符合。^[54] 对于“唯一能够解释人与人之间之所以存在差别的科学”这个基本概

念，颇相学和往常一样，首先使这个基本概念世俗化、精确化、科学化、简单化而且真实化，然后在大众当中以其作者的身份出现。^[55]和另一个著名的修辞上的创作“隔离但平等”相仿，颇相学的原则“平等但有差别”极大地便利了自私者和无私者之间的灵活机动，以至于它的影响无所不在。当然我们不难发现，它为什么会让那些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受到危害的工匠特别满意。他们可能会带着微笑离开一个颇相学讲座现场，这种讲座把社会底层阶级的头盖骨说成在厚度和外观上都次于那些“社会层次较高而且有知识的阶层”。由于工匠把自己归类于后者，他们（就像邓迪的技工）会一方面声称这种差别与他们在社会上所观察到的一致，另一方面又同意讲演者的观点，认为这种学说就代表着“普遍民主”，因为它承认“所有人都拥有合法使用自然赋予他们的所有资质并为此感到满足的平等权利”。^[56]即便它仅仅意味着每个人（尤其是男性）拥有自我修养的平等权利，这种说法听起来仍然不错。但是颇相学的合理性总是和它的意义一样重要；如果更贴近点观察，可能更是如此，这门许多人藉以寻求理解和解脱的“常识性”科学成了一座不可抗拒的充满矛盾的知识大厦。

修辞的力量

尽管爱默生认为颇相学非常“荒谬”，但他认为这门学说之所以流行，其根基并不虚幻。他察觉到颇相学的魅力在于其修辞的力量，因为“当时对教会和学校的批评……表明人们希望从

宗教和哲学中获得它们迄今还不能提供的知识”。^[57]工人群众与“有理性阶级”相比，(p. 184)对于颅相学是否是迄今为止人类精神哲学最大的飞跃，他们能够怀疑的机会更少，而且一般也没有理由去怀疑。毕竟，最敌视这门科学的人主要是那些最迫切要求把社会下层人民固定在原有位置上的人。“颅相学颠覆了所有宗教的基本原则”，在右翼分子看来，它“使得政治经济立法产生内部混乱，使骚乱取代了和谐，失望代替了希望，永远的黑暗替代了持久的光明”。另一个极端保守分子认为，这门科学的直接倾向是“使得广大群众对他们的状况不满，对现有的社会关系不满”。另一个人则说，颅相学家以“1先令6便士的代价”在“贫民和文盲”的手中放了“一把锐器或者手术刀，他们用这种工具正在制造巨大的灾难”。^[58]

工人群众不需费劲就察觉到造成这种责难的根源。难道库姆没有指出，大制造业主提出《结社法》来反对工会，其唯一动机不过就是利益的驱动？难道他没有呼吁工人应该结成牢不可破的同盟，只有这样才能改善自己的状况，使其与造物主赋予他们的天性相吻合？为了抗议下院对《十小时工作法案》的否决，颅相学家在乔治·库姆和安德鲁·库姆思想的引导下团结起来。乔治和安德鲁认为，商人和制造业主不仅沉溺于贪婪和自大之中，打破道德法则，强迫工人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而且也违背了自然法则，使劳动人民沦落为仅仅满足于基本官能的人力机器。^[59]J. Q. 朗鲍尔* 绝对算不上最开明的颅相学家，但他也像其他人那样坚定不移地认为，新《济贫法》“纵容不劳而获，违背了神意”。他宣称，这个法案是“我们这个国度的耻辱”。^[60]这还

不是颅相学家最鼓动人心的语言：1838年颅相学家小查尔斯·索罗尔德·伍德*对唐卡斯特的工人说：“现在到了被剥夺、被蔑视、被侮辱的工人们发出比君主、大臣和议会中的奴才们更强大的声音的时候了，而且也到了身居王宫中的独裁者向栖居于茅屋的饥寒交迫的人民屈服的时候了。”^[61] 尽管只有一小部分中等阶级颅相学家真正希望像伍德和约翰·埃普斯那样寻求宪章派的支持，许多人仍比较乐意支持坚定不移的休伊特·沃森所主张的普选权观点。^[62] 实际上，颅相学家广泛赞成杰克逊式的共和主义，并从大脑结构的角度使之合法化。霍奇森提醒库姆，“大脑是一个共和国”，其中的每一种官能都和其四邻一样优秀，而且也行使同样的权利。^[63] 尽管库姆从来没有放弃他坚定不移的信念：智力和道德官能至高无上，但他仍在《宗教和科学》（1847）的脚注中以近乎忏悔的态度修正了他的“主张寡头政治的错误”：“我不提倡不抵抗主义。人的大脑中有着代表好斗和破坏的器官，它们有合法的行动范围，其中之一似乎能够有力量击退我们不能通过道德方式击败的侵略行为”。^[64] 大概正是因为受到这点的鼓舞，1848年人们对《人民颅相学杂志》前任编辑的评价是：他“很容易扰乱大众的宁静，激起革命情感”，并作为宪章运动分子被监禁。^[65]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为什么查尔斯·伍德的名字会记录在某些间谍的笔记本中；相反，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工人会赞成他的观点：当查尔斯·伍德的兄弟威洛比在演讲中批判政治经济学的荒谬并告诉穷人应该对他们的命运不满的时候，查尔斯公然质疑新登基的女王的权威，

她掌握着这个国家三分之一的权力……但她并不比任何一位现在正在听我演讲的人多一种官能。君主有兽性、道德和智慧三个叶片，你们也有；君主有40种人类的心智官能，你们也有。君主并没有使这些发挥效益，但你们却做到了……可是君主和你们以及全国的人民是一样平等的！哦！可耻啊，可耻！19世纪的英国人竟然会忍受这种可悲的堕落。^[66]

与此同时，这些颅相学家和其同行一道还促成了工匠对陈腐、虚伪的旧神学的敌视。颅相学家猛烈攻击“花言巧语的牧师，他们让你的思想处于混沌之中，这样他就可以完全控制你的一切，他不仅使你身体挨饿，更可恶的是他还使你思想贫瘠”，由此颅相学家满足了激进派的要求，使得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明白其话语的真正打击目标并不是他们，而是居于垄断地位的国教教士。因此，人们可以诉诸并利用不同的世俗传统和反教权主义传统。^[67]

因此，尽管大多数杰出的颅相学辩护士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渐渐地不再是与“人民”同道的激进派，而日益成为资产阶级性质的“人民”保护者，但是很难普遍性地把这个时期的他们看作激进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先驱，敢于公开对抗那个时代最主要的政治、社会和宗教压迫。他们宣称，一个约克郡的织工或者一个诺桑普顿郡的农民和其他任何人一样都拥有掌握这门科学秘诀的权利，^[68]但这么做却使得他们必须面对两方面的反对者。一方面是像奇切斯特主教这样的顽固分子。奇切斯特主教当时

就声称,教育,尤其是容易学习的学问,会导致仆从阶层不安于现状,并导致民族的毁灭。另一方面是“实用知识传播学会”和英国协会的代表们,他们(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轻蔑地称这门学问是“使那些一知半解的笨蛋感到高兴的……大胆推测”,因为他们知道,当“社会等级的金钱特征”被颅相学所提倡的“天生的高尚品质”所取代时,已经摇摇欲坠的权力结构将会与其他所有的特权机构一起被颠覆。^[69]很显然,正是在1832年的真实暴露*之后,其他教育家为了“更进一步保证财产的安全,维持公共秩序”,^[70]企图重新塑造工人的私人生活(用凯一沙特尔沃思的话说)。但是颅相学家没有这么做,他们不仅通过其简单的经验性实用科学含蓄地预言了机会平等和社会正义,而且也公开表示要消除过去对人民的压迫——即“立刻而且永远”废除“原始的残余和低劣的兽性残余”。^[71]颅相学家较少带有虚伪的社会改良空想家的“道德迂腐”,他们把工人群众当作成熟的人,迫切恳求他们理解并洞察对颅相学家的欺骗,以期能让他们自由地改善自我并躲开不愉快的事情。^[72]人们不断地听到他们在说(就如同库姆于1851年在格拉斯哥所作的演讲),“只有当工人开始对无知和肮脏感到不满,对通风不畅的拥挤住房感到不满,对辛苦劳作和缺乏高雅的娱乐感到不满时,他们才会有希望”。(让宗教家们懊恼的是,)颅相学家忘记了宗教祈祷,不顾他人设置的一切“人为”障碍,告诉并要求人们:你们应该自己行使改善道德情感、控制自己嗜好的权利,这样会让你们“提升自己的社

* 指1832年议会改革过程中的社会动荡。——译注

会地位”。很显然,这是理性的传播,而不是对服从的谆谆教诲;正如《泰特杂志》对一位比较受欢迎的颅相学家的描述,他“既不妥协也不伪装”,直白地表明了这门科学“彻底改变整个社会体制的……最终后果”。^[73] 187

但是要知道,并不是颅相学家的所有话语在所有时候在所有的工人阶级看来都是激进的,这点我们在下面的章节中也会有所提及。我们已经说过,有些颅相学家偶尔会故意使自己及其知识与明显退步的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利益相结合。但是我们也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绝大部分颅相学家并没有清晰的社会控制策略。要是颅相学家能注意到,当福音派反对社会主义者的运动在19世纪30年代如火如荼地开展时,有些工人阶级激进派开始抱怨工人阶级正被引离他们真正的阶级利益,^[74]那么许多颅相学家应该为此而欣喜;但是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他们**确实**注意到这个问题,或者他们曾克服自己一手造成的令他人极其困惑的问题。正因为他们不是愤世嫉俗的宣传家,并不企图用某种花招把人们对工业化问题的憎恶引向当今维持诺曼奴役的人,进而为工业体制进行辩护,因而他们通过科学对传统权力进行攻击是可信的,而且也受到了大众的欢迎。^[75]但是要记住,他们的大多数话语并不是特别针对工人阶级的。比如,当恩格尔杜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谈到“彻底抛弃那些长期以来使人苦恼困惑的狭隘而缺乏创见的观点”时,他其实是在发泄自己对长期存在的宗派主义狭隘性的不满,因为这种宗派主义使得他所追求的文化不能实现。^[76] 1815年福斯特在《哲学杂志》上的言论,麦肯齐1830年对爱丁堡皇家协会所作的演讲,或普

里多 1869 年为高尔所作的辩护,都是如此。既然猎狐的对象仍真实存在,教会的力量仍很强大,就没有理由解释为什么颇相学家不应该继续专注于反对贵族政治和超自然主义。他们中的许多人至死都坚信其信仰。^[77]即便那些特别针对工人进行宣称的颇相学家,也没有故意地欺骗和虚伪地宣扬自己根本不相信的信仰。大多数人坚定地认为,他们正在使得大自然的革命真理民主化,并且正在教导工人“自己思考和判断”。^[78]由于私人经济开销通常相当可观,他们可能会继续承认自己的离经叛道。艾伦·埃普斯记载道,她的丈夫

被一些人横加责备,因为他接受人们的请求……为[工人群体]提供信息;无疑,他为社会主义者演讲的事实使他在一个本来对他有利的圈子里受到了伤害。然而,他的想法是,这种机会可以传播他确信能够造福于渴望学习者的知识,也可以开启大众的思想,使他们了解上帝的法则,因此,不应该忽视这种机会。^[79]

这些颇相学家的声音之所以能在“人民”中间引起共鸣,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宣传颇相学时仍对这门学问的性质不太清楚,就像库姆在写作《人类体格》时那样。一些虽狂热却在政治上幼稚的资产阶级改革家曾盲目履行马克思所谓的“粉碎古老的英格兰,即过去的英格兰的使命”,颇相学家和他们一样,投身于暧昧不明的激进主义,并帮助它支撑到了 19 世纪 40 年代,而这种激进主义是“介于政治经济学和理论上的

普选权之间——即李嘉图和卡特莱特上校之间的混合物，也是介于《国富论》和《人权》之间的混合物”。^[80]当然，凤凰正经历新生：密尔公开提倡阶级合作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声誉正隆，而那些在社会转型时期获益最多的人也日益希望地位比他们低下的人分享他们关于现实的想法——（从心理上）像他们那样。几乎在不经意之间，工业社会自由资产阶级正在实行阶级控制的事实在留下固定的“潜意识反射”的同时也被抹煞了：“自然安排的社会等级作为一种制度对所有人都有利。”^[81]人们完全明白这点，但多数人不过是后见之明。当时，大部分工匠只认识到颇相学适合并能增强他们自己的自由主义“战斗”传统。他们可以回应恩格尔杜，这门学问“提倡自由，憎恶专制，……认识到了思想上自由而不受限制的表现；它使所有观念成熟起来，并支持所有致力于增加人类幸福的方案”。他们可以现成地引用《人类体格》中的语言说，颇相学正引领“我们的观念、行为准则、行为以及社会制度……发生一场伟大的革命”。^[82]工人阶级中的怀疑派开始认识到，在工业化背景中呼吁“打倒贵族”是不现实的，寻求“能够对付教士权术的良药”也是苍白无力的，^[83]因而，怀疑派只能目睹颇相学作品被投入曾经考验过《理性时代》的地狱之火的景象，去证明他们的怀疑是不可能的，并再次确认库姆的信仰是不信仰国教的老百姓的真正声音：反贵族政治、反教会、反君权。^[84]颇相学这门科学，尤其是《人类体格》，使得过去下层社会被剥夺的一切以及他们所希望的一切都在本质上得以明确化。在灵魂和智慧的渴求中，它击中了要害。

欺骗无知者

我们现在已经说出了适合任何宗教运动的一般真相：颅相学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它的社会功能和个体功能。有时这是令人愉快的对现实的逃避，但不是那种能让人简单地超越无法忍受之事的逃避。由于颅相学对与本性及他人相关的自我进一步加深了理解，它的比较容易掌握的规则或人们对经验丰富的颅相学家的接纳，反而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问题相冲突；它为未来铺平了一条与理性的伦理体系相符合的道路。颅相学使得人们从过去加尔文教派的现实特征中解放出来。在加尔文教派中，财富和成功是增加个人荣耀的唯一方法，也是增强个人尊严和价值的唯一方法。但是颅相学使得被上帝遗弃的人能够了解自己，认识到自己的罪恶和失败，开始新的生活，并能有机会自救；它也为人们提供了忍耐、宽恕并帮助同伴的天然基础。^[85]最后，随着进步根基的奠定，现实世界中的空想计划以及自我拯

190 救对于人类来说也变得触手可及。因而颅相学成了一种万灵丹、一种安慰剂，它是所有意义的根源，是人类获得身份、道德、纯粹、进步和价值的正确道路。

但是可以想象，任何社会运动或者科学信念都会提供这一切。颅相学的有利之处在于，它关于象征和比喻、力量和相对潜力的核心条款使得我们首先可以把这门科学当作一种世俗宗教。^[86]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认为，大脑可以触及的隆起及其内在象征结构，不仅与社会体制有关，是理想化的社会关系形

象的外在形式,而且也是组织人类活动及其经历的模型。由于这些隆起非常典型地带有个体的、隐秘的、普通的、易变的、“真实”的性质(因为它们具有外在可以触摸的经验性特征),因而它们可以被人们欣然接纳。但这种接纳却使人们同意以某种方式解释经验;如果人们并不完全赞成某种“具体化的”结构,并且没有完全或部分地受到某种“自然的”行为倾向的影响,那么至少人们同意让某种其他类型的倾向变得模糊不清。颅相学因而成为弗兰克·帕金称之为“大众意义体系”的一部分。^[87]人们越体会到它是真理,就越被束缚在它把现实当作唯一真理的阐释之中。下面就是一个皈依颅相学的典型例子:

我的经验以及我从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事实,与我阅读[《人类体格》]书中的描述是如此彻底地吻合,以至于我无法驳斥自己的判断:颅相学有着科学基础,我也无法在这一结论之外得出其他的结论。^[88]

这是一位中等阶级妇女的体验。中等阶级妇女是积极参加颅相学演讲会的另一个忠实的听众群体,其地位仅次于工匠。上面的例子是这个群体的一个典型。^[89]这些妇女中的大多数也和工匠(以及儿童)一样,她们在城市工业社会中的角色也面临着被时代抛弃、遭到冷漠伤害的危险。她们想知道社会关系是有其潜在秩序的;她们也想得到确切保证,那些关系是天生的、不受约束的;她们还想知道她们是拥有自己权利的个体,其权利与世间万物的天然安排是密不可分的。^[90]颅相学满足了这种宗教性

的“对清楚明白的追求”，即对经验世界进行描绘使之与紊乱无
191 序相对抗并通过大脑的符号对自然、社会和日常生活进行定位
的需要。人类学家克里福德·格尔茨曾写道，

对于那些能够信奉这些宗教符号的人来说，只要他们相信，
这些符号就会提供一种极其强大的保证，不仅能让它们理解
这个世界，而且当他们理解世界时，还能使他们准确地知道
自己的感情，确切地了解自己的情绪，这可以使他们以一种
种忧郁或快乐、冷酷或傲慢的态度来忍受这个世界。^[91]

颅相学符号体系的强大保证不只是使得制度化事物被人们随心
所欲地接纳或拒绝：它们是传播秩序差别性的特殊理想化状态
的符号，一旦这种符号被人们接纳，这种秩序就无法反向思维。
它们并不具有作为特殊社会体系的绝对同形体的功能，人们也
从来没有“设想”它们能有这样的功能；颅相学的头颅图解经常
被称作“符号图表”是一个令人好笑的讽刺；这些符号的真正文
化工作——它们对理想化的社会形态和功能的翻译——被人们
不加批判地、草率地当作关于自然的真实知识。^[92]

因而，断言接受库姆颅相学的人从心理上“受控于”颅相学
对大脑现实的阐释，并不是一种理论阴谋。接受颅相学，在许多
方面可以与耶稣的受难或者印度教中湿婆神的形象进行类比，
它们都是关键性的象征符号。然而，从理论上说，把这些大脑示
意图解释成现实指南，就是接受符号的权威性，并让自己与那种
用其他不同的方式来建构或重构心智—社会现实的可能性隔绝

开来。赫兹利特在 1829 年痛斥颅相学时,曾触及到这种联系的一个重要真相。他把颅相学的头颅比喻成欧文在《泰晤士报》报眉刊登的模范村的木刻:“在那一瞬间”,赫兹利特发现,“每个读者都对欧文的体制有了视觉证明;木刻就是事实,清晰可见而且触手可及……头部的隆起与此类似,也是事实”。^[93]当然文本说明也起到了强化作用;但是可以认为,这些栩栩如生的视觉印象在潜意识中证明了这些符号本身是真实的。因而在潜意识(被称为“意识形态的残留”)^[94]之中,天然符号的权威能够被人接纳——这种权威也就是有关理想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一种具体的心理元语言的权威。与此相随的是对个人心理更基本的评估,以及颅相学对智力的两方面赞颂(一是把焦点放在头部,一是通过大脑对劳动进行等级分工,在这种分工中智力官能和反射官能优越于感觉性和动物性官能)。这样,学习颅相学的工人阶级就不是直接接纳赤裸裸的统治阶级意识,而是开始接纳取决于而且暗含于占据主导地位的物质关系的意识形态结构和优先权——这种接纳同样有力地强化和规范了资产阶级资本家的社会关系,并对工人阶级决定自己社会利益的能力设置了强大的知觉障碍。^[95]

通过这样来思考——即把颅相学当作意识形态的神秘中介,而不是当作对意识形态的拙劣的合理化解释——颅相学没有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压迫工具”就毫不奇怪了。就像它自身的实际情况一样,这门科学超自然地存在着,它无须去证明除它之外的其他选择。颅相学关于功能、发展、和谐、秩序等等的比喻不仅不是社会意识的产物,而且,只要它们还只是基于生理“事

实”的推测,就根本不是比喻。因此,它们不可能用来辩论。与此类似,我们只能从历史的角度去领会颅相学的智力头脑存在于一个特殊的背景中:以往手工业中的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融合状态正被分离开来。当时,在这样的背景中,无论是颅相学家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完成一系列的抽象过程,这种抽象过程是衡量被文化资源调和的意识力量所必需的——文化调和观念本身也是一种抽象。

因此除了其修辞之外,颅相学通过对现实的界定,使它的接受对象留心社会现实中当时正在构成的某些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当专业化分工——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之间的相互依赖被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时,在那些努力实现他或她自己独特的个人能力的颅相学学员看来,颅相学是世间最“自然”的事物。同样,当人类生活的合法性被认为不是源自个人与其他同类的关系,而是源自个体的人与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阶级调和)的社会的关系时,在普通人民中很流行的传统社会话题:正义、自由和暴力反叛等,很容易被遗忘。在免除了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实质性二元分裂之后,生物学的正确光芒可以指引人们认识更多与下述类比相似的重要区分:适应与不适应行为,正常与异常功能,正常与病态等。人们的注意力转向这些概念(却没有认识它们的人性结构),并从“自然权利”和“社会构成”等观念上偏移出去;他们开始根据自己适应大脑结构所规定的自然秩序的程度来评价自己的生活。加入这种独立秩序并把大脑对劳动的分工“作为评判对错的标准”,^[96]并不是要加入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反抗剥削的社会;而是要扮演一个适应小资产阶级自我改

良的本能的竞争价值的角色，由此把工人阶级抛在脑后。

当葛兰西提出了**霸权**概念并以此反击功能主义社会理论时，他关注的正是这种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神秘化。他发觉，阶级剥削和利益冲突受意识决定与日常生活相遇，尤其是每天与知识相遇，普通人民就会看不清其真相。雷蒙·威廉斯对此进行了详述：“霸权”既不是指明明显顺从统治阶级观点，也不是指简单地操纵人民接受“错误的思想意识”；霸权的所指远非这些，它指的是现实的完整性、我们的行为和期望的整体——即

我们对能量的分配，以及我们对人的天性和人的世界的一般性理解。它[霸权]是一组意义和价值，当它们在实践中被人们体验时，似乎是互相确证的。因此霸权让社会上的多数人感觉到了一种真实感，一种绝对感。^[97]

信仰颇相学，也可以说是信仰一种以头脑为主题、以有所保留的理性为训诫的宗教，这种信仰是人们到达现实世界的通道。如果颇相学的修辞利用了工匠意识中的某些裂痕，那么这种颇相学的主题就可能使工匠通过自己的意志堕入“错误的意识”中，这种“错误意识”也因为他对新的社会体制的“真正”兴趣而不再是“错的”。正如一位颇相学拥护者所说，仅仅通过学习一门“以和谐和简单为特色的”科学，学员们就发现在自己面前打开了“有用而且有趣的广阔天地”，随着学习的深入，他们会发现“永远新颖而且日益……显现的观点得到最多的扩充，也是最令人愉快的；这一切以一种与学习者的个人发展成正比的速度不断

地增加”。^[98]19世纪最流行的科学知识不仅通过其心理操纵对社会控制作出了贡献,而且对植根于社会期望的社会心理的成熟过程也作出了贡献。颅相学最终成为现代工业社会中完全与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格格不入的思想体系的象征,它非常出色地阐释了经济决定一切的现实,以至于这种格格不入的思想体系本身也成为不言自明的真理。因此,尽管大多数人完全被排斥在权力之外,改革家祝贺“人民”成为“唯一的合法力量的源泉”可能不再是修辞性的话语,而似乎是现实。^[99]

卫理公会式科学

因此,“制造业哲学家”尤尔是正确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教程本身并不能向人们灌输服从的观念。但是他认为“关于来生幸福的崇高教义”不仅必然会提供“服从的动机,而且也提供服从的形式”,^[100]则是错误的观点。诸如卫理公会等流行宗教中,并不仅仅只有来生能够解释人们的顺从;除此之外,由于大众颅相学向人们提供了一种在今世生活中拥有未来幸福的学说,很显然它也可以非常有效地确立那种有助于人们在社会上进行正确自我控制的模式。

卫理公会和颅相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互相重叠的。从教义来说,它们都包含了矛盾,也正因为如此,它们的吸引力才增强:尽管它们都继承了加尔文主义的特征,却都实现了合乎福音的阿米尼乌斯教派的乐观推论,即人们有可能在俗世成为完人。颅相学就像卫斯理对基督教的评价一样,是一种“社会宗教”,而且

“优秀的著作”、进步、财富的积累等能证明宗教拯救的外在证据,也同样适用于科学。^[101]根据颅相学的说法,一个人的道德名望是大脑内在状态的外在证明,也就是说,心智官能使灵魂具体化。加尔文教的教义“逐步净化”是追溯那些命中注定的上帝选民之所以被上帝选中的依据,每个人都可以(就像卫理公会那样)通过改善心智官能而发现,它能够在通过道德纠正所达到的幸福或俗世救赎状态中得到反映。上帝给予特别眷顾的教条曾在1781年被卫斯理遗憾地认为“完全过时”,现在也通过这门知识卷土重来。^[102]有人就断言,只要撩起前额的头发,颅相学就能找到这种上帝眷顾的外在证明。而其他前额长得不太好并且物质生活不太舒服的人虽然也声称,随着头盖骨的实际改善,可以发现这种“逐步净化”,但他们可能对这种原教旨主义习俗表示不满。^[103]然而,后一种观念并非绝对清晰明确,它遭到了生理学的辩驳;因此,只有良好的行为、勤奋工作以及为获人尊敬而不懈付出的努力等日益被当作内在道德的真正体现而得到重视。所以,与卫斯理把重点从“与神同行”转移到“把耶稣的形象深铭于心”一样,^[104]颅相学中的进步伦理日益深刻地植根于——从生物学的角度而言——人的个性之中。颅相学越来越像卫理公会,成为一种从人们自身寻找社会安全感的宗教。因此,新教的“你应该”在面对未经改革的教派所提出的“你不该”时,通过这种科学方法,也成为像卫理公会那样强调自我约束的“你不该”。因而颅相学这门科学和卫理公会在同样的工匠阶层和妇女阶层中都拥有大量信徒也就不足为奇了。^[105]

但是颅相学和卫理公会的成功主要依靠的并非其特殊教

义,而是人们在社会大背景中的经历,其中最常见的经历就是城市工业化的变化和人们的适应。颅相学和卫理公会一样,依靠在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之间进行调和的能力而获得成功。^[106]但是颅相学却通过更进一步地拓展其现代化的方面而胜过了它的教派伙伴卫理公会。颅相学家在加尔文的足迹和卫斯理的影响下继续前进,为了让人们简单直白地理解颅相学粉碎偶像崇拜和教条,他们鼓励为数众多的人民成为(或者乐于做)唯一神教派的詹姆斯·马蒂诺所谴责的“纯粹的反超自然主义者”。^[107]对于这样的人而言,《人类体格》,就如同霍利约克所描述的,是“一本新的实用伦理的福音书”,它在很多方面是威尔伯福斯所著的《实用基督教观点》的俗世班扬式对等物,而《实用基督教观点》以前曾使得中上等阶级皈依基督教。^[108]但是,这种新的信仰“相信的是人的虔敬,而不是上帝的存在”,唉,它不仅将令人恐惧地使人民受制于专家们所界定的“进步”方式,而且也令人恐惧地让人民自己对这种进步负责,根本没有由上帝来进行未来判决的希望(就像卫理公会那样)。问题难就难在这里:尽管颅相学使得那些也相信宗教末世论的唯理论者可以赋予存在以及重新塑造的身份以意义,或者通过保持自我来与城市工业社会的无名和无序进行斗争,^[109]尽管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既是一种解放也是一种安慰,但是,这个世界在工业化的影响下越是专制和反常,人们就越是依赖颅相学,以此探求自己生存于这个工业化世界的原因;而颅相学愈加被人们依赖和研究,异化就愈加显得自然。^[110]换一种方式来讲:尽管被这门学说所吸引的大多数人可能几乎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向上的社会流动(因

而他们也没有真正的理由去合理解释资产阶级关于开放社会的虚假神话),但是颅相学通过大力宣传进步伦理促使它自己必须对随之发生的异化进行合理解释。事实上,通过引导人们探索自身的“真正天性”并使自己与这些天性相符合,颅相学使得这个问题恶化,然后又为人们提供了神奇的解决方法,而这个解决办法其实又是一个会导致问题的结构的间接复制品。作为一种通过个性和理性来实现自我启蒙的激进形式,颅相学堪称弗洛伊德学派的先驱,它使得现代生活的异化变得可以理解,但是它所提供的不过是作为解决办法的合理解释而已。

哈里雅特·马蒂诺本来应该不会把颅相学理解成卫理公会的世俗形式,但是她与其兄弟詹姆斯不同,她完全认为人们从这门科学中获得了宗教般的满足,而且这种满足有益于新秩序的稳定和进步。她对“无知者”从《人类体格》中发现的真理进行了独特的描述,他们把这部著作当作“就好像降临到身上的新启示”,他们就像“对待神启一样委身于这门学问。”她观察到: 197

他们了解到,他们的身体是宇宙的一部分,由物质所构成,受到人类必须遵从的法则的支配。对他们而言,人类通过学习知识和自我管理能够自主控制自己的健康和思想的发展,是一种新观点。他们以前认为自己置身于俗世之外,就好像他们与其他的生物不同,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其天性和品质无法理解,而且也与自然法则毫无关联。^[111]

用宇宙论的术语来讲,这就是颅相学家的自然宇宙,它是把无知

者从长期以来的异化和不幸福状态中拯救出来的必由之路。其策略就是教会所用的策略：提供一把能打开唯一的救助之门的钥匙，这扇门能够把人们从人为的危险中拯救出来。为了追求幸福，皈依这种宇宙论的人必须接受那些使“自我管理”的行为规范进一步神圣化的态度和伦理，进而使自己作为个体与那些有志于规范其行为的人联系起来，因为这些行为使得他们的异化继续存在，并且使得他们无法了解现实的全部真相。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呢？对于某些工人而言，这可能不仅仅象征着用自然来替换上帝，而且也象征着唯物主义者集体世界观的实质性毁灭，这种世界观强调人在已经驯化的资本主义环境是绝对孤独的。有什么可以补偿？——一种对异化的合理解释；一种比旧的宗教所创造的任何事物都更加坚强和神圣的道德以及通过克服混乱、通过自我控制而获得的幸福。

然而，人们很少这么消极地体验颇相学。只需依靠它纯粹的奇异性，它就使普通人民离开其日常轨道，就像人们通过精神分析、摇滚音乐或者占星术就可以通过自我发现来尽情追求自我满足感一样。实际上，曾经用来解释维多利亚早期其他“教育宣传家”之所以很少触及工人阶级的理由，同样也是解释颇相学家更为成功的最好理由：绝大部分工人阶级对学习并不感兴趣，他们需要的是娱乐；他们的思想主要来源于经验和现实事物，而不是理性；他们的正义感和尊严感很强；而且他们比较偏爱源于他们自身的自然而不矫饰的知识，或者那些似乎与他们比较接近的知识。^[112]通过性刺激，通过造成关于秩序和意义的清晰印象，通过提供有关生存和人生进步的似乎至关重要却又很容易

掌握的实用信息,以及通过平民论者的煽动性语言来唤醒民众等方式,颇相学再次唤醒了根深蒂固的人相观念并重申大众文化中的说教性旧习惯,但是在大多数工人阶级看来,颇相学并没有虔诚地证明工业资产阶级社会的合理性并加强它的凝聚力。如果它看起来确实歌颂或保护了什么,那么这只能是:掌握关于自身性质的真正理论的“权利”,发现和发展个体作为人的潜力的“自主权”,以及努力在公认的不公正、不平等的世界中获得成功的“自由权”。



第四部分

199

激进派的挪用与批判

我们的无知使我们无法评价，理性主义者对科学的兴趣以及他们对构成科学性质和目的的阐释，与那些喜欢科学或是对科学感兴趣的人们所认为的方法方式有着多么大的距离。

苏珊·巴德：《各种各样的无信仰》

(1977)，第 126 页。

霸权尽管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并没有对人们的生命观形成全面的影响，而仅仅是遮蔽了人们的眼睛。这种遮蔽在某些方面限制了人们的视力，但在其他方面却清晰透彻……。至于一个从属的阶级能否形成一种对统治意识形态的连贯性的知识批判和超越霸权限制的策略——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似乎是一个历史问题（即，对历史证据可以提出很多不同答案的问题，有些答案仅有细微的差别），它不是在“理论实践”中提出看法就能解决的问题。1790 年和 1850 年间英国工匠和工人中存在的“有组织的

知识分子”数量绝不应该被低估。

E. P. 汤普森：“18 世纪的英国社会：
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史》
1978 年第 3 期第 164 页。



第七章

理查德·卡莱尔和异端科学

观察[雅各宾激进分子]推荐自然史研究……的热诚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人们无法轻易地看出这种热诚与其公开目标——人的幸福之间有什么联系。

约翰·鲁宾逊：《针对所有教派和欧洲政府的一个阴谋的证据》，都柏林，1798年第5版，第527页。

很明显，学者们探求知识和记录知识是不尽相同的，各有各的目的。我现在特别要谈的是科学知识，而不是应用知识或实用艺术。

J.J.加思·威尔金森：《一切为了科学》
(1847)，第3页。

如果说传播科学的优势相对于其他知识形式而言，是在价值中立的幌子下使得具体的社会和政治利益合法化，那么其他知识形式将会通过同样的知识体系导向根本不同的目标，这种

危险是显而易见的。那些企图采取此种方式的人就会单在言辞方面加以捍卫,作出回应。他们就会声称科学是中立的,是真理,不属于任何一方(当然,他们往往声称自己代表了真理的一方)。如此一来,达尔文的思想就被那些诸如美国的敛财大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缔造者和英国费边主义者“合理化”地分解和利用。于是乎缔造出墨索里尼、拉姆齐·麦克唐纳和彼得·克鲁泡特金等不同人物。与此类似,18世纪早期,就在牛顿主义者的新科学文化开始认可对于国王和教会的天命信仰时,不太相信这种天命信仰的激进分子却利用同样的知识来提倡自然主义信仰,相信那些纯粹的人类制度、共和政体和私人共济会组织。此外,在18世纪末的法国,许多激进分子试图把催眠术疗法与梅斯梅尔*区分开来。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从中推导出一种激进的政治理论学说。^[1]

19世纪,颅相学也同样被各种激进分子用来支持与库姆派颅相学家不同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目标。正如第三章所讲,这么利用颅相学既极端又具有社会争议性,正统颅相学家很担心与其产生联系而被控负有责任,因此竭力控制颅相学的科学用途,试图使颅相学与维多利亚早期关于声望的社会标准保持更为严格的一致性。相反,激进分子(这里主要指工匠,他们被认为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通常的反应是,竭力把他们对于颅相学的兴趣与资产阶级支持者对颅相学的兴趣区分开来,并对后者那

* 梅斯梅尔·弗朗兹(Mesmer Franz)是早期催眠术(mesmerism)的提倡者。——译注

种公然的宗教及世俗卫理公会式地利用颅相学表示质疑,认为那是反动的“滥用”。在本章以及下一章中,我们将探讨激进分子与颅相学不期而遇的某些特征。

首先需要说明一下,与人们有时候的设想相反,19 世纪初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科学“激进分子阵营”。和 19 世纪初的工人阶级激进文化一样,激进分子对科学和科学家的态度是多变的,这证明了传统观点和新观点的混合,也证明了这些观点不断变化的性质。1824 年,威廉·汤普森认为:“知识不再是劳动的侍女,它几乎全方位地反对劳动,不仅隐藏了从劳动者那里盘剥而来的财富,而且为了使劳动者变成完全机械化的顺从的劳动力,系统地欺骗和引导劳动者误入歧途。”一些激进分子可能注意到了汤普森的描述,他们热衷于在工人阶级中传播和普及科学,目的就是终结大脑与手之间的不统一以及劳动人民随之而来的地位下降。^[2]19 世纪后期,令人痛苦的明显事实是,“思想家和科学家给予我们的伟大力量仅仅是扩大了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不平等”,^[3]但是在最初几十年,许多激进分子仍然满怀希望地认为,如果工人能够以一种不脱离社会政治、社会经济斗争以及人道主义道德的方式获取科学知识,那么他们就能够维护自身的尊严、价值和自立,而且能够更好地武装起来与蒙昧主义和社会不公作斗争。^[4]但是,其他激进分子则认为,尽可能避开科学是更明智的做法。对于某些人而言,到 19 世纪 30 年代,很显然,科学标志着雅各宾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事实上的结合。某些资产阶级科学论者放弃激进主义的目标使得这一点更为清晰。据报导,曼彻斯特的工人在 19 世纪 30 年代初曾发表过这

样的声明：“我们正急切地寻找一种新的社会组织体制，它应该与时代的发展道路和谐一致，布鲁厄姆男爵却想用袋鼠来堵住我们的嘴。”^[5]但在其他情况下，怀疑和厌恶源自科学本身。理查德·李的《人类》是19世纪30年代初一份很受欢迎的激进杂志，它在首页指出：“科学本身还没有完全摆脱习俗和自负的不良影响，……多多少少带有现世的偏见。”^[6]但是，其他激进分子（其中，理查德·卡莱尔，本章的中心人物，通常被视为典型）在反驳资产阶级科学论者的同时，却把科学“本身”看成中性力量，“……是抵制专政暴君和神权宗教的致命力量”，^[7]而且他们过于急切地如此利用科学的这种力量。还有一些激进分子，开始把正统唯物主义科学当作恶劣的资本主义工业技术环境中毫无精神目的和精神意义的象征。1831年，兰开夏的激进分子、斯威登伯格信徒罗兰·德特罗西尔在给分裂后的曼彻斯特新技工学院的学员作公开演讲时声称：“科学创造了财富，但使人完美的是道德。”^[8]这种立场受到了不信奉国教思想的激励，与之密切相关的通常是对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科学概念的厌恶，这种科学概念始终带有傲慢自大、精英主义和人为抽象的特点。^[9]19世纪初反抗这种科学概念的激进分子可以看作是18世纪晚期法国雅各宾派（他们在1791年处死了拉瓦锡）传统的追随者。^[10]但是，他们通过利用无法感觉的“活力原理”来重新调查科学，把对科学以及科学家的否定与根深蒂固的对科学进行民主化和人性化的欲望联系在一起，在这点上他们更多地继承了17世纪的掘地派和泛神论唯物主义者杰拉德·温斯坦莱的传统。^[11]这样的欲望，特别是反机械论的活力论者的欲望，在19

世纪初将使得某些激进分子深陷新柏拉图主义神秘而深奥的传统之中,这同 18 世纪的情况如出一辙。“科学”和“玄学”之间,或者说理性和感性及美感之间的区分,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初曾经从社会和文化方面得到牛顿机械论的强化。这些激进分子和此处我们将要讨论的人一样,对于上述区分的根源并没有连贯的历史认识。但是,他们对现实日益异化的碎裂所作的批判,他们试图把现象的自然界融入人为的社会中(进而改变自然本身)的努力,使他们渗透到了现代科学理性主义的核心。^[12]

因此,很显然,我们不能断言,19 世纪早期所有的激进派都盲目信仰资产阶级实证主义科学。保守派把激进派描绘为年老的科学骗子的任性子女,但是激进分子很少符合这样的形象。^[13]不仅是他们对科学的兴趣超越了纯科学主义,而且,一旦科学被尊崇为社会、政治争论中的有力工具,这种尊崇并不一定需要去认可统治阶级关于自然现实结构的所谓客观看法。^[14](很有可能,科学仅仅被用来限制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15]当然,可以认为,激进分子对科学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现行观点,即只是“在突然之间,人们才醒悟到,科学和技术是……权力的最新表述,那些掌握科学和技术的人成为新的支配者”。^[16]

尽管激进派早在 19 世纪初就已经觉醒,如果认为他们身上有着 20 世纪激进派对于科学的批判意识,即把科学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化身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调停者,很显然是幼稚而且犯了时代错误的做法。就算我们假设某些激进分子能够接受这样的观点,他们也不可能进一步发展这种观点,主要是因为他们缺乏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科学批判的先决条

205 件——关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历史考察。一般来说，这个时期的激进分子宁愿去努力解决“如何改善社会状况”的问题，也不愿去苦苦思考社会起源的问题。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即便是在早期社会主义中，批判主义也只是触及“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还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早期社会主义者对待资本主义科学的态度就如同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最好就是“简单地把它当作坏东西抛弃掉”。^[17]

因此，毫不奇怪，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神秘调和物，比如颅相学，并没有在本质上受到 19 世纪初激进派的批判，公认科学的理论重塑也没有受到攻击。一些激进分子竭力纠正库姆的“寡头错误”，即道德和智力官能在颅相学中占据的支配地位，但是没有人想要打击心理学概念本身。某些激进派之所以拒绝这门科学，主要是出于对这门科学的某些用途以及某些宣传家的反感。因此，专心研究高尔的大脑理论和性格科学的激进派和那些利用（或忽视）达尔文思想的人一样，他们既不像潜心于牛顿思想的激进泛神论者，也不像潜心于催眠术的法国激进派，他们别无他法，只有再现大脑现状的“官方”观点——它对资产阶级结构和关系的调和。仅仅拒绝这门科学的某些用途并替换其他用途，不仅不能排斥事物的精神特性，相反，将会予以再现和强化（但是，这不等于说，使用者必然会受到现实的工具性操控）。激进派在多大程度上实际接纳颅相学并把颅相学内化为真正唯一的人性科学，仍有待考察。尽管如此，作为资产阶级建立霸权的威胁，激进派对颅相学的控制最终仍是有名无实。

但是仅仅从维多利亚时期资产阶级霸权“最终”建立的视角来研究激进文化中的颅相学历史,会牺牲很多具有历史价值的东西。特别是,它会使我们忽视颅相学对于研究激进文化中的科学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实:高尔的思想既不同于牛顿也不同于达尔文的相关学说。首先,它们既不讨论物质世界,也不讨论猿(或“袋鼠”),而是讨论更为重要的人类思想的内部隐秘特征——是最崇高、最神秘的知识分支。其次,正因为如此,高尔的思想不仅具有社会争议性,而且从经验主义方法论角度来看,也具有科学上的非正统性。颅相学试图对现实及其内在结构进行全面而统一的解释,用孔德的话来讲,颅相学这么做使得它的“神学性”多于“科学性”。尽管19世纪还没有其他大脑理论和性格科学可以与颅相学相提并论,但是,作为“科学”的颅相学(不同于库姆式的科学主义)总是停留在“另类”的位置上,或明或暗地挑战着传统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准则和权力。(在这方面,颅相学更像催眠术,实际上,它在形式上也开始与催眠术联系在一起,并且受到一些激进分子的热烈追捧。)19世纪30年代后期,设菲尔德的欧文主义者呼吁在他们的科学会所中除了颅相学以外,暂停所有科学讨论。这里,把颅相学作为一种有可能对抗正统科学和社会的“另类”来看待,似乎很明显。^[18]尽管我们发现,实际上只有很少一部分激进分子这么看待颅相学;对于这一小部分人而言,就像李森科的农学对20世纪苏联思想的影响一样,颅相学能够从历史角度被理解,就在于它是一种科学理论和实践,能够恰当地应用于某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被有意识地当成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另类的社会结构和

社会关系。^[19]

但是,如果说颅相学的科学非正统性对于理解其在前达尔文时期激进文化中的地位至关重要的话,那么很明显的推论就是,从历史角度看,颅相学对于总体理解这一时期的激进派对科学的态度,远比化学研究和天文学研究更令人怀疑。然而,可以认为,正因为颅相学的科学非正统性所造成的历史问题,才使得它在阐释激进文化中科学的公开或隐秘的社会和思想功能时成为最有用的学科。作为一种关于精神结构和思想特性的“另类”²⁰⁷或非正统的知识体系,颅相学进入激进文化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反权威主义话语的形式,而且从社会和认识论的角度看,它也是对正统资产阶级科学和社会关系的一种批判——这种批判包含着人道主义、反实证主义的一面。(我们发现,某些激进分子认为有必要把颅相学本身整合进去的,正是这种批判。)与此同时,就颅相学被视为牛顿物理学在精神方面的对应物而言,它反复灌输了对于实证主义科学观的敬重和服从;在这种科学观中,科学高高在上,远非社会和意识形态批判所能触及。因此,颅相学在不同层面上同时扮演了武装和解除武装、解放和压制的作用。结果,颅相学为人们同科学进行彻底交锋的范围和结构作了一个非常好的介绍。

然而,由于那时候激进文化的多样化特征,我们唯一能够说明颅相学卷入其中的多层特性的方法是,详细阐述特殊的工人阶级激进派卷入其中的情况,并努力把他們与变化中的宏观和微观的物质、社会环境结合起来,就像我们先前论述资产阶级卷入其中的情况一样。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历史的公正性和

历史编纂的公正性,即科学在激进文化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等被人忽视的复杂性所要求的历史和历史编纂学的公正性。因此,本章其余部分将研究理查德·卡莱尔所从事的颅相学事业。理查德·卡莱尔是19世纪20年代激进运动的中心人物,也是英国第一批对颅相学产生浓厚兴趣的激进分子之一。为了说明颅相学与19世纪三四十年代激进运动的关系,下一章将集中阐述罗伯特·欧文和欧文主义者。

理查德·卡莱尔*(1790—1843)

表面上看,人们对于理查德·卡莱尔之所以对颅相学产生兴趣的种种解释根本没有问题。卡莱尔是一位“自由思想的斗士”,他认为托马斯·潘恩的著作“比培根、牛顿和洛克加在一起的价值还要大”,坚信“单靠文学和哲学……就能让世界变得完美”。对于卡莱尔来说,颅相学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种唯物主义学说,可以用来支持反教会的共和主义。^[20]出于这个目的,颅相学 208 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是一种“另类的科学”,相反,却在于它是一块在科学上无可厚非的、地道的、传统的真理试金石。因此,当威廉·劳伦斯在1823年向他介绍了这门科学以后,卡莱尔对它的最初反应是有保留的。他不能确定颅相学“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他坚信,如果颅相学是一门科学,那么根据它对“宗教……独特器官”的划分,它的“描述就是错误的”。^[21]1826年,他阅读了阿伯内西论述高尔和施普茨海姆的文章以及福斯特的《躯体心理学》,并微服私访了位于伦敦斯特兰德大道上的德维

尔颅相学商店。直到此时,年已 36 岁的他开始感觉到,颅相学能破坏笛卡尔哲学中精神和大脑的二元性,并把人牢固地置于动物体系而不是把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生物,因此颅相学能从理论上为无神论或唯物主义科学提供无可辩驳的新证据。^[22]至 1828 年,对卡莱尔来说,颅相学对人类精神、自由意志及其必然性等根本性问题的回答,它赋予世俗道德哲学的坚固基础,以及它强调人的灵魂“并不在道德之中,而在**身体结构**中”的教诲对于真正的忍耐所起的引导作用,似乎都促使它成为“大众作家能够加以利用的最重要的学科”。^[23]为了实践他所倡导的东西,卡莱尔踏上了颅相学之路,1828 年 7 月他在曼彻斯特发表了第一次颅相学演讲。^[24]

卡莱尔关于颅相学重要性的结论,正统颅相学家几乎不可能表示异议。但是,历史学家只有在表面层次上接受这个结论并完全把它与其语境分离开来,才能大胆地推测卡莱尔的颅相学旨趣与乔治·库姆的颅相学旨趣之间的密切联系。隐藏在卡莱尔旨趣背后的力量,即便与库姆的《人体构造》所证明的并非完全无关,也必须视其为有着不同社会重心的力量,从不同的方向对其产生推动。值得注意的是,卡莱尔对颅相学兴趣日益增长的整个过程与正统颅相学家日益成功地让自己及其科学被社会所接受并被新生的“有理性的阶层”所尊崇的过程刚好同步。

209 卡莱尔通过重申颅相学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直接地公然违抗那些变化,对资产阶级启蒙激进主义以及雅各宾派对古老英格兰的批判所起的调和作用表示不满,尤其反对从社会宗教角度把颅相学驯化为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工具。因此,卡莱尔对

颅相学的兴趣远非仅是对诸如约翰·塞尔沃尔在 1793 年所作“以唯物主义体系解释精神行为的起源”的演讲中所表达的激进主义的一种大倒退,相反,可以把它看作对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秩序的警惕和敏锐反应。^[25] 1826 年卡莱尔曾谈及,当他“第一次接触颅相学”时,他是如何已经意识到颅相学的唯物主义含义,却认为“暂时或者在这门科学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稳定地位之前保持沉默是明智之举”,但是他承认现在有必要打破沉默,因为“我已经发现它遭到了一些愚蠢的(原文如此)宗教信徒的谴责;当我看到某些颅相学家试图从宗教角度为这门科学辩白时,我遗憾地一笑置之……(然而,这门科学实际上)正是从源头上打击了宗教”。^[26] 因此,卡莱尔开始抨击正在基督教化的颅相学家:首先,攻击戴维·韦尔什牧师论证圣经经文的颅相学证据;其次,攻击施普茨海姆,因为他故意(在他的《人类自然法则的哲学问答集》)吹捧基督教来迎合一些人的偏见,这些人发现或正发现劳伦斯传播的高尔的唯物主义哲学是完全或多多少少应该受到谴责的。^[27]

卡莱尔沉溺于讲坛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揭露和抵制那些“屈从于基督教教士权术”的“不称职的、错误的”颅相学家造成的影响。但这不是他的唯一动机。在 19 世纪 20 年代后期,在颅相学已经在英国取得“稳固地位”之后,卡莱尔通过挥舞颅相学唯物主义的旗帜,同时也是在试图竭力保持他对激进运动的影响力——他在 20 年代前期通过类似的无神论共和主义论证法所获得的影响力。当时,卡莱尔通过赞美托马斯·潘恩的思想,通过再版彼得·安内特的《自由调查者》、米拉波的《自然体

系》、霍加特·图尔明的《永恒宇宙》和伊莱休·帕尔默的《自然原理》之类的著作(《自然原理》连同《理智时代》的出版导致卡莱尔在 1819 年因为亵渎罪而遭受审讯,并在多切斯特监狱度过 6 210 年监禁生涯),他的贡献远非仅仅扩大了伦敦通信协会某些成员先前已经阐述的共和主义的唯物主义传统。^[28]当激进主义的热情尾随着卡洛琳王后事件以及西斯尔伍德因为参与卡图街密谋案在 1820 年被处决而渐渐熄灭时,卡莱尔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大大促成了激进主义事业的复活。当时,关于宗教的启蒙观念尽管广为人知,但即使激进派的大多数人也仅仅是私下赞同。^[29]在推动激进派最终形成关于宗教的启蒙观念方面,卡莱尔为新老正统派学说提供了刺激性的、正统的反作用力,它反过来使激进派产生了新的紧迫感。年轻一代的激进派,和卡莱尔本人一样,并没有太多地卷入“生而自由的人们”开展的艰难的立宪斗争、反税法斗争,但通过不同的方式迷恋着从 18 世纪 90 年代到 19 世纪头十年发展起来的被称之为“关于个人和社会不公的旧分析、老观点”。^[30]对于这一代激进派而言,卡莱尔关于异教的“生死攸关”的辩护尤其在他们心中激起了重要的激进主义使命感和团体精神。虽然卡莱尔在 20 年代“伦敦无产阶级的寒冷季节”里复活了这种反权威主义的号召力,^[31]但他既没有推进劳工事业,也没有推进公民自由事业,他(就像该世纪末继承他的非宗教论衣钵的人一样)试图使激进工匠的事业产生某种凝聚力,让工匠激进主义的呼声和愤怒能够穿越资产阶级法规建设的喧嚣,被人们听见。

但到 19 世纪 20 年代末,卡莱尔的科学极端唯物主义已经

丧失魅力,他的影响力基础受到严重侵蚀。1826年经济萧条以后,激进主义的调门和节拍发生了变化。新的激进主义虽然植根于前工业社会中小雇主和工匠的激进主义,并且仍然受到农业观念的强烈影响,却与城市工业中日益膨胀的没有技术的工资劳动者队伍有着更多的关系。总体而言,与政治原则、地下密谋协会、神学的非正统性和对贵族的攻击等问题相比,这种新激进主义关心的问题更主要是工资、生活条件、公开的组织 and 大量的成员等。早在1825年,托马斯·霍奇斯金在《受保护的劳动者》中就声言:“长期以来抛掷给封建贵族的责难,现在该到了倾泻给资本和资本家的时候了。”^[32]

然而,对于这种新激进主义及其发展,神学异端远非不合时 211
宜。在激进主义新背景下追求唯物主义颇相学就其本质来说绝不是反动。例如,对于激进的出版商詹姆斯·沃森、亨利·赫瑟林顿和约翰·克利夫来说,在1832年把劳伦斯的演讲集冠以《一篇关于大脑功能的论文》之名出版,并把它和潘恩、沃尔尼的著作、拜伦的《田赋》及《工人之友》等书籍的再版放在一起做广告,似乎毫无不当之处。^[33] 毕竟,无神论的使命,或者更广义的反对基督教的使命,本身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种策略:无论宗教作为社会凝聚力和离心力的真正源泉在19世纪是何等衰落,从科学角度对宗教的攻击一直都是象征性的,实际的攻击矛头却是权威,无论这种权威,就像卡莱尔所认识到的那样,是“君王还是教会”,抑或是没有多少传统的剥削性的资产阶级资本家的权力结构。例如,卡莱尔有一位运气不好的熟人叫乔治·皮特里,是废除私有财产的公开鼓吹者,他把科学看成破坏宗教的力量:

“哦，天堂般的科学！”他在著名的《平等》诗中写道，

……如果不是为了你，
我们最钟爱的希望永远不能抵达自由；
有了你，真理的光芒开始穿透
思想的地平线，开始驱散
那些至今密布的错误浓云
它阻碍人类去感知，即便是《常识》。^[34]

但据宗教来看，皮特里所指“不是介于人类和造物主之间的抽象物”，而是“使懒散、狡猾和奢侈逸乐的少数人能够尽情享受被掠夺的多数人辛勤劳动成果”的事物。^[35] 坚持否定原动力（the First Cause），就像卡莱尔和他的怀疑论追随者所做的那样，不仅仅是用现世现时的“天性和需求”去取代“上帝和天命”，并参与反对权威的行动。更重要的是，要从态度上把自己与仅仅使用反教权主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言辞区分开来。^[36] 虽然这种区分既没有在理论上详细阐述，也没有在社会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方面进行清晰表述，但人们却经常这么来理解它的言下之意。

212 例如，1845年，从前是泥水匠的威廉·奇尔顿在评论钱伯斯的《天地万物自然沿革的痕迹》时暗示，“唯物主义者和信奉《痕迹》作者（自然神论）观点的人之间在看法上的根本差异”在于，后者经过净化的观点属于“正统派”。^[37] 同样，卡莱尔反对施普茨海姆的《哲学问答集》，认为这部著作为了使自己看起来是宣扬正统社会道德和基督教之间的互为依存，阴险地将自然法则和上

帝法则混合在一起。^[38]卡莱尔完全同意施普茨海姆,认为颅相学具有提升道德的价值,它有着“通过改善道德的方法增加人类幸福总量”的倾向。但卡莱尔的理由建立在否定原动力或个体神性的基础上,这和施普茨海姆的理由不同。由于这种不同,卡莱尔的批判使得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道德—社会秩序变得有可能。因此,非但不需要接受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或者预先排除批评它的能力,极端唯物主义利用科学来反对宗教也能为根本性批判铺平道路。的确,它能鼓动对资产阶级科学本身的意识形态功能的批判。例如,生物学家 A. R. 华莱士年轻时在欧文主义者科学会所中从反教权主义的唯物主义角度对颅相学产生了毕生的兴趣,他在 1913 年针对工业社会中不平等的自然化著文批判道,与宗教一起,“科学[已经]赞成把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作作为唯一合理而可能的社会体制”。^[39]因此,可以说,卡莱尔试图通过颅相学加以发展的唯物主义所达到的效果,正好与帮助工人摆脱那些被激进分子费利克斯·霍尔特称为“与事物本性不相符的徒劳无益的期望和……思想”适得其反。^[40]

然而,在 19 世纪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的环境中,卡莱尔对颅相学的特殊利用抑制了这门科学对于激进文化的潜作用。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卡莱尔直接面对新激进主义时,他寻求的是利用这门科学来证明好学、独立、生而自由的工匠精英的传统价值是合理的,并试图加以保留,仅此而已。“能够从这门科学汲取的最重要的[即基本的]道德好处”,他该要重复他那与欧文主义者较少限制地应用颅相学的情况正好相反的观点了,就是它教导人们“改善自己需要改善的地方”。^[41]而在过去,潘恩激进

主义的主要背景是前工业社会,努力保留这些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对于家长制[神圣]权威构成了根本威胁,到19世纪20年代末,情况已今非昔比。^[42]卡莱尔的个人主义言论与新兴的监工过于类似,尤其是他对《人权》第二部分所包含的反对私有财产的政治思考和经济观点进行压制的言辞。^[43]工匠的“自立”是一种传统的反权威主义信条,它针对的是合作社成员和工会主义者。^[44]因此,卡莱尔用颅相学为这种传统的反权威主义信条进行辩护,将使他置身于经济学的关键位置,即,他将与颂扬日益放弃激进立场的小资产阶级个人自由主义崇拜的正统颅相学家结成同盟。虽然卡莱尔实际上并不赞成威廉·汤普森在1824年的《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中思考并反驳过的经济个人主义,但他依据颅相学对工匠独立性的辩护所造成的结果是相同的,因为他依据“每个人独特的器官构造表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而像科学家似的回避了平等主义。^[45]欧文要求他考虑合作问题,卡莱尔表示反对,“人类性情在颅相上的不均衡使得任何关于普遍合作达到平等的原则,在我看来,显然是不切实际的”。^[46]艾布拉姆·库姆、范妮·赖特、欧文等人所建立的公社最终解体向卡莱尔证明,那些“不满足于从言辞上攻击使社会堕落的迷信和专制”,企图做更多尝试而提出社会蓝图的人,“与那些一直在追寻人类千年至福或点金石的人相似,都是狂热的幻想者”。^[47]“我的看法始终如一,”他在1829年写道:“人类不是一种能够超越被迫合作的需求而主动合作的动物。在欧文先生的体系中,合作意味着行动自由,人类还不能适应这样一种目的,至少目前这一代的情况如此。”^[48]

卡莱尔反对欧文关于教养的力量高于天性的观点,他利用颅相学来巩固自己关于人类的看法,即,人类完全是有感情的动物,这种感情并不取决于教育,而取决于“动物的身体结构或特性”。^[49]这并不是要否定教育的力量,尤其是科学教育的力量,因为教育一直是卡莱尔的后援。^[50]这并非要否定良好的环境对心智产生的影响。更准确地说,是要坚持这样的观点:因为大脑结构的先天差异,从道德角度对人们进行再教育的唯一途径是因人施教。也就是,在需要的情况下,“对暴躁而凶猛的[情感]予以驯服,对没有恶意的意志薄弱者进行激励”。^[51]颅相学科学恰好证实了卡莱尔的信念,增加人类的幸福所需要的并不是大规模或突然而至的变化,而是“个体的组织和发展状态,个体必需……遵照道德哲学的目标行事并实现这种目标”。^[52]

因此,卡莱尔在1828年特别针对欧文的计划,提出了一项“改革新方案”。这项改革新方案的见解和适用性完全依赖于颅相学,它的要点与正统颅相学家的干涉主义方案几乎没什么区别。与正统的颅相学家一样,卡莱尔要求人们尽最大可能去关注下列事项:不仅要注意父母的般配(即“颅相、身体、道德和智力的对等,[还有]……年龄的对等”)和他们交媾的“时间、情绪和当时的方法”,而且还要保持怀孕母亲良好的身体和心理健康。^[53]特别是从孩子出生那一刻起,卡莱尔强调,父母必须了解颅相学,“与孩子已经取得的变化相比,或者与之前的所有知识相比,这门科学必将更好地改善对孩子的教育”。他指出,如果不掌握这种知识,父母将无法了解孩子的官能如何以及何时发育,或者说他们如何以及为何避免抚养孩子过程中的许多常见

215 错误。如果父母掌握了颅相学,无论用什么方式使孩子“长大成人”,都将是完美的,永久改善的种子已在孩子身上种下。

从表面上看,卡莱尔的改革新方案比欧文倡导的任何方案都更具可行性,但实际上这种方案的空想性几乎不亚于欧文。尽管他从来不接受库姆派颅相学家的观点,即“变化的发生将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他却无法否认,新方案要产生效果将持续“连续数代人的时间”。^[54]根据颅相学,卢梭的《爱弥尔》显然属于遥远的未来时代的产物——与欧文当时就实行的共产主义试验相比,这注定是一种不太激进的前景。然而,新方案并不一定比欧文主义更具有资产阶级倾向。尽管卡莱尔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他的抱负却和那些资产阶级自由派教育家并不相同,因为当他劝说工匠相信他们是独特的群体或者说他们形成了一个有特权的少数派时,他所寻求的并不是复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必要的等级制和专制的条件。^[55]也许,卡莱尔的目标有点天真,仅仅是创造出彻头彻尾信奉无神论的个体的人;而且很显然,他试图鼓励那种所有官能都得到平衡的心智构造(但他没有详细说明,这种主张与施普茨海姆、库姆等一群人的观点是相反的,他们赞成智力和道德官能的优越性)。但是,另一方面,卡莱尔仅仅采用颅相学具象化的精神官能概念,寻求个体的改良主义,个人对那些官能进行塑造是这种改良主义的基础。通过这些,卡莱尔与正统颅相学家在对人性进行抽象概括上保持一致,也就是把人性与思想分开,并把人性放在比人类的现实社会—经济关系更高的地位上。“人的大脑器官”[是]“由人类用手创造的”(马克思曾如是说),但卡莱尔却根本没有看到。^[56]然而在当时,

欧文也参加了这场没有对手的争论,他也无法理解这点。尤其是在欧文作为新拉纳克的实业家和教育家的许多年里,他促成了意识的物质化和人们对意识的疏离。正如科贝特在1832年参观过新拉纳克以后适时指出的,欧文的教育技巧“使头脑变成虚构之物”。^[57]因此,欧文和卡莱尔一样,也应该受到指责,因为他接受唯物主义教育心理学所造成的后果,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竟促成了资产阶级所支持的唯心主义人性观。 216

对于卡莱尔而言,颅相学是一种“把人生当作科学来研究”的手段,毫无疑问,在他追求这点的时候,他也有着和许多后启蒙时代的空想家一样的抱负,并期待梦想成真。^[58]不可否认,卡莱尔是有意利用这门科学的流行性来为自己争取发言机会。反击正统颅相学家奴颜婢膝的言辞是必要的,但无论这种必要性是多么合理,也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他只是在自己的名气衰退之后才对颅相学产生浓厚兴趣,1826年的他刚刚结束牢狱之灾,他的杂志《共和主义者》曾有一万多名读者,现在还不到十分之一。^[59]几乎可以肯定,保持自己在激进文化中的声望,是卡莱尔致力于颅相学演讲的背后动机。因此,他希望能介入工人阶级教育机构,否则这些机构对他是关闭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不再在宣传他演讲的海报上使用他的名字,并且集中精力在地方上演讲。^[60])

卡莱尔对颅相学产生兴趣的投机性一面也体现在他的讽喻基督教上。这是一种与千年至福相联系的混杂了比较宗教、东方神话以及以天文学形式出现的神秘象征主义的奇怪而晦涩难懂的混合物。神秘象征主义的提倡者是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

员,被称为魔鬼的教士的罗伯特·泰勒牧师。卡莱尔被泰勒所吸引差不多正是他对颅相学兴趣高涨的20年代末期。讽喻基督教和颅相学联手为卡莱尔构建了一种不信奉宗教的宗教狂热,无论是从其作为反超自然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的身份来看,还是从其共和主义视野来看,这种宗教狂热都与18世纪自由思想家的泛神论唯物主义很相似。^[61]卡莱尔在婚姻和自由思想论战中的伴侣伊莉莎·沙普尔斯*,与他持相同观点,并鼓励卡莱尔相信这些观点;从她1832年6月在布弗里大街演讲厅所作的“关于《圣经》的第9讲”中,我们可以找到例证来说明讽喻基督教利用颅相学的一种方法:

217

在当今世纪,有一种科学已被人们发现,并且得到系统研究,它就是颅相学。颅相学为圣经《启示录》的正确性提供了证据,野兽的标记和上帝的权威在两类人的前额上被区别开来。根据永恒不变的比较的力量和测试,颅相学认为,前额部分缺乏脑髓是判断无知的标准,这不仅是针对人类而言,也是针对所有其他类别的动物而言的。突出而垂直的前额是上帝存在的标志,是拥有的知识水平以及获取知识之能力的指示器。^[62]

从理论上讲,这样一种糅合了科学、宗教与古老箴言的原教旨主义混合物本应该是基督教科学成为大众欢迎的信条的秘诀。很显然,随着卡莱尔亲自站在讲坛上,这一点就成为卡莱尔通过讽喻基督教所要寻求的东西,他在1830年6月给欧文的信中对此

有明确表达。为了替他的宗教转型辩护,他写道:“如果牵着大众的鼻子,我们……能够……使他们改恶向善,我们为什么要阻止?”^[63]因此,目的被用来证明手段的正当性,无论这种手段是颇相学的还是圣经的,抑或是颇相宗教的。

然而,宗教的目的似乎超越了宗教的手段,至少在19世纪30年代的一段时期内是如此。或许就和19世纪40年代后期的孔德在情人克洛希尔德·德沃去世后从理性主义大逆转到唯心主义一样,^[64]卡莱尔思想转变的关键原因是他和沙普尔斯唯一的儿子在1833年10月去世。无论什么原因,其结果是,要把纯粹利用这些宗教概念与卡莱尔本人对它们的信仰分离开来,或者就如同前引沙普尔斯的演讲,把他们在辩解中所使用的颇相学分离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1836年卡莱尔给布赖顿居民所作的第6次演讲的一部分就题为“祈祷、忏悔和拯救的真正原理——运用颇相学科学作出的解释”,而沙普尔斯在“颇相学的哲学和神学”的演讲中对这个主题作了进一步阐述。卡莱尔在他的《政治纪事》杂志中为后者登广告宣传时声称:“宗教界担心颇相学敌视宗教。它敌视的只是迷信,没有其他。它与基督教的起源以及所有道德科学、自然科学是完全协调一致的。”^[65]

很明显,这是要抹去他先前曾坚持强调的无神论—有神论(原动力)的区别,把人类从他早先的托付物提升为纯粹的肉体生物。但这绝不是向反唯物主义“正统派”让步,也不是与施普茨海姆的宗教谄媚者阵营或库姆的自然神学、自然神论兼世俗论者阵营的再结盟。唯物主义者在新兴的资产阶级文化中对人

性进行修改,使之具体化;信奉功利主义的国家行政官员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辩护士正谈论利用自然神论的自然法则,为的是他们能把宗教同道德分离开来,并把自己打扮成新的神职监护人。鉴于这些,卡莱尔改变颅相学的用途,用个体神性去支持更加人道主义的有神论,可以想象,这比他早先仅仅从无神论角度利用颅相学更加具有反正统文化的意味。很有可能卡莱尔是意识到这一点的,因为人们知道他在这个时期与马格莱顿教派信徒^①和其他千年至福说信徒^②有联系。他熟知17世纪激进泛神论者约翰·托兰德的著作,而且人们也知道他对共济会规章有着广泛的了解,其中很有可能包括了对该组织过去曾有的激进泛神论一面的了解。^[66]因此,他把颅相学与神秘主义和玄秘之事结合起来,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对19世纪30年代已经变化的物质、文化环境作出的精心策划的激进主义回应。实际上,通过主张反迷信的有神论观点和神秘主义观点,他不仅继续对正统宗教所象征的传统秩序的社会、政治权威表示不满,而且也对客观秩序中新制度的自然神论合理化表示反对。

随着“激进泛神论”传统在19世纪的演进,我们很难辨明卡莱尔对这个传统感兴趣的确切性质以及他对这个传统所作出的贡献。我们也很难说明他对唯灵论和共济会的兴趣是否曾导致他接受更具有生机论性质的自然概念。卡莱尔把颅相学编入一

① 马格莱顿教派创立于1650年,属于英格兰清教徒成员,反对三位一体,相信圣灵启示。——译注

② 千年至福(或千年王国)的信徒指的是相信基督将复活并为王一千年的人。——译注

个提倡“普世兄弟关系”的有神论异端说传统。可以把卡莱尔看作许多接触了颅相—催眠术后的欧文主义者和 19 世纪末平民唯灵论者的原型。^[67] 219

但是,在卡莱尔身上,这方面的直接联系并不明显。实际上,总的来看,无论用不用讽喻基督教,卡莱尔对颅相学的利用似乎都没有对激进文化产生什么消极影响。毫无疑问,这没能使他重新获得他所期望的对于工人阶级的影响力。他试图作颅相学演讲,但多数被地方当局所阻挠。例如,1829 年,哈利法克斯的《商业编年史》警告,拥有适合演讲场所的人“面对类似于‘有一位绅士,一位颅相学演讲者,现在暂时需要租借这房子’的请求时,不要受诱惑而把房子租借出去;总而言之,我们恳请民众不要参与他们的演讲会”。^[68] 虽然卡莱尔在 1831 年仍自称“颅相学教师”,但这种新闻曝光可能缩短了他的演讲生涯。^[69] 至于他在自己的期刊上发表的颅相学文章,大多数都发表在《英国狮》(*Lion*)上,这是一份发行量很小的杂志,主要是为他的一个身陷囹圄的朋友,罗伯特·泰勒牧师,发表言论的地方。此外,读者给《英国狮》编辑的来信表明,即便在杂志的读者中,也不是所有人都赞成颅相学。1828 年 4 月,卡莱尔承认,有一些人“转而攻击我们,并说,你们的颅相学是一种迷信”。^[70] 一位自称“隐士”的工人说道,他阅读过高尔、施普茨海姆、麦肯齐等人的著作,听过德维尔的演讲,也阅读了《英国狮》杂志,但他认为他们全是错的。“事情走得太远了,其中有太多武断的东西。就算它的提纲是正确的,它的细节也是错的”。这位“隐士”直截了当地警告:“当事物的结果不需要杜撰一个原因也能得到解释的

时候,永远不要去杜撰这样的原因。”^[71]卡莱尔不久以后写道,“诸如颅相学这样有某些正确的普遍原则的科学体系,可能会被当成谬论”,也许他想到了这种警告。^[72]《英国狮》的另一位读者并没有驳斥颅相学的原理,而是急切地表明,对于民族和个人的性格产生影响的并不是颅相的发展,而是环境。这位读者在他的论据中引用以前的立宪主义激进分子詹姆斯·蒙哥马利*的一本反颅相学著作,预言戈德温关于颅相学的看法是狂妄危险的,而且剥夺了人性,因为戈德温树立了一个其他激进分子几乎没有明确表达的目标:颅相学并不仅仅“[提出]这样的原则,即自然界生物有着优劣之分”,而且体力劳动者不在优等之列。^[73]这与某种认识很类似,即,颅相学使得资产阶级从道德和知识层面对于“兽性”工人的支配变得合乎自然,而且,根据官能的分类,颅相学也使得劳动分工和劳动剥削变得合乎自然。在《英国狮》中,怪人皮埃尔·亨利·博姆*也提供了一个头骨学证据来反对颅相学,虽不引人注目却比较新奇。^[74]此外,这种反对、质疑和批判只是在卡莱尔丰富了他的讽喻基督教时才所有加强,因为卡莱尔用颅相学作为“上帝科学的基础”而使得讽喻基督教成为人类精神现象的化身。^[75]于是,正当孔德把克洛西尔德·德沃神化为圣母的精神象征时,卡莱尔疏远了大多数剩余的追随者,由于他太过急躁而未能抓住机会来证实激进主义和疯狂之间的结盟,他又被保守派抓住了把柄。^[76]

卡莱尔的自负似乎严重地误导了他,竟企图把颅相学当作重新获得工人阶级舆论控制权的便利工具。作为激进出版商,他推动了那个时代的大分裂(1829年的《颅相学杂志》就这么指

责他)。^[77]他作为激进出版商的声誉已经太牢固了,以至于他影响不到不太激进的听众,而对于年轻人以及先前的怀疑论者而言,讽喻基督教看起来不过是原则的总妥协而已。1833年《人类》对卡莱尔的描写令人瞠目结舌:

当我们得知,因为大胆而诚实地表达对宗教信条的怀疑而遭受9年监禁和18年迫害的人,现在宣称自己皈依人类迄今所写的所有邪恶的书籍中最邪恶、最淫秽而且最没有教益的道德[也就是《圣经》],……这是……匪夷所思的。^[78]

对于这枚伪造的硬币,19世纪30年代初很多左派所思考的这一面却变成了它的另一面——反对欧文,正是这点给卡莱尔的声誉造成了最大的损害。而且,也正是这点才使得卡莱尔对颇相学的利用被当作对这门科学的“滥用”。迟至1839年,在与欧文主义者劳埃德·琼斯的辩论中,人们认为卡莱尔是“为颇相学说话”。^[79]卡莱尔以前曾“大胆而勇敢”地反对合法当局,他曾经为自由讨论和出版自由权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但是到1838年,这些事实只是更加令人悲叹,在人们眼中,当前的卡莱尔“已经堕落……但他自己却称之为进步”。^[80]

根据19世纪末关于科学和宗教的著作已经过滤过的图景,19世纪初的激进派主要是把科学当作可以用来打击“教士权术”的工具。激进派大概没有注意到宗教已渐渐丧失社会的凝聚力,因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的科学反教权变成了对

实证科学和启蒙理性的盲目信仰。正如保罗·费耶阿本特所说：“相同的事业，曾经赐予人类以思想和力量，使其从暴虐的宗教恐惧和偏见中解放出来，……[最终又使]他变成[科学]利益的奴隶。”^[81]

卡莱尔对颅相学的兴趣在很多方面支持了这个论点，无论我们是把“科学利益”仅仅理解成一种排他性的科学理性主义传统（如费耶阿本德所指），还是从社会历史角度把它理解成由现代科学所构成的资本家的结构和关系。与他的良师潘恩一样，卡莱尔不是一个有创造性的、感觉敏锐的思想家，他很难被视为葛兰西所认为的那种“有机知识分子”。他对科学的理解完全不同于欧内斯特·琼斯。琼斯是宪章派，马克思的朋友，他认为科学是一种力量，其潜能的释放“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对权力的征服才能发动”。^[82]卡莱尔盲目地把科学理性主义当作政教分离主义，他也这样机会主义地利用了它。因此，就像其他历史学家曾经指出的，他赞成“本质上是自由个人主义者的‘资产阶级’立场，把主要指望寄托在想象中永恒的、固定的、特定的‘自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法则框架内的自我改造”。^[83]因此，他在1842年11月会历经艰难加入反谷物法同盟并申请成为其演讲者就不足为奇。对于这样一位在1828年就放言“洛克是正确的、颅相学家是正确的，我也是正确的，差别仅仅在于我们发挥观点的程度不同而已”的人，^[84]我们还能指望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呢？

然而，很显然，只有脱离卡莱尔发布其颅相学看法的社会的、政治的和个人机会主义的语境而曲解他的这些观点，然后只

在继之而来的稳定的资产阶级工业秩序的背景下静态地评价它们,才能简单地认为它们是对资产阶级霸权的支持。同样,只有通过这样夸张的渲染,卡莱尔的颅相学观点才能被简单地当作对宪章主义者布朗特雷·奥布赖恩在1831年的著名言论的强调,即激进运动“除了人们尖声叫嚷的中等阶级万灵药之外,并没有任何意识形态”。^[85] 尽管人们不该忘记,在当时的背景下,正统和非正统同样都认为,卡莱尔对颅相学资源的种种借用和利用是与新生的秩序及其控制相敌对的;人们也不该忽视,“观点的发挥”总会达到临界点,使其脱离原义,而变得完全不同。尽管从社会和政治角度看,卡莱尔关于颅相学的认识由于他信奉潘恩式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而受到阻碍,但是从知性层面看,他的认识最终还是超越了正统启蒙理性而得到了扩展。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的颅相学尽管从来就是具体化和异化的象征,却与超越理性去探索灵魂始终共存,而这种对灵魂的探索是在人性日益世俗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发生的。根据这种探索,我们就不能如此这般来描绘卡莱尔的职业生涯,即它遵循了合乎逻辑的、笔直的从科学的激进唯物主义者向反谷物法同盟成员转变的轨道,或者是在上述模型内看待颅相学,认为它“自然且必然地”推动他进入库姆的思想轨道。事实上,我们应该清楚,只有超越人们反对把科学概念从人性中分离出来的历史现实,只有超越19世纪早期激进思想和政治的出色的辩证逻辑,卡莱尔才能走上涉足颅相学的道路。 223

当我们在其时其地的背景中认识卡莱尔的颅相学经历,而不是用最近一百年来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事后认识对它进行

有目的的过滤时，可以认为，卡莱尔的颅相学经历有一点超越了当时他被主流意识形态神秘接纳的表面现象。尽管必须认识到那些表面现象有几分反映并促进了资产阶级思维模式的延伸，“否定”也可以说是与“接纳”同时存在的。对于马克思而言，这就可能证明卡莱尔（像蒲鲁东一样）是彻底的“小资产阶级”，他

迫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引以为骄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个自诩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这样的小资产者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他自己只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他应当在理论中表现出他在实践中的面目。^[86]

但是，从这个角度给卡莱尔贴上“小资产阶级”的标签，并不意味着他因此不值得历史学的认真关注，或者说他通过颅相学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已偏离了正道，他不配在激进文化中曾有的地位。相反，虽然卡莱尔的颅相学经历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19世纪初其他工人阶级激进派仍有待考察，但是他自己涉足颅相学可以说既对历史又对现实起到了有益作用：一方面，可以在我们处理历史上民众对科学产生兴趣的问题时，帮助我们避免年代错误、谬误和不必要的辩护；另一方面，当我们面对重新构思

和重新铸造人类“客观”研究的不可能性时，它能阻止我们陷入彻底的人性和文化的绝望之中。



彻底颠覆社会主义

如果浮士德的胸膛里能有两个灵魂,为什么一个正常人发现自己在世界性危机中从一个阶级转变成另一个阶级时,就不能把内心中冲突的思想倾向统一起来呢?……思想混乱并不意味着永久的混沌。

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R.利文斯通译
(1971年英文版),第10—11页。

但他们的理想主义已经在令人遗憾的无聊中趋于荒废。无论从字面上还是象征意义上看,他们[颇相学欧文主义者]已经彻底颠覆了社会主义理论,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准确的事实了。

E.P.汤普森:《威廉·莫里斯:从浪漫到革命》
(1955年),第317页。

19世纪激进派把科学理解为“人类现成的天恩”,其程度之

深令人印象深刻：正当卡莱尔面对欧文式平等主义价值观的冲击，利用颅相学来保存潘恩式个人主义价值观时，欧文主义者却狂热地追求着颅相学，以至于有些人竟然用欧文的全国公平劳动交换所的劳动券来支付颅相学演讲的费用。^[1]这也非常有力地评价了这门科学能够经受的压力，因为从表面判断，欧文主义的基石——个性是由社会环境塑造的——与高尔的智力天赋论是完全相对立的。因此，欧文主义者怎么会在知性层面上赞成颅相学，这需要进行解释。

然而，在解释之前，我们有必要回忆一下：尽管“欧文主义”是工人阶级对工业化的第一次重大回应，它也表达了激进派关注的许多更为传统的非专门性的经济问题。欧文主义批判以竞争性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拒绝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明显的中等阶级意识形态，坚持劳动价值理论。同时，欧文主义对宗教、教育、技术、医学、哲学、民主、自助、工会主义、女权主义、千年至福说、功利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激进问题予以关注和支持。因此，激进派通常能够带着完全不同的兴趣参加到“运动”中，尽管有时仅仅介于运动的边缘，有时仅仅是暂时参与运动。

鉴于这种多样性，颅相学竟然能进入欧文主义阵营就不太令人惊讶了。实际上，倘若“欧文主义”从多方面来说是“对社会变化的总体反应”，与整个维多利亚早期文化有“无数相似之处”，那么，如果颅相学没能进入欧文主义阵营，就显得特别异常了。^[2]令人惊奇的是欧文主义者研习颅相学的规模。由于很多人利用颅相学来攻击欧文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因此这个问题还

没有被历史学家充分认识,也没有得到说明。^[3]欧文主义者对颅相学的研习,不仅范围远比卡莱尔广泛,而且程度也更为深入,几乎到了否定自然知识的地步,这种自然知识“脱掉了活力论外衣”,把真实现象呈现为个性化的“事物本性”而不是社会关系。因此,当我们思考科学在 19 世纪初激进文化中的不同作用时,除了探究被评论家们指责为欧文主义与颅相学之间“令人憎恶的联盟”的性质外,几乎没有更好的途径。

合作的基础

颅相学和欧文主义在知性层面的友好关系主要在于这样的事实:高尔在某些方面尽管是启蒙运动不太典型的追随者,但他和同时代人一样对于人性进步的潜力持乐观态度。他的非学术性理论是对洛克感知论的反击,但他却以一种改良主义的方法利用了基于生物学的社会观点。^[4]他以生物学上人生来就不平等为前提,考察了环境、社会化以及人类为了改良而进行的斗争。他打算将他的大脑理论直接应用于性格改造,然后应用于社会改造:他相信,通过抑制或刺激特殊的精神器官,能够鼓励或抑制某些特殊行为。这为他的一个愿望奠定了基础,即用这种学说去改造精神病患者和罪犯,这也是拉马克偶然中对颅相学抱有的愿望。^[5]此外,高尔信奉生物学的不平等并不一定会违背 18 世纪其他理论家的心理学原理,即所有人的天性官能是平等的。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所见,高尔的理论可以用来证明,所有人事实上在出生时拥有同样的天赋(就其精神官能数量而

言),因而其不断改善的潜能也是相等的。这样,即便是对于高尔来说,这是一个关于个体的理想发展在天性与教养方面的限度问题(而对于欧文主义者中追随洛克、孔迪亚克和爱尔维修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改变教养方式以便塑造一种能够让所有人平等分享的理想天性的问题),但在精神哲学的两个不同出发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重叠。^[6]

在英国,施普茨海姆加强了它们互相支持的基础。1814年以后,施普茨海姆在英国广泛游历的过程中,开始强调该学说的社会改良意义,而减少宿命的预成论因素。他强调,“所有有机生命都受到外部影响的修正”,虽然原始天性永远不会改变,但即使是小小的影响只要持续不断地起作用,“必然会适时地对人类造成显著变化”。否则,他承认,人类将“不如我们期望的那么完美”。^[7]施普茨海姆竭力要把自己推介出去的对象正是当时最杰出的改革家,他竭力使自己在他们当中获得声名。鉴于此,他的这种强调很显然是合乎时宜的。罗伯特·欧文曾在新拉纳克与施普茨海姆会面,他后来非常自得地写道,他“从施普茨海姆第一次来英国时”就知道他,而且,完全有“理由相信[施普茨海姆]关于教育的非常有用的短论[1821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们]谈话的影响”。^[8]

乔治·库姆实际上担任了施普茨海姆教育论文英文版的最后编辑,他甚至比施普茨海姆更加了解英国社会改革的基本原理。而且,作为鼓吹共产主义的欧文主义者艾布拉姆·库姆的弟弟,乔治·库姆不仅非常熟悉欧文的理论和实践,而且对欧文思想在改革者圈子里的反应十分警觉。库姆注意到施普茨海姆

对高尔学说进行了调整,他希望进行进一步的修正,心情之急切竟然到了提出根本改革的可能性的地步,他希望通过教育彻底改变原始天性或最初显现的力量以及既有特性的遗传。^[9]由于库姆对人体构造的所有颅相学思考都与外部目标相关联,因此,在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人们普遍相信“颅相学最初阐释者的发现已被远远地抛在背后”,这就几乎不足为怪了。^[10]

然而,同样中肯的是,欧文的“社会科学”正如高尔的“头脑科学”,当它在19世纪早期寻求一种能够作为行动依据的更有凝聚力的哲学基础时,它始终处于持续的修正状态。欧文在他的第一本著作《新社会观,或论人类性格的形成》(1813)中曾指出,世界上的所有不幸都归因于恶劣的环境,在孩子的幼年改变孩子的环境可以在他们身上塑造更好的性格。至于消灭恶行和犯罪(《新社会观》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写作的),他则有点乐观主义了,欧文宣称“人类天性毫无例外都是普遍可塑的”。^[11]严格地讲,欧文学说的两个主要观点与颅相学家所坚持的任何观点都不对立。相比较而言,对于其第一个观点,即“旧的世界体制建立在人的性格是由人自身形成的信念上”,颅相学家并不反对;对于其第二个观点,“新的理性社会制度建立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即人的性格是为了他而塑造的”,颅相学家可能不太赞同。^[12]然而,欧文的观点又为天赋禀性的影响留下了余地,为了回应颅相学的讲道,他日益重视这种影响。19世纪30年代初,欧文心理学主张的终极形式以建立新社会的“五个基本事实”出现,其中没有一点是颅相学家能够反对的。欧文在《新道德世界书》(1836—1844)对此做了精简,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学说上

的妥协：“人是复杂的生命，出生时的体格和身体构造形成了他的性格，一生中外在环境塑造着其性格；这种原始体格和外在环境的影响持续不断地彼此产生作用与反作用。”^[13]这是介于爱尔维修和高尔的世俗思想之间基本常识的妥协（早在1828年，高尔在题为“倡导性格的形成受环境影响的人致颅相学家”的文章中就已经详细阐述）^[14]。实际上，这种妥协是对边沁学说的扼要复述，即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倾向使他能获得某种类型的快乐，而环境则会强化和削弱甚或产生和消灭这种倾向。^[15]

对于某些人来说，那些相信“原始同一性磨平机”的人对“头骨学的谬论”进行调和，（正如赫兹利特分别予以谴责的，）是这两种学说都是彻底宿命论的结果。^[16]例如，女权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凯瑟琳·巴姆比在1826年的《合作杂志》发表论颅相学的文章，说明颅相学的结论是如何现成地与欧文的结论相一致。她写道，颅相学和欧文主义一样，阐明了

人类，无论从其天性还是宇宙中的状况来看，都不是自由选择的，他必然成为他应该成为的人；他的性格由他的体格塑造而成，他所置身的环境或多或少也对性格产生影响；在他身上并没有能够让他选择自己该成为何种人或如何举止的自我引导力量；他的行动被器官的力量所驱使，那些器官是由天性所创造并共同构成其大脑的。^[17]

1840年，欧文的各民族各阶级联合会伯明翰书记、唯一神教信徒霍克斯·史密斯在《颅相学杂志》上狂热地宣称，就他而言，颅

229 相学学说证实了欧文最重要、最坚定的咒语，“人的性格为他所造，而非由他所造。”他断言：“颅相学和欧文主义同样都涉及了加尔文、爱德华兹、克龙比、普雷斯特利和索思伍德·史密斯所教导的哲学必然性学说；这是‘人类的免责条款’。”^[18]

但实际上，这些学说之间和谐统一的真正基础在于其倡导者共同努力使自己摆脱与宿命论的令人绝望的联系。^[19]虽然欧文和库姆出于不同的理由并从不同的宿命论延伸出来，他们共同提出的要求是，尽管有着基本的免责条款，人们仍承担着道德责任。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自我引导力量”，人们就没有理由为新的道德准则而奋斗。库姆花了八年的时间才认识到，在颅相学理论范围内他能够为个人责任辩护的唯一方法是引入外部环境作用学说。在施普茨海姆的帮助下，他终于明白，正是外部因素影响“官能的自然活动”，使它“在智力的约束下”产生“构成意志”的渴望。^[20]欧文需要一个与之平衡的对等物来考虑较好的环境对精神官能的影响。他写道：“相信性格是为人而设的，绝不会妨碍我们去评估他的行为的性质；它只是为我们寻找其起源提供线索，并引导我们关注那些使他们达到我们预期状态的手段。”因此，孩子既不需要对出生时的体格构造负责，也不需要出生后的环境负责，但是欧文指出，改革家存在的正当理由是“向孩子传递我们对于他的行为的看法，我们可以根据其好坏的相应情况给他重复或改变行为的动力。”^[21]

循着这些线索，把欧文主义与颅相学彻底融合起来的是乔治·艾略特的导师、曾经是考文垂丝带制造商的查尔斯·布雷*。^[22]布雷是一位“诚实的怀疑者”，他在颅相学中找到的新的

世俗支柱使他度过了信仰危机。布雷的困扰在于,他不仅要让人们遵循世俗工业社会的道德训诫,还要在不中断工业社会进步的前提下结束大规模的劳动剥削。当他在19世纪30年代末发现欧文主义,他觉得,通过把欧文主义与颅相学相结合,就可²³⁰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并设计出一个人类进步的纲要。在他最重要的著作《必然性哲学》(1841)中,他把颅相学的生物学决定论与欧文的环境学说嫁接起来,得出一个均等地依赖于双方的必然性定义。在这里我们没必要复述布雷的观点;但在当时,他的观点之所以得到欧文主义者和库姆信徒同样的称赞,更主要是因为它的阐释清晰,而不是因为它的新奇。^[23]值得注意的是,从现实意义来看,布雷把欧文主义渗入库姆哲学的做法导致布雷吹捧那种为了公社的整体利益而协调个人资本积累的观点。布雷在1840年所创建的考文垂劳动者与工匠合作协会,就是对合作个人主义伦理(它与劳动者为了社会正义同资本进行斗争的伦理不同)的落实。^[24]布雷关于理想工业社会的哲学和例证与赫伯特·斯宾塞出于同样的伦理诉求而提出的工业主义模式一样,^[25]把颅相学所描述的理想化的生理结构和大脑功能,与取决于(既定结构内)不同部分之间互相依存的合作所取得的进步并列起来。布雷和库姆一样,为了根除体制中“异常的”功能不平衡,也就是说,为了使资本主义体制更加人性化地运行,他要求必须对人们(尤其是资本家)“天生的”贪欲进行抑制。因此,纯粹的原因就将独自终结阶级不平等的不公平现象。^[26]

我们将会发现,布雷把颅相学和欧文主义相结合的做法为

什么在 19 世纪 40 年代初会得到某些欧文主义者的认同,是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的。目前我们足以看到,布雷的著作是颇相学与欧文主义相一致的进一步证明,欧文主义者对这种和谐状态长期以来是承认和尊重的。例如,《英国合作者》在 1829 年就认为,颇相学家,要是他们“一心致力于准确辨别感情的各种状态,而不从事精神科学的其他工作,他们本来是有资格因为随后的调查而得到人们的感谢的”。但是,该文补充道,他们做得太多:面对政治经济学家对财富积累的关注,以及当权者对于使受

231 压制者安于现状的关注,颇相学家已经把颇相学知识整合起来,来表明“获得幸福的最佳手段”。^[27]不是所有的欧文主义者都走向极端,但是大多数人赞成这门知识并不仅仅是创造更加美好的社会的助手。有些欧文主义者用所有精神官能本身是善的观点取代了“有些情感和习性……天生邪恶”的观点,他们用颇相学来“证明”不完美的心智结构只是不完美的社会结构所导致的结果。^[28]因此,颇相学是“社会主义实践性的检测”,它是从“同一个真理源泉”中流出并在同样的平等主义方向流动的学说。^[29]因此,1835 年欧文《新道德世界》杂志的一位投稿者提出,颇相学确切的唯物主义证据和必然性学说,连同它追求普遍幸福的目标,完全构成了“光荣的三位一体”。^[30]

在宗教和社会反抗的同样烈火中经受考验的光荣的三位一体,只是加强了欧文主义者对颇相学的信仰。1839 年的《晨报》通讯员曾把社会主义者定义为“一批成熟的哲学家,其信仰是颇相学,其理论(甚至可能是实践)则是男女杂交”。^[31]诸如该通讯员之类的人使得欧文主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得到加强,因为对

科学理性的社会真理所进行的压制历史久远,它现在似乎正压制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公开讨论头脑和身体功能,一是质疑社会机构和正统宗教的控制。年轻的欧文主义“社会传道士”罗伯特·库珀、弗雷德里克·霍利克、霍利约克、查尔斯·索思韦尔和 J. G. 克拉克,都竭力宣讲世俗是神圣的。对于他们而言,这就使得颅相学成为反教权主义和唯物主义宣传中的明确因素。^[32]因此,诸如斯韦登伯格信徒 D. G. 戈伊德、反唯物主义者 and 反催眠术者 J. Q. 朗鲍尔、低教会派信徒查尔斯·考恩和天主教徒 H. W. 杜赫斯特之类的颅相学家,就像卫理公会教徒 W. 洛在演讲中所做的那样,也在其颅相学演讲中抱怨“愚蠢的社会主义者”让颅相学拖拽着“一个不情愿的俘虏去[为他们]……效力”,试图“证明人类没有责任”。^[33]设菲尔德的斯宾塞·T. 霍尔 232 是一位基督教化的颅相—催眠术家,他也相信社会主义者已经“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新理论,而且尽一切可能珍惜着它”,因为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尽管它不能说明整个人类的观点,但它必然有助于证实他们自己的主张”。^[34]这些指责有一定的道理,但只要诸如约翰·布林德利牧师和布鲁因·格兰特牧师等巡游四方的狂热基督徒在周游全国的同时到处分发反对颅相学的传单,并谩骂颅相学“显而易见是一种与社会主义创立者一样声名狼藉的人创立的学说”,那么利用这种糟糕的联盟远比否认它更合时宜。^[35]然而,与此同时,欧文主义者公开挑战基督教颅相学家,向人们解释,后者就像卡莱尔那样,支持的是一种完全没有宗教信仰而且与政治斗争不可分离的科学。

欧文主义者对颅相学的兴趣除了这些宗教、哲学和社会的

原因外,最后还有头骨学的诱惑。鉴于大多数欧文主义者像怀疑论者那样完全陶醉于科学的奇迹之中,他们被头骨学的大脑官能图所吸引就很容易理解。“仅仅在几年前,我们实际上只知道天性有四个要素”,一位合作者在 1826 年宣告,

现在已经证明天性是复合物;我们已经知道几乎有 60 种要素。因此,根据新的引人入胜的颅相学科学,我们知道人类有着不少于 35 种力量或官能,而不是最初的四种力量,即知觉、记忆、判断和意志。每一种官能都是一个独特的器官,在每一个普通的人脑中都清楚地进行了划分。

……此处是工作勤奋,此处是机会丰富,此处是广泛发挥作用的领域。每一个婴儿身上都有这 35 种有待发展的力量,它们需要适时的训练和恰当的指引。这里没有偏见,没有错误,没有亟待克服的坏习惯。^[36]

1820 年至 1823 年间,当施普茨海姆和库姆访问新拉纳克并进行头部隆起的解读时,欧文本人给予了热情回应。尽管,或者说可能是因为,1820 年库姆在访问时通过描述一些学童的头颅而设法抢了欧文的风头,并使得《伦敦杂志》的随行访问者皈依颅相学,但欧文还是太激动了,当即就购买了书籍和半身塑像,打算进一步研究这门科学。^[37]在一定程度上讲,正是由于这种早期研究,他的“心理图案学”才得以形成:他试图用自己发明的与颅相学类似的人类具体官能的列表来简化常识哲学家“深奥难解的推论”。他也设计了一个“心理描绘图”,用它可以测量“人

们出生时的官能,然后确定环境是如何改变这些官能的”,这样“就可以用一种有形的方式来展示人性”。^[38]

1821年,在爱丁堡同样受到库姆的影响而激发起热情的人还有达尔泽尔的 A.J. 汉密尔顿。他是艾布拉姆·库姆在奥比斯顿所创办的英国第一个欧文主义公社的合作者。汉密尔顿的最初反应是对新意识和理性化的惯常反应:当他感觉到生命中深藏的秘密现在已经被简单地解决时,他表达了自己的愿望,那就是他早已经了解真正的精神哲学,对自我有认识,因此他不可能“错过他认为自己应有的成功人生”。^[39]

虽然汉密尔顿和欧文后来都抛弃了库姆主义,认为它是一种令人讨厌的思想,诱导欧文主义者背离对欧文社会观的追求,但是这两人谁都没有失去对颅相学中头骨学内容的早期热情。^[40] 欧文和他的儿子罗伯特·戴尔每次遇到一位杰出的颅相学描绘师时就抛弃对这门科学的怀疑态度,也代表了很多欧文主义者;^[41] 与此同时,《新道德世界》也对头骨学给予鼓励,曾两次发表有关前曼彻斯特粗斜纹布裁布工 E. T. 克雷格创作的《颅相学图表》的有利评论。^[42] 欧文主义者意识到从外部对内部官能进行解读是颅相学最薄弱的方面,但他们差一点最终通过关于头骨学的议案。在 1843 年的理性学会分会的代表会议上,来自伦敦 A1 分会(约翰街学院)的代表沃尔特·纽沃尔提议,“任命一个委员会去考虑应用颅相学原则的事宜,在和谐大厅用它进行测试,来确定性格的趋向,将来也可以选择其他地方作为测试地点”。^[43] 威廉·德文希尔·索尔是激进的伦敦酒商和伦敦颅相学学会成员,对城市路的科学会所和圣约翰街学院的建

234 立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提议把他的私人颅相学博物馆遗赠给和谐大厅,他就像法国社会主义者艾蒂安·卡贝那样确定无疑地相信,为了教育的目的,这样的公社需要有**头骨学博物馆**。^[44]由于被敌对者、吃白食者、不守规矩者和懒惰者所包围,欧文共产主义合作社的成员们敏锐地意识到,必须找到一种方便快捷的估测性格的方法。此外,我们有理由相信,欧文主义者唯一真正成功的实验是由 E. T. 克雷格* 在 1831 年和 1833 年间组织的爱尔兰克莱尔郡的拉拉尼公社,这一成功完全归因于克雷格实际应用颅相学的才能,他在候选人的筛选并把他们分派到公社中严格分工的位置上时,应用了颅相学。^[45]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克雷格在拉拉尼应用颅相学并不是为了支持欧文的“共产主义观念”,克雷格认为欧文的“共产主义观念”是令人遗憾的“事后想法,它建立在[欧文]错误的‘人性’观念上”。^[46]拉拉尼被约翰街的欧文主义者 A. R. 华莱士称赞为“纯粹社会主义”的光辉夺目的典范,事实上它是布雷所支持的合作个人主义的成功案例。^[47]实际上,它是一个农业新拉纳克,其“成功”依赖于像“性格描绘图”这样的颅相学小窍门。^[48]欧文错在后来抛弃了潜含着这类小窍门的社会经济原则,就这方面来讲,当欧文在 1858 年去世时,派人为欧文守灵并在坟地遍种金雀花,预防猎取人头的颅相学家,也许是正确的做法。^[49]

库姆与欧文:和谐、变化和分裂

颅相学作为一种关于性格和社会改革的理性主义哲学,对

于欧文社会主义者来说是一种和谐的学说，它有激进的表达方式，乌托邦式的、反传统主义的理念和人相学上的实用主义。自相矛盾的是，库姆在 19 世纪 20 年代初对欧文主义的敌视，很大程度上证实了这种学说的和谐性和各位拥护者前后兴趣的差异。当时，“棉纺家王子”欧文仍是一位慈善家，是贵族的朋友，235正忙着为消除社会分裂而寻找最有效的镇痛剂，并在以脾气暴躁而出名的劳动者中灌输工厂纪律。然而，当他在新拉纳克进行科学化工业管理方面最著名的实验时，他正在“实现彻底重组社会的强烈愿望与相信变革必须渐进的坚定信念”之间摇摆不定。刚刚放弃“贵族政治的广泛基础是‘工人和贫穷阶级’”这种金字塔式社会结构观，欧文正在思考的问题就不是废除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而是建立一个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这类不平等现象的乌托邦的未来社会。^[50]他关心的是“规则、法律和秩序”。对于这样的欧文，库姆的反应只能是嫉妒。和其他人一样，库姆因为新拉纳克的出现而感到“极度快乐”；当他在 1822 年 10 月第二次参观新拉纳克时，遇到了布鲁厄姆勋爵，他和布鲁厄姆勋爵一样被新拉纳克激起强烈的兴趣。^[51]在 1823 年第三次访问新拉纳克以后，库姆私下里写道，“欧文主义有很多能够对旧社会产生最有效的裨益作用的真理”。^[52]不久，他立即决定扩充他的颅相学观点，写作“关于颅相学应用于道德、批评和政治经济的讲稿”。^[53]

从一开始，库姆对于欧文名声的嫉妒就激励他以竞争性方式来利用颅相学。刺激他进一步前进的是 1821 年对他的兄长艾布拉姆的欧文主义的不满。艾布拉姆比起当律师的弟弟，精

力更加充沛,更喜欢冒险。出于同样的宗教动机,艾布拉姆在1820年与乔治一起访问新拉纳克并阅读了欧文的《致拉纳克郡报告》(1821)以后,开始信奉欧文主义。^[54]爱丁堡的实践协会是一个诞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贫民窟的工人阶级组织,它为艾布拉姆提供了试验某些“新观念”的试验场;而奥比斯顿公社(1826—1827)则完全是艾布拉姆为应用这些“新观念”而作出的奉献。在乔治看来,这种奉献很过分,很不负责任;但就他本人而言,他更恼怒的是艾布拉姆对颅相学的忽视,如果不是蔑视的话。^[55]因此,当库姆1823年首次在《颅相学杂志》第2卷上与欧文进行论战时,他的文章以心胸狭隘和充满怨愤为特色。库姆强调与生俱来的气质对环境影响的重要性,正如欧文所承认的,236 “我们之间只有这一点差别”。但是库姆却把绝大部分论辩诉诸传统的性别和宗教偏见,也就是对欧文观点的“愚蠢、荒谬和不道德”进行评述,事实上库姆通过之前与欧文的交谈和通信联系知道这些一点也不正确。^[56]当欧文在公开发表的答复中有力地驳斥了这些指控并挽回自己的人品时,库姆在欧文主义领袖中的名声被永远玷污了,他的大众颅相学也受到了质疑。在《纽卡斯尔杂志》发表了一篇论述环境对性格的影响的文章之后,A. J. 汉密尔顿在给库姆的信中指出,

要是你不谈论你所做的事情,那么一切都很好。关于色情和原动力……由于你自身的色情倾向只有一点点(即使有的话),你根本没有资格论述这个话题,更不用说找到反对它的理由了,这是一个你自己很显然并不精通的理论体

系……因此,你的所为使得你的理论体系遭受危险,而你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57]

欧文在《致拉纳克郡报告》中对平等进行了评论,他也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把自己的原则“立即付诸实施”,这个原则就是“价值的天然标准从原则上讲是人的劳动,或者说是行动起来的人们的体力和脑力的综合”。鉴于这点,库姆对此进行回击也就不令人惊讶。库姆的论点是,如果天性是倾向于“财产公有和等级平等”的,那么自我保护的心智官能就应该已经植入大脑之中。^[58]然而,库姆在这个问题的论辩中所遗漏的是潜在的紧迫感;从本质上讲,他只想用讥讽报复批评者的中伤:如果存在这样一种精神科学,人们对它的信奉并不会导致社会的动荡,反而会消除阻碍人们追求完美幸福的每一种有害的情感,那么,“为什么公众就应该以稳定为代价,造成社会的解体”?^[59]但是,欧文和库姆本人就意识形态分歧进行摊牌只是时间问题。这个分水岭就是1827年艾布拉姆的去世和艾布拉姆家庭在奥比斯顿公社的财政破产。尽管库姆在1826年的奥比斯顿产权人会议上,不情愿地承认(或许仅仅是出于礼貌)“总的原则似乎是正确的”,但他又补充说道,“最确切地说,房客们在自我管理的情况下会做得最好,因为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尽最大的努力”。^[60]三年以后,他成功地让奥比斯顿的经理亚历山大·保罗相信,“根据我们都曾接受过的教育方式,根据我们的愿望和感情所存在的差异,我们在任何情况下几乎都不可能找到数量相等的个人……让他们在这样的实验中彼此手拉手地前进”。^[61]

到 1831 年,库姆开始利用艾布拉姆的经历和他的去世,来鼓吹他自己与公社生活有关的人性思考。^[62]当霍克斯·史密斯在 1837 年告诉他,“你关于人类的主张……在竞争驱使我们所有人目前都做着徒劳无益的追求时,是永远都不会实现的。在存在个人积累体系的情况下,竞争永远不会被消灭或者被阻止”,库姆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

我的观点已经证明了奥比斯顿人的精神状况,也许关于这一点我的观点冲击力太大了。这些人完全没有做好合作的准备,他们只是消耗着产权人的财产。我哥哥的家庭由于这个实验而破产,到现在仍经受着它带来的巨大痛苦。^[63]

与此同时,19 世纪 20 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以及威廉·汤普森、约翰·格雷、J. F. 布雷、詹姆斯·莫里森和托马斯·霍奇斯金等人著作(他们在欧文主义的范畴中详细阐述劳动价值论和经济平等的观点)的影响,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聚集起来,形成了对欧文的支持。此时的欧文已被看作激进的共产主义社会提倡者和互助的倡导者。1826 年以后,欧文推翻了他以前关于社会金字塔的观点,开始揭露“加在劳动阶级身上的负担多么沉重,人们多么期盼能实现财产的平均分配”。^[64]身为慈善家、教育家和工厂改革家的欧文现在变成了令人畏惧的“社会主义者”欧文,他领导了 19 世纪 30 年代初阶级意识明显的合作社和工会运动,对资产阶级社会最神圣的三种制度展开攻击:私有财产、宗教和婚姻。尽管这个阶段的欧文主义随着 1834 年 8 月全

国公平劳动交易所和全国各业统一工会的瓦解而衰退,大多数曾经坚持欧文学说的人后来退回到一些不太直接攻击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思想,但是,公众对 1830 年以后的欧文和社会主义的印象已经定型。^[65]这种形象的僵化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因为, 238 就算欧文致力于鼓吹千年至福的家长式统治,并声称自己是“各民族各阶级”之间秩序与和谐的代表者,他仍然能够断言没有一种原则曾经“像个人主义原则那样产生了这么多的罪恶”,并继续攻击技工学院,比方说,称其支持“现有的反常状况”并充当了“使社会不公平继续下去的工具”。^[66]尽管欧文由于无穷尽的乐观主义而继续期盼在颅相学家和他自己的追随者之间“没有必要进行论战”,但颅相学家有充分的理由另做打算,并因此保护他们的资源。^[67]如果说,在 19 世纪 20 年代颅相学家和欧文主义者之间唯一真正的差异只是社会革命的速度问题,那么,在 19 世纪 30 年代,他们之间对于性格形成问题的哲学差异开始象征明显对立的意识形态立场。^[68]

库姆尤其坚定不移地认为,“社会主义、傅立叶主义和欧文主义”是与人性相对立的。就在 1848 年 2 万名宪章派人士向肯宁顿公地前进的那一天,库姆给威廉·埃利斯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最明确的语言声称,虽然“与我们一起扬名的”“查尔斯·布雷……以及……罗伯特·钱伯斯热衷于‘劳工组织’,他们指的是某种能够让操作工分享到劳动和资本共同行动所产生的利润的安排……,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他补充说道,“粗野的劳动者”不应该获取“上帝只是分配给聪明的劳动者或文明的劳动者的报酬,因为文明的劳动者受到经过熏陶的智力和受过训

练的道德情感的指导和控制”。唯恐埃利斯对“文明劳动者”的含义不明白,库姆解释他指的是那些有道德的人或“智力状况处于中等程度、兼具资本和劳动力特性的人”。^[69]同一年稍后时期,他在给布雷的一封信中反驳环境的重要性,不承认环境以任何方式对工人阶级的状况有所援助。他坚持认为,工人阶级状况的真正提高应该包括“巧妙而坚定不移地”训练和教导他们“遵守那些支配着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自然法则”。不实现这些,从外部实施诸如土地计划之类的方法将无法“把他们作为一个阶级从违背这些法则所造成的自然后果中拯救出来”。只要劳动者依然“在道德、勤劳、智慧和自我克制等方面存在着缺陷”,那么,无论是普选权、好土地、最好的法律还是宗教,都不能将他从“赤贫”中拯救出来。^[70]

就我们所知,库姆从来没有表达过要使用欧文主义者提出的颇相学的观点。他或许意识到,这样做会使他陷入宗教反动分子所责骂的把颇相学“令人讨厌地误用”到“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去的那个营垒,因为社会主义“……彻底根除了所有的社会、家庭纽带……,摧毁了所有的道德责任……,颠覆了人们最热爱的习惯,并宣称人类只对自己负责”。^[71]库姆把自己和这样的想法融为一体,不仅他本人应该受到谴责,而且这么做在策略上也是愚蠢的,因为只要欧文主义者表示对颇相学有兴趣而且坚持认为(就像欧文的同事乔治·弗莱明在1837年对库姆所说的)“欧文先生和你本人实际上传播的是同样的学说”,^[72]库姆就可能期望,不是没有理由,颇相学真理有可能成功地转变那些坚信文明仍很不完善的人的思想。库姆对这样的演讲不作回

应,他大概是指望这么做能防止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到,颅相学不止是导致社会主义论争和社会主义意识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象征。我们将会发现,他的希望部分而言是有根据的;但他的沉默策略(如果是策略的话)并不足以阻止欧文主义者攻击他的特殊的颅相学观点,称其为“一堆令人作呕的假话和废话”。^[73]

然而,在我们论述这个问题之前,应该简要地论述一下其他因素的作用,包括防止具有意识形态象征性的反颅相学在欧文主义者中崛起,以及(至少在普通欧文主义者当中)抹煞库姆分子和欧文主义者在控制大脑生理学的合法资源方面展开竞争的现实等因素。可能最为重要的事实是,其他颅相学家一般都不像库姆那样明确、公开地阐述他们的政治经济观点。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像我们在第五章所指出的,用他们的自由主义与欧文主义展开了类似的搏斗,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们也同样强调天性比教养更为重要,以此掩盖其理论的矛盾之处,但是,他们就这些问题在公众面前的低姿态却在无意之中使得直言不讳的库姆显得尤其特别。有些颅相学家,比如伍德夫妇、乔舒亚和霍克斯·史密斯以及布雷,公开声明颅相学“证明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大多数原理的谬误”。^[74]因此,他们帮着证明了中性颅相学“事实”的效用不同于库姆附加给颅相学的“价值”。确实,库姆在与合作社的对抗中是孤军奋战。正如斯迈尔斯、布雷和钱伯斯等人注意到的,合作社是一种让工人们在困难时期求助于工人自己而不致成为社会负担的手段。^[75]《颅相学杂志》上对布雷的《哲学必然性》进行评论的人忽略了合作社对于工人团结的重要性,“为了解除有可能造成社会解体的根深蒂固的问

题”，他只期望解救的重点不仅仅是“同样的个体在文明的合作体制中实行劳动力和劳动成果以及资本的联合”，还应该把着重点稍微多地放在诸如政治改革、自由贸易、教育、宗教和移民等解救策略上。^[76]

使得欧文派改革和颅相学改革之间的差别进一步模糊的是这样的事实，库姆派颅相学家在一定的场合中并不反对把欧文尊奉为教育家和改革家。例如，竭力鼓吹颠扑不破的资产阶级原则的詹姆斯·辛普森，在1837年的一次关于世俗教育的演讲中，把欧文挑选出来作为“这个时代或以往任何时代所产生的最杰出的仁爱家的例子”。^[77]艾萨克·艾恩赛德和精明的欧文主义者一样，也对辛普森的表现非常满意，以至于他立即开始从事颅相学研究。这个事实证明了辛普森的热诚是值得付出的努力。^[78]

因此，并不清楚颅相学家在什么问题与某些社会、政治哲学相关。如果有人为了寻找答案而在大量的颅相学文献中搜索，那么这些文献似乎在所有问题上都与此有关。这就是1841年一位茫然的评论者得出的认识，他和之前的人一样，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只要大脑是精神力量的最直接的器官介质这个事实被认可，一位颅相学家的理论 and 另一位颅相学家所接受的理论之间的差距可能就像南北两极那么遥远。例如，一个颅相学家可能会认为人的思想主要受外部事件的影响，或者说他是外在环境的产物。而其他颅相学家可能会坚持认

为,人更大程度上是自身内在体格的产物。另外的人可能会认为人主要是自己意志的产物,而其他人可能会认为对人产生最强烈影响的是精神感化力,尽管这种影响可能是隐秘的。^[79]

值得玩味的是,这位评论者谴责库姆拥护“财产的平等分配”,并且推测其原因是“库姆先生受到罗伯特·欧文先生信徒如此赏识”的“社会无组织状态”。^[80]

但是,如果欧文主义者对颇相学的兴趣取决于库姆并不是颇相学的发言人,那么他们的兴趣同样也取决于“欧文主义”华而不实的现实。阿瑟·贝斯特对欧文从一种立场迅速转变到另一种立场进行了仔细考察,E.P.汤普森对欧文与“欧文主义”进行了区分,J.F.C.哈里森等人提醒人们注意,“‘欧文主义’是一个蓄水池,不同的群体和个人包括工人,都能够从中汲取思想和灵感,然后根据其选择而加以应用”,这一切都警告我们不要以为“欧文主义”在社会或政治方面是协调一致的。^[81]最典型的是在1832年的合作社大会上,威廉·佩尔对于受剥削的工人阶级和剥削人的中等阶级资本家之间利益一致的“谬误”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同时,浸礼会传道士、后来成为颇相学讲师的约瑟夫·马里奥特*宣称,合作者并不是“平等派”,他们并不打算剥夺其他人的财产,只希望“接受各等级、各种状况的人”。^[82]后者较温和的立场往往在普通欧文主义中占据优势,^[83]但它本身在范围宽泛的特殊利益中显现出来。这种多样性反映在许多欧文主义者身上,他们有的专门进行颇相学演讲,有的专门进行颇相学写

作,其中包括:世俗论者霍利约克*, J. G. 克拉克* 和罗伯特·库珀,女权主义者、由浸礼会信徒转为自由思想家的埃玛·马丁*, 以前是卫理公会信徒、后来成为宪章派导师的威廉·洛维特,一神论派信徒 W. 霍克斯·史密斯* 和哈利法克斯的麦克阿瑟先生*, 合作社成员克雷格* 和凯瑟琳·巴姆比,以及民主派和催眠术师 J. N. 贝利*。根据其对欧文主义者计划的经济和道德支持,这样的名字还可以继续增加:布雷,倡导贵族政体和节欲的阿瑟·屈维廉,甚至包括行为古怪的皮埃尔·亨利·博姆*, 他曾于 1835 年在米尔班克的威斯敏斯特学院作关于颅相学的演讲。再一个不同是加入哈姆和谐公社的倡导颅相学的欧文主义者。这个社的管理者是“伯顿街贤人”詹姆斯·皮尔庞特·格里夫斯(1772—1842),他曾经做过商人,是一位裴斯泰罗齐式^①的教育家。格里夫斯(在 1826 年 5 月当选为伦敦颅相学学会会员)和之前的弗拉克斯曼一样,激情饱满地研读雅各布·博姆、威廉·劳和伊曼纽尔·斯韦登伯格的唯心论著作,并提出一种颅相学观点,这种颅相学在一个层面上显得是另类的知性选择,在另一个层面却又具有荒谬的宗教象征性,而从又一个层面来看它又显得相当陈腐老套,根本不是外部世界的人所能理解的。^[84]在哈姆公社“严肃的社会主义者”中有一些是欧文主义的传道士,如亚历山大·坎贝尔、古德温·巴姆比和威廉·盖尔平,对他们而言,这种颅相学不是混乱的狂热,它与他们倡导的

① 裴斯泰罗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1746—1827), 瑞士教育学家, 提倡实物教学法。——译注

素食主义、节欲、贞洁、催眠术、水疗法和宗教共产主义相一致，是对传统社会规范的彻底抵制，是对居于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实证形而上学的拒绝，但后者几乎是无意之中产生于对传统唯物主义理性和实验科学的权威的厌恶。这种颅相学和卡莱尔的讽喻基督教中传播的颅相学，在社会和知性层面上有着许多特殊的不同点，但两者都反感使人类受制于无生命的唯物主义的、不带感情而呆板的自然，都渴望恢复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被摧毁的精神完整性。^[85]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些与17世纪共和派同样的19世纪共和派人士中，伊莉莎·沙普尔斯在卡莱尔于1843年去世后找到了避风港。^[86]

“第一批和谐社员”对颅相学的兴趣尽管很少有公开表述，但他们的这种兴趣绝对没有与欧文主义者（包括那些到19世纪30年代末还声称孔德的实证主义与人类智力有着特殊关系的人）对这门科学的兴趣产生激烈冲突。^[87]对于大多数欧文主义者来说，颅相学，就像汤普森所评述的，在他们论证更为理性的世俗社会的理论链条中是“最后的决定性一环”。但是，从19世纪晚期的社会背景中产生的威廉·莫里斯的历史观点不应该模糊这样的事实，即对于该世纪前期的社会主义者来说，“理性”的想象总是多多少少涉及用“无理性”或“非理性”去批判资产阶级竞争性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理性社会”问题。^[88]在19世纪40年代初，欧文主义者称呼自己为“理性宗教家的普世公社”，在他们当中，许多人毫不困难地把对于“面包和奶酪改革”的兴趣与对于改善精神的更为广义的千年至福的兴趣结合起来。^[89]建设另一个真正理性的社会总是涉及两个方面，他们所设想的新道德

世界就是物质与精神、理性与感性、科学与人性这两者的和谐整合。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欧文主义者称赞颅相学是进行肉体、精神和道德改造的“理性而可靠的手段”,就一定表明他们尊重同样把理性主义作为其理论前提的库姆派颅相学,或者说,就这方面而言情况就是如此,而且仅止于此。^[90]现在我们可以讨论对库姆颅相学的批评问题了。实际上,对库姆颅相学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一门显然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理性表现形式的科学的蔑视,因为它起的作用是反对“我们[欧文主义者]所提出的改善人性状况的方案”。^[91]

反应与折射

敏锐的社会主义者范妮·赖特 1830 年在美国欧文主义者杂志《自由调查者》发表文章,反对“当今流行的走上科学之路的习惯,我们像对待信仰一样,预期能发现比实际更多的真理,并相信科学无需证明的信奉”。^[92]她把颅相学与宗教进行类比或许仅仅是巧合,但对于颅相学“本质”的怀疑肯定不仅仅是一个暗示。她没有态度鲜明地这么说过,但她很显然觉察到了这门知识对社会主义可能产生的威胁。欧文自从 19 世纪 20 年代初与库姆论战之后,也意识到这一点。他的儿子,与范妮·赖特共同编辑《自由调查者》的罗伯特·戴尔,也意识到这一点。为了答谢库姆在 1827 年送给他一本《论人类职责》,小欧文抓住机会批评库姆“过度的乐观主义”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罗伯特·戴尔·欧文看来,库姆所论证的“现实中所有的恶都是普遍的

善,目前遭受的所有苦难都是未来幸福确定而直接的根由”,仅仅“证实了因为它是什么,所以它就应该是什​​么”。对于罗伯特·戴尔·欧文来说,这种宗教咒语是库姆最愚蠢的地方。关于这一点,他和他父亲的感受一样。由于他们已经不相信竞争性工业资本主义的超凡至理名言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他们发现,库姆的乐观主义根本没有存在的基础,除非它能证明“不幸和苦难本身是好的、值得追求的东西”。^[93]库姆和其他颅相学家宣称人的生物学天性不是用来适应事物的不同状态的,他们接受竞争体制并有可能对其不完善之处进行改造,但他们不会去研究社会弊端的经济根源。欧文主义者改变社会、经济关系进而改变人性的方案,作为一种矫正的手段,应该是乐观主义的真正唯一源泉。

但是直到 19 世纪 30 年代,当《人类体格》获得真正的标志性成功时,欧文主义者领导层才开始公开表达他们对库姆颅相学中自然主义的深深疑惑。1835 年初的《新道德世界》发表了一个对话,对话的一方是“‘各民族各阶级联合会’的创建者”,另一方是“一个陌生人,渴望准确了解该协会的起源和目标”,其对话的主要目标是把那些已经被颅相学引入歧途的问题拉回到更富建设性的社会主义渠道。因此,对话中的陌生人被安排提问:“为什么你在我们现在的谈话中这么多地谈及颅相学?”欧文的回答再清楚不过:“因为,根据颅相学倡导者现在所讲授的颅相学,它的目标是要在大众头脑中占据位置,这种位置本应该属于更能有效改善人类性格的科学,像颅相学这样软弱而不完善的手段是永远无法实现这种目标的。”颅相学是一个软弱而不完善

的手段,他补充说道,因为它“除了推测人类大脑的容积和力量之外不可能再前进一步……一旦社会进入健康、理性的状态,即
245 这个世界正缓慢接近的状态,那么,环境影响力科学就会使得颇相学几乎毫无用处”。欧文含蓄地承认在他们各自的“科学信念”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斗争,在这里,欧文实际上选择的是摧毁竞争者社会资源的可信性,而不是说明这种斗争是合适的、可以加以利用的。欧文就好像在为颇相学致悼词似的,承认颇相学作出的巨大贡献:它引导人们关注头脑的研究以及“现有教育模式的重大错误”;它协助了有机生命法则的研究;揭示了根据“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而非无知短暂的人的法则”来改变社会的必要性。但是,最后,欧文认为美中不足的是:颇相学未能超越批评旧社会的框架;它的反教权主义和反贵族统治在根除新政治经济学所昭示的不平等问题上一筹莫展。它应该受到谴责,原因是:由于它已经吸引了大众的注意力,它将引导大众“把目前人性和社会的暂时状况看作其固定状态[‘人事的自然安排’],尤其是在人类和社会这两者都处于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惊人的变化即将发生的前夕,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94]

截至此时的当时文献中,没有一处对颇相学与激进派相关的意识形态作用有过如此准确的描述和揭露。然而,问题一旦被揭露,相应的著述便相继出现,但是直到1838年6月库姆在伯明翰技工学院的系列演讲中完全证实了在学说之间和谐共处的“光荣的三位一体”是不虔敬的,这种状况才出现。在这些讲座中,库姆毫不含糊地说明,“当今社会状态应该存在下去是主的意志”;他补充说道,工人应该对他们在现有社会等级中的命

运感到满足：

如果所有人都努力成为莎士比亚、钱特里斯这样的人，那么我们从哪里找到农夫、织工和建筑者？社会机器如何维持运转？……如果所有人都成为淑女和绅士，那么谁来履行不讨人喜欢的社会职责？谁会在煤矿劳动？等等，等等。^[95]

《新道德世界》在头版的位置用一个“呸”对这番论调予以回敬，²⁴⁶毫不含糊地表达他们对颅相学的蔑视，在他们看来这门学说现在已经不仅与“人类在性格和身份方面所发生的变化”相去甚远，也与欧文所钟爱的“公平、自然的财产共有制度”观点相左。^[96]“在我们看来，根据能力不同的发现进而推论社会地位不平等是必然之事，这是最缺乏哲理的观点”。由于“库姆作为讲师的道德水准从来没有给他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现在根本找不到理由去留意他。

就在库姆发表系列演讲之后，欧文的《对话》策略性地出版了单独的小册子。同时出版的还有一份言辞更为犀利的作品，其作者是约翰·劳瑟·墨菲，他是伯明翰的牙医，也是欧文中央委员会成员。^[97]墨菲和霍克斯·史密斯当时是伯明翰技工学院委员会成员，是他们邀请库姆去演讲的。在库姆到达后，墨菲坐在前排，仔细观察这位全国著名的颅相学家。但他的观察并没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库姆演讲的14个晚上，霍利约克热心地为库姆做现场展示，但是当墨菲发现霍利约克所得到的酬劳

仅仅是一个有缺口的石膏模型和一本已经翻阅得很旧的《颅相学原理》时，确实是墨菲鼓励霍利约克给《伯明翰杂志》写稿的。在库姆免费使用了演讲厅，并且从演讲中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后，他却并没有给技工学院基金捐一分钱，这对墨菲等人来说既是伤害又是侮辱。^[98] 因此，毫不奇怪，墨菲在他的《论意识科学》（1838）中大胆地攻击颅相学，称它是一大堆假话、伪论、抽象的废话和白痴般的谬误。^[99] 让墨菲同样也让欧文恼火的是，尽管他们已经大胆地揭示了颅相学的骗子行为，即那些围绕在颅相学家身旁的一般是一群打着哈欠等着颅相学家为他们检查颅骨隆起的人，但是颅相学仍然有不少仰慕者。墨菲能够理解人们可能会被颅相学的自然主义、理性主义推论所蒙骗；但令他几乎无法理解的是，在有大量的证据表明颅相学“教授们”为了某个主人或女主人的利益而拿人们及其子女的生活、名誉和未来做²⁴⁷ 赌注时，这些人怎么还会支持颅相学家的“狂热”呢？颅相学家就好像自己是牧师一样，对其他人的生活进行评判。对于他们傲慢无知的推论，墨菲和之前的戈德温一样，深感遗憾。^[100]

然而，墨菲攻击颅相学的核心是他注意到这门科学胡编乱造了一个所谓的基于回报和惩罚的“自然”伦理体系。回想起罗伯特·戴尔·欧文在1827年对库姆的评论，“你试图证明上帝对人的回报是正当的”，墨菲指出，诸如“服从器官法则”和“对违背自然法则的惩罚”等词语不过是正统神学的世俗化形式，颅相学对这些词语的普及证明了“大众的无知，以及造成他们如此无知的理论体系的非理性”。^[101] 墨菲比密尔的《论自然》早十多年就深入问题的核心，指出，貌似真理的颅相学哲学产生于错误地

“通过隐喻的手法利用法则这个术语来象征一种一般性事实”。由于“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法则’这个词语的隐喻意义和字面意义的不同”，颅相学家就能蒙骗大众相信，他们的伦理建立在某种客观、中立的权威之上，实际上他们对“自然”的利用完全是主观的。^[102]墨菲暗示，颅相学坚持服从自然法则，就和神学中通过牧师对回报和惩罚进行仲裁的体制一样，是一种建立社会控制的手段。唉，遗憾的是墨菲自己对科学的世俗道德的信仰使他无法质疑道德本身的主观基础。由于他本人在某种程度上将道德建立在颅相学关于人性的基础上，他也无法阐明科学的中介形态或它所传播的有机论！^[103]此外，他作为欧文主义大师的地位也使得他不能谴责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仲裁者或仲裁机制。然而，他的洞察足以推动欧文进一步揭露颅相学语言中自然法的反社会主义的功能，并证实范妮·赖特的怀疑是正确的，即对颅相学的信仰使得人们很难认识到现有体制是不合理的，现有体制不仅需要纠正而且也是能够纠正的。

尽管这样的布道或许只是针对皈依者而言的，但 19 世纪 248
40 年代初的证据表明很多欧文主义者已经把类似的结论记在心上或者已经独自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例如，曾经做过壁炉装配工的设菲尔德人艾萨克·艾恩赛德曾在 30 年代末狂热地接受了颅相学，不久之后却放弃了颅相学，不仅是因为这门科学“经不起严格的验证”，而且也因为它的主要鼓吹者的政治和社会观念极端可疑。他说：“这门科学的鼓吹者所使用的假话证实了……我的观点。”^[104]同样，曼彻斯特科学会所的书记在 1842 年写道：

任何人只要认真研究迄今为止所陈述的颅相学,就一定会被这种奇怪的混合物所迷惑,它把许多有价值的真理糅合到这个前后矛盾并以其提倡者(为了获得正统派和异端派的认可)口是心非和谄媚为特征的体制中。^[105]

但另一方面,也有人强烈反对加诸颅相学的这类诘难,1838年《新道德世界》的一位作者竟然说,墨菲的论点除了教条主义别无其他,他不过用他的教条主义去推翻“[颅相学家]观察到的无数事实……这些颅相学家的主张中并没有什么动机,只是为了发展真理”。^[106]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几年之内,就在库姆因为宣扬“社会主义的无责任性”而遭到指控后不久,^[107]几乎为欧文主义者普遍坚持的正是这后一种观点(虽然得到了重新界定)。但它不是因为库姆耍了什么把戏,也不是欧文主义者心情突然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得颅相学重新回到欧文主义者怀抱并使得艾恩赛德这样的人重新支持该科学的,是1842年6月恩格尔杜给颅相学学会的致辞。正如艾恩赛德所指出的,恩格尔杜的致辞“完全割断了颅相学和假话之间的联系”。^[108]颅相学反对派的言论也帮着证实了这一点,“恩格尔杜博士的主张有着一定的必然性;……他首次宣布了学说的非真实性,这是整个社会主义体制得以建立的基础”。^[109]在40年代剩余的年份里,激进派就以恩格尔杜的颅相学为标准,来判断所有其他的颅相学作品,尤其是库姆及其基督教辩护者的作品。因此,这种资源本身的圣洁性不仅被保留下来,而且得到了强化。^[110]

重新点燃欧文主义者对颅相学的热情的，不仅仅是恩格尔杜的不妥协唯物主义：他针对科学界、医学界和教会的封闭性，呼吁对催眠术或“大脑活动的磁刺激”展开自由而公开的调查，也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根据艾恩赛德对设菲尔德科学会所进行的颅相催眠术调查的报告（发表在1842年12月的《新道德世界》杂志上），恩格尔杜所坦承的对于这个课题的“超乎寻常的兴趣”几乎与各地的欧文主义者都相似。最典型的是，桑德兰的理性宗教家学会的书记写道：

我们认为这种[颅相—催眠术]，在传播关于人性的正确观念，并间接摧毁那些在各个时代使人性堕落并在人类中传播悲惨和苦难的陈旧的有害学说方面，如果说它不是唯一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最有力的手段之一。^[111]

颅相催眠术很显然使欧文主义者高兴，不仅因为它是异端学说并为欧文主义者的科学会所吸引了大量群众，而且也因为它积极参与了科学实验和心理揭示的过程。此外，用来解释现象的科学原则本身似乎也属于积极的、有感知力的那一类。^[112]至少从理论上讲，颅相催眠术有可能消除精神世界及其僧侣似的监督者与人类及物质秩序之间的差别。因此，颅相催眠术因为其性质，可能同样也因为其追求民主的方式，从科学角度成为颅相学（由于库姆的所为）已无法充当的“另一种选择”。“颅相学能够经受严格的验证”，艾恩赛德坚持认为，“在催眠术的帮助下，每个人的发展能够被正确地探知……，[并且]在此基础上能

够建立一种教育体系”。据他看来，“我们[理性宗教家]学会的科学部应该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调查课题，这是最重要的”。^[113]因此，库姆主义和宗教的伪善之言全被剥光，并成为批判的对象，颅相学的真理被重新发掘出来。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讲，这仅仅是颅相学真理的重新发掘；真理并没有被重构。半高尔主义的欧文主义者通过颅相催眠术发现了许多新的精神官能，他们的行为只不过是强化了颅相学的隐喻基础和哲学基础。某些欧文主义者相信，通过颅相催眠术，他们正为自身确定心理现状。这几乎完全是一种错觉。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没有人对恩格尔杜坚持的有必要根据遗传血统的法则重塑社会的观点提出任何异议。恩格尔杜认为，“在四代中有三代”会使“天然的贵族社会”上升到极顶，并使得“道德崇高、智力卓群”弥漫整个社会。^[114]曼彻斯特科学会所书记的异议则与此不同。他把恩格尔杜的颅相学与其他颅相学家的颅相学相比，倒是宁愿相信恩格尔杜，但他觉得无论是颅相学还是颅相催眠术，对于欧文主义者来说都是一种错误，因为它通过迎合听众的兴奋点而分散了他们对于宣传社会主义和学习如何建设新道德世界的严肃事业的注意力。“在目前这个阶段”，他写道，“令人担忧的是理性宗教家协会只怕会因为与颅相催眠术的联系而拖累自己”。^[115]

然而，到这个时期，普通的欧文主义者几乎没人愿意对这样的警告多加注意。相反，就在几年前，当墨菲和欧文表达了类似批评时，人们对最新的欧文主义实验——汉普郡东蒂特利的昆伍德公社——表现出热情；到40年代初，许多欧文主义者对整

个运动已经失望。这种失望从表面上看与欧文的中央委员会设法解决和谐大厅的财政困难而采取的越来越独裁的方式有关。很显然,这把很多欧文主义者挤到错误的方向上。它就发生在这个社会经济混乱正使得宪章派政治运动获得动力的时期,因此没有理由去责难诸如洛维特和赫瑟林顿这样的激进派在这个时刻离开欧文,因为欧文拒绝勇敢地面对政治和社会现实。^[116]然而,分析诸如克雷格之流对欧文的“共产主义观念”的负面评论,²⁵¹再比较恩格斯对“轮廓鲜明的共产主义”和谐大厅的深情回忆:“它已让人别无所求”,历史研究的重心似乎不仅要放在欧文的“新家长式统治”上,也同样要放在欧文主要社会目标所遭遇的反对上。^[117]至少从事后来看,这条论争的线索似乎被很多欧文主义者所证实,他们在这个时候开始感觉到把主要精力放在传播唯物主义颅相学上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可能是更为“现实”的做法。这部分欧文主义者的推论也很实际,而且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尽管宪章派正与现实展开斗争,19世纪4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仍经受了新一波攻击(被普遍谴责为异教主义),对手们通常把焦点集中在颅相学和颅相催眠术上。^[118]为了回击这种“非理性”,甚至连曼彻斯特科学会所的书记也赞成,颅相催眠术是欧文主义者可以研究的合适对象。^[119]因此,约翰街学院书记理查德·雷德伯恩在1842年给《颅相学杂志》的报导中写道,具有激进思想的工人对颅相学的兴趣之大,竟至形成了“一股潜流……除了那些关注人民活动的人之外没有人对此有所了解,即便那些了解的人也不知道其真正的程度”。在他自己的学院中,就一个颅相学班在埃普斯1840年莅临演讲之后不久就建立起来,每

个季度招生,每次招收 50 名学员,“大部分是技工”。雷德伯恩断言,这种班“不仅是我们这个学院有”,“在本学会的其他学院,颅相学的研究也受到追捧”。因此,他补充说道,碰巧的是,“欧文先生的许多仰慕者无论他走多远都追随他;但也有一些人,像我,并不认为他已经很成功,他并没有更多地强调理解天性和人脑功能的必要性,而我们都赞成天性和人脑的功能是受到教育和外部环境的影响的”。^[120]或许,雷德伯恩要求欧文“激进化”为用颅相学摇旗呐喊的自由思想家的行为无意间模糊了欧文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反资本主义一面,因而抹煞了欧文主义与库姆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区别,从而助长了后者的优势地位。因此,雷德伯恩的通信很自然地得到了罗伯特·考克斯兴奋的公开欢迎,他当时是《颅相学杂志》的编辑。如果社会主义者确如考克斯所说,所信奉的学说与人性相悖,那么,“除了在他们中鼓励颅相学研究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能驱散他们的幻觉”。^[121]

当然,激进的“幻觉”是否会像库姆派所希望的那样完全被驱散是值得怀疑的,可能即便是在雷德伯恩之类的欧文主义者中也不可能做到。工匠文化的潜力一直很大,对统治意识形态的赤裸裸的形式或者调和性形式表示顺从的因素也能够超越其当前形象而轻易地共存于个人和群体之中。^[122]但是,能够确信的是,19 世纪 40 年代初,就在欧文关于另一种共产主义社会的计划即将崩溃的时候,欧文主义者关于颅相学的社会主义倾向的争论变得和卡莱尔早期试图证明颅相学实质上是上帝科学的行为一样,即便不是同样荒谬,也同样是不合适的。实际上,欧文的密切合作者,曾经是卡莱尔的反欧文主义颅相学的批评者

劳埃德·琼斯,在1843年发现,理性宗教家协会的分支机构对社会原理越来越淡漠,部分原因是有些人“分裂出去,加入了颅相学委员会”。^[123]这样的观察使得人们很难摒弃雷德伯恩关于欧文主义走向颅相学的片面报导。结合更多的其他证据,似乎证实了E.P.汤普森的分析,像E.T.克雷格这类人的颅相学化生涯“几乎注定成为19世纪工人斗争的一种象征”。^[124]不仅是比雷德伯恩更具有历史重要性的欧文主义者,诸如约瑟夫·马里奥特、洛维特、霍利约克和查尔斯·索思韦尔等人,而且像阿瑟·奥尼尔*和托马斯·库珀这样的宪章派也都从根本上感觉到,欧文令人悲叹的缺点(正如克雷格指出的)是他不能理解颅相学的“实际后果”。^[125]因为对他们来说,既然《人类体格》(就像洛维特向库姆所承认的那样)已经首先揭示了“关于[我们]自己天性的清晰观念”,他们对欧文的反对就完全可以预料。^[126]因此,这些人的未来生涯也可以这么分析。洛维特最典型:由于相信库姆的颅相学“在历史上第一次”使教育成为“科学”,他抛弃了政治上的宪章主义,在1842年建立了霍尔本国民会所,一个有着自己的颅相学班的成人教育场所。1848年,在宪章运动的高潮期,他在国民会所为儿童开设了第一个库姆式的世俗走读学校。为了进一步“出卖他伟大的智力”,用宪章派人士谴责的话来说,他全力以赴地撰写像《基础解剖学和生理学》(1851)这样的著作,在书中他强调“折磨人类的所有弊病”都可以追根溯源到“对于这个世界某些伟大的自然和道德法则的忽视或侵害”。^[127]

然而,我们不能把这些激进分子中的任何一个人简单地看

作向中等阶级价值观“投降”(甚至连洛维特也不是)。相反,在平等主义和反资本主义逻辑的应用似乎越来越不现实的社会背景中,对社会结构进行有判断力的评估以及对社会和政治转型的强调,就可能被人们对于唯物主义颅相生理学和世俗自然主义的狂热所淹没,后者调和了人们对于竞争和等级力量的信仰,使之成为追求个人自我改善和个人成就的刺激物。^[128]在现实中,19世纪中期的洛维特、索思韦尔和霍利约克之流是早期卡莱尔的继承人。^[129]他们和卡莱尔一样,对社会关系的看法通过颅相学得到再次确认,这些关系植根于前工业社会独立工匠的历史。他们停止关于颅相学真实性的争论仅仅是为了利用这门科学来实现他们进行自我改善的世俗目标,但他们这么做实际上削弱了继承性。一方面,他们忽略了颅相学在激进文化中的社会前提,使得唯物主义、世俗主义以及“物质清教主义”品德成为目的;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失去了把颅相学放在另一种更广泛的、潜在的“理性”社会概念中的愿望。由于把库姆或恩格尔杜的颅相学作为理性和真理的指南,洛维特和霍利约克之类的激进分子对于寻找精神解毒剂来纠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力量的需求熟视无睹。对他们来说,后期的卡莱尔或和谐论者利用颅相学是不可理解的。^[130]颅相学内涵以及激进派利用颅相学所具有的丰富辩证被单向度转型,颅相学回复到潘恩、西尔沃尔和早期卡莱尔的唯物主义领域,但颅相学命运之轮的这次倒转比任何一次关键时刻的刹车倒退的程度都大,它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对这门科学的利用区别开来,其重要性已经消失。^[131]

大体而言,剩下的只有言辞,它不是自然权利的言辞,不是社会契约的言辞,也不是同私有财产作斗争的言辞,而是同抑制许多人掌握知识的权力作斗争的言辞,这种知识“通过砸碎那些禁锢思想、威胁理性的锁链并摧毁专制统治,为精神自由”铺平了道路。^[132]这样的言辞,与库姆、马蒂诺和布鲁厄姆之流的言辞难以区分开来,侵入与社会无害的渠道,掩饰了其顺从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的真相。实际上,通过这种言辞把“社会主义”与库姆所杜撰和赞美的“世俗主义”对等起来,就使得社会主义本身对社会无害。正如霍利约克在1844年所指出的,“论述社会主义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不必担心冒犯任何人”。^[133]

然而在最后的分析中,如果说对19世纪初激进分子信奉颇相学的审察将进一步揭示而不是驳斥被实证主义人性观所调和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作用,那么它也显示,从挑战这种资产阶级霸权的“形而上学大本营”的角度来说,在布莱克对牛顿形而上学进行批判之后,并非一切都是黑暗的。尽管现代资本主义科学文化在拉瓦锡被处死时可能遭遇了最初也是最后的重大的标志性“否定”,此后对于科学的反应并不是消极的、非歧视的和恭顺的态度。尤其是那些沉浸在不同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的社会关系、人类抱负之幻想中的人,关于实证科学的“无知灵感”继续在关键时刻闪现。^[13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前达尔文时期诱发这类重要反应似乎最多的自然知识团体,与那些最积极地公开或隐蔽地阻碍对科学和社会进行重大反思的团体是一样的。颇相学迫使人们用它来攻击传统的宗教权威,促进人

们对科学的实际兴趣,加强大众对生物学的物质确定性和道德确定性的信仰,通过这一切,颅相学有助于把工人群众的注意力
255 从具体的历史力量中转移出来,投射到个体病理学上。不仅如此,颅相学通过引导工人分享统治阶级关于大脑实际特征的图像,诱导工人默认统治阶级管理他们的权力。因此,颅相学最重要的作用是进一步束缚了工人群众作为一个整体来决定其自身历史和现实的能力。



结 语

256

虽然今天的人相学和颅相学是不成熟的呆板的体系，但它们却建立在永恒的基础之上。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39年10月：

《日记》，第6卷(1966)第285页。

要记住：历史可能会留下重要的蛛丝马迹……，条件会变化，开始某种进程所必需的条件也可能被进程本身所摧毁。

R. 卢奥廷和 R. 莱文斯，“李森科学说的问题”，载希拉里·罗斯和斯蒂文·罗斯编：

《科学的激进化：自然科学的意识形态》

(1976)，第60页。

有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人会找到另外的魔力，使得他在现实的压力下所释放的巨大威力回到他的控制之下。但是这种力量与最初调动这些威力的力量并不相同。当然，也有可能发生人们淹没在自己所制造的血泊中的

情况。

彼得·伯格：《宗教的社会现实》
(1969)，第 10 页。

从 19 世纪上半叶的视角来看，没有什么东西比颅相学在 19 世纪下半叶的急剧衰落更加确定无疑。颅相学完全从对科学的渴望堕落为遭人嘲笑的性格分析术。“这一刻，所谓的心理学和颅相学科学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无可救药的失败”，人类学家詹姆斯·亨特在 1867 年如是写道。他补充道，“这不仅被独立的思想家所感知，甚至也被普通公众所感知，在很多情况下心理学家和颅相学家本人也感觉到这一点”。^[1]在“独立的思想家”中就有 G. H. 刘易斯和赫伯特·斯宾塞。刘易斯从实证的视角出发，认为高尔把精神功能的研究指派给生物学以及在揭示大脑区位问题方面是革命性的创新，他仍认为颅相学是盲目信仰者所推动的极不完善的科学。斯宾塞的看法也与此类似：正如 257 亨特所说，“可能没有一位现代心理学研究者像他那样如此盲目地接受颅相学的基本原理”，但斯宾塞在其《心理学》(1855)中仍公然强烈反对“颅相学家的非科学论证”，并且也像刘易斯那样谴责颅相学的支持者是头脑简单的教条主义者。^[2]

查尔斯·布雷也和其他颅相学家一样，证实了亨特的论断。他在 1885 年发现，

颅相学现在已经变得声名狼藉，首先是因为神职人员给它

加上了会导致唯物主义的坏名声；其次是因为不合格的“教授”为了获利而追随颅相学，他们自称能揭示的东西远远超出当前的颅相学所能说明的范围，即便他们是合格的颅相学阐释者。^[3]

其他人试图把颅相学的“失败”归咎于“唯物主义者、自由思想家和异端”（特别是恩格尔杜）；也有一些人完全或部分地把它归咎于颅相学与催眠术的混合（恩格尔杜再次成为主要罪人）。^[4]绝非所有人都像许多医学界人士那样感觉到，高尔学说的通俗化是高尔的“不幸”；而自由思想的历史学家、议员和 19 世纪 90 年代英国颅相学学会副主席 J. M. 罗伯逊的观点似乎很独特：当他自问为什么颅相学“会彻底丧失地位”，他

毫不犹豫地讲，这实际上是一个经济过程。换句话说，当人们发现颅相学本身“无利可图”，以颅相学为业将像牧师那样受到排斥时，科学界尤其是医学界逐渐冷淡颅相学……，法国的情况和英国类似，颅相学衰落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宗教—经济的压力。^[5]

然而，无论是颅相学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异口同声地公开谴责“到处给人测算性格的巡游者”、“凭空捏造的头颅检测者”、“颅相催眠术家和算命者”，因为人们认为这些人是使得颅相学前所未有地墮落下去的元凶。^[6]

但是，如果颅相学在 19 世纪中期以后，其知识、社会耐久性

已辉煌不再,它也不能因此而被历史所忽略。和19世纪初的反
258 颅相学言论一样,19世纪晚期对颅相学的“胡说八道”表示轻蔑
的言论是文化的信号,忽略这些信号就和19世纪初忽略颅相学
一样,是知性层面上的傲慢自大。

就像17世纪的帕拉塞尔苏斯主义*和18世纪的占星术那样,经历了前几个世纪在科学、社会和神学方面的重大斗争之后,19世纪下半叶的颅相学前所未有地在人们的日常思维和表达方式等许多方面变得根深蒂固。^[7]许多人当时就察觉到,当颅相学的术语和关于大脑的基本原理渗透进西方语言中时,库姆·式颅相学所赞美的自然主义也悄然潜入大众思想,对现代思想产生强大而无形的影响,在这点上它堪比18世纪的牛顿学说或20世纪的结构主义。^[8]更容易计量的是,19世纪下半叶这门知识在人们想象中的魅力和实际魅力都与日俱增。即便在洛伦佐·福勒*及其表兄弟萨姆·韦尔斯(1820—1875)从纽约乘船在利物浦登岸,着手填补颅相学在英国普及的巨大空隙之前,亚历山大·贝恩就在《弗雷泽杂志》上写道:普通大众是如此熟悉“颅相学对精神的划分”,以致每个人都试图“证实它或者驳斥它,颅相学有着容易得到理解的机会”。^[9]在福勒和韦尔斯复兴颅相学之后,公众对颅相学的关注和热情有了较大提高。确实,

* 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约公元1493—1541),瑞士医生,企图把医学和炼金术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新的医学,其后,随着帕拉塞尔苏斯著作的不断出版以及对化学论哲学持久而激烈的争论,帕拉塞尔苏斯的名字享誉整个欧洲,其主要思想被称为帕拉塞尔苏斯主义(Paracelsianism)。——译注

一位作者在 1907 年说道：“这种推测性的关于个性的科学标准变得如此流行，以致我曾听到一位著名的牧师谈到，在他给一位青年人讲解灵魂之前，他希望可以获准触摸其头骨隆起。”^[10]

早在 19 世纪初，颅相学的魅力是多面的，跨越社会各阶级。尽管到 1858 年时，帕默斯顿勋爵（花费 50 镑，向颅相学家弗雷德里克·布里奇斯）征询颅相学的忠告可能是例外行为，但是中等阶级中仍有人鼓励自己的儿子阅读斯迈尔斯的《自助》、《节俭》、《责任》和《性格》，颅相学的描绘仍被看成决定教育和职业以及雇用仆人的有用的前提条件。^[11] 资产阶级专业人员也没有完全疏远该科学：虽然在刑事改革、精神病学和教育方面对该科学的明确支持远远少于以前（它直接的开花结果的作用已经实现），与头盖测量和人相学相关的研究仍被看作具有重大意义。种族人类学这个新兴领域尤其如此，“人体测量学”开始盛行起来。^[12] 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詹姆斯·莫蒂默先生在《巴斯克维尔的猎犬》（1902）中自称“业余科学家”，他的业余爱好是收藏和测量头骨，并且没完没了地谈论头骨学，在这方面他绝非独一无二。当然，福尔摩斯本人和年轻的威廉·奥斯勒一样，喜欢用颅相学来仔细检查罪犯的头颅，这个嗜好受到 19 世纪晚期意大利刑事学家、人相学家切萨雷·隆布罗索（1835—1909）的影响而获得了可信性。^[13] 弗朗西斯·高尔顿、卡尔·皮尔逊和达尔文之子伦纳德对优生学和心理测验学的研究兴趣和研究工作也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于颅相学。伦纳德在 1911—1928 年间曾担任优生协会主席，他发明了测量人体的测径器，这种测径器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测量中小学生头颅的常规仪器。^[14] 正如第一

章所指出的,戴维·费里尔等人对于大脑定位的研究很显然是从早期颅相学中延伸出来的。

但是,在19世纪后半期最忠诚地保护和追求颅相学的,首先是工人阶级的通俗文化。随着颅相学日益成为“时代特征”之一(这是布鲁斯特在1863年所贴的标签),它适应了普通工人的实际需求、娱乐、渴望和理解力。到19世纪50年代,诸如“小高尔”的《日常生活中所证明的颅相学的实际效用》(格拉斯哥,1856)或约翰·密尔的《实用颅相学问答集》(利兹,1851)之类的著作与陈旧的赞美自然法则的格调高尚的小册子或指导大脑解剖学的著作相比,更容易买得到也更容易研究。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作的出版地多半是北方的大工业城市。颅相学的这些新消费者既没有金钱和耐心,也没有胃口去消化那些社会地位优越的人所吹嘘的改革成果。^[15]

260 1860年以后,反映、支持和适应这个新市场的是50多位颅相学的实践“教授”。^[16]他们中的大多数(但不是全部)出身于和他们的顾客相似的底层社会背景。就像查尔斯·肖在19世纪末的回忆中所描述的制陶业中某个粗俗的“穷人比尔·S.”一样,对于某些人而言,做一名颅相学“教授”是一种摆脱贫穷、丑陋和屈辱的悲惨生活的途径。^[17]他们要么通过学徒身份获得这条出路,就像J.D.伯恩斯(1835—1894)在1863年成为福勒的随从后那样;要么就采取更常见的途径,即学习一门颅相学课程,比如巡游颅相学教授莱特(他也讲授动物催眠术和动物标本剥制术,每一节课10先令!)所讲授的颅相学课程,或者是利物浦的弗雷德里克·布里奇斯精神几何学学院、莫克姆的约翰·

泰勒颅相学研究院(11讲3个几尼)以及德维尔的继承者科尼利厄斯·多诺万*经营的伦敦颅相学学院所教授的课程。这样的教育机构也从事私人咨询服务,它们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很迅速。^[18]但是,所有这类教育机构都有至少一打像“穷人比尔·S.”那样的人,寒冬季节他们在小店和前厅为人看颅相,盛夏时节他们在布莱克浦、莫克姆、布赖顿、博内茅斯等地的码头和沙滩为人看颅相。鉴于这些从业者本人只有侥幸才能获得在基督教青年会(YMCA)演讲的机会,有人猜测,他们不像莫克姆颅相学博物馆(建于1872年)的马克·穆尔斯先生那样,“从不造访人们的住所或商业场地去进行检查,从未这么做过”。^[19]

如果说颅相学职业对于某些人而言基本上是一条谋生之道,那么对其他人而言,它可能是宪章运动之后失败和平静时期激进政治的一种退路。詹姆斯·阿什克罗夫特·诺布尔在1873年所虚构的人物威尔克斯先生非常逼真(很可能是以约瑟夫·巴克为原型):

他起初是一名鞋匠和卫理公会的地方传教士。在宪章运动高潮时期,他投身于政治,成为所在地区最著名的宪章运动支持者,好不容易才躲过牢狱之灾。当宪章运动失败时,他开始从事神学、颅相学和劳工文学的演讲;现在他定居于英格兰北部的某个城市,在那里为一位书商管理商店,并检查人们的头颅——当然是用颅相学的方法。目前他是一名最 261
前卫的怀疑论者。^[20]

然而,到诺布尔写作的时期,诸如威尔克斯先生或金斯利在《阿尔顿·洛克》(1849)中所塑造的几乎与威尔克斯先生一样的桑迪·麦凯这类人,正成为过去时代的人物。尽管颅相学恰如我们所见,对于少数具有独立思想的平民自学者来说,仍然是反独裁主义的术语;但是,该世纪早期激进工匠的传统卫士所磨砺的特殊锋芒已经钝化。在维多利亚中期的英国,无论是在不信奉国教的地方教堂还是在反教会的大城市俱乐部区,人们较少听到反叛社会的老调子,取而代之的是进步伦理以及自助并实现“对我们自身和环境的正确理解”这样的论调。^[21]威廉·马蒂·威廉斯*是19世纪40年代伦敦技工学院颅相学班的毕业生,他在1894年出版的《颅相学辩护》当时已属陈词滥调,就好像写于1834年的书,他断言,“颅相学最大而且最无可比拟的现实效用是它作为激励整个人类的必要手段被应用于自我修养的事业中”。^[22]同样具有怀旧情结而且对社会无害的是重新提出把人们从旧神学的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世俗主张,但是这样的论调对于年轻一代而言并非没有意义。“福勒和韦尔斯先生的演讲已经使得本国的颅相学获得了与他们来之前不同的地位”,一位格拉斯哥工人1863年给福勒作告别演说,在他看来:

福勒先生使我们对人类使命和命运有了更深切、更崇高的认识。他的教导与我们所习惯的教育有点不同。他不再告诉我们,我们是贫穷、堕落、悲惨、有邪恶倾向的可怜人,如果我们今生改善了悲惨和不幸,来世遭遇更惨的生活,那么我们的所得超过了我们的应得。福勒先生通过颅相学向我

们标明……使用它们[精神官能]从精神和道德上来提升我们自己,不仅是我们的特权,也是我们的职责;同时,我们像现实世界所承认的那样,渴望接近造物主的完美程度,并不是对上帝的亵渎。^[23]

福勒、韦尔斯的颅相学和威廉斯的颅相学一样,是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资产阶级颅相学鼎盛时期形成的,并且始终保持其固有模式,因此,其言辞有着这种连续性就无需惊讶。这种连续性也可以用来证明,那些起初曾在大众中唤醒这门科学的社会力量并没有变化,更不用说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关系了。 262

然而,在曼彻斯特接受约翰·埃普斯治疗的那些年长病人在60年代听了福勒和韦尔斯的颅相学和生理学演讲后,“强烈地想起了……过去的时代”。尽管如此,在这门知识及其魅力的新、老阐述之间也还存在着细微而重要的差别。^[24]对遗传论的过分强调,尤其是对种族和种族退化的强调,就是一个局部的变化。查尔斯·罗森堡发觉,在美国,正是在19世纪40年代,“关于改善颅相的劝勉作品……日益卷入关于遗传学的公开讨论”。^[25]在英国,这种变化部分而言是福勒家族的美国影响所导致的直接结果。约瑟夫·巴克在游历美国时,对福勒家族更加世俗前卫的直率留下了深刻印象,1851年他开始在利兹出版他们著作的普及本。其中有奥森·福勒最畅销的《遗传世系:应用于人类改良的法则和论据》(1844),以及他关于“色情”、“爱与出身”和“结婚”的各种小册子。这些著作带有“美国佬式的粗糙”和“令人痛苦的粗鄙”(霍利约克的评价),但它使福勒家族在教

育水平不高者的语言中增加了新思想,这些思想已经由施普茨海姆和库姆普及开来,但是在50年代却被视为颅相学的核心成就。^[26]1857年,也就是福勒家族的著作还没有普及的前几年,同时也是达尔文主义在大众中产生影响的数十年前,休·米勒就指出

对颅相学的信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遍,以至于人类就和某些劣等种族一样,为了发展其内部最好的东西,极大地依赖于我冒昧地称之为品种纯正的东西。好性情的有智慧的父母将生育好性情的有智慧的后代,这已经成为一种公理。^[27]

在颅相学的重点和评价方面所发生的重要变化是,资产阶级对社会堕落,尤其是因为想象中工人阶级耽于声色放纵而产生的社会堕落,越来越感到恐惧。教育人们控制生育,正如 F. B. 史密斯所说,不仅是“向社会下等阶层灌输人生的力量本身就在于科学和自然力量的最隐秘也最有效的方法”;^[28]而且,通过对科学和自然力量的神化,也是向工人群众灌输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最有效的潜在方法,库姆在《人类体格》中已经传递了这些资产阶级价值观。维多利亚中期和晚期的颅相学文献中充斥着关于沉湎性欲的罪恶的讨论,在这些问题上,把颅相学家称为某种全知者也并不异常。正如一位反手淫的作者在19世纪70年代的警告,

无论怎么掩藏,孤独的放荡不羁者可以……通过多种迹象被洞察;颅相学家能够破解好色图上的每一条轮廓,并解释心脏的秘密运行和语言。如果荡妇可以在大型聚会中根据男人的好色迹象挑选到自己的伴侣,那么生理学家和颅相学家当然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根据类似的迹象找到好色的痕迹。^[29]

关于种族(不是激进主义)和性纯洁的原始优生学的思想观念在维多利亚晚期的颅相学中变得更为突出,但是,完全从这个角度对颅相学进行定性则是一种歪曲。颅相学最流行的印象与它的内容(仍是描述性和解释性的)不一样,根据这种印象,颅相学最突出的特征是更加明显的反精英的反知性主义。这种反知性主义的性质不同于该世纪早期因追求地位而涉足该科学的专业人士。尽管它继续赞美实用性、经验和对抽象哲学化的反内省,与此同时,文学作品也前所未有地反对专业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群体的仲裁力量。库姆及其同伴当然先前曾引领过针对学院派知识精英的平民民主言论,但是他们也公开地渴望得到他们声称予以蔑视的社会—学术地位,1836年库姆竞争爱丁堡逻辑学教授职位就是一个典型例证。19世纪下半叶的颅相学家矛盾心理少得多,也更加坚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已不可能谋夺学术地位,但似乎更主要是因为他们确实不赞成那些自称比其他人学识更丰富因而拥有特权和权势的人的专横行为。“我们的大众作家们认为所有事物都与自然哲学有关,他们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谎话建立在所观察的事实基础上,对他们应该

毫不犹豫地予以揭露”，一份倡导大众颅相学和占星术的新杂志的编辑宣称，“许多所谓的哲学家因其愚蠢和笨拙将继续受到斥责、蔑视或嘲笑，因为这是他们每个人都应得的结果”。^[30]

尽管威廉·马蒂·威廉斯从来都不是人民权利的自觉的发言人，尽管他非常坚决地反对“高尔颅相学”的庸俗化，然而，他为了驳斥知识分子，仍支持颅相学的普及者。他认为，颅相学要实现其提升人类的“特殊作用”，它

必须是一门通俗科学，是平民大众的科学，是最普通的人民大众的科学，是所有人的公共财产，包括最贫困的穷人。如果它一开始就被有学问的贵族阶层所接纳，或者接受某些特殊人群（他们把公立学校当成会导致“老百姓”对自身状况不满的危险机构）的资助，它的作用将受到阻挠。

为了使颅相学的未来发展更健康、更有收获，颅相学需要继续在一段时间内处于可以激奋人心的逆境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它将受到知识界的激进民主主义的庇护、支持和倡导，它也将受到那些为自己着想并敢于实现其信念的人的庇护、支持和倡导，即便这些人与流行的传统风尚并不相符。^[31]

这样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源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的语言，而资产阶级理论家的语言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更久远的雅各宾派对知识的需求，这种知识能够被所有人理解和分享。但是，也不仅如此：明确地讲，它表述了工人群众

对他们在社会和知识层面被排斥、在文化上被驱逐的怨愤；隐蔽地讲，它是一种新的中肯的社会批判。基于自然权利和禁欲苦行的美德对资产阶级“特性”的合法化让位于基于知识优越性（以及学术证明）对资产阶级“特性”的合法化，在这样的背景中，对颅相学在“普通大众”中的地位所作的断言就不仅仅是对傲慢 265 地把反颅相学作为知识精英主义资源加以利用而进行的自私的挑战。^[32]无论它是多么地漫不经心，它对正成为维持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权力的主要理论基础的思想也是一种挑战。维多利亚晚期自力更生的颅相学故意强调“简单和实用”（有时近乎反科学），实际上它是平民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回应，那些文化帝国主义者制造了一个神话，认为知识分子和科学家所统治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更好、更自由的社会。^[33]

在这方面，自力更生的颅相学与 19 世纪下半叶的医学争端和自体痊愈的增长同步，也与对唯灵论兴趣的增长一致，付出和收获也一样多。现在，这两种现象都开始吸引历史学家的注意力，而且很显然的情况是，无论与颅相学的实践的和理论的联系多么微弱，从心理学、社会 and 修辞层面来说，对这些联系的信任与对颅相学的信任的基础正得到相互强化。^[34]有许多人也牵扯其中；确实，1853 年，在背离颅相学的丹尼尔·诺布尔看来，一个

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当今时代几乎所有层面的哲学蠢货……都从气数已尽的颅相学学派获得元气。有些人成为水疗的信徒或坚定支持者；其他人则成为超感视觉和催眠

预知的信徒；另一些人则成为顺势疗法的支持者；而我相信，还有一些人已经转变成圣歌说唱者！^[35]

诺布尔相信，这些与颅相学相关的新兴趣只不过是“过分轻信”的表现。当然，他的这种信念被他本人先前对颅相学的热情所掩饰。与颅相学的这些联系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平民文化中，与异端和自助医学的联系持续已久而且根深蒂固。正如第六章所揭示，人们理解和控制自己大脑的愿望对于公认的理解和控制其身体的重要性而言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反过来讲，理解和控制身体也是不被宗教权威所控制这个愿望的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颅相学与禁酒节欲、素食主义、催眠术治疗、生理学和大众卫生、自学成才和世俗主义密切交接。在 19 世纪中期以后，在医学界的地位与通俗医疗法如顺势疗法、水疗法、医学植物学以及各种各样外行和内行的医学异端的地位日益接近并声称自己比后者更权威的情况下，这种言语的一致性得到了强化。在这种新的背景中，颅相学前所未有地与处于反文化前沿的异端医学成为战友。从疗效的角度来看，人们发现，正统医学并没有比以前更好地履行诺言。这个事实加强了异端医学思想和实践活动的现实魅力和修辞魅力。因此，在 19 世纪下半叶，标准的历史叙述把重点放在医学学科放弃颅相学方面是一种年代错位。^[36]更正确地说，是绝大部分大众在 1858 年 8 月《医疗法案》通过以后放弃了该学科。（确切地讲，就在乔治·库姆死于萨里郡的一个水疗基地的那个月份。^[37]）

招魂术既是一种外行的治疗形式，也是一种信仰。它是在

19 世纪末接近高潮的一种文化和反文化现象。尽管如此,它仍与颅相学以及其他异端思想和实践活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及至 20 世纪,在中等阶级神智学团体内部,颅相学就像在平民的招魂术讲堂中一样,仍是一个令人喜爱的话题。^[38]因此,那些依然经久不衰的话题之间的直接联系仍继续存在,即便它们不像与医学争端的那些联系那样普遍存在。托马斯·蒂姆森是莱斯特地区“有关颅相学、心理学、卫生学、水疗法等学科的密德兰学院”(建立于 1882 年)的颅相学家,他在 19 世纪 90 年代谈到“人类的迷人体格”是“物质和精神之间的最高等级”,灵魂由“具有磁力的两极”构成,“最大、最卓越、最强大的部分位于头脑的中心和顶部,就位于代表坚强的颅相学器官的区位或脑回之中”。他这么说,其实是在延伸该科学与神秘、浪漫和新柏拉图主义传统的联系,这些传统与 19 世纪 40 年代格里夫斯以及和谐论者所追求的传统并没有什么不同。^[39]如果不太断章取义的话,与颅相学的联系至少能够回溯到歌德。我们在前一章已发现,这些联系通过颅相催眠术得到普及和强化,导致唯物主义大脑理论的自相矛盾比真实更加明显,而这种大脑理论是有助于对“非理性”和非物质的兴趣的。颅相学唯物主义和颅相催眠术所暗示的唯物主义都有助于反对神职人员的权威和干预。招魂术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一种使超自然物自然化的手段,它和颅相学一样,对世俗主义作出了贡献。既然人们经常根据实证主义科学理性来考察招魂术本身,那么维多利亚晚期的招魂术在何种程度上是对基于实证主义科学理性的社会秩序进行贝格松式的含蓄的活力论批判,^[40]则令人怀疑。然而,招魂术是最典型的

反知性论,因此,它就和维多利亚晚期的颅相学一样,含蓄地谴责了知识分子对现存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理性化。无独有偶,诸如曼彻斯特的中间人 E. W. 沃利斯夫妇经营的那类书店在为招魂术和神智学的著作做广告的同时,也为论述自由思想、相手术、宗教、生理学、医学和颅相学的“各种进步文献”做广告。同维多利亚晚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官员的作品相比,福勒、R. B. D. 韦尔斯、詹姆斯·科茨、亨利·S. 德雷顿等人的颅相学著作与查尔斯·布雷德洛、G. W. 富特、H. M. 海因德曼、罗伯特·布拉奇福德以及 J. M. 罗伯逊等为劳工和自由思想代言者的著作一样,具有一种天生的地位。^[41]

维多利亚晚期自学成才者文化中的颅相学摆脱了先前对资产阶级的依附,转而反对资产阶级专业人士的特权,这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具有集体主义言外之意的自决意识。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威廉斯写道,“平民大众”已经确实把这门知识变为己有,傲慢的知识分子有理由对此进行非难。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颅相学的头颅现在丧失了 19 世纪 20 年代努力争取的科学形象——各种可以辨别的人类活动被图绘进精神官能中(见图 8)。

但是,和 19 世纪早期一样,激进派出于说服效果而利用这门知识和人们对该知识的抗议,可能会掩盖自由以及镇压和屈从,这门知识本身会继续使自由失去效力,并继续偷偷摸摸地一点点地灌输镇压和屈从。无论颅相学因为平民的攻击而多么犹豫不决,它仍然保持了一如既往的状态:人性等级秩序的象征和驯化。对颅相学的功能主义假设、颅相学对脑力统治体力的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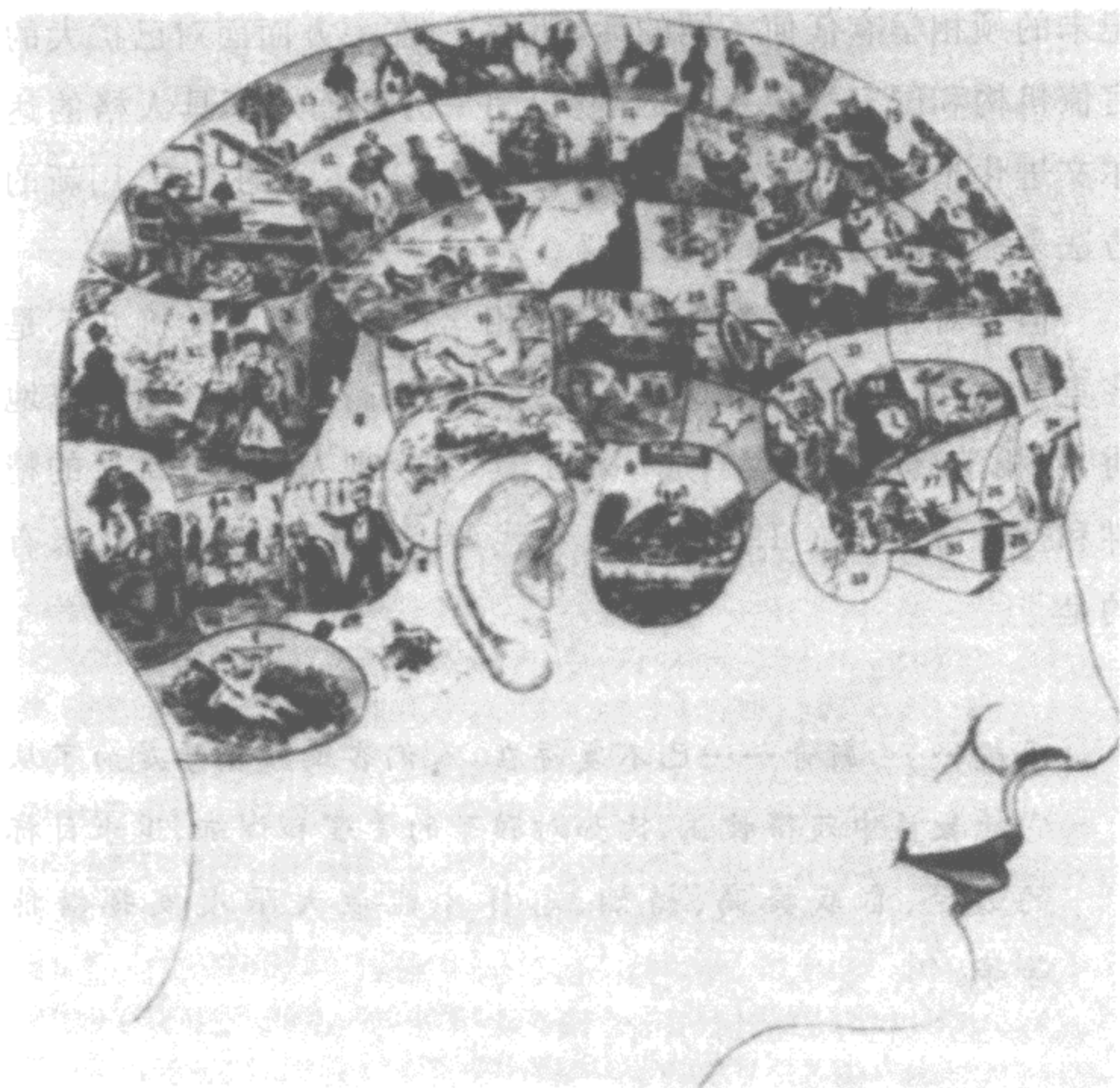


图 8 R. B. D. 韦尔斯的《颅相学图表和象征性头颅》(1878)

认、颅相学对反常的病理学定位与定义,以及颅相学关于碎化和专业化的隐喻,并没有出现文化的驱魔人。如果人们通过对该科学的研究,仍然感到自己从诸如前定论等宗教信条的奴役中解放出来,那么就没有必要由此发出任何命令,去随意调查人格或影响共享的社会行为。相反,和以前一样,颅相学鼓励人们接受经过自己的大脑生物学调和的逻辑和理性的专制。和以前一样,颅相学主要是鼓励人们改变自身去适应体制。如果说 19 世

纪末的颅相学有任何不同的话,那就是:在一方面面对已扩大的官僚机构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幽灵,另一方面面对不具人格的达尔文进化论的种族简化论时,颅相学对个人主义的赞美,用新的方法来衡量的话,具有解放意义。

269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颅相学产生兴趣的动机并不是在竞争性社会秩序中寻找自己位置这样崇高的东西。更谦卑地讲,颅相学继续被仅仅当成一种工具,去实现人生绝大部分的精神和社会命运。在19世纪70年代,在某些人看来,前所未有的是

乐趣……,新奇……已不复存在,人们咨询颅相学是为了从它的教益中获得收益,比如对孩子的管理和训练、追求目标的选择、自我提高、婚姻、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潜能等等。^[42]

因此,罗伯特·特雷塞尔在19世纪末写道,颅相学似乎与储蓄银行、绝对禁酒、性节制、主日学校、擦靴子以及各种简单、平常而且通常是利他性的事情是一回事,它使得工人群众要么从宗教角度要么从世俗角度赞美个人主义,因此在政治上助纣为虐,帮助那个在经济上压迫他们的阶级。在特雷塞尔看来,颅相学咨询业就是在骇人听闻的阶级剥削中继续向工人群众灌输一种错误的自我意识或一种关于社会自治的错觉。特雷塞尔在《衣衫褴褛的男慈善家》中关于“颅相学家”那一章中没有正面对抗颅相学,这或许表明他意识到,比他所塑造的人物斯利姆先生的

生活条件更艰苦的工人,也得依靠这门知识维持生计。但似乎正是这些斯利姆们——那些努力超越本阶级的人,最容易积累这门知识,并且通过假装的深奥,津津乐道于“使自己的工人同伴们震惊”。^[43]

但可以认为,正是因为工人群众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被固定在被压迫阶级,感觉到维多利亚后期社会关系更加牢固稳定,并对时代特性普遍持较为悲观的态度,才使得特雷塞尔视之为压迫的标志和象征的颅相学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成为人们需要和追求的东西,它被当作一种世俗宗教手段,藉之可达到自我满足、获得慰藉、实现希望、证明无所不包的宇宙规划和持续的和谐有着不可磨灭的证据。^[44]和招魂术一样,颅相学继续充当着“廉价、简单而便捷的神启”。^[45]1869年《大众科学评论》的一位评论员评论道,公众“在得不到任何补偿的情况下”应该会抛弃颅相学,几乎是不可相信的事;只要颅相学通过减少其模棱两可的含糊性而赋予经验以意义、秩序和明显的精确性,反对这门知识体系的科学界人士就只会“迫使他们的听众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能和‘专家’争论!”^[46]颅相学家与这些“专家”相反,他们继续处理生与死、性与家庭、秩序与意义这样真正重要而持久的问题。“颅相学家的书房或咨询室完全可以看作一个圣殿,”博内茅斯的颅相学家 J.J. 斯帕克在 1891 年写道,

在履行其日常职责期间,他就像牧师一样听取人们的忏悔,为人们的灵魂问题提出忠告,像医生一样对健康问题提出建议,像法官一样在互相争辩的两方之间作出准确抉择。

除了习惯性地表演这三种才能以外,他通常还是催眠术士、医疗电器师、水疗法专家、心理学家和占星术士。^[47]

截至此时,几乎没有颅相学家再渴望成为社会变迁的理论家。面对另一股社会、经济和知识变化的急流,面对大众社会中人们对人性更为冷漠的态度,更准确地说,他们所起的作用完全是作为解救人们生理和心理痛苦的救星,去重申对现在已经成为理解和评价城市工业社会生活的“传统”方式表示认同的基本原则。颅相学巧妙地能从能改变一切的王者之剑变身为“起源健忘症”的渊源,而这种“健忘症”是一种认为“事物总是一成不变”的幻觉。^[48]

通俗达尔文主义、优生学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流行的弗洛伊德学说等现象渐渐侵蚀并最终摧毁了 19 世纪颅相学的科学、艺术和宗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切尘埃落定,伦纳德·达尔文的人体测量器已被搁置,药店的橱窗中再也见不到石膏模型。像颅相学这样的事物永远都不会再现,至少没有一事物能有颅相学那样的能力,能够把不可捉摸的事物演绎成可以感知的事物,同时还能全面解释人类心智,乐观地预报人类的处境并对其施加影响。

271 但是,如果说把大脑理论和性格科学结合起来的颅相学不会长久永存,那么它在文化意义方面的遗产却能永久存在。尽管 19 世纪对高尔学说有着各种各样的抵制,但是这门学说却超越了各种各样的心理学,在大众的思想中树立了这样的观念:人

类的行为是能够进行分类和衡量的；不仅社会、经济和知识的成功可以还原为大脑器官的紊乱，而且犯罪、行为不良和嗜好也可以还原为大脑器官的紊乱。^[49] 尽管斯蒂芬·乔罗弗所描述的“从颅相学到精神外科学的道路”并不是一条直道，但毋庸置疑的是，“智商学”和应用心理学正是从颅相学停止的地方起步的。^[50] 在去除了颅相学生动想象的情况下，新的精神测试方法以超越以往的广泛程度继续使得大脑尤其是智力官能成为众所周知的文化器官，鼓励人们竞争性地关注其自身的差别，并从本质上使得 19 世纪初期的颅相学曾经自然地对劳动力进行的等级分工变得合法化。特别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到 50 年代期间，作为一门“科学”的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前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与大脑区位和神经生物学一直相关的颅相学以及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的个体—社会生态学和分子生物学所主张的东西：它不仅仅是一种迫使人们认可资本主义社会的等级权威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直率的科学信念，而且它更主要是一种在文化上可以接受的自然主义语言或准则，通过它，人们开始细察其关于社会秩序的认识并加以合理化。^[51] 只要颅相学能让我们集中关注工业资本主义起源时期文化认同的手段和过程，我们在最后用马克思的话来总结就不会显得不合适：“你看，颅相学并不是黑格尔所想象的无事实根据的艺术！”^[52]

附录：截至 1860 年英国的颅相学 公众演讲人

这份 233 名颅相学演讲者的传记名单(其中 21 人是反颅相学家)收录的只是那些有证据表明曾在某个公共论坛演讲过的人。不包括:(a)那些向私人团体,比如颅相学或医学团体,宣读该主题论文的人;(b)诸如约翰·康诺利或威廉·劳伦斯之流,他们只是在生理学、健康法则等的公共演讲中间接或部分地涉及颅相学;(c)迄今还没有证据表明曾作过颅相学公开演讲或教学的实际操作的颅相学家。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推测,这里所列举的演讲人在相近的日期和地点也曾作过其他演讲。

缩 写

- ★ 已出版过颅相学著作的作者
- 作过反颅相学演讲的人
- BAAS 英国科学促进协会
- DLB 《劳动者传记词典》
- DNB 《英国人名词典》
- DSB 《科学家传记词典》
- Lit & Phil 文学和哲学学会或协会



LSA	领有药剂师协会开业证书的人
MEB	弗雷德里克·博厄斯的《现代英国传记》
MI	技工学院
MPA	颅相学联合会成员(建立于 1838 年,但在 1842 年恩格尔杜关于唯物主义和催眠术的演讲以后终止)
MPS	颅相学学会成员

主要原始资料

H. C. Watson, *Statistics of Phrenology* (1836); *Phrenological Journal* (1823—1847); *Phrenological (Anthropological) Magazine and Christian Physician* (1835—1839); *Phrenological Almanac* (1842—1845); *Phreno-Magnet* (1843); *People's Phrenological Journal* (1843—1844); *Zoist* (1843—1856); *Journal of Health and Disease* (1846—1851); *Journal of Health and Phrenological Magazine* (1851—1860); *Human Nature* (1867—1878); *Crisis* (1832—1834); *New Moral World* (1834—1845); *Analyst* (1834—1840); *Penny Mechanic* (1836—1837); *Oracle of Reason* (1841—1843); *The Movement* (1843—1845); *Reasoner* (1846—1872); *Cooper's Journal* (1850); Thomas Coates, "Appendix IV: List of Lecturers [1835]", in *Report of the State of Literary, Scientific, and Mechanics' Institutions in England* (London, SDUK, 1841).

273 演讲人

传记资料主要来自第二章(注释 8)中列出的资料,以及各地的姓名录和个人出版著作中可用的内容。对于那些在《英国人名词典》或《现代英国传记》中有条目可查的演讲者,此处将着重说明其被忽视的方面,最主要是与颅相学有关的方面。

理查德·埃布尔(ABELL, Richard), 1822 年在爱丁堡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生于爱尔兰;1825 年在科克协会演讲;爱丁堡颅相学学会会员(1821 年 11 月)。

托马斯·阿代尔(ADAIR, Thomas), 设菲尔德人, 1843—1846 年在密德兰地区、北方和苏格兰演讲;被称为“把颅相—催眠术引入苏格兰的第一人”;1843 年他在纽卡斯尔关于颅相—催眠术的演讲课程有 1000 多人参加。

• 艾特肯(AITKEN), 医学博士;1839 年在多塞特的布兰福德的文学和哲学学会演讲。

威廉·C. 艾特肯夫人(AITKEN, Mrs. William C.), 1835 年在邓迪演讲,其丈夫在一旁示范。

威廉·C. 艾特肯(AITKEN, William C.), 邓弗里斯的颅相学学会会员(曾任秘书);1842 年在邓弗里斯技工学院组织颅相学展览的秘书,那次展览有 5000 人参加;1835—1838 年在苏格兰演讲。

★迪斯尼·亚历山大(ALEXANDER, Disney), 赫尔的药

剂师和医学作者；他在 18 世纪 90 年代背离国教而成为卫理公会的世俗传道者；1831—1836 年间（继威廉·埃利斯之后）成为韦克菲尔德穷人精神病院的医学监督；当选为伦敦颅相学学会的通信会员（1826 年 12 月）；19 世纪 30 年代在韦克菲尔德、利兹等地演讲；1839 年在索比布里奇技工学院也作过关于健康的演讲；1836 年向乔治·麦肯齐爵士提供了一份有关颅相学价值的证明书。

★马修·艾伦（ALLEN, Matthew, 1783—1845），1821 年在阿伯丁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出身于约克郡一位不信奉国教的传道士之家，是家中 10 个孩子中的最小者；挥霍成性，撒谎成癖，有说服力；1819—1824 年间是约克精神病院的药剂师，先前曾在爱丁堡经营一家商店，曾因债务问题被监禁；1825 年在埃平森林创办一所模范精神病院，死后由他的第三任妻子继续经营；是坦尼森和埃普斯的朋友；曾被选为爱丁堡颅相学学会的通信会员（1821 年 11 月）以及伦敦颅相学学会的通信会员（1824 年 11 月）；1816 年为了钱而开始作颅相学演讲，是继施普茨海姆之后第一个在英国进行颅相学巡回演讲的人；1825 年在利兹文学和哲学学会的演讲，据说是那时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演讲；在 30 年代不太经常演讲颅相学，这个时期他也是伦敦人类学（颅相学）学会的会员。（M. C. 巴尼特，“传记”，载《医学史》1965 年第 9 期，第 16—28 页。）

J. 安德森（ANDERSON, J.），里士满的外科医生；1835 年在里士满演讲；也作过解剖学、生理学和动物学的演讲。

詹姆斯·内皮尔·贝利（BAILEY, James Napier），作家，

也是欧文主义的社会宣传者;曾在圆形大厅作颅相—催眠术的演讲(1843 年 5 月),1843 年在(欧文主义者的)约翰街协会作关于非永久性基础的演讲。

W. 贝克(BAKER, W.), 1848 年 4 月在芬斯伯里大厅与彼得·琼斯辩论颅相学;在伦敦学院作关于基督教证据等的演讲。

274 ★威廉·巴利(BALLY, William), 铸模工和制图者;生于瑞士;19 世纪 30 年代在伯明翰时,曾短期雇用霍利约克为他招徕顾客;1829—1831 年与施普茨海姆一起旅行,后来又与贝克一起作颅相学巡讲之旅;在曼彻斯特国王街经营颅相学画廊,1838 年担任曼彻斯特颅相学学会的管理人员;颅相学学会的成员,1842 年签署了《应急宣言》;为《颅相学杂志》撰稿;被曼彻斯特人评为英国最好的实用颅相学家;19 世纪 30 年代在曼彻斯特技工学院教授石膏铸造并在密德兰地区的其他城市讲授这种工艺;1842 年在曼彻斯特雅典娜神庙演讲颅相学(主要针对母亲和监护人);1848 年退休,回到瑞士,并把他收藏的 1000 多个模型捐给了曼彻斯特技工学院。

★乔纳森·巴伯(BARBER, Jonathan, 1784—1864), 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1820 年前在斯卡伯勒和伦敦行医,1820 年移居美国并成为耶鲁和哈佛最著名的演讲术教师;波士顿颅相学学会副主席;施普茨海姆的朋友和学生;1836 年在美国和加拿大演讲和操作,1838—1842 年在大陆和英国演讲和操作;1842 年与布林德利在布里斯托尔辩论;也在伦敦讲授演讲术;40 年代中期作为顺势疗法医师回加拿大行医;担任麦吉尔大学的讲演术教授,直到 1862 年。(MEB)

爱德华·巴克(BARKER, Edward, 1798—1832), 设菲尔德的削笔刀制造商, 设菲尔德铅厂的经营管理者; 一神论派信徒; 著名的化学家; 19 世纪 20 年代活跃的激进分子; 设菲尔德文学和哲学学会矿物学部主任; 经常在设菲尔德医学协会演讲颅相学; 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会员。

乔治·巴拉斯牧师(BARLAS, Rev. George), 基督教颅相学家; 大约 1835 年在苏格兰演讲。

★皮埃尔·亨利·J. 博姆(BAUME, Pierre Henri J., 1797—1875), 生于那不勒斯; 古怪富裕的激进事业支持者; 先前曾受雇于西西里国王斐迪南做过间谍; 卡莱尔的朋友; 在伊斯灵顿建立了实验花园; 1835 年在米尔班克的威斯敏斯特学院作颅相学演讲。(DNB)

★理查德·比米什(BEAMISH, Richard, 1798—1873), 土木工程师, 1836 年皇家学会会员; 1829 年介子电离冷却实验成员; 1826 年泰晤士隧道的助理工程师, 1850 年前担任格洛斯特和迪安森林铁路的驻段工程师; 是弗朗西斯·比米什(1837—1841 年间科克的议员以及颅相学学会的会员)和诺思·勒德洛·比米什(约克的治安官和皇家学会会员)的兄弟; 居住在靠近切尔滕纳姆的普雷斯特伯里; 颅相学学会会员(1840 年 7 月), 签署了 1842 年《应急宣言》; 为《颅相学杂志》撰稿; 1839—1842 年在切尔滕纳姆和密德兰地区演讲, 1844 年在科克演讲; 也致力于水疗法和雄辩术。(MEB)

★约翰·G. 贝德福德牧师(BEDFORD, Rev. John G., 1810—1879), 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的卫理公会传教士; 在韦克

菲尔德受训成为一名律师；巴斯颅相学学会会员，宣读了几篇有关基督教颅相学的论文，为《颅相学杂志》撰稿；1838 年与纽约的反颅相学家凯尼恩先生进行了一场讨论。（*MEB; DNB*）

★托马斯·贝格斯（*BEGGS, Thomas, 1808—1896*），生于爱丁堡；在利兹成为一名装订商的学徒；1848—1871 年在伦敦做工程师和黄铜铸工；1871—1892 年在索斯沃克做卫生工程师；1838 年接受了禁酒誓言，任诺丁汉禁酒协会秘书，1846 年任
275 国家禁酒联盟的秘书；1842 年担任完善选举权协会的秘书，1848 年任城市健康协会的秘书；教育家；写过关于青少年堕落和死刑的威慑作用等方面的著作；1843 年设菲尔德颅相学学会会员；1856 年新的伦敦颅相学学会主席；1843 年 3 月 6 日，创办《颅相—催眠术辩护者》周刊；1842—1844 年在密德兰地区演讲。（*MEB*）

J. H. 比格内尔（*BIGNELL, J. H.*），1833 年在朴茨茅斯演讲。

比尔顿（*BILTON*），朴茨茅斯颅相学学会会员，因为所作“颅相学所提供的改善人类状况的灵光”的演讲被指责把政治与颅相学混合而于 1832 年退出颅相学学会。

威廉·约翰·伯奇（*BIRCH, William John, 1811—1863*），高级律师；东印度商业公司一位船长的儿子；在牛津的巴利奥尔和新英豪尔接受教育（1832 年获学士学位）；自由思想基金的主要捐助者；意大利的支持者；《莎士比亚哲学和宗教研究》（1848）一书作者；1840 年在曼彻斯特学术演讲会堂作了 7 次免费演讲；1840 年在曼彻斯特技工学院和利物浦技工学院也作过关于

普遍的宗教谬误和关于“来自头脑推理的自然神学”的演讲。
(*MEB*)

★约翰·博伊德(BOYD, John), 爱丁堡人, 在阿伯丁确立了自己作为实用颅相学家的身份; 自称曾做过医学探索者学会的主席和马略卡颅相学学会的荣誉会员; 体面的爱丁堡颅相学家视其为“极度虚荣的人”; 1844—1846 年在苏格兰演讲和操作。

★查尔斯·布雷(BRAY, Charles, 1811—1884), 1853—1856 年考文垂的丝带制造商, 自由思想家和作家, 1846 年《考文垂先驱和观察家》(后改为《先驱和自由新闻》)的经营者; 1841—1850 年乔治·艾略特的朋友和家庭教师, 使她对颅相学产生兴趣; 信奉自由贸易; 在 40 年代对欧文主义产生兴趣; 1843 年建立和主持了考文垂劳工和工匠合作学会; 1845 年创立了一家工人俱乐部; 对顺势疗法、水疗法、催眠术和唯灵论感兴趣; 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会员; 与库姆通过信; 颅相学学会会员(1840 年 5 月), 签署了 1842 年《应急宣言》; 考克斯心理学学会会员; 1836 年为考文垂技工学院作过 6 次演讲, 并在那里办了一个颅相学班。(*DNB*; *MEB*)

★弗雷德里克·布里奇斯(BRIDGES, Frederick, 卒于 1883 年), 大约从 1832 年起成为实用颅相学家; 40 年代在美国旅行收集头骨等; 1850 年前在利物浦的快乐山创立了实用颅相学和生理学学校; 40 年代和 60 年代在北方和密德兰地区演讲。

• ★约翰·布林德利(BRINDLEY, John), 不信奉国教的

传教士,曾经做过剑桥郡马奇学校的校长;重要的反社会主义鼓动家,经常把攻击社会主义与攻击颅相学结合起来,认为颅相学对基督教有着巨大的破坏作用;由于成就卓著,他被任命为宗教和实用知识学会的秘书;1842 年编辑《反社会主义公报》;1838 年、1839 年在伍斯特与朗鲍尔公开辩论颅相学,1842 年在利物浦又再次辩论(其传单写着“为了人民反对颅相学”);1842 年在布里斯托尔与巴克辩论,1842 年在伦敦的艾德尔菲与德维尔辩论;继库姆在伯明翰技工学院演讲以后,被邀于 1836 年在那里作了 6 次反颅相学演讲(收取 18 个几尼的费用),结果导致 W. H. 史密斯作了两次辩驳演讲——布林德利对史密斯的辩驳(在伯明翰艺术学会所发表的第 4 次演讲)导致他连带攻击了社会主义;此后,他把更多的时间用于攻击社会主义而不是颅相学。

276 • ★J. 布朗利牧师(BROMLEY, Rev. J.), 1811—1850 年为卫理公会牧师;朴茨茅斯和波特西哲学学会会员(1822 年 1 月),当时他在那里的反颅相学演讲把高尔和施普茨海姆的学说称为宿命论和唯物主义;1836 年在唐克斯特学术演讲会堂所作的反颅相学演讲,导致了与利维森的论战。

H. 布鲁克斯(BROOKES, H. or Brooks), 主要作关于催眠术的演讲,有时也示范颅相—催眠术;1842 年在肯特开始演讲,1843 年游历南部各郡;具有保守主义风格。

詹姆斯·布朗(BROWN, James), 格拉斯哥的外科医生;1825 年在格拉斯哥技工学院作过演讲。

★威廉·亚历山大·弗朗西斯·布朗(BROWN, William Alexander Francis, 1805—1885), 1826 年红十字会会员,在海

德堡获医学博士学位，1861 年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员；爱丁堡皇家医学学会主席；1830 年在斯特灵做内科医生；1834—1838 年任蒙特罗斯皇家精神病院主管，1838—1857 年任克雷切顿皇家协会主管；1857—1870 年任苏格兰精神病方面的医学委员；1866 年任医学—心理学协会主席；爱丁堡颅相学学会会员（1824 年 4 月），颅相学联合会会员（1840 年 5 月），并出任爱丁堡伦理学会实际应用颅相学理事会成员；库姆家族的密友；作为颅相学演讲者，非常受欢迎（1838 年在邓弗姆林的演讲吸引了 1000 名听众）；出席了爱丁堡颅相学学会最后一次会议（1870 年 12 月）；为《颅相学杂志》撰稿。（MEB）

詹姆斯·比克(BUIK, James)，邓迪颅相学学会会员；1833 年在福弗尔演讲。

★约瑟夫·邦尼中尉(BUNNEY, Lieut. Joseph)，有关“基督教原理”的实用颅相学家；在伦敦摄政王扇形区办公；自称在 1830 年前后开始颅相学的演讲，并为“牛津和剑桥等名校的一半成员做过检查”；约于 1848 年在萨里教育协会发表过演讲，并在索霍相互教育学会作关于“科学研究的愉快与满足感的对比”的演讲。（1850 年 6 月）

★卢克·伯克(BURKE, Luke，卒于 1885 年)，伦敦颅相学学会会员；有神论者和多产作家；1847 年霍利约克—神论派学会会员；1848—1849 年创办《人种学杂志，或人种学、颅相学和考古学杂志》，1854 年该杂志出版新辑（《德比郡广告商》称之为“大胆的异端出版物”），1860—1862 年创办《未来》杂志；1843—1844 年编辑《人民的颅相学杂志》；1843 年在伦敦技工学院演讲

(有一次与埃普斯一起);也作关于人种学和《旧约》编年史的演讲。

亨利·布谢伊(BUSHEA, Henri, 或 Bu Shea, 或 Beau Sheau),“教授”、“博士”和“法学博士”;巡游各地的操作者;1842—1846 年经常在密德兰地区巡游(见图 7);1841 年 3 月到 1842 年 3 月在设菲尔德生活,为了证明颅相学与基督教圣经的和谐,他在那里创办了一家博物馆,并在技工学院和其他地方演讲;1841 年的 8 月成立设菲尔德颅相学学会和反社会主义学会。

乔赛亚·布谢尔(BUSHELL, Josiah),伍斯特珀肖尔技工学院的荣誉秘书,1850 年他在那里作过颅相学演讲;他还就摩西对创世的描述进行过演讲。

• 威廉·约瑟夫·巴特勒牧师(BUTLER, Rev. William Joseph, 卒于 1869 年),1825—1866 年任诺丁汉圣尼古拉斯教派的教区长;在诺丁汉会议室(针对 70 人)发表过一次反对《人类体格》的演讲(1840 年 5 月),道(Dow)对此进行了辩驳。

277 J. S. 巴特沃思(BUTTERWORTH, J. S.),1852—1853 年在马斯登技工学院、1860—1861 年在洛克伍德技工学院作过颅相学和催眠术的演讲,这两个地方都靠近哈德斯菲尔德。

★乔治·道格拉斯·卡梅伦(CAMERON, George Douglas, 约卒于 1845 年),生于苏格兰;1820 年在爱丁堡获医学博士学位;在利物浦开业;大约在 1823 年把 H. C. 沃森引入颅相学;为《颅相学杂志》撰稿;1824 年在利物浦的巴黎会所发表了 12 次演讲,1825 年和 1827 年在那里给少数听众作过演讲;1828 年

向利物浦皇家协会请求讲授颅相学，被拒绝；爱丁堡颅相学学会会员（1824 年 12 月）。

坎托博士（CANTOR），1842 年在利兹、布拉德福德、韦克菲尔德和设菲尔德的技工学院成功地作了演讲。

★威廉·卡吉尔（CARGIL, William），东印度公司商人；1836 年向麦肯齐提供了关于颅相学价值的证明书；纽卡斯尔颅相学学会秘书；J. 卡吉尔博士（也是纽卡斯尔颅相学学会会员）的兄弟；为《颅相学杂志》撰稿；1838 年在纽卡斯尔演讲，导致了与撒缪尔·诺特博士的争论。

伊丽莎（娘家姓沙普尔斯）·卡莱尔（CARLILE, Eliza，卒于 1852 年），女权主义者；圆形大厅的演讲者；理查德·卡莱尔的法定妻子；由于 1843 年卡莱尔死时她身无分文，被哈姆公社收容；对催眠术和神秘科目感兴趣；30 年代中期在卡莱尔、格雷夫森德、伦敦演讲，1839 年在伦敦科学大厅作关于“颅相学的哲学和神学”的演讲。

★理查德·卡莱尔（CARLILE, Richard, 1790—1843），拿破仑战争以后的激进出版商、重要的英国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因为他的煽动性出版物而坐牢；1829 年在曼彻斯特和北方演讲颅相学，在他皈依讽喻基督教后，1836 年在布赖顿就颅相学对祈祷、悔悟和拯救的帮助作用进行过演讲。（DLB；DNB）

詹姆斯·C. L. 卡森（CARSON, James C. L., 1815—1886），爱尔兰人；1837 年在格拉斯哥获医学博士学位；30 多家保险公司的医学顾问；撰文反对死刑和普利茅斯兄弟会；信奉福音主义基督教的颅相学家；做过制图工作；为《颅相学年鉴》撰

稿;1842 年、1850 年在科尔雷因技工学院讲授 3 门演讲课程,1851 年在都柏林演讲。(MEB)

卡斯泰尔斯(CARSTAIRS),设菲尔德的外科医生;1843 年在韦克菲尔德和利兹作过颅相催眠术演讲,1842 年在设菲尔德颅相学学会也演讲过颅相—催眠术;设菲尔德颅相学学会会员。

•★约瑟夫·皮尔·卡特洛(CATLOW, Joseph Peel, 卒于 1867 年),1843 年在诺丁汉和曼彻斯特作过关于颅相—催眠术骗局的演讲。

★理查德·丘奇(CHURCH, Richard),19 世纪 50 年代约克郡国民教育促进会的荣誉秘书;1833 年在奇切斯特文学和哲学协会演讲。

★亨利·克拉克牧师(CLARKE, Rev. Henry),兰开郡乔利地区人;大约从 1825 年起对颅相学产生兴趣;基督教颅相学家;为《颅相学杂志》撰稿;1835 年在邓迪技工颅相学学会作过演讲,1835—1836 年与艾特肯一起在苏格兰各个城市演讲。

★J. G. 克拉克(CLARKE, J. G.),欧文主义者和自由思想家;1838 年前后,为了支持欧文的理性宗教,作过关于颅相学的演讲。

科尔曼(COLEMAN),1837 年在伍尔弗汉普顿文学和哲学学会作过演讲。

278 罗伯特·H. 科利尔斯(COLLYERS, Robert H.),美国颅相学著作的作者和科学发明家;施普茨海姆的英国学生,自称在巴黎与施普茨海姆相见;1836 年去美国,在纽约当上了讲师,讲

授“显微镜世界的奇迹”；1839年毕业于马萨诸塞匹茨菲尔德的伯克郡医学院；后改信催眠术；1841—1843年给新英格兰的大批听众作过演讲，1839年在哈特福特与库姆争锋；1843年在利物浦演讲颅相—催眠术，1845年回到波士顿；60年代回到英国，1863年出席伦敦的人种学学会的会议；1876年因为诈骗被判监禁3个月。（T. 斯托尔，“霍桑的人相术和颅相学”，载《亨廷顿自由季刊》，1974年第37期，第399—400页。）

★乔治·库姆（COMBE, George, 1788—1858），英国重要的颅相学普及者；《人类体格》作者；加入了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但反对该会唯我独尊和排斥颅相学；《颅相学杂志》的支持者、主要撰稿人，曾任其经营者；1820年爱丁堡颅相学学会的创立者；1822—1840年，在爱丁堡、格拉斯哥、伯明翰、巴斯、纽卡斯尔、阿伯丁以及美国和德国演讲颅相学；1822年5月，首次为爱丁堡开展颅相学的教学和演讲；1832年第一次面对工人阶级听众作系列演讲。（*DNB*；C. 吉本：《生活》，1878年版。）

★约翰·坎农（CONNON, John），《泰恩河领航员》编辑；毕业于阿伯丁大学；是1840年关于应用颅相学挑选议会候选人的获奖论文的作者；颅相学联合会会员（1840年5月）；为《颅相学杂志》撰稿；1842年在南设菲尔德技工学院作过演讲。

★库克（COOK），1842年在利兹文学学会作过演讲。

• ★查尔斯·科维（COVEY, Charles, 1795—1834），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伯明翰诊疗所外科医生；1831年在伯明翰哲学学会作过反颅相学演讲。（阿里斯的《伯明翰杂志》，1834年10月6日。）

★查尔斯·科文(COWAN, Charles, 1806—1868), 1833 年在爱丁堡获医学博士学位, 1834 年在巴黎获医学博士学位; 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 雷丁的托马斯·C. 科文牧师(卒于 1856 年)的儿子; 在巴斯任解剖学讲师, 1835—1839 年在巴斯行医; 从 1839 年起担任雷丁诊疗所荣誉医生、皇家伯克郡医院高级医生, 直至去世; 听诊的早期拥护者; 英国医学协会的早期积极的会员; 在 50 年代反对顺势疗法; 出版过几部医学著作; 被视为医学界最优秀的演讲人之一; 活跃于雷丁低教会政坛, 出版过几部关于教会联合、现代唯灵论和圣经写实主义的著作; 为《颅相学杂志》撰稿; 在 1836 年为库姆写过推荐信; 基督教颅相学家; 1836—1843 年在雷丁(1836 年为皇家威尔特郡医院义讲, 听众超过 800 人)和巴斯演讲; 颅相学联合会会员(1840 年 9 月); 在遭到了 M. P. J. 弗卢朗的批评以后, 于 40 年代放弃颅相学。(MEB; 及《英国医学杂志》, 1868 年第 650 页。)

★爱德华·威廉·考克斯(COX, Edward William, 1809—1879), 汤顿制造商威廉·C. 考克斯的长子; 在汤顿接受教育, 1843 年在那里的技工学院作过颅相学演讲; 1843 年进入律师行业; 1868 年成为高级律师; 1843—1879 年任《法律时代》等法律杂志的经营者和执行人; 1868—1869 年任汤顿的保守党议员; 出版过政治学和唯灵论的著述; 毕生对颅相学和心理学感兴趣; 1875 年创立心理学学会, 并出任主席, 直至去世。(DNB; MEB)

279 ★罗伯特·考克斯(COX, Robert, 1810—1872), 爱丁堡乔迪制造厂的皮革裁剪师罗伯特·考克斯的第三个儿子; 库姆的

侄子；1830—1837 年、1841—1847 年任《颅相学杂志》编者；罗伯特·钱伯斯的密友；律师，但是当库姆于 1836 年退休时，他婉言谢绝了库姆要求其接替其事业的提议；反对守安息日的作家；1836—1840 年任利物浦文学、社会和商业协会的秘书；1837 年在利物浦文学和哲学学会演讲；1838 年针对 A. 希金森在利物浦文学和哲学学会上对颅相学的攻击，为颅相学辩护；颅相学联合会会员（1840 年 9 月），1842 年退出；爱丁堡颅相学学会成员，出席了该学会最后一次会议（1870 年 12 月）。（*DNB*；*MEB*）

★爱德华·托马斯·克雷格（*CRAIG, Edward Thomas*, 1804—1894），曼彻斯特粗斜纹布切割师；爱尔兰克莱尔郡拉拉尼公社的欧文主义合作者和管理者；1836 年以后任《东方之星》的助理编辑；1836 年前，偶尔作过颅相学演讲，其后则经常作颅相学演讲，并成为 40 年代英国最活跃的巡回演讲者之一，当时他一度被约克郡技工学院联盟聘为巡回演讲者；1843 年，他把催眠术融入演讲之中，并编辑了《催眠术师》周刊；公开或私下为人进行催眠诊疗；把罗兰·德特罗西的模型作为完美组织的模型；在诺丁汉生活时成为颅相学联合会会员（1840 年 8 月）；1888 年任英国颅相学学会主席；继续致力于教育、社会改革、新闻业和公开讨论。（*MEB*；*DLB*）

★威廉·亨利·克鲁克（*CROOK, William Henry*），科学巡回演讲者；英国科学促进协会成员，但在 1831 年强烈反对其专制的组织提案；1825 年伦敦颅相学学会会员；自称发现了营养（饥饿）官能；大约 1825—1835 年，曾在大多数英国城市演讲，主要是在文学和哲学学会演讲；也著述和演讲记忆术；戈伊德认

为,他对颅相学在布里斯托尔的传播起了关键作用。

★威廉·克赖尔(CRYER, William),医学博士,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布拉德福德人;1843年在布拉德福德技工学院的演讲中把颅相学纳入演讲内容;提倡催眠术;后来担任(爱丁堡)探索者学会的主席,伦敦维鲁拉姆哲学学会的荣誉会员。

科比夫人(CUBI, Madam),她自称“西班牙的颅相学殉教者”(靠着西班牙颅相学家马里亚诺·科比·伊索勒[1801—1875]的声誉赚钱);40年代在伦敦演讲颅相学并为人检查颅相。

★理查德·卡尔(CULL, Richard),1838年给斯坦斯文学和哲学学会演讲,1837年给伦敦技工学院演讲;《颅相学杂志》的捐助者;颅相学联合会会员(1840年8月),1842年退出;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会员;1855年人种学协会秘书;关于医学和准医学的问题,有过著述。

★威廉·戴维(DAVEY, William, 卒于 1858年),1848—1858年这十年中,和他的副手 J. W. 杰克逊一起在爱丁堡、都柏林等地演讲;后来从演讲和证明颅相学及颅相催眠术转向了催眠术。

★詹姆斯·德维尔(DEVILLE, James, 1777—1846),19世纪二三十年代伦敦重要的颅相检查者和模型制作者,其顾客有哈利特·马蒂诺、查尔斯·布雷、乔治·艾略特、R. D. 欧文、理查德·卡莱尔、惠灵顿公爵和阿尔伯特亲王;他出身卑微,但在19世纪头10年成为灯具制造商和石膏模型制作者,他在灯塔装配行业的生意非常赚钱;动物学学会会员;艺术学会会员(后

来担任主席),土木工程师协会会员;他的工程师同行布雷恩·唐金鼓励他在 19 世纪 20 年代早期进军颅相学铸模行业,从此他对颅相学产生兴趣;1825 年组织施普茨海姆在塔弗恩的皇冠和铁锚大厅演讲;虽然被一些颅相学家视为文盲,但他向《颅相学杂志》投过稿,并为他制作的颅相学头颅模型撰写了几种说明书;伦敦颅相学学会会员,有时也是其出纳员;颅相学联合会会员,1842 年退出;19 世纪 30 年代曾在英国各地的技工学院和文学学会演讲,并在他自己开在斯特兰德的展览品商店中作私下的演讲;留下了 5000 多个头骨和模型的收藏品(参见《颅相学杂志》1846 年第 19 期,第 329—344 页)。

★亨利·威廉·杜赫斯特(DEWHURST, Henry William),外科医生,皇家詹纳学会会员,伦敦兽医学学会会员,普林尼学会会员,西部医学学会会员;埃普斯的同事,1834—1837 年伦敦维鲁拉姆哲学学会的主席和创建者;19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伦敦和地方上发表关于颅相学、自然史、天文学等方面的演讲;是一名天主教徒,有时他演讲时,爱尔兰的神父 D. 德莱尼也陪同在侧;对《帕特农神庙》有某种兴趣。

多布森(DOBSON),1843 年在桑德兰的雅典娜神庙与盖恩斯比一起向大批观众演讲颅相学。

W.J. 多德(DODD, W. J.),芒克韦尔茅斯的外科医生;1836 年在桑德兰作过演讲,1841 年在南希尔兹技工学院作过演讲。

★科内利乌斯·多诺万(DONOVAN, Cornelius, 约 1820—1872),19 世纪 40 年代到 70 年代的颅相学“教授”;几乎

在英格兰每个城镇(特别在东南部和密德兰南部地区)作过演讲,并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作过一些演讲,主要是在技工学院;1842年在西部文学协会(莱斯特广场)特别给颅相学班做过指导;继德维尔后成为伦敦重要的实践颅相学家和头颅塑像者;在斯特兰德(后来在特拉法加广场)建立了伦敦颅相学学校;坚持正统的政治和宗教观点;颅相学联合会成员(1840年5月);向《颅相学杂志》投过稿;人种学学会会员。

亚历山大·詹姆斯·D.多尔赛(D'ORSAY, Alexander James D., 1812—1894), 1843—1850年任格拉斯哥高级学校英语教师;对格拉斯哥颅相学学会实行无情的控制,直到被迫退出;颅相学联合会成员(1840年9月);在格拉斯哥技工学院作过演讲,也在那里教语法;1836年受福弗尔城市地方官员的邀请在福弗尔演讲;1847年被任命为牧师,1859年从剑桥的圣体学院毕业,1860—1864年在那里被任命为牧师;1860—1864年担任剑桥第一位英语史讲师;1864年被任命为伦敦国王学院的教授。(MEB)

达夫(DOVE), 苏格兰的颅相学和催眠术巡回演讲者, 1843年以格拉斯哥为根据地(是否就是帕特里克·爱德华·达夫? 帕特里克·爱德华·达夫[1815—1873], 1858年格拉斯哥出版的《英联邦》杂志的编辑, 名列《帝国传记词典》的前20位成员, 并与M.兰金一起编辑《帝国艺术和科学杂志》: MEB)。

詹姆斯·K.道(DOW, James K.), 诺丁汉兰开斯特小学校长;大约在1838—1841年作过演讲;1840—1841年的8次演讲辩驳了巴特勒对颅相学的攻击;颅相学联合会会员。

利斯的亨利·达夫牧师(DUFF, Rev. Henry), 1835 年在利斯和格拉斯哥作了两次颇受欢迎的演讲。

★罗伯特·邓恩(DUNN, Robert, 1799—1877), 1825 年领 281
有药剂师协会的开业证书, 1828 年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 1852 年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 伦敦医学—外科医生学会和威斯敏斯特医学学会会员; 人种学会会员; 在盖伊和圣托马斯医院受教育; 在安德森大学教学; 为库姆写过报道; 出版过心理学和医学著作; 1842 年在苏格兰演讲; 伦敦颅相学学会会员(1826 年 12 月)。(DNB; MEB)

★撒缪尔·伊登(EADON, Samuel, 1809—1891), 生于设菲尔德; 设菲尔德比夫街一所学院的教师, 之后任皮斯加韦尔学校的校长直到去爱丁堡从事研究(1834 年获硕士学位); 40 年代早期被水疗法和顺势疗法所吸引, 50 年代在班伯里成为顺势疗法的医生; 与查尔斯·皮尔斯共同担任《顺势疗法档案》的编辑; 在阿伯丁研究医学, 并于 1861 年成为医学博士; 在另类医学、语法、土地问题和颅相学等方面, 是个多产的小册子作家; 自 30 年代起对颅相学感兴趣; 1844—1847 年任设菲尔德颅相学学会的副主席; 颅相学联合会会员(1840 年 8 月), 1842 年签署了《应急宣言》; 在 40 年代, 就颅相学与圣经经文的和谐进行演讲; 1842 年, 在目击了拉方丹的示范以后对催眠术和颅相催眠术产生兴趣; 是克雷格的朋友。(《颅相学档案》, 1892 年, 第 7—8 页。)

伊登牧师(EDEN, Rev.), 伦敦摄政街 70 号的“博士”; “道德哲学和大脑生理学教授”; 1847 年在班伯里技工学院作颅相学和催眠术的演讲。(见图 6)

约翰·埃利斯(ELLIS, John), 19 世纪 40 年代经常在欧文主义者科学大厅和工人俱乐部作关于颅相催眠术的演讲, 在伦敦和斯托克波特的演讲特别多。(可能就是那个欧文主义的社会使徒以及 1845 年对婚姻进行猛烈抨击的作者; 也有可能是 1846 年加入设菲尔德颅相学学会的约翰·埃利斯。)

★威廉·科林斯·恩格尔杜(ENGLEDUE, William Collins, 1813—1858), 爱丁堡医学博士, 1835 年爱丁堡红十字会会员, 1836 年领有药剂师协会的开业证书; 是爱丁堡医学讲师、颅相学支持者约翰·麦金托什的学生, 皇家医学学会的学生主席; 1836 年为麦肯齐提供了关于颅相学价值的证明书; 1835 年在朴茨茅斯开业, 直至去世; 1846 年创立了皇家朴茨茅斯、波特西和戈斯波特医院, 还创立了各种公共浴室和洗衣房; 与约翰·埃利奥特森一起编辑《活力论者》; 催眠术和唯物主义的倡导者; 是朴茨茅斯和伦敦的颅相学学会的重要人物; 1834—1835 年在朴茨茅斯文学和哲学协会演讲, 1836 年在汉普郡哲学协会演讲, 1840 年在达温技工学院作了 8 次演讲; 颅相学联合会会员, 对联合会的解体负有主要责任。(MEB)

★约翰·埃普斯(EPPS, John, 1805—1869), 1826 年在爱丁堡获医学博士学位; 有着加尔文教背景, 但信奉非国教; 到处都能见其踪影的伦敦激进派(涉足自由贸易、反对国教、共和主义等等); 威斯敏斯特医学学会会员; 詹纳学会主席, 1845 年人类学学会主席; 出版过很多关于医学、植物学、语法和宗教的著作; 英国顺势疗法运动的早期领导者, 1851 年任伦敦顺势疗法医院的药理学讲师; 1828—1829 年任《伦敦医学和外科杂志》的

编者；1845—1852 年任《健康和疾病杂志》编辑，1856—1869 年任《一个新真理的说明》编辑；受宪章派的支持，1847 年竞选诺丁汉的议员，没有成功；爱丁堡颅相学学会会员（1826 年 4 月）；伦敦颅相学学会会员；颅相学联合会会员；1827 年在伦敦开始私人行医，同一年开始演讲颅相学，在伦敦和地方的教育机构中成为人们最熟悉的人物；为《颅相学杂志》撰稿，1835—1839 年编辑《颅相学（人类学）杂志和基督教医生》。（*DNB*；*MEB*）

埃比尼泽·伊夫（EVE, Ebenezer），实践颅相学家；多诺万 282 的学生；1862 年为诺丁山和肯辛顿合作协会作了一系列演讲。

★亚历山大·福尔克纳（FALKNER, Alexander），纽卡斯尔商业银行的出纳；为《颅相学杂志》和《颅相学年鉴》撰稿；颅相学联合会会员（1840 年 2 月），签署了 1842 年《应急宣言》；1841—1842 年在纽卡斯尔向大批听众作过演讲；开设私人的颅相学博物馆。

• 菲尔丁（FIELDING），1827 年在赫尔作反颅相学演讲的“年轻的外科医生”。（是否就是罗伯特·S. 菲尔丁？罗伯特·S. 菲尔丁 [1806—1855]，1833 年领有药剂师协会的开业证书，在靠近约克的里科尔行医：《医学说明》1856 年第 733 页。）

约翰·法伊夫爵士（FIFE, Sir John, 1795—1871），1814 年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1843 年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纽卡斯尔医院高级外科医生；创立了纽卡斯尔医学学校和眼科医院；1838 年和 1843 年两次出任纽卡斯尔市长；纽卡斯尔技工学院院长和发起人；致力于大多数的地方社会改革运动；1840 年，因参与镇压纽卡斯尔的宪章运动而被封为骑士；纽卡斯尔颅

相学学会的关键人物;1836 年为麦肯齐提供了关于颅相学价值的证明书;1836 年在纽卡斯尔文学和哲学学会给很多听众演讲,1836 年在卡莱尔技工学院演讲。(DNB;MEB)

★托马斯·I. M. 福斯特(FORSTER, Thomas I. M., 1789—1860),1811 年林奈学会会员,1819 年剑桥医学学士,皇家天文学学会会员;自然学家、天文学家、气象学家、作家;俄国商人和自然学家托马斯·弗利·福斯特(1761—1825)的长子;1824 年皈依天主教;约瑟夫·班克斯爵士、约翰·赫谢尔和威廉·休厄尔的朋友;皇家学会目录中有其 35 篇论文;与数学家 B. 冈珀茨一起创立了动物之友学会,当他于 20 年代退休回到布鲁日时,成为荣誉秘书;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会员;1806 年被高尔的学说所吸引,1815 年创造了颅相学(phrenology)这个术语;1815 年与施普茨海姆相识;是爱丁堡演讲颅相学的第一人(1816 年在沃纳学会的演讲);伦敦颅相学学会会员(1825 年 3 月)。(DNB;MEB;《生平文集》,1837。)

★杰西·A. 福勒(FLOWLER, Jessie A., 1856—1932),美国“颅相学福勒家族”的最后一人;洛伦佐·奈尔斯·福勒和莉迪亚·福勒的女儿;19 世纪 70 年代起在英国与她的父亲一起演讲、写作和绘制颅相学图表;担任《颅相学期刊》的编辑直到 1889 年;英国颅相学联合会会员;在其父去世后返回美国。(M. B. 斯特恩:《颅相学的福勒家族》,1971。)

★洛伦佐·奈尔斯·福勒(FOWLER, Lorenzo Niles, 1811—1896),纽约颅相学家奥森·斯夸尔·福勒(1809—1887)的弟弟;1860 年与妻子莉迪亚(1823—1863)、女儿杰西·福勒

和合伙人撒缪尔·韦尔斯移居英国，进行了非常成功的演讲游历，其足迹所到之处紧跟着出现很多新的颅相学学会；他所作颅相学、性、婚姻、生理学、遗传等演讲是针对工人阶级听众的，收费特别优惠；他在路德格特马戏场创办了福勒协会，作为指导课程和实践颅相学的地方，也是成百本从纽约发行的廉价福勒出版物的仓库；19 世纪 70 年代回到英国作巡回演讲，在密德兰地区特别受欢迎；1886 年建立了英国颅相学联合会并担任其主席。（MEB；斯特恩：《颅相学的福勒们》，1971。）

J. J. 福克斯 (FOX, J. J.)，1841 年在威尔特郡向迪韦齐斯文学和科学学会发表了 3 次演讲。

J. H. 弗罗斯特 (FROST, J. H.)，1852 年给斯皮尔斯比文学学会演讲。 283

盖恩斯比 (GAINSBY)，1843 年在桑德兰的雅典娜神庙与多布森一起演讲颅相催眠术。

★弗朗兹·约瑟夫·高尔 (GALL, Franz Joseph, 1757—1828)，颅相学的“发明者”；生于德国靠近普福尔茨海姆的蒂芬布罗恩，父母是罗马天主教徒；1777 年在斯特拉斯堡学习医学；1781 年到维也纳，1785 年在那里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801 年，他关于大脑新理论的演讲被皇帝弗朗西斯一世禁止，他（在助手施普茨海姆陪伴下）在欧洲的主要城市进行了一次演讲游历，1807 年到达巴黎，并在那里写作、演讲和开展受到高度尊敬的医学实践，直到他去世。1823 年春天，他到伦敦做短暂的访问，在大马尔伯勒街的博桑奇公司向大量时尚的听众（用法语）演讲颅相学；爱丁堡颅相学学会荣誉会员（1820 年 3 月）。（DSB）

• ★罗伯特·莫蒂默·格洛弗(GLOVER, Robert Mortimer, 1816—1859), 医学博士, 纽卡斯尔文学和哲学学会的医学作者和历史学家; 1841 年, 他在为纽卡斯尔文学和哲学学会所作的庸医医术的系列演讲中把颅相学也包含在内。

弗雷德里克·古尔德(GOULD, Frederick, 1817—1900), 萨里郡金斯顿的化学家; 1849 年林奈学会会员; 在 1839 年移居萨里郡金斯顿以前, 是巴斯一位化学家的学徒; 1880 年任金斯顿市长; 创立了金斯顿文学和科学学院并担任其第一任院长, 1841 年和 1853 年曾在该学院演讲颅相学; 颅相学学会会员。(MEB)

★戴维·乔治·戈伊德(GOYDER, David George, 1796—1878), 格拉斯哥的实践颅相学家; 也是一位教育家, 有时还是药剂师和斯韦登伯格的传道者; 具有国教徒背景; 1810 年成为制刷工学徒, 1814 年成为印刷工学徒; 19 世纪 20 年代早期布里斯托尔的斯韦登伯格学校校长; 后来成为主张实物教学法的学校巡视员, 到处旅行; 在移居格拉斯哥之前主要居住在赫尔和纽卡斯尔, 移居格拉斯哥以后成为常驻的实践颅相学家; 1822 年, 在克鲁克的布里斯托尔演讲以后, 被颅相学吸引, 但直到 1839 年才开始颅相学演讲; 足迹遍及英格兰和苏格兰, 在格拉斯哥周围 40 英里以内的每个村庄作过演讲; 编写《颅相学年鉴》; 格拉斯哥颅相学学会会员, 颅相学联合会会员(1840 年 9 月); 在格拉斯哥创办了一家私人的颅相学博物馆; 在布拉德福德去世。(MEB;《自传》, 1857。)

格雷厄姆(GRAHAM), 格拉斯哥颅相学学会会员; 1841

年在柯考恩演讲。

• ★布鲁因·格兰特牧师 (GRANT, Rev. Brewin, 1821—1892), 莱斯特羊毛梳理工之子; “理性主义、浪漫主义和激进主义”(包括颅相学)的福音派反对者; 活跃于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 1849 年在伯明翰与多诺万进行了一场公开辩论, 1858 年在设菲尔德演讲反对颅相学; 霍利约克把他描述为“思想像兔子般胆小, 眼光像清道夫一样, 拒绝旧的神学矛盾”; 1848—1853 年在伯明翰、1856—1868 年在设菲尔德做过公理会的牧师; 1871 年成为英国国教牧师。(MEB)

约翰·格林 (GREEN, John), 欧文主义的社会使徒, 1838 年被派到利物浦, 其他时间在曼彻斯特和斯托克波特; 在布莱克本 (1837)、威根 (1838) 演讲过颅相学, 可能在其他地方也演讲过; 后来移居美国, (根据霍利约克的说法) 在美国被一列火车撞死。

★威廉·格雷戈里 (GREGORY, William, 1803—1858), 284
1828 年爱丁堡医学博士, 1832 年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员; 爱丁堡医学教授詹姆斯·格雷戈里的第 4 子; 1835 年在吉森的利比格指导下研究化学; 1837 年、1838 年、1839 年分别在安德森大学、都柏林大学和阿伯丁的国王学院获得讲师职位, 1844 年在爱丁堡获得化学教授职位 (当时和他竞争这一职位的莱昂·普莱费尔在 1858 年继任这一职位); 写过很多关于化学和催眠术的著作; 1856 年苏格兰催眠治疗术协会主席; 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会员;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爱丁堡颅相学学会的活跃分子, 阿伯丁颅相学学会的重要人物; 颅相学联合会会员 (1840 年 9 月),

1842 年签署了《应急宣言》；为《颅相学杂志》撰稿；1839 年在安德森大学发表一系列通俗演讲。（*DNB*；*DSB*；*MEB*）

约翰·G.古兰(GULIAN, John G.)；格拉斯哥教师；1835 年在安德森大学发表系列演讲；颅相学联合会会员。

★约瑟夫·威尔考克斯·哈多克(HADDOCK, Joseph Wilcox, 1800—1861)，博尔顿人；1834 年领有药剂师协会的开业证书，1850 年在圣安德鲁斯获医学博士学位；滑铁卢和地方保险公司的医学仲裁人；著有《催眠术和精神病》(1849)，明确支持颅相催眠术，1848 年根据该书的内容在博尔顿的禁酒会堂作了两次演讲。

★斯宾塞·蒂莫西·霍尔(HALL, Spencer Timothy, 1812—1885)，诺丁汉郡贵格会皮匠的儿子；起先做过制长袜工和印刷工，后来热衷诗歌、论文和新闻写作；以“谢伍德森林人”而出名；19 世纪 50 年代开始从事水疗法和顺势疗法，在德比、肯德尔、伯恩利等地行医，1881 年定居布莱克浦；对招魂术感兴趣；1843 年开始从事颅相催眠术，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很多城镇进行演讲和示范；编辑《颅相催眠术》(1843 年)；1843 年设菲尔德颅相学学会的秘书；死时穷困潦倒。（*DNB*；*MEB*）

汉密尔顿先生(HAMILTON, Mr.)，19 世纪 40 年代深受欢迎但身份不明的“江湖郎中”；1841 年现身于纽卡斯尔和卡莱尔，1845 年 12 月在设菲尔德演讲颅相催眠术。

汉密尔顿夫人(HAMILTON, Mrs.)，佩斯利人，实践颅相学家和演讲者；在那些寻求体面的颅相学家看来，她是个骗子，但在欧文主义者看来，她是一位受欢迎的女权捍卫者，因为她根

据男女同等的精神天资来捍卫妇女权利;她非常擅长吸引大量听众;19 世纪 40 年代以前她似乎主要生活在苏格兰,后来到了伦敦等地,主要在一些科学会所和技工学院里演讲“妇女自由的进程”和“和谐的新时代”,通常也为人描绘头颅轮廓图;最后一次关于颅相学的演讲约在 1856 年在牛津的钱伯斯委员会的一个公众讨论课演讲颅相学。

• ★理查德·温特·汉密尔顿牧师(HAMILTON, Rev. Richard Winter, 1794—1848), 1844 年格拉斯哥法学博士;神学博士;作家,利兹的阿尔比恩独立教堂牧师,1836—1838 年利兹文学和哲学协会的主席;向利兹文学和哲学协会递交了《论头骨学》(1826),把颅相学称作“对子孙有害的谎话”,H. D. 英格利斯对此进行了反驳。(DNB)

• ★威廉·汉密尔顿爵士(HAMILTON, Sir William, 1788—1856), 1818 年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员,苏格兰常识哲学的最后的重要鼓吹者;1836 年在与库姆竞争以后获得爱丁堡逻辑学教授职位;1827 年,在手术不幸者救济委员会的筹款活动中,他在爱丁堡集会厅发表演讲,反对颅相学;1825 年和 1826 年也在爱丁堡皇家学会作过反对颅相学的演讲。(DNB; MEB) 285

★威廉·汉考克(HANCOCK, William), 萨默塞特郡威弗利斯科姆的律师;1841 年埃克塞特颅相学学会的秘书;《颅相学杂志》的撰稿人;颅相学联合会会员(1840 年 8 月),1842 年签署了《应急宣言》;1838 年给汤顿技工学院作了 3 次演讲;大概在 1835 年也作过生理学的演讲。

哈里斯(HARRIS), 1843 年在霍伊克、加拉希尔斯、梅尔罗

斯等地巡回演讲颅相催眠术。

哈特(HART),与贝利一起在南伦敦科学大厅演讲颅相催眠术(1843年5月)。(是否就是威廉·本尼迪克特·哈特[1813—1858]?威廉·本尼迪克特·哈特是1827年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1837年领有药剂师协会的开业证书,来自斯皮特尔菲尔兹:《医学指南》,1859年版,第973页。)

★约翰·艾萨克·霍金斯(HAWKINS, John Isaac, 1772—1855),土木工程师;汤顿的艾萨克·霍金斯的儿子;在新泽西的博登敦生活了很多年,1852年在那里创办了《人类天性和人类进步杂志》;1824年土木工程师协会会员,1816—1849年在伦敦做咨询工程师,之后回到纽约;他发明了不秃尖铅笔等新奇玩意儿;是斯韦登伯格的信徒;也是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会员;1835年与他的朋友埃普斯一起创立了公益协会(埃普斯认为他是个热情多于才智的人);1836年担任肯特城技工文学和科学学院院长;1815年对颅相学感兴趣;担任伦敦颅相学学会的财务主管,直到1842年为止,其时他创立了基督教颅相学学会并担任主席,埃普斯是副主席[1844年这个学会被伦敦人类学(颅相学)学会所替代];颅相学联合会会员(1839年8月);《颅相学杂志》和《颅相学年鉴》的撰稿人;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给伦敦的很多学院作过演讲。(MEB)

威廉·拉姆齐·亨德森(HENDERSON, William Ramsay, 1810—1832),来自爱丁堡附近的沃里斯顿;一位富裕的爱丁堡银行家之子;业余风景画家和艺术爱好者;在19世纪20年代早期对颅相学表现出浓厚兴趣;爱丁堡颅相学学会会员(1824

年 3 月)；留下 5000 英镑遗产用于发展颅相学，包括为“贫穷阶级中聪明的个人和技工学院等”出版普及本的《人类体格》，在《颅相学杂志》亏损的年份该基金也被用于杂志的发行；他曾试图为爱丁堡利斯地区的工人阶级演讲，但由于口吃而放弃。

埃德温·托马斯·希克斯(HICKS, Edwin Thomas)，在 19 世纪 40 年代和多诺万、克雷格、古伊德和莱文森等人一样同属受人欢迎的巡回演讲者群体；他一度以布里斯托尔为根据地，并于 1842 年为捍卫巴伯的颅相学、反击布林德利的批评而在布里斯托尔描绘和演讲颅相学；他主要在英格兰南部演讲；对电心理学和催眠术也略有研究，并于 1845 年在格洛斯特与同为巡回演讲者但是反对催眠术的 J. Q. 伦鲍尔就催眠术问题进行了公开辩论。

• ★阿尔弗雷德·希金森(HIGGINSON, Alfred, 1808— 286 1884)，1832 年获得药剂师协会的开业证书，1832 年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哈里雅特·马蒂诺的表兄弟；利物浦南方诊疗所的荣誉外科医生；1840—1844 年任利物浦医学学校解剖学示范老师；《解剖学和生理学百科全书》撰稿人；希金森注射器的发明者；1838 年在利物浦文学和哲学协会就颅相学与现有的大脑结构和功能的知识相关的解剖学和生理学作了演讲；曾与 R. 考克斯进行过辩论。（《皇家学会医学学报》，1932 年第 25 期，第 635—638 页。）

★威廉·巴兰坦·霍奇森(HODGSON, William Ballantyne, 1815—1880)，教育家、政治经济学家、改革家和颅相学家；生于爱丁堡，父母是加尔文教徒，父亲是一名印刷工；他是库姆、

威廉·埃利斯、布雷、科布登、布赖特和埃普斯的好友;爱丁堡颅相学学会会员,爱丁堡实践颅相学伦理学会会员,颅相学联合会会员(1840年8月);1839年任利物浦技工学院秘书,1844—1847年以每年400英镑的代价成为其负责人;1871年,在爱丁堡商人公司推荐下,获得了他们新近捐助设立的爱丁堡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几乎每一次自由改革运动中,总是表现突出;与他人合编了一神论派改革家 W. J. 福克斯的著作;为《颅相学杂志》撰稿;22岁时开始在苏格兰各城镇向大量操作工听众演讲颅相学;1840—1847年在利物浦、1847年在设菲尔德发表了一系列演讲;为了回应他1855年在爱丁堡的演讲,爱丁堡工人成立了颅相学学会(该学会一直维持到1864年以后);他也教生理学和健康法则。(DNB;MEB)

J. F. 霍尔登内斯(HOLDENNESS, J. F.), 1837—1838年在伦敦给新路和伊斯灵顿的技工学院作过演讲。

★乔治·卡尔弗特·霍兰(HOLLAND, George Calvert, 1801—1865), 1827年在爱丁堡获医学博士学位;设菲尔德工匠之子;做过理发师学徒,后受到一神论派的帮助和教育;在曼彻斯特行医,但由于他公开倡导颅相学,1829年被迫移居设菲尔德;曾被任命为设菲尔德总医院的荣誉医生;1837年创立了设菲尔德生理学学会,也是文学和哲学协会的积极支持者;1840年,由于他关于废除谷物法的错误言论,使他失去了从前的朋友和他的医学业务;后来涉足铁路工程,担任两个银行的董事;由于这两个银行的破产,他移居伦敦;1851年以顺势疗法医生的身份回到设菲尔德,并于1853—1854年创办了设菲尔德顺势疗

法医院；他也对催眠术感兴趣；1862 年任设菲尔德高级市政官，直至去世；写过好几部医学著作，1853 年编辑了《设菲尔德顺势疗法柳叶刀》；设菲尔德颅相学学会副主席；1827—1828 年在哈利法克斯、1831 年在切斯特菲尔德作过颅相学演讲。（*DNB*；*MEB*）

亨利·哈利·霍尔姆（*HOLM, Henry Haley, 1806—1846*），1828 年皇家外科医生学会会员；*J. D. 霍尔姆*之子；由于继承了一笔遗产，使得他能把全部时间用于研究颅相学和比较动物学；曾与施普茨海姆一起住在巴黎以及他父亲位于贝德福德广场的家里，并和他的父亲一道继承了施普茨海姆在伦敦的头骨收藏品和随身用具；首次在一所公认的英国医学学校（1832—1833 年伦敦医院）进行了一系列颅相学演讲；1828 年，因为他掘出他母亲、哥哥和姐姐的遗体，切下他们的头颅用于颅相学研究而被逮捕并被罚款 50 英镑；1825 年 12 月参加伦敦颅相学学会，直至 1832 年，其时他和另外几个人（包括詹姆斯·克拉克爵士）组建了一个专门讨论颅相学的团体；颅相学联合会会员；1838 年 287 在西部协会发表系列演讲。（参见：《颅相学杂志》1846 年第 19 期，第 28 页；《亨登和芬奇利时报和卫报》，1958 年 3 月 28 日。）

★约翰·迪德里克·霍尔姆（*HOLM, John Diderick, 1772—1856*），瑞典皇家造币厂的铸币者约翰·哈利·霍尔姆（死于 1763 年）的孙子；生于瑞典；1805 年以外籍商人的身份移居伦敦，1817 年退出商界，开始业余从事颅相学研究，较早与高尔在巴黎见面；是施普茨海姆的朋友和遗嘱执行人；颅相学联合会会员；每周四在自己家里举行演讲；1828—1832 年是在高尔

街的家中,1832 年直至去世为止是在贝德福德广场的家中;1832—1836 年也在格兰杰解剖学手术教室、萨瑟克协会、伦敦和波罗的海客栈、北伦敦学院、东雅典娜神庙、哥特会堂、实用知识协会和米尔敦协会作过演讲;1843 年在南伦敦欧文主义者科学大厅作过演讲。(MEB)

★乔治·雅各布·霍利约克(HOLYOAKE, George Jacob, 1817—1906),伯明翰锡铁匠,在技工学院接受教育,并对颅相学以及欧文主义、自由思想和宪章运动产生兴趣;曾追随欧文主义,但最终放弃了欧文主义,成为查尔斯·布雷德洛之前英国重要的世俗论者,集中全副精力从事理性的世俗宗教观点的宣传;与巴利和库姆之间令人遗憾的冲突使他怀疑颅相学家的某些动机,但是 1841 年 8 月他在设菲尔德科学大厅给大量观众作了关于颅相学的演讲(同一个时期他大概也在其他科学大厅作过演讲);1846 年 2 月,他在伦敦理性主义者学院发表演讲,题为“乔治·库姆和恩格尔杜博士的颅相学哲学,包括有待讨论的我们的个人记忆”;1848 年 12 月,在约翰街学院,他发表了题为“除了手相术和颅相学之外测试性格的其他方法”的演讲。(DNB;DLB)

C. G. 休斯(HUGHES, C. G.,有时也拼成 Hughs),1843 年在欧文主义的约翰街学院发表题为“耶稣基督的颅相学特征”的演讲;1843 年给南安普顿技工学院演讲催眠术,大约在 1843 年曾给伦敦的各个学院演讲过颅相催眠术。

★罗伯特·亨特(HUNTER, Robert, 1795—1864),1828 年在格拉斯哥获医学博士学位;1826 年,在波特兰街医学学校

担任解剖学及外科讲师；1841—1850 年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医院工作，1850—1860 年在安德森大学工作；1855—1857 年任格拉斯哥生理学和外科学院院长；1857 年任格拉斯哥皇家医院外科医生；1833 年在格拉斯哥技工学院演讲颅相学，1834—1836 年与 J. R. 伍德一起在格里诺克演讲；1836 年向库姆提供了一份有关颅相学价值的证明书；格拉斯哥颅相学学会会员和颅相学联合会会员；写过关于颅相学的通俗手册。

威廉·亨特(HUNTER, William)，安德森大学的逻辑学教授；1836 年在安德森大学发表了一系列颅相学演讲。

赫斯潘德(HUSPAND)，1839 年在约克郡技工学院免费演讲颅相学；也作过关于睡眠哲学和非洲文明的演讲。

E. J. 海奇(HYTCH, E. J.)，伊斯灵顿的法律书籍出版商；1839—1844 年在伦敦技工学院组织和辅导星期六晚上的颅相学班；1841 年和 1846 年在该技工学院给大量听众作过系列演讲；以基督教颅相学家著称；为《颅相学杂志》、《颅相学年鉴》、《人民颅相学杂志》和《基督教的医生》撰稿；也为《柳叶刀》撰稿，还写过一本诗集；颅相学联合会会员(1840 年 5 月加入)，1842 年退出。

★亨利·戴维·英格利斯(INGLIS, Henry David, 1795— 288 1835)，旅行家和多才多艺的作家；苏格兰律师之子；1830 年前任《切斯特菲尔德公报》编辑，1832—1834 年任《泽西英国批评》编辑；在伦敦定居，并给科尔伯恩的《新月刊杂志》投稿；1826 年担任利兹文学和哲学协会副主席时，对 R. W. 汉密尔顿牧师对颅相学的非难进行辩驳。(DNB)

★詹姆斯·英格利斯(INGLIS, James, 1813—1851), 1834年在爱丁堡获医学博士学位, 1834年获得药剂师协会的开业证书, 地质学会会员; 生于格拉斯哥; 学生时代就在医学方面表现出色; 1837年任里彭诊疗所荣誉医生, 此后在哈里法克斯行医; 把主要精力用于哈里法克斯文学和哲学协会的组织 and 各项活动, 并担任其地理学部主管; 发表了各种医学论文, 包括反对顺势疗法的论文; 为《颅相学杂志》撰稿; 颅相学学会会员(1839年8月加入), 签署了1842年的《应急宣言》; 1836年为麦肯齐提供了关于颅相学价值的证明书; 1843年在哈里法克斯文学和哲学协会演讲。(参见《医学指南》, 1852年, 第647—648页; *MEB*。)

★杰贝斯·英沃兹(INWARDS, Jabez, 1817—1880), 实践颅相学家, 提倡禁酒、人寿保险和自助; 与托古德和倡导水疗法和禁酒的贵格会教徒威廉·霍塞尔同为伦敦牛津街492号的颅相学训练营和博物馆的同事; 从1843年到大约1860年间在伦敦各种工人学院、诺丁山、霍尔本以及各郡演讲颅相学(也作关于其他科学和文学主题的演讲); 1856年协助贝格斯等任组建了新的伦敦颅相学学会。(MEB)

★约翰·威廉斯·杰克逊(JACKSON, John Williams, 1809—1871), 出生于萨默塞特一个卫理公会信徒的家庭, 13岁时腿残废; 1832年从布里斯托尔移居伦敦, 试图成为一名作家,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大不列颠博物馆度过了失败的七年; 后转向演讲, 在布里奇波特遇到了威廉·戴维, 与他一起演讲了10年, 直到戴维在1858年去世; 1855年移居爱丁堡, 演讲颅相学和催眠术, 经营一家颅相催眠术诊所; 通过为报纸和杂志撰稿增

加收入；戴维死后，他移居格拉斯哥，担任催眠治疗术学会主席，并成为格拉斯哥招魂术研究者学会的重要人物；1864 年成为（新的）爱丁堡颅相学学会会员；1866 年结婚以后返回伦敦；为《活力论者》、《人类学杂志》和《人的天性》撰稿（参见他所著《省思的人》[1875]中其妻子回忆）。

★詹姆斯·詹宁斯(JENNINGS, James), 成人教育和欧文主义合作运动富裕的捐赠者；《家庭百科全书》的编辑；1828 年在伦敦技工学院演讲颅相学。

●小威廉·杰文斯(JEVONS, William, Jr., 1794—1873), 利物浦的一神论派信徒；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 W. S. 杰文斯(1835—1882)的伯父；与利物浦的政治银行家家族联姻的托马斯·杰文斯的长子；出版了《道德哲学》(1827)和天文学(1828)方面的著作；教育家，在利物浦经营一所私立走读学校，该校(从 1822 年起)就办了一个关于精神和道德哲学的班；1828 年在利物浦文学和哲学协会演讲哲学，1834 年 11 月又作了题为“限制颅相学的大脑功能”的演讲。

约翰逊(JOHNSON), 欧文主义者；1843 年在纽卡斯尔演讲颅相催眠术。

爱德华·琼斯(JONES, Edward), 威尔士霍利韦尔人；19 世纪 40 年代与他的兄弟一起演讲颅相学和催眠术。

彼得·琼斯(JONES, Peter), 与伦敦技工学院的颅相学班有联系(可能在海奇之后)，随后在 1846—1848 年在约翰街学院组织了主日下午的颅相学班；在伦敦大多数激进协会作过演讲，偶尔也在辩论台上捍卫颅相学；1847 年在舰队街金匠大道发表

演说;1847 年与贝克辩论颅相学。

基尔(KEIR),大约 1836—1837 年在爱尔兰、苏格兰和密德兰地区作关于天文学、地质学、自然史和颅相学的通俗演讲。

★马丁·柯特利(KIRTLEY, Martin),巴纳德堡的外科医生;1836 年在巴纳德堡技工学院演讲;为《颅相学杂志》撰稿。

阿道弗斯·基斯特(KISTE, Adolphus),颅相学和催眠术的巡回演讲者;利物浦颅相学学会会员,颅相学联合会会员(1840 年 8 月加入);1840—1841 年与弗农一起在利物浦、埃克塞特、托基等地活动。

约瑟夫·莱肯(LACON, Joseph),律师和普通的文学作者;利物浦学问爱好者协会主席;利物浦技工学院的早期倡导者,1832—1833 年在那里首次演讲颅相学。

A. 李(LEE, A.),1837 年在伦敦技工学院演讲头骨的形成和大脑结构(可能是亚历山大·库珀·李[死于 1850 年?],1831 年在埃朗根获医学博士学位,在伦敦行医,是阿斯特利·库珀和约翰·埃利奥特森医学教材的编辑)。

西奥多·莱杰(LEGER, Theodore, 1799—1853),生于巴黎并在巴黎接受教育;居住在墨西哥,在那里他发了两笔财并花得精光;1850 年成为医学催眠术师;1851 年在伦敦亨格福德会堂演讲颅相学;1852 年在索霍的杰勒德街 20 号召开多次会议,检查头颅。(MEB)

★安德鲁·莱顿(LEIGHTON, Andrew),利物浦制造商;为《颅相学杂志》撰稿;颅相学联合会会员(1840 年 7 月加入),1842 年签署了《应急宣言》;后来沉迷于招魂术;大约在 1862 年

给利物浦霍普街的相互促进学会作过演讲。

★约翰·L.利维森(LEVISON, John L.), 巡回颅相学家, 1828—1843 年在英格兰的主要技工学院演讲; 1832 年在伦敦学院给 800 位听众发表系列演讲; 曾是赫尔的主要颅相学家, 在移居唐克斯特后开了一家颅相学博物馆, 成为莱森戏院的副主席; 后来移居伦敦; 1842 年在伯明翰演讲牙科和“牙科骗术”, 并在那里从事颅相催眠术的实验; 1849 年在布赖顿以牙科医生而出名; 为《颅相学杂志》撰稿, 并在精神文化和禁酒方面有所著述; 颅相学联合会会员, 1842 年签署了《应急宣言》。

西蒙·洛根(LOGAN, Simon), 艺术家, 来自萨里郡的沃尔沃思; 伦敦颅相学学会会员, 颅相学联合会会员(1839 年 8 月加入); 1836—1841 年是苏格兰、英格兰东南部和伦敦非常受欢迎的演讲者; 1836 年在伦敦的南安普顿咖啡屋为大众教育协会作过演讲。

★赫德森·洛(LOWE, Hudson), 来自切尔西; 为《颅相学杂志》撰稿; 伦敦颅相学学会会员和颅相学联合会会员; 19 世纪 40 年代在文学和哲学协会作过演讲。

★威廉·鲁宾逊·洛(LOWE, William Robinson, 1820— 290 1856), 批发药剂师, 伍尔弗汉普顿城市议员; 热情的卫生改革者和工人阶级的教育家; 名义上是国教徒, 实际上是一位超乎寻常的基督教颅相学家; 因负债破产而突然死亡; 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会员; 《颅相学杂志》撰稿人; 颅相学联合会会员(1839 年 8 月加入), 签署了 1842 年《应急宣言》; 1840—1842 年在伍尔弗汉普顿技工学院演讲, 1841 年在艾恩布里奇演讲; 也作过地质学、教

育和文学的演讲。（《演讲集》[1857]中的自传。）

H. 伦第(LUNDIE, H.), 1844 年在苏格兰的迪韦齐斯演讲颅相催眠术(可能也是 19 世纪 40 年代早期出现在英格兰城镇的那个人, 曾被设菲尔德颅相学学会视为巡回演讲的骗子)。

麦克阿瑟(McARTHUR, 1813—1849), 哈利法克斯的文具商; 生于因弗内斯, 曾在爱丁堡做过一段时间的印刷工; 在技工学院受过教育; 一神论派信徒; 移居伦敦, 随后去了哈利法克斯, 在那里听了劳埃德·琼斯关于欧文合作主义的演讲, 转而相信欧文主义, 随后担任普雷斯顿社会协会的秘书; 致力于哈利法克斯工人阶级的教育和改革, 并在那里演讲颅相学; 关于他的死, 霍利约克在《理性者》中描述, 麦克阿瑟的“教学和演讲总带着几乎超越他个人力量的热情并付诸行动。听过他演讲的人不会很快就忘却他关于颅相学的演讲”。

★G. N. B. 麦比恩(M'BEAN, G. N. B.), 1844 年安德莱姆的颅相学“教授”; 19 世纪 50 年代在乌尔斯特也作过医学电疗法和“人的形成”的演讲; 1864 年加入(新的)爱丁堡颅相学学会。

麦杜格尔(M' DOUGAL), 外科医生, 来自加拉希尔斯, 1835 年试图在加拉希尔斯演讲, 但“由于人们对这门科学的危险性的普遍反对而没有成功”。

麦吉本(M' GIBBON), 1843 年在苏格兰巡回演讲颅相催眠术, 所涉地点从格里诺克到阿伯丁。

威廉·麦格拉尚(MacGLASHAN, William), “一个瘦得皮包骨的裁缝”; 也被称为邓迪颅相学学会的教师和图书管理员;

1835—1836 年在因弗拉里蒂、莫尼菲斯和邓迪进行颅相学描述并向工人阶级听众演讲颅相学。

★乔治·斯图尔特·麦肯齐爵士 (MacKENZIE, Sir George Steuart), 从男爵七世 (1780—1848), 1815 年皇家学会会员, 1799 年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员, 矿物学家和地质学家, 爱丁堡天文学协会主席; 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会员; 爱丁堡颅相学学会早期成员; 《颅相学杂志》的发起人和捐助人; 库姆的亲密朋友; 1843 年转向催眠术; 1835 年建议成立颅相学联合会, 1842 年退出; 1822 年在丁沃尔给他的佃户演讲颅相学, 1839 年在泽西技工学院、1840 年在皇家游艇俱乐部演讲颅相学和教育。(DNB)

威廉·麦肯齐 (MACKENZIE, William, 1791—1868), 格拉斯哥的外科医生; 生于格拉斯哥, 是一位薄细棉布制造商的儿子; 求学于伦敦和维也纳, 1819 年回到格拉斯哥; 1810 年为了医学而放弃神学; 1828 年被格拉斯哥大学任用, 1838 年在苏格兰被任命为女王的眼外科医生; 在安德森大学期间成为著名的眼科专家和解剖学教授; 颅相学的早期支持者; 1822—1825 年在格拉斯哥演讲, 并在他的解剖学课程中教授颅相学。(J. 马歇尔:《格拉斯哥医学杂志》, [1954 年]第 35 期, 第 270 页)

戴维·姆塔格特 (M'TAGGART, David), 哈利法克斯的 291
外科医生; 1845 年为设菲尔德的颅相学学会作了两次公开演讲。

约瑟夫·马里奥特牧师 (MARRIOTT, Rev. Joseph, 生于 1794 年), 出身于富裕的伦敦家庭; 原指望从事法律职业, 但他放弃了这种追求, 成为兰开夏郡不信奉国教的传道者; 受到欧文

式社会主义的吸引,1831 年成为沃灵顿委员会成员,写过关于欧文主义的小册子;19 世纪 40 年代转向颅相学的公开演讲;一段时间曾以布里斯托尔为根据地,在那里演讲颅相学并为人描绘头颅画像,后来在伦敦皇家阿德莱德画廊以及各工人学院演讲颅相学;还在北方和密德兰地区作关于社会和家庭经济学的演讲;建议成立贫民科学学院,1848 年在霍利约克作“死亡逻辑”的演讲以后,他在戈斯韦尔街学院演讲颅相学。

埃玛·马丁夫人(MARTIN, Mrs. Emma, 1812—1851),生于布里斯托尔;接受过严谨的浸礼会教育,1839 年听了亚历山大·坎贝尔的演讲以后,开始怀疑正统基督教;随后离开她的丈夫,成为一名自由思想的演讲者,主要在伦敦和地方的社会主义会堂演讲;19 世纪 40 年代在伦敦给妇女作私人的生理学演讲;1840 年在伦敦的科学大厅与 R. S. 贝利牧师辩论“结婚与离婚”;1840 年在莱斯特为捍卫社会主义、不忠和颅相学而与布林德利争辩;据说她在临终时曾忏悔,但霍利约克仍然为她致悼词;她曾写过关于不忠的著述;1839 年在设菲尔德科学大厅作了 5 次关于颅相学的演讲。(MEB; DLB)

马西奥(MATHEO),1838 年居住在埃克塞特的意大利移民;1838—1840 年在埃克塞特、普利茅斯和塔维斯托克理工学院作过演讲,1841 年在设菲尔德作过演讲。

梅诺特(MAYNOTT),1839 年在多佛的一次演讲中反对奥卡拉汉对颅相学的攻击,捍卫颅相学。

乔治·米勒(MILLER, George, 卒于 1879 年),亨廷登郡埃姆斯沃思的全科医生,1831 年领有药剂师协会的开业证书,

1833 年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受教于大学学院；哈文特济贫法联合会的外科医生，后来做了锡德茅斯和德文的外科医生，他也是那里的诊疗所的外科咨询医生；《柳叶刀》杂志和其他医学杂志撰稿人；埃姆斯沃思文学学会主席，1835 年和 1842 年在埃姆斯沃思演讲颅相学；颅相学联合会会员。

D. 米尔恩(MILNE, D.), 1849 年在芬斯伯里会堂演讲“颅相学的逻辑”；他通常演讲的话题是合作和世俗理性主义等。

安德鲁·莫伊尔(MOIR, Andrew), 阿伯丁的外科医生；1838 年在阿伯丁作过演讲，也给阿伯丁颅相学学会作过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演讲。

★詹姆斯·蒙哥马利(MONTGOMERY, James, 1771—1854), 既是诗人也是《设菲尔德纪事》的编辑；1795 年因诽谤罪被监禁；在 19 世纪 30 年代变得日益保守；1826 年在设菲尔德文学和哲学协会演讲颅相学，反驳威廉·汉密尔顿爵士的攻击，捍卫颅相学，但在 1829 年的写作中反对颅相学的宿命论倾向。(DNB; MEB)

W. H. 纽曼(NEWMAN, W. H.), 1843—1848 年在伦敦各相互促进学会和工人学院中演讲；1843 年在伦敦城相互促进学会(建立于 1836 年)办了一个颅相学夜校班，在这个班里他经常与埃普斯和霍利约克一起演讲。

★戴维·尼科尔(NICHOL, David, 卒于 1865 年), 1816 年 292
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领有皇家内科医师学会开业证书(L. R. C. P)的不住院医生；在斯旺西行医，并成为那里的医院的荣誉医生(1846 年退休)和南威尔士皇家协会的荣誉秘书；《颅相

学杂志》撰稿人；颅相学联合会会员（1840 年 5 月加入）；1836—1841 年在斯旺西各协会发表了两个系列的演讲。

★丹尼尔·诺布尔（NOBLE, Daniel, 1810—1885），1833 年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1852 年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1859 年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生于普雷斯顿；在盖伊医院接受教育；1834 年居住在曼彻斯特，在查塔姆街医学学校讲授心理医学，后来以一流的医生和咨询者而出名；写过很多生理学和心理学医学著作；英国医学协会兰开郡和柴郡分会的主席；克利夫顿会堂收容所和布克斯顿的怀豪斯救济院的访问医生；曾拒绝担任县地方法官，热心于地方卫生改革；颅相学联合会会员（1840 年 6 月加入），曼彻斯特颅相学学会会员并于 1835—1838 年担任主席；《颅相学杂志》撰稿人；库姆和邓恩的朋友；1837 年在曼彻斯特文学和哲学协会演讲；在威廉·卡彭特攻击他的观点以后，于 1846 年放弃颅相学。（MEB）

尼曼（NYMAN），1843 年在伦敦作过颅相催眠术的演讲；自称在美国有过演讲经历。

• 奥卡拉汉（O'CALLAGHAM），1839 年在多佛哲学学院作反颅相学的演讲。

阿瑟·奥尼尔（O'NEILL, Arthur, 1819—1896），深受欢迎的伯明翰宪章运动者，基督教宪章派教会的创建者；马车制造商之子；1835 年在格拉斯哥学习医学，1837 年转而研究神学；靠演讲科学和神学维持生计，他的演讲主题包括生理学和物理学；1837 年签署了绝对戒酒誓言；1838 年受到宪章运动的吸引，1839 年当选为格拉斯哥宪章派的执行委员，年仅 20 岁；1840 年

在伯明翰建立了耶路撒冷浸礼会教堂，经营一所较大的主日学校；1840 年加入中等阶级激进改革同盟；1841 年在他的教堂演讲颅相学；1842 年被监禁。（*MEB; DLB*）

霍尔·奥弗伦（OVEREND, Hall, 卒于 1831 年），设菲尔德医院的外科医生；是一位设菲尔德职员之子；是当地的科学活动家，在教会街拥有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是贵格会教徒，但后来宣称皈依自由思想；致力于地方改革运动；其兄约翰（1769—1832）拥有隆巴德街奥佛伦、格尼商业银行和商业公司；自称是第一个把颅相学引介到设菲尔德的人；1830 年在文学和哲学协会发表了 4 次演讲；1824 年在诺丁汉作过演讲；他的儿子威尔逊（1806—1865）是设菲尔德杰出的外科医生和医学讲师；他的长子唐克斯特的约翰（1802—1832）1824 年在爱丁堡获医学博士学位，1824 年 2 月成为爱丁堡颅相学学会会员；参见《绅士杂志》，1832 年第 187 页。

欧文斯（OWENS），最初是弗农的随从人员之一，1844 年在斯塔福德郡和布里斯托尔的技工学院帮助弗农演示和演讲颅相催眠术；到 19 世纪 50 年代，他自己在伦敦演讲颅相学；自称于 1839 年获得皇家外科医师学会的会员资格。

帕斯奎尔（PASQUALL），1862 年在赫德斯菲尔德附近的阿蒙德伯里技工学院演讲。

• ★詹姆斯·考尔斯·普里查德（PRICHARD, James 293 Cowes, 1786—1848），1808 年在爱丁堡获医学博士学位，1835 年获牛津大学荣誉证书，1827 年成为皇家学会会员；在爱丁堡时期听过杜格尔德·斯图尔特的演讲，后来在剑桥和牛津学习；

1811 年被任命为布里斯托尔圣彼得医院的荣誉医生,1814 年任布里斯托尔医院的荣誉医生;1813 年出版了关于人种学的著作,1847—1848 年成为伦敦人种学学会主席;1844—1848 年任精神病委员会委员;全身心投入科学和社会生活方面的保守活动;是一名贵格会教徒,在离开牛津前加入了英国国教;布里斯托尔协会会员,是布里斯托尔文学和哲学协会的重要人物,1835 年 1 月在那里作过颅相学和催眠术的演讲,与他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和《论精神错乱》中对颅相学的批判相呼应。(DNB; DSB)

★T. 赛姆斯·普里多(PRIDEAUX, T. Symes),约 1790 年生于南安普顿;是恩格尔杜的朋友;19 世纪 60 年代给《颅相学杂志》、《活力论者》和《人类学评论》撰稿;人种学学会的会员;反对颅相催眠术中的谬误(事实上,是和他的大多数同事围绕该学说的观点展开辩论);1806 年阅读了《伦敦医学和医生杂志》上对颅相学的描述后被颅相学所吸引;1838—1840 年,在多塞特的布兰福德城市会堂以及根西岛演讲;也写过关于燃料经济学和语法的著作。

• 托马斯·普劳德福特(PROUDFOOT, Thomas, 1791—1859),1819 年在爱丁堡获医学博士学位,先前是一位军队的外科医生;后是肯德尔诊疗所的外科医生;做过地方行政官;1842 年为肯德尔自然史协会作过反对颅相学的演讲。

R——D,——:1834—1835 年在朴茨茅斯作过颅相学演讲。

威廉·坦纳·雷恩(RAINE, William Tanner),教师;1842

年在多克希德技工学院和伯蒙德西以廉价讲座开始演讲颅相学（他相信他的这些讲座在首都是第一次有关颅相学的廉价讲座）；霍金斯基基督教颅相学学会会员；1836 年给《基督教医生》撰稿。

威廉·理查森(RICHARDSON, William), 达勒姆和诺森伯兰地区的巡游颅相学家和操作者；自学成才；也作过关于电学、气体力学和化学等演讲。

• J. 里格(RIGG, J.), 伯明翰人；1843 年在伯明翰和哈里法克斯开始作反颅相学的演讲(是否就是约翰·克卢洛·里格？约翰·克卢洛·里格卒于 1868 年, 是约翰·里格牧师之子；做过亨伯河畔巴顿的一位医生的助手；做过股票经纪人凯尔先生的职员；1848—1864 年间任《看守人》的编辑)。

詹姆斯·罗伯逊(ROBERTSON, James, 约卒于 1890 年), 1832 年爱丁堡红十字会会员；伦弗鲁郡约翰斯通的外科医生；格拉斯哥医学一手足病学会、哲学协会和地质学学会会员；颅相学联合会会员(1840 年 5 月加入)；1838 年为了资助一个公共阅览室, 在约翰斯通发表一系列演讲。(不要把他与死于 1840 年的詹姆斯·罗伯逊相混淆, 后者是由施普茨海姆创立的巴黎人类学学会的主席, 他曾与库姆和麦肯齐通信, 并留给爱丁堡颅相学学会 15000 英镑, 但由于国外的司法争议, 这笔钱从来没有收到。)

鲁宾逊(ROBINSON), 科学主题的演讲者；1837 年给大塔街技工学院作过颅相学演讲。

威廉·西蒙兹·鲁特斯(ROOTES, William Symonds, 卒 294

于 1876 年), 1839 年在爱丁堡获医学博士学位, 1845 年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 医学博士乔治·鲁特斯之子; 在圣乔治医院接受训练; 赫里福特郡罗斯联合会的医学官员, 罗斯诊疗所的荣誉医生; 1841 年给赫里福特郡的文学和哲学协会作过演讲。

罗伯特·罗普(ROPE, Robert), 设菲尔德人; 职业化学家和药品制造商; 1840 年 12 月到 1841 年 5 月, 在给设菲尔德技工学院的演讲中包括了关于颅相学的一讲; 也作过生理学、化学、电学和哲学方面的演讲。

★詹姆斯·奎尔特·朗鲍尔(RUMBALL, James Quilter, 1795—1872), 1817 年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 1822 年获得药剂师协会的开业证书; 是阿宾顿的外科医生约翰·朗鲍尔之子; 他本人也是阿宾顿的外科医生; 巡游颅相学家; 自称曾在贝思莱精神病院的蒙罗的指导下学习, 并且在 1820 年前后做过施普茨海姆的学生; 写过几部价值可疑的医学著作, 并且在 1844 年为了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了解颅相学的需求而写过书; 是赫特福德郡圣奥尔本斯的无照经营的哈彭登大厦精神病院的所有者; 为《心理医学》和《颅相学杂志》撰稿; 在斯特兰德的威廉国王街 3 号开了一家颅相学商店, 1840 年与多诺万的颅相学学校展开竞争; 颅相学联合会会员; 1844 年 1 月提议建立一个新的英国颅相学学会和新的颅相学杂志, 但是这两个计划都未能实现;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伦敦和地方上讲学, 1843 年在阿德莱德画廊曾给大批听众作过演讲; 1843 年, 在英格兰追随弗农, 领导了一场反对唯物主义和催眠术(特别是颅相催眠术)的艰巨的运动; 1839—1840 年以及 1842 年分别在伍斯特和利物浦与布林德利

展开论战；曾解读过赫伯特·斯宾塞的头颅。(MEB)

赖丁(RYDING), 19 世纪 30 年代在利默里克哲学协会作过演讲。

赖利(RYLEY), 1843 年在设菲尔德作过颅相催眠术的演讲。

★马默杜克·布莱克·桑普森(SAMPSON, Marmaduke Blake, 卒于 1876 年), 1846—1879 年任《泰晤士报》城市通讯员及金融编辑；先前做过很多年的英格兰银行财政委员会秘书；为《经济学家》和《旁观者》撰稿，编辑过《通俗报告》；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古典学者；1838 年在纽约遇到库姆，与他保持了很长时间的通信联系，谈论颅相学、现钞、股票和参股；是埃普斯创办的英国顺势疗法协会的创始会员之一，并于 19 世纪 40 年代出任其委员；在利用颅相学对待罪犯、刑事法理学和罪犯的改造方面，是权威人物；为《颅相学杂志》撰稿；颅相学联合会会员(1840 年 9 月加入)，与辛普森一起提出了 1842 年的《应急宣言》；19 世纪 30 年代末和 40 年代初在伦敦各个学院给大量听众作过演讲。(MEB)

★托马斯·桑德威瑟(SANDWICH, Thomas, 1793—1867), 在圣巴托罗缪医院受过训练；大约 1815 年开始在贝弗利行医；1843 年在埃朗根获医学博士学位；是约克郡东雷丁教管所的外科医生，济贫法联合会的医学官员；写过几部医学著作；为《颅相学杂志》撰稿；1835 年在赫尔和贝弗利作过演讲。

★詹姆斯·斯科特(SCOTT, James), 在爱丁堡获医学博士学位；从 1822 年起担任戈斯波特的哈斯勒皇家海军精神病院的

医学主管;1824 年 1 月成为爱丁堡颅相学学会会员,1840 年 9 月加入颅相学联合会;19 世纪 30 年代任朴茨茅斯颅相学学会主席;1836 年给库姆提供了一份有关颅相学价值的证明书;1834—1835 年在戈斯波特和朴茨茅斯作过演讲。

295 ★约翰·斯科特(SCOTT, John),科学讲师,颅相学也包括在其演讲目录中;是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会员;大约活跃在 1850 年。

伊莉莎·沙普尔斯(SHARPLES, Eliza),参见卡莱尔夫人。

T. B. 沙特尔沃思(SHUTTLEWORTH, T. B.),设菲尔德人;1844 年加入设菲尔德颅相学学会;1843 年作过颅相催眠术的演讲。

★詹姆斯·辛普森(SIMPSON, James, 1781—1853),苏格兰鼓动家和世俗教育家;库姆(1836 年为库姆提供了有关颅相学价值的证明书)、理查德·科布登和托马斯·怀兹的密友;1823 年 4 月加入爱丁堡颅相学学会,1839 年 8 月加入颅相学联合会,与桑普森一起提出了 1842 年的《应急宣言》;《颅相学杂志》的发起人和捐助者;1836—1844 年在爱丁堡、纽卡斯尔、伯明翰、巴斯、曼彻斯特、阿伯丁等地作过关于颅相学和教育的演讲;他对工人阶级身体清洁的兴趣一如他对工人阶级道德的兴趣,他积极参与了爱丁堡的公共浴室运动;后来对催眠术产生兴趣。(DNB; MEB)

斯利普(SLEEP),1847 年在罗斯作了三次关于颅相催眠术的演讲。

★亚历山大·斯马特(SMART, Alexander),邓迪技工颅

相学学会的秘书；1833 年在邓迪演讲。

约翰·史密斯(SMITH, John), 来自泰特利罗；1843 年在布拉德福德技工学院演讲颅相催眠术。

★乔舒亚·图尔明·史密斯(SMITH, Joshua Toulmin, 1816—1869), 是威廉·霍克斯·史密斯的长子；1832 年签约成为伯明翰一位律师的学徒；1835 年在伦敦林肯律师学院做学生, 1849 年取得律师资格；作为一名文学和哲学研究者, 他对经济学和教育改革有着浓厚兴趣, 与他的父亲一起在伯明翰技工学院教书, 1835 年在那里演讲颅相学；哈里雅特·马蒂诺有关美国的描述对他产生了影响, 1835 年他移居密西根, 在那里试图通过写作和演讲颅相学谋生, 但失败了；1842 年回到英格兰, 继续法律研究；成为著名的反对政府集权的宪政律师, 创办了《议会提醒者》周刊(1857—1865)；1859 年任地质家协会首任主席；伦敦颅相学学会会员, 1839 年 8 月加入颅相学联合会并于 1840 年担任其秘书；1836—1850 年与库姆通信, 为《颅相学杂志》撰稿。(DNB; MEB; F. B. 斯特里特编：《1837—1838 年美洲杂志》，1825 年)

★西德尼·史密斯(SMITH, Sidney), 巡游颅相学家；爱丁堡人；为《颅相学杂志》撰稿；爱丁堡颅相学学会会员, 并出任实践颅相学伦理学会委员会委员；19 世纪 40 年代主要从事政治学和社会改革；1836—1838 年在苏格兰的主要中心城市、英格兰北部和曼彻斯特等地演讲；也作过有关废除谷物法和禁酒节欲的演讲, 为了吸引更多的听众, 经常把诸如“改善农业”等问题加入颅相学演讲中。

T. W. 史密斯(SMITH, T. W.), 布里斯托尔圣彼得医院医学部学生; 1838 年 2 月在布里斯托尔技工学院作过演讲(是否就是托马斯·韦德·史密斯[卒于 1857 年]? 托马斯·韦德·史密斯是 1843 年加入皇家外科医师学会的会员,《医学指南》[1858 年],第 874 页)。

296 ★威廉·霍克斯·史密斯(SMITH, William Hawkes, 1786—1840), 伯明翰激进分子和一神派信徒; 一生中做过作家、店主、印刷工、雕工、文具商、公证人、《伯明翰检察家》编辑(1817)和《密德兰纪事报》的编辑; 伯明翰技工学院的副院长; 19 世纪 30 年代被欧文主义和库姆式颅相学所吸引; 1839 年在伯明翰组织了颅相学联合会的会议; 是基督徒社会主义者;《颅相学杂志》撰稿人; 与库姆通信; 是布雷的朋友; 在伯明翰技工学院教授颅相学, 1838 年在布林德利作过一系列反颅相学的演讲以后, 他在两次演讲中公开为库姆的颅相学辩护; 19 世纪 30 年代在密德兰地区的其他城市作免费演讲; 1839 年 8 月加入颅相学联合会。(参见《颅相学杂志》1840 年第 13 期, 第 284 页;《新道德世界》, 1840 年第 7、8 期, 第 1260—1261 页、第 59 页。)

斯奈普(SNAPE), 牙科医生, 布里奇斯的学生; 1836 年在切斯特技工学院作关于颅相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用处的演讲; 19 世纪 40 年代在陶器场免费作关于颅相学和牙齿的演讲。

★托马斯·斯珀尔夫人(SPURR, Mrs. Thomas), 设菲尔德人; 与设菲尔德的颅相学家有着联系; 1836 年给设菲尔德的“女士们”演讲“作为知识器官的大脑”以及其他生理学、宗教和教育等方面的问题。

★约翰·加斯帕·施普茨海姆 (SPURZHEIM, John Gaspar, 1776—1832), 1813 年在维也纳获医学博士学位, 1817 年获得皇家内科医师学会的开业证书; 生于德国科布伦茨附近, 父母信奉路德教, 原指望做一名牧师; 在特雷维斯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 1797 年前后到维也纳旅行, 1800 年开始医学研究, 先是做高尔的学生, 后来成为其助手; 1805—1806 年陪高尔进行欧洲之旅, 1807 年与高尔一起居住在巴黎; 1813 年与高尔分手, 到英国旅行, 并在 1814—1831 年断续在英国作颅相学演讲, 1824 年前经常回到巴黎作公开演讲, 1824 年之后转为私下演讲; 从 19 世纪 20 年代初起, 使颅相学在英国公众 (既包括世俗大众, 也包括医学界人士) 中普及; 他在英国主要生活在 J. D. 霍尔姆位于伦敦的家中; 是伦敦和爱丁堡颅相学学会荣誉会员; 为《颅相学杂志》撰稿; 听他演讲的听众从 1829 年在设菲尔德演讲时的 70 人到 1826 年他在伦敦学院讲授颅相学课程时的 700 多人; 1832 年在波士顿死于热病, 当时他正进行他的美国演讲之旅。(DSB; A. 卡迈克尔:《回忆录》, 1833。)

乔舒亚·哈里森·斯托拉德 (STALLARD, Joshua Harrison, 卒于约 1856 年), 莱斯特的全科医生; 莱斯特全科医院、济贫院联盟和民兵团的外科医生; 其著述论及妇女劳动、健康和卫生、贫穷的精神病人、经济学、苏格兰济贫法、自治政府和卫生等问题; 19 世纪 50 年代反对顺势疗法和水疗法; 1847 年 1 月给莱斯特文学和哲学协会作过颅相学的演讲。

• ★S. 斯坦尼兰德 (STANILAND, S., 卒于约 1851 年), 1828 年成为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 1829 年获得药剂师协会的

开业证书;法纳姆的全科医生;后成为利兹医学院解剖学示范老师;1839 年在法纳姆文学协会作了两次反对颅相学的演讲,针对他的观点,恩格尔杜在出版物上进行了辩驳;后者的影响可能迫使他移居利兹。

威廉·斯塔克(STARK, William),来自诺里奇;是地质学会会员;1840 年在诺里奇博物馆向 300 听众演讲。

★J. 兰金·斯特宾(STEBBING, J. Rankin),来自南安普顿;为《颅相学杂志》撰稿;1833—1844 年在南安普顿和温彻斯特技工学院以及考斯文学和科学协会作过演讲。

斯托克斯(STOCKS, J. E. 斯托克斯?),设菲尔德的颅相催眠术家;1843 年在唐克斯特作过演讲,1839 年在设菲尔德科学大厅作过演讲。

297 ★詹姆斯·斯特拉顿(STRATON, James, 卒于 1856 年),加工工具制造商;阿伯丁的重要颅相学家,1836 年阿伯丁颅相学学会的创建人;颅相学联合会会员,签署了 1842 年《应急宣言》;专注于头颅的分类或“颅相学的数学”;为《颅相学杂志》和《活力论者》撰稿;1851 年 12 月在曼彻斯特雅典娜神庙作过演讲。(MEB)

埃利斯·斯威特洛夫(SWEETLOVE, Ellis, 约卒于 1843 年),1829 年领有药剂师协会的开业证书,1829 年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教育家和医学改革家;利物浦技工学院的捐助人,1833 年曾在那里演讲颅相学;1833—1835 年也在利物浦技工学院和利物浦文学、科学和商业协会作过演讲;并且也在地方上作过大气原理和其他科学主题的演讲。

★威廉·泰特(TAIT, William, 卒于 1870 年), 1833 年领有格拉斯哥内外科医生协会的开业证书; 是佩斯利诊疗所和康复院的住院外科医生和药剂师, 也是一位城市教区医生, 后来到劳德行医; 是医学学会会员以及格拉斯哥手足病医学学会会员; 著有医学方面的论文; 为《颅相学杂志》撰稿; 1840 年 7 月加入颅相学联合会, 签署了 1842 年《应急宣言》; 1835—1836 年在加拉希尔斯和劳德技工学院作过演讲。

T. 泰尔德(TAYLDER, T.), 1839 年在康沃尔的圣奥斯特尔文学协会作过演讲。

• J. N. H. 托马斯牧师(THOMAS, Rev. J. N. H.), 1836 年 11 月在爱丁堡的圣詹姆斯教堂布道时反对库姆的《人类体格》(见图 5)。

• 索普(THORPE), (是否就是 1810 年爱丁堡的索普?) 医学博士; 在利兹行医; 1838 年给利兹文学协会作过反颅相学的演讲。

★托马斯·蒂奇伯恩(TICHBORNE, Thomas), 汉普郡颅相学学会会员; 19 世纪 40 年代受雇于萨默塞特议会的印花税和税收办公室; 和埃普斯通过信; 1832—1835 年以及 1839 年在汉普郡、朴茨茅斯和在伦敦学院作过演讲。

图姆斯(TOOMBES), 1837 年在塔街相互促进学会作过演讲。

约翰·托贝特(TORBET, John), 佩斯利的外科医生; 1821 年 11 月加入爱丁堡颅相学学会; 1824—1825 年在佩斯利哲学协会给 70 人作过演讲。

★弗雷德里克·托古德(TOWGOOD, Frederick, 卒于 1860 年),禁酒和禁烟的倡导者;1850 年担任《健康杂志》的合编者;1856 年担任新的伦敦颅相学学会财务主管;1855 年在卡姆登会堂作过演讲。

汤森(TOWNSEND),来自霍沃思,1843 年在哈德斯菲尔德作过两场关于颅相催眠术的演讲。

★爱德华·阿斯特伯里·特利(TURLEY, Edward Astbury),伍斯特的教育家;1825 年 3 月加入伦敦颅相学学会,颅相学联合会会员;1839 年以及 1834—1836 年分别在伍斯特雅典娜神庙和吉尔德霍尔作过非常成功的演讲。

★亨利·特纳(TURNER, Henry),设菲尔德的仓库管理员;从 1857 年起就成为西雷丁重要的世俗主义者;是约瑟夫·巴克的追随者;在设菲尔德的一所主日学校学习过颅相学;19 世纪 40 年代担任设菲尔德颅相学学会秘书;在设菲尔德技工学院讲授颅相学,以理查德·奥斯特勒、艾萨克·艾恩赛德、霍利约克和欧文等人的头颅来解说这门科学。

298 托马斯·特纳(TURNER, Thomas, 1793—1873),1843 年加入皇家外科医师学会;1817—1820 年是曼彻斯特医院的住院医生;1830 年任曼彻斯特皇家医院的外科医生;为曼彻斯特创立内外科医学校起了促进作用;1843 年任曼彻斯特皇家学院哲学教授;1835 年加入地方的内外科医学协会,为协会《会刊》撰稿;是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卫生协会(建立于 1852 年)的重要人物;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会员;1844 年在曼彻斯特皇家学院作教育演讲,利用颅相学以及巴利提供的模型来解释教育。(DNB)

★W. 约翰·弗农 (VERNON, W. John, 卒于 1850 年), 具有戏剧天赋的科学福音传道者; 1840—1843 年在英格兰南部与基斯特一起演讲, 1843 年以后专长于颅相催眠术; 1840 年 8 月加入颅相学联合会, 并在 1841 年的会议上发表一篇论文; 在伯克之前担任《人民的颅相学杂志》的编者; 为《颅相学杂志》撰稿; 他在埃克塞特的演讲促进了埃克塞特颅相学学会的形成; 1845 年, 他为自己摄政街的演讲所做的广告把自己宣传为“催眠术和颅相学的咨询者”; 曾参加宪章运动, 并因为参与 1848 年的骚乱而被监禁 18 个月, 获释后不久即去世。(《雷诺兹政治教员》, 1850 年 1 月 26 日, 第 89—90 页。)

★休伊特·科特雷尔·沃森 (WATSON, Hewett Cottrell, 1804—1881), 植物学家; 1837—1841 年任《颅相学杂志》编辑; 是柴郡地方官员霍兰·沃森 10 个孩子中的一个; 曾立志投身军队, 但由于膝盖受伤使他走起路来一瘸一跛, 因而转攻法律 (在曼彻斯特取得了律师从业资格), 后来又转向医学 (1828—1832 年在爱丁堡学习); 继承了一小笔遗产, 使他不必要为生计发愁; 1823 年前后在利物浦通过卡梅伦首次了解颅相学, 当他在爱丁堡与库姆以及其他重要的颅相学倡导者相遇后, 就成为一名热心的颅相学倡导者; 反对他父亲的托利主义和英国国教的教育; 承认自己是一个民主主义者, 1848 年写了论自治方面的著述; 是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会员; 爱丁堡颅相学学会会员, 1839 年 8 月加入颅相学联合会; 1839 年在沃灵顿作过演讲, 1839 年和 1843 年在曼彻斯特雅典娜神庙作过演讲; 1840 年放弃颅相学, 致力于植物学和进化论研究。(DNB; MEB; DSB)

瓦茨(WATTS), 1836 年在伯明翰技工学院、1843 年在曼彻斯特曾作过生理学、颅相学和颅相催眠术的演讲(可能就是约翰·瓦茨[1818—1887], 考文垂丝带织匠的儿子; 欧文主义者, 担任过考文垂技工学院秘书, 1841—1844 年在曼彻斯特科学大厅管理一个男孩学校: *MEB*)。

★威廉·韦尔(WEIR, William, 1794—1876), 1829 年在格拉斯哥获医学博士学位; 1814 年领有格拉斯哥内外科医生协会的开业证书, 1816 年成为其会员; 1847—1849 年担任其主席; 1829 年任格拉斯哥皇家医院的外科医生, 1840 年起任该医院内科医生; 1830—1842 年讲授生理学, 是波特兰街医学学校秘书, 参与了 1839 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会员的协商; 其父是一位偶尔在格拉斯哥圣乔治教堂领唱的音乐教师; 他是《格拉斯哥医学杂志》的最初倡议者, 1830—1832 年与 A. 布坎南共同担任该杂志的编辑; 为《颅相学杂志》撰稿; 格拉斯哥颅相学学会会员, 1840 年 7 月加入颅相学联合会, 签署了 1842 年《应急宣言》; 1846 年在安德森大学任颅相学教授(年薪 50 英镑); 1831—1834 年以及 1841—1842 年在格拉斯哥、1835 年在格里诺克曾进行公开演讲; 1836 年给库姆提供了一份关于颅相学价值的证明书; 拥有一家私人的颅相学博物馆。(MEB)

温曼(WENMAN), 1826 年加入伦敦颅相学学会; 19 世纪 20 年代在伦敦作过演讲。

299 ★约翰·怀特(WHITE, John, 1806—1868), 1828 年领有药剂师协会的开业证书, 1829 年加入皇家外科医师学会; 来自米德尔埃塞克斯的芬奇利; 著有《关于人的通俗讲稿》(1841)和

《妻室教程》(1849)；1837 年在托特纳姆的兰开斯特教室、1838 年在托特纳姆技工学院、1841 年在海格特文学和科学协会作过演讲；是深奥的基督教颅相学家；19 世纪 50 年代在巴斯以操作者的身份出现(也可能是演讲者)。

★威廉·安德伍德·惠特尼(WHITNEY, William Underwood, 1813—1895), 1835 年领有药剂师协会的开业证书, 1835 年加入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师学会；在巴斯以及圣塞洛缪医院接受训练；威斯敏斯特普通医生；1850 年以后任威斯敏斯特女性收容所外科医生, 西部诊疗所医学官员, 伊曼纽尔医院外科医生；1837 年任威斯敏斯特技工和文学协会秘书, 在那里他培养了一个颅相学班(多诺万曾对该班给予特别的训练), 并于 30 年代在那里演讲过颅相学；为《颅相学杂志》撰稿；1840 年在卡多根协会作过“民族—颅相学方面的特征”的演讲。

詹姆斯·威廉斯(WILLIAM, James, 1811—1868), 桑德兰的宪章派和欧文主义者；在一个贵格会信徒经营的糖果店工作, 此人为他传授了和平及绝对禁酒的原则；后来成为一位书报代理人；1839 年因参与宪章派活动而遭逮捕, 被监禁了 6 个月；1843 年的欧文主义杂志《新道德世界》中曾说他是“我们杰出而尊贵的朋友”；后来成为桑德兰市的地方议员；1843 年在东北地区作过颅相催眠术演讲。(MEB)

★威廉·马蒂·威廉斯(WILLIAMS, William Mattieu, 1820—1892), 伦敦鱼商之子；在伦敦技工学院与威廉·埃利斯一起合作, 创办了世俗小学；1841—1842 年在爱丁堡大学学习, 后来去欧洲游历；制造电气设备；1848—1854 年任爱丁堡库姆

世俗学校的校长，随后在伯明翰密德兰学院工业系任科学教师，直到 1863 年；1881—1882 年任伯明翰工学院的管理人员；1880—1889 年为《绅士杂志》撰写关于科学解释的稿件；他是速记的倡导者；他的颅相学知识是在伦敦技工学院获得的，1848 年 8 月他也在那里作过演讲，并辅导过颅相学课程。（*MEB*；J. 安吉尔在威廉斯的《颅相学辩护》[1894]中的回忆。）

罗伯特·威利斯（*WILLIS, Robert, 1799—1878*），1819 年在爱丁堡获医学博士学位，1823 年加入皇家外科医师学会，1837 年领有皇家内科医师学会的开业证书；根据艾伯内西的建议，1827 年被任命为皇家外科学院的图书管理员，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到 1845 年，此后在萨里郡的巴恩斯开始行医；是施普茨海姆和威廉·哈维著作的翻译者；写过几部医学著作，还写过斯宾诺莎（1870）、塞维特乌斯和加尔文（1877）等人的传记；1820 年 6 月加入爱丁堡颅相学学会，1824 年加入伦敦颅相学学会；1824 年初在伦敦发表一系列演讲，这些演讲因其听众不超过 7 人而出名。（*DNB*；*MEB*）

威尔逊（*WILSON*），1843 年在福尔柯克作过颅相催眠术的演讲。

亚历山大·威尔逊（*WILSON, Alexander, 1846 年卒于韦克斯福德郡*），生于苏格兰，最初受雇于邓巴顿郡的一个店主；曾为《苏格兰人》工作过一段时间；是一位特别沉默寡言的具有文学气质的人；很显然他演讲颅相学是为了金钱，1836—1846 年主要在爱尔兰游历，也操作颅相学；1842 年在伯明翰雅典娜神庙作了一次演讲。（参见《颅相学杂志》1847 年第 20 期，第

95 页。)

★约翰·威尔逊(WILSON, John), 来自多尔顿(在弗内斯?)；颅相学“教授”；19 世纪 40 年代在切尔滕纳姆行医；30 年代在爱尔兰和英格兰演讲；写过几部具有强烈的基督教颅相学倾向的宗教著作；1842 年应颅相学学会之邀在伯明翰皇家医学学校作了 6 次演讲。

亨利·T. M. 威瑟姆(WITHAM, Henry T. M., 卒于 1844 年), 巴纳德堡人；罗马天主教徒和辉格党人；业余地质学家；在爱丁堡住了 6 年, 1833 年 4 月在那里加入颅相学学会；1828 年担任沃纳学会的副主席, 是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员；少数几个身为天主教徒而卷入英国科学促进协会早期历史的人员之一, 1838 年在纽卡斯尔协商中表现活跃；1844 年成为达勒姆郡的高级治安官；1836 年为麦肯齐提供了颅相学价值的证明书；建立巴纳德堡技工学院并担任其主席, 1836 年在那里演讲。(参见《颅相学杂志》, 1845 年第 18 期, 第 188 页。)

★小查尔斯·索罗尔德·伍德(WOOD, Charles Thorold, Jr.), 出生于唐克斯特附近的坎普索尔豪尔；是霍斯加尔兹一位船长之子, 是内维尔·伍德(1818—1886；颅相学学会会员, 《分析家》和《自然家》的编辑)的兄弟；教育家和鸟类学家；1832 年建立了坎普索尔实用知识传播学会, 并为其演讲颅相学；为《基督教医生》撰稿；1837 年在莱斯特文学和哲学协会和伦敦作过演讲, 1838 年在唐克斯特学园作过演讲, 1839 年在设菲尔德作过演讲。

★弗兰克·伍德(WOOD, Frank), 外科医生；为查尔斯·

帕廷顿的《科学报》撰稿；1824 年 4 月加入伦敦颅相学学会；1826 年向伦敦学院申请作演讲（但是否作过演讲未经证实）。

约翰·罗伯逊·伍德(WOOD, John Robertson), 1831 年在格拉斯哥获医学博士学位；是邓弗里斯一位长老会牧师的孙子，苏格兰自由教会长老会主席的兄弟；曾担任格拉斯哥技工学院解剖学讲师；1828 年因支持托马斯·坎贝尔反对沃尔特·斯科特爵士担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出名；后移居伦敦，英年早逝；1833 年在格拉斯哥技工学院讲过 6 个月的生理学和颅相学，1833—1836 年在格里诺克讲课，有一次曾到格拉斯哥的改革长老会教堂演讲。

威洛比·伍德(WOOD, Willoughby), 查尔斯·伍德的兄弟；1838 年在设菲尔德学园演讲“从颅相学角度谈音乐”；也曾在唐克斯特发表攻击正统政治经济学的演讲。



本书前面“关于资料来源和缩写的说明”解释了文献资料的构成情况,使我们能够了解标准的杂志缩写之外的其他缩写。

导 论

1. 关于科学、医学和技术及其最新的重新阐释的文献材料,见 Pietro Corsi and Paul Weindling, eds., *Information Source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Medicine* (1983); P. T. Durbin, ed., *A Guide to the Cultur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N. Y., 1980); Ina Spiegel-Rosing and Derek de Solla Price, ed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Beverly Hills and London, 1977); and G. S. Rousseau and Roy Porter, eds., *The Ferment of Knowledge: studie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eighteenth-century science* (Cambridge, 1980)。专门关于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的著述,见 Barry Barnes, ed., *Sociology of Science: selected readings* (Harmondsworth, 1972); Michael Mulkey, *Science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1979) 以及杂志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关于被抵制的科学知识的著述,见 Roy Wallis, ed., *On the Margins of Scienc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jected knowledge*, *Sociological Review Monographs* 27 (Keele, 1979); 关于哲学,见 Yehuda Elkana, 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Highlands, N. J., 1974)。此处引文取自 Noam Chomsky, “Objectivity and

- Liberal Scholarship”, in his *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Harmondsworth, 1969), 23—129 at p. 50.
2. 苏珊·坎农在其他方面较有价值的著作 *Science in Culture: the early Victorian Period* (N. Y., 1978) 就是这种情况, Stephen Cotgrove 和 Steven Box 的著作 *Science, Industry and Society* (1970)、Hilary 和 Steven Rose 的著作 *Science and Society* (Harmondsworth, 1969) 或 Peter Mathias 编著 *Science and Society, 1600—1900* (Cambridge, 1972) 也是如此。
 3. L. Pyenson, “‘Who the Guys Were’: prosopography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Hist. Sci.*, 15 (1977), 155—188 at p. 179。例外情况有: Charles Gillispie, *Genesis and Geology: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of scientific thought, natural theology, and social opinion in Great Britain, 1790—1850* (1951; N. Y., 1959), esp. chap. 7, pp. 184—216; David Layton, *Science for the People: the origins of the school curriculum in England* (1973); Alfred Kelly, *The Descent of Darwin: the popularization of Darwinism in Germany, 1860—1914* (Chapel Hill, N. C., 1981); 以及两篇未刊论文: D. A. Hinton, “Popular Science in England, 1830—1870”, Ph. D. thesis, Bath, 1979; and Susan Sheets Pyenson, “Low Scientific Culture in London and Paris, 1820—1875”, Ph. D. thesis, Pennsylvania, 1976。
 4. S. Shapin and A. Thackray, “Prosopography as a Research Tool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he British scientific community, 1700—1900”, *Hist. Sci.*, 12 (1974), 1—28 at p. 21.
 5. Theodore Roszak, *Where the Wasteland Ends: politics and transcendenc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 Y., 1972), p. xxiv。也见: P. D. Anthony, *The Ideology of Work* (1977), p. 94 et passim。
 6. Paul Feyerabend, *Science in a Free Society* (1978), p. 31.
 7. 见: Susan Budd, *Varieties of Unbelief: atheists and agnostics in English Society, 1850—1960* (1977), p. 1.
 8. 阿多诺引自 Martin Jay,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1974), p. 222(关于仔细区分在准因果关系意义上的意义和功能的必要性,见:Peter Winch, *The Idea of a Social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 [1958], pp. 115—116); Douglas, *Cultural Bias*,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ccasional Paper no. 35 (1978), p. 1。
9. 关于高尔及其学说的最简洁说明当数罗伯特·M. 扬在《科学家传记词典》中关于“高尔”的条目,见 *DSB*, vol. 5 (1972), 250—256。这个条目也包括了有用的文献和原始及二手资料。
10. 关于高尔思想的起源和悠久,见:M. Bentley, “The Psychological Antecedents of Phrenology”,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21 (1916), 102—115; Max Neuburger,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Experimental Brain and Spinal Cord Physiology before Flourens* (1897) trans. E. Clarke (Baltimore, 1981); Edwin Clarke and C. D. O’Malley, *The Human Brain and Spinal Cord: a historical study illustrated by writings from antiquity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rkeley, 1968); E. Lesky,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Gall”, *Bull. Hist. Med.*, 44 (1970), 297—314; H. W. Magoun, “Development of Ideas Relating the Mind with the Brain”, in C. Brooks and Paul Cranefield, ed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Physiological Thought* (N. Y., 1959), 81—108; N. H. Steneck, “Albert the Great on the Classific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the Internal Senses”, *Isis*, 65 (1974), 193—211; A. E. Walk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Cerebral Localiz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ull. Hist. Med.*, 31 (1957), 99—121。
- 颇相学的反对者利用这种学说的悠久反对其新颖性,支持者使用它来展示这种学说的“高尚遗产”,把高尔的思想与博尔哈夫(Boerhave)、哈勒(Haller)、冯·斯温滕(Von Swieten)、舍尔哈默(Schellhammer)、格拉瑟(Glasser)、雅各比(Jacobi)、维厄桑斯(Vieussens)、门罗(Monro)、维克·德阿齐(Vicq d’Azyr)、赖尔(Reil)、约翰·巴普蒂斯塔·波尔塔(John Baptista Porta)、阿格里帕(Agrrippa)、德拉波塔(Delaporta)、蒂德曼(Tiedemann)、普罗查斯卡(Prochaska)、威利斯(Willis)、斯

威登伯格 (Swedenborg)、布勒因斯威克的杰罗姆 (Jerome of Bruynswyke) 以及 9 世纪的爱尔兰籍苏格兰人约翰联系起来。见: P. M. Roget, "Cranioscopy", *Encycl. Brit.*, Suppl. 4th—6th ed. (Edin., 1824), vol. 3, 419—437 at p. 420; Thomas Laycock, "Phrenology", *ibid.* (8th ed., Edin., 1859), vol. 17, 556—567 at p. 557; A. Macalister, "Phrenology", *ibid.* (9th ed., Edin., 1885), vol. 18, 842—849 at pp. 842—843; John Elliotson, "The Term Organs of the Brain, used before Gall", *Zoist*, 3 (1845), 22—24; J. Eliot Hodgkin, "Phrenolog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otes & Queries*, 8th ser., 5 (24 Mar. 1894), 224—225; Terrance O'Toole, "Origin of Phrenology", *Dublin Penny J.*, 1 (18 Aug. 1832), 60—61; "The Phrenology of the Middle Ages", *Gents. Mag.*, 103 (1833), 126—128; "Historical Notice of Early Opinions Regarding the Functions of the Brain", *Pren. J.*, 2 (1824/1825), 378—391; "Antiquity of Phrenology", *Lancet*, 5 Aug. 1826, p. 599; "Phrenology as Old as Creation", *Edin. Mag. & Lit. Misc.*, 93 (Mar. 1824), 268—275; "Swedenborg's Doctrine of Craniology", *Lon. Med. Repository*, 6 (1828), 92—93.

11. Young, "Gall", p. 252; *idem*, *Mind, Brain, and Adapt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erebral localization and its biological context from Gall to Ferrier* (Oxford, 1970); and K. Dallenbach, "The History and Derivation of the Word 'Function' as a Systematic Term in Psychology", *Amer. J. Psychol.* 26 (1915), 473—484, esp. at p. 484.
12. Macdonald Critchley, "The Divine Banquet of the Brain": *the Harveian Oration* (1966), p. 6.
13. 引自 Louis Chevalier, *Labouring Classes and Dangerous Classes in Paris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rans. F. Jellinek (1973), p. 411.
14. Lavater, *Essays on Physiognomy: for the promo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love of mankind*, trans. T. Holcroft (1789), as q. in Willard L. Valentine and D. D. Wickens, *Experimental Foundations of General Psy-*

- chology* (3rd ed., N. Y., 1949), p. 6. 也见: Theodore Poupin, *Caractère phrénologiques et physiognomiques des contemporaines les plus célèbres, selon les systèmes de Gall, Spurzheim, Lavater, etc.* (Paris, 1837); 303
A. Ysabeau, *Lavater et Gall* (Paris, n. d.). 关于拉瓦特尔及其著作在英国拥有很多版本(到 1800 年有 20 个版本), 见: J. Graham, "Lavater's Physiognomy in England", *J. Hist. Ideas*, 22 (1961), 561—572。
15. [Richard Chenevix], "Gall and Spurzheim: phrenology", *Foreign Q. Rev.*, 2 (1828), 1—59 at p. 37.
16. 见 Brian Easlea, *Witch-hunting, Magic, and the New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to debates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1450—1750* (Brighton, 1980), pp. 111 ff.。
17. 当 18 世纪中期林奈正试图根据有相互关系的心理学和生物学分类来证实人类的种类, 巴蒂和门罗家族正努力通过人类的“神经”质来划分人的类型时, 伊曼纽尔·斯威登伯格正独立地详细阐述一种与高尔的大脑区位理论非常类似的理论。见: G. S. Rousseau, "Psychology", in Rousseau and Porter, *Ferment of Knowledge*, 143—210 at p. 172; and K. Akert and M. P. Hammond, "Emanuel Swedenborg (1688—1772)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Neurology", *Med. Hist.*, 6 (1962), 255—266。
18. 见: Chevalier, "The Preoccupation with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his *Labouring Classes*, pp. 409—417 at p. 410; and Young, "Gall", pp. 252—253。
19. Stephan L. Chorover, *From Genesis to Genocide: the meaning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power of behavior control* (Cambridge, Mass., 1979), p. 143; 也见: Erna Lesky, *The Vienna Medical School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altimore, 1976), chap. 1。
20. Gall, *Anatomie et physiologie du système nerveux en général, et de cerveau en particulier, avec des observations . . . de l'homme et des animaux*, 4 vols. and atlas (Paris, 1810—1819)。这部著作(前两卷是与

施普茨海姆合著的)经过修订后出版为六卷本 *Sur les fonctions du cerveau et sur celles de chacune de ces parties*, 6 vols. (Paris, 1822—1825), 1835 年经温斯洛·刘易斯牧师 (Winslow Lewis) 翻译后出版 (Boston, 1835)。1844 年伦敦开始翻译另一译本, 但没有完成; 高尔的部分作品被艾伦·埃普斯翻译后在 1846—1852 年的《健康和疾病杂志》上发表。一些伦敦颅相学家抱怨“几乎很少有颅相学家看过高尔的著作”是有根据的。见: *Zoist*, 13 (1856), 441; and John Elliotson, “On the Ignorance of the Discoveries of Gall Evinced by Recent Phrenological Writers”, *Lancet*, 25 Nov. 1837, 295—298。

21. *Med. & Phys. J.*, 4 (1800), 50. 据说伦敦议会街的一位盖斯韦勒先生拥有高尔从维也纳寄来的一份手稿。从 1802 年起《每月评论》、《月刊》和《哲学杂志》中开始出现更全面的报道; 从 1803 年起《爱丁堡评论》、1805 年起《文学杂志》、1806 年起《绅士杂志》都开始有了更全面的报道。关于高尔的两份重要的英文早期文献是 *Dr. F. J. Gall's System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Brain Extracted from Charles Augustus Blöde's Account of Dr. Gall's Lectures, Held on the Above Subject at Dresden;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to serve as an explanatory attendant to Dr. Gall's figured plaster-skulls* (n. p., n. d. [c. 1805]) 以及 [Henry Crabb Robinson], *Some Account of Dr. Gall's New Theory of Physiognomy... with the Critical Strictures of C. W. Hufeland, M. D.* (1807), 后者是根据 1805 年在耶那听了高尔的演讲而写成的, 它为百科全书中创建关于这个主题的第一个条目“头骨学”奠定了基础, 见 *Rees's Cyclopaedia* (1807), vol. 10 (rev. ed., 1819), n. p., 15 cols.
22. 例如见: D. de Giustino, “Reforming the Commonwealth of Theives: British phrenologists and Australia”, *Vict. Stud.*, 15 (1972), 439—461; Arthur Fink, “Phrenology”, in his *Causes of Crime: biological theo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00—1915* (Phil., 1938), 1—19; David W. Lewis, *From Newgate to Dannemora: the rise of the penitentiary in New York, 1796—1848* (Ithaca, N. Y., 1965), 232—250; A. Price, “A Pioneer of Scientific Education, George Combe (1788—1858)”,

Educ. Rev., 12 (1959/1960), 219—229; and R. J. Cooter, "Phrenology and British Alienists, c. 1825—1845", *Med. Hist.*, 20 (1976), 1—21, 135—151, repr. in Andrew Scull, ed., *Madhouses, Mad-Doctors, and Madmen: the social history of psychiatry in the Victorian era* (Phil., 1981), 58—104; 也见 Sir Geoffrey Jefferson, "The Contemporary Reaction to Phrenology", in his *Selected Papers* (1960), 94—112。

23. 关于在其他地方没有提到的那些人(见索引), 见:(关于 James Hunt) 304 R. Rainger, "Race, Politics, and Science: the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in the 1860s", *Vict. Stud.*, 22 (1978), 51—70; W. M. Sensesen, "Charlotte Brontë's Use of Physiognomy and Phrenology", *Trans. Brontë Soc.*, 12 (1957), 286—289; I. Jack, "Physiognomy, Phrenology, and Characterization in the Novels of Charlotte Brontë", *ibid.*, 15 (1970), 377—391; M. B. Stern, "Poe, 'The Temperament' for Phrenologists", *Amer. Lit.*, 40 (1968), 155—163; E. Hungerford, "Poe and Phrenology", *Amer. Lit.*, 2 (1930/1931), 209—231; *idem*, "Walt Whitman and His Chart of Bumps", *Amer. Lit.*, 2 (1930/1931), 350—384; J. B. Wilson, "Phrenology and the Transcendentalists", *Amer. Lit.*, 28 (1956/1957), 220—225; Taylor Stoehr, *Hawthorne's Mad Scientists: pseudo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fe and letters* (Handen, Conn., 1978); T. Hillway, "Melville's Use of Two Pseudo-Sciences", *Mod. Lang. Notes*, 64 (1949), 145—150; and H. Aspiz, "Phrenologizing the Whale", *Nineteenth Century Fiction*, 23 (1968), 18—27。法国作家中相信颅相学的有巴尔扎克、波德莱尔、阿尔弗雷德·维尼(Alfred de Vigny)、欧仁·苏(Eugene Sue)和乔治·桑。
24. 这主要是大卫·德朱斯蒂诺(David de Giustino)和约翰·D.戴维斯的观点, 见: David de Giustino, *Conquest of Mind: phrenology and Victorian social thought* (1975); and John D. Davies, *Phrenology, Fad, and Science: a nineteenth-century crusade* (New Haven, 1955; repr.

- ed., 1971)。也见: O. Temkin, "Gall and the Phrenological Movement", *Bull. Hist. Med.*, 21 (1947), 275—321; T. M. Parssinen, "Popular Science and Society: the phrenology movement in early Victorian Britain", *J. Soc. Hist.*, 7 (1974), 1—20。
25. Shapin, "Phrenological Knowledge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Edinburgh", *Ann. Sci.*, 32 (1975), 219—243; idem, "The Politics of Observation: cerebral anatomy and social interests in Edinburgh phrenology disputes", in Wallis, *Margins of Science*, 139—178; idem, "Homo Phrenologicus: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an historical problem", in Barry Barnes and Steven Shapin, eds., *Natural Order: historical studies of scientific culture* (Beverly Hills and London, 1979), 41—71。也见: David Turnbull, ed., *Phrenology: the first science of man* (Deakin University, 1982) 以及 R. 约 (R. Yeo) 对此书的优秀评论, R. Yeo in *Proc. Austral. Ass. Hist., Phil., (and) Soc. Stud. Sci.*, no. 13 (1982), 26—29。
26. 见: R. M. Young, "The Impact of Darwin on Conventional Thought", in Anthony Symondson, ed., *The Victorian Crisis of Faith* (1970), 13—35 at p. 16。
27. *The Secularization of the European Mi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1975), pp. 170, 183。也见: Budd, *Varieties of Unbelief*, p. 128; F. A. Hayek,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Glencoe, Ill., 1955), p. 206; E. P. Thompson,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 in his *The Poverty of Theory* (1978), 35—91, at pp. 61 ff., but cf. R. M. Young, "The Historiographic and Ideological Contexts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Debate on Man's Place in Nature", in Mikuláš Teich and Robert M. Young, eds., *Changing Perspective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1973), 344—438 at pp. 423 ff。
28. Robert Mert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2nd ed., N. Y., 1970), p. 209。也见: Zygmunt Bauman, *Culture as Praxis* (1973); C. Geertz, "Ideology as a Cultural System",

in David E. Apter, ed., *Ideology and Discontents* (Glencoe, Ill., 1964), 47—76; H. Marcuse, “Remarks on a Redefinition of Culture”, in Gerald Holton, ed., *Science and Culture* (Boston, 1965), 218—235; James P. Spradley, ed., *Culture and Cognition: rides, maps, and plans* (San Francisco, 1972); and Y. Elkana, “Introduction: culture, control system, and science”, in R. S. Cohen et al., eds., *Essays in Memory of Imre Lakatos* (Dordrecht, Holland and Boston, 1976), 99—107。

第一章 源自于大脑井

1. Morell, *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View of the Speculative Philosophy of Europ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846), I, pp. 411—426, II, pp. 529 ff.; Lewes, “Phrenology”, in his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Philosophy* (rev. ed., 1857), 655—674; and Lange, *The History of Materialism and Criticism of Its Present Importance* trans. E. C. Thomas (1881), III, pp. 113—125.
2. A. G. W. Whitfield, “Clark and Combe: fact and fantasy”, *J. Ray. Coll. Phys.*, 11 (1977), 268—272 at p. 272. 类似的参考资料, 见: Daniel W. Hering, “Phrenology”, in his *Foibles and Fallacies of Science* (1924), 152—157; C. J. Herrick, “Error in Neurophysiology”, in Joseph Jastrow, ed., *The Story of Human Error* (N. Y., 1936), 251—267; Joseph Jastrow, “The Skull Science of Dr. Gall”, in his *Wish and Wisdom: episodes in the vagaries of belief* (N. Y., 1935), 389—403; Lowell S. Selling, “‘Quack’ Number One: Gall”, in his *Men against Madness* (N. Y., 1940), 121—172; and Martin Gardner, “From Bumps to Handwriting”, in his *Fads and Fallacies in the Name of Science* (2nd ed., N. Y., 1957), 292—298.
3. 见: R. Wallis, *Margins of Science*, esp. the essay by H. Collins and T. J. Pinc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anormal: nothing unscientific is

- happening”, 237—270; and R. M. Young, “Getting Started on Lysenkoism”, *Rad. Sci. J.*, 6/7 (1978), 81—105。
4. Dallenbach, “Phrenology versus Psychoanalysis”, *Amer. J. Psychol.*, 68 (1955), 511—525; Medawar, “Further Comments on Psychoanalysis”, in his *The Hope of Progress* (1972), 57—68 at p. 68; Rose, “Scientific Racism and Ideology: the I. Q. racket from Galton to Jensen”, in Hilary Rose and Steven Rose,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cience: ideology of/in the natural sciences* (1976), 112—141 at pp. 117, 129; Eysenck, *Fact and Fiction in Psychology* (Harmondsworth, 1965), pp. 130—131, *Sense and Nonsense in Psychology* (Harmondsworth, 1958), p. 61, and *Uses and Abuses of Psychology* (Harmondsworth, 1954), pp. 28—29; 也见: L. Mann, “Psychometric Phrenology and the New Faculty Psychology”, *J. Special Educ.*, 5 (1971), 3—14; and S. Waksman, “Psychometric Phrenology Revisited: comments on neuropsychological testing”, *J. Consult. & Clin. Psychol.*, 46 (1978), 1489—1490。
5. 对实证主义及其被滥用的理论结构的批评, 见: L. Levidow, “A Marxist Critique of the IQ Debate”, *Rad. Sci. J.*, 6/7 (1978), 13—72; and Thomas McCarthy, *The Critical Theory of Jürgen Habermas* (Cambridge, Mass., 1978), esp. at pp. 5—8, 40—52。
6. Mendelsoh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Mendelsohn et al., eds.,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Dordrecht, Holland and Boston, 1977), 3—26. Cf. Joseph Ben-David’s idealist account of the origins of C17 science in his *The Scientist’s Role in Society* (Englewood Cliffs, N. J., 1971) as criticized in T. Gran, “Elements From the Debate on Science in Society: a study of Joseph Ben-David’s theory”, in Richard Whitley, ed., *Social Processes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1974), 195—209; 也见: P. Wright, “On the Boundaries of Scienc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in Yehuda Elkana and E. Mendelsohn, eds., *Sciences and Cultures: sociology of the sciences*, vol. 5 (Dordrecht, Holland, 1981), 77—100; and Frank Manuel, *A Portrait*

- of Isaac Newton* (Cambridge, Mass., 1968), p. 119.
7. D. Dickson, "Science and Political Hegemon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Rad. Sci. J.*, 8 (1979), 7—37, at p. 10. 关于其经济背景, 见: Joyce Appleby, *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Princeton, 1978), esp. at p. 245.
 8.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1923; trans. R. Livingstone, 1971), pp. 7—11, 89—98, et passim. 加雷斯·斯特德曼·琼斯引用了相关段落, 见: Gareth Stedman Jones, "The Marxism of the Early Lukács", *New Left Rev.*, no. 70 (1971), repr. in Stedman Jones, ed.,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reader* (1977), 11—60 at pp. 13—14; 也见: R. M. Young, "Man's Place in Nature", pp. 398—399, 402, 405, 414, 430—434.
 9. "Science Is Social Relations", *Rad. Sci. J.*, 5 (1977), 65—129.
 10. 例如: David de Giustino, *Conquest of Mind*; John D. Davies, *Phrenology: fad and science*; Alastair Cameron Grant, "George Combe and His Circle: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hi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h. D. thesis, Edinburgh, 1960; T. M. Parssinen, "Phrenology Movement"; A. McLaren, "Phrenology: medium and message", *J. Mod. Hist.*, 46 (1974), 86—97; O. Temkin, "Gall and the Phrenological Movement"; A. Wrobel, "Orthodoxy and Respectabil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Phrenology", *J. Pop. Culture*, 9 (1975), 38—50.
 11. 从表面上看, "科学主义"是从已经得到确认的科学领域向社会领域的不合理推断,但是由于科学本身是在社会状况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并包含了这些社会状况,因此可以说, "科学主义"只不过是公开地实现了社会合法化,而科学却是隐蔽地实现社会合法化。见: L. Hodgkin, "A Note on Scientism", *Rad. Sci. J.*, 5 (1977), 8; D. Dickson, "Technology and Social Reality",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1 (1975), 34—37; and Phil Brown, "Scientism of Dialectics?" in his *Toward a Marxist Psychology* (N. Y., 1974), 11—37。也可参见哈耶克对

- 科学和科学主义所做的实证主义区分, F. V. Hayek, "Scientism and the Study of Society", in his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129—142; G. Eastman, "Scientism in Science Education", *Science Teacher*, 36 (1969), 19—22; Robert B. Fisher, "Science and/or Scientism", in his *Science, Man, and Society* (Phil., 1971), 43—44; and W. H. White, "Scientism", in his *The Organization Man* (N. Y., 1956), 25—35.
12. 例如, "颅相学是一种奇怪的知识岔道, 走在这条道上的知识分子急切地欢迎一些看似充满光明前途的徘徊不定的新事物。等到这些运动的真正性质显现出来一般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到那时, 如果这种前途已经渺茫, 多数人将恢复良好的判断力, 而这个领域将留给那些江湖骗子。" H. Schwartz, "Samuel Gridley Howe as Phrenologist", *Amer. Hist. Rev.*, 57 (1952), 644—651 at p. 651.
13. 关于布罗卡以及大脑区位的历史, 见: Edwin Clarke's entry on Broca in DSB; M. Critchley, "The Origins of Aphasiology", *Scot. Med. J.*, 9 (1964), 231—242; K. Goldstein, "Pierre Paul Broca, 1824—1880", in Webb Haymaker and F. Schiller, eds., *The Founders of Neurology* (Springfield, Ill., 1953), 259—263; W. Reise and E. C. Hoff, "A History of the Doctrine of Cerebral Localization", *J. Hist. Med.*, 5 (1950), 51—71 and 6 (1951), 439—470; William Hanna Thomson, *Brain and Personality or the Physical Relations of the Brain to the Mind* (1907), pp. 21 ff.; A. E. Walker, "Concept of Cerebral Localization"; Young, *Mind, Brain, and Adaptation*; and O. L. Zangwill, "The Cerebral Localization of Psychological Functions", *Advancement of Science*, 20 (1963/4), 335—344.
14. *The Story of the Brain*, Henderson Trust Lectures. no. III,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29 Feb. 1924, pp. 15, 4.
15. 见: P. Bailey, "Cortex and Mind", in J. M. Scher, ed., *Theories of the Mind* (N. Y., 1962), 3—14; J. McFie, "Recent Advances in Phrenology", *Lancet*, 12 Aug. 1961, 360—363; and S. L. Chorover, "The Paci-

- fication of the Brain: from phrenology to psychosurgery”, in Thomas P. Morley, ed., *Current Controversies in Neurosurgery* (Phil. 1976), 730—767。
16. 见: H. Charlton Bastian, “Phrenology: old and new”, in his *The Brain as an Organ of the Mind* (1880), 511—547; James George Davey,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Brain”, *J. Psychol. Med.*, 2 (1876), 252—262; Bernard Hollander, *The Old and the Modern Phrenology: a lecture* (1889); idem,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Phrenology in the Light of Modern Science”, *Phren. Rec.*, I (1893), 5—16; idem, *The Revival of Phrenology* (1901); idem, *Scientific Phrenology* (1902); C. W. Saleeby, “The New Phrenology”, *The Academy and Literature*, 67 (1904), 510—511; S. Paget, “The Revival of Phrenology, 11” *Fortnightly Rev.*, 78 (1905), 1107—1115; M. Allen Starr, “The Old and the New Phrenology”, *Pop. Sci. Monthly*, 35 (1889), 730—748; J. Knott, “Franz Josef Gall and the ‘Science of Phrenology’ ”, *Westminister Rev.*, 166 (1906), 150—163; J. M. Robertson, “The Revival of Phrenology”, *Free Press*, 5 (1895), 352—372, 616—643, 6 (1896), 246—263。
17. Review of “Lettre de Charles Villers, etc. *i. e.* A letter from Charles Villers to George Cuvier,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France, on a new Theory of the Brain by Dr. Gall, in which that Viscus is considered as the immediate Organ of the Moral Faculties”, *Monthly Rev.*, 39 Appendix of Foreign Literature (1802), 487—490. On Yelloly (1774—1842), M. D. Edin. 1796, L. R. C. P. 1800, F. R. S. 1814, F. G. S. 1828, see *DNB*.
18. *Lit. J.*, 5 (1805), 1334.
19. *Recherches sur le système nerveux en général, et sur celui du cerveau en particulier; mémoire présenté à l’Institut de France, le 14 mars 1808; suivi d’observations sur le rapport qui en a été fait à cette compagnie par ses commissaires* (Paris, 1809; published concurrently in

- 307 Strasbourg). 法兰西学院关于《论文集》的报告是由法国著名科学家特农(J. R. Tenon)、安托万·波塔尔(Antoine Portal)、萨巴蒂耶(R. B. Sabatier)、菲利普·皮内尔(Philippe Pinel)和乔治·居维叶(George Cuvier)撰写的,发表于“Séance du lundi 25 avril 1808”, *Institut de France, Académie des Sciences: procès rebaux des séantes de l'académie...*, 1809年《爱丁堡内外科医学杂志》翻译发表了这份报告,见 *Edin. Med. & Surg. J.*, 5 (Jan. 1809), 33—66, 1809年《医学生理学杂志》重刊了这份报告,见 *Med. & Phys. J.*, (London), 21 (Feb. 1809), 149—161, 后来,这份杂志写道,最近几期杂志中对该理论敌视的观点“不是建立在……高尔的任何直接著述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他的学生和追随者的表述的基础上”。William Royston, “Sketch of the Progress of Medicine”, *Med. & Phys. J.*, 24 (1810), 3—4。
20. 对高尔学说的早期敌视态度,唯一表示不赞成的是《月刊杂志》、《伦敦医学和生理学杂志》以及《哲学杂志》。关于《哲学杂志》,参见第二章,尤其是注释 61;《月刊杂志》早在 1802 年 10 月就注意高尔学说了,1803 年发表了“高尔博士颅相学演讲的说明”(“Account of Dr. Gall’s Cranioscopic Lectures”, 14, 1803, 212—213), 此后发表了各种解释性说明(见: vol. 14 [1802], 379—381, vol. 18 [1805], 492—495, vol. 19 [1805], 12—15, 以及一张插页图, vol. 21 [1806], 197—203, 290—292);《医学和生理学杂志》1805 年发表了医学博士贾斯特斯·阿内曼(或 Arnemann)所写的“高尔博士新的大脑和精神官能学说的简要说明”(*Med. & Phys. J.* 14, Oct. 1805, 327—336), 他是这个杂志的编辑,曾在柏林听过高尔的讲课。然而,直到 19 世纪 20 年代中期,这个杂志仍以反对颅相学为主,例如 vol. 56 (1826), 367—369。
21.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John Bowring, ed. (1843), VII, pp. 433—434 (但边沁在 1821 年和 1827 年的其他作品中对高尔学说有比较奉承的评论,同上书 [N. Y., 1962], VIII, p. 537, VII, p. 433); 关于兰伯特的漫画(流行于 1826—1843 年),见: W. F. Bynum, “An Old Maid’s Skull Phrenologised”, *J. Hist. Med.*, 23 (1968), 386 and plate; Cocking’s cartoon prefaces *Three Familiar Lectures on Cranio-*

- logical Physiognomy* (1816)。
22. 前者最初发表于 *Whims and Oddities*, 2nd sec. (1827), 重刊于 *Comic Poems* (1886), 126—130; 后者发表于 *Poems by Two Brothers* (2nd ed., 1893), pp. 200—203。
23. In *Flim-Flams! or, the life and errors of my uncle, and the amours of my aunt! with illustrations and obscurities, by Messieurs Tag, Rag, and Bobtail* (1805), I, pp. 41—53.
24. *Encephalology; or a very brief sketch of Dr. Hirnschadel's ologies of the cranion and phren perfected by the rationals* (1824), reviewed in *Monthly Crit. Gaz.*, 1 (1824), 347—348.
25. John Morley, *The Life of Richard Cobden* (1881), I, p. 26。关于科布登后来对颅相学的支持, 见第四章注释 99。
26. *Edin. Lit. J.*, 4 (27 Feb. 1830), 128; see also the review of Wade's play in the *Times* q. in *Phren. J.*, 6 (1829/30), 353—354。颅相学既不能创造美好的诗也不能创造好的讽刺文学:《爱丁堡文学杂志》如此评说匿名的《爱丁堡的颅相学》(爱丁堡, 1830 年版[原文如此]), “我们曾认为颅相学本身是这个世界上最乏味的东西, 直到我们看到这首只卖六便士的诗, 才相信原来还有更乏味的东西——即这首不值钱的诗。”Vol. 2 (19 Dec. 1829), 411。
27. Vol. 76 (June 1806), 502。这几行诗出自拉罗什富科之手。
28. “Villers, sur une Nouvelle Theorie de Cerveau”, *Edin. Rev.* 2 (1803), 147—160(查尔斯·德维莱尔[Charle de Villers]是教育理论家, 他在 1802 年把高尔的思想传播到法国)。
29. Brown, *Observations on the Zoonomia of Erasmus Darwin M. D.* (Edin., 1798); 关于布朗的生平传记, 见 David Welsh,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Thomas Brown* (Edin., 1825)。
30. 高尔写道:“当我说到道德和知识官能产生作用取决于物质条件时, 我并不是在暗示我们的官能是有机体的一种产物; 这会把条件与有效的原因混淆起来。”引自 J. C. Marshall, “Freud's Psychology of Language”, in Richard Wollheim, ed., *Freud: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

says (Garden City, N. Y., 1974), 349—365 at p. 354.

31. 有时布朗被认为是共和党人, 一般而言, 人们认为他是充满活力的苏格兰学派的最后代表, 该学派在法国的影响下有所修正, 但并没有受到德国唯心论的感染; 见: *DNB* and Elie Halevy, *The Growth of Philosophical Radicalism*, trans. M. Morris (1972), p. 435。布朗对这些观点的依恋解释了为什么英国颅相学家最终有点自相矛盾地把他当作自己的哲学先驱, 见: Combe, *Elements of Phrenology* (9th ed., Edin., 1862), p. 7; *Diary of the Late John Epps, MD*, ed. Mrs. [Ellen] Epps [1870], p. 388; Daniel Noble, *The Brain and Its Physiology* (1846), pp. 68—70; [R. Chenevix], “Phrenology”, p. 15; and David Uwins, *A Treatise on Those Disorders of the Brain and Nervous System Which Are Usually Considered and Called Mental* (1833), P. 22n。但值得怀疑的是, 如果布朗的传记作者戴维·韦尔什不是爱丁堡颅相学学会成员的话, 爱丁堡的颅相学家是否会认为布朗是“一位假颅相学家”呢? (见 *Phren. J.*, 2 [1824/5], pp. 98—104, 308—321。)
32. 洛克在《人类理解论》(1690)第4卷第19章详细阐述了这样的观点: 充满激情的争论在阐述时必然是不太可信的。对此, 克尔凯廓尔强烈反对。也见: R. Knox, *Enthusiasm* (Oxford, 1950); and G. Rosen, “Enthusiasm”, *Bull. Hist. Med.*, 42 (1968), 393—421。
33. 见: H. D. Spoerl, “Faculties versus Traits: Gall’s solution”,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4 (1935/6), 216—231; and M. Bentley, “Psychological Antecedents”, pp. 102—115。
34. 见: G. N. Cantor, “The Edinburgh Phrenology Debate, 1803—1828”, *Ann. Sci.*, 32 (1975), 195—218 at p. 206。
35. [Gordon], “The Doctrines of Gall and Spurzheim”, *Edin. Rev.*, 25 (June 1815), 227—268。他在发表于该杂志前一期的《神经系统的功能》一文中早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Functions of the Nervous System”, *ibid.*, 24, Feb. 1815, 439—452), 在《人类解剖学体系》(*A System of Human Anatomy*, Edin., 1815, esp. pp. 79—174, 150)中, 他用纯粹的解剖学理由详细阐述了自己不赞成高尔和施普茨海姆思想

的原因。施普茨海姆对这些著作作了回应,见 Spurzheim, *Prospectus of the Anatomical Views of Drs. Gall and Spurzheim on the Brain and Nerves, Confronted with the Edinburgh Review* (No. 49, June 1815, Art. X) and *Dr. Gordon's Opinions in His System of Human Anatomy and Surgery, Vol. I, Edinburgh, 1815* (Edin., [1815]); and more extensively in idem, *Examination of the Objections Made in Britain against the Doctrines of Gall and Spurzheim* (Edin., 1817)。不同的杂志从不同的角度对这场争论进行了考察:“Retrospect”, *Lon. Med. Repository*, 8 (July 1817), 4—9 (倾向于偏袒戈登); “Drs. Gall & Spurzheim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Brain”, *Medico-Chirurgical Rev.*, 4 (July 1817), 53—63 and (Aug. 1827), 117—134 (偏袒施普茨海姆); “The Craniological Controversy”, *Blackwoods*, I (April 1817), 35—38 (对颅相学极端反感) and (July 1817), 365—367 (指出其褊狭)。施普茨海姆的《人相学体系》也被着重评论, *the Eclectic Rev.* [by David Uwins], n. s., 3 (April 1815), 321—335 and (May 1815), 459—469; *Quart. Rev.*, 13 (April 1815), 159—178; *Brit. Critic*, n. s., 3 (May 1815), 468—487; *Lon. Med. & Phys. J.*, 33 (June 1815), 485—505; *Lon. Med. Repository*, 4 (July 1815), 53—63 and (Sept. 1815), 208—229; *Monthly Rev.*, 77 (Oct. 1815), 147—165; and *Augustan Rev.*, I (1815), 281—285。关于戈登,见: Daniel Ellis, *Memoir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John Gordon, Late Lecturer on Anatomy and Physiology in Edinburgh* (Edin., 1823)。

36. 施普茨海姆在《人相学体系》中察觉到了这种变化,见该书第 120 页。也见: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1976), pp. 163—167; Maurice Mandelbaum, “Materialism” in his *History, Man, and Reason* (Baltimore and London, 1971), 20—28; and G. A. Foote, “Mechanism, Materialism, and Science in England, 1800—1850”, *Ann. Sci.*, 8 (1952), 152—161。
37. Gordon, “Doctrines of Gall and Spurzheim”, p. 239。
38. 同上,第 268 页。关于高尔和施普茨海姆有关解剖学的论述,见他们

的著作 *Anatomie et physiologie du système nerveux* (Paris, 1812), 这也是戈登在 1815 年评论的著作, 后来以施普茨海姆的著作形式出版了翻译稿, 见 Spurzheim, *The Anatomy of the Brain, with a General View of the Nervous System*, trans. R. Willis (1826)。

39. 这篇论文还包含了一份关于高尔和施普茨海姆的“头骨”的附录, 第 185—207 页, 摘自 *Dictionnaire des sciences médicales* (Paris, 1813) vol. 7, 260—266。
- 309 40. 《不列颠百科全书》第 4 版、第 5 版和第 6 版补遗(爱丁堡, 1824 年), 第 3 卷, 第 419—437 页。库姆在《颅相学杂志》1823—1824 年第一期发表了罗热博士的《头骨学》对此进行回应(“Cranioscopy, by Dr. Roget”, *Phren. J.*, I, 1823/4, 165—176)。也见: D. L. Emblem, “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and Phrenology”, in his *Peter Mark Roget: the word and the man* (1970), 132—152。罗热(1779—1869), 1798 年在爱丁堡获医学博士学位, 1815 年加入皇家学会, 1828 年加入地质学会, 参见 *DNB* 以及第二章内容。Kidd, *An Introductory Lecture to a Course in Comparative Anatomy, Illustrative of Paley's Natural Theology* (Oxford, 1824), pp. 58—72。基德(1775—1851), 1804 年医学博士毕业, 1818 年加入皇家内科医师学会, 1822 年加入皇家学会, 1828 年加入地质学会, 参见 *DNB*、*DSB* 和第二章注释 29。
41. *Ency. Brit.* (7th ed., Edin., 1842), vol. 17, 454—473; 这个条目的最后 6 页是编后记, 解释了观点没有改变的原因; 这篇文章后来单独出版, 即 Roget, *Treatise on Physiology and Phrenology from the Seventh Edition of 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2 vols. (Edin., 1838)。沃森对这篇文章作了回应, [Hewett Cottrell Watson], *Strictures on Anti-Phrenology, in Two Letters to Macvey Napier, Esq. and P. M. Roget, M. D.: Being an exposure of the article called “Phrenology”, recently published in 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for private distribution], Oct. 1838); and idem, “Phrenology and 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r the deliberate obstruction of Truth”, *Phren. J.*, 11 (1838), 278—282。

42. Sir George MacKenzie and Dugald Stewart,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ir G. S. MacKenzie and Dugald Stewart, 1821", *Phren. J.*, 7 (1831/1832), 303—309; Barclay, *An Inquiry into the Opinions, Ancient and Modern, concerning Life and Organization* (Edin, 1822), pp. 372—381; 库姆等人对此作了回应, George Combe and Dr. Barclay, "Correspondence betwixt Mr. George Combe and Dr. Barclay", *Phren. J.*, 1 (1823/1824), 46—55; Andrew Combe, "Observations on Dr. Barclay's Objections to Phrenology", *Trans. Phren. Soc.* (Edin., 1824), 393—429。巴克莱(1758—1826), 1798年在爱丁堡获医学博士学位, 1807年加入爱丁堡皇家学会, 见 *DNB*、*DSB* 和第二章注释 29。
43. Home, "The Croonian Lecture: microscopical observations on... the brain and nerves showing that the materials of which they are composed exist in the blood...", *Phil. Trans. Roy. Soc. Lon. for the Year 1821*, pp. 24—46。也见: Spurzheim, "Remarks on Dr. Baillie and Sir E. Home" (q. from the 2nd ed. of Spurzheim's *Physiognomical System*), *Lon. Med. & Phys. J.*, 34 (1815), 309—316。霍姆(1756—1832), 1787年加入皇家学会, 见 *DNB*、*DSB*; 马修·贝利(1761—1823), 1789年在牛津获医学博士学位, 1789年加入皇家内科医师学会, 1790年加入皇家学会, 见 *DNB*、*DSB*。

Bell, "[On Gall in] Second Part of the Paper on the Nerves of the Orbit, Charles Bell. Communicated by Sir Humphry Davy, Bart., President of the Royal Society. Read June 19, 1823", *Phil. Trans. Roy. Soc. Lon. for 1823*, pt. II, pp. 306—307。安德鲁·库姆、辛普森和施普茨海姆对此作了回应, 见 [Andrew Combe], "Mr. Charles Bell on the Functions of the Nerves", *Phren. J.*, 1 (1823—1824), 58—65; [James Simpson], "Additional Evidence of the Existence of a Sense of Equilibrium as a Primitive Mental Power, Derived from the Consistency Which Obtains between Its Supposed Functions and the Recent Physiological Discoveries of Mr. Charles Bell", *Phren. J.*, 4 (1826—1827), 266—284; 以及 Spurzheim, *Appendix to the Anatomy of the Brain*,

Containing a Paper Read before the Royal Society on the 14th of May, 1829, and Some Remarks on Mr. Charles Bell's Animadversions on Phrenology (1830)。贝尔(1774—1842),1799年加入皇家外科医师学会,1811年加入爱丁堡皇家学会,1826年加入皇家学会,见 *DNB*、*DSB*。

Kidd, *On the Adaptation of External Nature to the Physical Condition of Man, Principally with Reference to the Supply of His Wants, and the Exercise of Intellectual Faculties* (1833; 3rd ed., 1834), pp. 59—73; 约翰·埃利奥特森在《柳叶刀》杂志上撰文回击了基德的观点, *Lancet*, 22 Feb. 1834, p. 835。

44. Jeffrey, "Phrenology" (review of Combe's *System of Phrenology*), *Edin. Rev.*, 44 (1826), 253—318; idem, "Note to the Article on Phrenology", *Edin. Rev.*, 45 (1826), 248—253。对此进行的回应有: *Letter from George Combe to Francis Jeffrey, Esq. in Answer to His Criticism on Phrenology* [from *Phren. J.*, 4 (1826/1827), 1—82] (Edin., 1826; 2nd ed., 1826); 以及 Combe, "Second Letter to Francis Jeffrey...", *Phren. J.*, 4 (1826/1827), 242—251。也见: *Facts in Favour of Phrenology: two letters to a friend in Oxford in reply to the strictures of the Edinburgh Review* (Macclesfield, 1826)。杰弗里(1773—1850),他把大部分闲暇时间用来研究科学,他和布朗、贝尔一样也是爱丁堡物理学学会的会员,见 *DNB*。

- 310 45. 1825年12月19日和1826年2月6日汉密尔顿向爱丁堡皇家学会的论文《论高尔理论对于大脑功能的结论》("On the Practical Conclusions from Gall's Theory Regarding the Functions of the Brain")从未发表,他于1827年4月2日和1829年2月18日提交的论文也没有发表,但他的观点在后来发表的作品中都有体现:如为亚历山大·门罗的著作所作的序言 "Account of Experiments on the Weight and Relative Proportions of the Brain, Cerebellum, and Tuber Annulare, in Man and Animals, under Various Circumstances of Age, Sex, Country, etc." in Alexander Monro, *The Anatomy of the Brain* (Edin., 1831);

“Remarks on Dr. [Samuel] Morton's Tables on the Size of the Brain”, *Edin. New Phil. J.*, 48 (1850), 330—333; 以及“Researches on the Frontal Sinuses, with Observations on Their Bearing on the Dogmas of Phrenology”, *Med. Times*, 12 (1845), 159, 177, 371。这些论文的有些片段后来收录在: Hamilton, “Phrenology”, app. II of *Lectures on Metaphysics and Logic*, ed. Rev. H. L. Mansell and John Veitch (Edin., 1859), I, 404—444, 这本书第 424 页注释记载道, 汉密尔顿在 1829 年曾打算把他的论述汇集起来以《颅相学的幻想和人性的真实》(*The Fictions of Phrenology and the Facts of Nature*) 为题出版。

休伊特·C. 沃森站在颅相学方面对此进行了回应, Hewett C. Watson, review of “Sir William Hamilton's Prefix to Alexander Monro's *The Anatomy of the Brain* (1831)”, *Phren. J.*, 7 (1831/1832), 434—444; 也见: “Cruelty to Animals: Sir William Hamilton's experiments”, *ibid.*, 7 (1831/1832), 427—433。汉密尔顿的观点早前就已经在匿名出版的著作《汉密尔顿爵士和颅相学》(*Sir William Hamilton and Phrenology: an exposition of phrenology; shewing the complete inefficacy of the objections lately advanced in the Royal Society, and the real grounds on which the system ought to be assailed*, Edin., 1826) 中公布, 安德鲁·库姆在一封托利党倾向很明显的给《爱丁堡和利斯广告报》(*Edinburgh and Leith Advertiser*) 编辑的信中对此进行了讨论和驳斥, 见 *Phren. J.*, 4 (1826/1827), 100—103; 进一步的批驳见: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Phrenology between Sir William Hamilton, Bart., Dr. Spurzheim, and Mr. George Combe, in January, February, and March, 1828* (Edin., 1838), 该文的部分内容曾发表在 *Caledonian Mercury*, 最初发表在 *Phren. J.*, 4. (1826/1827), 377—407, 以及 “Renewed Correspondence”, *ibid.*, 5 (1828/1829), 1—69, 153—158。

46. Stone [(? 1793—1854), 1813 年在爱丁堡获医学博士学位, 爱丁堡皇家医学学会主席的学生], *Evidences against the System of Phrenology, Being the Substance of a Paper Read at an Extraordinary Meeting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 (Edin., 1828); idem, *Observations on the Phre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Burke, Hare, and Other Atrocious Murderers . . . : presenting an extensive series of facts subversive of phrenology, read before the Royal Medical Society of Edinburgh* (Edin., 1829); 后一篇文章是受到乔治·库姆的文章(“Phrenological Observations on the Cerebral Development of William Burk [sic] executed for Murder at Edinburgh . . . and on the Development of William Hare, His Accomplice, Read to the Phrenological Society, 5th February, 1829”, *Phren. J.*, 5, 1828/1829, 549—572)的激发而写的,随后乔治·库姆对他的文章进行了回应,见:G. Combe, “Evidences against Phrenology, by Thomas Stone”, *Phren. J.*, 5 (1828/1829), 264—273; idem, “Answer to ‘Observations . . . by Thomas Stone’”, *Phren. J.*, 6 (1829/1830), 1—14(同年也出版了小册子)。斯通随后又撰文回应,见 Stone, *A Rejoinder to the Answer of George Combe, Esq. to ‘Observations . . . Murderers’* (Edin., 1829)。也见:[James Kennedy], “Remarks on the ‘Evidence against the System of Phrenology. By Thomas Stone’”, *Lon. Med. & Surg. J.*, 1 (1828), 153—165, 249—265, 349—362, 435—450, and 2 (1829), 46—59, 130—146, 507—530(对斯通进行了严厉抨击);以及 William Rathbone Greg, *Observations on a Late Pamphlet by Mr. Stone* (Edin., 1829)。

47. 在马让迪(Francois Magendie [1783—1855])的著作 *An Elementary Compendium of Physiology; . . .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with copious notes and illustrations by E. Milligan* (Edin., 1823)中,米利根对头骨学进行了说明。米利根说道:“大体上,事实似乎对颅相学家不利:[高尔的]学说面世已经近30年了,但在这段时期里……没有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出面为它辩护”(见该书第437—439页)。对米利根观点的回应,见:“Dr. Milligan vs. Phrenology”, *Phren. J.*, 1 (1823/1824), 490—492;以及 John Elliotson, “The Arguments of Dr. Magendie and Dr. Bostock against Phrenology, Read to the London Phrenological Society, 3 Dec. 1827”, *Phren. J.*, 5 (1828/1829), 92—102;也见:Milli-

gan, "Theory of the Frontal Sinuses", *Trans. Prov. Med. & Surg. Ass.*, I (1833), 59—67; Neville Wood, "Some Remarks on a Review of a Paper on Phrenology, by Dr. Milligan", *Analyst*, 2 (1835), 314—317; 以及《地方医学和外科协会会报》(*Trans. prov. Med. & Surg. Ass.*)对爱德华·巴洛的颅相学论文的评论(参见下面的注释 68)和米利根的反颅相学回应,还有《柳叶刀》杂志的文章 "Provincial Medical Association", *Lancet*, 6 July 1833, pp. 461—464。米利根(1784—1833),据推测曾在爱尔兰接受教育,1823年在爱丁堡担任生理学和治疗学讲师。

Flourens [1794—1867], *Examen de la phrénologie* (Paris, 1842; Eng. trans. Charles de Lucene Meigs, Phil., 1846)。弗卢朗是居维叶的得意门生,大概是 19 世纪上半叶最成功的生理学家。虽然他称赞高尔把大脑当作思维器官比以往任何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都要好得多,但他仍反对颅相学,认为它是宿命论、唯物主义、反基督教、反社会的,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科学。他致力于恢复身心二元论,因此他把自己的著作题献给笛卡尔。

Rudolphi [1771—1832], *Grundriss der Physiologie* (Berlin, 1821—1828)。安德鲁·库姆对鲁道菲的观点作了回应:[Andrew Combe], "Professor Rudolphi and Phrenology", *Phren. J.*, I (1823/1824), 592—599。也见:"Cranioscopie" in *Encyclopädisches Wörterbuch der medicinischen Wissenschaften* (Berlin, 1832), 590—611, 这篇文章吸收了布施(Busch)、格雷费(Gräfe)、胡费兰(Hufeland)、林克(Link)以及鲁道菲著作中的观点,还附录了 3 页法国和英国有关这方面的早期著作的参考文献。

Sewall [1787—1845], *An Examination of Phrenology; in two lectures, delivered to the students of the Columbian College, District of Columbia, February 1837* (Washington, D. C., 1837; London, 1838; rev. 2nd ed., Boston, 1839)。查尔斯·考德威尔(Charles Caldwell)对休厄尔的观点进行了回应,见:Charles Caldwell, *Phrenology Vindicated, and Antiphrenology Unmasked* (N. Y., 1838), 1838 年的《颅相学

杂志》对考德威尔的著作进行了评论,见 *Phren. J.*, 11 (1838), 427—429。也见评论文章:“Sewall’s Examination” in *Medico-Chirurgical Rev.*, 27 (1837), 159—160。

Bostock, “Of Craniology and Physiognomy”, in his *An Elementary System of Physiology* (1827), III, 264—290。这是一篇不带偏见的文章,似乎公正地阐释了颅相学的缺点,对于唯物主义的论述特别精彩(参见前面的埃利奥特森的批判);博斯托克早在 20 年前评论克雷布·鲁宾逊论文《关于高尔人相学新理论的一些说明》(“Some Account of Dr. Gall’s New Theory of Physiognomy”)时就表示了对颅相学的敌视,见: *Monthly Rev.*, 55 (1808), 36—39。关于博斯托克,见第二章注释 27。

Copland, “The Doctrines of Gall” in appendix to A. Richerand, *Elements of Physiology*, trans. G. J. M. De Lys (2nd ed., 1829), pp. 686—689。也见:“Of Phrenology” in his *Dictionary of Practical Medicine* (1858), vol. 2, 501—505。关于科普兰,见第二章注释 27。

Prichard, *Diseases of the Nervous System* (1822), chap. 1; idem, “Temperament” in John Forbes, Alexander Tweedie, and John Conolly, eds., *Cyclopedia of Practical Medicine* (1833—1835), vol. 4, pp. 165—174; and idem, “Supplementary Note on Peculiar Configurations of the Skull Connected with Mental Derangement, with Observations on the Evidence of Phrenology, and on Opinions Respecting the Functions of the Brain”, in his *A Treatise on Insanity* (1835), 461—483; 关于后者,《海内外医学评论》(*Br. & For. Med. Rev.*)的评论家写道,“我们承认普里查德博士的评价是公正的,但我们并不认为这些评价能颠覆颅相学学说”, 7 (1839), 46。也见:[Andrew Combe], “Dr. Prichard and Phrenology”, *Phren. J.*, 2 (1824/1825), 47—55; idem, “Cyclopedia of Practical Medicine: Dr. Prichard and phrenology”, *Phren. J.*, 8 (1832/1834), 649—57; idem, “Remarks on Dr. Prichard’s Third Attack on Phrenology, in his ‘Treatise on Insantiy’ ”, *Phren. J.*, 11 (1838), 345—358; 埃德蒙·谢泼德·赛姆斯(Edmond Sheppard

Symes)给伦敦颅相学学会的演说摘要中也对普里查德文章进行了谴责(曾发表于 *Prov. Med. & Surg. J.*, 1844年5月的《颅相学杂志》翻印了这篇文章), *Zoist*, 2 (1845), 448—449。关于普里查德和颅相学的争论,见: William F. Bynum, “Time’s Noblest Offspring: the problem of man in the British natural historical sciences, 1800—1863”, Ph. D. thesis, Cambridge, 1975, pp. 215—222。

Brande, “Phrenology”, in his *Dictionary of Science, Literature, and Art* (1842), 925—926。布兰德(1788—1866),见: *DNB*、*DSB* 以及 Morris Berman, *Social Change and Scientific Organization: the Royal Institution, 1799—1844* (Ithaca, N. Y., 1978)。

48. “The Champions of Phrenology”, *Atlas*, 19 July 1829, in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Hazlitt*, ed. P. P. Howe (1934), vol. 20, 254—255。

49. *Phren. J.*, 11 (1838), 263。也见: “Phrenology and the Medical Profession”, *ibid.*, 13 (1840), 128—142。1825年,伦敦颅相学学会计有72名会员,其中28名是物理学家和外科医生,3年以后134名会员中有50名是物理学家和外科医生;19世纪20年代的设菲尔德学会中有一半会员是医学界人士;1836年的都柏林学会据说几乎全部会员都是医学界人士;1826年的爱丁堡颅相学学会中有三分之一会员是医学界人士;1835年,刚刚组建的利明顿和沃里克颅相学学会,26名会员中有10人是医学界人士。 *Lancet*, 21 April 1827, p. 80; Hewett Cottrell Watson, *Statistics of Phrenology: being a sketch of the progress and present state of that science in the British Islands* (1836), pp. 124, 166—167; *Phren. J.*, 3 (1825/1826), pp. 259—261; I. Inkster, “A Phase in Middle Class Culture: phrenology in Sheffield, 1824—1850”, *Trans. Hunter Arch. Soc.*, 19 (1978), 273—279 at p. 276。

50. 阿伯内西不是颅相学家;实际上,他预言,如果颅相学变得广为人知,“只会产生恶劣影响”。然而他承认,他找不到合理的理由去反对高尔和施普茨海姆的生理学,这种态度使得这门学说获得了最大的推动力: *Reflections on Gall and Spurzheim’s System of Physiognomy and Phrenology, Addressed to the Court of Assistants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in London, in June 1821 (1821)。库珀出版的著作和自传表明他对于颅相学没有任何责任,但据《柳叶刀》杂志报道(*Lancet*, 13 Jan. 1827, p. 480),他曾宣称施普茨海姆关于颅相学的新著将使施普茨海姆“永垂不朽”。劳伦斯尽管从来没有专门就颅相学作过演讲,但他1819年所著《关于比较解剖学、生理学、动物学和人类自然史讲演录》(*Lectures on Comparative Anatomy, Physiology, Zoology, and Natural History of Man*),却糅合了高尔和施普茨海姆的观点,并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后者流行起来。劳伦斯发觉,高尔的理论充满了“耐心的询问、详细的观察和没有偏见的反思”,没有人能够拒绝这种理论,他称赞这种理论为人们开辟了令人惊奇的新领域(见该书第237—238页)。关于库珀、阿伯内西和劳伦斯在1816年对颅相学的相对支持,见: Spurzheim to Thomas Forster, 5 Nov. 1816 in Forster Papers: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MS Eng. Letters, c. 200, f. 181。

51. “Dr. Gall’s Lectures on the Physiology of the Brain”, *Weekly Medico-Chirurgical & Phil. Mag.*, 1, 2 (May/Apr. 1823), serially.
52. 《医学—外科评论》(*Medico-Chirurgical Rev.*)发表的重要的颅相学文章可见: 4 (1817), 53—63, 117—134; n. s. 3 (Mar./May 1823), serially and published separately as *Review of “Observations on Phrenology”* (1823); 4 (1824), 847—882; 5 (1826), 437—469 (the quotation is from p. 437); 11 (1829), 193—196; 14 (1831), 321—322; 15 (1831), 172—174; 22 (1835), 121—123; 26 (1837), 225—232; 28 (1838), 225—252; n. s. 4 (1846), 447—463。《医学—外科评论》是约翰逊在1816年创办的,1848年与《海内外医学评论》(*Br & For. Med. Rev.*)合并,据估计它在合并前的发行量有2500份。关于约翰逊对颅相学的公开支持,参看他为库姆所写的推荐信, *Testimonials on Behalf of George Combe as a Candidate for the Chair of Logic in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Edin., 1836), p. 67。关于《海内外医学评论》中发表的颅相学文章,见: 10 (1840), 474—485; 13 (1842), 527—528; 16 (1843), 81—110; 22 (1846), 230—231; 以及下文所引的安德鲁·库姆(1846)和D. 诺布尔(1842)所写的重要文章。关于《柳叶刀》杂志谈

- 论颅相学的例子,见:1 & 15 Feb. 1824, 162—165, 224—227; 14 Aug. 1824, 203—210; 4 Sept. 1824, 298—302; 13 & 20 May 1826, 200—211, 234—244; 4 & 11 July 1829, 435—438, 468—475; 19 Jan. 1832, 532—535; 27 Dec. 1834, 500—503; 以及下面的注释 56。据《伦敦杂志》估计,《柳叶刀》每周的发行量为 8500 册:1 (1845), p. 431。关于韦克利身为伦敦颅相学学会会员的证据,见: *Lancet*, 4 Sept. 1824, p. 298。《英国人名词典》有专门关于约翰逊(1777—1845)、福布斯(1787—1861)、韦克利(1795—1862)的条目,约翰逊 1821 年在圣安德鲁获医学博士学位,福布斯 1817 年在爱丁堡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53. Henry William Dewhurst, *A Letter to the Right Hon. Robert Peel ... on Some of the Impediments, Defects, and Abuses, Existing in the Present System of Medical Education: with suggestions for their removal and correction* (1828), pp. 21—22.
54. 见: Elliotson, “St. Thomas Hospital Lecture: a case of monomania and phrenology”, *Lancet*, 30 Apr. 1831, 135—144; 也见: “Account of the Schools of Medicine in London, Session 1833—1834”, *Lancet*, 28 Sept. 1833, p. 7, and “List of Lectures at the London Medical Schools, Session 1831—1832”, *Lancet*, 1 Oct. 1831, pp. 13—16; J. W. Crane, “State of Phrenology in Great Britain” [answers to questions of the French minister of commerce respecting the progress of phrenology in Britain with notes by the *Lancet*, reporter], *Lancet*, 22 June 1833, pp. 407—408; 以及 J. F. Clarke, *Autobiographical Recollections of the Medical Profession* (1874), pp. 125—126。埃利奥特森在他翻译布卢门巴赫的著作《生理学体制》(Blumenbach, *The Institutions of Physiology*, 3rd ed., 1820) 的第 32—34 页、他自己所著《医学的原理和实践》(*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 1839) 的第 606—643 页,以及他的著作《人类生理学》(*Human Physiology*, 5th ed., 1835) 第 2 卷第 1147—1162 页中都提到了颅相学。关于埃利奥特森,见第二章注释 34; 关于格兰杰,参看 *DNB*。
55. 斯莱(1797—1863), 1816 年加入皇家外科医师学会, 见第二章注释 43;

威尔逊(1809—1884),1831年加入皇家外科医师学会,见 *DNB*;索斯(1797—1882),1819年加入皇家外科医师学会,见 *DNB*。格林(1791—1863),他的侄女嫁给了索斯,而他本人在19世纪20年代是否是颅相学的支持者还不太清楚。他并没有参加过伦敦颅相学学会的会议;但他对高尔和施普茨海姆的大脑解剖方法的说明,有力地证实了1825年3月《地球》中提出的观点(引自 *Phren. J.*, 2 [1824/1825], p. 488):“无论人们对于颅相学的观点有什么不同,我们认为,高尔和施普茨海姆两位博士所使用的解剖方法,毫无疑问,比迄今为止解剖学学校中所使用的方法更好。”然而,正如《颅相学杂志》在重新发表这份声明时所指出的,通过公认的技术专家,颅相学获得了权威性,人们对高尔、施普茨海姆及其学说的总体认识得到了加强。

56. *Lancet*, 16 Apr.—24 Sept. 1825; 25 June—17 Sept. 1836; 经过颅相学家詹姆斯·德维尔*的商谈,施普茨海姆在皇冠和铁锚大厅(能容纳2500人)发表了演讲。布罗赛的演讲发表于巴黎大学。
57. 比林(1791—1881),1818年在三一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1819年加入皇家内科医师学会,1819年加入皇家学会;温斯洛(1810—1874),1835年加入皇家外科医师学会,参看 *DNB*。赖特(1791—1859),1813年在爱丁堡获医学博士学位,1826年4月加入伦敦颅相学学会,一段时间曾任该学会主席,1819年被贝瑟伦精神病院任命为住院药剂师,但1830年因酗酒而被解雇。斯特里特(1802—1873),1823年领有药剂师协会的开业证书,1824年加入皇家外科医师学会,1852年加入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学会,是医生之子,也是拉塞尔协会会员,撰写过医学著作,1825年听了施普茨海姆的系列讲座之后,成为一名虔诚的颅相学家(J. F. Clarke, *Med. Times & Gaz.*, 2 [1873], 51—52);在为撒缪尔·索利的《人类大脑》(*Human Brain*, 1847)第2版所写的前言中,斯特里特对英国接受高尔和施普茨海姆思想的早期情况进行了描述。约瑟夫·穆尔(卒于1855年),1814年在格拉斯哥获医学博士学位,1815年在爱丁堡获医学博士学位,1818年在巴黎获医学博士学位,是共济会的皇家女性精神病院的医生,也是夏洛特王后产科医院的咨询医生,1824年加入伦敦颅相学学会并担任其秘书(后来任主席);他也是

颅相学学会会员。爱德华·穆尔(1794—1858),1827年在爱丁堡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815年加入皇家外科医师学会,是普利茅斯眼科医院的高级外科医生,撰写过医学著作,也是博物学家和地质学家,1824年5月加入伦敦颅相学学会。海斯(1769—1830),早在1822年之前就加入了皇家外科医师学会,1825年加入伦敦颅相学学会,从医学转到商业,见:obituary, *Phren. J.*, 6 (1829/1830), 500—503。

58. 格林诺(1791—1881),1814年加入皇家外科医师学会,1842年加入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学会,纽卡斯尔医院高级外科医生,1836年担任纽卡斯尔颅相学学会主席;汤普森(1793—1876),1820年在爱丁堡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831—1866年为设菲尔德总医院荣誉医生,是设菲尔德颅相学学会的重要人物;麦金托什(卒于1837年),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医学作家,是爱丁堡颅相学应用伦理学会的主席之一;麦克唐纳(1804—1874),1832年在爱丁堡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841年在格拉斯哥波特兰街医学学校作了10次颅相学演讲。
59. 帕特(1791—1877),1811年加入皇家外科医师学会,1822年在爱丁堡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820年加入皇家学会,1823年2月加入爱丁堡颅相学学会,1825年3月加入伦敦颅相学学会,见 *DNB*;关于琼斯和亨利,缺乏资料;巴洛(1779—1844),1803年在爱丁堡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是巴斯文学和哲学协会的创建者之一,1814年施普茨海姆在巴斯作了演讲之后,他信奉颅相学;1826年11月,加入伦敦颅相学学会,同时也是颅相学学会会员;他的《关于颅相学研究的辩解》(*An Apology for the Study of Phrenology*, Bath, 1825)是题献给乔治·库姆的。
60. 康诺利(1794—1866),1821年在爱丁堡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844年加入皇家外科医师学会,1839—1844年任汉韦尔的医学主管,见 *DNB*;埃利斯(1790—1839),1800年加入皇家外科医师学会,1818年获圣安德鲁斯医学博士学位,1818—1820年在韦克菲尔德精神病院、1831—1838年在汉韦尔任医学主管,在韦克菲尔德时创立了颅相学学会,用颅相学来描绘他的病人。约翰·罗伯逊·西鲍德(1799—1868),1818年加入爱丁堡红十字会,1829年加入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师学会,1821年4月加入爱丁堡颅相学学会,1827年1月当选为伦敦颅相学学会通

信会员,是皇家马格达莱恩精神病院的外科医生。关于其他颅相学精神病医生,见本人论文《颅相学与英国的精神病医生》(“Phrenology and British Alienists”),尤其是第4—7页。

61. 克拉克(1788—1870),1809年加入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师学会,1817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832年加入皇家学会;克拉克最亲密的朋友安德鲁·库姆(1797—1847),1825年在爱丁堡获医学博士学位,1833年加入爱丁堡皇家内科医师学会,是乔治·库姆的哥哥,见 *DNB*。奈顿(1776—1836),在阿伯丁获医学博士学位,1810年前后加入皇家外科医师学会,是颅相学的早期追随者,曾在1814年把拜伦爵士介绍给施普茨海姆,让施普茨海姆为其描绘颅相。斯图尔特是皇家海军的外科医生,1836年当他为乔治·麦肯齐爵士提供颅相学价值证明书时,他正担任萨塞克斯公爵的特派医生: *Documents Laid Before the Rt. Hon. Lord Glenelg ... Relative to the Convicts Sent to New South Wales* [46 testimonials] (Edin., 1836)。
62. Winslow, *The Principles of Phrenology as Applied to the Elucidation and Cure of Insanity: an essay read at the Westminster Medical Society, January 4th 1832* (1832), p. 11. 见: Spurzheim, *Observations on the Deranged Manifestations of the Mind or Insanity* (1817), and A. Combe, *Observations on Mental Derangement* (Edin., 1831)。
63. James G. Davey, *On the Nature, and Proximate Cause of Insanity* (1853), p. 26n. 戴维(1813—1895),1833年领有药剂师协会的开业证书,1836年加入皇家外科医师学会,是康诺利主管的汉韦尔的住院医生,后来担任位于米德尔埃塞克斯科尔尼·哈奇的欧洲最大精神病院女性部的医学主管。
64. *Brain and Its Physiology*, pp. 123—124(这是一份关于科学、医学就颅相学展开争论的最有用的文献)。
65. “Phrenology”, *Lancet*, 19 Mar. 1825, p. 348.
66. Review of “Spurzheim on Education”, *New Edin. Rev.*, 1 (1821), 311—334 at p. 327. 该杂志的编辑是理查德·普尔(1783—1871),1805年在圣安德鲁斯获医学博士学位,1839年接替 W. A. F. 布朗在

蒙特罗斯精神病院的职位,是爱丁堡颅相学学会会员,《颅相学杂志》最初四位编辑之一,也是 *Ency. Edinensis* (Edin., 1816—1827)“颅相学”条目的作者。

67. Disney Alexander, *A Lecture on Phrenology, as Illustrative of the Moral and Intellectual Capacities of Man* (1826), p. 2.
68. Uwins, *Treatise on Disorders of the Brain*, pp. 95—96. idem, “Phrenology”, pt. 33, vol. 17, *London Ency.* (1829), 259—274; idem, “Phrenology”, *New Monthly Mag.*, 34 (1832), 445—455 (当时《伦敦百科全书》的编辑是爱德华·布尔沃-利顿以及伦敦颅相学学会会员撒缪尔·卡特·豪尔)。尤温斯(1780—1837), 1803年在爱丁堡获医学博士学位,在伦敦许多诊疗所做过医生,1828年受雇于佩卡姆精神病院,见 *DNB* 和 J. F. Clarke, *Recollections*, p. 234。关于巴洛坦承自己信仰颅相学,见: Barlow, “An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First Anniversary Meeting of the Provincial Medical and Surgical Association, July 19th, 1833”, *Trans. Prov. Med & Surg. Ass.*, 2 (1834), 1—31 at pp. 27—28.
69. *Homoeopathy and Allopathy or Large, Small, and Atomic Doses?* [1836], p. 4n.
70. Michael Ryan, “Physiology, Phrenology, Materialism, Immaterialism of the Mind, By the Editor”, *Lon. Med. & Surg. J.*, 3 (1829), 44—51 at p. 49。也见: “Dr. Michael Ryan versus Phrenology” [in his *Manual of Medical Jurisprudence* (1831), pp. 6—18], *Phren. J.*, 7 (1831/1832), 366—368; and *Lancet*, 25 Oct. 1831。瑞安(1800—1841), 见 *DNB*。约翰·基德公开认为,而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则私下认为,颅相学有着有害的、危险的倾向: Kidd, *Course in Comparative Anatomy*, p. 72; Stewart, in the letter from Spurzheim to Forster cited above (见注释 50)。
71. 关于帕拉塞尔苏斯,参见: ref. in W. F. Bynum, “Health, Disease, and Medical Care”, in Rousseau and Porter, *Ferment of Knowledge*, 211—253 at p. 253; 关于马尔库塞,参见: Herbert Marcuse, “Industrialization and Capitalism in the Work of Max Weber” in his *Negations*

(Boston, 1968), 201—226; 以及多尔金等人编辑的《象征性人类学》(J. L. Dolgin, et al., eds., *Symbolic Anthropology*, N. Y., 1977, p. 364)中重新发表马尔库塞该文时的介绍性评论。关于詹姆斯·弗雷泽爵士与此类似的观点, 参见: Mary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1978), p. 24。也见: Hans Vaihinger, *The Philosophy of "As If"*, trans. C. K. Ogden (1968), pp. 84, 108; Lucien Goldmann, *The Hidden God*, trans. P. Thody (1964), p. 48; 以及 Nigel Harris, *Beliefs in Society: the problem of ideology* (Harmondsworth, 1968), p. 15。

第二章 大脑的社会意义

1. *Philosophisch-medizin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Natur und Kunst im Kranken und gesunden Zustande des Menschen* (Vienna, 1791)。和弗洛伊德一样, 高尔希望结束哲学家专横的归纳: J. C. Marshall, "Freud's Psychology of Language", p. 354。
2. 参见: "Some Particulars Respecting Gall", *Zoist*, 2 (1845), 455—465; J. Fossati, "Discourse Pronounced over the Tomb of Dr. Gall, 27 Aug. 1828", *Phren. J.*, 5 (1828/1829), 580—584; *Times* (London), 27 Aug. 1828, p. 2; *Lon. Med. Gaz.*, 2 (1828), 477—478; R. M. Young's entry on "Gall", in *DSB*; and Marquis F. de Moscati, "On the Character and Phrenological Organization of Dr Gall", *Lancet*, 22 June 1833, 399—403。
3. 这是 W. C. 恩格尔杜和约翰·埃利奥特森编辑的颅相学杂志《活力论者》(1843—1856)的卷首题词。
4. Anon., *Sir William Hamilton and Phrenology* (Edin., 1826), p. 11; and *Zoist*, 1 (1843), 22。
5. Erna Lesky, "Organology of Franz Joseph Gall" in her *The Vienna Medical School* pp. 4—8; and J. Y. Hall, "Gall's Phrenology: a roman-

- tic psychology”, *Stud. Romanticism*, 16 (1977), 305—317 at p. 306。关于浪漫主义哲学体系比较有价值的介绍,参见:H. W. Piper, *The Active Universe* (1962)。
6. Erna Lesky, “Gall and Herder”, *Clio Medica*, 2 (1967), 85—96; G. Morin, “Gall et Goethe”, *Paris médical, partie paramédicale*, 72 (1929), 425—432; and George Henry Lewes, *The Life and Works of Goethe* (1855), II, p. 325.
7. 关于弗拉克斯曼和颅相学,参见:Henry Crabb Robinson, *Diary, Reminiscences, and Correspondence*, ed. Thomas Sadler (1869), II, p. 310;关于斯威登伯格和颅相学,参见:Peter J. Lineham, “The English Swedenborgians, 1770—1840: a study in 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religious sectarianism”, Ph. D. thesis, Sussex, 1978, pp. 445—447;关于柯勒律治,参见:Trevor Levere, “Coleridge and the Human Sciences: anthropology, phrenology, and mesmerism”, in M. Hanen et al., eds., *Science, Pseudoscience and Society* (Waterloo, Ont. 1980), 171—192。柯勒律治的指定遗嘱执行人是 J. H. 格林(见第一章注释 55),他是德国理想主义学者,也是颅相学家的朋友。查尔斯·奥古斯塔斯·塔尔克(1786—1849),是弗拉克斯曼、柯勒律治和威廉·布莱克的朋友,他是伦敦最主要的斯威登伯格信徒,在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常担任伦敦颅相学学会主席职位。他也是 1820—1826 年萨德伯里的议员,1841 年普尔的议员;1836—1847 年担任米德尔埃塞克斯的地方官员;1839—1847 年任汉韦尔精神病院管理委员会主席。从伦敦斯威登伯格协会的一份手稿中,可以看出他的颅相学观点(a ms in the Swedenborg Society of London [A/83], “Aphorisms on the Laws of Creation as Displayed in the Correspondences that Subsist between Mind and Matter”, c. 1843)。斯威登伯格派颅相学家另外还有 J. P. 格里夫斯(第八章)、J. I. 霍金斯* 和 D. G. 戈伊德。*
8. 关于颅相学的支持者,他们的传记资料大多数取自他们的出版物,尤其是《颅相学杂志》、《为库姆提供颅相学价值证明书》的人名清单以及提供给麦肯齐爵士的证明颅相学价值的 46 份证明书,这些证明书收录在

Sir G. S. Mackenzie, *Documents Laid before Lord Glenelg* (1836)。另外的信息主要来自：*Lancet*；*Br. Med. J.*；*London and Provincial Medical Directory* (from 1845)；*Index-Catalogue of the Library of the Surgeon-General's Office, United States Army* (from 1880)；*List of Graduates in Medicine in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from 1705 to 1866* (Edin., 1867)；*A List of the Members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in London* (from 1805)；*A List of Persons Who Have Obtained Certificates of Their Fitness and Qualification to Practice as Apothecaries from August 1, 1815 to July 31, 1840* (1840)；Frederic Boase, *Modern English Biography*；Richard Hunter and I. MacAlpine, *Three Hundred Years of Psychiatry* (1963)；and J. F. Clarke, *Autobiographical Recollections* (1874)。英克斯特的《设菲尔德的颅相学》(I. Inkster, "Phrenology in Sheffield")以及沙平的《颅相学知识》(S. Shapin, "Phrenological Knowledge")对于设菲尔德和爱丁堡的颅相学而言具有无比宝贵的价值。比较特殊的是颅相学反对者,他们的传记信息(除了引自 *DNB* 和 *DSB* 中的条目以外),取自于：*The Record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4th ed., 1940)；*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Memoirs of the Wernerian Natural History Society* (1808—1838)；*Lives of the Fellows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London, 1826—1925* ed. G. H. Brown (1955)；Plarr's *Lives of the Fellows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of England* (1930)；W. Innes Addison, *The Matriculation Albums of 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 1728—1858* (Glasgow, 1913)；George Burchnell and T. U. Sadleir, *Alumni Dubliniensis* (Dublin, 1935)；J. A. Venn, *Alumni Cantabrigienses*, pt. II, 1752—1900 (Cambridge, 1952)；Joseph Foster, *Alumni Oxonienses, 1715—1886* (1888)；Jack Morrell and Arnold Thackray, *Gentlemen of Science: early years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Oxford, 1981)。关于各颅相学学会的成员,参见：“List of Members of the Phrenological Society”, *Phren. J.*, 3 (1826), 476—481；“Names of Members and Visitors, In-

- specting the Casts etc. Belonging to the Phrenological Society, 1822—1846” (MS, Gen. 608; Edin. Univ. Lib.); “London Phrenological Society”, *Panoramic Miscellany*, [I] (31 Jan. —30 June 1826); 关于伦敦颅相学学会, 参见: *Lancet* (1824—1837) and *Phren. J.*, 5 (1828/1829), 70—82; *Fourth Annual Report of the Sheffield Phrenological Society* (Sheffield, 1846), p. 12; 关于颅相学联合会成员的资料, 参见第三章注释 85。
9. William Weir, letter to editor, *Phren. J.*, 11 (1837), 90。关于达尔文支持者以及柏林的生物简化论支持者的年龄, 分别参见: J. W. Burrow, *Evolution and Society* (Cambridge, 1966), p. 42 (伯罗发觉, 如果考虑到查尔斯·莱尔的年龄和他当时的地位, 那么查尔斯·莱尔对达尔文思想的支持很显然可以称之为“英勇无畏”); Everett Mendelsohn, “Revolution and Reduction: the sociology of method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concerns in nineteenth century biology”, in Y. Elkana, *Interac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pp. 407—427。
10. 参见: Christopher Hill,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Harmondsworth, 1975), p. 366 et passim; Timothy Lenoir, “Generational Factors in the Origin of *Romantische Naturphilosophie*”, *J. Hist. Biol.*, 11 (1978), 57—100。可参考 Herbert Moller, “Youth as a Force in the Modern World”, *Comp. Stud. Soc. & Hist.*, 10 (1968), 237—260 at p. 255 (莫勒发现, 1840 年英国每百人中就有 77 人的年龄介于 15 到 30 岁之间); Lewis S. Feuer, “The Generational Basis for Ideological Waves”, in his *Ideology and the Ideologists* (Oxford, 1975), 69—95。
11. Lenoir, “Generational Factors”, p. 59。
12. 根据特里·帕西南 (Terry Parssinen) 的观察, 1826 年爱丁堡颅相学学会的 110 名英国成员中, 29% 在《英国人名词典》或博厄斯的《现代英国传记》中有人名条目, 而在同时期的伦敦颅相学学会 (有会员 72 人) 中这个比例只有 26%: “Phrenology Movement”, *J. Soc. Hist.*, 7 (1974), 15n.。
13. 在所有颅相学家中, 只有下列人员是以在牛津或剑桥受过教育而出

名：阿瑟和沃尔特·特里维廉爵士，都是爱丁堡颅相学学会会员；罗伯特·埃弗雷斯特，1821年加入爱丁堡颅相学学会；理查德·惠特利（见下面的注释16）和查尔斯·塔尔克、约翰·哈利斯（1804—1848）。哈利斯于1830年在剑桥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当他还在三一学院求学时就已经是伦敦颅相学学会的通信会员。

317 14. 约翰·P. 波特（1771—1855）是另一位曾经是伦敦颅相学学会通信会员的皇家海军外科医生，他后来升任朴茨茅斯囚船的医学主管，是朴茨茅斯和波特西文学、哲学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15. Charles Gibbon, *The Lift of George Combe* (1878), I, p. 318; and A. C. Grant, "George Combe and the 1836 Election for the Edinburgh University Chair of Logic", *The Book of the Old Edinburgh Club*, 32 (1966), 174—184. 也见 *Testimonials to Combe and Testimonials in Support of Sir William Hamilton's Application for the Chair of Logic and Metaphysics* (Edin., 1836)。库姆给他哥哥安德鲁的信中写道，他竞争这个职位，“不是期望成功，而是期望能讨论颅相学”：9 April 1836, Combe Papers, NLS 7386 ff 531。

16. 怀特斯通（1802—1875），1825年加入伦敦颅相学学会，30年代在这个学会中非常活跃，参见 *DNB* 和 *DSB*。在英国所有活跃的颅相学家中，下列人必定在其他时期拥有学术地位：约翰·P. 尼科尔（1804—1859），格拉斯哥的天文学教授；戴维·韦尔什牧师（1793—1845），1831年为爱丁堡教会史教授，当时他虽然对颅相学仍有兴趣，但已经与爱丁堡颅相学学会决裂；詹姆斯·L. 德拉蒙德（1783—1863），贝尔法斯特皇家学院解剖学和植物学教授，贝尔法斯特自然史（和颅相学）学会主席；理查德·沃特利（1787—1863），1829—1831年为牛津政治经济学德拉蒙德教授，1831—1853年为都柏林大主教，在牛津时，沃特利让人为他制作了他的头颅模型，但直到1832年读了库姆的《人类体格》以后才热衷于颅相学（见吉本：《库姆的生平》，第1卷，第259—260页，以及第三章注释45）。

17. 撒缪尔·索利（1805—1871）是唯一身为伦敦皇家学会成员的医学讲师却在医学机构中倡导颅相学的人。他是一位商人之子，在圣托马斯

医院,他在本杰明·特拉弗斯的指导下学习医学,1853年成为那里的外科医生和讲师,1867年担任皇家医学和外科学会的主席。1823年他就被施普茨海姆在圣托马斯医院进行的一次大脑解剖实验所鼓舞,但并没有完全相信颅相学(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没有把他包括在我们的样例中),直到1836年(这年他成为皇家学会会员)以后的一段时间,他在亲眼目睹了头骨学演示之后,才完全相信颅相学。他加入了颅相学联合会,并于1843年成为其委员会成员;1844年2月16日,他在为皇家学会作关于大脑的演讲时,公开承认自己是颅相学家。参见他的 *The Human Brain* (2nd ed., 1847), pp. x—xiii。

身为伦敦或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员而支持颅相学的人还有:布赖恩·唐金(1786—1855),1838年加入皇家学会,工程师和发明家;威廉·埃尔福德·利奇(1790—1836),1817年加入皇家学会,不列颠博物馆自然史部门助理管理员,1837年曾把自己收藏的大量头盖骨捐赠给爱丁堡颅相学学会;查尔斯·塔尔克,1824年加入皇家学会;理查德·比米什,*皇家学会会员,土木工程师和讲师;帕特里克·尼尔,1814年加入爱丁堡皇家学会,爱丁堡的印刷工,1820年任沃纳学会秘书;约翰·香克·莫尔,1820年加入爱丁堡皇家学会,颅相学鼓吹者;罗伯特·汉密尔顿,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员,1821年加入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师学会;威廉·博纳,1823年加入爱丁堡皇家学会,银行家;海军上将托马斯·布朗,皇家学会会员和沃纳学会会员;丹尼尔·罗斯,皇家海军上将,1822年加入皇家学会,伦敦颅相学学会会员。

18. 例如,布朗在他的《精神病院的过去、现在和未来》(Browne, *What Asylums Were, Are, and Ought to Be*, Edin., 1837)中竭力避免提及颅相学,因为他遭到安德鲁·库姆的严厉批评;参见:G. Combe, *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Andrew Combe, M. D.* (Edin., 1850), pp. 280—281。关于劳伦斯,参见 Owsei Temkin, “Basic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Romantic Era”, in his *The Double Face of Janus and Other Essays* (Baltimore and London, 1977), 345—372 at p. 357;关于库珀,参见 B. B. Cooper, *The Life of Sir Astley Cooper* (1843), II, pp. 296—297。
19. 引自 G. N. Cantor, “Edinburgh Phrenology Debate”, p. 204。也见 B.

Spector, "Sir Charles Bell and the Bridgewater Treatises", *Bull. Hist. Med.*, 12 (1942), 314—322.

20. 关于劳伦斯与艾伯内西的争论, 参见: Temkin, "Basic Science", esp. at pp. 347—349, 357—359; "Abernethy, Lawrence, etc. on the Theories of Life", *Quart. Rev.*, 22 (1819), 1—34。颅相学家关于这场争论的看法, 参见: *Phren. J.*, 1 (1823/1824), pp. 120—146; 以及 Robert Macnish, *An Introduction to Phrenology* (2nd ed., 1837), p. 9。强烈反对唯物主义的托马斯·伦内尔牧师是剑桥的基督教拥护者, 他在《论怀疑主义》(*Remarks on Scepticism*, 2nd ed., 1819)中公然反对劳伦斯, 但托马斯·福斯特认为伦内尔在发现高尔学说是一种唯物主义哲学之前曾经是一个头盖骨学家: "Phrenology: the Wernerian Society of Edinburgh, and the Phrenological Societies of Edinburgh and London", *Lancet*, 13 Jan. 1827, 479—480 at p. 480。
21. 关于这个问题, 参见: Robert K. Webb, *Harriet Martineau, a Radical Victorian* (1960), p. 363; 关于个人和机构涉足 19 世纪初科学的情况, 参见: Cannon, *Science in Culture*, p. 229。
22. Anon., *Sir William Hamilton and Phrenology*, p. 29, 引自 Shapin, "Phrenological Knowledge" p. 239; 同一作者, "The Politics of Observation", in Wallis, *Margins of Science*, p. 170。关于 19 世纪初形而上学的衰落史, 参见: Hugh Miller, "The Idealistic School", in *Essays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Political and Social,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4th ed., Edin., 1870), 431—441, 也可参考第三章注释 18。
23. Karl Mannheim, "Conservative Thought", in *Essays on Sociology and Social Psychology*, ed. P. Kecskemeti (1953), 74—164 at p. 76。
24. Arnold Momigliano, *J. Roman Stud.*, 30 (1940), 77 cited in L. Pyenson, " 'Who the Guys Were' ", p. 155; cf. Shapin and Thackray, "Prosopography as a Research Tool".
25. Charles Rosenberg, "Sexuality, Class, and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Amer. Q.*, 25 (1973), 132。也见: 保罗·福尔曼在他经典的社会研究论文《魏玛文化、因果关系, 和量子理论》(Paul Forman,

- “Weimar Culture, Causality, and Quantum Theory, 1918—1927”, *Hist. Stud. Phys. Sci.*, 3, 1971, 1—115)的最后评论;以及 D. Layder, “Problems in Accounting for the Individual in Marxist-Rationalist Theoretical Discourse”, *Br. J. Sociol.*, 30 (1979), 149—163。关于社会和心理学的不可分割性,参见: J. F. C. Harrison, *The Second Coming: popular millenarianism, 1780—1850* (1979), p. 220。
26. 科普兰, 1815 年在爱丁堡获医学博士学位, 1833 年加入皇家学会, 1837 年加入皇家内科医师学会, 试图在伦敦获得医学职位, 但没有成功; 在非洲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回到伦敦, 受雇担任医学撰稿人, 最终在小迪恩街医学学校获得讲师职位, 后来又在米德尔塞克斯医院获得讲师职位, 参见 *DNB*。他对颅相学的敌视似乎主要是因为他接受了一次令他很不满意的颅相描述(参见他所著 *Dictionary of Practical Medicine* [1832], vol. 2, p. 503n); 在他担任《伦敦医学知识库》编辑期间(1822—1827), 颅相学遭到攻击。
27. 关于博斯托克, 参见 *DNB* 和 *DSB*; 关于罗热, 参见 *Emblem, Roget*。
28. 关于汉密尔顿(他曾谴责托马斯·布朗是一个共和党人, 借鉴了孔狄亚克和德特蕾西的思想), 参见 *DNB* 和 *DSB*; 关于杰弗里, 参见 *DNB*。埃利奥特森和康诺利都是实用知识传播学会委员会委员; 克拉克、比林和康诺利是伦敦大学评议会成员。值得注意的是, 颅相学家和反颅相学家之间私下里往往有着朋友关系: 因此施普茨海姆在 1816 年是查尔斯·贝尔的座上客, 乔治·库姆在 1826 年曾与杜格尔德·斯图尔特一起进餐, 而杰弗里则在 1826 年把来访的奥杜邦介绍给颅相学家詹姆斯·辛普森。参见: Gordon Taylor and E. W. Walls, *Sir Charles Bell* (Edin., 1958), p. 69; and *Audubon and His Journals*, ed. M. R. Audubon (N. Y., 1960), I, pp. 161, 191。
29. 关于基德的社交圈子和知识分子圈子, 参见: Pietro Corsi, “Natural Theology,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ce, and the Question of Species in the Works of the Reverend Baden Powell”, D. Phil thesis, Oxford, 1980。把约翰·巴克利归入反颅相学家也带来更多的问题, 因为他的观点(尤其是 *Inquiry Concerning Life and Organization* 中的观点)比

- 319 较倾向于劳伦斯和颅相学唯物主义；实际上，根据福斯特的说法，巴克利在听了福斯特于 1816 年在爱丁堡所作的颅相学讲座后，为颅相学辩护：“Phrenology the Wernerian Society”，p. 479。
30. 除了英克斯特和沙平关于设菲尔德和爱丁堡的研究之外，还可参阅我的论文：“The Politics of Brain: phrenology in Birmingham”，*Bull. Soc. Social Hist. Med.*，no. 32 (1983)，34—36。
31. 分别参阅：Sir George Lefevre，“Drs Gall and Spurzheim: phrenology”，in his *The Life of a Travelling Physician* (1843)，I, p. 150（利菲弗把施普茨海姆与高尔对比后认为，施普茨海姆“慷慨而仁慈”，而高尔“几乎在所有事情上，甚至包括他自己的理论体系，背叛了怀疑论……我在和几位法国教授谈论这个问题时，发现他们一致同意这种观点”。“S[purzheim] croit au moins a tout ce qu’ il dit, comme un bon enfant. Gall n’ y croit pas un mot.” Such was the opinion in Paris.）；Spurzheim to William Rathbone, 12 June 1831 (Bodleian Lib., MS Autog. f. 181—182)，以及施普茨海姆在 1815 年 2 月 2 日至 1817 年 2 月 13 日写给福斯特的几封信(Forster papers, Bodleian Lib., MS Eng. lett c. 200 f. 173—189)；John Elliotson, *Human Physiology* (5th ed., 1835)，pp. 1159—1160n.；idem, “Announcement of the Death of Dr Spurzheim, to London Phrenological Society”，*Lancet*, 29 Dec. 1832, pp. 427—432；“Death of Spurzheim”，*Phren. J.*，8 (1832/1834)，126—143；Marquis F. de Moscati, “Biographical Paper on the Character and Phrenological Organization of Dr Spurzheim, to the London Phrenological Society”，*Lancet*, 12 Jan. 1833, pp. 493—498；G. Combe, *Life of Andrew Combe*, pp. 203—204；Spurzheim, *Education: Its elementary principles founded on the nature of man* (Manch., n. d.)，p. 52；Robert Owen, *A Dialogue on Three Parts* (Manch., 1838)，p. 11。唯一一部施普茨海姆传是由颅相学家安德鲁·卡迈克尔撰写的一本薄薄的册子，Andrew Carmichael, *A Memoir of the Life and Philosophy of Spurzheim* (Dublin, 1833)。美国关于施普茨海姆的资料，参见 A. A. 沃尔什为《科学家传记词典》所写的条目，沃尔什的博士

- 论文“Johann Christoph Spurzheim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Scientific Phrenology in Boston, 1832—1842”, Ph. D. thesis, New Hampshire, 1974; Walsh, “The American Tour of Dr Spurzheim”, *J. Hist. Med & Allied Sci.*, 27 (1972), 187—205; 以及 Walsh, “Phrenology and the Boston Medical Community in the 1830s”, *Bull. Hist. Med.*, 50 (1976), 261—273。
32. *Notebooks*, 3, p. 4355, and *Table Talk*, 2 (July 1830), q. in Levere, “Coleridge and the Human Sciences”, pp. 182—185。柯勒律治被高尔和施普茨海姆的学说所吸引是因为他厌恶感觉论者的心理学, 对人、精神和自然的统一有着柏拉图式的反笛卡尔主义者的兴趣, 拒绝经验主义哲学。到 1833 年, 他对这种学说的敌视证明, 随着颅相学在大众面前仅仅以唯物主义心理学简化论的形式出现, 该学说和理论的这些特征是如何被删减的。
33. 在《大脑解剖学》的前言中, 施普茨海姆对他疏远高尔作了最明确不过的说明; 但也可参见: Spurzheim, *Physiognomical System*, p. vii; his notes to *Phrenology Article of the Foreign Quarterly Review* by Richard Chenevix (1830), pp. 11, 62; and de Moscati, “Spurzheim”。
34. 最近从心理学视角对埃利奥特森所做的最出色的研究当属米勒, 参见: J. Miller, “A Gower Street Scandal”, *J. Roy. Coll. Phys.*, 17 (1983), 181—191。米勒的文章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我曾经依靠的材料: *DNB*; *Reece's Monthly Gaz. Health*, 14 (Dec. 1829), 753—754; *Court Mag.*, 6 (April 1835), 175; *Lancet*, 8 June 1833, 341—344; *J. Mental Health*, 14 (1868), 428—430; G. Rosen, “John Elliotson, Physician and Hypnotist”, *Bull. Hist. Med.*, 4 (1936), 500—503; Harley Williams, “John Elliotson”, in *Doctors Differ* (1946); and Fred Kaplan, Introduction to *John Elliotson on Mesmerism* (N. Y., 1982)。我感谢欧文·劳登 (Irving Loudon) 提醒我注意埃利奥特森的重要性。关于埃利奥特森对施普茨海姆的态度, 参见 *Human Physiology*, pp. 1159—1160n。埃利奥特森第一次在伦敦遇见高尔是 1824 年在詹姆斯·德维尔的颅相学商店, 后来在阿斯特利·库珀爵士的陪同下, 在

圣托马斯医院又与高尔会面；随后他于 1826 年和 1827 年在巴黎拜访了高尔(同上,第 1147 页)。

- 320 35. *A Treatise on Naval Discipline; with an explanation of the important advantages which naval and military discipline might derive from the science of phrenology. To which are added phrenological deduction from the cerebral development of J[oseph] H[ume], Esq.* (1825)。罗斯加入爱丁堡颅相学学会有可能是应乔治·麦肯齐爵士之邀,因为麦肯齐在 1821 年以丹麦语出版了由 C. W. 哈尼什以高地德语阐释颅相学的译本, [*Travels near Iceland the Bay of Baffin in Search of Discovering a Northwest Passage by Greenland in the Year 1818 by John Ross*]。这至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相互接触的机会。
36. 《英国人名词典》。我要感谢剑桥斯科特·波拉尔研究院的档案员克莱夫·A. 霍兰以及海军上将 M. J. 罗斯为我提供关于罗斯的信息。我也要感谢康斯坦丝·马丁给我提出了有益的建议。(伦敦颅相学学会的皇家海军上校丹尼尔·罗斯与约翰·罗斯无关。)
37. Susan Cannon, "The Cambridge Network", in *Science in Culture*; 她在第 44 页提到了罗斯。
38. 尽管罗斯对休谟的反感直接因为休谟反对在好望角建立天文台,但是,假如罗斯赞成休谟广受欢迎的政治学的话,他不太可能对休谟作出那样的评论。实际上,罗斯认为休谟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他更主要是为私人生活服务而非为公众生活服务的”。*Treatise on Naval Discipline*, pp. 35—39。关于颅相学家和监狱,参见第四章注释 68 和注释 70。
39. 同上,第 23 页。
40. 同上,第 33 页。罗斯指的是苏格兰教会福音派的一些重要人物,他们为了使自己的关于人性堕落和福音再生力量的反动观点得以合法化而利用颅相学,因而为颅相学所遭受的唯物主义和宿命论的指责而辩护。其中一些人后来卷入了 1843 年苏格兰教会的分裂事件,但截至那时他们已经与颅相学脱离关系,并公然抨击库姆的颅相学是法国异端分子的唯物主义的复活。参见第四章注释 89。

41. 参见: Sabine, *Remarks on the Account of the late Voyage* (1819); 以及 Ross, *Explanation of Capt. Sabine's Remarks* (1819)。
42. 罗斯后来的 22 个颅相学描绘图被剑桥的斯科特·波拉尔研究院收藏。
43. 因此,各种脾气暴躁、在生活中挣扎的人纷纷涉足颅相学,尤其是在 19 世纪 20 年代初。这些人在政治上完全不是自由主义者。例如,威廉·威尔科克·斯莱,就是一位非常自负、保守、邪恶的偏执狂,他是约翰·埃普斯 1821—1822 年在伦敦最先接触的颅相学家 (*Diary of Epps*, pp. 70, 109—111; 以及能揭示斯莱个性和政治观点的信件: *Letter to the Independent Governors of St George's Hospital* [1827]); 还有弗雷德里克·利奥博士,很显然是一位“自负而且自我中心的”老派的德裔福音主义者,参见: *The Letters of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ed. Thomas Pinney, vol. 4 (Cambridge, 1977), pp. 234—235。
44. 可参照下列人员对解读大脑的反应:福斯特(见下文)、R. 科布登(第四章注释 99)、H. 马蒂诺(第四章注释 57)、J. 科普兰(前面的注释 26)、S. 索利(前面的注释 17)和 R. 卡莱尔(第七章注释 22)。关于麦肯齐皈依颅相学,参见 *DNB*; Gibbon, *Life of Combe*, I, pp. 109 ff.; MacKenzie, *An Essay ... on taste*, pp. v, 2, 287—301。
45. 参见: MacKenzie, *Three Lectures ... for the use of Mechanics' Institutions* (Edin., 1839); idem, *General Observations on th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 for the use of mechanics' institutions* (Edin., 1836);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ir George S. MacKenzie and Duglad Stewart, 1821”, *Phren. J.*, 7 (1831/1832), 303—309。
46. “Essay Read by Sir Geo. S. MacKenzie, Bart., to the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 Jan. 1830”, *Phren. J.*, 6 (1829/1830), 332—343, 355—365 (这篇文章大概是在 1829 年 12 月 8 日和 1830 年 2 月 1 日之间提交的: Shapin, “Phrenological Knowledge”, p. 231 n.) 和 *Scotsman*, q. in *Phren. J.*, 6 (1829/1830), 363—364。皇家学会关于精英主义的颅相学言论,参见: G. Combe, “Letter on the Prejudices of the Great i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against Phrenology; addressed to the editor of

- 321 the *Edinburgh Weekly Journal*”, *Phren. J.*, 6 (1829/1830), 14—38; 10 (1837/1838), 623—629; and 11 (1838), 13—22.
47. Berman, *Royal Institution*, pp. 38, xxi.
48. 参见 *NDB* 条目;《科学家传记词典》对切尼维克斯的介绍很简短,而且不全面。通过他与约瑟夫·班克斯爵士以及查尔斯·布莱格登爵士的通信可以追溯他的早期经历,这些信件摘录于《班克斯通信集》(Warren R. Dawson, ed., *The Banks Letters*, 1958)。他的 28 篇论文收录在 *Roy. Soc. Cat. Sci. Papers* 中; *Wellesley Index to Victorian Periodicals* 列举了他发表于《爱丁堡评论》上的 6 篇文章和发表在《季度评论》上的两篇文章,这些文章题材广泛,从诗歌和海难到工业和烹调术都有涉及。
49. *Phren. J.*, 6 (1828/1829), 158—160; Chenevix, “Phrenology”, *Foreign Q. Rev.*, 在小册子版的第 15 页有施普茨海姆的评论(参见注释 51)。
50. 参见: M. C. Usselman, “The Wollaston/Chenevix Controversy over the Elemental Nature of Palladium: a curious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chemistry”, *Ann. Sci.*, 35 (1978), 551—579; Chenevix, “On Mesmerism Improperly Denominated Animal Magnetism”, *Lon. Med. & Phys. J.*, n. s. 6 (Mar.-Sept 1829) serially.
51. 戴维·尤温斯是承认切尼维克斯的文章导致他相信颅相学的人之一: [Uwins], “Phrenology”, *London Ency.* (1829), p. 272。施普茨海姆得到切尼维克斯的许可,把那篇文章印成一本小册子(*Phrenology Article of the Foreign Quarterly Review by Richard Chenevix [1830]*),并加上了 12 页他自己的评论;这本小册子随后于 1833 年在美国再版,1838 年被地质学家卡尔·伯恩哈特·科塔(1808—1879)翻译成德语。
52. *Phren. J.*, 6 (1829/1830), 604; *Zoist*, 1 (1843), 58—64, 88—89.
53. 参见: Erwin Ackerknecht, “German Jews, English Dissenters, French Protestants: nineteenth-century pioneers of modern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Charles Rosenberg, ed., *Healing and History* (N. Y. and London, 1979), 86—96。关于切尼维克斯对德国人的憎恨,参见:

- Banks Letters*, p. 96; idem, "On Mesmerism", p. 220; Chenevix, *Remarks upon Chemical Nomenclature, According to the French Neologists* (1802)。关于德国化学的反动政治影响,参阅:Lenoir, "Generational Factors", pp. 78—79。切尼维克斯对于他本人投身于其中的颅相学与早期化学革命进行了类比:*Phrenology Article*, pp. 57—58。
54. 参见:J. W. Crane, "State of Phrenology in Great Britain", p. 408。
55. 除了《英国人名词典》中关于福斯特本人和本杰明·弗利的条目之外,可参见《英国人名词典》中关于他父亲托马斯·弗利·福斯特(1761—1825)、他祖父爱德华·福斯特(1730—1812)、他伟大的叔父本杰明·福斯特(1736—1805)以及他的叔父本杰明·梅戈特·福斯特(1764—1829)和爱德华·福斯特(1765—1849)的条目。
56. *Phil. Mag.*, 45 (Jan. 1815), 63。福斯特于 1818 年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学士学位。
57. Forster, *Recueil de ma vie, mes ouvrages, et mes pensées opusculé philosophique* (3rd ed., Bruxelles, 1837), pp. 16—18; 第一版标题为 *Recueil des ouvrages et pensées d'un physician et metaphysicien*, 1836 年在法兰克福出版; idem, *Facts and Enquiries Respecting the Source of Epidemia ... to Which Are Added Observations on Quarantine and Sanitary Rules* (3rd ed., 1832), p. 15; idem, *A Collection of Letters on Early Education, and Its influence in the Prevention of Crime* (2nd ed., 1844), p. v; *Phren. J.*, 7 (1831/1832), 192(剑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颅相学杂志》最初 10 卷来自于休厄尔图书馆)。福斯特向沃纳学会提交的文章使得这个学会极为不安,但是根据他的说法(*Recueil de ma vie*, p. 18),他们中有些人后来成为“爱丁堡最伟大的颅相学家”。沃纳学会记录的官方出版物严格遵守皇家学会的标准:“在这次会议中,第一次没有涉及公共事务”: *Memoirs of the Wernerian Natural History Society for the Years 1811—1816* (Edin., 1818), p. 659. 也见 [Forster], "Phrenology: the Wernerian Society", pp. 479—480。关于施普茨海姆的戏剧性表演,参见: "Edinburgh Dissection of the Brain", *Phil. Mag.*, 48 (1816), 153; Carmichael, *Memoir of*

- Spurzheim, pp. 18—23; Gibbon, *Life of Combe*, I, pp. 94—95; Combe, *Essays on Phrenology* (Edin., 1819), pp. ix—xiv。根据《柳叶刀》杂志关于伦敦颅相学学会的一篇报道,福斯特成为该学会的“通信会员”。然而,情况更可能是这样的,他没有选择成为会员,而像他在自传中所声称的那样,被选为“荣誉会员”。尽管《柳叶刀》杂志的报道并不完整,但我却没有找到证据说明他曾经参加过该学会的会议。他不太可能参加,因为1818年以后他住在哈特威尔—萨塞克斯,而且由于他妻子的健康和女儿的教育等原因,他在大陆生活了很长时间。
58. 第1卷的前言。福斯特在《关于颅相学新体系的考察》一文(Forster, “Observations on a New System of Phrenology; or, the anatomy and physiology of the brain of Drs Gall and Spurzheim”, *Phil. Mag.*, 45, Jan. 1815, 44—50)中造出了“颅相学”这个词(即 *phren* 指“头”; *logos* 指“论述”);一个月后,这篇文章又发表在 *Pamphleteer*, vol. 5, 219—244, 1815年又和其他文章收录在一起单独出版,不过其标题用“动物生理学”取代“颅相学”。关于颅相学这个词,参见:Eric T. Carlson and Patricia S. Noel, “Origins of the Word ‘Phrenology’”, *Amer. J. Psychiatry*, 127 (1970), 694—697。
59. 参见:I. Inkster, “Science and Society in the Metropolis: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the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the Askesian Society of London, 1796—1807”, *Ann. Sci.*, 34 (1977), 1—32。《哲学杂志》创办于1798年,1802年吞并了威廉·尼克尔森(William Nicholson)的《自然哲学、化学和艺术杂志》(*Journal of Natural Philosophy, Chemistry, and the Arts*);蒂洛赫一直担任该杂志编辑,直到1821年。关于蒂洛赫,参见:*DNB*; *Mechanics’ Oracle* [他也是该杂志的编辑] 1 (1825), 220; *Phil. Mag.*, 65 (1825), 134—135; *Gents. Mag.*, 95 (1825), 276—281; *Imperial Mag.*, 7 (1825), 208—222; *Annual Biography and Obituary*, 10 (1826), 320—334。
60. *Phil. Mag.*, 39 (1812), 142—150, 引自 Inkster, “Askesian Soc.”, p. 9。蒂洛赫因为班克斯怀疑他的政治观点而被迫退出皇家学会会员的选举以后,似乎对更激进的资产阶级团体产生了兴趣,参见:Paul Wein-

dling, "Science and Sedition: how effective were the acts licensing lectures and meetings, 1795—1819?" *Br. J. Hist. Sci.*, 13 (1980), 139—153 at p. 149.

61. 关于哲学学会在 1811 和 1815 年举办的颅相学讲座, 参见 Inkster, "Askesian Soc.", p. 12。《哲学杂志》是英国第一批报道高尔和施普茨海姆学说的杂志之一, 参见: "A Short View of the Craniognomic System of Dr Gall, of Vienna. By L. Bojanus, M. D." [摘录自 *Magazin Encyclopedique*, no. 4], *Phil. Mag.*, 14 (1802), 77—84, 131—138。1809 年, 《哲学杂志》第 35 卷第 303—305 页发表了法兰西学院关于高尔和施普茨海姆《论文集》的报告, 补充道, 所有人都认为他们的学说在许多方面要比之前的学说“更清晰、更容易理解”。该杂志还发表了关于该学说进展情况的另一篇报道: "Craniology", *Phil. Mag.*, 36 (1810), 77—78。从 1814 年 7 月开始, 该杂志发表了长达 40 页的长篇连载《高尔和施普茨海姆的头骨学体系》("Messrs Gall and Spurzheim's System of Craniology"), 直到 1815 年 2 月才刊载完毕。参见: vol. 46 (July & Nov. 1815), 9—11, 398; 49 (June 1817), 457; 52 (Oct. 1818), 300; 54 (Sept.—Nov. 1819), 226—227, 252—264, 324—335; 57 (Mar. & June 1821), 222—226, 449—453。1822 年理查德·泰勒和理查德·菲利普斯接任该杂志编辑, 《哲学杂志》对颅相学的支持正式结束。
62. "Of the Physiology of Certain Disorders of Health Founded on a Knowledge of the Proportionate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s of the Special Organs of the Mind", *Phil. Mag.*, 45 (1815), 132.
63. 参见: Richard Carlile to Forster, 16 Sept. 1826, Forster Papers,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MS Eng Lett, c. 200 f. 173—189。福斯特在《生平文集》(*Recueil de ma vie*, p. 13) 中遗憾地写道, 他从 1811 年就开始得到阿伯内西的信任, 却因为 1823 年出版的《躯体心理学》(*Somatopsychonologia*) 而告终(参见下面的注释 73)。1815 年阿伯内西在圣巴塞洛缪医院接受福斯特为学生, 与他一起反对烈酒和食肉。
64. 引自《生平文集》(*Recueil de ma vie*), p. 16。参照对福斯特的指责, 说

- 他是施普茨海姆的“忠实弟子”，只顾吹嘘施普茨海姆的观点：review of “*Sketch of the New Anatomy... by Thomas Forster*”, *Monthly Rev.*, 77 (1815), 165—167。福斯特的论著《观察》(*Observations on the Casual and Periodical Influence of Particular States of the Atmosphere on Human Health and Disease, Particularly Insanity*, 1817)是献给施普茨海姆的，但是(让埃利奥特森高兴的是)不到十年时间，福斯特就改变看法，开始把施普茨海姆看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理论上的剽窃者：Elliotson, *Human Physiology*, pp. 1159—1160n。
- 323
65. *DNB*; *Recueil de ma vie*, p. 17.
66. *Facts and Enquiries*, p. 76; *Recueil de ma vie*, p. xi.
67. “J’ai été écolier, academicien, musicien, physicien, métaphysicien, enthousiaste, voyager, aéronaute, phrénologiste, poète et philosophe!” *Recueil de ma vie*, p. 31. 也见 Forster to Charles Daubeny, 9 May 1832, 引自 Morrell and Thackray, *Gentlemen of Science*, p. 277。
68. Cannon, *Science in Culture*, p. 59。从很早开始，福斯特就倡导毕达哥拉斯的宇宙永恒学说。弗里德里克·兰格写道，“认为颅相学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很显然是错误的观点。如果可以证明的话，颅相学不仅能非常好地支撑起康德的体系，而且事实上它也能够与那些认为大脑与‘灵魂’有关的过时思想保持一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唯物主义者……已经令人震惊地表明他们自己赞成颅相学。” *History of Materialism* (1881), III, p. 118。
69. *Recueil de ma vie*, pp. xx, xviii。也许他可能是有意识地模仿他的先祖本杰明·弗利，弗利曾陷入隐修哲学家和炼丹家范·黑尔蒙特的思想中不能自拔；参见：Margaret Jacob, *The Radical Enlightenment: pantheists, freemasons, and republicans* (1981), p. 212。1830年福斯特编辑出版了弗利留下的家族遗产：*Original Letters of Locke, Algernon Sidney, and Anthony Lord Shaftesbury*。
70. *A Biographical Memoir of George Canning Prime Minister of Great Britain* (Brussels, 1827); *England’s Liberty and Prosperity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Duke of Wellington, based on independence of*

election (2nd ed., Colchester, 1830).

71. *Recueil de ma vie*, p. 116。不久,福斯特移居布鲁日,那里有一所英国学院,因而对于英格兰的天主教徒来说是一个天堂。约翰·博西的论著《1570—1850年的英国天主教团体》(John Bossy, *The English Catholic Community, 1570—1850*, 1975)中没有提到福斯特,但该书第392页以后对于贵格会与天主教学说之间的相似性的考察,值得关注。Joseph Gillow, *Bibl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English Catholics* (1886), II, pp. 318—324,有一个关于福斯特的非常有价值的词目。
72. *Recueil de ma vie*, p. 20, pp. xiv—xv。因此,福斯特是在重申19世纪头十年的谢林和其他(特别是德国的)浪漫主义者的反对理由,即高尔体系对灵魂自由的限制太多,参见:J. Hall, “Gall’s Phrenology”, p. 310。
73. *Somatophychonologia; showing that the proofs of body, life, and mind, considered as distinct essences, cannot be deduced from physiology, but depend on a distinct sort of evidence; being an examination of the controversy concerning life carried on by Laurence [sic], Abernethy, Rennell, and others. By Philostratus* (1823)。也见 Temkin, “Basic Science”, p. 356。
74. *Recueil de ma vie*, p. 116。他写道:“真相是,英格兰的新教改革运动是一场被利益群体和狂热者突然扭曲的革命,使之偏向于富人和伪善者;它也使穷人被拒之于人生各种纯真快乐的大门之外,而过去的天主教会却为他们提供了充分的机会。”(第110页)
75. 关于卢卡奇的观点,参见 Peter Hamilton, *Knowledge and Social Structure* (1974), p. 69。
76. 在邓肯和韦斯顿—斯密斯编著的《说谎的真理》(Ronald Duncan and M. Weston-Smith, eds., *Lying Truths: a critical scrutiny of current beliefs and conventions*, Oxford, 1979, p. 5)中,科林·威尔逊的文章《人生而自由,人生的枷锁无处不在》曾如此评价卢梭。

第三章 通过仪式

1. *Phrenology Article* (1830), p. 7.
2. "Craniology", *Portsmouth, Portsea, and Gosport Literary Register*, 1 (1823), 71—83, at p. 71.
- 324 3. Carmichael, *Memoir of Spurzheim*, p. 27; J. N. Hays, "Science in the City: the London Institution, 1819—1840", *Br. J. Hist. Sci.*, 7 (1974), 146—162 at p. 150. 施普茨海姆的第一个演讲是 1826 年 5 月在伦敦学院的演讲;他的第二门课程(由 12 讲组成)是在 1827 年 4 月开课的。
4. J. W. 克兰向法国商务大臣汇报,几乎所有哲学团体都在“热烈讨论颅相学”(J. W. Crane, "State of Phrenology in Britain", pp. 407—408)。可以说,克兰的汇报基本上是准确的。虽然利物浦皇家协会在 1825 年拒绝了 G. D. 卡梅伦提出的颅相学演讲的申请,其理由是“颅相学还不是一门科学”,但是两年之后,它却为利物浦颅相学学会提供了便利:G. W. Roderick and M. D. Stephens, "Nineteenth Century Ventures in Liverpool's Scientific Education", *Ann. Sci.*, 28 (1972), 61—86 at p. 65; H. C. Watson, *Statistics of Phrenology*, pp. 146—147.
5. *Philomathic J. & Lit. Rev.*, 3 (July 1825), 98—144. 星相学家协会于 1807 年成立于伯顿街,目的是促进科学和文学,“整体提升知识分子的力量”,并“拓宽知识、提高能力”;协会每周聚会,但不讨论宗教和党派政治;会费为每年 2 几尼;James Jennings, *A Lecture on the History and Utility of Literary Institutions* (1823), p. 51n. 和其他同类的协会一样,星相学家协会也有热衷于颅相学的成员,尤其是罗伯特·莫姆,他是律师,伦敦颅相学学会会员,写过 *The Outlines of Character* (1823)。在 4 卷《星相学家杂志》(1824—1826)中,就有 7 篇关于颅相学的文章,而且都是支持颅相学的。
6. 关于葛兰西使用“组织危机”这个词,参见: *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s*, ed. and trans. Q. Hoare and G. N. Smith (1971), p. 210 ff.; and

- R. Q. Gray, "Bourgeois Hegemony in Victorian Britain", in Jon Bloomfield, ed., *Papers on Class, Hegemony, and Party* (1977), p. 76; 也见 Karl Mannheim, "The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the State as an Organism: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in his *Essays* (1953), pp. 165—182.
7.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 p. 60; on "class" as a happening, see *ibid.*, p. 85 and *idem*,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Society: class struggle without class?" *Social Hist.*, 3 (1978), 133—165 at pp. 146—150.
8. 关于文学和哲学学会第一次把科学当作一种社会资源, 参见: A. Thackray, "Natural Knowledge in Cultural Context: the Manchester Model", *Amer. Hist. Rev.*, 79 (1974), 672—709; 后来的文献和资料, 参见: Ian Inkster and Jack Morrell, eds., *Metropolis and Province: science in British Culture, 1780—1850* (1983)。
9. Hays, "London Institution"; 也见: J. R. McCulloch, *A Discourse Delivered at the Opening of the City of London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Institution*, 30 May 1825 (1825), esp. at p. 12; "City of London Institution", *Panoramic Misc.*, 1 (28 Feb. 1826), 208—214; and Shapin and Thackray, "Prosopography as a Research Tool", p. 7。关于“纯粹的”、“实用的”科学概念的历史, 参见: E. Mendelsohn, "Social Construction", p. 22。
10. 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各自文献, 参见: I. Inkster, "Marginal Men: aspects of the social role of the medical community in Sheffield, 1790—1850", in John Woodward and David Richards, eds., *Health Care and Popular Medicine in Nineteenth Century England* (1977), 128—163;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1970), esp. pp. 115—117; and Victor Turner, *The Ritual Process* (Harmondsworth, 1974), esp. pp. 80 ff.。
11. I. Inkster, "Introduction: aspects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science culture in Britain, 1780—1850 and beyond", in Inkster and Morrell, *Metropolis and Province*, pp. 40—41。也见: R. S. Neale on the "uneasy class" in "Class and Class-Consciousness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England: three classes or five?" *Vict. Stud.*, 12 (1968), 4—

32, esp. at pp. 14 ff. .

12. 转引自: J. V. Pickstone,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Medicine in England and Europe: the state, the market, and industrial society", *J. Japan. Soc. Med. Hist.*, 25 (1979), 1—31, at p. 13; 也见 K. Figlio, "Chlorosis and Chronic Disease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omatic illness in a capitalist society", *Social Hist.*, 3 (1978), 167—197 at p. 176。关于我们研究的这个时期的医学界的总体状况, 参见: M. Jeanne Peterson, *The Medical Profession in Mid-Victorian London* (Berkeley, 1978)。
13. 参见: Philip Elliott, *The Sociology of the Professions* (1972); and Brian Heeny, *A Different Kind of Gentleman: parish clergy as professional men in early and mid-Victorian England* (Springfield, Ohio, 1976), esp. pp. 4—5。关于专业人员的绝对数量的增长, 参见: Richard Altick,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Chicago, 1963), p. 83。
14. 例如, 安东尼·卡莱尔爵士对中等阶级信心的追求, Sir Anthony Carlisle (pres. College of Surgeons), *Practical Observations on the Preservation of Health and the Prevention of Disease* (1838), p. ix。《解剖法案》和 1832 年霍乱的爆发进一步打击了人们对医学的信心, 参见: F. K. Donnelly,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heffield School of Anatomy in 1835: a popular response to class legislation", *Trans. Hunter Arch. Soc.*, 10 (1975), 167—172; M. J. Durey, "Bodysnatchers and Benthamit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dead body bill for the London schools of anatomy, 1820—1842", *London J.*, 2 (1976), 200—225; idem, *The Return of the Plague: British society and the cholera, 1851—1852* (Dublin, 1979)。
15. 关于文学和哲学学会中医学界人士的优势地位, 参见: Inkster, "Marginal Men", pp. 137 ff.; Thackray, "Manchester Model", pp. 684—685; and S. Shapin, "The Pottery Philosophical Society, 1819—1835: an examination of the cultural uses of provincial science", *Sci. Stud.*, 2 (1972), 311—336 at pp. 324—325。在支持颅相学的医学界人士中,

参与文学和哲学学会的建立或指导工作的有：巴斯的爱德华·巴洛、纽卡斯尔的约翰·法伊夫、设菲尔德的 G. C. 霍兰、汉普郡埃姆斯沃斯的 G. 米勒、朴茨茅斯的约翰·波特。

16. 讣告, *Br. Med. J.*, 19 Dec. 1868, p. 650.
17. 1823 年 11 月的《颅相学杂志》“前言”声称：“现在对[颅相学]的尊重是复兴的结果, 这种复兴是有着开明习惯的人实现的”, 第 5 页。
18. De Moscati, “Character of Gall”, *Lancet*, 22 June 1833, p. 399. 哈里雅特·马蒂诺描述了 19 世纪初对形而上学的类似高傲态度, 她在《三十年和平的历史》(Harriet Martineau, *A History of the Thirty Years Peace*, 1846/1848; 1877 ed., II, p. 363) 中, 对杜格尔德·斯图尔特与高尔进行了比较。关于颅相学著作中这种传统的高傲态度, 参见: W. C. Engledue, *Zoist*, 1 (April 1843), p. 6; John Slade, *Colloquies: Imaginary conversations between a phrenologist and the shade of Dugald Stewart* (1838); “Correspondence between Academicus and Consiliarius [i. e., W. P. Alison and P. Neill] on the comparative merits of phrenology and the mental philosophy of Reid and Stewart”, *Phren. J.*, 10 (1836/1837), 301—337; G. Combe, “Dialogue between a Philosopher of the Old School and a Phrenologist”, *ibid.*, 1 (1823/1824), 65—72, 200—217; *idem*, “Address to Students of Logic and Moral Philosophy”, *Phren. J.*, 6 (1829/1830), 191—200 (这些由库姆撰写的文章都被选印在罗伯特·柯克斯编《颅相学杂志文选》[Robert Cox, ed., *Selections from the Phrenological Journal*, Edin., 1836])。关于颅相学家和反颅相学家在方法论上的差异, 参见: P. M. Roget, “Phrenology”, *Ency. Brit.*, p. 469; and Shapin, “Phrenological Knowledge”, pp. 236—237.
19. *Testimonials to Combe* (Edin., 1836), p. 55.
20. 关于颅相学家把形而上学和炼金术相类比的例子, 参见: review, “*Illustrations of Phrenology ... by Sir G. S. Mackenzie*”, *Edin. Monthly Rev.*, 5 (1821), p. 94.
21. 引用培根的话使这个规则本身丢脸, 正如伯明翰一位颅相学家对牛津

学术精英的攻击：“牛津人引用培根勋爵的语言，‘与人生的实践和想象并不相符’，它并没有为大脑的运行和大脑官能做好准备，‘而是使它们误入歧途’。”他还谴责牛津人受教会控制。[Joshua Toulmin Smith]，“On the Progressive Diffusion of Phrenology”，*Phren. J.*，10 (1836/1837)，346—352 at p. 405。关于使杰克逊时期的美国平等主义反抗合法化的纯粹经验主义，参见：J. Higham，“The Matrix of Specialization”，in A. Oleson and J. Voss, eds., *The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in Modern America, 1860—1920* (Baltimore, 1979)，3—18 esp. at p. 8。

- 326 22. 参见某些欧文社会主义者对颅相学的兴趣(第八章)。身为教育家和欧文支持者的詹姆斯·詹宁斯，* 虽然在某些方面赞成颅相学，但他却批评颅相学家没有充分关注“日常生活中简单的感觉；我认为在这类调查中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这些问题：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的一定是产生于我们通常称之为感觉的媒介，即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情感”。*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Nature and Operations of the Human Mind in Which the Science of Phrenology, the Doctrine of Necessity, Punishment, and Education are Particularly Considered: a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Mechanics' Institution, London* [with additional notes by J. Deville*] (1828)，p. 23。
23. *Educ. Mag. & J. Christian Philanthr. & Publ. Utility* (May 1835)，p. 307。
24. 例如：Richard Church, *Presumptive Evidence of the Truth and Reasonableness of Phrenology: a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members of the Chichester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Society, January 11th, 1833* (Chichester, 1833)，p. 111；James D. Green, *An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the Birth of Spurzheim,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Boston Phrenological Society, December 30, 1836* (Boston, 1836)，p. 14；and Robert Chambers in his testimonial to Combe, printed in *Testimonials to Combe*，p. 55。
25. 颅相学文献充斥着对于这些死的语言的蔑视，参见：Charles Caldwell，

Thoughts o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he True Mode of Improving the Condition of Man; and on the study of the Greek and Latin languages, with notes by Robert Cox and a recommendatory preface by George Combe (Boston, 1834; Edin., 1836, 1844); [William B. Hodgson], "Classical" Instruction: its uses and abuses, reprinted from the *Westminster Review* for October 1853; 也见:亨利·科伯恩在其《杂志》中对反拉丁文改革者的评述(Henry Cockburn, *Journals*, Edin., 1874, I, entry for 5 Oct. 1834, p. 70), 以及道格拉斯把这种反仪式主义的表现方式当作追求秩序的一种形式的评论(Douglas, *Natural Symbols: explorations in cosmology*, Harmondsworth, 1973, pp. 19 ff.)。

26. 转引自:R. Yeo, "Scientific Method and the Image of Science, 1831—1891", in Roy MacLeod and P. Collins, eds., *The Parliament of Science: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1831—1981* (1981), 65—88 at p. 65。也见:Daniel Noble, "Sketch of the Accordance between the Inductive Philosophy of Bacon and the Aptitude of the Human Intellect, as demonstrated by Phrenology", *Phren. J.*, 10 (1836/1837), 190—201。关于培根的反经院哲学, 参见:Robert Mandrou, *From Humanism to Science, 1480—1700*, trans. B. Pearce (Hassocks, Sussex, 1978), pp. 202 ff.; 也见:Merton, *Scienc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esp. p. 97; and William Leiss, *The Domination of Nature* (N. Y. 1972), pp. 73 ff。关于“培根主义”或作为世俗科学和社会进步先知形象的培根, 参见:Roszak, *Where the Wasteland Ends*, pp. 248—249; Morrell and Thackray, *Gentlemen of Science*, pp. 268—292; Cannon, *Science in Culture*, pp. 59, 73, 228 ff。
27. 总的来说, 这是马克斯·霍克海默对实证主义的批评, 参见:Martin Jay,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1973), p. 62。
28. Bronislaw Malinowski, *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and Other Essays* (1948; 1974); 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1951); 可参照:J. Powles, "On the Limitations of Modern Medicine", *Science, Medicine, and Man*, 1 (1973), 1—30 at p. 20。

29. G. Combe, "Objections to Phrenology", in his *Elements of Phrenology* (9th ed., Edin., 1862), p. 211.
30. "Observations on the Recent Improvements and Discoveries in the Anatomy and Physiology of the Brain. By a medical correspondent", *Gents. Mag.*, 89 (suppl., 1819), 608—609; 也见: 支持文章, 如: review of "Maugham's *Outlines of Character*", 93 (Feb. 1823), 149—151; and "On the Advantages of Phrenology", 94 (April 1824), 301—303.
31. Daniel Ellis, *Life of Gordon*, p. 42.
32. Gordon, "Doctrines of Gall and Spurzheim", p. 251.
- 327 33. Roland Barthes, "The Brain of Einstein", in his *Mythologies*, trans. A. Lavers (St. Albans, Herts. 1976), 68—70.
34. "Dr. Spurzheim's Lectures", *Monthly Mag.*, 59 (June 1825), p. 401n. 当切尼维克斯声称“有些人指责施普茨海姆博士抛弃了他的前辈培根哲学的严肃性, 沉溺于先定的假定”时, 他可能指的就是这一点, *Phrenology Article*, p. 22.
35. 关于高尔原来所用的德语词汇表, 参见上书, 第 24 页。关于乔治·库姆用来描述精神器官的术语(本质上是施普茨海姆的术语)与高尔所使用的术语(即博亚纳斯和维莱尔在 1802 年所使用的术语)之间的区别, 参见: "Combe's Phrenology", *Nat. Mag. & Monthly Critic*, 2 (1838), 103—119 at p. 107; 也见: Robert Cox, "Objections to Dr. Spurzheim's Classification and Nomenclature of the Mental Faculties", *Phren. J.*, 10 (1836/1837), 154—164.
36. "Introductory Statement", *Phren. J.*, 1 (1823/1824), iv.
37. 在《颅相学杂志》发行的 24 年中, 唯一没有亏损经营的时期是 1831—1832 年。休伊特·沃森在担任该杂志编辑并把它移交给泰晤士·迪顿之前不久, 抱怨道: “它从来没有受到人们的高度欢迎, 即使在颅相学家中也是如此, 人们抱怨它体现的是这门学说的倡导者(即库姆及其爱丁堡的朋友)的感情和思想, 而不是信奉颅相学的大众的感情和思想”; *Statistics of Phrenology*, p. 14; 也见: Sidney Smith,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Editor of the Phrenological Journal", *Phren. J.*, 10

- (1836/1837), 658—664。但沃森试图使该杂志拥有更多读者的努力也没有更成功,他作为编辑,反过来也遭到了其他颅相学家的批评,例如:T. S. Prideaux, *Strictures on the Conduct of Hewett Watson, FLS in His Capacity of Editor of the Phrenological Journal* (Ryde, 1840)。
- 1843年,库姆派重新购回该杂志的版权,罗伯特·考克斯担任编辑:Gibbon, *Life of Combe* (1876), I, pp. 161—162, 247。
38. 例如,“Phrenological Quacks”, *Phren. J.*, 9 (1834/1836), 517—519; “On the Requisites for the Advance of Phrenological Science: — Manipulators”, *ibid.*, 13 (1840), 97—119; “Phrenological Manipulators”, *ibid.*, 12 (1839), 346—350; *ibid.*, 18 (1845), 238; and *ibid.*, 19 (1846), 197; *Phren. Almanac*, 1 (1842), p. 12n.; “Phrenological Quackery”, *Phren. Almanac & Phren. Ann.*, 4 (1845), 17—22; “Phrenology: phrenological quacks”, *Medico-Chirurgical Rev.*, 24 (Jan. 1836), 207—208; *Aldine Mag.*, 19 Jan. 1839, p. 120。为了维护“受尊敬的”颅相学普及者的生计,W. A. F. 布朗在1835年建议给诚实的好演讲者颁发特别证书:*Minute Book of the Edinburgh Phrenological Society*, 3 Dec. 1835 (MS, Edin. Univ. Lib; Gen. 608/2)。10年以后,设菲尔德的颅相学家又提出并接受了一个类似的建议:*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Sheffield Phrenological Society ... during Session 1844—1845* (Sheffield, 1845), p. 6, *Phren. J.*, 18 (1845), 285; and *People's Phren. J.*, 1 (1843), 178。行业保护的同样问题最终导致20世纪初国际心理分析协会的形成:H. A. Murray, “Sigmund Freud, 1856—1939”, *Amer. J. Psychol.*, 53 (1940), 134—138 at p. 135; and Ernest Jones, *Life of Sigmund Freud* (1953), p. 257。
39. Steven Marcus, *The Other Victorians* (1966), p. 283。《埃尔金信使》(*Elgin Courier*)为这种效果提供了一个例证,它在评论颅相学演讲者J. Boyd时说,“发现有人试图摧毁并使得这门科学变得荒谬可笑,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24 July 1846, q. in *Phren. J.*, 19 (1846), p. 383; 也见:*Physician*, 10 Nov. 1832, p. 10; *Analyst*, (Nov. 1839), p. 337。
40. 就在埃利奥特森“一直在监狱和精神病院为犯人们检查头颅”(The

- London Journal of Flora Tristan*, 1842, trans. J. Hawkes [1982] p. 120), 库姆在纽卡斯尔和都柏林对囚犯进行权威的描绘, 并为保险公司雇用员工、家庭选择仆人从颅相学角度进行论证的时候 (*Phren. J.*, 9 [1834/1836], 519—526, 14 [1841], 297—310, 6 [1829/1830], 211—222; 但参考 Combe, “On the Best Means of Making Converts to Phrenology”, *ibid.*, 2 [1824/1825], 130—131), 乔治·麦肯齐爵士却收集了 46 份关于颅相学价值的证明书, 证明颅相学在描绘罪犯头颅方面的价值, 这样就证明这些罪犯更应该被运送到澳大利亚去 (*Documents laid before Lord Glenelg*)。在不太知名的颅相学家中这样的例子更多。一些为实用知识传播学会写作的人也面临同样的困难: 一方面, 他们为了在工人阶级中传播某些价值, 需要使他们的科学功课简单化; 另一方面, 他们不希望失去同类的科学团体对自己的尊重, 因为这些团体有可能认为他们的努力是非科学的夸夸其谈; 很显然, 植物学家约翰·林德利就面临这样的困境。参见: J. N. Hays, “Science and Brougham’s Society”, *Ann. Sci.*, 20 (1964), 227—241 at p. 239。
- 328 41. *Cheltenham Looker-on*, 27 Mar. 1841, n. p.: see also: *Analyst*, 9 (Nov. 1839), 337.
42. Page xiii; 可参照 17 世纪的占星术士试图摆脱加诸他们的不敬神的宿命论或机械决定论罪名的努力: Bernard Capp, *English Almanacs, 1500—1800: astrology and the popular press* (Ithaca, N. Y., 1979), chap. 5.
43. “Introductory Statement”, p. xiii; 一个几乎相同的表述, 参见: Barlow, *Apology for Phrenology*, pp. 17—24.
44. As q. in *Analyst*, 1 (Aug. 1834), 56。其他例子, 参见: William Robinson Lowe, “Lecture VI: phrenology in relation to religion”, 18 Dec. 1839, in his *Lectures on Popular and Scientific Subjects Delivered at Various Literary Institutions* (Wolverhampton, 1857), pp. 186—213; [John Epps], *Internal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 Deduced from Phrenology. By Medicus* (Edin., 1827)。也见: John C. Tomilson, “The Science of Phrenology Consistent with the Doctrine of Christianity; a

letter addressed to Dr Spurzheim”, *Pamphleteer*, 26 (1826), 415—425; [George Lyon], “On the Harmony of Phrenology with the Scriptural Doctrine of Conversion”, *Edin. Christian Instructor*, 22 (Dec. 1823), 803—818; [John Hamilton], “On the Accordance with Subsists between Phrenology and the Scriptural Doctrine of Regeneration”, *Phren. J.*, I (1823/1824), 555—570; Charles Cowan, *Phrenology Consistent with Science and Revelation* (Reading, [1841]); John Maclean, *The Testimony of Phrenology to the Truth of Revelation* (Leith, 1858); and Lot Mason, *Harmony of Phrenology and the Bible* (Leeds, [c. 1858])。在理性宗教家中,身为颅相学家的还有:一神论者乔舒亚·图尔明(Joshua Toulmin)* 以及霍克斯·史密斯(W. Hawkes Smith)*、非国教徒莱特(H. G. Wright)、皮尤夫人(Mrs. Pugh)、撒缪尔·伊登(Samuel Eadon)*、约翰·怀特(John White)* 以及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国教徒亨利·克拉克牧师(Rev. Henry Clarke),* 以及波士顿浸信会教友约瑟夫·沃纳(Joseph Warne),沃纳的《论圣经与颅相学之间的和谐》(*On the Harmony between the Scriptures and Phrenology*, Edin., 1836)最初是以库姆的《人类体格》在美国发行的学校版的附录形式出现的。

45. 沃特利声称,“从宗教和道德角度对颅相学的攻击彻底无效”: q. in Gibbon, *Life of Combe*, I, p. 275;《新教杂志》批判一个攻击颅相学的同伙,说:“同样虔诚、同样有学问、同样明智、同样是毫无偏见的人,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4 Aug. 1842, p. 272;美国的公理会教徒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公开承认,颅相学支撑了他的神职生涯: q. in *Zoist*, 13 (Oct. 1855), 282—284; 1843年,《不信奉国教者》(*Nonconformist*)甚至为制造业地区的罢工代表进行颅相描述: 14 June 1843, q. in w. B. Hodgson, “Progress of Phrenology”, *Phren. J.*, 16 (1843), 408。达勒姆和诺里奇的主教们参加了 1839 年伦敦的颅相学演讲 (David de Giustino, *Conquest of Mind* [1975], p. 122), 而高教会 *Christian Remembrancer* 公开承认它对颅相学的支持: 6 (Dec. 1843), 661—676。教士们在演讲结束时站起来表示对颅相学的支持

是普遍现象。这种和谐不仅是正统捍卫者所宣称的,好斗的约克郡激进分子、以前是织工的约瑟夫·巴克也指出,颅相学反对的是“现存的神学体系,……而不是宗教”,它易于“使人们成为异端,相信错误的人性理论,相信我们无知的长辈的传统和干预,但它绝不会妨碍神或上帝的教旨,也不会妨碍人类职责或人类命运的学说”:*“Phrenology”, The People, I (1848), 122.*

46. 但可参见:*London Pioneer, 1 (28 May 1846), 76.*

47. Page xiii; 也见:“Abuses of Phrenology”, *Christian Remembrancer, 22 (Nov. 1840), 682.*

48. 例如:“Phrenological Controversies”, *Phren. J., 10 (1836/1837), 150—153; and “Recent Attacks on Phrenology”, ibid., 11 (1838), 260—266.* 关于知识分子反抗者对于其对手主观主义的理解,参见:Lucien Goldmann, *The Hidden God (1977), p. 163; and David Ingleby, “Understanding ‘Mental Illness’”, in D. Ingleby, ed., Critical Psychiatry: the politics of mental health (Harmondsworth, 1981), 23—71 at p. 26.* 当前发生在知性论者与以科学为对象的社会史学家之间的争论,正如查尔斯·罗森堡的评价,越来越接近其本义,“否认科学知识的卓越性是……一种政治行为。全面理解科学既是一种社会工具,也是一种认识论,使人们接受似乎是永恒的、无私的、不可避免的知识,并认为它是临时的、有利益的,它并不是永恒思想铁律的产物,而是极端世俗利益的产物”。“Nature Decoded”, *Isis, 8 (1980), 291—295 at p. 294.*

49. 参见:“The Pope versus Phrenology”, *Phren. J., 10 (1836/1837), 600—602.*

50. *Phrenology Article, p. 20.*

51. 参见:G. Combe, “Letter on the Prejudices of the Great i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against Phrenology”, *Phren. J., 4 (1829/1830), 14—38, 18—27; Spurzheim to vice-chancellor of Oxford, 17 Nov. 1830; Bodleian MS Top. Oxf. b. 23, f. 301(d); and “March of Intellect, and Suppression of Phrenology, at the King’s College”, *Lancet, 7 Jan.**

1832, pp. 519—520.

52. 参见：“Cruelty to Animals: Sir William Hamilton’s experiments”, *Phren. J.*, 7 (1831/1832), 427—433; 关于颅相学在修辞上对中等阶级的吸引力, 参见: “Practical Phrenology”, *Phren. J.*, 3 (1825/1826), 410—419, 514—522; Spurzheim, “Usefulness of Phrenology”, in his *Outlines of Phrenology* (1829), pp. 77—101; and Barlow, *Apology for Phrenology*, pp. 24—32 (可参考有关颅相学直接针对大众的实际应用的文献描述, 第六章注释 25)。
53. *Phrenology Article*, p. 55.
54. R. F. Jones, *Ancients and Moderns* (2nd ed., 1965); and C. C. Gillispie, “The Encyclopédie and the Jacob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 study in ideas and consequences”, in Marshall Clagett, ed., *Critical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Madison, Wisc., 1959), 255—289. Cf. R. Mcaulay, “Velikovsky and the Infrastructure of Science: the metaphysics of a close encounter”, *Theory and Society*, 6 (1978), 313—342; W. F. Cannon, “The Uniformitarian-Catastrophist Debate”, *Isis*, 51 (1960), 38—55; D. MacKenzie and B. Barnes, “Scientific Judgement: the biometry-Mendelism controversy”, in Barnes and Shapin, *Natural Order*, 191—210.
55. 参见: Tom Paine on the nature of “crises”, cited in E. Mendelsohn, “Revolution and Reduction”, p. 414.
56. 特别是 G. 坎托, 他根据“不可比较的”神学、哲学、解剖学、生理学和方法学的观点来解释爱丁堡的颅相学争论。他总结道: “如此多、如此深入的相互不可比较的形式, 使得两个派别之间的互相交流维持在最低水准”, 任何一方都不能明显地改变另一方的观点。 “Edinburgh Phrenology Debate”, p. 217.
57. 这种理解思想史的辩证方法几乎与科学史 (by Rosenberg, “Nature Decoded”, p. 294) 中所描述的另一关于可感知事件的主观世界的困境相近, 甚至导致了后者。这种困境是“阐释方面的混乱, 其中每一件事都与其他事物潜在地联系在一起”。这不能成为不去追求辩证理

解的理由,尤其是因为,“此处的原因,却在别处产生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很显然是“一种空洞的抽象……形而上学的极端对立只有在危机时期才存在……;巨大的整个过程以互相影响的形式发展着——尽管力量很不平衡,但经济运动仍成为最强大的、最主要的、决定性的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中,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事物”; Letter to Conrad Schmidt, 27 Oct. 1890, in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3rd ed., Moscow, 1975), p. 402.

58. Mannheim, “Conservative Thought”, in *Essays* 74—164, esp. pp. 74—
330 79。关于把“思想风格”的概念说明性地应用到类似的问题,参见: J. Harwood, “The Race-Intelligence Controversy: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Social Stud. Sci.*, 6 (1976), 369—394 and 7 (1977), 1—20。
59. George Lyon, “Essay on the Phrenological Causes of Different Degrees of Liberty Enjoyed by Different Nations”, *Phren. J.*, 2 (1824/1825), 598—619 at p. 599.
60. *Examiner*, 30 Oct. 1831, n. p.
61. “The Phrenological System”, *London Mag.*, 6 (Sept. 1822), 197—204 at p. 198。也见: *Edin. Monthly Rev.*, 3 (Feb. 1820), 123—145 and 5 (Jan. 1821), 90—108; “Phrenology”, *Metropolitan Q. Mag.*, 2 (1826), 56—71; 以及 Walt Whitman as q. in Madeleine B. Stem, *Heads and Headlines: the phrenological Fowlers* (Norman, Okla., 1971), p. 100。
62. *Monthly Rev.*, 94 (Apr. 1821), 396; 也见: *Quart. Rev.*, 13 (Apr. 1815), 159; “Craniology”, *Oxford Ency.* (Oxford, 1828), vol. 2, 708—710; *Medico-Chirurgical Rev.*, 3 (Mar. 1823), 897—898; *Christian Remembrancer*, 6 (Dec. 1843), 661。
63. “Combe’s Constitution of Man, 4th ed.”, *Br. & For. Rev. or European Q. J.*, 12 (1841), 142—180 at p. 142。
64. *Hampshire Telegraph*, 28 Mar. 1842, q. in *Phren. J.*, 15 (1842), 279。
65. *Southern Lit. Messenger*, 2 (March 1836), 286, q. in T. Stoehr, “Physiognomy and Phrenology in Hawthorne”, *Huntington Lib. Q.*, 37

- (1974), 355—400 at p. 360.
66. “Phre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s”, *Union*, 1 (June 1842), 75—77 at p. 75.
67. *Christian Teacher*, 2 (1836), 603—604.
68. 参见: W. C. Engledue, “Messrs. Forbes, Wakley, and Co., the Antimeric Crusaders”, *Zoist*, 4 (Jan. 1847), 584—601; 以及 R. M. Glover,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Delivered in the Lecture Room of the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Society, Newcastle, Lecture VI: quackery . . . pseudo science: phrenology, mesmerism, hydropathy, tee-totalism, vegetarianism, homoeopathy”, *Lancet*, 11 Jan. 1841, pp. 34—38。通过这种方法, 以前支持颅相学的医学界人士与先前通过攻击江湖庸医而寻求职业尊严的人联合起来, 可参考: James L. Bardsley, *Observations on Homoeopathy and Animal Magnetism . . . a lecture introductory to a course on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 (Manch., 1838)。先前涉足颅相学、后来在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反对顺势疗法的著名医生有詹姆斯·英格利斯 (James Inglis)* 和查尔斯·考恩 (Charles Cowan)。然而, 当约翰·埃普斯写道, 韦克利“就和城市自治机关赞成史密斯菲尔德令人讨厌的行为一样: 他在[顺势疗法的]滥用中获得了既得利益”, 他实际上表达了拥有不同社会利益的其他颅相学家的感情: letter to J. Gardiner, May 1851, in *Diary of Epps* [1870], p. 488。
69. 1830 年 4 月 15 日, 爱丁堡颅相学学会(在宗教问题的讨论极大地干扰了学会会议之后)把神学问题排除在会议议题之外: “*Minute Book of the Phrenological Society*”。但随后, 该学会规定, “颅相学通过揭示人类思想的要素, 把道德和政治的所有总体原则及其应用纳入科学的范畴中”, 因此, 如果“能坚持普遍结论”, 从这样的讨论中能够得到的只会是好东西。 *Phren. J.*, 8 (1832/1834), 192。可参照星相学家协会对于讨论宗教和政治问题的必要性的认识: 转引自 P. Weindling, “Science and Sediton”, p. 10。
70. Richard Winter Hamilton, *An Essay on Craniology: being the sub-*

- stance of a paper submitted to the Philosophical and Literary Society, Leeds, December 2, 1825 (1826), p. 23。关于爱丁堡颅相学学会, 参见 Gibbon, *Life of Combe*, I, pp. 129, 134; *Phren. J.*, 3 (1825/1826), 476—481。大约三分之一的颅相学学会在苏格兰, 还有三分之一在英格兰北部; 英格兰南部有 20 个, 爱尔兰有 3 个; Watson, *Statistics of Phrenology*, pp. 218—219。然而, 正如伯明翰颅相学家乔舒亚·T. 史密斯* 指出的, “我们并不是通过查核现有的颅相学学会数字来对颅相学会员人数进行估测的。绝大多数颅相学家强烈反对这种宣传方式”: “On the Progressive Diffusion of Phrenology”, p. 406。
- 331 71. Circular for the institution, c. 1840, bound with MS papers relating to the Liverpool Mechanics' Institution, 1777—1850: Br. Lib. 8364. b. 24.
72. “On the Moral Application of Phrenology”, *Christian Observer*, 29 (May 1829), 294—295 at p. 294.
73. J. Stevenson Bushnan, “Nature of Thought: phrenology”, in his *The Philosophy of Instinct and Reason* (Edin., 1837), 240—265 at pp. 261—262.
74. 转引自: Watson, *Statistics of Phrenology*, p. 124; 关于格拉斯哥颅相学学会这种平静的发展进程, 参见: D. G. Goyder, *My Battle for Life: the autobiography of a phrenologist* (1857), p. 286。
75. Watson, *Statistics of Phrenology*, pp. 11—12; *Phren. J.*, 13 (1840), 109.
76. 关于地质学会, 参见: Cannon, *Science in Culture*, p. 161; 关于把科学作为侵蚀科学活力的因素而实施的科学制度化, 参见: Joseph Ben David, *The Scientist's Role in Society*, p. 78; 也见: I. Inkster, “The Social Context of an Educational Movement: a revisionist approach to the English Mechanics' Institutes, 1820—1850”, *Oxford Rev. Educ.*, 2 (1976), 277—307 at p. 284。
77. 参见: “Warwickshire Natural History and Archaeological Society”, *Analyst*, 5 (1836), 305 (在该学会和先前的颅相学学会中, 约翰·康诺

利起了主导作用); Neville Wood, "Phrenological Society of Warrington", *Naturalist*, 3 (Feb., Apr. 1838), 108—109, 205—206; 4 (Dec. 1838), 152—153; 5 (July 1839), 38; "Blackburn Phrenological and Geological Society", *Naturalist*, 5 (Apr. 1839), 376; *Phren. J.*, 14 (1841), 19; 关于贝尔法斯特, 参见: Watson, *Statistics of Phrenology*, pp. 115—117; 以及 *Phren. J.*, 12 (1839), 100。1842年,《颅相学年鉴》只记录了8个幸存的颅相学学会:阿伯丁、艾尔、邓弗里斯、爱丁堡、格拉斯哥、海布里奇、伦敦和沃灵顿(pp. 60—61)。实际上,正如《人民的颅相学杂志》(1843年2月4日第12页)指出的,还有更多,但大多数是在技工学院之类的机构中,它们的组织方法不同,目标和社会功能也不一样。参见第五章。

78. "Phrenological Societies", *Phren. J.*, 13 (1841), 388—389 at p. 388.
79. 参见: Morrell and Thackray, *Gentlemen of Science*, esp. the section "Phrenology and the Unwelcome Sciences", pp. 276—281; MacLeod and Collins, *Parliament of Science*; and Cannon, *Science in Culture*, chaps. 6, 7.
80. I. Todhunter, *William Whewell* (1876), II, p. 293, 阿米蒂奇的著作《技术官僚的崛起》(W. H. G. Armytage, *The Rise of the Technocrats: a social history*, 1965, p. 95)论述英国科学促进协会时引用了这个资料。也见 M. Berman, "'Hegemony' and the Amateur Tradition in the British Science", *J. Soc. Hist.*, 8 (1975), 30—50 at pp. 37 ff.; and Gillispie, *Genesis and Geology*, pp. 188 ff. 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理论家戴维·布鲁斯特(David Brewster, 1781—1868),在1832年以后曾担任《哲学杂志》的编辑,他信誓旦旦地保证以后再不会撰写颅相学文章。1845年,他在《北部英国评论》中对《天地万物自然沿革的痕迹》进行评论时攻击了颅相学,但他直到1863年才专门撰写反对颅相学的文章:"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ge", *Good Words*, [1] (1863), 7—13; 也见 [Hector McLean], *A Reply to Sir David Brewster's Strictures on Physiognomy and Phrenology by E. M'G.* (Glasgow, 1863); and Cornelius Donovan, *The Ethnological Society and Phrenology: a*

paper entitled "Physiognomy Popular and Scientific" with report of the Discussion (1864).

81. 关于对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谴责, 参见: "The Phrenological Association", *Phren. J.*, 12 (1839), 29—41; 根据这篇文章的记载, 在 1838 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会议上担任不同部门职务的颅相学家或颅相学支持者不少于 16 人。身为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会员的颅相学家有: 乔治·库姆、詹姆斯·克拉克爵士、W. H. 克鲁克*、理查德·埃文森、托马斯·福斯特*、W. R. 罗伊*、麦肯齐*、T. S. 普里多* 以及 H. C. 沃森*。J. Q. 朗鲍尔* 是小册子《论颅相学必须被当作科学》(J. Q. Rumball, *On the Claims Which Phrenology Has to Be Considered a Science: addressed to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assembled at Plymouth, 1841*, Plymouth, 1841) 的作者。
82. 关于颅相学的讨论后来主要集中在统计学、医学、自然史和人类学, 参见: *Phren. J.*, 9 (1834/1836), 120—126; 11 (1838), 92—94, and 20 (1847), 187; *Standard*, 25 Aug. 1828, p. 1; *Athenaeum*, 1837, p. 752—753; and Dr J. Thurnam, "On the Scientific Cranioscopy of Professor Carus", *Report of the 14th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Held at York, September 1844*, p. 86.
83. 转引自: *Edin. New Phil. J.*, 7 (1834), 372。
84. 麦肯齐的建议发表在 1835 年 3 月的《颅相学杂志》; 同年 8 月, 都柏林颅相学学会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Gibbon, *Life of Combe*, II, p. 101。关于私人会议的诉求及其被拒绝, 参见: Morrell and Thackray, *Gentlemen of Science*, p. 279。
85. 三百人的名字收集自 *Phrenological Association: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4th session, held in London, in June 1841. Proceedings ... laws, and list of members (1841)*; 以及 "The Phrenological Association", *Phren. J.*, 12 (1839), 29—41;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Phrenological Association, at its Third Annual Session at Glasgow, in September 1841", *ibid.*, 14 (1841), 1—63; 以及 "Phrenological Association", *Lancet*, 5, 12 June and 17 July 1841。见 1826 年爱丁堡颅

- 相学学会与爱丁堡皇家学会相比较的职业细目分类, Shapin, "Phrenological Knowledge", p. 229.
86. Morrell and Thackray, *Gentlemen of Science*, p. 280; and "Proceedings of the Phrenological Society [sic] at Glasgow in September Last", *Medico-Chirurgical Rev.*, 34 (Jan. 1841), 289—292.
87. 见: "Dr Elliotson vs. Spurzheim and the Phrenologists of Britain", *Phren. J.*, 11 (1838), 225—247。埃利奥特森的伦敦圈子中, 非国教徒有詹姆斯·克拉克爵士和亨利·霍尔姆, 他们这些人在 1832 年已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私人颅相学小团体: *Phren. J.*, 19 (1846), 288。
88. 恩格尔杜断言: "是! 楔子已经打入, 就应该把它敲进去。观点已经传播, 就应该进一步支持和加强"。 *Cerebral Physiology and Materialism: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application of animal magnetism to the cerebral organs ... with a letter from Dr Elliotson, on mesmeric phrenology and materialism* (1842), p. 26 (这篇演说最初发表在 *Med. Times*, 6 [2 July 1842], 209—214, 《颅相学杂志》加上评语后转发, *Phren. J.*, 15 [1842], 291—318)。
89. "The Declaration of Expediency", *Zoist*, 1 (July 1843), 148—160; "Materialism and the Phrenological Association", *Phren. J.*, 16 (1843), 40—59; Sir George MacKenzie, "The Split in the Phrenological Association", *ibid.*, 15 (1842), 343—346; and "Phrenology and Mesmerism", *Lancet*, 25 June 1842, p. 459。查尔斯·布雷、詹姆斯·西尔克·白金汉、威廉·格里高利、沃尔特·屈维廉爵士、阿瑟·屈维廉以及理查德·比米什也在《应急宣言》上签了名。另一个颅相学学会是由约翰·亚历山大·埃利斯在《医学时代》第 6 期上提议的 (*Med. Times*, 27 Aug. 1842), 342—343; 也见 "New Phrenological Society", *Lancet*, 13 Aug. 1842, p. 702。颅相学学会的第 6 次会议, 见: *Phren. J.*, 17 (1844), 414; and *Zoist*, 1 (Oct. 1843), 227—246。
90. "True and False Phrenology", *Br. & Foreign Med. Rev.*, 14 (July 1842), 65—85 at p. 70.
91. 例如, Noble, "An Essay on the Application of Phrenology to the In-

vestigation of the Phenomena of Insanity”, *Phren. J.*, 9 (1834/1836), 447—459; idem, “An Essay on Temperaments Read before the Manchester Phrenological Society, April 30, 1834”, *ibid.*, 9 (1834/1836), 109—118; idem, *An Essay on the Means, Physical and Moral of Estimating Human Character* (Manch. 1835); idem, *An Inquiry into the Claims of Phrenology, to Rank among the Sciences: a paper read before the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Society of Manchester Nov. 17th, 1837* (Manch. 1837); idem, “On the Quality of Brain, as Influencing Functional Manifestation. Read before the Manchester Phrenological Society, Oct. 8th, 1838”, *Phren. J.*, 12 (1839), 121—134; and *ibid.*, 10 (1836/1837), 190—201, 11 (1838), 312—314, 12 (1839), 206—212。

92. *Phren. J.*, 13 (1840), 387, Cf. “Mr L. Burke’s Lectures, London Mechanics’ Institution”, *People’s Phren. J.*, 1 (1843), 201; and Henry Clarke, “Professional Phrenologists and Party Phrenologists”, *Phren. J.*, 18 (1845), 237—240 at p. 240.

333 93. 见: *Strictures on Anti-Phrenology . . . Roget* (1838); and “Hamilton’s Prefix to Monroe’s Anatomy”, *Phren. J.*, 7 (1831/1832), 434—434。

94. 见: *Testimonials in Favour of Hewett Cottrell Watson as a Candidate for a Chair of Botany in Ireland* [1846]。

95. 见: “Phrenological Collections”, *J. Health & Dis.*, 4 (1848), 49—54 at p. 52。

96. 诺布尔的真正坦白见于他的著作《心理医学原理》(Noble, *Elements of Psychological Medicine*, 1853, pp. x—xi, 36—38)。关于卡彭特的观点, 见: “Mr Noble on the Brain and Its Physiology”, *Br. & For. Med. Rev.*, 22 (Oct. 1846), 488—544 (这是对诺布尔的《大脑及其心理学》[Noble, *The Brain and Its Physiology*, 1846]的评论, 而库姆则鼓励诺布尔撰写文章批驳卡彭特的评论)。也见: “Noble and Walkott on Phrenology”, *Dublin Q. J. Med. Sci.*, 3 (Feb. 1847), 148—154; T. S. Prideaux and W. C. Engledue, *A New Year’s Gift for the Medical Pro-*

- fession. Dr. Carpenter and the Antiphrenological Physiologists; Messrs. Forbes, Wakley, and Co., the antimesmeric crusaders* (1847); and Bruce Haley, *The Healthy Body and Victorian Culture* (Cambridge, Mass., 1978), pp. 36—37.
97. 查尔斯·科恩于 1845 年因为 M. P. J. 弗卢朗的批评而放弃颅相学, 可与诺布尔放弃颅相学相提并论, 他自己也提及这一点: paper read to the Reading Pathological Society, *Prov. Med. & Surg. J.* (16 Apr. 1845), 转引自: Noble, *Brain and Its Physiology*, p. 359。关于“边缘化”团体从对科学的积极参与中抽身而退, 见: Inkster, “Askesian Society”, p. 27 ff; idem, “Marginal Men”, pp. 149 ff.; idem, “Phrenology in Sheffield”, p. 278; Thackray, “Manchester Model”, pp. 696 ff.; Lenoir, “Generational Factors”, p. 465; Mandrou, *Humanism to Science*, p. 138。
98. 见: Andrew Combe, *Phrenology; its nature and uses; An address to the students of Anderson's University at the opening of Dr Weir's first course of lectures on phrenology in that institution, January 7th 1846* (Edin., 1846); *Lancet*, 10 Jan. 1847, pp. 61—64; *Br. & Foreign Med. Rev.*, 22 (July 1846), pp. 230—231; *J. Health & Dis.*, 1 (1846), 232; Gibbon, *Life of Combe*, II, pp. 210—211。
99. Travers, *The Physiology of Inflammation* (1844), p. 44, q. in *Medico-Chirurgical Rev.*, n. s. 1 (1845), 369。
100. Brodie, “Phrenology”, in *Psychological Inquiries* (1854) 220—232 and at pp. 33—104, 262—264 (也见: Cornelius Donovan, *Reply to Sir B. Brodie's Attack on Phrenology, in His “Psychological Inquiries”; being a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Marlebone Institution* [1857]); Lefevre, “Phrenology”, in *An Apology for the Nerves* (1844), 58—74; and “Drs Gall and Spurzheim: phrenology”, in his *The Life of a Travelling Physician* (1843), I, 144—151 (criticized in *Zoist*, 2 [Jan. 1845], 462—464); Skae, “Phrenology” [review of James Straton, *Contributions to the Mathematics of Phrenology and of Noble's The*

Brain and its Physiology], *Br. Q. Rev.*, 4. (Nov. 1846), 397—419 (replied to by Straton in *Phren. J.*, 20 [1847], 36—48 and by Combe in *Lancet*, reprinted in *Phren. J.*, 20 [1847], 63—80; 也见: Skae's reply, *Lancet*, 31 July 1847, 123—126, and Combe to Skae, *Lancet*, 21 Aug. 1847, 194—196)。关于布兰德和弗卢朗的批评,见第一章,注释 47;关于斯基,见:F. Fish, "David Skae, MD, FRCS, Founder of the Edinburgh School of Psychiatry", *Med. Hist.*, 9 (1965), 36—53。

101. 关于韦伯对内在的价值自由和科学的伦理中立的论述,见:Herbert Marcuse, "Industrialization and Capitalism in the Work of Max Weber", in *Negations* (Boston, 1968), 201—226。

102. 相反,由于颅相学方法论与科学的形象相一致,当时人在论述“真科学”与“伪科学”的区别时很少提到颅相学。例如:G. Cornewall Lewis, *An Essay on the Influence of Authority in Matters of Opinion* (1849; 2nd ed., 1875), p. 53; [Elizabeth Eastlake], "Physiognomy", *Quart. Rev.* 90 (1851), 62—91 at p. 62; and Henry Dircks, *Scientific Studies, II, Chimeras of Science: astrology, alchemy, squaring the circle, perpetuum mobile, etc.* (1869), esp. pp. 42, 80。

103. J. W. Hudson, *History of Adult Education* (1851), p. 167; and "Decay of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Institutions", *London Pioneer*, 2 (9 Dec. 1847), 536。

104. 实际上,为了在工人阶级中倡导社会和谐,像约翰·福布斯这样的人重新接触颅相学,并把重点主要放在库姆的颅相学言论上,是有可能的:Forbes, *Of Happiness in Its Relation to Work and Knowledge: an introductory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members of the Chichester Literary Society and Mechanics' Institute, October 25th, 1850* (2nd ed., 1867), esp. pp. 13—15。也见:"Combe on the Constitution of Man", *Medico-Chirurgical Rev.*, 23 (1835), 361—370 (这篇文章的言下之意是没有一位有才华的医生没有读过这本书); "Combe on Moral Philosophy", *ibid.*, 35 (1841), 68—80, 353—376; Andrew Combe, "Phrenology", *Br. & For. Med. Rev.*, 9 (1840), 190—215;

and J. G. Davey, "G. Combe and His Writings: a lecture delivered at Bristol", *J. Mental Sci.*, 10 (1864), 168—194.

第四章 乔治·库姆与人类体格的重塑

1. "George Combe", in *Biographical Sketches, 1852—1875* (new ed., 1877), 265—277, 参见 p. 265.
2. Williams Ellis to Combe, 30 Oct. 1853, Combe Papers, NLS 7333/87.
3. Charles Gibbon, *The Life of Combe* (1878) I, pp. 55 ff. (该书最初的 68 页一直写到 1804 年, 来源于库姆生前未能完成的自传)。
4. 同上书, I., pp. 51, 17, 53; Combe, *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Andrew Combe, M. D.* (1850), pp. 8, 22.
5. 艾布拉姆更为外向的性格可以看作家庭气氛压抑的证明: 根据乔治·库姆的说法, 艾布拉姆正是在第一次离家到伦敦去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可以在不违反道德的情况下尽情享受生活"。[G. Combe], *The Life and Dying Testimony of Abram Combe in favour of Robt. Owen's Views of Man and Society*, ed. Alexander Campbell (1844), p. 6.
6. Silvan S. Tomkins, *Affect, Imagery, Consciousness* (N. Y., 1963), pp. 132—156, 转引自: Thomas J. Scheff, "Labelling, Emotion, and Individual Change", in Scheff, ed., *Labelling Madness* (Englewood Cliffs, N. J., 1975), p. 83. 也见 Jenny Cook-Gumperz, *Social Control and Socialization: a study of class differences in the language of maternal control* (1973), R. P. Neuman, "Masturbation, Madness, and the Modern Concepts of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J. Soc. Hist.*, 8 (1975), 1—27, 以及 Lloyd de Mause, ed.,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N. Y., 1974)。
7. Combe, *Life of Andrew*, pp. 8, 21.
8. 同上书, p. 4; Charles Mackay, "George Combe", in his *Forty Years' Recollections of Life* (1877), II, 241—270 at p. 245; Elizabeth Eastlake

- to Miss Laura Browne, Edinburgh, 5 Nov. 1842, in *Journals and Correspondences of Lady Eastlake*, ed. Charles E. Smith, (1895), I, p. 31; Robert Cooper, "Autobiographical Sketch", *National Reformer*, II (1868), 373.
9. Gibbon, *Life of Combe*, I, pp. 281—288; de Guistino, *Conquest of Mind*, p. 5. 所谓库姆缺乏色情倾向的说法被用作攻击他的社会观点的工具, 参见: A. J. Hamilton to Combe, 16 May 1824, Combe papers, NLS 7213/46—47; 以及 Elliotson, *Human Physiology* (5th ed. 1835), p. 1156n.
10. Combe, *Life of Andrew*, pp. 9—10; Gibbon, *Life of Combe*, I, pp. 9, 12—13, 37—42.
11. 认为宇宙学是有生命的, 因而会随着我们的变化而变化的观点见于道格拉斯著作; 例如, 也见: "Couvade and Menstruation", in her *Implicit Meanings* (1975), 60—72 at pp. 60—61; Walzer, "Puritanism as a Revolutionary Ideology", *History and Theory*, 3 (1963), 58—90。也见: Raymond Firth, "Religious Belief and Personal Adjustment", in his *Essays on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Values* (1964), 257—293。
12. Gibbon, *Life of Combe*, I, p. 16.
13. Martineau, *Autobiography* (1877), 3 vols; R. K. Webb, *Martineau* (1960); Bray, *Phases of Opinion and Experience during a Long Life: autobiography* [1888]; Giles St. Aubyn, *A Victorian Eminence: the life and works of Henry Thomas Buckle* (1958); J. D. Y. Peel, *Herbert Spencer: the evolution of a sociologist* (1971); *Diary of John Epps* [1870]; F. N. Egerton, "Hewett Cottrell Watson", *DSB*; 以及 *Life and Letters of William Ballantyne Hodgson*, ed. J. M. D. Meiklejohn (Edin., 1883).
- 335 14. Gibbon, *Life of Combe*, I, p. 16, 这是我强调的重点; 也见 p. 51, 以及他给罗伯特·钱伯斯的信, 引文见 pp. 296—297。
15. 同上书, I, p. 11。库姆在大概 10 岁时因为生病从他寄养的阿姨和叔叔家回到自己的家里。他在家里一直呆到 1812 年 24 岁。可能值得注意

- 的是他生病期间,他母亲的一个仆人对他说:“哦,孩子,你永远都不要结婚。”这反过来可能与库姆在婚前对施普茨海姆的信任有影响,当然也与他没有子女有关。同上书,p.284。
16. 同上书,I,pp.60—65,82; Combe, *Life of Abram*, p.22。但可参看在老罗伯特·考克斯于1815年去世之后他对姐姐安妮一家的亲近 (Robert, [Sir] James, and [Dr.] Abram Cox), 这记载于 Benjamin Wm. Crombie, “George Combe”, in *Modern Athenians* (Edin., 1882), 161—165。
17. Bruce Mazlish, *James and John Stuart Mill: father and s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75), p.57。
18. 参见: Martin Jay,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1973), p.126。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评价道,“她是英国少见的热心肠的母亲”,密尔也评价了可能对他自己生活产生影响的各种母爱,参见 Jack Stillinger ed., *The Early Draft of John Stuart Mill's Autobiography* (Urbana, Ill., 1961), p.184。关于对一位信奉加尔文教的母亲以及她与子女的关系稍微有点夸张的小说描述,参见 Charles Kingsley, *Alton Locke, Tailor and Poet: an autobiography* (1849), chap.1。
19. Mazlish, *James and John Stuart Mill*, pp.7—8 强调说,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很“关键”,“与阶级冲突一样重要”;也可参见 J. 汉伯格对马兹利什的评论,载于 *History and Theory*, 15 (1976), 328—341, 尤其是第335页。
20. Gibbon, *Life of Combe*, I, pp.94—95, 以及 Combe, *A System of Phrenology* (Edin., 1825) 的前言。后者在第二版时重命名为 *Essays on Phrenology* (Edin., 1819), 这本书在1836年出第四版时改成了两卷本,到1863年已出版第10版。
21. Gibbon, *Life of Combe*, I, pp.73—83, 171, 以及 II, p.5。关于他对自己早年论文的骄傲感和重视程度,参见前引书,I,p.99。
22. 同上书,I,p.75。关于莱尔,参见: Cannon, *Science in Culture*, p.151; 以及 R. Porter, “Charles Lyell: the public and private faces of science” (1980年打印稿)。关于罗伯特·钱伯斯承认“我从一开始就计

- 划成为中等阶级评论家”，参见：William Chambers, *Memoir of William and Robert Chambers* (Edin., 1884), p. 240。
23. 在“On the Philosophy of Dugald Stewart, Esq., and Comparison betwixt It and the System of Gall and Spurzheim”, *Lit. & Stats. Mag. Scot.*, 3 (Feb. 1819), 34—51 中显得有点少年老成。
24. “Materialism and Scepticism”, *Phren.*, I (1823/1824), p. 140.
25. Gibbon, *Life of Combe*, I, pp. 72—73。库姆是爱丁堡的科贝特俱乐部的成员, 1809 年, 他协助成立了靠近斯特林附近的一家科贝特俱乐部。当时也在爱丁堡学习医学的亨利·霍兰回忆了“每次在科贝特的《纪事》出版当天寻找和阅读它的迫切心情。”*Recollections of Past Life* (1872), p. 21 n.
26. Combe,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 (Edin., 1847; 4th ed. 1857), pp. xii, ix.
27. Carlyle, “Sign of the Times”, *Edin. Rev.*, 49 (1829), 439—459 at p. 442。也见: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1963), pp. 85—90。
28. 卡莱尔在 *Sartor Resartus* 中显然提出了象征符号起着隐藏和揭露两种作用的观点(参见: Raymond Firth, *Symbols Public and Private* [1973], p. 15); 特别提及象征符号的图示部分的, 参见 Barry Barnes, *Interests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1977), pp. 4—7 等处。在这方面同样有价值的是 Ian G. Barbour, *Myths, Models, and Paradigms: the nature of scientific and religious language* (1974), 尤其是 pp. 27—28, 69—70。
29. 参见 C. Hill, “William Harvey and the Ideal of Monarchy”, *Past & Present*, no 27 (1964), 54—72, 该文重刊于 Charles Webster, ed., *The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974), 160—181; 以及 Critchley, *Banquet of the Brain*。
30. 关于赞美头颅的部落例子(处于东非法帕民族的关键历史时期), 参见 Roy Willis, *Man and Beast* (1974); 关于工业化时期的英国, 参见 S. Shapin and B. Barnes, “Head and Hand: rhetorical resources in

- British pedagogical writing, 1770—1850”, *Oxford Rev. Educ.*, 2 (1976), 231—254; 也见: Alfred Sohn-Rethel,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1978)。
31. 参见 M. Neve and R. Porter, “Alexander Catcott: glory and geology”, *Br. J. Hist. Sci.*, 10 (1977), 37—60, esp. pp. 47—48。也见: R. Porter, “The Terraqueous Globe”, in Rousseau and Porter, *Ferment of Knowledge*, 285—324 中的第 300 页; 关于维多利亚时期受过教育的人中使用地质学分层来进行比喻, 参见 John Fowles,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1969) 第八章尤其是第 54 页的内容。
32. James Wilkinson, *The Human Body and Its Connexion with Man* (1851), p. 1, 他在同一段中把才智当作“符合官能的机器”。但在颇相学文献中只是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才正式使用这种想当然的比喻; 官能通常被描绘成力量, 但整体而言, 官能经常被当作一种“有组织的体系”, 比如 Spurzheim, *Elementary Principles of Education* (2nd ed., 1828), pp. 56—57。关于身体比喻, 富有刺激性和敏锐性的考察可参见 J. Miller, “The Dog beneath the Skin”, *Listener*, 88 (20 July 1972), 74—76; 以及 Mary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以及 *Natural Symbols*。
33. 参见 Piper, *Active Universe*, pp. 7—8; 也见: Donald A. Schon, *Displacement of Concepts* (1963), 尤其是第 144 页; 以及 J. C. Marshall, “Minds, Machines, and Metaphors”, *Soc. Stud. Sci.*, 7 (1977), 475—488。关于与结构有关的器官学说, 参见 H. Scott Gordon, “Alfred Marshal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as a Science”, in R. N. Giere and R. S. Westfall, eds., *Foundations of Scientific Metho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diana U. P., 1973), 234—258, 尤其是第 244 页内容; 以及 K. Deutsch, “Mechanism, Organism, and Society: some models in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 *Phil. of Sci.*, 18 (1951), 230—252。
34. 关于把身体作为机器的完美例证, 见 *London Med. & Surg. J.*, 4 (1835) 的卷首插图。关于被这种有机体观念所忽略的内容, 见 Mann-

heim, "Concept of State as an Organism", in *Essays* (1953), 尤其是第 177—178 页的内容。

35. 关于后者, 见 Désirée Hirst, *Hidden Riches: traditional symbolism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Blake* (1964), 第 10 章以及第 12 页内容。
36. 参见: George Canguilhem, *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 (2nd ed., Paris, 1972); Frank E. Manuel, "From Equality to Organicism", *J. Hist. Ideas*, 17 (1956), 54—69, 重刊于他的 *Freedom from History and Other Untimely Essays* (1972); K. Figlio, "The Metaphor of Organization: an historiographical perspective on the biomedical sciences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Hist. Sci.*, 14 (1976), 17—53; Cynthia Russett, *The Concept of Equilibrium in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New Haven, 1966); R. Cooter, "The Power of the Body: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in Barnes and Shapin, *Natural Order*, pp. 73—92。参考边沁取自于生物学比喻的“虚伪和奢靡”思想: Halévy, *Philosophical Radicalism*, p. 500。
37. R. M. Young, "The Development of Herbert Spencer's Concept of Evolution", *Actes du XI Congres International D' Histoire des Sciences* (Warsaw, 1967), II, 273—278 中的第 274 页。斯宾塞曾向《颅相学杂志》递交了关于各种颅相学官能的论文, 但是当时被拒绝录用; 这些论文随后发表在《活力论者》, I (1844), 369—385, 2 (1844), 186—189, 316—325。他所绘制的“头部图表”附录在他的《自传》(1904), II, pp. 540—543; 关于他初涉颅相学之事, 见 vol. I, pp. 200—203, 225—228, 540。也可参见他的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1855), p. 607; Peel, *Spencer*, pp. 10—11; 以及 Bernard Hollander, "Herbert Spencer as a Phrenologist", *Westminster Rev.*, 139 (1893), 142—154。关于圣西门得益于高尔, 见 B. Haines,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Biological, and Medical Thought, 1750—1850: Saint-Simon and Comte", *Br. J. Hist. Sci.*, 11 (1978), 19—35, esp. p. 20; 关于圣西门, 见: Frank Manuel, *The New World of Henri Saint-Simon* (Cambridge, Mass., 1956); 以及同作者的论文 "Henri Saint-Simon on the Role of

the Scientist”, in *Freedom from History*, pp. 205—218。关于孔德和颅相学,见:E. Littré, “Du tableau cerebral, ou modification apportée par M. Comte au system phrenologique de Gall”, in *Auguste Comte et la philosophie positive* (Paris, 1863), 538—552; Bernard Hollander, “Comte’s Analysis of the Human Faculties”, 重刊于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Nov. 1891, n. p.; John Ingram, *Human Nature and Morals According to Auguste Comte with Notes Illustrative of the Principles of Positivism* (1901), 这本书的很大篇幅用于讨论高尔的官能划分以及孔德对它们的依赖; J. Greene, “Biology and Social The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uguste Comte and Herbert Spencer”, in Clagett, *Critical Problems*, pp. 419—446, esp. pp. 425, 444, 453(格林在此处详细描述了孔德在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中几段论述高尔的内容)。关于孔德和 J. S. 密尔就颅相学产生的冲突,见:Iris W. Mueller, *John Stuart Mill and French Thought* (Urbana, Ill., 1956), pp. 107—112; 以及 Mazlish, *James and John Stuart Mill*, pp. 260—261。

38. 参见: N. J. Demerath and R. A. Peterson, eds., *System, Change, and Conflict: a reader on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the debate over functionalism* (1967); H. E. Barnes, “Representative Biological Theories of Society”, *Social. Rev.*, 17 (1925), 120—130, 182—194, 294—300; R. Harrison, “Functionalism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Genetic Psychol. Monographs*, 68 (1963), 387—423; D. Martindale, ed., *Functionalism in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strength and limits of functionalism in anthropology, economics,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Monograph 5,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hil., 1965); Emile Durkheim,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1893), trans. G. Simpson (1933, repr. 1964); A. R. Radcliffe-Brown, “The Concept of Function in Social Science”, in his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 (1952); Herbert Spencer, “The Social Organism”, *Westminster Rev.*, (1860), 重刊于他的 *Essays: scientific, polit-*

- ical, and speculative* (1901), I, 265—307; R. M. Young, “Functionalism” (1971 年打印稿)。
39. “Phrenology”, in his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Philosophy* (2nd, rev. ed., 1857), 629—645 at pp. 632, 640; 以及该书第三版(改名为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from Thales to Comte*, vol. I [1867], vol. II [1871])中本部分内容, II, 394—435, 尤其是 p. 410。(据推测,这一章是根据乔治·艾略特的主张来写的,但后来重新改写时扩成了现在的标题“Psychology Finally Recognised as a Branch of Biology: the Phrenological hypothesis.”)也见:Lewes, “Psychology: a new cerebral theory”, in his *Comte's Philosophy of the Sciences* (1853), 213—232。
40. “Phrenological Fallacies”, *Atlas*, 5 July 1829, 重刊于 *Works*, vol. 20, pp. 248—253。
41. 这个引人注目的非人类学的主张从历史角度看也值得怀疑(可以参看处于剧烈变动时期的俄国、古巴和中国的行为),该主张是由罗宾·霍顿提出的。“African Traditional Thought and Western Science”, *Africa*, 37 (1967), 重刊于 M. D. F. Young, ed., *Knowledge and Control* (1971), 206—288, at p. 224。
42. “Fourier's Theory”, *Democratic Review*, I (Mar 1850), p. 383。尽管傅立叶相信,他所写的所有事情都来源于他自己的头脑(参见:David Zeldin, *The Educational Ideas of Charles Fourier* [1772—1837] [1969], pp. 13—14),但他对“官能”的使用无疑起源于颅相学。鉴于我们对颅相学调解作用的阐释,那种认为傅立叶是“泰勒主义”先驱的说法就因为他的观点产生于“工人的心智之中”而得到了强化,参看 J. Beecher and R. Bienvenu, *The Utopian Vision of Charles Fourier* (1972), p. 46。
43. 这是新欧文主义杂志 *Spirit of the Age* (1848—1849)的题词,该杂志由 G. J. 霍利约克编辑。
44. Pope, *Essay on Man*, IV, II, 49 ff., 转引自 Arthur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1936; Cam-

- bridge, Mass., 1957), p. 206。W. F. Bynum,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fter Forty Years: an appraisal", *Hist. Sci.*, 13 (1975), 1—28, 对洛夫乔伊的概念不加批判, 但对于英国的背景比较有用。
45. 关于作为内聚机制的劳动分工, 见: Durkheim, *Division of Labour*, pp. 54—63。对于涂尔干来说, 劳动分工的扩大是进步的动力, 因为在社会大众分裂之后, 它起到了建立平衡的作用(同上书, p. 270)。
46. 见: Combe, "Letter on the Functions of Concentrativeness", *Phren. J.*, 2 (1824/1825), 246—250。关于颅相学术语, 见上引书, 第三章注释 35; 颅相催眠术将成为无以计数的追加名词的来源: 比如, 美国人拉罗伊·桑德兰在他的 *New Theory of Mind: Pathetism* (Boston and London, 1851) 中又在其他器官中增加了主管“满意、谦虚和虔诚”的器官。(桑德兰通常被认为是 1841 年前后把颅相学和催眠术联系起来的第一人。)
47. Shapin, "Phrenological Knowledge", pp. 239—240; and idem, "Politics of Observation", pp. 149 ff。除了上文中提及的对前窦进行争论(第一章, 注释 45, 47)的资料之外, 还可见: Thomas Stone, "On the Frontal Sinus", *Edin. New Phil. J.*, 14 (1833), 82—89; George Murray Humphry, *A Treatise on the Human Skeleton* (Cambridge, 1858) 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看法。颅相学家认可, 精神器官并不局限于大脑表层(见 Spurzheim, *Physiognical System*, p. 239), 但他们断言, 正是大脑表层代表了观察力。
48. R. Macnish, *Introduction to Phrenology*, p. 17。
49. 见: Robert J. Lifton, *Boundaries: psychological man in revolution* (N. Y., 1970), pp. 54—55, 85; R. Firth, *Essays*, p. 234; C. Geertz, "Ideology as a Cultural System", p. 61; Douglas, *Natural Symbols*, p. 98; 以及 Malinowski, *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p. 101。
50. 这个标题后来改为 *The Constitution of Man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External Objects*; 在美国出版的学校版(1836 年出版于奥尔巴尼)把后半部分标题改为……*in Relation to the Natural Laws*, 卡斯尔于 1893 年在纽约再版该书时用的就是后面这个修改过的标题。本书除非特

别标明,参考的都是该书于 1836 年出版的第 6 版。

51. “The Excursion”, *Peotical Works*, ed. T. Hutchinson, rev. ed. edited by E. de Selincourt (Oxford, 1978), p. 590。认为人的外部特征与内在心智特征恰好相符的观点(尤其是当人们根据生理部件来构想大脑的时候)显然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观点,而且与 13 世纪的艾伯特斯·马格纳斯关于微观世界—宏观世界的观点有关联。关于丘吉尔和牛顿的神经感应,分别见:Geertz, “Ideology as a Cultural System”, p. 72; F. Manuel, *Newton*, pp. 49—51, 66, 以及 R. S. Westfall, “Newton and Order”, in Paul G. Kuntz, ed., *The Concept of Order* (1968), 77—88。关于那些把自己构想的社会戏剧完全同形地透射到现实中去、充当着政治形而上学者的思想家等等,见:Lewis S. Feuer, *Ideology and the Ideologists* (Oxford, 1975), esp. p. 103。
52. 关于该书的销售信息来源于各类版本的广告,也源于 Gibbon, *Life of Combe*, I, pp. 262—263, 306, II, p. 274。
53. 关于这些书籍的销售,分别见:R. M. Young, “The Impact of Darwin on Conventional Thought”, p. 16; Charles Gillispie, *Genesis and Geology*, pp. 163, 172; R. K. Webb,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Reader, 1790—1848* (1955), p. 38; Richard Altick,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pp. 70, 390。关于一本“有影响的书籍”所具有的象征意义的思考,见:Owen Chadwick, *Secularization*, pp. 171 ff。佩利(Paley)的《证据》(*Evidences*)可以用来进行进一步的比较,该书在 1794 年到 1830 年间达到了巅峰,共出版了 29 版,但之后就迅速过时,某种程度上它是被它的库姆式修正所取代的:Hamish Swanston, *Ideas of Order* (Assen, 1974), pp. 5—6。
54. William Harral Johnson, “Death of Mr. George Combe”, *Investigator, a Journal of Secularism*, 5 (1858), p. 93; 马蒂略在论文“库姆”的第 265 页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而且莫利、查尔斯·麦凯等人也都重复了这种看法。也见:罗伯特·钱伯斯在“George Combe”, *The Book of Days* (Edin., 1864), II, 213—214 中写给库姆的颂词。
55. “Combe’s Moral Philosophy”, *Spectator*, 10 Apr. 1841, p. 351.

56. “Combe”, p. 276; 也见: *Life and Letters of W. B. Hodgson*, p. 13。关于 339
于把库姆与冯·洪堡匹配成对的恰当性, 见: Cannon, *Science in Culture*, chap. 3: “Humboldtian Science”。
57. Morley, *Cobden I*, p. 93; Martineau, “Combe”, p. 273。也见: “Mr. George Comb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suppl., 28 (Aug. 1858), 203—204; and William Jolly, ed., *Education: it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as developed by George Combe* (1879), p. v.。乔利和查尔斯·吉本一样, 也感觉到库姆在当时不太为人(尤其是“他为之作出杰出贡献的那个阶级”)所了解和欣赏。马蒂诺向库姆坦承, “我完全不相信颅相学。……但是我阅读你论述你的‘科学’的每一句话时都感到很舒服”(Letter to Combe, 24 Sept. 1841, Combe Papers, NLS 7261/58), 美国的爱默生和钱宁也有同感(见: T. Stoehr, “Physiognomy and Phrenology in Hawthorne”, p. 363), 但是对于库姆的大多数读者来说, 《人类体格》使人们非常认真地对待颅相学(举例来说, 上文所引的索菲娅·皮博迪·霍桑的反应, p. 359n.)。对于资产阶级理论家来说, 个人关于颅相学的观点也没有阻碍他们在条件适宜的情况下公开依赖这门科学; 例如, 马蒂诺在她的 *Household Education* (1849), p. 259 中就利用了颅相学的权威性, 在她和 H. G. 阿特金森合著的 *Letters on the Laws of Man's Nature and Development* (1851) 中也大量依赖这门科学。根据她的哥哥詹姆斯的建议, 1830 年她让人解读了她的头颅, 随后又让德维尔* 和 J. D. 霍尔姆* 解读了她的头颅: *Autobiography*, I, pp. 393—396; Webb, *Martineau*, p. 247; and V. K. Pichanick, *Harriet Martineau* (Ann Arbor, Mich., 1980), pp. 183—197。她对颅相学的信仰由于她在 1844 年的催眠体验而得以强化; 见她的 *Letters on Mesmerism* (2nd ed., 1845) 的“附录”, pp. 67—70。
58. *Constitution of Man*, pp. 95, 211—212, 218—219 等处, 以及 1855 年版 p. 59; Letter to Welsh, 26 June 1825, 转引自 Gibbon, *Life of Combe*, I, p. 182。
59. *Constitution of Man* (1st ed., Edin., 1828), p. 204。斯宾塞在 *The Data of Ethics* (1879), pp. iii—iv 中解释道, 从 1842 年开始, 他的写作

目标就是使道德神圣化或使它在世俗世界中获得威望。关于库姆把天性与道德相关联的背景,见 Basil Willey,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ackground* (Harmondsworth, 1972) 后面几章内容。

60. *Constitution of Man*, p. 52; 也见: pp. 66—69。

61. 尤其要参看第五章和第六章,“To What Extent Are the Miseries of Mankind Referable to Infringement of the Laws of Nature?”以及“On Punishment”。

62. 例如,可见 William Scott, *Remarks on Mr. Combe's Essay on the Constitution of Man, and Its Relation to External Objects* (Edin., 私人传阅版本, 1827); [Alexander Smith], “Phrenological Ethics”, *Edin. Rev.*, 74 (1842), 376—414 at p. 403; “Mr. Combe's Constitution of Man Regarding the Efficacy of Prayer”, *Macphael's Edin. Eccles. J.*, 14 (1853), 27—34 at p. 27; “Mr. G. Combe on Education”, *Free Church Mag.*, 5 (1848), 33—36 at p. 33; “The Constitution of Man, 4th edition”, *Br. & For. Rev.*, 12 (1841), 142—80, at p. 172; J. L. Murphy, “Phrenology”, in his *Essay Towards a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 (1838), pp. 53 ff. 关于库姆利用自然法则的通俗例证,见: Edwin Lunn, *A Lecture on Prayer, Its Folly, Inutility, and Irrationality* (Manch., 1839), p. 5; John Scott, * *Scott's Popular and Scientific Lectures* (1850), pp. 3 ff.

63. *Vestige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 (2nd ed., 1844), pp. 333—334, 转引自 Young, “Impact of Darwin on Conventional Thought”, p. 17. 钱伯斯在 1834 年听了库姆的讲座之后信奉颅相学, 1836 年他给库姆提供了一份关于颅相学价值的证明。见: de Giustino, *Conquest of Mind*, p. 52; *Testimonials to Combe*, p. 55. Adam Sedgwick 在 *Vestiges in Edin. Rev.*, 82 (1845), 11 上评论道, 该书作者认为“高尔和施普茨海姆是自柏拉图以来唯一的精神哲学家”; 其他人也如此认为, 这也是人们普遍认为库姆是该书作者的原因。

64. Whewell, *Astronomy and General Physics Considered with Reference to Natural Theology* (1833; 1852), pp. 5—6; Lewes, “What Are the

- Laws of Nature?" in his *Problems of Life and Mind* (1874), I, 307—313, 该文最初发表于他的著作 *Comte's Philosophy of the Science* 340 (1853), 51—57; Carpenter, "Man the Interpreter of Nature" (这是1872年在英国协会发表的主席演讲), 以及 "Nature and Law", *Modern Rev.* (Oct. 1880), 这两篇文章都重刊于该作者的 *Nature and Man* (1888); T. H. Huxley, "Scientific and Pseudo—Scientific Realism", and "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 这两篇文章都重刊于 *Collected Essays*, vol. 5, *Science and Christian Tradition* (1904), esp. pp. 79, 108. 关于后者, 也见: O. Stanley, "T. H. Huxley's Treatment of 'Nature'", *J. Hist. Ideas*, 18 (1957), 120—127.
65. *Nature; the Utility of Religion; and Theism* (2nd ed., 1874), p. 14. 也见 E. Zilsel, "The Genesis of the Concept of Physical Law", *Phil. Rev.*, 51 (1942), 245—279. 边沁和激进哲学家们关于自然法则及其模糊性的思想, 见: Halévy, *Philosophical Radicalism*, pp. 489 ff.。
66. 关于教育与天性之间著名的对比, 见: E. R. Dodds, *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 (Berkeley, Calif., 1951), pp. 182 ff., and Mary Douglas, *Cultural Bias* (1978), pp. 22 ff.; 关于人类有着把道德法则当作终极裁判者的强迫性心理冲动, 见: Leszek Kolakowski, "The Priest and the Jester", in his *Marxism and Beyond: on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and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trans. J. Zielonko Peel (1968), p. 29.
67. *Constitution of Man*, pp. 95—96.
68. 同上书, (6th ed., 1836), pp. 249, 254. 库姆对罪犯的改造方法更全面地体现在下列著作中: Combe and C. J. A. Mittermaier, "On the Application of Phrenology to Criminal Legislation and Prison Discipline", *Phren. J.*, 16 (1843), 1—19; Combe, *Remarks on the Principles of Criminal Legislation, and the Practice of Prison Discipline* (1854), 这是对他的论文 "Criminal Legislation and Prison Discipline", *Westminster Rev.*, n. s., 5 (1854), 409—445 的重新改写; 作者同前, "Prison Discipline", *Illus. London News*, 25 (5 Aug. 1854), 114; 作者同前, *Penal Colonies: the management of prisoners in the*

- Australian colonies* (Edin., 1845); 作者同前, “Instances of Successful Moral Treatment of Criminals”, *Phren. J.*, 18 (1845), 205—209。
69. 在用大字号印刷的第 1 版中, “惩罚”部分只占了 5 页, 到 1836 年该书第 6 版时, 该部分却在字体很紧密的情况下占了 27 页。
70. 当然, 颅相学以及颅相学著作对于犯罪的兴趣也是一样, 比如可以参看: “Result of an Examination, by Mr James De Ville, of the Heads of 148 Convicts on the Convict Ship England, When About to Sail for New South Wales in the Spring of 1826”, *Phren. J.*, 4 (1826/1827), 467—471; G. S. MacKenzie, *Documents Laid before Lord Glenelg* ([Edin.], Apri. 1836); Marmaduke B. Sampson, *Criminal Jurisprudence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Mental Organization* (1841; 3rd ed., 1851); 作者同前, “Phrenology in Its Application to the Treatment of Criminals”, *Lancet*, 5 and 12 Feb. 1842, pp. 639—643, 672—677; 作者同前, *The Phrenological Theory of the Treatment of Criminals Defended in a Letter to John Forbes* (1843)。斯坦利勋爵对于颅相学鉴别罪犯的兴趣以及这门科学对那些处理罪犯问题的人产生影响的一个例证, 见: Walter Lowe Clay, *The Prison Chaplain: a memoir of the Rev. John Clay, B. D.* (Cambridge, 1861), p. 569。
71. 关于福柯的概要和介绍, 见: Edith Kurzweil, *The Age of Structuralism: Levi-Strauss to Foucault* (N. Y., 1980), esp. p. 113。
72. 库姆从他在纽约和伊利诺伊州铁路的投资中每年获利 200 多英镑: de Giustino, *Conquest of Mind*, pp. 4—5。关于铁路财政、银行和投资的信件在库姆文件中非常多。
73. *Constitution of Man*, p. 214。
74. 同上书, pp. 215—228。
75. 见: Herbert Marcuse, “The Affirmative Character of Culture”, in his *Negations*, 88—133, 参看 p. 90。
76. 在这方面, 库姆的《人类体格》和 J. R. 凯[—夏特沃思](J. P. Kay [—Shuttleworth])的《工人阶级的道德和身体状况》(*The Mor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Employed in the Cotton Manu-*

facture in Manchester, 1832) 以及其他无数类似的著作比较相似。关于凯—夏特沃思的书籍, 见: R. Johnson, "Education Policy and Social Control in Early Victorian England", *Past and Present*, no. 49 341 (1970), 重刊于彼得·斯坦利 (Peter Stanley) 编辑的 *The Victorian Revolution* (N. Y., 1973), 199—229, 参看 p. 205。其他与此不同但却有用的比较, 见: Eugene Genovese, "In the Name of Humanity and the Cause of Reform", in his *Roll Jordan Roll: 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 (1975), 49—70; and J. Stauder, "The 'Relevance' of Anthropology to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Rad. Sci. J.*, (1974), 51—70, esp. p. 64。

77. 见: G. Lichtheim,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History and Theory*, 4 (1965), 164—195, esp. pp. 167—169; Leiss, *Domination of Nature*, pp. 148—151; L. R. Kass, "The New Biology: what price relieving man's estate?" *Science*, 174 (19 Nov. 1971), 781—782。
78. 1831 年库姆担任爱丁堡改革同盟的秘书; 在 "Parliamentary Reform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the Moral and Intellectual Improvement of the People", *Phren. J.*, 7 (1831/1832), 118—131, 587—597, 以及为 E. P. Hurlbut 的著作 *Essays on Human Rights and Their Political Guaranties* (Edin., 1847) 所写的序言和注释, 在他的 *Our Rule in India* (Edin., 1858) 等著作中, 库姆坦率地谈到了他对社会政治改革的兴趣。1830 年 11 月, 他曾考虑创办一份政治杂志, 以便在《人类体格》(但不包括颅相学) 的基础上 "自由讨论政治、政治经济学和宗教" (A. C. Grant, "George Combe and Circle", p. 108)。在 1834 年成为《伦敦信使报》驻爱丁堡的通讯员之前, 库姆是这么对该报编辑清楚地说明他的政治观点的: "我倾向于辉格派, 我非常喜欢现在的政府; 但是在许多方面, 我对人民的偏爱会超过他们通过其公共政策而让我对他们产生的好感, 但我希望不会超出他们想要达到的程度。我对人性的观点是, 人所需要的东西, 第一是知识, 第二是在他们能够被委以权力或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让他们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之前, 对他们的道德和心智官能进行训练; 但是我相信人作为一个整体, 一旦受到

启蒙训练,将会走上正道并增加他们自己的幸福;因此,我认为必须推翻所有假装永久统治人们思想和人类财产的教会和寡头政治,但在通过上述方式使人民获得理性之前,不能这么做。因此我倡导非常自由主义的观点,作为最终能够实现的原则,但是对于时间和手段,我比较温和”;转引自 Gibbon, *Life of Combe*, I, p. 302, 也见该书 I, p. 243 描述他崇拜沃特利的政治经济学,该书 II, p. 213 描写他和 J. R. 麦卡洛克关系密切,以及 II, p. 244 描写他和威廉·埃利斯的友谊。

79. 参看: Lukacs, *Class Consciousness*, esp. p. 234; Alfred Schmidt, “The Mediation of Nature through Society and Society through Nature”, in his *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 (1971), 63—93; Raymond Williams, “Ideas of Nature”, *Times Lit. Supp.*, 4 Dec. 1970, pp. 1419—1421; R. M. Young, “Evolutionary Biology and Ideology: then and now”, *Science Studies*, 1 (1971), 177—206, 重刊于 Watson Fuller, ed., *The Biological Revolution: social good or social evil?* (N. Y., 1972), 241—282; R. M. Young, “The Human Limits of Nature”, in Jonathan Benthall, ed., *The Limits of Human Nature* (1973), 235—274。

80. 见: A. C. Grant, “Combe and the 1836 Election”, p. 177。

81. *Constitution of Man*, p. 73。关于 19 世纪对待无神论的态度,见: J. M. Robertson, *A History of Free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29), pp. 70—202。

82. [*Lectures on*] *Moral Philosophy; or the duties of man considered in his individual, social, and domestic capacities* (Boston and Edin., 1840; 1893), p. 95。也见: *Constitution of Man*, chap. 9,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Scripture”。

83. 关于查默斯的政治经济学,参见其 *On Political Economy in Connexion with the Moral State and the Moral Prospects of Society* (Glasgow, 1832) 以及 *The Christian and Civic Economy of Large Towns* (Glasgow, 1826)。关于他对人在自然中的地位问题的辩论所作出的贡献,见: R. M. Young, “Malthus and the Evolutionists: the common con-

- text of biological and social theory”, *Past and Present*, no. 43 (1969), 109—145, esp. pp. 120—125。也见：[John Minter Morgan], *The Critics Criticised: with remarks on a passage in Dr. Chalmers’ s Bridgewater Treatise* (1834)。
84. Combe,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 (Edin., 1847), pp. 37—39. 库姆在阅读了查默斯的布里奇沃特论文之后写给后者的信中暴露了他在有些方面的幼稚：转引自 Gibbon, *Life of Combe*, I, p. 276。 342
85. 见：Corsi, “Natural Theology”；以及 J. H. Brooke, “The Natural Theology of the Geologists: some theological strata”, in L. J. Jordanova and Roy Porter, eds., *Images of the Earth* (Br. Soc. Hist. Sci. Monographs, 1979), 34—64。
86. 这是 E. P. 汤普森的用语：“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 pp. 60—61。
87. 可参看 17 世纪的情形，那时在清教派别与其国教对手之间，上帝和自然都成为双方争夺合法性的源泉，见 S. Shapin, “Social Uses of Science”, in Rousseau and Porter, *Ferment of Knowledge*, 93—139。
88. Gibbon, *Life of Combe*, I, pp. 181 ff. 见：William Gillespie, *An Exposure of the Unchristian and Un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Set Forth in Mr. George Combe’ s Work Entitled “The Constitution of Man...”*; being an antidote to the poison of that publication (Edin., 1836; 2nd ed., 1836); Joseph S. Hodgson, *Consideration of Phrenology in Connexion with an Intellectual, Moral, and Religious Education* (1839); C. J. Kennedy, *Nature and Revelation Harmonious: a defence of scriptural truths assailed in Mr. George Combe’ s work on “The Constitution of Man”* (Edin., publish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Scottish Association for Opposing Prevalent Errors, 1846), 库姆在 *Answer [to] the Attack...* (Edin., 1848; 1857) 中对此作了回击；M. Ryan, “Physiology, Phrenology, Materialism, Immateriality of the Mind”, 44—51; “Combe’ s Constitution of Man”, *Presby. Rev.*, 9 (1936), 92—118; “Mr. George Combe and the Philosophy of Phrenology”, *Fraser’ s*

Mag., 22 (1840), 509—520; “Phrenology”, *Christian Remembrancer*, 6 (1843), 661—676; “Combe’s Reply to Kennedy’s Nature...”, *United Presby. Mag.*, 2 (1848), 64—68; William Scott, *A Few Last Words to Mr. Combe on the Subject of His Essay on the Natural Laws* (Edin., 1828); 作者同前, *The Harmony of Phrenology with Scripture: shown in a refuta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errors contained in Mr. Combe’s “Constitution of Man”* (Edin., 1836)。也见:前面的注释 62。这些还仅仅是从宗教的角度对《人类体格》进行的攻击。

89. 关于查默斯对颅相学的兴趣,见:Gibbon, *Life of Combe*, I, p. 135。关于韦尔什,见本书第一章注释 31。关于颅相学和苏格兰福音派,见保罗·巴克斯特于 1979 年 7 月递交给达勒姆《英国科学社会史》杂志的论文“Combe, the Constitution of Man, and the Churches”以及该作者于 1980 年 4 月递交给巴斯《英国科学社会史》杂志的论文“Natural Laws and Divine Judgements: some reflections on Scottish natural theology”。库姆在格林诺赫技工学院演讲过之后,查默斯拒绝在那儿演讲,以免别人认为他赞成库姆的观点:W. Hanna,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Thomas Chalmers* (Edin., 1849—1852), IV, pp. 205—211。

90. Scott, *Remarks on Constitution of Man*.

91. Adam Rushton, *My Life as Farmer’s Boy, Factory Lad, Teacher, and Preacher* (Manch., 1909), p. 50。1837 年,拉什顿(Rushton)作为一所卫理公会主日学校的图书管理员,曾经对允许这本书上架横加责难。

92. 最典型的例子是 J. W. Draper, *History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 (1875); and A. D. White, *History of the Warfare of Science with Theology* (1896)。也见:John T. Merz, *A History of European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 Scientific Thought* (1896); John B. Beard, *Religion, Science, and Orthodoxy: their real nature and reciprocal relations* (Manch., 1861); Thomas Dick, *The Christian Philosophers; or the connection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 with religion*, 2 vols. (Glasgow, 1869); and J. Y. Simpson, *Landmarks in the*

Struggle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 (1925)。较为有用的二手资料有 Joseph Needham, ed., *Science, Religion, and Reality* (1925); Budd, *Varieties of Unbelief*; and Chadwick,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his *Secularization*, chap. 7。

93. 这个词语出自 Beatrice Webb, *My Apprenticeship* (1926), p. 83, 转引自 Frank M. Turner,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 the reaction to scientific naturalism in late Victorian England* (New Haven and London, 1974), p. 12。《天地万物自然沿革的痕迹》对自然神学想要起到的调和作用进行了嘲笑,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围绕着《天地万物自然沿革的痕迹》的争论,关于这种争论,见:Brooke, "Natural Theology", p. 50。关于人们对《天地万物自然沿革的痕迹》的反应,见:Gillispie, *Genesis and Geology*, pp. 156—157。R. Moore, *Post Darwinian Controversies* (1980)是对围绕着达尔文主义的争论所作的最新阐释,但不太令人信服。 343
94.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 (1847), p. 37。这个小册子最初发表于1847年的《颅相学杂志》(20 [1847], 193—239);1857年出版第9版时,和库姆未刊印刷本《对自然宗教的探究》(*An Inquiry into Natural Religion, Its Foundation, Nature, and Application*, Edin., 1853) [Combe Coll., NLS]合并在一起,以《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The Rela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为题,献给查尔斯·麦凯(Charles Mackay)。到1872年该书出版317页的第5版时,在自由思想家们看来,库姆在世俗教育和清除“天意的妄想和祈祷的功效”方面作出的贡献,除了罗伯特·欧文之外,无人望其项背;J. M. Wheeler,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Freethinkers* (1889), p. 85。
95. 可参考 F. V. Konstantinov et al., "Science: its place and role in the life of society", in *Fundamentals of Marxist-Lennist Philosophy*, trans. R. Daglish (Moscow, 1974)中体现出的极端实证主义者的观点;也可参考 W. R. Comstock, "Consciousness, Purpose, and Mystery" [review of Harold Schilling, *Science and Religion and The New Consciousness in Science and Religion*], *Zygon*, 12 (1977), 390—412, esp.

- p. 392; and John Skorupski, *Symbol and Theory: a philosophical study of theories of religion in social anthropology* (1976), pp. 2, 18.
96.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1904—1905; trans. T. Parsons, N. Y., 1930). James L. Peacock, *Consciousness and Change* (Oxford, 1975), pp. 184—195 为我了解加尔文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也见: R. H. Tawney, “Calvin”, in his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1926; 1975), 111—139; and David 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Cambridge, 1969), pp. 21—24.
97. 见: Alan Macfarlane, *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Oxford, 1978)。
98. *Rela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 p. 12.
99. Cobden to Combe, 1 Aug. 1846, 转引自 Gibbon, *Life of Combe*, II, p. 218。由于《人类体格》中有着大量从颅相学角度对棉纺织厂主进行的讽刺, 科布登在阅读该书之后宣称, 这可以称得上“是他自己类似思想的抄本”。他在组建曼彻斯特颅相学学会时起到了关键的领导作用, 而且一直是该协会的顾问, 还从埃及和世界各地把颅骨寄给协会。他相信颅相学是在 1836 年库姆为他详细描绘了他的头部并发现了他所宣称的崇拜官能之后。10 年以后, 他向库姆承认, “那是颅相学的胜利, 因为你可能根本没有从我这儿听到或者看到的任何事物中形成这样的观念”: 转引自 Gibbon, *Life of Combe*, II, 218。也见: Morley, *Cobden*, I, p. 93; and de Giustino, *Conquest of Mind*, pp. 203—204。

第五章 偷猎者变成猎场管理员: 无处不在的颅相学家

1. II, p. 4.
2. 可特别参考: J. Harrison, *Second Coming*; and L. Barrow, “Socialism in Eternity: the ideology of plebeian spiritualists, 1853—1913”, *Hist. Workshop J.*, 9 (1980), 37—69。

3. J. E. “Shepherd” Smith, “Phrenology”, *Shepherd*, 1 (15 Nov. 1834), 90—92 at p. 90; “Phrenology”, *Bolster’s Q. Mag.*, 1 (May 1826), 179—186 at p. 179; “Lectureship of Phrenology”, *J. Health & Dis.*, 1 (1846), 232; *Morning Advertiser*, 28 Nov. 1848, q. in *J. Health & Dis.*, 4 (1848), p. 78; Thomas Morgan, “Letter to H. C. Watson on the History and Statistics of Phrenology in Southampton”, *Phren. J.*, 10 (1836/1837), 520—525 at p. 524; *ibid.*, 4 (1826/1827), pp. 154—155; Martineau, “Combe”, p. 270.
4. “Combe’s Moral Philosophy”, *Spectator*, 10 Apr. 1841, pp. 351—353 at p. 351.
5. [J. T. Smith], “Progressive Diffusion of Phrenology”, pp. 407—408. 安德鲁·库姆发现, 颅相学的器具在伦敦也同样流行, 他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迹象, 它反映了人们的思想”。见: “Phrenology”, p. 193.
6. “Phrenology and Politics”, *New Monthly Mag.*, 35 (Nov. 1832), 487—488; “Phrenology: its utility and importance”, *Farrier and Naturalist*, 1 (Jan. 1828), 34—35; Edward Jarman Lance, *The Golden Farmer; being an attempt to unite the facts pointed out by Nature in the sciences of geology, chemistry, and botany, with practical operations of husbandmen... increase the employment of the labourer* (1831), frontispiece; *Non-Phrenological Essay* 是由 H. H. Jones 牧师撰写的。关于无意识地应用颅相学词语, 见: Alexander Somerville, *Autobiography of a Working Man* (1848), p. 289; J. D. Burn, *The Autobiography of a Beggar Boy* (1855), pp. v, 20; Thomas Low Nichols, *Nichols’ Health Manual; being also a memorial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Mrs. Mary S. Grove Nichols (1810—1884)* (1887). *passim*. 344
7. 此话出自曼彻斯特的公理会牧师 J. W. 梅西 (J. W. Massie) 之口, 原文出处见 *Manchester Guardian*, 20 Dec. 1843, 转引自 *Phren. J.*, 17 (1844), 212。这个断言是正确的, *Manchester Guardian*, *Wolverhampton Chronicle*, *Lincoln Mercury*, *West Briton and Nottingham Review*, *Preston Chronicle*, *Reading Mercury*, *Sheffield Independent* 以及 *Dumfries Cour-*

- ier 等报纸杂志发表了许多支持这门科学的文章。由库姆的朋友兼同事的查尔斯·麦克拉伦编辑出版的《苏格兰人》(*The Scotsman*), 被威廉·汉密尔顿爵士称为“颅相学家的报纸”, 有一次库姆还亲自担任编辑; 库姆自己也定期为《伦敦信使报》(*London Courier*) 写稿。 *Tyne Pilot* 由约翰·康农* 编辑, *Coventry Herald and Observer* 由查尔斯·布雷* 编辑。好几位颅相学家为《旁观者》写稿, *Chesterfield Gazette* 的编辑 H. D. 英格利斯还出版了 *A Lecture upon the Truth, Reasonableness, and Utility of the Doctrines of Phrenology* (1826)。
- 8.1 (4 Mar. 1843), p. 57.
9. Alexander Taylor, “Dundee Mechanics’ Phrenological Society”, *Phren. J.*, 3 (1825/1826), 456—458 at p. 456. 关于其他类似的群体, 参见下文。
10. J. C. James, *Thoughts on Phrenology; being a brief dissertation on the principles and progress and tendency of that science* (1836), p. 26.
11. *Necessity of Popular Education, as a National Object* (Edin., 1834), p. 20. 利·亨特评论道, 这本著作是“每一个热爱其种族并买得起该书的人所不可缺少的”; *Analyst*, 2 (1835), 413n. 也可以在 Henry Parr Hamilton 的著作 *The Education of the Lower Classes: a sermon* (2nd ed., 1841) 或者 J. P. Kay [—Shuttleworth] 的著作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in Manchester* 中发现类似观点, 而后者作为辛普森的朋友和教育家同事, 无疑激励了辛普森。
12. *Phren. J.*, 11 (1838), 222; Samuel Laing, *Atlas Prize Essay, National Distress: its causes and remedies* (1844), p. 19; Combe, q. in Gibbon, *Life of Combe*, I, p. 302 (此话全文参见本书第四章注释 78)。
13. 斯特利布里奇技工学院在 1838 年文学哲学研究协会解体时全部接收了该协会的 33 名成员, 同时接收的还有“两副人头骨, 14 个石膏模型, 以及颅相学书籍”。引自 Mabel Tylecote, *The Mechanics’ Institute of Lancashire and Yorkshire before 1851* (Manch., 1957), p. 243n.。
14. 第 334 页。
15. 出自: the Rev. John Davies, *An Estimate of the Human Mind* (1828),

- I, p. 6. 关于“实用知识传播学会(SDUK)”, 见: F. A. Cavenagh, “Lord Brougham and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J. Adult Educ.*, 4 (1929), 3—37; Monica C. Grobel, “The SDUK, 1826—1846”, M. A. thesis, London, 1933; J. N. Hays, “Brougham’s Society”; Elaine A. Storella, “‘O, What a World of Profit and Delight’: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Ph. D. thesis, Brandeis, 1969; J. G. Crowther, “Henry Brougham, 1778—1868”, in his *Statesmen of Science* (1965), 7—73; Chester New, *The Life of Henry Brougham to 1830* (Oxford, 1961), chaps. 17, 18; R. K. Webb, *Working Class Reader* (1955), esp. chaps. 3, 4; and David Vincent, *Bread, Knowledge, and Freedom: a study of nineteenth-century working class autobiography* (1982)。
16. 见: S. Shapin and B. Barnes, “Science, Nature, and Control: interpreting mechanics’ institutes”, *Social Stud. Sci.*, 7 (1977), 31—74, esp. at p. 46。也见: L. Stone, “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 *Past & Present*, no. 42 (1969), pp. 69—139 at p. 91; 也可比较 345 E. P. Thompson, “Patrician Society, Plebeian Culture”, *J. Soc. Hist.*, 6 (1974), 382—405 at p. 383。
17. Gibbon, *Life of Combe*, I, p. 254; *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Edinburgh School of Arts for 1825—1826*, 转引于 W. H. Marwick, “Early Adult Education in Edinburgh”, *J. Adult Educ.*, 5 (1932), pp. 389—404 at p. 393; and H. C. Watson, *Statistics of Phrenology*, p. 41。同样也值得注意的是, 在“实用知识传播学会”的刊物《教育季刊》(*Q. J. Educ*)从 1831 到 1835 年的 10 卷中完全没有提到颅相学。
18. Vol. XI, pp. 49—50。
19. 转引自 Gibbon, *Life of Combe*, I, p. 234。作为爱丁堡颅相学学会会员之一, 弗雷泽也进了库姆、霍奇森、S. 史密斯、辛普森、J. P. 尼科尔、彼得·默里以及成立于 1832 年的“爱丁堡实用有趣科学指导协会 (the Edinburgh Association for Providing Instruction in Useful and Entertaining Sciences)”中的颅相学教育家的圈子。见 S. Shapin, “‘Nibb-

ling at the Teats of Science'; Edinburgh and the diffusion of science in the 1830s", in Inkster and Morrell, *Metropolis and Province*, pp. 151—178.

20. "Henderson's Bequest", *Phren. J.*, 7 (1831/1832), 656; and Gibbon, *Life of Combe*, I, pp. 256—259.

21. 同上书, I, p. 263n., 以及该书第 5 版和第 6 版的广告。

22. 詹姆斯·E. “牧羊人”史密斯就是这样一位兜售者, 他是加尔文教徒培养出来的招魂术追求者, 曾主编欧文主义者的 *Crisis* 杂志和后来的 *Family Herald* 杂志。见: W. Anderson Smith, "Shepherd" Smith, *the Universalist: the story of a mind* (1892), p. 191.

1848 年 4 月 10 日宪章运动者示威之后, 有些教育家放弃了科学教育, 转而致力于(或者回归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公开教育, 例如, 可参见: 哈里雅特·马蒂诺和查尔斯·奈特(Charles Knight)于 1848 年四五月间编辑的《人民之声和工业的权利》(*The Voice of the People and the Rights of Industry*), 以及查尔斯·金斯利等人在 1848 年五六月间共同编辑的《人民政治》(*Politics for the People*)。与此并行的是英国的帝国主义, 在 1855 年之前, 它遵循的是“通过影响来提升英国地位”的政策, 但是当英国的支配地位受到挑战时, 它却采取了经种族主义合法化之后的侵略领土的做法。见: Ronald Hyam, *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1815—1914* (1976)。

关于把“民众”视为旧贵族恐惧“暴徒”及其特性的一个新的对等物, 见: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p. 288。查尔斯·金斯利描述了那些年的状况, 那时“年轻的[资产阶级]小伙子相信(这并不太错误), 民众是他们的天敌, 这些人可能还有他们的姐妹”: 转引自 G. M. Young, *Early Victorian England, 1830—1865* (1934), II, p. 436; and F. C. Mather, *Public Order in the Age of the Chartists* (Manch., 1959), p. 1。

23. 例如: *Hoggs Weekly Instructor*, 4 (19 Dec. 1846), p. 260n.; *Mirror*, (4 Nov. 1837), p. 298。

24. "Mr. Combe's Lecture to the Mechanics of Edinburgh", *Phren. J.*, 7

- (1831/1832), 657—660; and Gibbon, *Life of Combe*, I, pp. 255—283. 看来这是库姆第一次尝试对工人阶级听众进行演讲,他在1822年初作的演讲都是针对少数中等阶级听众的。1835年库姆和爱丁堡哲学协会的其他同道在“道德和经济学知识传播协会”的资助下在爱丁堡的考盖特天主教堂发表了一系列一便士演讲。库姆关于道德哲学的20次演讲在印刷品上的标题表明,这些演讲的对象是“爱丁堡哲学协会”,但实际上是在1835年底和1836年初的冬季对“爱丁堡工人协会”发表的演讲。
25. *Journals*, I, p. 117, 关于1836年4月23日的条目。当然,截至此时,《人类体格》已经取代了布鲁厄姆有着重大影响的《关于人民教育的现实考察》(*Practical Observations upon the Education of the People* [1825])作为鼓舞教育和理性化源泉的地位。例如,可参见:John Fletcher, *Discourse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udy of Physiology as a Branch of Popular Education* (Edin., 1836), 在该书中可以发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已经完全取代“辉格派功利主义”。
26. A. Smith. “Phrenological Ethics”, p. 400; Combe, “Phrenological Analysis of Mr Owen’s New Views of Sociey”, *Phren J.*, (1823/1824), 218—237; Jeffrey, “Phrenology”, p. 253; Combe, “Education 346 in America; State of Massachusetts”, *Edin. Rev.*, 73 (1841), 486—502.
27. *Cheltenham J.*, 31 May 1841, n. p.
28. 1841年11月27日、12月4日、11日和18日的《布里斯托尔信使报》报道了巴伯的演讲;欧文与布林德利的论战(据说是当着4000观众的面)发生在1841年1月,主持人是当地身兼银行家、黄铜制造商和慈善家的约翰·斯坎德雷特·哈福德。布林德利在和欧文的辩论中表现很好,但是当他于1842年1月在布里斯托尔与巴伯辩论颇相学时,他的大众支持度跌落了。我很感谢迈克·尼夫在这条注释上给我的帮助。
29. *Brief Reports of Lecture Delivered to the Working Class of Edinburgh; or, the means in their own power of improving their character and con-*

- dition* [重刊于 *Edin. Weekly Chron. & Scottish Pilot*] (Edin. [1844]), p. 54. 对于科伯恩来说,在辛普森关于“压制低等能力,提升高级能力——那就是教育”的声明中,辛普森的目标似乎是“使贫民接受他的状况,其方法是通过解释它的必要性和用途,向人们显示如何可以从其中提取出幸福以及个人如何可以从中得到提升”: *Journals*, II, p. 84, 关于 1844 年 7 月 30 日的条目。《旁观者》刊登的关于辛普森的讣闻,极好地表达了自由主义神话:“他的雄辩完全没有那些大众权利鼓吹者特有的粗鲁话语和阶级偏见,他的雄辩有的是高等教育的优雅和真正慈善的印象”: 17 Sept. 1843, p. 893。也见: *National Education: report of the speeches delivered at a dinner given to James Simpson, Esq., by the friends of education in Manchester* (Manch., 1836)。辛普森是“中央教育协会”(它是维多利亚时代实用知识传播学会的完全对应物)成员,与他一道的有颅相学家埃利奥特森、麦肯齐和约翰·克伦丁宁,以及与颅相学关系密切的教育家如威廉·埃利斯、托马斯·巴斯塔德、萨金特·亚当斯和托马斯·怀斯,还有 G. 波利特·斯克鲁普,查尔斯·奈特以及托马斯·科茨等人。“中央教育协会”的第一份出版物评论道,“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特别适合那些有可能成为技工学院成员的人学习的科目……在工人人口大规模集中的城镇——即罢工、工会和结社已经对商人、制造商和工匠造成毁灭性影响的地方——必须让人们完全理解影响着物质财富和勤勉的原则是最为重要的”: Charles Baker, “Mechanics’ Institutes and Libraries: from the first publication of the Central Society of Education” [1837], 重刊于 Baker, *Contributions to the Publications of the SDUK* (1842), p. 367。
30. “Eduction, As It Is and as It Should Be”, *Analyst*, 7 (Aug. 1837), 70. 也见: H. C. Watson, “Phrenology and Political Economy”, *Phren. J.*, 11 (1837/1838), 201—202 and pp. 247—248; William and Robert Chambers, *Political Economy for Use in Schools and Private Instruction* (Edin., 1852)。关于政治经济学家理查德·沃特利以及他和库姆的关系,见: de Giustino, *Conquest of Mind*, p. 183, and Gibbon, *Life of Combe*, I, pp. 259—260; 关于政治经济学家威廉·B. 霍奇森,参见他

的 *Life and Letters*。

31. *Phren. J.*, 15 (1842), p. 382; 1865 年当大法官法庭关于昆伍德公社的资产诉讼案结案时, 特里维廉拿回了 41 英镑 2 便士: George J. Holyoake, *The History of Co-operation* (1875), II, p. 469。
32. *Testimonials to Combe*, p. 52. 也见: George Lyon, “Essay on Liberty”, p. 598; and “The Press and Political Economy”, *Phren. J.*, 3 (1825/1826 47—51)。
33. Ur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1835), p. 16. 该书由实用知识传播学会的出版商查尔斯·奈特出版。值得注意的是, 1804 年尤尔博士取代了乔治·伯克贝克, 在格拉斯哥向成年男工发表科学演讲, 1823 年在这些男工中发展形成了格拉斯哥技工学院。尤尔是出版于 1829 年的强行把《创世记》和地质学调和在一起的著作《地质学新体系》的作者, 也是皇家协会的《科学和艺术杂志》的主要评论者, 他在许多方面堪称苏格兰的布兰德(W. T. Brande): C. C. Gillespie, *Genesis and Geology*, p. 194; D. L. S. Cardwell, *Organization of Science in England* 347 (rev. ed., 1972), p. 40; Berman, *Royal Institution*, p. 142。
34. 同样,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制定越南政策的某些人认为, 赢得战争的唯一方法是改变越共中近来已经被现代化和城市化唤醒的社会阶层的观念或者意识: Chomsky, “Objectivity and Liberal Scholarship”, pp. 44ff. 关于自由主义, 见: Kenneth R. Minogue, *The Liberal Mind* (N. Y., 1968)。关于马克思对于“正式”控制和“真实”控制的划分, 见: Keith McClelland 发表于《历史工场杂志》评论 Patrick Joyce 的著作《工作、社会和政治》(*Work, Society, and Politics*) 的书评, *Hist. Workshop J.*, 11 (1981), 170—171。
35. *Constitution of Man*, p. 338. 关于同样的哲学在维多利亚时代疯人院的应用, 见: Andrew Scull, *Museums of Madness* (1979), esp. pp. 71—72。
36. 1846, 引文见 Edmund K. Blyth, *Life of William Ellis* (1889), p. 142. 作为人们熟知的伯克贝克学校的创始人, 埃利斯和 J. C. 霍布豪斯、查尔斯·奈特、弗朗西斯·普莱斯、伯克贝克以及布鲁厄姆等人同是伦

敦技工学院的最初捐赠者。

37. 因此, 牧师约瑟夫·沃恩写道, 掌握颅相学知识对于法官、教师、教士和父母特别重要: *Phrenology in Family; or, the utility of phrenology in early domestic education* (Edin., 1833), p. 61。该书按 1830 年美国版重刊, 序言由“一个基督徒母亲”[也就是 Mrs. Johanna Graham] 所写。一个几乎与此同样的表述, 见: Spurzheim, *Physiognomical System*, p. 2。
38.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及这门科学, 认为它具有社会生产关系的辩证功能时, 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 例如: *Communist Manifesto* (1848), in *Collected Works*, vol. 6 (1976), p. 503。
39. Letter to W. B. Hodgson, 19 Aug. 1847, 转引自 Blyth, *Life of Ellis*, p. 58。
40. 关于这些技工学院(除了在下面的注释 45 中引用的第二手资料), 见: Cardwell, *Organization of Science*, pp. 39—44, 71—75; J. F. C. Harrison, *Learning and Living, 1790—1960* (1961), 57—89; Brain Simo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1780—1870* (1960); D. A. Hinton, “Popular Science in England”。关于阐释的焦点, 见: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1968), pp. 817—819; E. Royle, “Mechanics’ Institutes and the Working Classes, 1840—1860”, *Hist. J.*, 14 (1971), 305—321; Shapin and Barnes, “Nature and Control”; I. Inkster, “English Mechanics’ Institutes”; Maxine Berg, *The Machinery Question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1815—1847* (Cambridge, 1980), chap. 7。
41. *Mechanics’ Mag.*, 7 (21 Apr. 1827), 246。理查德·奥尔蒂克(Richard Altick)认为 1824 年《技工杂志》的发行量达到了 16000: *English Common Reader*, p. 393。关于霍奇斯金和罗伯逊以及伦敦技工教育政纲, 见: Iorwerth Prothero, *Artisans and Politics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John Gast and his times* (Folkestone, 1979), pp. 191—203; and Simon, *Studies in Education*, p. 216。戈达德(John G. Godard)在 19 世纪末关于伯克贝克的颂词中强烈反对《技工杂志》, 因

- 为该杂志否认了布鲁厄姆和伯克贝克作为伦敦技工学院“之父”的地位。(戈达德说道),罗伯逊“被攻击他的短评所激恼……,自降身份到了明目张胆说假话的地步,一个例证就是他宣称,自学院创建以来人们关注程度最高的学科可能就是颅相学和戏剧!”: *George Birkbeck, the Pioneer of Popular Education* (1884), pp. 137—138。
42. “Observations on Phrenology”, 3 (14 Jan. 1826), 202—204; “Outlines of Phrenology”, 3 (29 Oct., 19 Nov., 10 Dec. 1825), 11—12, 49—51, 105—106. *The London Mechanics’ Register* 从 1824 年 11 月办到了 1826 年, 改版为 *New London Mechanics’ Register and Magazine of Science and the Useful Arts* (1827—1828)。它的出版者是考伊和斯特兰奇, 杂志的主要篇幅用于重新刊载伦敦技工学院的演讲。
43. Brougham, *Practical Observations*, 引自 Simon, *Studies in Education*, p. 216 (also pp. 215—222)。然而, 这并不能阻止布鲁厄姆在技工学院传播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热情。正是在他的建议下, 威廉·埃利斯 348 准备了内容为政治经济学的演讲, 打算到每一所技工学院演讲(这正是詹姆斯·密尔希望巡回演讲或者“能力尚可, 经过培训可以成为好讲师的人”在技工学院所传播的内容)。Alexander Bain, *James Mill: a biography* (1882), p. 389; and Berg, “Political Economy for Mechanics”, in *Machinery Question*, pp. 161—166。但是, 正如沙平和巴恩斯已经指出的(“Nature and Control”, p. 53), “在技工学院, 人们接触自然神学知识的机会通常比接触政治经济学知识的机会多得多, 政治经济学从‘自然法的科学研究’中得出了类似结论, 它可能对辉格派和改革家的吸引力更大些。政治经济学和它的‘强制法则’实际上经常被公开排斥在技工学院的课程之外, 而许多带有自然神学味道的课程, 尤其是生理学、颅相学以及地球科学, 则一眼可见。”这可能与布鲁厄姆编辑的佩利著作《自然神学论》(*Discourse on Natural Theology*, 1835)有点关系。也见: “On the Study of Natural History”, *Saturday Mag.* I (7 July 1832), 3 and 7 (17 Oct. 1835), 151。
44. 当科学讲演者查尔斯·帕廷顿在他的《科学公报》(*Sci. Gaz.*, 16 July 1825, pp. 34—36)中轻蔑地评论该书时, 该书的副标题为 *a peep at the*

evil intentions and the evils likely to result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eavers' Mechanic Institution, 几个星期后, 该杂志就刊登了 F. 伍德所写的赞扬颇相学的文章。技工学院运动的尾声是人们努力在斯皮特菲尔兹地区建立一所技工学院, 打算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非常糟糕的牺牲品皈依这门学问。然而, 正由于这个原因, 必须把对双方的批评言辞看作是特殊情况。见: Ur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rs*, pp. 453—456; 关于对转变意识形态进行最低限度的斡旋, 见 T. Hodgkin, *Lectures on the Means of Promoting and Preserving Health, Delivered at the Mechanics' Institution, Spitalfields* (1835)。

45. Prothero, *Artisans and Politics*, p. 203。当伦敦技工学院成员的职业统计数据受到严厉批评后在 1838 年的《技工杂志》上公布时, 其结果显示, 在 1144 名成员中, 600 人可以称为工人阶级, 289 人没有统计职业情况, 但只有一人真正被列为“技工”。有技术的生意人大约占了成员的三分之一, 远远落在工人阶级和中等阶级总体数据之后。“Classification of the Members: London Mechanics' Institute”, *Mechanics' Mag.*, 29 (11 Aug. 1838), 311—312。在下述特别委员会的证词中也包含了类似的证据(同样也带有说服的目的): *Education in England and Wales*, 1835, VII, pp. 763—1003, 尤其是附录 3 中来自辛普森、A. J. 多尔赛、撒缪尔·怀尔德斯平和弗朗西斯·普莱斯的证词; *Arts and Manufactures*, 1835, V, pp. 375—516, 尤其是伦敦技工学院副院长查尔斯·托普利斯的证词; *Education of the Poorer Classes in England and Wales*, 1838, VII, pp. 157—343, 尤其是凯一夏特沃思的证词, 第 182 页的第 73 个问题(此处称, 在曼彻斯特技工学院的 1526 名成员中, 只有 58 人与工厂有关系); *Public Libraries*, 1849, XVII, pp. 1—450, 尤其是洛维特、兰利和斯迈尔斯的证词; 还有 *Newspaper Stamps*, 1851, XVII, 尤其是托马斯·霍格的证词, 他是兰开郡和柴郡技工学院联盟的秘书, 后来成为 W. B. 霍奇森在利物浦的继承者, 赞成取消知识税, pp. 167—175。也见: John Glyde, *The Moral, Social, and Religious Condition of Ipswich in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pswich 1850; repr. ed., 1971), pp. 69—70。

关于许多工匠对技工学院的大失所望以及技工学院追随者的变化,见: Tylecote, *Institutes of Lancashire and Yorkshire*, pp. 38—39, 87; Thomas Kelly, *George Birbeck, Pioneer of Adult Education* (Liverpool, 1957), pp. 209 ff.; idem, *A History of Adult Education* (Liverpool, 1962; rev. ed., 1970), pp. 112—113, 115; Harold Silver, *The Concept of Popular Education* (1965), pp. 210—226; I. R. Cowan, “Mechanics’ Institutes and Science and Art Classes in Salfor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Vocational Aspect*, 20 (1968), 208; A. T. 349
Patterson, *Radical Leicester* (Leicester, 1954), pp. 235—238; J. W. Hudson, *History of Adult Education*, pp. 130 ff.; Webb, *Working Class Reader*, pp. 66—74; Thomas Coates, *Report of the State of Literary, Scientific, and Mechanics’ Institutions in England; with a list of such institutions and a list of lectures* (SDUK, 1841); James Hole,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and Management of Literary, Scientific, and Mechanics’ Institutions* (1853); and Frederick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1845; Eng. Trans., 1892),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on Britain* (2nd ed., Moscow, 1962), p. 275; 可比较 J. M. Ludlow and Lloyd Jones, *Progress of the Working Classes, 1832—1867* (1867), p. 169; I. Inkster, “Science and the Mechanics’ Institutes, 1820—1850: the case of Sheffield”, *Ann. Sci.*, 32 (1975), pp. 451—453; idem, “English Mechanics’ Institutes”, pp. 278—279 et passim.

46. Thomas Hogg, evidence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Newspaper Stamps* (1851), *Parliamentary Papers*, XVII, p. 175.

47. *Science and Religion*, p. 258. 关于没有颇相学的同样情况, 见: Richard Dawes, *An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Annual Soiree of the Huddersfield Institute, December 13th, 1855* (1856), pp. 16—17; George Boole, *The Right Use of Leisure: an address, delivered before the members of the Lincoln Early Closing Association, February 9 1847* (1847), p. 14; J. J. Garth Wilkinson, *Science for All: a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Swedenborg Association (1847), p. 7.

48. 见：“Decay of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Institutions”, *London Pioneer*, 2 (9 Dec. 1847), 536; 关于学习科目变化的例证, 见: G. W. Roderick and M. D. Stephens, “Middle-Class Non-Vacational Lecture and Debating Subjects in 19th Century England”, *Br. J. Educ. Stud.*, 21 (1973), 192—201.

例如, 在曼彻斯特技工学院, 关于自然科学的演讲从 1835—1839 年的 235 场减少到 1840—1844 年的 127 场, 到 1845—1849 年减到了 88 场; 在伯明翰的工业学院, 1845—1850 年不再讲授化学和数学, 而摄影和语音学团体却繁荣起来; 在阿伯丁, 自然哲学和化学由于没人捧场而出局。(Hudson, *Adult Education*, pp. 130, 65, 61; 也见: Altick, *English Common Reader*, pp. 202—203; and Coates, *Report on Literary Institutions*, pp. 51—62.)

49. 见：“Mechanics’ Institutions”, *Tait’s Mag.*, 5 (1838), 521—526. 关于一些学院不愿意削弱其课程设置, 见: 狄更斯在其小说《不图钱财的旅行者》(*The Uncommercial Traveller*, 1861) 第 12 章 “Dullborough Town Mechanics’ Institution” 中有精妙的讽刺描写。
50. E. J. 希思曾在 1842 年 1 月谈论伦敦技工学院, “超过三分之一的理事……是公认的颅相学家; 至少三分之一的教师公开承认相信这门科学。” *Phren. J.*, 15 (1842), 185. 在 19 世纪 30 年代, 颅相学家约翰·法伊夫是纽卡斯尔技工学院院长; W. A. F. 布朗是邓弗里斯技工学院院长, J. I. 霍金斯是肯特郡城镇技工学院院长, G. C. 霍兰是设菲尔德技工学院院长。
51. “Phrenology”, *Newcastle Chronicle*, 14 May 1836, p. 2 (着重号为后加的)。霍利约克讲述了一位外科医生的逸事, 该医生曾作过颅相学演讲并演示大脑的物质构成, 当他面对一位牧师的质问时, 他却用他的推理向这位牧师作出了妥协, 他还认为他做出这样的彻底改变是非常明智之举。霍利约克补充道, “他的职业需要一种宗教”: *Reasoner*, 5 (9 Aug. 1848), 174.
52. J. L. Dyer, “The Hitchin Mechanics’ Institute”, *Adult Educ.*, 23

(1950), 113—121, 212—220; John Salt, “Isaac Ironside and Education in the Sheffield Reg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 A. thesis, Sheffield, 1960; Inkster, “Phrenology in Sheffield”, p. 277; idem, “Science Instruction for Youth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informal network in Sheffield”, *Vocational Aspect*, 25 (1973), p. 94; Harrison, *Learning and Living*, p. 115。在《1851年英国人口调查: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教育》(*Census of Great Britain, 1851: education: Egnland and Wales*)第215—258页的文学、科学和技工学院的调查结果中, 好几个技工学院每年仍有两三次颇相学演讲: *Parliamentary Papers* (1854), Vol. LXX。

同样必须注意的是, 颇相学并非一直局限在显而易见的演讲门类中的: 就像威廉·麦肯齐于1832年4月在曼彻斯特技工学院所讲授的力学课程一样, 一门诸如“力学原理”这种似乎与颇相学不相关的科目一旦包含了“大脑和神经系统——感觉力学”这一部分, 它就可以成为颇相学的传播媒介。 350

53. *Q. J. Educ.*, 2 (1831), 391.

54. W. Hawkes Smith, “On the Tendency and Prospects of Mechanics’ Institutions (being a portion of a lecture lately read before the Birmingham Mechanics’ Institution)”, *Analyst*, 2 (June 1835), 336。关于库姆在伯明翰的演讲, 参见下文第八章。布林德利曾以18几尼的薪酬受雇讲授一门包含6次反颇相学演讲的课程。对此, 霍克斯·史密斯又作了另外两场演讲进行答辩, 1839年1月布林德利又作了另外4次演讲, 包括以3先令6便士的薪酬在艺术学校的演讲以及以10先令6便士的薪酬为一个家族作的演讲: *Midland Counties Adver.*, 10 Jan. 1839。

55. “Phrenology: relief of the distressed operatives”, a handbill dated 25 Apr. 1827, contained in *Phrenological Museum Scrap Book* [I], (MS, Edin. Univ. Libr.)。汉密尔顿的演讲是在大学的一间教室里举行的; 库姆的演讲有600名听众, 持续了3个小时: Gibbon, *Life of Combe*, I, p. 192。爱丁堡哲学协会发现, 在他们的所有演讲中(关于化学、植物

学、地理学、天文学、生理学,等等),颅相学演讲的听众最多。见:five reports of this society in NLS, Combe 4 (30—34); and Watson, *Statistics of Phrenology*, p. 131。

56. *Reasoner*, 3 (8 Sept. 1847), 82; 关于芬斯伯里学院,见: *ibid*, 4 (26 Apr. 1848), 43。

57. *Phren. J.*, 15 (1842), 86; *ibid*, 17 (1844), 210。曼彻斯特技工学院一个长长的画廊里摆满了半身雕像,其中包括一套完整的展示人体器官的雕像以及另一套最为恶名昭著的谋杀犯雕像——《颅相学杂志》认为,所有这些是伦敦以外地区最完整也最精致的石膏模型。见:“Mr. Bally’s Phrenological Gallery, Mechanics’ Institution”, *Manchester Guardian*, 10 Jan. 1844, p. 6; *Catalogue of the Fifth Exhibition at the Manchester Mechanics’ Institution, Cooper St., Christmas, 1844—1845*; “no. 6, ‘Phrenological Room’”; and *Exhibition Gazette 1844—1845 with a Catalogue of the Exhibition, Edited by the Manchester Mechanics’ Institution* (Manch., 1845)。在早期的一次展览中,巴利以老练的颅相学家身份定居开业,办了一个绘画的摊位;见: *Exhibition Gaz.*, 27 June 1840, p. 45。泰莱科特提到有5万人去参观1837—1838年的展览: *Institutes of Lancashire and Yorkshire*, p. 180。1840年7月纽卡斯尔理工学院举办的一个类似的筹款展览额外花钱提供了一份关于石膏模型展览品的图解手册,以便参观者可以更好地理解“说明[颅相学]原理的事实”:prefactory remarks “To the Visitor”, *Phrenology Illustrated in a Series of Profiles by J. H. Mole from the Collection of Cast Contributed to the Polytechnic Exhibition Newcastle, with Explanatory Descriptions by Alexander Falkner* (Newcastle, 1840)。1840年在哈利法克斯、哈德斯菲尔德和布拉德福也举办了类似的展览。

尽管这些展览是为了筹措资金,但也具有其他功能——最明显的就是颂扬了机器技术的奇迹,进而动摇了人们对于机器时代的抵制。见:T. Kusamitsu, “Great Exhibitions before 1851”, *Hist. Workshop J.*, 9 (1980), 70—89。

58. Spencer T. Hall, *The Phreno-Magnet, and Mirror of Nature: a record of facts, experiments, and discoveries in phrenology, magnetism, etc.*, 1 (1843), 66; idem, *Mesmeric Experiences* (1845), p. 21。关于沃克利, 见上文第三章注释 68; 关于恩格斯的观点, 参见其《自然辩证法》(*The Dialectics of Nature* [1872—1882; trans. & ed. C. Dutt, preface and notes by J. B. S. Haldane, 1940]) 第 299—300 页, 此处他批评了 A. R. 华莱士通过催眠术探究“精神世界”的运动。恩格斯曾经于 1843—1844 之交的冬季在曼彻斯特见过霍尔——“最低劣的江湖庸医”, 恩格斯也曾经做过试验来驳斥这一理论, 因为霍尔试图“由此证明上帝的存在、灵魂的不朽以及当时欧文主义者正在各个大城镇宣传的唯物主义的不正确。”(见: Steven Marcus, *Engels, Manchester, and the Working Class* [N. Y., 1974], pp. 96—97n.) 埃利奥特森的引文出自他于 1847 年 7 月在 PA 的第六次年会上的演讲, *Zoist*, 1 (Oct. 1843), 230。 351

库姆犹豫之后在他的《颅相学体系》(*System of Phrenology* [1843]) 第 5 版中增加了一章“催眠颅相学”(“Mesmeric Phrenology”)。乔治·麦肯齐爵士也表示支持(*Phren. J.*, 16 [1843], 234—237), 他的做法和詹姆斯·辛普森一样(*ibid.*, 16 [1843], 246—250, and 17 [1844], 261—272); 另一方面, T. S. 普里多仍然强烈地反对: “On the Fallacies of Phreno-Magnetism”, *Phren. J.*, 17 (1844), 158—168, and 18 (1845), 15—31。关于欧文主义者的观点, 见第八章。关于颅相催眠术在大众中的普及, 也见: *New Age*, 1 (10 June 1843), 44—45; *Mesmerist*, 1 (27 May 1843), 23; James Hopkinson, *Victorian Cabinet Maker: the memoirs of James Hopkinson, 1819—1894*, ed. J. B. Goodman (1968), p. 52; T. M. Parssinen, “Mesmeric Performers”, *Vict. Stud.*, 21 (1977), 87—104; Barrow, “Socialism in Eternity”。

59. 10 Apr. 1841, p. 351.

60. 引自 Hinton, “Popular Science”, p. 252.

61. 必须承认, 这是一个几乎还没有多少研究的巨大领域; 伊恩·英克斯特(Ian Inkster)的文章“A Note on Itinerant Science Lectures, 1749—1850”(*Ann. Sci.*, 28 [1972], 235—236)几乎是唯一的研究成果; 也

见: idem, "Sheffield Mechanics' Institutes", pp. 454—455。关于更早时期的研究, 见: A. E. Musson and E. Robinson, "Science and Industry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in thei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Industry Revolution* (Manchester, 1969); John R. Millburn, *Benjamin Martin* (Leyden, 1976), chap. 4, "Itinerant Lecturer, 1740—1755"; F. W. Gibbs, "Itinerant Lecturers in Natural Philosophy", *Ambix*, 8 (1960), 111—117; and Nicholas Hans, *New Trend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51), chap. 7, "Adult Education, Sciences, and Mathematics." 关于我们研究的这个时期, 见: J. N. Hays, "The London Lecturing Empire, 1800—1850", in Inkster and Morrell, *Metropolis and Province*, 91—119; 关于更晚时期的研究, 见 [Henry Wace], "Scientific Lectures: their use and abuse", *Quart. Rev.*, 145 (1878), 35—61。对颅相学有用, 但远非详尽深入研究的是沃森的《颅相学数据》(*Statistics of Phrenology*)第 230—231 页关于“颅相学演讲”的部分。

62. 细木工匠詹姆斯·霍普金森 (James Hopkinson) 在发现自己有催眠能力之后, 相信: “如果我脸皮稍厚一点点, 我就可能成为一名公开的催眠术师, 因为我能做出我曾经目睹斯宾塞·霍尔做过的大部分显灵现象, 只是我不善言辞而已”: *Memoirs*, p. 53。(霍普金森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颅相学知识”, 他发现这门科学在催眠术那里完全得到证实。在判定这种潜能削弱了智力之前, 他练习这种潜能达三年之久。) 由于没有三寸不烂之舌, W. R. 亨德森* 是一位失败的颅相学演讲者, 而亚历山大·威尔森也做得很糟糕。

63. Bray to Combe, 14 Jan. 1848, Combe Papers, NLS 7391/7424.

64. "The Intellectuals", in *Prison Notebooks*, p. 12.

65. 前排入场费是 2 先令, 后排是 1 先令: 牛津博德里亚图书馆约翰逊珍藏品中的“魔法和神秘”类中的三盒关于催眠术和颅相催眠术招贴收藏品中的一张招贴。(雷诺森是一位催眠术师, 他在伦敦莱斯特广场的西方学院作过演讲, 他也曾在波特曼广场自己的住所中为病人进行“私人咨询”: "Mesmeric Performers", p. 100。)令人尊敬的最杰出的地质学普及者吉迪恩·曼特尔曾于 1852 年在皮卡迪利的埃及广场参

- 加过一次这样的演讲/演示,他惊讶地发现“至少有 150 人出席”,他补充说道,“演讲者是一位肤色黯淡有点像恶棍的面容坚毅的男人,他的声音洪亮单调,一直不停地在讲话。” *The Journal of Gideon Mantell, Surgeon and Geologist Covering the Years 1818—1852*, ed. E. Cecil Curwen (Oxford, 1940), entry for 11 Feb. 1852, pp. 281—282.
66. 由于他在格拉斯哥作颅相学演讲的缘故,史密斯讲道,他“在格拉斯哥全面戒酒学会一个代表的要求下,在该学会的资助下作了关于营养的演讲。我作了两场这样的演讲,一场听众是 600 人,另一场听众是 900 人。佩斯利全面戒酒学会也提出了同样的请求,我在那儿为大约六七百人作了演讲”: *Phren. J.*, 11 (1837/1838), 341。后来人们发现史密斯在哈德斯菲尔德等地作关于谷物法的演讲。 352
67. 卡莱尔在柯卡尔迪第一次听他给“富人和女性”演讲后,认为他虽然有点习惯于“虚构”,还是有潜能的;当卡莱尔 1817 年再次听他演讲时,评价道:“大大地出乎意料。他的大脑中似乎有飞轮……它看起来推翻了施普茨海姆的学说。” *Early Letters of Thomas Carlyle, 1814—1826*, ed. Charles Eliot Norton (1886), I, pp. 135—136; 也见: *ibid*, pp. 91—96, and II, p. 252。关于艾伦,也见: M. Barnet, “Matthew Allen, M. D. (Aberdeen), 1783—1845”, *Med. Hist.*, 9 (1965), 16—28。
68. *Lit. Gaz.*, 5 Sept. 1829, p. 577 关于 J. I. 霍金斯* 和 W. H. 克鲁克* 的内容。
69. *Science for All*, p. 10; Clement Wilkinson, *James John Garth Wilkinson; a memoir of his life* (1911), pp. 66—69。
70. 见: 哈里雅特·马蒂诺在她的 *Retrospect of Western Travel* (1838), pp. 188—189 中关于这方面的评论,引自 Webb, *Martineau*, p. 247。
71. 1836 年 4 月,库姆通过给将近 500 名格拉斯哥市民作演讲获得了 250 英镑,每个听讲的市民付听课费 10 先令 10 便士。1836 年库姆为纽卡斯尔文学哲学协会作了 16 场演讲,每场一个半小时,他索要的演讲费是 100 英镑,这是协会当时为演讲付出的最高费用。Gibbon, *Life of Combe*, I, pp. 311—312, *Forty-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Newcastle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Society* (Newcastle, 1836); and Watson,

Statistics of Phrenology, pp. 231—232。相比之下,纽卡斯尔技工学院为一门包括 6 次演讲的课程而支付给知名的化学演讲者彼得·默里的报酬只有 12 英镑 12 先令: *El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Newcastle Mechanics' Institution* (Newc., 1835) p. 7。也见:英克斯特和沙平文章中提到的关于演讲者的收入, Inkster, "Sheffield Mechanics' Institutes", p. 463; Shapin, "Teats of Science", pp. 155—156。在某些情况下,按户收入的百分比可能极为赚钱。如果戈伊德的话是可信的,克鲁克通过这些方式从他在 1832 年为纽卡斯尔文学哲学协会所作的关于记忆术的演讲中得到了 500 几尼的收入。然而,听众们感觉到他们被欺骗了,克鲁克拒绝留下来作颅相学演讲,他对戈伊德说道,“现在不行—现在不行,它不吸引人”: Goyder, *Autobiography*, pp. 250—251; 戈伊德自己的收入似乎从未超过维持生存的水平。

72. "Syllabus of a Course of Lectures on Phrenology, by Mr. Crook (Member of the Council of the London Phrenological Society, etc., etc.) to Be Delivered at the Crown and Anchor, Strand, on Mon., Tues. and Weds., the 5th, 6th and 7th of February 1827 at 7 pm": handbill in Box "Phrenology and Chirolgy" in J. Johnson Collection of ephemera,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克鲁克向一位绅士和两位女士收取了 1 几尼;或者每次演讲收取 4 先令: *Phren. Almanac*, 1 (1842), 59。

兰利(J. B. Langley)在 1849 年为 *Select Committee on Public Libraries* 作证的证词中宣称,一个演讲者一年可以挣到 500 到 1000 英镑,“在某些地方,演讲很红火。现在演讲变得如此有利可图”: *Parliamentary Papers*, 1849, XVII, pp. 152—155; 也见洛维特的证词,同前书, p. 180。似乎毫无疑问,19 世纪 40 年代科学演讲的衰落在某种程度上与演讲费用有关。

听众听取演讲的费用根据地点、演讲内容和座位的不同有所差异——例如:

Cameron Liverpool (Paris Rms.) 1824 1g 12 lects

Crook	Private	1828	20g
Spurzheim	Sheffield (Tontine Rm.)	1829	2g 12 lects. or 3s each
Aitken	Dundee	1835	3d(front seats), 6d(back)
Combe	Newcastle (Lit & Phill)	1835	10s 6d per lect
Weir	Glasgow(Andersonion Univ.)	1836	2s 6d per lect
Brindley	Birmingham (Soc. of Arts)	1839	1s; 3s 6d for 4 lects. or 10s 6d for a whole family
Martin	Sheffield (Owenite Hall)	1840	2d per lect
J. Wilson	Birmingham (Med. Sch.)	1842	3s per lect or 15s for 6
P. Jones	London (Owenite Hall)	1840	1d per lect

73. 和演讲费用一样,不同的表述方式其收费也不一样:约翰·博伊德 (John Boyd)* 的收费方式堪称典型,一次口头描述收费 1 先令;一份书面描述收费 2 先令 6 便士;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通常以印刷的小册子出现,其中也包含了该科学的简史、一系列杰出赞助者的名单,等等)收费 5 先令。克鲁克* 在 1828 年和霍金斯* 在 1829 年都是一份书面报告收费 2 几尼,一次口头报告收费 1 几尼;1842 年,朗鲍尔* 对一次全面的颅相描绘收费 5 先令,而约翰·威尔森对“实际操作”的咨询收费从 20 先令、10 先令、5 先令到 2 先令 6 便士不等;1844 年,伯纳德夫人在伦敦的收费从 1 先令、3 先令到 5 先令不等,1846 年,H. 布谢伊* 的收费从 2 先令 6 便士(书面报告)到 20 先令(全面描述和私人演讲)不等。亚历山大·弗纳是 19 世纪末博尔顿一位实用颅相学家,其收费从 2 先令 6 便士做一次口头描述(附带关于健康的建议)到 3 英镑 3 先令做一次“关于身心方面的全面的书面分析,推荐一些极端的和危险的案例;一份给父母的备忘录和用来培育病弱的或者身体素质不太好的孩子的可靠指南,附带自学指导。”和当时大多数的颅相学家一样,弗纳也通过看相片对颅相进行描绘,收费 2 先令 6 便士: *Practical Phrenology* (Bolton 1902)。

《人民颅相学杂志》1843年第1期第96页登载了一则多诺万的伦敦颅相学学院的广告,概括了迄至当时的许多巡游颅相学家的商业和社会前景:“多诺万先生对较富有者阶层收取的费用是最低半个几尼;但他一直乐于把时间奉献给操作工阶层,向他们收取适合其收入的费用,他相信颅相学的进步将会从低级走向高级,而不是相反。”

一个头部石膏像的费用通常在1先令6便士到2先令6便士之间:戈伊德*和德维尔*都是这种头部石膏像的供应者,爱丁堡的安东尼·奥尼尔也一样,他在爱丁堡颅相学博物馆出售名人头颅复制品(30个收费2英镑15先令)。

克雷格、克鲁克、戈伊德、德维尔、埃普斯和多诺万都有他们的颅相学“手册”,库姆于1831年在爱丁堡演讲时以1先令6便士的价格向听众出售了200本《人类体格》(*Phren. J.*, 7 [1831/1832], 657)。

74. 布谢伊、德维尔、多诺万、福尔克纳、戈伊德以及利维森·多诺万在伦敦颅相学学院(成立于1840年)9次私人授课收取了3几尼,向两个一起上课的人收取了5几尼,向三人收取了6几尼。关于18世纪的“医学院”和商店橱窗展览,见:Eric Jameson [i. e., E. J. Trimmer], *The Natural History of Quackery* (1961), p. 99.
75. “The Country Phrenologists”, *Inspector & Nat. Mag.*, 3 (June 1827), 151.
76. 曼特尔就如此指责上述演讲者(注释65)。关于给技工学院所作的传统颅相学演讲的内容,参见:Goyder, *Autobiography*, pp. 346—384.
77. Holyoake, *History of Co-operation*, I, 375; and *New Moral World* 4 (18 Nov 1837), 28.
78. William Mattieu Williams, *Vindication of Phrenology* (1894), pp. 257—258; Eastlake, *Journals and Correspondence* (1895), I, pp. 65—66; *Crisis*, 4 (3 May 1834), pp. 32—34。除了作关于“妇女自由的进程”讲演之外,她还作关于戒酒的演讲;见:*Crisis*, 3 (Feb. 1834), 191; *Phren. J.*, 13 (1840), 187—188; *ibid*, 20 (1847), 449—450.
79. *Chapters in the Life of a Dundee Factory Boy: an autobiography* (Dundee, 1850), pp. 72—73. 颅相学家用他们的知识打击乡村文化(典

型的就是用城市工业的现在和未来去超越农业的过去)的另一个例子³⁵⁴是靠近唐开斯特的坎普斯奥会堂(Campsall Hall)的伍德家族。1837年他们成立了坎普斯奥实用知识传播学会,致力于提升40多个“劳工、工匠、农夫等”的文化水平,其方法是为他们读《一便士杂志》(*Penny Magazine*)中的文章。这个学会很快发展成为查尔斯·伍德进行颅相学演讲的讲台——这些演讲在查尔斯的兄弟内维尔所编辑的杂志《分析家》(*Analyst*)中得到了热情的描述。见:“Campsall Society for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Analyst*, 7 (Aug. 1837), 100; “Hints on Educational Reform in Connexion with Phrenology”, *Phren. (Anthropol.) Mag. Christian Physician*, 2 (May 1837), 256; C. T. Wood, “Society for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of Campsall and Its Vicinity”, *ibid.*, 3 (Nov. 1837), 70—72; “Campsall Newspaper Club”, *ibid.*, 4 (Jan. 1839), 145—154。然而,尽管颅相学家们城市超越乡村的意图明显(库姆帮着在爱丁堡组建了“资助乡村科学演讲协会”),颅相学家有意识地把这门科学传播到乡村的例子却不多。《诺丁汉评论》(*Nottingham Review*)在谈及詹姆斯·K.道(James K. Dow)在靠近诺丁汉的比斯顿村庄所作的颅相学演讲时说,“我们相信,这是唯一在小村庄中每周一次传播这门科学的例子”:16 Mar. 1838, p. 5。

80. 例如, James Jennings, *Inquiry Concerning Phrenology*, p. 1; 或者埃普斯在《颅相学手册》中的开篇语, Epps, *Manual of Phrenology* (n. d.), p. 1。
81. *Twelfth Year's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Literary, Scientific, and Mechanical Institution of Newcastle-upon-Tyne* (Newcastle 1836), p. 6. 这被看作对没能达到伦纳德·霍纳的爱丁堡艺术学校标准的一种安慰。
82. *Derby Reporter*, 1 Nov. 1844, q. in *Phren. J.*, 18 (1845), 91.
83. T. Morgan, “Phrenology in Southampton”, pp. 520—525.
84. 克莱克希顿的例子引自 Harrison, *Learning and Living*, p. 115; Northampton; *Mesmerist*, 1 (1 July 1843), 64。19世纪30年代初,曼彻斯特技工学院成立了一个颅相学班,40年代初在海布里奇学院成立

了这样的班；1832年德比班成立，1844年希钦班成立，1842年哈利法克斯班成立，大约在同一时间利兹班成立，1831年伦敦技工学院的颅相学班成立，1843年伦敦城市技工学院（这是唯一进行互教互学的地方，建立于1836年）的颅相学班成立（领导者是W.H.纽曼*），1837年威斯敏斯特技工文学学院的颅相学班成立（由外科医生W.U.惠特尼*领导）。1840年，约翰街的社会学院有一个主日下午班，领导者是理查德·雷德伯恩（关于他，见下文第八章）；1843年，霍尔本的洛维特国民会所也有一个这样的班，领导者是彼得·琼斯*。

85. *Phren. Almanac*, 1 (1842), p. 59.

86. 伦敦技工学院的班每季度收费6便士，南安普顿的班每季度收费2先令6便士，社会学院的班每次课1便士或者每季度1先令6便士或者7个月4先令，利物浦的班每年5先令。邓迪技工颅相学学会成员每次集会交2先令，直到交满1英镑为止。

87. *Phren. J.*, 14 (1841), 193. 颅相学家威廉·马蒂·威廉斯 (William Mattier Williams), 后来担任库姆的爱丁堡世俗学校的校长，就是这种颅相学班的毕业生。人们最初提到这种班是在 *Phren. J.*, 7 (1831/1832), 479。也见：同前书，10 (1836/1837), 742；以及 20 (1847), 186。

88. 该班成员在1839年恳请埃普斯*来授课，他们向管理委员会递交了由430人签名的书面请求。然而，委员会以13票对12票的结果否决了这一请求，可能是因为埃普斯的激进主张，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埃普斯的酬金太高。该班成员然后以无记名投票的形式聘请了另一位颅相学家西蒙·洛根 (Simon Logan)*，他是伦敦颅相学学会会员，当时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颇受欢迎。这个提议得到执行，洛根三次演讲的听众人数超过800人。 *Phren. J.*, 12 (1839) 107, 187。

89. *Phren. J.*, 11 (1838), 218, 338；关于其他讨论主题也见上面的参考文献。关于1848年讨论的另一些主题以及提交论文的人的名单，见于 G. Combe, R. Cox, et al., *Moral and Intellectual Science Applied to the Elevation of Society* (N. Y., 1848), p. 112。柯森 (W. C. Corson) 于1850年向设菲尔德颅相学学会成员所作的演讲“与灵魂有关的颅相

学”似乎是当时颅相学班的一个常见主题：引自 Inkster, “Phrenology in Sheffield”, p. 278。

90. Hytch, *Phren. J.*, 20 (1847), 186; 《不列颠辩论家和公正调查者》(主要由互助教学协会成员的来信构成, 针对的就是那些听众)真的进行了关于“颅相学是真理吗?”的争论, 1 (July/Nov. 1850), 83—228 (serially)。根据海奇的观点, 颅相学家的职责是充当道德医生, 不能允许“根深蒂固的癌症[即, 滥用动物本能]……得到强化, 并且不受干扰地沉溺于这一体系”: “The Philosophy of Phrenology”, *London Phalanx*, 1 (11 Dec. 1841), 586。
91. Shapin and Barnes, “Nature and Control”, p. 57; 关于技工学院的“失败”, 见: Inkster, “English Mechanics’ Institutes”; and R. N. Price, “The Working Men’s Club Movement and Victorian Social Reform Ideology”, *Vict. Stud.*, 15 (1971), 117—147。可比较: Royle, “Mechanics’ Institutes”。关于托利派评判布鲁厄姆和他的公司漠视“成千上万的煤矿挑夫、运货马车车夫、清洁工、制砖工、劳工、运输工、各种各样的仆人和劳工、裁缝、鞋匠, 等等”, 见: [David Robinson], “Brougham on the Education of the People”, *Blackwoods*, 17 (1825), 534—551 at p. 538。
92. 伯明翰技工学院全部 485 名成员中有 240 人年龄在 21 岁以下; 在约克技工学院, 404 人中有 119 人年龄不到 21 岁, 在曼彻斯特技工学院, 739 人年龄不到 21 岁, 769 人年龄大于 21 岁; 在设菲尔德技工学院, 1850 年 6 月和 1851 年 3 月之间关于讨论班的统计数据显示, 308 人年龄不到 21 岁, 只有 26 人年龄在 21 岁以上: Coates, *Report on Literary Institutions*, pp. 19—20; and *Analyst*, 4 (Jan. 1836), 135—137。创办于 1838 年的索尔比布里奇技工学院(The Sowerby Bridge Mechanics’ Institute)把成员分成三等: 第一——业主, 第二——捐助者, 第三——21 岁以下的捐助者; 1840 年, 153 名成员中有 51 人是第三等(他们代表了大多数生意行业, 最大的群体是 16 名接头工, 其次是 10 名技工, 8 名细木工人, 7 名纺纱工, 5 名漂洗工, 4 名织工)。 *Halifax Express and Huddersfield, Bradford, and Wakefield J.*, 23 May 1840, p. 2。关于年

龄,也见:Inkster,“Scient Instruction for Youth”, p.94。例如,A. R. 华莱士和他的哥哥于 1836 年进入社会学院时分别是 13 岁和 18 岁: *My Life: a record of events and opinions* (1905), I, p. 87; 亚历山大·贝恩(Alexander Bain)在 13 岁和 16 岁期间在阿伯丁技工学院学习: *Autobiography* (1904), p. 16。有人认为,这些年轻人在学院里纯属偶然而非有意安排,为了辩驳这种观点,我们可以引用 1839 年在曼彻斯特关于建立一所“实用科学机构”的讨论,该机构将遵照伦敦的阿德莱德画廊(创建于 1830 年)的模式,对象是“年轻人阶层”。主持这场讨论的是该学院后来的院长 H. H. 伯利,当地的托利派分子和地方上的知名人士,他在 20 多年前因为是彼得卢案件的领导者而声名狼藉。引自 Robert Kargon, *Science in Victorian Manchester* (Baltimore and London, 1977), p. 36。

关于学院中工人上层的引语出自撒缪尔·斯迈尔斯在谈及约克郡技工学院联盟 16000 名成员时的证词, *Select Committee on Public Libraries*, 1849, XVII, p. 126。

93. Hudson, *History of Adult Education*, p. vi。当技工学院经营者们认为自己的目标是培养“有才智的工匠”时,很难理解他们到底是指什么样的听众,见:Thomas Wright,“The Working Man’s Education”, in his *Some Habits and Customs of the Working Classes* (1867), pp. 3—4。不应该忘记,在 19 世纪 20 年代和 40 年代之间,中等阶级教育家的目标已经改变;见:Berg, *Machinery Question*, pp. 145—173。
94. 见:Armytage, *Technocrats*, p. 105; R. Q. Gray,“Styles of Life; the ‘Labour aristocracy’ and class relations in later nineteenth century Edinburgh”, *Int. Rev. Soc. Hist.*, 18 (1973), 428—452; and cf., G. W. Roderick and M. D. Stephens,“Science, the Working Classes, and Mechanics’ Institutes”, *Ann. Sci.*, 29 (1972), 349—360 at p. 360。
95. Prothero, *Artisans and Politics*, p. 194; 普罗瑟罗补充道,技工学院“为满足人们普遍感到的需求提供了机会。人们希望提升社会地位,因为随着工商业的扩张,社会日益需求有教育水平的民众,不仅是职员和管理人,还有手工劳动者。技术的变化对言教的传统学习方法和通过

眼睛观察来工作产生了不利影响,使得计划和测量绘图的使用成为必要”。关于工人阶级支持颅相学的资料,参见上文第六章。

96. On Browne, *Phren. J.*, 12 (1839), 109; 他也因为是邓弗里斯技工学院的院长而受到高度尊重; 见: W. H. Marwick, "Mechanics' Institutes in Scotland", *J. Adult Educ.*, 6 (1933), 292—309 at p. 296。至于他在被任命为蒙特罗斯精神病院主管前后作为颅相学演讲者所获得的非凡成功, 见: *Phren. J.*, 8 (1832/1834), 571—572, 662—663; and *ibid.*, 11 (1838), 214。关于维特翰姆: *York Herald*, 6 Aug. 1836. q. in *Phren. J.*, 10 (1836/1837), 245; 也见:《颅相学杂志》关于他的讣文, *ibid.*, 18 (1845), 188。
97. *New Moral World*, 2 (18 June 1836), p. 267. 该引文和其他参考文献出自他的《大众教育的必要性》: *Necessity of Popular Education*, pp. 14, 9—11, 23。1835年,他在爱丁堡为道德和经济知识传播学会所作的每一场演讲都有1000多名以工人为主的听众,1844年有3000名工人请求他继续为他们作演讲,给他赠送奢侈的奖品和一笔慷慨的奖金。见: app. to his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Edin., 1836), pp. 251—256。关于道德和经济知识传播学会(SDMEK), 见: 上文注释 19, 24; Marwick, "Early Adult Education in Edinburgh", pp. 401—402; and Simpson, *Brief Reports*, p. 1; 也见: "Proposed Testimonial to James Simpson Esq. Advocate", NLS (这是一张为感谢辛普森为爱丁堡工人阶级的“道德和社会提升”所做的一切而募捐的单子)。
98. A. Tyrrel, "Class Consciouness in Early Victorian Britain: Samuel Smiles, Leeds Politics, and the Self-help creed", *J. Br. Stud.*, 9 (1970), 103—125 at p. 120; 也见: Harrison, *Learning and Living*, p. 53; *idem*, "Adult Education and Self Help", *Br. J. Educ. Stud.*, 6 (1957/1958), 37—50 at p. 46。关于民众学院, 等等, 见: "Mechanics' Institutions and People's Colleges", *People*, 2 (1850), 358; 关于学术演讲会堂, 见: Coates, *Report on Literary Institutions*, p. 43; 关于欧文主义者的科学会所, 见: A. Black, "Education before Rochdale: the Owenites and the halls of science", *Co-operative Rev.*, 29 (1955),

42—44; and Eileen Yeo, "Robert Owen and Radical Culture", in Sidney Pollard and John Salt, eds., *Robert Owen: prophet of the poor* (1971), 84—114 at pp. 90—95. 关于著名的技工学院分离出来的机构(以颅相学为主), 见: "New Mechanics' Institution, Manchester", *Analyst*, 3 (Oct. 1835), 155—156; "Mechanics' Institutions", *Working Man's Friend*, 12 Jan. 1833, p. 32; and R. G. Kirby, "An Early Experiment in Workers' Self-Education: the Manchester New Mechanics' Institution, 1829—1835", in D. S. L. Cardwell, ed., *Artisan to Graduate* (Manch., 1974), 87—98. 至于对 19 世纪 40 年代制陶业地区共进团体的详细阐述, 见: Charles Shaw, *When I Was a Child* (1903; repr. ed., 1969), chap. 23,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under Difficulties".

99. Pages 219 ff.

100. *The Life of Thomas Cooper Written by Himself* (1872), p. 169. 身为共和党人的雕刻师詹姆斯·林顿在广告中把颅相学列为自己创建于 1839 年的沃森斯托互教互学协会(Walthamstow Mutual Instruction Society)要讨论的主题(同时也希望它能复兴该协会): F. B. Smith, *Radical Artisan: William James Linton, 1822—1897* (Manch., 1973), p. 44.

101. 见: J. Salt, "The Sheffield Hall of Science", *Vocational Aspect*, 12 (1960), 133—138; and Inkster, "Phrenology in Sheffield", p. 277. 这个科学会所是 1839 年由 I. 艾恩赛德斯和罗伯特·欧文创建的, 埃玛·马丁* 和 G. J. 霍利约克* 分别于 1840 年 12 月和 1841 年 8 月在此作过演讲。

102. Bain, *Autobiography*, p. 26.

357 103. "Mutual instruction Societies", *London Sat. J.*, 3 (29 Feb. 1840), 129—132; 也见: "Useful Knowledge: with a few hints to members of mutual instruction societies", *ibid.*, 3 (18 Apr. 1840), 232—233. 关于互教互学协会的成立, 见: Christopher Thomson, *The Autobiography of and Artisan* (1847), pp. 353 ff. .

戈伊德发现, 斯卡伯勒附近有一个互教互学团体, 成员们购买了一些

石膏模型和多本《人类体格》，非常勤奋地研究这门科学，直到他们的卫理公会传教士公然抨击这门科学为异端为止。戈伊德向他们保证，颅相学和圣经是相符的，这个团体又重新聚集起来。*People's Phren. J.*, 1 (11 Feb. 1843), 60。

104. Myles, *Autobiography*, p. 73.

105. 载于“Phrenological Association and Meeting”, *Newcastle Courant*, 7 Sep. 1838, pt. II, p. 3。举例来说：由罗伯特·考克斯编辑的《颅相学杂志论文选辑》(*Selections from the Phrenological Journal*, Edin. and Boston, 1836)在第一年显然卖出了 1.8 万册；罗伯特·麦克尼什 (Robert Macnish) 的《颅相学入门》(*Introduction to Phrenology*, 1836)第一版 2000 册在 6 个月时间里就售卖一空；罗伯特·亨特匿名出版的《简明颅相学原理》(*Philosophy of Phrenology Simplified*, 1836)到 1845 年已出到第三版，共销售了 4000 册；乔治·马基什的《颅相学问答》(*Catechism of Phrenology*, 1831)在最初 10 天就卖出了 900 本，到第三个月底时卖出了 1700 本，1834 年出了第七版，1857 年登广告宣称出了 34000 本 (noted by Robert Macnish, *The Modern Pythagorean: a series of tales, essays, and sketches, by the late Robert Macnish, LL.D. with the author's life by his friend D. M. Moir* [Edin., 1838], I, pp. 371 ff.)。这样一本成功的著作鼓励了续篇：1836 年，乔治·麦克尼什出版《简明颅相学》(George Macnish, *Phrenology Simplified*, 1836)；1838 年又出版《颅相学科学》(*Science of Phrenology*, 1838)。此外还有埃普斯、施普茨海姆、艾金、多诺万、德维尔、布里奇斯、博伊德等人关于颅相学的汗牛充栋的手册。诸如《道德新世界》、《帕特农神庙》和《理性》之类的杂志，最常见的是封底所登载的一到四便士出版物的广告，如：Goyder's *Epitome of Phrenology* (n. d.)；idem, *Acquisitiveness* (1837)；Crook's *Compendium* (1828)；Edwin Saunders's *What Is Phrenology?* (1835)；Engledue's *Cerebral Physiology and Materialism* (1842)；Dewhurst's *Grammar of Phrenology* (1834)；and John Mills's *A Catechism of Practical Phrenology* (Leeds, 1851)。19 世纪中期以后，对于严肃的初等读本，

人们的需求下降了,但是对于由布里奇斯、* A. L. 瓦戈、J. 英沃兹、* A. 奇塔姆以及最为重要的 L. N. 福勒这样的人的著作,在 1860 年和 1900 年间销售仍保持稳定。在世纪之交,“码头颅相学家”(布莱克浦和莫克姆的埃利斯家族,博恩茅斯的 J. J. 斯帕克家族以及布莱顿的塞弗恩家族)出版了无以计数的颅相学手册,而伦敦的杰西·福勒* (“颅相学福勒家族”的最后一人)以及路德盖特马戏团的斯塔克普尔·奥德尔也一样。

技工学院和类似的学院购买了许多格调较高的颅相学著作:纽卡斯尔技工学院堪当典型,1827 年学院图书馆收藏有库姆的《颅相学体系》,1829 年收藏有库姆的《致弗朗西斯·杰弗里》(*Letter to Francis Jeffrey*)。学院第八次《年度报告》中披露,颅相学家阿瑟·特里维廉是《颅相学杂志》的捐助者。1847 年,沃灵顿技工学院的书籍中有 20% 是关于颅相学的;见: Hinton, “Popular Science”, table V, p. 251。(然而,由于捐助和其他各种因素,图书馆目录不能给我们了解大多数学院的详细情况提供很好的指南。)

106. 这个决定显然是在 1834 年作出的,就在罗伯特·钱伯斯听了库姆演讲后皈依颅相学不久,也是在杂志销量事实上已经开始下滑之时(奥尔蒂克把该杂志在 1832 年的销量定在 5 万册[p. 393]);此后,随着杂志登载了一篇极受欢迎的颅相学文章(entitled “Is Ignorance Bliss?” 2 [3 Jan. 1834], 385—388),后面的每一期销量逐期增加 1 万册。见: De Giustino, *Conquest of Mind*, p. 52; William Chambers, *Memoir of Robert Chambers with Autobiographical Reminiscences of William Chambers* (Edin., 1872)。“我有理由相信”,罗伯特·钱伯斯在他 1836 年写给库姆的感谢信中说道,“[颅相学]正在中下等阶层较有思想的人中获得迅速发展……它不需要得到文化人的许可,正趋向于拥抱大多数民众”(Testimonials, pp. 55—57)。
107. W. J. Linton, *James Watson: a memoir* (Manch., 1880), p. 27; *New Moral World*, 2 (4 Feb. 1837), 117。也见: W. E. 希克森的证词, *Select Committee on Newspaper Stamps*, p. 478, pp. 3249—3251, 他断言,不可能见到每周收入不到 16 先令的人去买《钱伯斯》杂志或者

《一便士杂志》。罗伯特·钱伯斯知道激进派对他的杂志所抱有的观点,他也为此感到遗憾;然而,令他感到安慰的是杂志的销量和“我们的劳动……所获得的好处超乎我们的希望和设想”的事实。Letter to Leith Hunt, q. in Chambers, *Memoir* (1884), p. 249。

108. “Phrenology”, *Moral Reformer*, 1 (Mar./May 1838), 77—115 (serially); “Phrenology”, *The People*, 1 (1848), 280, 297—298; “The Work of O. S. Fowler, the American Phrenologist and Physiologist”, *ibid.*, 1 (1849), 291; “All Our Faculties Should Be Cultivated”, *ibid.*, 3 (1851), 282; “The Laws of Nature and Human Nature”, *ibid.*, 1 (1848), 167; “Combe’s Works”, *ibid.*, 1 (1848), 199。班克对福勒的著作太热心了,以至于他在当时就以2便士一本的价格出版福勒的著作(《人民》是致力于“颅相学、绝对禁酒主义、神学改革、营养学……而所有这些学问又是致力于所有个人及家族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关于《人民》的发行量,见: *Life of Joseph Barker Written by Himself*, ed. John Thomas Barker [1880], p. 299, and the evidence of Abel Heywood to *Select Committee on Newspaper Stamps*, pp. 373—375); “Mr. George Come and the Philosophy of Phrenology”, *Fraser’s Mag.*, 22 (Nov. 1840), 509—520 at p. 509。
109. 27 Dec. 1834, q. in *Phren. J.*, 9 (1834/1836), 284。
110. 27 Jan. 1838, q. in *Phren. J.*, 11 (1838), 219。
111. 引自 De Giustino, *Conquest of Mind*, p. 204。
112. Hays, “Science and Brougham’s Society”, pp. 231, 238; 可比较 A. Tyrrell, “Political Economy, Whiggism, and the Education of Working-class Adults in Scotland, 1817—1840”, *Scottish Hist. Rev.*, 48 (1969), 151—165, esp. p. 155; R. Johnson, “Educational Policy and Social Control in Early Victorian England”; Simon, *Studies in Education*, p. 132 et passim; D. G. Paz, “Working Class Education and the State, 1839—1849: the sources of government policy”, *J. Brit. Stud.*, 16 (1976), 129—152; Webb, *Working-Class Reader*, pp. 64—65。也见: A. P. Donajgrodski, ed., *Social Control in Nineteenth Cen-*

tury Britain (1977)。

113. 例如, H. F. Kearney, "Puritanism, Capitalism,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Past & Present*, no. 28 (1964), 80—101, esp., p. 85。至于某种与此类似却并无特别明显的反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方法, 见: K. Fielden, "Samuel Smiles and Self-help", *Vict. Stud.*, 12 (1968/1969), 155—176。菲尔登认为, 由于斯迈尔斯并没有监守自盗, 因此他是真正关心工人阶级地位的, 他并没有为工业资本主义辩护。
114. 本章所引用的关于成人教育的几乎所有二手资料都描述了这种工人阶级的“非神秘化”。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提供了许多其他例证, 但他也意识到, “统治机构以直接的、有力的、未经调停的‘统治阶级’组织出现的时刻极其罕见, 也极其短暂”……而且, “试图进行简化分析的努力也以什么都没有解释而告终”: “The R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 p. 48。至于对工人阶级左翼历史的非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尖锐评价, 见: D. Selbourne, “On the Methods of the History Workshop”, *Hist. Workshop J.*, 9 (1980), 150—161。
- 115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p. 275; 可参看 Prothero, *Artisans and Politics*, p. 195。
116. 然而, 教育家的言辞可能会使人猜测例外的情况: 托马斯·默里博士是政治经济学的演讲者, 他在 1838 年告诉科伯恩, 他刚刚结束在邓弗姆林给 1000 名技工所作的 28 场演讲, 这些听众第一次来听他演讲时希望听到“激进主义的学说; 但是他们被工资、贫民、人口、集会、机械、自由贸易、移民等原理所吸引, 并没有被货币、税收、银行等话题所惊呆, 他们不仅留了下来, [而且]……使他把课时又延长了一倍”。
359 *Journals of Henry Cockburn*, I, pp. 177—178。关于默里之精通颇相学, 参见他的 *Autobiographical Notes*, ed. John A. Fairley (Dumfries, 1911), pp. 51, 64, 72, 89。
117. John Foster, *Class Struggl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arly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three English towns* (1974)。至于对福斯特著作的许多著名评论以及因此而引发的历史和历史学问题, 见: G. McLennan, “‘The Labour Aristocracy’ and ‘Incorporation’: notes

- on some term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working class”, *Social Hist.*, 6 (1981), 71—81。
118.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起点是“词语”,这个词语一旦说出,就承载着一种决定未来思想结构和经济结构模式及形态的价值负荷。关于以“价值”为起点,见:R. M. Young, “The Anthropology of Science”, *Sci. Stud.*, 1 (1971), 177—206。关于重新界定“以人道的有活力的概念为基础”,见:Raymond Williams,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New Left Rev.*, no. 82 (1973), 3—16; idem,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1977), pp. 75—82; S. Hall, “Rethinking the ‘Base-and-Superstructure’ Metaphor”, in Bloomfield, *Papers on Class*, 43—72; and V. N. Volosinov,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Basis and Superstructures”, in his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rans. L. Matejka and I. R. Titunik (N. Y. and London 1973), 17—24。
119. 见:S. Feuchtwang, “Investigating Religion”, in Maurice Bloch, ed., *Marxist Analysis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1975), 61—81 at p. 62。
120. 卢克·伯克* 在 1864 年认为,科学已经成为“一种宗教”(见:C. Donovan, *The Ethnological Society and Phrenology*, p. 17);其他人对此更加确定:“你是否明白,”詹姆斯·沃兹沃思在 1839 年写信给库姆道,“在你的《人类体格》中,你已经给了世界一个新的宗教?它所揭示的神权统治观念将及时地颠覆所有其他宗教,它们自身将成为一种宗教”:引自 Mackay, “Combe”, in his *Forty Years Recollections* (1877), II, p. 255。
121. *The Making*, esp. pp. 392—393, 437, and the section “The Chiasm of Despair”, pp. 411—440; 也见: his “Time, Work 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 Present*, no. 38 (1967), 56—97, repr. in M. W. Flinn and T. C. Smout, eds., *Essays in Social History* (Oxford, 1974), 39—77, esp. pp. 61 ff。
122. 见: his 1968 postscript in *The Making*, pp. 917—923; and his review of Robert Moore, *Pit-Men, Preachers and Politics: the effects of*

Methodism in a Durham mining community (Carbridge, 1974), in *Br. J. Sociol.*, 27 (1976), 387—402。也见: F. K. Donnelly, “Ideology and Early English Working-class History: Edward Thompson and his critics”, *Social Hist.*, 1 (1976), 219—238。

123. Mannheim, *Ideology and Utopia* (1936; repr. ed., 1960), p. 54: “只有当我们多多少少有意识地在社会因素中搜寻[个人]虚伪的源泉时, 我们才准确地作出一种意识形态的阐释”; 也见: 同前书, pp. 237—247。

第六章 世俗卫理公会

1. *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Baltimore, 1977), p. 42.
2. See: Douglas, “Environments at Risk”, in her *Implicit Meanings*, pp. 230—248; Sir Andrew Huxley, “Fact and Value Must Not Be Confused”, *Times Higher Educ. Suppl.*, 7 Oct. 1977, p. 21; D. Ingleby, “Ideology and the Human Sciences: some comments on the role of reification in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in Trevor Pateman, ed., *Counter Course: a handbook for course criticism* (Harmondsworth, 1972), pp. 51—81 at p. 54; and Roland Barthes, “Operation Margarine”, in his *Mythologies*, 41—42.
3. 见: 一位伦敦技工给埃利奥特森的信, in *Zoist*, 1 (Oct. 1843), p. 273; 以及 “Combe and the Philosophy of Phrenology”, *Fraser's Mag.*, 22 (Nov. 1840), 509.
4. 见: A. L. Morton, “Pilgrim's Progress”, *Hist. Workshop J.*, 5 (1978), 3—8。至于工匠把颅相学与班扬糅合起来的文字证据, 见: Hopkinson, *Memoirs*, pp. 52—56。
5. *Reasoner*, 3 (29 Sept. 1847), 539; 至于工人们特别关于颅相学的其他不同的政治宗教观点, 见 W. B. (of Bradford) to Barker, *The Pelple*, 1

- (1848), 167; and *Nottingham J.*, 5 June 1840, p. 3.
6. 见: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pp. 259, 711; and Prothero, *Artisans and Politics*, pp. 5, 332—333, et passim。对从属性工艺进行特殊的背景分析和讨论, 见: F. K. Donnelly and J. L. Baxter, “Sheffield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1791—1820”, *Int. Rev. Soc. Hist.*, 20 (1975) 398—423。
7. 这不是要辩称, 早在 19 世纪第二个 25 年以前, 工匠之于某些中等阶级下层和劳工阶层就有可能与已有的社会秩序疏远开来, 而这种疏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地位的变化(正如韦伯在论述宗教激进主义起源的经典文章中所提出的)。格温·威廉斯在《工匠与无套裤汉》(Gwyn Williams, *Artisans and Sans-culottes: popular movements in France and Britain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68)中认为 18 世纪 90 年代的激进分子是“社会上被取代的人”, 而 J. F. C. 哈里森(证实了韦伯的观点)要求人们注意 18 世纪后期工匠、小农、店主、商人、家庭佣工以及妇女对千年至福说的依赖 (*Second Coming*, pp. 221—222); 也见: E. J. Hobsbawm,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Socialism”, *Marxist Perspectives*, 1 (1978), 14—33 at pp. 23—24。
8. *Artisans and Politics*, p. 336.
9. See: R. Q. Gray, “Styles of Life: the ‘labour aristocracy’”, pp. 436, 445; and E. J. Hobsbawm, “The Labour Aristocrac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in his *Labouring Men* (1964), 272—315。对工匠的“意识形态合作”所进行的细致而敏锐的分析, 见: Trygve Tholfsen, *Working Class Radicalism in Mid-Victorian England* (1976); 也见: Geoffrey Crossick, *An Artisan Elite in Victorian Society* (1978); and R. O. Gray, *The Labour Aristocracy in Victorian Edinburgh* (Oxford, 1976)。
10. *The Works of the Late G. A. Stevens, Esq. Consisting of his Celebrated Lecture on Heads, and Songs; a new and improved edition to which is prefixed a life of the author by W. H. Badham* (1823); 关于斯蒂芬斯 (Stevens), 见: John Money, *Experience and Identity: Birmingham and*

the West Midlands, 1760—1800 (Montreal, 1977), pp. 123, 131—132。在 19 世纪以前, 诸如约翰·泰勒所著《各式各样的头颅》(John Taylor, *Heads of All Fashions; being a plaine description or definition of diverse, and sundry sorts of heads*, 1642) 之类的著作似乎并不常见, 也未激发大众太多的兴趣; 参见: *Heads of the People; or, portraits of the English* (1840—1841), 2 vols。

11. 在过去的几年中, 颅相学半身胸像已经出现在众多出版物的封面上, 如《观察家》彩色增刊、《广播时报》(*Radio Times*)、《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护理时代》(*Time, Nursing Times*)、《新闻周刊》(*Newsweek*)等刊物以及企鹅出版社重新发行的《大脑、机器和人》(Donald Mackay, *Brains, Machines, and Persons*, 1980) 以及《心的分析》(Gilbert Ryle, *The Concept of Mind*) 等著作。利用颅相学主题来为某个特殊产品做广告甚至范围更广, 《每日电讯》在约会版面中利用它, 纽约长老会医院利用它来募集资金, 一家水泵公司聪明地推销“Phlowology”, 美国科特克斯公司利用它来推销卫生巾。
12. 谋杀尤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关于詹姆斯·布洛姆菲尔德·拉什谋杀杰米先生父子案件的详细审判报告》(*A Full Report on the Trial of James Blomfield Rush for the Murder of Mr Jermy and His Son, of Stanfield Hall, in the County of Norfolk*), 包含了一张关于拉什大脑发展情况以及一份颅相学解释的插页, 1849 年前后, 该书为发行第 50 版而大做广告。佐以梅休的发现, 即关于处决拉什和曼宁的传单卖出了大约 250 万份, 关于其他的处决传单卖出了 150 万份, 那么上面的说法是可信的 (Webb, *Working Class Reader*, p. 31)。至于用颅相学来分析谋杀犯的一个典型案例, 见: app. on Haggart's cerebral development written by Combe in *The Life of David Haggart Written by Himself, While under Sentence of Death* (Edin., 1821)。关于处决罪犯的新闻描写经常用确凿的事实和公众一致的认识来报导颅相学家的发现。爱丁堡颅相学学会有一本 1856—1861 年的厚厚的剪贴簿, 全是关于这类调查的新闻剪报: MS Phrenological Scrap Book (Edin. Univ. Lib)。

13. 库姆在 1823 年登广告说, 他的课程会包括解剖大脑的内容: *Prospectus of Lectures on Phrenology by Mr Combe, to be Delivered in the Clyde St. Hall, Commencing on Wednesday 14th May 1823*。其他演讲者则用摹本来设法应付, 这些摹本通常是由安东尼·奥尼尔爱丁堡公司所提供的(该公司也提供其他东西, 如“海默医生对取自多塞特郡谢伯恩地区一位年轻人身上的胎体进行解剖的标本”的复制品, 该广告见于 *Phren. Almanac* [1842], p. 6)。
14. 例如: G. Combe and A. Combe, *On the Functions of the Cerebellum, by Drs. Gall, Vimont, and Broussais* (Edin., 1838); Orson S. Fowler, “Amativeness”, in his *Works on Phrenology, Physiology, and Kindred Subjects*, ed. Joseph Barker (1851); 也见: Lorenzo N. Fowler, *Marriage: its history and ceremonies with a phren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exposition of the functions and qualifications for happy marriages* (Manch., n. d.)。
15. E. T. Craig, “Palmistry and Phrenology”, *Phren. Mag.*, 2 (25 Feb. 1886), 148. 关于技工从事其他科学研究的困难, 见: George Head, *A Home Tour through the Manufacturing Districts of England in the Summer of 1835* (1836), p. 202。
16. “Combe’s Phrenology”, *Nat. Mag. and Monthly Critic*, 2 (1838), 103—119 at p. 119; “The Immoral Tendency of Combe’s ‘Constitution of Man’”, *Presby. Mag.*, n. s. suppl., 4 (1836), 368—378 at p. 369; *Keene’s Bath J.*, 28 Feb. 1842, n. p. 也见: Phineas Deseret, *The Christian or True Constitution of Man* (1856; 2nd ed., 1858), p. 16。
17. Myles, *Autobiography*, p. 69; Bain, *Autobiography* (1904); Gutteridge, *Light and Shadows in the Life of an Artisan* (1893), repr. in *Master and Artisan in Victorian England*, ed. V. E. Channellor (1969), 77—238(格特里奇从未提到颅相学, 但他参加了查尔斯·布雷的“考文垂互助进步班”[Coventry Mutual Improvement Class]以及 19 世纪 50 年代的生理学讲座)。关于在可怕的条件下来从事科学学习研究, 也见: William Dodd, *A Narrative of the Experience and Sufferings* [of]

- William Dodd* (2th ed., 1841; repr. ed., N. Y., 1968), esp. pp. 89, 307.
18. “Combe and Philosophy of Phrenology”, *Fraser's Mag.*, 22 (Nov. 1840), p. 509. 黑兹利特的表述也与此相仿, “Phrenological Fallacies”, *Atalax*, 5 July 1829, repr. in *Works*, vol. 20, 248—253 at p. 249.
19. Editor's introduction to [James Simpson], “Phrenology”, *Chambers's Information for the people*, 2 (1842), 129—160 at p. 129.
20. “On the Influence of Prejudice on the Arts”, *London Mercury* [一份由约翰·贝尔编辑的极端激进的报纸], 13 Vol. 1836, n. p., 该文章补充道: “自然的所有作用都是以简单和力量为特色的……我们对自然法则的探究越多, 就越概括和简单化; 对大脑法则的探究也是如此。”
21. 詹姆斯·加思·威尔金森在《所有人的科学》中就公开应用了新百科全书编纂者反对“智力财产”的语言: James Garth Wilkinson, *Science for All* (1847), pp. 3—7. 然而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工匠涉足科学研究与发明的历史及其终结(在某些情况下是因为彻底的制度剥削) 仍然需要人去编写。J. L. 海尔布伦记录了电学理论发展中 18 世纪普通人的参与情况 (“Experimental Natural Philosophy”, in Rousseau and Porter, *Ferment of Knowledge*, 357—387 at p. 369)。罗伯特·达恩顿在催眠术中注意到了这点 (*Mesmerism and the End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France* [N. Y., 1970]); 戴维·艾伦在研究植物学和自然历史时也注意到这一点 (*The Naturalist in Britain* [1976])。也见: Thompson, *The Making*, p. 322; and P. Weindling, “Science and Sedition”, p. 143.
22. In his “Essays on Phrenology, No. 1: on an organ of Sympathy, seated between Comparison and Benevolence”, *Zoist*, 4 (1848), 72—85 at p. 73.
23. Sept. 1836 in *The Journals and Miscellaneous Notebook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vol. 5 (1835—1838), ed. Merton M. Sealts (Cambridge, Mass., 1965), p. 212; 也见: 1836 年 3 月的类似表述, pp. 142, 146; 当代颅相学家西比尔·利克认为, 这是当代世界的人们诉诸颅相学的一

- 个原因：*Phrenology*(1970), p. 12。参见：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p. 210, and idem, “Self-evidence”, in her *Implicit Meanings*, pp. 284—285。
24. 见：杰克·伦敦的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Martin Eden*)中的段落，引自 Budd, *Varieties of Unbelief*, p. 139。
25. 关于以实用身份出现的颅相学，见：“Uses of Phrenology”, *Phren. J.*, 6 (1829/1830), 320—326, 368—376, 449—450, 620—630; “Practical Utility of Phrenology”, *ibid.*, 7 (1831/1832), 368—373; Joshua T. Smith, *Synopsis of Phrenology; directed chiefly to the exhibition for the utility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cience to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happiness* (London and Boston, 1839); “Practical Phrenology”, *J. Healty*, 4 [1855], 230—231; D. G. Goyder, “Marriage Considered Phrenologically”, *Phren. Ann. Almanac*, 5 (1846), 25—31; “O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Phrenology in the Ordinary Affairs of Life”, *Phren. J.*, 19 (1846), 223—227。
26. Colin Wilson, *The Outsider* (1956), p. 277. 占星术的相似物，见：Capp, *English Almanacs*, and Harrison, *Second Coming*, p. 48。虽然戈伊德的《颅相学年鉴》(*Phren. Almanac*, 1842—1846)反映了通俗文学中颅相学的前身，但尝试把颅相学与占星术结合在一起的是理查德·詹姆斯·莫里森少尉(1795—1874)：Lieut. Richard James Morrison, *Zadkiel's Magazine, or Record and Review of Astrology, Phrenology, Mesmerism, and Other Sciences* (Jan./Feb. 1849)。
27. D. G. Goyder, *Heads of the People, 1843: measurements and manipulations of heads in 1843* (MS, Edin. Univ. Lib; Gen. 608 x [v])。在这些顾客中，156人年龄介于18岁和26岁之间，43人是女性，其中大部分是女仆。
28. 例如：“Friendly Computer Clarence May Hold Key to Your Future”, *Calgary Herald*, 19 Mar 1979。布谢伊(见第五章图7)代表性地强调了颅相学在决定妻子、职员、店员和家庭佣人的性格方面的重要性。至于小老板热衷于应用这门科学作为雇人技巧的例子，见：*Phren. J.*,

8 (1832/1834), 425; 也见: Combe, "On the application of Phrenology to the Purposes of the 'Guarantee Society, for Providing Security for Persons in Situations of Trust, Where Sureties Are Required, on Payment of an Annual Premium'", *Phren. J.*, 14 (1841), 297—310 (这个公司的负责人显然通过了一项颅相学的决议: *Phren. J.*, 14 [1841], 61—62); Combe, "Practical Phrenology: choosing servants by their heads: criminal legislation", *Phren. J.*, 6 (1829/1830), 211—222; the section on "Choice of Servants" in *Constitution of Man*, pp. 176—179, and p. 61; H. C. Watson, "Relation between Cerebral Development and the Tendency to Particular Pursuits", *Phren. J.*, 8 (1832/1834), 97—108; 以及 E. J. Hytch, "On the Seclection of Keepers in Lunatic Asylums", *Lancet*, 6 Nov. 1841, pp. 190—192。至于对这一行为的批判, 见下文第八章。

29. J. D. Holm, *Phren. J.*, 9 (1834/1836), 494; Combe, *Constitution of Man*, cited in G. D. Campbell (i. e., duke of Argyll), "Phrenology: its place and relations", *North Br. Rev.*, 17 (May 1852), 41—70 at p. 59; J. N. Bailey, *Essays on Miscellaneous Subjects* (Leeds, 1842), p. 21; "Self-Knowledge", *People*, 2 (1849), 98。也见: John R. Beard, *Self Culture: a complete guide to self-instruction* (1850), esp. at p. 19。
30. Alexander Taylor, "Dundee Mechanics' Phrenological Society", pp. 456—458。库姆在《致弗朗西斯·杰弗里》(*Letter to Francis Jeffrey*)中重刊了这封信: *Letter to Francis Jeffrey*, pp. 7—8。
31. *The Autobiography of an Artisan* (1847), p. 116; Bray, "Phre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s", p. 76。
32. 例如, 见: J. L. Levison, *Lecture on the Hereditary Tendency of Drunkenness* (1839); De Giustino, *Conquest of Mind*, pp. 62—64; Cooter, "Phrenology and British Alienists", p. 144; and V. L. Hilts, "Obeying the Laws of Hereditary Descent: phrenological views on inheritance and eugenics", *J. Hist. Behav. Sci.*, 18 (1982), 62—77。

33. 《生理学原理》的主要章节最初发表在《颅相学杂志》第 6 和第 8 卷中 (1829/1830, 1832—1834); 1885 年出了第 16 版, 之前出了好几个美国版和一个依据 1837 年版翻译而成的德文版。1849 年, 安德鲁·库姆的《消化生理学》(*Physiology of Digestion*, [1836]) 出到了第 9 版, 而他自认为最有价值的著作《论婴儿的生理学和道德管理》(*A Treatise on the Physiological and Moral Management of Infancy*, [1840]), 在 19 世纪中期以前已经卖出了 9500 本, 这也使他成为“19 世纪的斯波克博士”。“人类生理学的洛克”源于约翰·布朗的过度称颂, John Brown, “Dr Andrew Combe”, in his *Horae Subsecivae* (new ed., 1900), I, 103—132。
34. “Physical Puritanism”, *Westminster Rev.*, n. s., 1 (1852), 418—419. 布朗 (1817—1856, 约翰·布朗的堂兄弟, 也是库姆兄弟的密友) 也注意到: “那个时期受过启蒙的工匠中所存在的无神论, 完全是对现在正讨论的身体美德的赞同。清洁和戒酒就是唯物主义者的宗教, 它也应该针对所有人的宗教补给”(同前书, p. 419)。乔治·艾略特刚刚担任《威斯敏斯特评论》的编辑, 就在给萨拉·亨内尔的信中热情地赞扬布朗的贡献 (见: *George Eliot Letters*, ed. G. S. Haight [1954], II, pp. 5—6)。至于类似的评价, 见: *London Sat. J.*, 3 (18 Apr. 1840), 259; and *Eliza Cook's J.*, 3 (7 Sept. 1850), 292。
35. Graham, *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Human Life* (People's edition, 1849), p. iii (关于格雷厄姆, 见 Stephen Nissenbaum, *Sex, Diet, and Debility in Jacksonian America: Sylvester Graham and health reform* [Westport, Conn., 1980]); review of “Smiles, *Physical Education; or, the nature and management of children, founded on the study of their nature and constitution* [Edin., 1838]”, *Phren. J.*, 11 (1838), 317—320。(连同对出版商原稿的评论, 见: Smiles to Combe, 20 Dec. 1837, Combe papers, NLS 7244 f 10, and Combe to Smiles, 22 Dec. 1837, NLS 7387 f 504。)斯迈尔斯在《简明传记》的“安德鲁·库姆博士”条目中对颅相学以及安德鲁·库姆给予了相当多的称颂: Smiles, *Brief Biographies* (Boston, 1861), 365—376。(关于斯迈尔斯的这方

面,比较有用的研究是 T. Travers,“Samuel Smiles and the Origins of ‘Selfhelp’: reform and the new enlightenment”, *Albion*, 9 [1977], 161—187。)受到库姆兄弟影响的同类著作有: Amariah Brigham, *Remarks on the Influence of Mental Cultivation and Mental Excitement upon Health* (Boston, 1833); Charles Caldwell, *Physical Education* (1844) (布里格姆和考德威尔都是颅相学家); T. B. Johnson, *Physiological Observations on Mental Susceptibility* (1837); G. T. Black, *The Principles of the Natural Laws of Man with the Lights Which the New Philosophy Will Shed upon the World* (1837); L. J. Beale, *The Laws of Health, in Relation to Mind and Body* (1851)。还有许多非常类似的著作,大部分都把库姆作为论述的起点。关于这方面的总体思考,见: Haley, *The Healthy Body*。

36. Bain, *Autobiography*, p. 50; 关于大众对正统医学的蔑视,见: J. W. Lake, *Medicine Unveiled* (advertised in Holyoake's *Reasoner*, 4 [8 Mar. 1848], 30)。弗雷德里克·霍利克是颅相学研究者和欧文主义社会宣传者,他在美国致力于生理学的演讲,当他说医学艺术“只得到了少数人的信赖;被多数人怀疑,甚至被有些人完全蔑视”时,他似乎一语中的: *Neuropathy; or, principles of the art of healing the sick*, q. in *Reasoner*, 3 (20 Oct. 1847), 569。也见: *Reasoner*, 7 (1 Aug. 1849), 65。
37. 引自詹姆斯·辛普森的证词, *Select Committee on Foundation Schools and Education in Ireland, Parliamentary Papers*, XIII, pt. I (1835), p. 251。科贝特卒于 1835 年;由罗伯特·麦克尼什注解的英文版布里格姆著作(注释 35)是由钱伯斯兄弟在 1836 年出版的。也见: Simpson, “On Elementary Education”, *Analyst*, 6 (1837), 7—8。
38. Vol. 7 (1835), 290。也见: Epps's *Diary*, p. 293。实用知识传播学会立刻意识到了库姆的生理学的价值,见: *Quart. J. Educ.*, 8 (1834), 326—332; and *Educ. Mag.*, 1 (Mar. 1835), 183—190。
39. Preface to Fowler's “Amativeness”, p. 1。也见: Holyoake, *The Origin and Nature of Secularism* (1896), p. 106。

40. Sidney Smith, *Principles of Phrenology* (Edin., 1838; 2nd ed., 1849), p. 15.
41. 见: John Fletcher, *Discourses on Physiology* (Edin., 1836), p. 24; and J. Blackman, "Popular Theories of Generation: the evolution of Aristotle's Works: the study of an anachronism", in Woodward and Richards, eds., *Health Care and Popular Medicine*, 56—88 at p. 88.
- 霍利约克曾写道,“他可能是一位期盼改革人类的狂热分子,但他却忽视了自我改造,没能完成这首要也是最重要的职责”,这其实是在总结许多工匠的态度:“The Healthian”, *Oracle of Reason*, 8 Oct. 1842, p. 352. See also: *Reasoner*, 7 (1 Aug. 1849), 65.
42.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Valentine Vox, the Ventriloquist* (1840), chap. 23 “Valentine Attends a Phrenological Lecture”, p. 165。也见: David M. Reese, “Of Phrenology”, in his *Humbugs of New York* (Boston, 1838), 75—76; and M. Ryan, “Physiology, Phrenology, and Materialism”, p. 49。瑞安认为,穷人不会从这种自我脱罪的行为中获得真正的安慰。
43. 例如,见:“Principles of Phrenology, IV: objections considered”, *Moral Reformer*, 1 (May 1838), 114—115。也见: C. Rosenberg, “The Bitter Fruit: heredity, disease, and social thought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Persp. Amer. Hist.*, 8 (1974), 189—235, esp. at pp. 199—200, 208。
44. Combe, q. in Gibbon, *Life of Combe*, I, p. 148。关于颅相学对基督教忍耐信条的拓展,见: John Elliotson, “An Account of the Head of Rush, the Norfolk Murderer”, *Zoist*, 8 (July 1849), 107—121 at p. 120; Robert Macnish, *Introduction to Phrenology*, p. 204; William Wildsmith,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Relative Connexion Which Subsists between the Mind and the Brain: with remarks on phrenology and materialism* (Leeds, 1828), p. 44; J. D. Burn, *The Autobiography of a Beggar Boy*, p. 20; *Phren. J.*, (1834/1836), 381。
45. “On Human Capability of Improvement”, *Phren. J.*, 7 (1831/1832),

- 197—212。参见高尔的最初理论, in Gall's "How Far Is Human Species Perfectible?" in his *On the Functions of th Brain*, vol. 6, pp. 218—287.
46. 关于把马克思主义比作加尔文主义, 见: Isaac Deutscher, *The Prophet Armed: Trotsky, 1879—1921* (N. Y., 1965), I, p. 27n.; 关于把马克思主义比作孔德的实证主义, 见: Royden Harrison, *Before the Socialist* (1965), pp. 270—271.
47. 例如, 见: the letter from W. Cookson to Joseph Barker, 24 Oct. 1848, in "Combe's Work", *The People*, 1 (1848), 199.
48. Martineau on the *Constitution of Man* in "Representative Men: Pestalozzi, the Combes, Roland Hill", *Once a Week*, 6 (18 May 1861), 575—580 at p. 579.
49. *Phrenology: its evidences and inferences, with criticisms upon Mr. Grant's recent lectures* (2nd ed., Sheffield, 1858), p. 14; 也见: James Freeman Clarke, *Autobiography, Diary, and Correspondence* (Boston, 1891), p. 49, q. in J. D. Davies, *Phrenology: fad and science*, p. 169.
50. 亨利·克拉克牧师* 是发现这种双重作用混淆在一起的许多作者之一: "因此, 有人认为颅相学摧毁了神性观念, 其他人却断言它摧毁了无神论。相信颅相学的加尔文教徒郑重地向我保证它超然于关于加尔文教真理的所有争论和怀疑; 而另一方面, 其他人则诚挚地向我证明, 它与加尔文教理是至死对立的": "Party Phrenologist", pp. 239—240.
51. Turner, *Phrenology*, p. 13; A. Taylor, "Dundee Mechanics' Phrenological Society", p. 456.
52. "Phrenology", *The People*, 1 (1848), 280.
53. 引文见 David Bakan, "The Influence of Phrenology on American Psychology", *J. Hist. Behav. Sci.*, 2 (July 1966), 200—220 at p. 201.
54. *Phil. Mag.*, 45 (Jan. 1815), 62; Chenevix, *Phrenology Article*, pp. 37—39; Paul Rogers letter to the editor, *Phreno-Magent*, 1 (May 1843), 104; cf. Uwins, *Eclectic Rev.*, 3 (Apr. 1815), 329.

55. “Book of the Week: phrenology and physiology”, *Aldine Mag.*, 1 (19 Jan. 1839), 120—122 at p. 121, 赞美《人类体格》是“迄今从人的头脑和笔尖所产生的最重要、最珍贵的书之一,有益于人类的进步和幸福”。人们经常评论,假如库姆在他关于教育的演讲中去掉颅相学,这些演讲似乎就纯粹基于常识,库姆对此的答复是,他的演讲“比起那种纯粹基于常识的演讲,对人们的理解所留下的印象要更深更持久,而且它能更确定无疑地在实践中成功实行”。引自 Jolly, *Education Developed by Combe*, p. 1。人们指责颅相学家把“世间所有的强大判断力据为己有,不给其他任何人留一丁点儿天赋睿智”,颅相学家则回击道:“我们的科学通过发现并确证人类大脑的原始能力以及它们与外部自然的关系,已经给了我们证明强大判断力的方式以及把它降低为一种人类幸福的正常的和谐方式;而那些仅仅有判断力的作者并没有这样的标准,他们自己及其读者都不能全然相信其观念的可靠性”: *Phren. J.*, 10 (1836/1837), 674。《人性》杂志(*Human Nature*)在 1868 年 8 月的一篇颅相学文章中 (p. 345) 说道,正是人所代表的“自然和不言自明的方式”,“才立刻使他将自身托付给人类的经验和常识”。
56. 卢克·伯克在伦敦技工学院的演讲,引自 *People's Phren. J.*, 1 (1843), 180; “Introduction”, *ibid.*, 1 (1843), 2。也见:“Equality”, *Reasoner*, 5 (13 Sept. 1848), 241—244, 在自然法的基础上使得不平等合法化。凭借着“邓迪一位制帽商关于社会不同阶层使用不同尺寸的帽子的论述”(“On the Size of Hats Used by Different Classes of Society; by a hat-maker of Dundee”, *Phren. J.*, 5 [1828/1829], Repr. in Cox, *Selections*, pp. 170—174), 或者“伦敦一位有经验的制帽商所观察到的全国各地人们的头部大小”(“Size of Head,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observed by an experienced hat-maker of London”, *Phren. J.*, 4 [1826/1827], 539—552), 值得尊敬的社会阶层的大脑的优越性被认为是合理的。参见 D. G. Goyder, “The Duties of Masters and Servants” in his *Sermons to My Household* (1861), p. 19: 他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一方面需要服从、另一方面需要仁慈的必然关系,他论辩道(就像他长期在颅相学演讲中所说的那样):“在上帝眼中,所有人

都是平等的；在他看来，没有个人的差别……但事实是，所有人的平等是一种抽象的平等，对它需要正确地理解；因为非常确定的事实是，这种说法已经被用来为非常不正确的行为进行辩护……造物主从来没有打算创造实际环境中的平等……在智力和身体条件方面，不同种族的人有着很大的差异。”很显然，此处的“逻辑”缺乏科学依据。

57. Ralph Waldo Emerson, *Journals and Miscellaneous Notebooks*, vol. 8 (1841—1843), ed. William H. Gilman and J. E. Parsons (Cambridge, Mass., 1970), entry for Mar. 1843, p. 341.
58. M. Ryan, *Manual of Medical Jurisprudence* (1831), pp. 16—18 as q. and condemned in *Lon. Med. & Phys. J.*, n. s., 11 (1831), 494; William Pyper, *Edin. Advertiser*, 24 Dec. 1833 (attribution and citation in Shapin, “Phrenological Knowledge”, p. 228); and Sam Sly, *Keene's Bath J.*, 28 Feb. 1843, n. p. 在赫兹利特论述颅相学的作品中，很明显对于颅相学可能会成为潜移默化大众的手段表示担忧，见：Howe, *Works*, vol. 20, esp. pp. 248—255。反对颅相学的人谴责这门科学“发源于不道德的人，那些下等阶层的人”，这种谴责可以充分解释工人阶级中的许多人赞成这门科学的原因。见 Brewin Grant, in *Discussion on Phrenology [with] Charles [sic] Donovan* (Birm., 1849), p. 3。
59. 见： *Constitution of Man*, p. 220; Comb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Phren. J.*, 6 (1829/1830), 630—634; idem, “Commercial Distress”, *Phren. J.*, 3 (1825/1826), 313—322; Andrew Combe, “Factories Regulation Bill”, *Phren. J.*, 8 (1832/1834), 231—237; “Hints to the Operative Classes in Britain”, *ibid.*, 7 (1831/1832), 276—280。邓迪的颅相学家支持 1832 年给议会递交的要求把 18 岁以下的年轻工人的工时限定到 10 小时的请愿书：G. Combe to A. Combe, 19 July 1832, *Combe Papers*, NLS 7385。至于库姆对于工人阶级拒绝限制童工工时的工厂法的反应，见：Gibbon, *Life of Combe*, I, p. 307。
60. 出自他为利物浦医学院所做的第五次演讲，引文见 *Liverpool Standard*, 6 Feb. 1838, p. 4。

61. Arguing for the Charter in "The Campsall Society and Universal Suffrage", *Sheffield Iris*, 9 Oct. 1838, n. p.
62. Watson, *Public Opinion; or safe revolution, through self representation* (1848), 书中建议成立一个全国协会作为正确统计大众意见和实施普选权的机构。大多数颅相学家并不属于被密尔称为“自然激进党”的极端激进派一翼,但属于极端自由派,只要有机会就批判辉格派,因为(正如1840年11月20日的《哈利法克斯信使》的编者按中所指出的,第2页)辉格党在选举中欺骗了太多的中等阶级。埃普斯在宪章派的支持下,1847年代表北安普顿参选,但没有成功: *Diary*, pp. 449—450; John Foster, *Class Struggle*, p. 104; R. C. G. ammage, *History of the Chartist Movement* (1894), pp. 283, 285.
63. Hodgson to Combe, 1842, q. in Gibbon, *Life of Combe*, II, p. 118. 366
64. *Religion and Science*, p. 30n.; 参见1857年的人民版第174页注释,此处的注释经过了修改,把利用体力仅仅作为最后的诉求之道;也要注意1836年《人类体格》第6版(pp. 211—212)与1855年人民版(p. 63)的下述变化:“如果道德情感和智力的支配地位是自然法则,那么,正如人们通常所观察到的,与人类生活有关的每一种情况必须与它相和谐”改变为“如果所有官能的和谐行动,万一与道德情感和智力的支配地位相冲突,这是自然的法则。”
65. 《雷诺政治指导员》(*Reynold's Political Instructor*, 1 [26 Jan. 1850], 89—90)写道:“W. J. 弗农先生是被突然抓住的一个合适人物,两年的监禁可以为他给著名的奥斯本陆军元帅(即阿尔伯特亲王)以及贝尔格雷夫广场的贵族阶层和隆巴德街的金融阶层造成的恐慌来赎罪。弗农先生被逮捕、审判,作为理所当然的结果,他被判有罪;在法官们混乱的大脑中,我们这位无恶意的和平的颅相学演讲者变成了马拉、库东或者罗伯斯庇尔,贵族老爷们立刻就判了他两年的监禁。”感谢多萝西·汤普森在这条文献上给我的帮助。
66. Willoughby Wood, "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 *Star in the East*, 25 Aug & 1 Sept, 1838, pp. 386, 397; "Mr. W. Wood's Lecture on Political Economy", *Sheffield Iris*, 5 Feb. 1839; "Campsall Society",

- ibid., 9 Oct, 1838. 1838年, 查尔斯·伍德在唐克斯特讲演厅作题为“大脑组织在人的头颅中的地位”的演讲时, 通过提及宿命论和唯物论而打破了规则; 在针对《唐克斯特新闻》对他的攻击所作的辩护中, 他指出所有颅相学家实际上都是唯物主义者, 但是他们都“太懦弱”以至于不敢承认这点, 因而就在宗教观点的压迫下被迫进行“道德欺骗”: “Knowledge versus Ignorance, or Science versus Religion: the Woods and the would-nots”, *Star in the East*, 22 Dec. 1838, p. 113. 参见: “Phrenology and Political Economy”, *Phren. J.*, 11 (1837/1838), 休伊特·沃森在此处用极其典型的颅相学方式论辩道, 他一点也不能认同诸如伍德或者乔舒亚·图尔明·史密斯这样的颅相学叛徒的观点, 即“在任何情况下, 颅相学揭示了大多数[正统]政治经济学原理的错误”(p. 201)。
67. *Sheffield Iris*, 9 Oct. 1838. 关于通过反教权主义进行文化宣传, 见: Foster, *Class Struggle*, p. 104; 关于在工人阶级历史中区分世俗论者与反教权传统的必要, 见: Eric Hobsbawm, *Age of Capital, 1848—1875* (N. Y., 1975), pp. 271—272.
68. S. T. Hall, *Mesmeric Experiences* (1845), p. 24. 霍尔特别怨愤的是, 有教养的中等阶级拒绝接受他的催眠术, 而工人阶级的某部分人却对他的催眠术抱以热情的欢迎 (pp. 21—22)。
69. [John Minter Morgan], *Hampd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834), I. p. 241n.; (有关教育以及这门科学的普及的反动观点的其他例子, 以及利用这些稻草人作为自由主义挡箭牌的例子, 见: J. Twist, *The Policy of Educating the Poor* [1822]; J. B. Summer and S. T. Coleridge, “Mechanics’ institutes and Infant Schools”, *Quart. Rev.*, 32 [Oct. 1825], 410—428, esp. at p. 415; D. Robinson, “Education of the People”, esp. p. 534; Country Gentleman, *The Consequences of a Scientific Education to the Working Classes* [1826]); T. S. Prideaux, *Gall’s Organology, repr. from Anthropol. Rev.*, 7 (Jan 1869), 76—92 at p. 11; Brewster,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ge”, p. 7; J. L. Levison, *Mental Culture; or the means of developing the human fac-*

ulties (1833), p. 207; S. Smith, *Principles of Phrenology*, p. 24.

70. 引自 Brian Simon, *History of Education*, p. 338.

71. [Engledue], "Physical Well-being: a necessary preliminary to moral and intellectual progression", *Zoist*, 5 (1847), 82—101 at p. 85; 也见: J. Forbes, *Of Happiness in Its Relation to Work and Knowledge*, pp. 31—32.

72. 在 1840 年前后,曼彻斯特的约翰·海伍德出版了施普茨海姆的《人的自然法则[概论]:一种哲学教义》([*A Sketch of*] *The Natural Laws of Man: a philosophical catechism* [1st ed., 1825])的廉价版本,也即第 7 版。该版的序言开篇这样写道:“成年男子长期以来被当作孩子。他们被告知,无知和轻信是美德,恐惧是智慧——他们能够通过谄媚而不是道德的优点来赞美上帝。各种强制规定强加在他们身上,要求他们盲目而无条件地服从这些规定……肉体上的满足已经证明足以引诱他们自觉自愿地追随其主人的美好愿望。即便宗教也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成为摧毁人类大脑的一种机器。”这种言语非常典型,见: Joshua T. Smith 在 *A Popular View of the Progress of Philosophy* (1836)中给库姆的献词。参见诸如罗伯特·洛这样的人关于选举权的政治观点与关于国家教育的“激进”观点之间明显的不一致; Simon, *History of Education*, p. 355. 367

73. 库姆在格拉斯哥关于国民教育的演讲, *North Briton Daily Mail*, 引自 Jolly, *Education Developed by Combe*, pp. 531—532; review of S. Smith's *Principles of Phrenology*, *Tait's Mag.*, 5 (Sept. 1838), 555—558.

74. A. J. Peacock, *Bradford Chartism, 1838—1840*, Borthwick Papers, no. 36 (York, 1969), p. 15. 在 19 世纪后期社会主义者与自由思想家争论不休,宣称后者正在从事一种不重要而且已经不适合时代要求的宗教问题时,人们也听到了类似的反对转变和神秘化的抱怨。见: S. Budd, "The Loss of Faith, Reason for Unbelief among Members of the Secularist Movement in England, 1850—1950", *Past and Present*, no. 36 (1967), 106—125 at p. 125; F. B. Smith, "Atheist Mission,

1840—1900”, in Robert Robson, ed., *Ideas and Institutions of Victorian Britain* (1962), 205—235 at p. 222; and Frank Harris on Bradlaugh's tremendous waste of energy on the wrong issue in *My Life and Loves* (1925; new ed., 1966), I, pp. 179, 183.

75. 例如,可以把科布登与库姆进行比较。科布登在 1848 年故意声称,为了赢得工人对自由主义的同情,“我们的贵族政治必须再次屈服”,而库姆(迟至 1854 年)在一份要求所有人享受政治权利的呼吁中声称,英国“处在中上等阶级的统治之下,他们通过常备军和教士使得民众臣服;国家因而能够承受得住他们沉溺于无知的显赫特权之中的代价”。科布登的话引自 J. T. Ward, *Chartism* (1973), p. 202, 库姆的话出自“Notes on a Visit to Germany in 1854”, *Scotsman*, 9 Sept. 1854, n. p. (应该承认,到 19 世纪 40 年代,对于许多工人群众来说,“反贵族统治”是反对各种可恶雇主的独裁统治的一个通用术语。)关于改革法案之后的贵族权力的实际状况(它被错误地与权力的意识形态现实等同起来),见:W. L. Guttsman, *The British Political Elite* (1963); Norman Gash, *Politics in the Age of Peel* (1953); idem, *Rea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English Politics, 1832—1852* (Oxford, 1965); F. M. L. Thompson, *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63); G. Kitson Clark, *Peel and the Conservative Party* (new ed., 1964); W. L. Arnstein, “The Myth of the Triumphant Victorian Middle Class”, *Historian*, 27 (1975), 205—221; and R. S. Neale, “‘The Bourgeoisie, Historically, Has Played a Most Revolutionary Part’”, in Neale and Eugene Kamenka, eds., *Feudalism, Capitalism, and Beyond* (1975), 85—102, esp. at pp. 101—102. Cf. R. Q. Gray, “Bourgeois Hegemony”, 73—93.

76. Engledue, *Cerebral Physiology* (1842), p. 5; 这段文章的其余部分很显然表明,在他看来,资产阶级革命绝没有结束。

77. 例如霍奇森在 1879 年 7 月给布雷的信中说,医治社会上的宗教愚昧和盲目“是缓慢而遥远的事情,当迷信在知识和自由思想面前落荒而逃的幸福时光还未来临时,我们该把着眼点转向一流人物”: *Life and*

- Letters*, p. 356。霍奇森当时 64 岁, 布雷 68 岁。
78. Engledue, *Cerebral Physiology*, p. 6; 又见: 同作者, “Education as It Is and as It Ought to Be”, *Zoist*, 1 (1844), 351—369, & 2 (1844), 1—20; 以及 G. Mackenzi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 (Edin., 1836)。
79. *Diary of Epps*, p. 322.
80. Marx, “The Chartists”, *New York Daily Tribune*, 25 Aug. 1852, in *Marx and Engels on Britain* (Moscow, 1962), p. 360; *Leeds Times*, 16 Nov, 1844, q. in A Tyrrell, “Smiles”, p. 112. 马蒂诺完全意识到, 要是库姆兄弟能够明白他们的钥匙不能揭开人性的秘密, 他们的计划是不完善的, “他们就不会像他们实际表现的那样成为狂热、快乐和自信的倡导者, 他们就不太可能带领着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达到其现有的进步程度”: “Representative Men... the Combes”, p. 579. 368
81. Combe, *Moral Philosophy: or, the Duties of Man* (1840; rev. ed., 1893), p. 97.
82. Engledue, “Physical Well-being”, p. 85; *Constitution of Man*, p. 335 et passim.
83. Thompson, *The Making*, p. 839。可比较工会领袖约翰·多尔蒂, 他在 1830 年曾抨击过试图阻止海外教师游行的“贵族命令”: R. G. Kirby and A. E. Musson,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John Doherty, 1798—1854* (1975), pp. 333—334.
84. 关于这把地狱之火的图解, 见 Philip Jones, *The Constitution of Man: his soul, mind, and brain, Popular phrenology tried by the word of God and proved to be Antichrist, and injurious to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1845) 的卷首插图。至于潘恩和库姆的著作被人们放在同样的背景下阅读和理解, 也得到了一些证明, 有一卷曾经属于诺丁汉的 J. R. 皮科克的书, 曾把《人类体格》第 6 版和《托马斯·潘恩政治著作》装订在一起, 现在这部著作收藏在伦敦城市大学医学史分部图书馆的颅相学著作收藏品中。至于库姆被当作巴特勒夫人所称的“约瑟夫·休谟同乡”的缩影, 见: [J. G. Lockhart], “[James Silk] Buckingham and Combe on the United States”, *Quart. Rev.*, 68 (Sep. 1841), 281—312

at p. 284.

85. "Next to religion, find who can / A system so befitting man / His mind t'exalt, delight his sense, / Or teach him pure benevolence: lines from a Southampton mechanic's Eulogy on Phrenology", q. in *Phren. J.*, 9 (1834/1836), 381.
86. 根据克利福德·格尔茨的定义, 宗教“(1)是一种象征体系,(2)其作用是使人建立强有力的、渗透性的、持久的情绪和动机,(3)其方法是通过形成关于存在的一种总体秩序的概念,(4)给这些概念穿上这样一种实在性外衣,(5)以至于情绪和动机显得特别真实”: “Religion as a Cultural System”, in Michael Benton, ed.,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Religion* (1966), 1—46 at pp. 4, 13. 也见: Raymond Firth, “Problems and Assumptions in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Religion”, in his *Essays*, 225—256, esp. at pp. 229, 232.
87. Frank Parkin, *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apitalist and communist societies* (1972), p. 82, 引自 G. Crossick, “The Labour Aristocracy and Its Values: a study of mid-Victorian Kentish London”, *Vict. Stud.*, 19 (1976), 301—328 at p. 320. 参见 Douglas, “Deciphering a Meal”, in her *Implicit Meanings*, p. 249; *Natural Symbols*, p. 137; and Roland Barthes, “The Photographic Message”, in his *Image-Music-Text*, essays selected and trans. Stephen Heath (Glasgow, 1977), 15—31 at pp. 15—16.
88. Mrs. John S. D. Pugh, *Phrenology Considered in a Religious Light: or thoughts and readings consequent on the perusal of “Combe's Constitution of Man”* (1846), p. 6. 关于与此很类似的情况, 见: 哈里特·亨特(1838年在波士顿听过库姆的演讲之后)所写的 *Glances and Glimpses; or, fifty years social, including twenty years professional life* (Boston, 1856), pp. 142—144. 至于其他女性对颅相学的反应, 见: Jane London, “Remarks on The Constitution of Man”, *Monthly Repository*, 10 (1836), 153—158; Mr. Thomas Spurr, “On the Brain as the Organ of Intellect”, in her *Course of Lectures on the Physical, Intellec-*

tual, and Religious Education of Infant Children; delivered before the ladies of Sheffield (Sheffield, 1836); [Emily G. S. Saunders], *Christian Phrenology* (1881); "Thoughts on Phrenology", *Christian Lady's Mag.*, 15 (1841), 369—371; "Dr Spurzheim", *Ladies Mag. & Lit. Gaz.*, 5 (1832), 570—572。L. 迈尔斯夫人提供了一包题为《颅相学和颅相学的道德影响》(*Phrenology and the Moral Influence of Phrenology* [1836])的图解这门科学的卡片。

89. 1838年许多妇女为了感谢库姆允许她们去听他的课,送了他一对银卡钳作为纪念(Gibbon, *Life of Combe*, I, p. 208);在一些特殊的晚会上,妇女也被允许参加颅相学的社交活动,这么做部分是为了作出一种激进的姿态,部分是为了提高出席的人数。《伦敦医学公报》的一位通讯员发现,在女性禁止参加活动的地方,她们“在家里拿着绘制的头部石膏模型,并没有闲着”：“Phrenology”, 5 (27 March 1830), 826—827 at p. 827。1828年1月25日,施普茨海姆在妻子在场的情况下告诉爱丁堡颅相学学会的成员,“颅相学家无疑认为,女士的思想也应该像我们的思想一样得到教养,以便使她们能适应她们的社会关系和职责”:引自 Carmichael, *Memoir on Spurzheim*, pp. 32—33。也见:“On the Female Character”, *Phren. J.*, 2 (1824/1825), 275—288; Combe, “Female Education”, in his *Lectures on Popular Education* (3rd ed., Edin., 1848), lect. 3; J. Wilson, *Phrenology Consistent with Reason and Revelation* (Cheltenham, 1843), I, p. xiv; Edouard Guilloit, “The Phrenological Constitution of Woman”, *J. Health*, 6 [1857], 193—194; J. W. Jackson, “On the Superiority of the Male Element in the Plan of Nature”, *Future*, 1 (1860—1861), serially 62—135; and B. Hollander, *The Female Mind* (repr. from *Ethol. J.*, Oct. 1927)。关于女性大脑与男性大脑关系的其他19世纪作品,见: B. Kanner, “The Women of England in a Century of Social Change, 1815—1914; a select bibliography”, pt. II, in M. Vicinus, ed., *A Widening Sphere: changing roles of Victorian women* (Bloomington, Ind., 1977), 199—270 at pp. 257—258。

90. 见: Flora Tristan, "English Women", in her *London Journal*, 244—261, esp. p. 249; Donald Meyer, "The Troubled Souls of Females", in his *The Positive Thinkers* (N. Y., 1980), 46—59; 也见: S. A. Shields, "Functionalism, Darwinism, and the Psychology of Women: a study in social myth", *Amer. Psychologist*, 30 (1975), 739—754.
91. "Religion as Cultural system", pp. 15, 19.
92. 见: Peter L. Berger, *The Social Reality of Religion* (1969); 关于作为符号集或能预先对我们所感知的东西进行分类的“文化元素”的图表和绘画, 见: Barry Barnes, *Interests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1977), esp. pp. 4—10; 也见: Barthes, *Mythologies*.
93. "Burke and the Edinburgh Phrenologists", *Atlas*, 4 (15 Feb. 1829) 105, in Howe, *Works of Hazlitt*, vol. 20, pp. 200—204.
94. By Feuchtwang, "Investigating Religion", p. 67, citing Louis Dumont, *Homo Hierarchicus* (1970).
95. 见: Raymond Firth, "The Sceptical Anthropologist? Social anthropology and Marxist views on society", in M. Bloch, *Marxist Analysis*, 29—60, esp. p. 32; M. Rosenberg, "Perceptual Obstacles to Class Consciousness", *Social Forces*, 32 (1953), 22—27; and H. C. Greisman and S. S. Mayer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Unreality: the real American dilemma",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2 (1977) 57—67.
96. Combe, *Science and Religion* (Edin. 4th ed., 1857), p. xvii.
97.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p. 9 (或者他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第110页中几乎一样的表述, 着重号是后加的); 也见: Thompson,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 pp. 72 ff.; M. Fellman, "Approaching popular Ideology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Hist. Reflections*, 6 (1979), 321—333; J. Femia, "Hegemony and Consciousness in the Thought of Antonio Gramsci", *Political Studies*, 23 (1975), 29—48. 关于葛兰西研究, 见: K. Nield and J. Seed, "Waiting for Gramsci", *Social Hist.*, 6 (1981), 209—227.
98. Joshua Toulmin Smith, *Phrenology Vindicated* (1836), p. 13 (着重号)

- 是后加的);至于类似的描述,见:下面的注释 110。
99. 托马斯·沃克利在 1837 年选举获胜之后第一次对芬斯伯里的选民所致的祝酒词: *London Mercury*, 3 Sept. 1837, p. 705。
100. Ur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pp. 424—425, 然而他并非没有从技术的角度注意到科学的作用:“当资本赢得科学为她所用时,难以驯服的劳工之手将一直接受驯服的教育”:引自 D. Dickson, “Science and Political Hegemony”, p. 33。关于警察和济贫院不足以赢得工人阶级的“心灵和思想”,见: G. Stedman Jones, “Working-Class culture and Working Class Politics in London, 1870—1900: notes on the re-making of a working class”, *J. Soc. Hist.*, 7 (1974), 460—508 at p. 466。
101. 参见: Bernard Semmel, *The Methodist Revolution* (1973), p. 12; 370 Gertrude Himmelfarb, *Victorian Minds* (1968), pp. 279—280; [A. Smith], “Phrenological Ethics”, p. 390。
102. Wesley, q. in Keith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Harmondsworth, 1973), p. 765。
103. 见: James Deville, “Account of a Number of Cases in Which a Change Had Been Produced on the Form of the Head by Education and Moral Training”, *Phren. J.*, 14 (1841), 32—38; and Andrew Combe, “Remarks on the Possibility of Increas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erebral Organs by Adequate Exercise of the Mental Faculties”, *Phren. J.*, 10 (1836/1837), 414—426。
104. 引自 T. Tholfsen,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Mid-Victorian Stability”, *Pol. Sci. Q.*, 86 (1971), 57—91 at pp. 82—83。
105. 关于卫理公会教徒,见: E. R. Wickham, *Church and People in an Industrial City* (1957), p. 85 et passim; Henry Pelling, review of K. S. Inglis, *Churches and the Working Classes in Victorian England* (1963) in *Past & Present*, no. 27 (1964), 128—133 at p. 129; Alan Gilbert,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Industrial England* (1976), p. 92; Robert Moore, *Pit-Men, Preachers and Politics*; 关于卫理公会教徒的

- 阶级和职业数据以及随着时间所发生的变化,见:C. D. Fiel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English Methodism: eighteenth-twentieth centuries", *Br. J. Social*, 28 (1977), 199—225。
106. *Methodist Revolution*, pp. 8—9 以及结论部分。
107. 引自 Richard Garnett, *The Life of W. J. Fox, Public Teacher and Social Reformer, 1786—1864* (1910), p. 215。
108. Holyoake, *Sixty years of an Agitator's Life* (1892, 3rd ed., 1906), I, p. 60; Wilberforce, *Practical View of the Prevailing Religious System of Professed Christians, in the Higher and Middle Classes in This County, Contrasted with Real Christianity* (1797)。威尔伯福斯的书因其切合实际、确凿、对过去的抨击、个性化以及对世间完美的积极乐观主义而闻名。
109. G. M. 扬在评论了颅相学作为技工学院定期讲授内容的例外状况的程度之后,注意到这门科学可能有助于“个性在体面这个压路机之下保持活力”: *Portrait of an Age* (1936; new ed., 1960), p. 26n。
110. 可以说,库姆在《人类体格》的结论中揭示了人们对颅相学这门科学的依赖需求意识(need-dependency),他写道:“前面所展示的道路,如果是真实的,将使我们有机会预见,改善人类状况的最成功的方法是那种最直接地诉诸人类道德情感和智力的方法;我可以通过我的经验和观察补充说明,与任何个人对人类头脑的真实状况日益熟悉的程度相称,他对这种方法的效力的相信程度也会增加。”(p. 339)
111. “Representative Men... the Combers”, p. 579. 通过这样考察库姆的颅相学,马蒂诺是在预言涂尔干把自由主义当作工业社会的世俗宗教的观点(见: Steven Lukes, “Political Ritual and Social Integration”, in his *Essays in Social Theory* [1977], 52—73)。关于 19 世纪英国有组织的自由思想运动的代理宗教功能,见: J. Eros, “The Rise of Organized Freethought in Mid-Victorian England”, *Social. Rev.* n. s 2 (1954), 98—120。
112. 参见: Webb, *Working Class Reader*, p. 160。

第七章 理查德·卡莱尔和异端科学

1. Jacob, *Radical Enlightenment*, esp. at pp. 137, 263。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丰富的二手文献,见:Gretta Jones, *Social Darwinism and English Though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iological and social theory* (Brighton, 1980); and Alfred Kelly, *The Descent of Darwin* (1981)。关于催眠术和法国激进分子,见:Darnton, *Mesmerism*。
2. William Thompson,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Most Conducive to Human Happiness* (1824), p. 274 (这本书的新版由欧文主义者威廉·佩尔出版)。关于把科学当作劳动分工的文化解毒剂,见:Maxine Berg, *The Machinery Question*, p. 150。 371
3. Frank Harris, *Life and Loves*, p. 309.
4. 例如,威廉·艾特肯每周一次向 *McDouall's Chartist and Republican Journal* 的读者介绍“科学信息”(1841年4月10日,第14—15页);and J. F. Bray, *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 or, the age of might and the age right* (Leeds, 1839), esp. at pp. 25, 29—34。
5. 引自:Shapin and Barnes, “Head and Hand”, p. 253n.;类似的言论主要集中在实用知识传播学会,见:*Poor Man's Guardian*, 31 Mar. 14 Apr. 1832, pp. 334, 359。
6. *Man: a rational advocate for universal liberty, free discussion, and equality of conditions*, 1 (7 July 1833), p. 1。一些在政治上富有战斗性的早期杂志,比如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的《人民》(*The People* [1817])、《美杜莎》(*The Medusa; or, Penny Politician* [1819]),或科贝特的《政治纪事》(*Cobbett's Political Register*)很少提到科学,这可能是时空的原因,但也可能是因为本能地对科学的不信任,或者本能地感觉到,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和意图,科学都和工人群众的实际需求不相关。
7. William Devonshire Saul in a lecture in the Rotunda, *Isis*, 1 (3 Mar. 1832), 60.
8. 引自:Tholfsen, *Working Class Radicalism*, p. 64。

9. 关于这类批评的最好例证,见:the Owenite condemnation of the BAAS editorial in *New Moral World* (下文简称“NMW”,即《新道德世界》),10 (28 Aug. 1841),68—69。同样,乔治·奥威尔对科学家的主要不满是,他们比读者更多地慑服于极权主义的思想习惯,但他们却都享有威望:“What is Science?” *Tribune*, 26 Oct. 1945, repr. in *Collected Essays*, vol. IV (Harmondsworth, 1970), p. 29。
10. 见:Gillispie, “Jacobin Philosophy of Science”;并不是所有的雅各宾派都认为科学与自由不相关或者是对自由的威胁,关于这种观点,见:L. Pearce Williams, “The Politics of Science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Clagett, *Critical Problems*, 291—308。亨利·格拉克在他为《科学家人名词典》撰写“拉瓦锡”词目时,复述了传统科学史的观点,即把雅各宾派当作流氓,把拉瓦锡当作“法国大革命时期极端恐怖统治的最著名的殉难者”, *DSB*, 69—91 at p. 67。
11. 《新道德世界》的社论中提到了“活力原理”。也可参考下文第八章和诸社成员的观点。关于温斯坦莱,见:Christopher Hill, ed., *Winstanley: the love of freedom and other writings* (Harmondsworth, 1973), pp. 42—59; and idem, “Forerunners of Socialism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ish Revolution”, *Marxism Today*, 21 (1977), 270—276 at p. 274。正统的科学群体和资产阶级团体中的一些人,比如卡莱尔、柯勒律治和朱利安·黑尔等人,也表达了活力论观点,见:R. Yeo, “Image of Science”, p. 76。总体而言,这些人和工人阶级激进分子对活力论的兴趣差别在于,后者与改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原則或多或少有着直接的联系。
12. 见:Stanley Diamond, “Anthropology in Question”, in Dell Hymes, ed., *Reinventing Anthropology* (N. Y., 1974), 401—429 at p. 410; and Barbara Goodwin, *Social Science and Utopia: nineteenth-century models of social harmony* (Hassocks, Sussex, 1978), pp. 162—163。
13. Jacob, *Radical Enlightenment*, p. 96。埃德加·齐尔泽尔(Edgar Zilsel)也考虑到了工匠的作用,“The Genesis of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Progress”, repr. in P. Wiener and A. Noland, eds., *The Roots of Scien-*

tific Thought (N. Y., 1957), 251—275。

14. 见: Michael Polanyi, *Knowing and Being* (Chicago, 1974), p. 81: “俗人通常不是因为他们分享了概念的真相而接受科学的教导, 而是因为他们慑服于科学的权威。”
15. 见: Paul Feyerabend, *Science in a Free Society*, p. 75。
16. Anthony Wedgewood Benn at a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Colloquium, “The Control of Science for Civil Needs”, Apr. 1971, q. in Morris 372 Goran, *Science and Anti-Science* (Ann Arbor, Mich., 1974), p. 11。但可参见圣西门的观点, 他认为科学家是“一群自由移动的没有天然阶级结盟的精英”: 引自 Frank Manuel, “Henri Saint-Simon on the Role of the Scientist” in his *Freedom from History*, p. 207。
17. *Anti-Dühring* (*Herr Eugen Dühring’s Revolution in Science*) (Peking, 1976), p. 33。
18. 然而, 表象是欺骗性的, 原因在于, 颅相学可能会导致政治和社会讨论, 故它有可能被排除在外。
19. 关于李森科, 见: R. M. Young, “Lysenkoism”。大众颅相学和李森科学说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 原因就在于李森科吸收了拉马克的思想, 而拉马克在反抗 18 世纪晚期的布丰科学精英主义时也部分地吸收了颅相学。
20. Carlile, *An Address to Men of Science; calling upon them to stand forward and vindicate the truth from the soul grasp and persecution of superstition* (1821), p. 23; William Wickwar, *The Struggle for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1819—1832* (1928), p. 90, q. in Weindling, “Science and Sedition”, p. 150。这一章的撰写和修改受益于乔尔·威纳的《19 世纪英国的激进主义和自由思想》(Joel Wiener, *Radicalism and Free-thought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the life of Richard Carlile*, Westport, Conn., 1983), 这是第一部完整的卡莱尔传记。它取代了我这里所使用的主要传记资料: Edward Royle, *Victorian Infidels* (Manch., 1974), pp. 31—43; and John W. Nott, “The Artisan as Agitator: Richard Carlile, 1816—1843”, Ph. D. thesis, Wisconsin, 1970。

21. *Republican*, 7 (25 Apr. 1823), p. 543。这种陈述是在他阅读了截至当时关于这门科学的唯一全面描述——一本“很薄的期刊”之后作出的。很有可能,他指的是对威廉·斯科特的《颅相学考察》(*Observations on Phrenology*)进行评论的专题论文,这篇有点矛盾的评论后来从 1823 年 3 月的《内外科评论》(*Medico-Chirurgical Rev.*)中抽出来发行了单行本。如果真是这样,一方面斯科特把颅相学与正统宗教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医学—生理学的评论家对颅相学的反对,给卡莱尔留下的大概只有疑问。卡莱尔在“宗教狂热”一文中[“Mania of Religion, Phrenologically Illustrated”, *Lion*, 3 (8 May 1829), 586—588]回顾了他从颅相学上得到的收获。
22. *Republican*, 11 (22 Apr. 1825), 487。关于卡莱尔拜访德维尔(他认为卡莱尔有一种“宗教的”特征),见:“Phrenology”, *Republican*, 13 (14 Apr. 1826), 449—451; and “Physiognomy and Phrenology Essential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rrect Moral Philosophy”, *Lion*, 1 (20 June 1828), 769—772 at p. 771; 也见 “What Is Love?” *Republican*, 11 (6 May 1825), 545—553 at p. 549。卡莱尔关于颅相学的思想很有可能受到了劳伦斯在《演讲集》中对颅相学的敬重态度的影响,他再版了劳伦斯的《演讲集》;也有可能是受到了他的朋友朱利安·希伯特的影响,希伯特是他的一个很有天赋的无神论朋友,也是他的赞助人,1824 年 4 月加入了伦敦颅相学学会(他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关于劳伦斯与卡莱尔的联系,见:W. F. Bynum, “Time’s Noblest Offspring”, pp. 135, 139, 150, 162—163; 关于希伯特(1800—1834),见:entry by J. Wiener i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odern British Radicals*, vol. I (1979), pp. 221—222。遵照他的遗嘱,希伯特的头颅被他和卡莱尔的朋友及同事皮埃尔·亨利·博姆用作颅相学研究,被存放在 W. 德文希尔·索尔的私人博物馆(“Extract from the Will of Julien Hibbert”, *Scourge*, 21 Feb. 1834), 博姆的《自传》(Baume, *Autobiography*, MS, Wellcome Institute, London, pp. 641—642)复制了他的头像;也见 Baume, *Autobiography*, MS, Wellcome Institute, London, p. 480; and Holyoake, *History of Co-operation*, II, p. 405。

23. “Mania of Religion”, p. 588; “Physiognomy and Phrenology”, p. 771.
24. *Lion*, 4 (17 July 1829), 65: “对于那一类所谓的感知器官,我只是匆匆一瞥。对于智力器官、道德器官、迷信器官以及精力器官,我观察得比较仔细,我自以为,我对他们在宗教合法性以及习俗上的倾向所作的分析已经使我的听众感到满意。”当时,他的听众“大约有 50 人”。
25. Thelwall is cited in Ian Inkster, “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Science in England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 1790—1850”, Ph. D., Sheffield, 1977, vol. II, p. 70.
26. “Phrenology”, *Republican*, p. 451. 373
27. “Phrenology”, *Lion*, 2 (3 Oct. 1828), p. 433 (关于韦尔什的观点,见: *Phren. J.*, 5 (1828/1829), 109—112); “Dr Spurzheim and Phrenology”, *Prompter*, 1 (11 June 1831), 497—500 at p. 497。也见: [Carlyle], “Craniology”, *Newgate Monthly Mag.*, 2 (Sept. 1825), 10—18, 127—130。
28. 例如,詹姆斯·帕金森就是小册子作家,也是《过去世界的生物遗骸》(James Parkinson, *Organic Remains of a Former World*, 1804—1811)的作者;约翰·西尔沃尔是巡回演讲的政治宣传家和医学著作家,也是《自然权利》(John Thelwall, *Rights of Nature*, 1796)的作者。和设菲尔德的宪政激进分子詹姆斯·蒙哥马利一样,西尔沃尔到 1825 年被完全驯服。政府对伦敦通讯学会的镇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再版和传播潘恩的著作。
29. 见: J. Ann Hone, *For the Cause of Truth: radicalism in London, 1796—1821* (Oxford, 1982), esp. at pp. 285, 336 ff.
30. *Ibid.*, pp. 355, 285.
31. Peter Linebaugh, “Labour History without the Labour Process: a note on John Gast and his times”, *Social Hist.*, 7 (1982), 319—328 at p. 323.
32. 引自: Tholfsen, *Working Class Radicalism*, p. 567; 也见: *ibid.*, p. 59。虽然,工人阶级意识,恰如福斯特(在《阶级斗争》中)所证明,在某种条

件下是能够发展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在19世纪早期存在着一种以工业工人阶级为基础的真正的工人阶级激进主义,和以工匠为基础的、从外观上看更为自由、更具有思想性的工匠激进主义。大体而言,激进的出版业仍掌握在“高级工匠”手中,尽管粗斜纹布切割工、工厂雇员或矿工可以更加频繁地发表观点,但是其背后的控制性发言权仍掌握在“肖尔迪奇的制帽匠或伯明翰的玩具制造匠和他的听众”手中,他们是有着实际渴望的启蒙理性主义的狂热爱好者。 *The Making*, p. 84。

33. *Fact versus Fiction; an essay on the functions of the brain, selected from Lawrence's lectures* (1832; 2nd ed., 1840); cf. anon., *Thought NOT a Function of the Brain: a reply to the arguments for materialism advanced by Mr. Lawrence, in his lectures on physiology* (1827).
34. *The Works of George Petrie: comprising Equality and other poems. Select extracts from the letters of Agrarius: with a biographical memoir of the author* (n. d.), p. 6。皮特里在汉韦尔精神病院度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卒于1836年2月。一般认为,他的死与博姆有关,因为博姆与皮特里的妻子同居。博姆曾是西西里政府的间谍,因此获得了可观的财产,他在新闻和流行歌谣中很有名,因为和他妹妹同居而被称为“伊斯林顿怪物”,当他妹妹于1830年死于分娩时,他把她的遗体连同死胎卖给了伦敦的一家医院。见: *Autobiography*。皮特里的激进观点可以在《人类》(Man)杂志中找到(比如8 Dec. 1830, p. 173)。《平等》是献给罗伯特·欧文的。
35. 引自: *Petrie, Works*, p. 29。
36. 见: Gwyn Williams, *Rowland Detrosier: a working class infidel, 1800—1834*, Borthwick Papers no. 28 (York, 1965), p. 15。
37. *Movement*, 2 (8 Jan. 1845), 9—12; and Chilton, “‘Materialism’ and the Author of the ‘Vestiges’”, *Reasoner*, 1 (3 June 1846), 7—8。奇尔顿觉得钱伯斯抄袭了他和查尔斯·索斯韦尔的“等级理论”。
38. “Dr Spurzheim and Phrenology”, pp. 497—498。霍利约克记录了怀疑论者对于佩利的敬意, Holyoake, *Paley Refuted in His Own Words*

- (1847)。
39. Wallace, *The Revolt of Democracy* (1913), p. 5。关于华莱士的欧文主义背景,见:Wallace, *My Life* (1905), I, pp. 87—89, 104。
40. George Eliot, *Felix Holt the Radical*, chap. 30; 引自 R. M. Young, “Man’s Place in Nature”, p. 378。
41. In his comments on “Phrenological Exhibition of the Reforming Optimist [i. e., Baume]”, *Lion*, 3 (8 May 1829), 588。
42. 然而,应该牢记的是,在《改革法案》通过之前和通过的过程中,政治个人主义对于改革家和反对改革的人士来说,类似于无政府的思想。见:D. C. Moore, “Concession or Cure: the sociological premises of the first Reform Act”, *Hist. J.*, 9 (1966), 39—59, at p. 43。 374
43. Thompson, *The Making*, pp. 845—851。
44. “Co-operative Competition against Competitive Co-operation”, *Lion*, 1 (9 Feb. 1828), 260; “Co-operation”, *Lion*, 3 (9 Jan. 1829), 39。(卡莱尔发现,只要坚持“合作只会导致平庸的社会状态”的观点,他就和李嘉图持有同样的观点了。)也见:T. W. Mercer, *Richard Carlile on Co-operation: a century old criticism. Reprinted from the Co-operative Review* (1929)。对欧文主义的类似批评是由卡莱尔在伦敦的第一个雇主托马斯·伍勒表达出来的,他是《黑矮子》杂志(*the Black Dwarf*)具有潘恩主义倾向的编辑,见:R. Hendrix, “Popular Humour and ‘The Black Dwarf’”, *J. Brit. Stud.*, 16 (1976), 108—128 at pp. 112—113。
45. *Lion*, 1 (11 Apr. 1828), 465—466; 关于汤普森论经济个人主义,见:his *Inquiry*, Pare edition, pp. 391—394。
46. “Co-operative Competition against Competitive Co-operation” (note 44) p. 260。欧内斯特·琼斯主张,为了破坏资本主义并建立社会平等,应该实行国有化合作:“A Letter to the Advocates of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and to Members of Co-operative Societies”, *Notes to the People*, 1 (1851), 27—31。与卡莱尔思想更为接近的是宪章派费格斯·奥康纳,他声称社会主义“与人的主要本能是不相符的,人的本

能是自私、自利、自立和有个性”： *Northern Star*, 23 Sept. 1848, n. p.。霍利约克和詹姆斯·林顿坚持同样的个人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观点，见：Holyoake, “The Disease of State Socialism”, a new chapter in the 2nd edition of his *History of Co-operation* (1879), II, 479—488; and Linton, *The English Republic*, ed. K. Parkes (1891), pp. 141—144。关于保守的劳工的观点，见：Charles Manby Smith, “A Working-Man’s Notions on Socialism”, in app. to his *The Working-Man’s Way in the World: being the autobiography of a journeyman printer* [1851], pp. 337—347。

47. “Competitive Co-operation versus Co-operative Competition”, *Lion*, 2 (4 July 1828), 12.
48. “Co-operation” (note 44), p. 38.
49. “Physiognomy and Phrenology”, p. 771; 也见：Carlile, “Moral Philosophy Necessarily Founded on the Animal Nature of Man; that animal nature various in its degrees and qualities, phrenologically or organically and chemically constituted and physiognomically indicated”, *Lion*, 2 (4 July 1828), 1—5.
50. 关于他鼓励技工成立互助教育学院，见：“Philosophical Institu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Mechanics”, *Republican*, 8 (26 Dec. 1823), 767; and Holyoake, *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Richard Carlile* [1870], p. 23。卡莱尔的观点和布鲁厄姆及其同伙不一样，对于他说，“科学大厦或科学殿堂”是普及潘恩著作的地方；见：“Mechanics’ Institutions and Tom Paine’s Works”, *London Mechanics’ Reg.*, 3 (4 Feb. 1826), 255—256。
51. “Physiognomy and Phrenology”, p. 771。也见：“The Creed of Richard Carlile”, *Prompter*, 1 (12 Feb. 1831), 235; Carlile, *A New View of Insanity* (1831), p. 29; idem, “Discussion with the Sect of Owenites”, *Political Reg.*, no. 8 (7 Dec. 1839), 127—128; “Mr. Carlile and the Socialists” [editorial], *New Moral World* 4 (23 Dec. 1837), 67—70; and Nott, “Carlile”, pp. 37, 158—159。

52. "Physiognomy and Phrenology", p. 771.
53. "New Plan of Reform", *Lion*, 1 (11 Jan. 1828), 33—36 at p. 33.
54. *Lion*, 1 (11 Apr. 1828), 466; *Phren. J.*, 6 (1829/1830), 623.
55. 关于资产阶级通识教育的功能, 见: André Gorz, "Technology, Technicians, and Class Struggle", in Gorz, e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the labour process and class-struggle in modern capitalism* (Hassocks, 1978), 159—189 at p. 178.
56. "Notebook VII [1858]", *Grundrisse*, trans. M. Nicolaus (Harmondsworth, 1973), p. 706.
57. *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Cobbett*, ed. W. Reitzel (1967), p. 218. 科贝特认为欧文在新拉纳克实行的教育制度正改变成长中的一代人, 使他们“养成绝对服从的习惯”。关于新拉纳克, 见第八章。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 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开始出现时, “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 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 它不用代表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象征着什么。从这时候起, 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The German Ideology*, in *Collected Works*, vol. 5 (1976), 44—46。正如恩斯特·布洛赫指出的, “对马克思来说……基本的主题从来不是精神而是人, 经济的和社会的人……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在历史过程中变化的人……他生活在利益的社会王国, 而不是思想的天国”: *On Karl Marx*, trans. J. Maxwell (N. Y., 1968), p. 111。颅相学是具体化的大脑“天国”。
58. *Lion*, 1 (11 Apr. 1828), 466; 关于总体的乌托邦思想, 见: Goodwin, *Social Science and Utopia*, pp. 150, 162—163 ff.; and Frank Manuel and Fritzie Manuel, *Utopian Thought in the Western World* (Oxford, 1979)。
59. 关于卡莱尔的各种杂志及传播和读者人数, 见: Patricia Hollis, *The Pauper Press: a study in working-class radicalism of the 1830s* (Oxford, 1970), pp. 117—120, 211; and Wickwar, *Struggle for the Press*, p. 95 et passim。关于卡莱尔声望的逐渐衰退, 见: Royle, *Victorian In-*

fidels, pp. 37—38.

60. 见: *Lion* 4 (10 July 1829), 37.
61. 关于泰勒(希伯特和博姆也跟随他), 见: Guy A. Aldred, *The Devil's Chaplain: the story of the Rev. Robert Taylor, MA, MRCS* (1784—1844) (Glasgow, 1942); 关于卡莱尔对泰勒观点的采纳, 见: Royle, *Victorian Infidels*, p. 38. 关于 18 世纪泛神论唯物主义者, 见: Jacob, *Radical Enlightenment*, esp. pp. 22, 263.
62. *Isis*, 1 (23 June 1832), 307. 她把颅相学视为改进欧文主义的工具, 见 *ibid.*, 17 Mar. 1832, p. 81 (作为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华纳街禁酒大厦的女主人, 沙普尔斯变得有点像查尔斯·布雷德洛的养母了; 见 Royle, *Victorian Infidels*, p. 308).
63. *Owen correspondence*, letter 262, 13 June 1830, 引自 Nott, "Carlile", p. 133.
64. Manuel and Manuel, *Utopian Thought*, pp. 720 ff.
65. *The Lectures of Mr Richard Carlile to the Inhabitants of Brighton with a Syllabus of his Course of Seven Lectures* [1836]. 这些讲座定于 1839 年 12 月 16 日和 23 日在伦敦城市路的科学会所举行: *Political Register*, no. 8 (7 Dec. 1839), 128.
66. Carlile, *Manuel of Freemasonry* [1860], first part published in 1825, 4th ed. of all 3 parts c. 1845. 卡莱尔在《福音》(Carlile,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Richard Carlile; showing the true parentage, birth, and life, of our Allegorical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 [1827], p. 6) 中曾提到托兰。见: Sophia Elizabeth De Morgan, *Threescore Years and Ten* (1895), pp. 46—47. 也见: J. Harrison, *Second Coming*, pp. 155—156. 卡莱尔的讽喻基督教通常为历史学家所摒弃或忽视; 诺特的《卡莱尔》(Nott, "Carlile", p. 11) 实质上是赞同 G. D. H. 科尔的《理查德·卡莱尔》(G. D. H. Cole, *Richard Carlile*, 1943, p. 3) 的, 认为这是为了实现同样的激进共和主义目标而在手段上的变化。卡莱尔的女儿西奥菲拉·卡莱尔·坎贝尔在《为出版自由而斗争》(Theophilia Carlile Campbel, *The Battle for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as Told in the*

Story of the Life of Richard Carlile, 1899)中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没有评论。

67. 关于潘恩的牛顿学说和他断言“运动不是物质的特性”,见:Royle, *Victorian Infidels*, p. 27; and John Derry, “Tom Paine: an international radical”, in his *The Radical Tradition: Tom Paine to Lloyd George* (1977), 1—45 at p. 12。在18世纪自由思想家看来,牛顿认为是上帝推动了物质的运动,如果运动是物质的内在特性,那么就使得上帝不起任何作用,因此上帝就不存在。见:Jacob, *Radical Enlightenment*, p. 240。关于平民唯灵论者和颅相催眠术,见:Barrow, “Socialism in Eternity”。
68. 引自: *Lion*, 4 (25 Sept. 1829), 395。
69. “Dr Spurzheim and Phrenology”, p. 499。
70. “Phrenology”, *Lion*, 1 (18 Apr. 1828), 481。
71. *Lion*, 2 (4 July 1829), 3。
72. *Lion*, 3 (6 Feb. 1829), 164。
73. Thomas Turton, letter to editor, *Lion*, 1 (18 Apr. 1828), 483; and idem, “A Paper Read before a Small Society in Sheffield, on the Properties of Mind”, *Lion*, 1 (25 Apr. 1828), 508—512。关于蒙哥马利对反颅相学的贡献,见他的论文: *An Essay on the Phrenology of the Hindoos and Negroes; showing that the actual character of nations as well as of individuals, may be modified by immoral, political, and other circumstances, in direct contradiction to their cerebral developments* [read before the Sheffield Lit & Phil, 7 Feb. 1827] together with strictures thereon by Cordon Thompson (1829); 也见: J. Wigley, “James Montgomery and the ‘Sheffield Iris,’ 1792—1825: a study in the weakness of provincial radicalism”, *Trans. Hunter Arch. Soc.*, 10 (1975), 173—181; and Donnelly and Baxter, “Sheffield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1791—1820”, pp. 412—413。关于戈德温的观点,见: “Of Phrenology”, in his *Thoughts on Man, His Nature, Productions, and Discoveries* (1831), 357—375; 以及稍微有点窘迫的

- 埃利奥特森所作的长篇回复, *Lancet*, to Dec. 1831, pp. 357—363。
74. 见 [Baume], “Phrenological Exhibition of the Reforming Optimist”, *Lion*, 3 (24 Apr. 1829), 541—544; *ibid.*, (8 May), 603—608。尽管博姆真诚地接受了颅相学, 相信它“必定是世界的救世主”, 而且相信“在政府的间谍中会找到最聪明的颅相学家”(*Autobiography*, pp. 60—61, 410), 但他不反对以卡莱尔在 19 世纪 20 年代早期《共和党人》(例如, vol. 10, 19 Aug. 1824, 194) 上的方式来讽刺颅相学; 例如可参考: [Baume], “Sambo’s Lecture on Craniology”, *New John Bull and Penny Satirist*, 17 Jan. 1835, copied in *Autobiography*, pp. 682—687。
75. “On the Science of God. Chapter IX”: “‘God as a spirit’”, *Political Register*, no. 7 (Nov. 1839), 105.
76. 关于把社会主义当真看成精神错乱的原因, 见: James Copland, *A Dictionary of Practical Medicine* (1858), II, p. 588, sec. 597。激进主义是“崇拜”加上“自尊”这两种天赋平均后的病态结果, 见: *Tait’s Mag.*, 5 (Sept. 1838), 557—558。
77. “Uses of Phrenology”, *Phren. J.*, 6 (1829/1830), 623.
78. Vol. 1 (10 Nov. 1833), 142.
79. 见: T. Travers, “Samuel Smiles”, p. 173; Lloyd Jones, *A Reply to Mr. R. Carlile’s Objections to the Five Fundamental Facts as Laid Down by Mr. Owen* (Manch., 1837)。
80. James Hill, *Star in the East*, 2 (23 June 1838), 214。也见: “Mr. Carlile on Equality of Condition”, *Man*, 1 (22 Dec. 1833), 190; 中等阶级出版业利用卡莱尔的虔诚, 试图把所有的激进派当成“疯疯癫癫的人”, 见: *The Printing Machine or Companion to the Library and Register of Progressive Knowledge*, 1 (June 1834), 186。到 1840 年时, 卡莱尔自己已意识到, “由于我既不是托利党、辉格党、激进分子、社会主义者, 也不是宪章派, 我发现我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见: Campbell, *Carlile*, p. 217。
81. *Science in a Free Society*, p. 75。也见: Noel Annan, *The Curious Strength of Positivism in English Political Thought* (1959), esp. pp.

- 10—11：“理性主义和宗教之间的战斗双方几乎都站在实证主义的立场——即强调证据的真实性和假设的可信性，这和德国理想主义历史学家戴维·施特劳斯的立场完全不同，他在 *Leben Jusus* 中把宗教信仰与社会结构的变化联系起来”。
82. A. L. Morton, *The English Utopia* (1952), p. 137n.
83. 罗伊·波特概括了克里斯·格林手稿的观点，格林把自然史作为英国 1820—1860 年间的意识形态，in “The Politics of Geology: the case of George Hoggart Toulmin”, *J. Hist. Ideas*, 39 (1978), 435—450 at p. 450n.。
84. *Lion*, 2 (4 July 1828), 1。霍利斯在《贫民新闻》(Hollis, *Pauper Press*, p. 308)中提到了参加反谷物法同盟的艰难(他的申请被拒绝)。
85. 引自: G. Williams, *Devosier*, p. 16。奥布赖恩和其他“原始马克思主义者”、科学社会主义者以及世俗论者一样，不仅没有意识到理性科学思想中潜藏的障碍，而且他个人也没有受到它的困扰，在这点上和卡莱尔不同。他对资产阶级和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的批判并不包括医生和外科医生、工程师、建筑师等职业者，也不包括艺术家、机械师、技工和所有其他(其人或其知识)与社会经济结构没有直接联系的人。引自: Stan Shipley, *Club Life and Socialism in Mid-Victorian London*, History Workshop Pamphlet no. 5 (1972), p. 12。
86. 1848 年 12 月 28 日，马克思致安年柯夫: *The Letters of Karl Marx*, selected and trans. Saul K. Padover (Englewood Cliffs, N. J., 1979), p. 53。也见: *Communist Manifesto*, p. 494。

第八章 彻底颠覆社会主义

1. 欧文主义者就曾这样恳求过: *Diary*, entry for 13 Mar. 1835, p. 251。霍利约克曾在《理性人》(*Reasoner*, 4 [1 Dec. 1847], 4)上写道:“所有的本性都用同一种声音喊道，人啊，指望你自己吧，除了科学没有现成的上帝。”也见: Holyoake, *History of Co-operation*, 1, p. 217。

2. Tholfsen, *Working Class Radicalism*, p. 118; J. F. C. Harrison, *Robert Owen and the Owenite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1969), p. 235.
3. 哈里森书中(J. F. C. Harrison, *Robert Owen and the Owenite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1969, pp. 239—243)顺带说明了欧文主义者对颅相学的兴趣;同一作者,“A New View of Mr. Owen”, in Pollard and Salt, *Owen: prophet of the poor*, 1—12 at p. 8; Eileen M. Yeo,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Change: a social history of some aspects of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investigation in Britain, 1830—1890”, Ph. D. thesis, Sussex, 1972, p. 42 et passim; McLaren, “Phrenology: medium and message”, p. 88; De Giustino, *Conquest of Mind*, pp. 140—145; and A. C. Grant, “New Light on an Old View”, *J. Hist. Ideas*, 29 (1968), 293—301.
4. J. C. 普里查德对高尔的受欢迎进行了解释,认为它产生于人们对洛克的人类理解学说(虽然哈特利、孔迪亚克和爱尔维修对此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的普遍不满,原因是,无论孩子如何培养,天赋似乎总是要呈现出来的: *Treatise on Insanity* (1835), p. 465.
5. Lamarck, “Systeme de Gall” [unpublished lecture, c. 1800], in William M. Wheeler and Thomas Barbour, eds., *The Lamarck Manuscripts at Harvard* (Cambridge, Mass., 1933), 3—38. 关于高尔对拉马克的看法,见: Hilts, “Phrenological Views on Inheritance and Eugenics”, p. 64.
6. 随着戈德温、普里斯特利、托马斯·霍奇斯金等人对爱尔维修思想的普及,欧文主义者从爱尔维修思想中汲取了营养;见: introduction to Harold Silver, ed., *Robert Owen on Education* (Cambridge, 1969), p. 15.
7. Spurzheim, *A View of the Elementary Principles of Education* (Edin., 1821; trans. to French, 1821), 标题改为: *Education: its elementary principles founded on the nature of man* (Manch., n. d.), pp. 14, 9. 参看巴尔扎克对颅相学不完善性所作的宿命论式评价: Honoré Balzac, *Harlot's Progress* (Paris, 1838—1847), trans. J. Waring (1896), I, p. 69; and [H. C. Robinson], *Account of Gall's New Theory*, p. 135.
8. Owen, *A Dialogue in Three Parts* (Manch., 1838), p. 11.

9. 例如: *Elements of Phrenology* (7th ed., Edin., 1850), pp. 23—24。库姆认为高尔缺乏“分析精神和分析能力,而这种分析精神和能力对于理解精神哲学的首要原则或原始官能是必需的”: Gibbon, *Life of Combe*, II, pp. 15—16。
10. S. Smith, *Principles of Phrenology*, p. v。裴斯泰罗齐的教育思想本质上是环境论教育思想,不仅得到颅相学家的广泛支持,也得到了欧文主义者的广泛支持。例如: J. L. Levison, *Mental Culture* (1833), pp. 177, 240, et passim。颅相学家 D. G. 戈伊德* 身为英国裴斯泰罗齐学校的筹办者曾访问过新拉纳克 (*Autobiography*, pp. 187—190), 詹姆斯·P. 格里夫斯在伊夫登跟随裴斯泰罗齐学习, 1825 年回英国创办伦敦幼儿学校。 378
11. *Report of Proceedings at Several Public Meetings Held in Dublin; preceded by an introductory statement of his opinions and arrangements at New Lanark extracted from his “Essays on the formation of Human Character”* (Dublin, 1823), p. iv。
12. 引自: De Morgan, *Threescore Years and Ten*, p. 156。
13. 引自: Harrison, *Owen and the Owenites*, p. 79。For the “Five Fundamental Facts”, see: *Crisis*, 1 (13 Oct. 1832), 126。
14. *Co-operative Mag.*, 3 (July 1828), 104 and repr. in *New Moral World* [下文简称 NMW], serially, 1 (3—25 Apr. 1835), 180—208。
15. Barbee-Sue Rodman, “Bentham and the Paradox of Penal Reform”, *J. Hist. Ideas*, 29 (1968) 197—210 at p. 202。
16. Hazlitt, review of Farington’s *Life of Sir Joshua Reynolds*, *Edin. Rev.*, 34 (Aug. 1820), repr. in *Works*, vol. 16, p. 189。
17. “K” [Catherine Barmby], “Phrenology”, *Co-op. Mag.*, 2 (Sept. 1826), 278—281 at pp. 279—280。关于巴姆比, 见: entry by A. L. Morton and J. Saville in *Dictionary of Labour Biography*, vol. 6 (1982) 10—18; and Barbara Taylor, *Eve and the New Jerusalem: socialism and femin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83), esp. pp. 172 ff., 386 ff。

18. William Hawkes Smith, "Remarks on the Application of Phrenology as a Test of the Practicability of Socialism", *Phren. J.*, 13 (1840), 110—128 at p. 129。关于霍克斯·史密斯, 见: Harrison, *Owen and the Owenites*, p. 74; E. Yeo,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Change", pp. 21—25; Holyoake, *Life*, pp. 48—50。也见《颅相学杂志》的讣告 (*Phren. J.*, 13 [1840], 284; and *NMW* 7 [25 Apr. 1840], 1260—1261, vol. 8 [25 July 1840], 59)。霍克斯·史密斯对颅相学的兴趣几乎与他对欧文主义的兴趣同时出现, 这种情况与卡莱尔很类似, 因为对颅相学的兴趣是使他在年轻一代激进分子中重新获得地位的手段。颅相学和欧文主义实质上更新了在他早年作为宪政激进分子时唯一神论所起的作用。
19. 因此, 亨利·克拉克牧师在论述颅相学的相反作用时声称: "欧文主义者极力向我陈述颅相学就是人类完全无责任的证据, 直到最后使我想起,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就没有人相信人类的职责并为此而奋斗, 也没有人反对欧文主义的原则": "Party Phrenologists", p. 239。
20. *On Human Responsibility as Affected by Phrenology* (privately printed, Edin., 1826), pp. 6, 1; 参见他的评论, *Essays on Phrenology* (Edin., 1819), p. 142。
21. Owen, "Formation of Character", *Crisis*, 1 (26 May 1832), p. 33。
22. 布雷最先引起人们注意是在 1836 年, 沃森的《颅相学数据》(Watson, *Statistics of Phrenology*, p. 121) 中有一篇关于考文垂的报告谈到了"一位年轻人……给技工学院作了一系列的颅相学演讲……每次的参加者大概有 200 人"。关于布雷剃光头后立即赶赴伦敦, 请德维尔为他制作头部模型(并从德维尔那里购买了 100 多个著名模型)的故事; 关于布雷鼓励玛丽安·埃文斯学习器官学课程; 关于布雷要求得到 J. W. 克罗斯的头部模型以便检查他是否适合做埃文斯的丈夫, 见: Bray, "Phrenology and the Natural Laws of Man", in his *Autobiography*, pp. 20—47; Gordon S. Haight, *George Eliot* (Oxford, 1968), p. 51; Lawrence Hanson and Elizabeth Hanson, *Marian Evans and George Eliot: a biography* (1952), pp. 316—317。也见: Gibbon, *Life*

- of Combe, II, p. 312; J. M. Robertson, *History of Freethought*, pp. 338—339; Bray, “Phre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s”, *Union*, 1 (June 1842), 75—77; and J. F. C. Harrison, “From the Margins: a view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George Eliot’s England”, paper delivered to the Eliot conference at Rutgers University, Nov. 1980.
23. 关于欧文主义者对这本书的接纳, 见: *Union*, 1 (Apr./May 1842), 21—28, 55—60; 也见: *Reasoner*, 4 (12 Apr. 1848), 39。关于颅相学家的观点, 见: *Phren. J.*, 15 (1842), 161—174(他们说只有颅相学家才能真正看懂这本书)。
24. 见: *The Philosophy of Necessity; or, the law of consequences, as applicable to mental, moral, and social science* (1841), I, p. 64; 布雷给玛丽·亨内尔的书所写的导言, Mary Hennell, *An Outline of the Various Social Systems and Communities Which Have Been Founded on the Principle of Co-operation* (1844; [该书最初是以《必然性哲学》的附录形式出版的]), pp. cvii—cviii. 379
25. 见: Peel, *Spencer*, p. 222 et passim.
26. *Philosophy of Necessity*, I, p. 44; II, pp. 464—465。也见: Bray, *Psychological and Ethical Definitions on a Psychological Basis* (1879), p. 31。
27. Quoted in the notices on the 2nd ed. of Epps, *Horae Phrenologicae* [1834], p. 92.
28. Catherine Barmby, “Phrenology”, p. 281。休·多尔蒂是傅立叶主义者的《伦敦法朗吉》的编辑, 在回应伦敦技工学院颅相学班的领导 E. J. 希奇关于“颅相学哲学”的信时, 不赞成这样的观点, 即“有些情感和习性……本身天生就是邪恶的, 在行为上完全不能产生道德一致性”, 但是他赞成, 在社会和头脑中都有着整体和谐: I (11 Dec. 1841), 586。
29. Hawkes Smith, “Application of Phrenology”, p. 119; “Address to Phrenologists”, *Co-op. Mag.*, 3 (July 1828), 99。霍利约克曾向霍克斯·史密斯学习颅相学, 称科学是“欧文主义的自然结果”: *Logbook of Self-Education*, Bishopsgate Institute, cited in Budd, *Varieties of*

Unbelief, p. 24.

30. *NMW*, 1 (17 Oct. 1835), 406.

31. *Morning Chron.*, 22 July 1839, q. in Hawkes Smith, "Chartism and Socialism-to editor. *Morning Chron.* [29 July]", *NMW*, 4 (10 Aug. 1839), 670.

32. Holyoake, *Life*, I, p. 255. 霍利克和霍利约克两人都是霍克斯·史密斯的学生,他们在伯明翰技工学院学习了颅相学知识: *ibid.*, pp. 47—49, 60—68。也见霍利约克于1846年2月10日星期天上午在汉密尔顿大街理性主义者协会举行“折中主义演讲”的招贴:“乔治·库姆和恩格尔杜博士的颅相学哲学;还包括不稳定的个人记忆力”, NLS 6. 1699(3)。库珀曾在“简历”中谈过(受库姆在曼彻斯特演讲的影响)初识颅相学,“An Autobiographical Sketch”, *Nat. Reformer*, 11 (14 June 1868), 373—374;也见他对恩格尔杜的赞美, *Investigator* 5 (Feb. 1859), 172。关于索思韦尔对颅相学的信赖,见: Southwell, *Socialism Made Easy; or, a plain exposition of Mr Owen's Views* (1840), esp. pp. 7—8; *idem*, *Superstition Unveiled* (1854), pp. 31, 33; *idem*, “The Philosophy of the Human Mind”, *NMW*, 8 (15 Aug. 1840), 109;关于人们对他在布里斯托尔演讲的反应,见: *Keene's Bath J.*, 14 Feb. 1842, n. p. 关于克拉克应用颅相学,见他的著作: *The Christian's Looking-Glass; or, a reply to the animadversions of the Rev Dr Redford LLD of Worcester, and the clergy of all denominations, who attempt to oppose the religion of charity as propounded by Robert Owen, being a lecture delivered in the Social Institution, Manchester* (Hulm, 1836)。克拉克在扉页上宣称自己是“颅相学的演讲者”。

33. William Lowe, “Lecture VI: Phrenology in Relation to Religion” (Dec. 1839), in his *Lectures*, p. 189;关于戈伊德对社会主义者的攻击,见: *NMW*, 7 (22 Feb. 1840), 1123 (此后《新道德世界》不再为他的著作做广告);朗鲍尔对伍斯特欧文主义者 S. 罗博瑟姆的攻击导致后者与反颅相学家、反社会主义者约翰·布林德利牧师的辩论(虽然朗鲍尔早就在伍斯特与布林德利的辩论中击败了布林德利): *NMW*, 5 (2

- Mar. 1839), 302; *ibid.*, 7 (11 Jan. 1840), 1018。关于考恩的攻击, 见: “Dr Cowan and the Christians of Reading”, *NMW*, 7 (2 May 1840), 273—275; 杜赫斯特在 1840 年公开抨击欧文, 他在演讲时很显然由“一位满口胡言的狂热的爱尔兰牧师 D. 德莱尼”陪伴左右: *NMW*, 7 (30 May 1840), 1263。至于反社会主义者 T. 多尔顿牧师, 也见: *NMW*, 4 (3 Feb. 1838), 124。关于布谢伊的“设菲尔德颅相学学会和反社会主义学会”, 见: Inkster, “Phrenology in Sheffield”, pp. 277—228。in *Socialism: public discussion between Mr. Alexander Campbell, socialist missionary, and the Rev. J. T. Bannister of Coventry* (Coventry, 1839), 把颅相学和库姆的分类体系尤其是智力官能的优越性加入“人性”中的人是班尼斯特(pp. 19—20)。
34. Hall, *Phreno-Magnet*, 1 (May 1843), 98. 380
35. 见: John Brindley and J. Barber, “Phrenology Discussion between Mr. Brindley and Mr. Barber, at Bristol”, [Brindley’s] *Anti-Socialist Gaz.*, 1 (Feb. 1842), 91, repr. in *Phren. J.*, 15 (1842) 185—186, 280—283; 也见: *Keene’s Bath J.* 17, 21, 24 Jan. 1842; *Midland Counties Advert.*, 10 Jan. 1839; Brindley, “Dr Andrew Combe and Phrenology”, *Birmingham J.*, 8 Dec. 1838, p. 7; *ibid.*, 10 Nov. 1838, p. 5; *Liverpool Standard*, 24 June 1842; *NMW*, 5 (26 Jan. 1839), 218; *ibid.*, 5 (2 Mar. 1839), 302; *ibid.*, 7 (11 Jan. 1840), 1018。关于布林德利, 见: Holyoake, *Life*, I, pp. 48—50; Royle, *Victorian Infidels*, p. 64; and Thomas Frost, *Forty Years Recollections* (1880), p. 18。关于格兰特, 见: Henry Turner, *Phrenology*; Grant, *Discussion with Donovan*; and Royle, *Victorian Infidels*, pp. 203—207 et passim。
36. 引文出自 1826 年 5 月在红狮广场的伦敦合作学会会议室所作的关于道德义务的演讲, *Co-op. Mag.*, 1 (Aug. 1826), 264。
37. “Phrenology”, *London Mag.*, 8 (Nov. 1823), 541—544 at p. 541: “之后, 如果说我们不是先入为主地偏爱它的话, 我们开始乐于用公正的态度来对待它。”关于欧文对颅相学的热情, 见: Gibbon, *Life of Combe*, I, p. 132。M. 布朗宁证实, 欧文至少曾购买过一座颅相学的半

身像,见:“Owen as an Educator”, in John Butt, ed., *Robert Owen: prince of cotton spinners* (1971), 67。

38. 欧文在为詹姆斯·詹宁斯的书写导言时对他的心理图案学的描述, James Jennings, *The Family Cyclopaedia; being a manual of useful and necessary knowledge* (1821), I, p. xxiv, 欧文在这篇文章中还对心理描绘图进行了图解(欧文所列出的官能有力量、勇气、感觉、理解、反省、记忆、想象、判断、爱情和自恋,这些分类与颅相学家相比,带有更多浪漫的社会反思性质); and Jennings, *An Inquiry into Phrenology* pp. 19—20 (这本著作是题献给欧文的)。
39. 引自: Alexander Cullen, *Adventures in Socialism: New Lanark Establishment and Orbiston Community* (Glasgow, 1910), p. 196。
40. 在库姆于 1820 年访问新拉纳克以后,一位在欧文的学校担任教师的人,威廉·巴兰坦,开始认真地学习颅相学,学了 6 个月之后,他写信给库姆说,他获得了更多关于人性的有价值的知识,“比我先前 6 年(在欧文先生学校时)没有这门知识的帮助时得到的收获要大得多”。《新爱丁堡评论》骄傲地重刊了这封信,“Spurzheim on Education”, *New Edin. Rev.*, 1 (1821), 321—322n。

例如,对于奥比斯顿公社的失败,汉密尔顿表示遗憾,“没有应用颅相学原则来挑选会员”:引自 Harrison, *Owen and the Owenites*, p. 184; 也见 Cullen, *Adventures in Socialism*, pp. 181, 197。

41. 罗伯特·戴尔·欧文(1801—1877)记录了他拜访施普茨海姆的经历,“Visit to Spurzheim: sketch of the phrenological theory”, *Free Inquirer*, 3 (1 Jan. 1831), 79—80, 在其自传中也有(施普茨海姆和德维尔对他做的)详细的颅相描述: *Threading My Way: twenty seven years of autobiography* (1874), pp. 296—301。他声称是在 1827 年 11 月第一次遇到施普茨海姆,但是就在一个月前他写给库姆的信里说:“我认为颅相学科学的重要性比我实际对它的关注要大,最近我被它极大地吸引了,我打算先自学,直到我确信这门科学中的头骨学内容是对还是错”: Combe papers, NLS 7220/35—36。S. T. 霍尔记载,罗伯特·欧文曾于 1843 年秋天拜访他,“他要我谈谈对他的头颅的看法”。霍尔

- 发现欧文头颅有一侧比另一侧大,欧文的解释是,“较小的一侧可能属于过时的旧世界,较大的一侧属于正在成长的‘新的道德世界’”:
“Robert Owen”, in Hall,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Remarkable People* (1873), 276。关于库姆对欧文头颅的描绘,见: *Phren. J.*, 1 (1823/1824), 235; 参见伦敦颅相学学会于 1844 年 3 月 6 日在一位汉兹先生提供了欧文头颅模型后对欧文头颅所作的描述: *Zoist*, 2 (July 1844), 162。
42. *NMW*, 2 (13 Aug. 1836), 335 and (15 Oct. 1836), 406。通过这种出版 381
方式,据称其作者“尽了最大可能使自己最喜爱的课题获得了特殊的吸引力,并精确描绘了人数众多的能干的支持者对这门科学表示支持的概貌”。在另一个场合,《新道德世界》称赞一种新的颅相学“分区半身像”是“机械论方面所做出的无数发明之一,这些发明使得各种科学能够达到现在的完美状态”: 2 (23 Jan. 1836), 102—103。
43. 《人民颅相学杂志》对此进行了报道, *People's Phren. J.*, 1 (1843), 226; 这项议案最初是在 1841 年 8 月提出的: “The Uses of Phrenology”, *NMW*, 10 (28 Aug. 1841), 67。
44. “Lecture of Mr. Saull in Bristol”, *Crisis*, 3 (5 Oct. 1833), 38。关于索尔,见: *DNB*; and J. M. Wheeler, *Dictionary of Freethinkers*, pp. 290—291。关于卡贝,见: A. McLaren, “A Prehistor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phrenology in France”, *Comp. Stud. in Soc. & Hist.*, 23 (1981), 3—22 at p. 18。
45. 见: R. G. Garnett, “E. T. Craig: communitarian, educator, phrenologist”, *Vocational Aspect*, 15 (1963), 135—150; Craig, *An Irish Commune: the history of Ralahine* (Dublin [1920]); E. T. Craig, *Educationalist and Social Reformer: a biographical sketch with phrenological delineation* [repr. from *Phren. Mag.*, 4 (Dec. 1883), 56—61]; “Memoir of E. T. Craig”, *Republican*, 9 (July/Sept. 1883), serially。
46. *Work and Wages; or, capital, currency, and production* (1865), 引自: Garnett, “Craig”, p. 150n。也见: A. E. Musson, “The Ideology of Early Co-operation in Lancashire and Cheshire”, in his *Trade Unions*

- and Social History* (1974), 173—194; Holyoake, *Self-Help by the People* (1858); Philip Backstom, *Christian Socialism and Co-operation in Victorian England* (1974); S. Pollard, “Nineteenth-Century Co-operation: from community building to shopkeeping”, in Asa Briggs and John Saville, eds., *Essays in Labour History* (1967), 74—112, esp. pp. 108—109; and G. D. H. Cole, *A Century of Co-operation* (1947).
47. Wallace, “Ralahine and Its Teaching”, in his *Studies Scientific and Social* (1900), II, 455—477 at p. 474。关于华莱士对社会主义的定义, 参见他的《我的一生》(*My Life*, 1905), II, pp. 266—267); 关于他对颅相学的信仰: “The Neglect of Phrenology”, in his *The Wonderful Century* (3rd ed., 1899), 159—193。
48. 见: Craig, *Star in the East*, 3 (8 Dec. 1838), 引自: Garnett, “Ralahine, 1831—1833”, in his *Co-operation and the Owenite Socialist Communities in Britain 1825—1845* (Manch., 1972), 110。
49. Holyoake, *History of Co-operation*, II, p. 405.
50. 见: Thompson, *The Making*, pp. 858—864; H. Silver, *Popular Education* p. 130; Arthur E. Bestor, *Backwoods Utopias: the sectarian and Owenite phase of communitarian socialism in America, 1663—1829* (Phila., 1950), p. 140; Owen, *Life of Robert Owen by Himself* (1857), pp. 151—152; Elie Halévy, *Thomas Hodgskin*, ed. A. J. Taylor (1956), p. 38。摄政王时期(1811—1830)的激进分子托马斯·伍勒和霍奇斯金、科贝特一样, 批评欧文通过规则和章程把工人降低到“纯粹的自动操作机器”的地步: *Black Dwarf*, 20 Aug. 1817, 引自: Patricia Hollis, *Class and Conflict in Nineteenth Century England, 1815—1850* (1973), pp. 31—33。
51. Gibbon, *Life of Combe*, I, p. 131; and Grant, “New Light on an Old View”, p. 294.
52. Combe to the Rev. David Welsh, 4 Oct. 1823, q. in Gibbon, *Life of Combe*, I, p. 165.
53. Combe to the Rev. David Welsh (after 4 Oct. 1823), q. in *ibid.*,

p. 165.

54. [G. Combe], *The Life and Dying Testimony of Abram Combe in Favour of Robert Owen's New Views of Man and Society*, ed. Alexander Campbell (1844), p. 8; Grant, "New Light on an Old View", p. 294. 艾布拉姆最初称他的公社为“第一个神启拥护者社会”: Harrison, *Owen and the Owenites*, p. 104.
55. 见: Abram Combe to Robert Owen, 29 Oct. 1823, printed in *NMW*, 2 (19 Dec. 1835), pp. 60—61; and Harrison, *Owen and the Owenites*, p. 105.
56. [Combe], "Phrenological Analysis of Mr. Owen's New Views of Society", *Phren. J.*, 1 (1823—1824), 218—237, esp. pp. 226, 232 (这篇论文曾提交给一位新观点的提倡者——或许是艾布拉姆, 其评论收录在脚注中); "Phrenology and Mr Owen" [containing Owen's letter to the *Edinburgh Advertiser* of 2 Mar. 1824 protesting against Combe's smear], *Phren. J.*, 1 (1823/1824), 463—466; and Owen to Combe, 26 Feb. 1821, Combe Papers, NLS 7213/156。人们不让库姆忘记他本人和他的兄弟之间的争论: 布雷在 1848 年 5 月 14 日的一封信中告诉他, “据我看来, 在三兄弟中, 他[艾布拉姆]最受人喜爱, 但他比他的时代早了一两个世纪。不过耶稣比他的时代早了 20 个世纪。”Combe Papers, NLS 7289/108—109。 382
57. A. J. Hamilton to Combe, 16 May 1824, Combe Papers, NLS 7213/46—47.
58. G. D. H. Cole, *The Life of Robert Owen* (1930), p. 222; 引文出自 *Report from the County of Lanark*, 载于 Tholfsen, *Working Class Radicalism*, p. 55; Combe, "Phrenological Analysis of Mr Owen's New Views", p. 235.
59. "Phrenological Criticism on Ballads of the Olden-times", *Edin. Mag. & Lit. Misc.*, 93 (May 1824), 543—551 at p. 544.
60. Combe et al., "Orbiston: meeting of the proprietors", *Co-op. Mag.*, 1 (Nov. 1826), 345 (由于艾布拉姆生病, 库姆代替艾布拉姆)。引入注

目的是,库姆为《合作运动杂志》而写的艾布拉姆传记(*Co-op. Mag.* 2 [Nov.& Dec. 1827] 517—520, 560—569)并没有诽谤欧文,可能是因为这类诽谤肯定会被编辑删除。艾布拉姆的《奥比斯顿纪事》(*Orbiston Reg.*)的摘录以及库姆在《合作运动杂志》为艾布拉姆所写的传记都收录进坎贝尔编《艾布拉姆·库姆的生平与临终遗言》(*the Life and Dying Testimony of Abram Combe*)。

61. Alexander Paul to A. J. Hamilton, 17 Aug. 1829, 引自 Cullen, *Adventures in Socialism*, p. 312.
62. Combe, "Parliamentary Reform", pp. 120, 127.
63. Hawkes Smith to Combe, 7 Apr. 1837, Combe Papers, NLS 7244/21; and Combe to Hawkes Smith, 28 Aug. 1838, Combe Papers, NLS 7288/82。也见: Combe, *Life of Andrew Combe*, pp. 143—145; 以及 Gibbon, *Life of Combe*, II, pp. 64—65, 该书也痛惜艾布拉姆为奥比斯顿筹集的 36000 英镑被浪费。虽然库姆在财力上完全有能力去减轻被抛入贫困中的艾布拉姆家人的痛苦,但不这么做也是出于他的个性。
64. Karl Bernhard [Duke of Saxe-Weimar-Eisenach], *Travels* (1828), 引自: Bestor, *Backwoods Utopias*, p. 81n。关于欧文主义的变化,也见: *ibid.*, pp. 82—88; and Thompson, *The Making*, pp. 859 ff.。
65. 正如哈利特·马蒂诺的故事《为了每一个人,为了所有人》,见她的《自传》(*Autobiography I*, p. 232)。
66. Owen, *A Development of the Principles and Plans on Which to Establish Self-Supporting Home Colonies* (2nd ed., 1841), p. 31, 引自: Bestor, *Backwoods Utopias*, p. 81; "Mechanics' Institutes and Socialism", *NMW*, 5 (24 Nov. 1838), 72。
67. Owen, *NMW*, 1 (25 Apr. 1835), 204。
68. 颅相学家的“认识”很难确定日期,而且他们之中明显不同;像文科硕士 R. J. 里德于 1845 年提交给阿伯丁颅相学学会的《揭露社会主义》这样的论文在 1838 年前非常罕见: *Phren. J.*, 18 (1845), 187。
69. Combe to William Ellis, 10 Apr. 1848, 引自: A. C. Grant, "Combe and

- his Circle”, p. 290。
70. Combe to C. Bray, 20 Apr. 1848, Combe Papers, NLS 7391/425—427。
也见：库姆于 1848 年 10 月 27 日给埃利斯的信中对密尔的《政治经济学》予以热情的回应，引自：Grant, “Combe and his Circle”, p. 292。
71. William Newham, *The Reciprocal Influence of Body and Mind Considered*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842), pp. 47—48: “确定无疑的事实是……颅相学的学说被用来证明令人讨厌的[社会主义]结论”。
72. 乔治·弗莱明(当时是曼彻斯特社会协会的秘书, 欧文核心委员会成员)致库姆的公开信, *NMW*, 3 (27 May 1837), 245。
73. 艾萨克·艾恩赛德(设菲尔德科学大厦的秘书)给《新道德世界》的报告, *NMW*, 11 (10 Dec. 1842), 194。
74. 引自：H. C. Watson, “Political Economy”, p. 201。
75. 关于这种观点的经典表述, 见：Henry M’Cormac, *On the Best Means of Improving the Mor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being an address, delivered on the opening of the first monthly scientific meetings, of the Belfast Mechanics’ Institution* (1830), pp. 22—24。
76. *Phren. J.*, 15 (1842), 173。尽管库姆是这部著作的最合适的评论家, 但他当时正在德国旅行, 可能无法承担这项评论工作。评论的签名为“Z”, 几乎无法证实这是库姆的签名。
77. 《新道德世界》也适时地予以赞扬, *NMW*, 3 (7 Oct. 1837), 405。
78. *Ironside*, *NMW*, 11 (10 Dec. 1842), 194。
79. “Combe’s Constitution of Man”, *Br. & For. Rev.*, p. 145; 见上面的注释 19。
80. *Ibid.*, pp. 179—180; *Constitution of Man*, pp. 219—226。
81. Bestor, *Backwoods Utopias*, p. 140; Thompson, *The Making*, pp. 857—887; J. F. C. Harrison, “The Poor Man’s Advocat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30 Apr. 1976, p. 530。
82.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Co-operative Congress; held in London on the 23rd of April 1832*, ed. William Carpenter (1832), pp. 56—57, 19。关于马里奥特, 见：Holyoake, *History of Co-operation*, I, p. 221; *Reaso-*

ner, 4 (10 May 1848), 47; *ibid.*, 5 (26 July 1848), 142; *Baptist Messenger*, no. 26 (Jan. 1861), 23; and *idem*, *Catechism on Circumstances; or,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a community* (Salford, [183?]), and *Community: a drama* [Manch., 1841].

83. T. 帕西南和 I. 普罗思罗发现,很少有欧文主义工会成员追随詹姆斯·莫里森和“牧师”史密斯的阶级冲突理论,因为他们发现这个理论与他们追求更高工资的利益毫不相关:“The London Tailor’s Strike of 1834”, *Int. Rev. Soc. Hist.*, 22 (1977), 65—107 at pp. 74—75。而且,福斯特已经发现,19世纪30年代中期在奥尔德姆有许多小雇主突然转向欧文主义,以此作为与工人阶级激进派被迫结盟的意识形态出路: *Class Struggle*, p. 136。也见: Eileen Yeo, “Robert Owen and Radical Culture”, in Pollard and Salt, *Owen: prophet of the poor*, 84—114, esp. at pp. 89—94。
84. 见: “Phrenological aphorisms”, *New Age, Concordium Gazette: a Temperance Advocate*, 1 (May/June 1844), 214, 251, 后来扩展为 93 条格言,以《颅相学》之名出版(无日期);也见: Greaves, *Three Hundred Maxims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Parents in Relation to the Education of Their Children* (1837); *Letters and Extracts from the M. S. Writings of James Pierrepont Greaves*. 2 vols., ed. Alexander Campbell (Ham Common, 1843); *The Healthian: a Journal of Human Physiology, Diet, and Regimen* (1842—1843)。关于格里夫斯和他的哲学,最好的资料是: A. F. Barham, *A Memoir of the Late James Pierrepont Greaves, Esq.*, p. II of his *An Odd Medley of Literary Curiosities, Original and Selected* [1845]。也见: W. H. G. Armytage, *Heavens Below: utopian experiments in England, 1560—1960* (1961), pp. 171—183; and Harrison, *Second Coming*, p. 159。关于哈姆公社,见: D. Hardy, *Alternative Communities in Nineteenth Century England* (1979), pp. 58—62。
85. 格里夫斯在他为“伦敦美学协会”(大约 1835 年)写的章程中,怒斥塞奇威克 1834 年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发表的反对情感研究的演讲(引

- 自上文第三章), 谴责塞奇威克这类人造成科学习惯性地失去人性: “Prospectus”, printed in Barham, *Memoir of Greaves*, pp. 16—19。因此格里夫斯提议成立“英国联合会, 为的是一方面提升星界研究和颅相学、磁学等其他科学, 另一方面保护学生”: 其章程发表在《新时代》上: *New Age*, 1 (1 Feb. 1844), 169—170。古德温·巴姆比(1820—1881)是斯宾诺莎主义的文章“论柏拉图主义城邦(The book of Platonopolis)”的作者, 该文在《共产党编年史》(*Communist Chronicle*, 1843)上连载; 见: *Dictionary of Labour Biography*, vol. 6 (1982), 20—18。
86. T. Campbell, *Carlile*, pp. 219, 253, et passim。哈姆公社学校主要由那两位大力资助卡莱尔的格洛斯特郡的寡妇所资助, 卡莱尔本人也参与了公社事务。关于共和派以及自 17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反对牛顿科学的激进传统, 见: Jacob, *Radical Enlightenment*, esp. p. 93; and Christopher Hill,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Harmondsworth, 1975)。
87. 见: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Intelligence”, *NMW*, 5 (22 Dec. 1838), p. 143, and the review of “Positive Philosophy”, *NMW*, 5 (25 May 1839), pp. 493—494, 该文一直把“孔德(Comte)”写成“库姆(Combe)”。
88. E. P. Thompson, *William Morris: 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 (1955) p. 316; 也见: J. F. C. Harrison, *Learning and Living*, p. 116。
89. 例如, 哈里森对欧文主义者托马斯·达吉恩的评论。达吉恩相信千年至福将因为小公社、颅相学和“现代科学”, 特别是流体静力学的应用而加快降临的步伐: *Second Coming*, p. 159。按照欧文主义的“千年至福趋势”来分析, 1853 年欧文自己在颅相催眠术的帮助下“皈依”招魂术不应该被当成背离理性主义观点的“非理性”怪异行为, 而应该当成是理性主义的逻辑延伸。无论我们是否把颅相催眠术视为某些欧文主义者理解神秘事物的实证主义手段, 很显然我们对于“理性”和“非理性”的事后划分如果应用到 19 世纪初及 19 世纪以前, 是毫无意义的。
90. *NMW*, 4 (24 Mar. 1838), p. 175。

91. *Co-op. Mag.*, 3 (July 1828), p. 111.
92. Frances Wright, "Phrenology", *Free Enquirer*, 3 (25 Dec. 1830), pp. 69—70. 关于赖特, 见: Margaret Lane, *Frances Wright and the "Great Experiment"* (Manch. 1974); and Taylor, *Eve and the New Jerusalem*, pp. 65 ff. .
93. R. D. Owen to Combe, 27 Oct. 1827, Combe Papers, NLS 7220/35—36. 库姆也把他的书寄了一本给老欧文; 见: Owen to Combe, 15 Nov. 1827, Combe Papers, NLS 7220/33.
94. *NMW*, 1 (21 Mar.—3 Apr. 1835), 166—180. 第二篇对话主要是关于颅相学的(pp. 169—172); 1835年3月26日, 欧文在颅相学家 J. D. 霍尔姆* 位于贝德福德广场的演讲厅宣读了这篇对话。很显然, 霍尔姆对社会主义者是友善的(弗洛拉·特里斯坦有一次和他一起去参观伦敦), 他对此作了回应, "Answer to the Dialogues Touching on Phrenology", *NMW*, 1 (18 Apr. 1835), 197—198; and *ibid.* (25 Apr. 1835), 205(该文以“欧文主义和颅相学”为题在《颅相学杂志》上重新发表, *Phren. J.*, 9 [1834/1836], 492—494, 同时还附带了一份对于欧文观点的小结, pp. 489—492)。他坚持“教育仅次于组织, 但它确实是第二位的”。“对话”作为小册子于 1838 年在曼彻斯特重印, 莫顿的《罗伯特·欧文的生平和思想》(A. L. Morton, *The Life and Ideas of Robert Owen* [1962], pp. 223—224) 也摘录了部分内容。也见: 欧文在纽卡斯尔颅相学家会议上的演说(他在那里被轰下了台): "The Phrenological Association and Meeting", *Newcastle Courant*, 7 September 1838, pt. II, p. 3.
95. "Mr. Combe's Lectures at Birmingham", *NMW*, 4 (23 June 1838), 273—274, 全文刊载在《伯明翰杂志》(*Birm. J.*, 26 May—23 June 1838), 欧文主义者讨厌库姆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他对奥比斯顿事务的拙劣处理被披露出来: "Facts about New Lanark, Motherwell, and Orbiston", *NMW*, 7 (4 Jan. 1840), p. 995: "奥比斯顿通过正确对待其中的游手好闲者和不适合人员, 正在恢复常态——它正逐渐巩固起来, 要不是伟大的颅相学家[G. 库姆]所实施的强制法律干预, 它本可

以纠正自己的弊端,在今天已成为一个繁荣的机构。”然而,他们搞错了;正如哈里森所指出的,在艾布拉姆死后接管奥比斯顿的是威廉·库姆(他是公社的主要捐献者),他“在艾布拉姆死后成功地接管奥比斯顿,当债权人在1827年迫切要求付款时,是威廉命令成员离开公社的”: *Owen and the Owenites*, p. 169. In the *Life and Dying Testimony of Abram Combe*, 坎贝尔声称,乔治·库姆作为公社的法律代理人,采取了“最有效的步骤使公社……快速地终结”。

96. *NMW*, 8 (4 July 1840), 1—3.

97. 根据霍利约克的说法,墨菲是伯明翰学会有名望的成员,他作为牙科医生的技能使他拥有了“足够高的地位,任何社会迫害都不会落到他的头上”: *History of Co-operation*, I, p. 222.

98. Holyoake, “Fourteen Nights with George Combe”, in his *Life*, I, 60—65; idem, “Reminiscences”, *Reasoner*, 1 (16 Sept. 1846), 225—226, and in *Life*, I, 48—49(但日期是错的)。也见: Holyoake to Combe, 24 Jan. 1846, Combe Papers, NLS 7280 f 69(库姆称他是“一个头脑失常的激进分子”)。

99. Murphy, “Phrenology”, in his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 213—221。《新道德世界》在其评论中称,关于颅相学的这部分是这本书最令人兴奋的内容: 5 (3 Nov. 1838), 28—30。参看一位法国左派对颅相学所作的罕见的批评: Dr D. Cerise, *Exposé et examen critique du système phrenologique* (Paris, 1836), 转引自: McLaren, “Phrenology in France”, p. 12。

100. Murphy,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 pp. 220, 221。如果一个人的颅相解读不太好的话,他会招致人们的羞辱,关于这样的例子,见: “Specimen of Antiphrenological Fact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Mr G. Combe and Mr David Dunn, teacher at New Lanark”, *Phren. J.*, 10 (1836/1837), 267—270。对于如此利用颅相学尤其是把颅相学应用于评价仆人的谴责,见: “Phrenology”, *Dublin Penny J.*, 1 (July 1832), 39—40 at p. 39; and “Craniology”, *Olla Podrida*, [1] (June 1825), 178—182。

101. R. D. Owen to Combe, 27 Oct. 1827, Combe Papers NLS 7220/35—36; Murphy,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 pp. 200, 221.
102. Ibid., pp. 219—220。关于密尔的《论自然》，见第四章。
103. 作为曾经与布林德利辩论（见 Garnett, *Co-operation*, p. 175）的唯物主义鼓吹者，墨菲能够接受颅相学把大脑作为精神器官，但是他不承认颅相学观点有什么新颖性。
104. Ironside, *NMW*, 11 (10 Dec. 1842), 194.
105. *NMW*, 11 (17 Dec. 1842), 202.
106. “Phrenology versus Murphy”, *NMW*, 5 (22 Dec. 1838), 130—131。
也见：《新道德世界》一个较早的辩论，*NMW*, 5 (12 Jan. 1839), 190。
107. “George Combe’s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review], *NMW*, 9 (8 May 1841), 288。《新道德世界》认为，这样的布道是库姆著作“主要的、本质的目标”。10年以后，詹姆斯·林顿遇到了库姆，听他谈论“罗伯特·欧文在美国殖民地‘新和谐’的不切实际的趣闻”：Linton, *Memories* (1897), p. 123。
108. Ironside, *NMW*, 11 (10 Dec. 1842), 194; Engledue, *Cerebral Physiology*；恩格尔杜的《大脑生理学》1842年版由詹姆斯·沃森出版，仅售4便士。《新道德世界》也以“颅相学哲学和动物磁学”为题连载此书，*NMW*, 11 (17 Sept.—8 Oct. 1842)，《医学时代》重新发表了该书原版内容，*Medical Times*, 6 (2 July 1842), 209—214。对于《新道德世界》来说，这是自1838年与库姆决裂以来第一篇关于颅相学的重头文章。其后出现了很多热衷于这方面的文章，包括一篇头版社论，“On the Applicability of Phrenology to the General Affairs and Management of the Rational Society”，*NMW*, 11 (26 Nov. 1842), 173—174；“Materialism and Phrenology”，(8 & 15 Oct. 1842)。
109. Isaac Vale, letter to the editor, *People’s Phren. J.*, 1 (1843), 167.
110. 例如：M. Q. Ryall, “Science and Religion”, *Movement*, 2 June 1844, pp. 196—197；[Robert Buchannan], “Mrs. Pugh on Phrenology”, *Reasoner* 1 (20 Aug. 1846), 184—186；T. Paterson, “Cerebral Physiology”, *Oracle of Reason* 1 (8 Oct. 1842), 345—346。

111. *NMW*, 11 (20 May 1843), 337。也见：理性宗教家学会利兹和德比分会的报告：*NMW* 11 (17 Dec. 1842), 202—203；其后一周艾恩赛德的评论，*ibid.* (31 Dec. 1842), 218；纽卡斯尔的报告，*ibid.* (27 May 1843), 389。也见：“Animal Magnetism”，*NMW*, 11 (25 Feb. 1843), 278—279；and R. D. Owen, *Neurology: an account of some experiments in cerebral physiology. By Dr Buchanan of Louisville* (1842)；*idem*, *Autobiography*, p. 240n。他认为布坎南的发现“不仅与高尔和施普茨海姆的发现并驾齐驱，而且也不亚于任何毕生从事科学、为人类谋福利的哲学家或慈善家”（第 11 页）。
112. 尤其见：Ironsides's report *NMW*, 11 (7 Jan. 1843), 228。1843 年，J. N. 贝利* 在约翰街学院连续作了颇相催眠术的演讲，约翰·埃利斯* 在斯托克波特科学大厦作了现场演示。也见：*New Age*, 1 (10 June 1843), 44—45；*Mesmerist*, 1 (27 May 1843), 23；*NMW*, 22 (13 Apr. 1844), 335；*ibid.* (11 May 1844), 366。
113. *NMW*, 11 (10 Dec. 1842), 194。
114. *Cerebral Physiology*, p. 5。也见：伊普斯威奇的报告，*NMW*, 11 (24 Dec. 1842), 212。
115. *NMW*, 11 (17 Dec. 1842), 202。一篇关于恩格尔杜和埃利奥特森的《活力论者》的长篇评论，对此进行了类似的警告：*NMW*, 12 (29 July 1843), 37—39。参见 J. L. Hammond and Barbara Hammond, *The Skilled Labourer* (1936), p. 381：“在这样一个创新和发展迅速的时代，人们很容易相信人类的一个任务是努力探知自然的奥秘，而忘记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努力寻找普通生活可以忍受的基础的历史。”
116. 见：Royle, *Victorian Infidels*, pp. 70—71 ff.；关于洛维特，见：*Life and Struggles of William Lovett in His Pursuit of Bread, Knowledge, and Freedom* (1876; repr. 1967), p. 48。关于赫瑟林顿，见他的“Mr. Owen and the Working Classes”，*Poor Man's Guardian*, 14 Jan. 1832, p. 245；and *ibid.*, 24 Dec. 1831, p. 221。见：G. D. H. Cole, *Robert Owen* (Boston, 1925), p. 225。
117. Engels, *Anti-Dühring*, p. 341, 他补充道，“我本人就认识好几位曾经

参加了这个共产主义典型试验的人。”

118. 在这批帮着煽起欧文主义者对颅相催眠术兴趣的反颅相催眠术师中就有伟大的“反天主教会”运动斗士休·莫尼尔牧师,见:“Satanic Agency and Mesmerism”, *NMW*, 11 (11 Feb. 1843), 263。
119. *NMW*, 11 (4 Mar. 1843), 292。这种评论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在于它是对 S. T. 霍尔所做的颅相催眠术演示的回应(参见第五章注释 58 中恩格斯的评论)。
120. *Phren. J.*, 15 (1842), 86—87。(雷德伯恩认为,基督教社会主义是荒谬的,颅相学和生理学已经证明宗教在学校中没有地位,他支持对和谐大厅的规则进行修正,把“上帝”和“宗教”的词汇从中删去,代之以“自然”和“道德”: *Movement*, 2 March 1844, p. 93。几年以后,他发动了释放异教囚徒查尔斯·索思韦尔的运动)。关于埃普斯在约翰街学院的演讲,见: *NMW*, 7 (18 Apr. 1840), 1253; and *ibid.* (6 June 1840), 1286—1287。该学院的颅相学班每周日下午上课,学费是每个季度 2 先令或 7 个月 4 先令但夏天除外,但有些成员还支付额外的费用以便能“更好地利用那里的书籍”。也见: *Movement*, 1 (25 Sept. 1844), 360; *Reasoner*, 1 (July-Oct. 1846), 142; 270, 288, 296, 304, 308。对约翰街学院的描述,见: Wallace, *My Life*, I, p. 87。
121. *Phren. J.*, 15 (1842), 87。
122. 见: Nicholas Abercrombie and B. S. Turner, “The Dominant Ideology Thesis”, *Br. J. Sociol.*, 29 (1978), 149—170, esp. at p. 161; Thompson,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 R. Q. Gray, “Styles of Life”, esp. pp. 437—438。
123. Report to Congress, May 1843, *NMW*, 11 (10 June 1843), 410。这种评论就出现在这个大会上, A1 分会(约翰街)的沃尔特·纽沃尔建议用颅相学来挑选申请进入和谐大厅的人,并且声称 A1 分会的颅相学班现在已经“拥有了财产,主要是书籍和模型,现在已经达到了 22 英镑,这些钱是班级成员捐献的”。由于 A1 分会在 1842 年 5 月到 1843 年 5 月捐献给和谐大厅的公共基金已从 105 英镑降到了 69 英镑,难怪劳埃德·琼斯会抱怨。 *NMW*, 11 (20 May 1843), 377—378。关于

- 琼斯作为库姆颅相学批评者的名声,也见: *Movement*, 2 (19 Feb. 1845), 62n.
124. *William Morris*, p. 356.
125. Craig, "Owen in Ireland", *American Socialist*, 1 Nov. 1877, 转引自: Gannett, "Craig", p. 136; 重刊于 Craig, *Memoir and in Memorium of Henry Travis, M. D.* (Manch., n. d.), p. 10。同样,霍克斯·史密斯在 1840 年指责欧文出于急躁而拒绝颅相学,误解颅相学是站不住脚的: *Phren. J.*, 13 (1840), 124。对于史密斯来说,“社会主义”是“有目的地实现乔治·库姆的逻辑推论”: *Letters on the State and Prospects of Society* (Birm., 1838), pp. 19—20, 32。阿瑟·乔治·奥尼尔,在格拉斯哥的医学院做学生时就对颅相学产生了兴趣,他通过颅相学演讲在一定程度上资助了自己的学习,见: A. Wilson, "Chartism in Glasgow", in Asa Briggs, ed., *Chartist Studies* (1959), 249—287; and Mark Hovell, *The Chartist Movement* (Manch., 1918, repr. 1966), pp. 200—203。关于奥尼尔的基督教宪章派教会中的颅相学,见: R. Alun Jones, "Knowledge Chartism", M. A. thesis, Birmingham, 1938, p. 206。关于库珀,见: *Life*, p. 169; G. D. H. Cole, *Chartist Portraits* (1941; repr. 1965), pp. 187—217; and Robert J. Conklin, *Thomas Cooper the Chartist (1805—1892)* (Manila, 1935)。金斯利在《埃尔顿·洛克》(*Alton Locke*)中对宪章运动进行了描绘,其中有很多关于颅相学的讨论。这本书主要是根据库珀写的,而库珀与金斯利是密友。另一个涉足异教科学(最有可能就是颅相学)的宪章派主要人物是亨利·文森特,1841 年他出狱后担任巴斯的基督教宪章派教会的领导。他采纳了洛维特和约翰·科林关于建立会堂的计划,会堂能使得宪章派获得“政治、道德和科学方面的信息”。见布雷恩·哈里森在《劳动者传记词典》中为文森特所写的条目: *Dictionary of Labour Biography*, vol. 2, 326—334。
126. Lovett to G. Combe, 22 Nov. 1849; 以及 *The Charter*, 3 Feb. 1839, 这两个文献都转载于 R. A. Jones, "Knowledge Chartism", pp. 57—58。洛维特在沃里克监狱撰写《宪章运动:人民的新组织》(1840)时迫切

希望他妻子给他提供的一本书就是《人类体格》，洛维特在自己书中向库姆表示感谢。

127. Lovett, *Life and Struggles* (1876; repr. 1967), pp. 238, 279; *People's Phren. J.*, 1843, p. 166; Jolly, *Education as Developed by Combe*, p. 230。洛维特受到谴责, 见: *McDouall's Chartist & Repub. J.*, 1 May 1841, p. 35; and in the *Northern Star*, 8 May 1841, p. 2 (其中赫瑟林顿、霍利约克和奥尼尔被讽为一丘之貉)。其他与洛维特同类的朋友还包括詹姆斯·林顿和乔治·豪厄尔, 后者出身于与洛维特类似的卫理公会家庭背景, 他在《英国争论家》(*British Controversialis*) 的建议下阅读了《人类体格》; 见: F. B. Smith, *Linton*, esp. p. 34; and F. M. Leventhal, *Respectable Radical: George Howell and Victorian working class politics* (1971), pp. 12, 23。关于洛维特作为维多利亚早期工人阶级激进分子的典型, 见: R. H. Tawney's preface to the 1920 reprint edition of Lovett's *Life*, p. vi。
128. 关于查尔斯·索思韦尔相信建立在真诚和进步之基础上的竞争观念, 见: F. B. Smith, "The Atheist Mission", p. 219; and Royle, *Victorian Infidels*, p. 70。
129. 早在 1842 年, 霍利约克在《理智的神谕》中谈到理查德·卡莱尔时声称: “各等级的改革家都感谢卡莱尔——他的美德值得赢得他们的尊重”: 1 (30 July 1842), 257。卡莱尔在去世前不久写道, “我越来越喜欢霍利约克”, 他的女儿补充说, 他“经常希望霍利约克是他的儿子, 霍利约克也希望自己真的是他的儿子”: 转引自 Campbell, *Carlile*, p. 257。索思韦尔在模范会堂咖啡馆所作“理查德·卡莱尔的生平与时代”的演讲中也颂扬卡莱尔: *Reasoner*, 2 (23 Dec. 1847), 8。
130. 当霍利约克认为格里夫斯已几近疯狂的时候, 卡莱尔的讽喻基督教似乎被这些人悄悄遗忘了: *Reasoner*, 1 (21 Oct. 1846), 265—266。拒绝泛神论的威廉·奇尔顿在他对《天地万物自然沿革的痕迹》的评论中写道, “确实, 唯物主义和[钱伯斯]……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相信物质财产已足以产生宇宙现象”: *Reasoner*, 1 (3 June 1846), 8。

131. 1858年,布雷德洛取代霍利约克担任世俗协会的主席,《伦敦调查者》388
 宣称,“刚刚过去的25年中,《人类体格》在促使更多的人信仰自由思想方面远超其他任何力量”:5(1858),93。也见:“Phrenology as It Affects Free Will and Immaterialism”, *London Investigator*, 1 (July 1854), 49; T. Paterson, “Phrenology and Materialism”, *Oracle of Reason*, 1 (10 Sept. 1842), 313—314; idem, “Cerebral Physiology and Materialism”, *ibid.*, (8 Oct. 1842), 345—346; *Free-Thinkers Information for the People*, 2 [1843], 20; and M. Q. Ryall, “Science and Religion”, *Movement*, 2 June 1844, pp. 196—197。撒缪尔·布朗在《自然的清教徒主义》(第419页)一文中写道:“不能否认,欧文和他的信徒长期以来一直[和库姆兄弟一样]致力于同样的工作,当时在大城市有文化的工匠中盛行的无神论都赞成现在正被人们讨论的身体美德。整洁和禁酒是真正的唯物主义信仰,它们应该成为宗教的补充内容。”
132. Craig, *History of Ralahine*, p. 145。参看 H. G. 阿特金森和 H. 马蒂诺:“我们并不反对……人的权利和财产的权利;我们反对的只是谎言、伪善和各种骗人的谬论。我们期望真正的自由——感知什么是真理、公正地思考所有问题的思想自由”: *Laws of Man's Nature and Development*, p. 190。
133. Holyoake, “Socialism”, *Movement*, 1 (20 Jan. 1844), 41。关于库姆以及世俗主义这个词的起源,见: Jolly, *Education as Developed by Combe*, p. 718; Holyoake, *Life*, II, pp. 254—255, 293; and idem, *Origins and Nature of Secularism* (1896)。
134. 这就是威廉·贝特森对一位一战士兵反应的描述,这个士兵感到达尔文主义不过是“科学的加尔文主义”,除此无他:转引自 Arthur Koestler, *The Case of the Midwife Toad* (1971), p. 31。

结 语

1. James Hunt [詹姆斯·亨特,伦敦人类学学会的创建者和主席], “On

- Physio-Anthropology: its aim and method”, *J. Anthropol. Soc.*, 5 (June 1867), ccxvii. 因此, E. W. 考克斯* 在 1878 年 11 月的全英国第五次心理学学会上提议, 把该组织的名称改为“气体治疗学学会 (Pneumatological Society)”: *Proceedings of the Psychological Society, 1875—1879 (1880)*, p. 8.
2. Lewes, “Phrenology in France”, *Blackwoods Mag.*, 82 (Dec. 1857), 665—674, esp. at p. 673; idem, “Phrenology”, in hi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1857), 629—645; Spencer,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1855), p. 607; Hunt, “Physio-Anthropology”, p. ccxiv; 又见: B. Hollander, “Herbert Spencer as a Phrenologist”, *Westminster Rev.*, 139 (1893), 142—154.
 3. Bray, *Autobiography*, p. 23.
 4. 例如, James Cars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Phrenology Are the Only Principles Capable of Being Reconciled with the Immateriality and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1868), pp. 63—64; A. R. Wallace, “Neglect of Phrenology”, p. 179; Bernard Hollander, *In Search of the Soul and the Mechanism of Thought, Emotion, and Conduct* [c. 1920], I, pp. 359—363; J. M. Robertson, “The Revival of Phrenology”.
 5. Ibid., pp. 250, 255. 关于医学界的观点, 见: *J. Psychol. Med.*, 6 (1853), 344; Hollander, *The Revival of Phrenology* (1901), p. 393.
 6. 尤其是: William Mattieu Williams, *A Vindication of Phrenology* (1894), p. 307.
 7. 关于帕拉塞尔主义, 见: Charles Webster, *From Paracelsus to Newton* (Cambridge, 1982); idem, “Paracelsus and Paracelsianism: basic data”, *Bull. Soc. Social Hist. Med.*, no. 30—31 (1982), 47—50. 关于占星术, 见: K.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pp. 341 ff.; and Capp, *English Almanacs*, chap. 8, “The Eighteenth Century”.
 8. 见: S. Smith, *Principles of Phrenology* (2nd ed., 1849), p. iii; W. B. Hodgson, letter of 18 July 1859, in *Life and Letters*, p. 22; H. Martineau, “Representative Men... the Combes”, p. 579; Gibbon, *Life of*

- Combe, I, p. xi; Nicholas Morgan, *The Skull and Brain: their indications of character and anatomical relations* (1875), p. 201.
9. 《论性格研究, 兼评颅相学》(*On the Study of Character; including an estimate of phrenology*, 1861) 的前言重印了这篇文章。也见: H. C. Bastian, "Phrenology: old and new", p. 520。关于福勒和韦尔斯, 见: M. B. Stern, *Phrenological Fowlers*; and J. Millott Severn, "The Late Professor L. N. Fowler", *Popular Phrenologist*, 1 (Oct. 1896), 148。关于 19 世纪 50 年代颅相学大众化的中断, 见: Gibbon, *Life of Combe*, II, p. 360; "Death of George Combe", *J. Health & Phren. Mag.*, 7 (July 1858), 142—143 (这份《健康和颅相学杂志》在两年没有发表有关颅相学的文章以后, 在 1860 年改名为《健康和素食主义导刊》[*Journal of Health and Vegetarian Messenger*]); "Phrenology", *Human Nature*, 2 (1868), 346。
10. W. H. Thomson, *Brain and Personality*, p. 20.
11. "Professor Bridges' Manipulation of Viscount Palmerston", *J. Health & Phren. Mag.*, 7 (Apr. 1858), 58—59; 又见 Bridges, *Criminals, Crimes, and Their Governing Laws as Demonstrated by the Sciences of Physiology and Mental Geometry* (Liverpool, 1860), preface。A. 麦克拉伦记载, 威尔伯福斯主教曾于 1852 年让人解读他的头颅: "Medium and Message", p. 90。
12. 在有关精神病、犯罪和教育等方面的严肃的颅相学讨论处于衰落时, 仅有的例外是詹姆斯·戴维和约翰·布朗的论文: James G. Davey, "Paper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Crime and Insanity", *J. Mental Sci.*, 5 (1858), 82—94; John P. Brown, *Phre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Education, Insanity, and Prison Discipline* (1860)。关于颅相学、人种学和人类学, 见: J. W. Jackson, *Ethnology and Phrenology as an Aid to the Historian* (1863); P. A. Erickson, "Phrenology and Physical Anthropology: the George Combe connec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18 (1977), 92—93; Marvin Harris, "Raciology, Phrenology, and the Cephalic Index", in his *The Rise of Anthropological Theo-*

- ry (1968), 99; and Nancy Stepan, *The Idea of Race in Science: Great Britain, 1800—1960* (1982), esp. pp. 20—28.
13. William Osler, “On the Brain of Criminals: with a description of the brains of two murderers”, *Canadian Med. & Surg. J.*, 10 (1881/1882), 385—398; and “Report on the Brains of Richards and O’Rourke”, *ibid.*, 11 (1882/1883), 461—466。关于科南·道尔和颅相学, 参见: Madeleine B. Stern, *The Game’s A Head: a phrenological case-study of Sherlock Holmes and Arthur Conan Doyle* (Rockville Center, N. Y., 1983)。
14. 关于颅相学与优生学的关系, 见: Hilts, “Hereditary Descent”; 皮尔逊是伦敦大学第一位优生学高尔顿教授, 他在(致力于推广颅相学)亨德森基金所举办的讲座中作了第五场演讲: *On the Skull and Portraits of George Buchanan* (Edin., 1926)。在此我要感谢查尔斯·韦伯斯特和琼·奥斯托克向我提及伦纳德·达尔文。关于一战前学校中的头骨测量, 见: William L. Mackenzie and Edwin Matthew, *The Medical Inspection of School Children* (Edin., 1904), pt. III “School Anthropometry”。
15. 见: A. L. Vago, *Phrenology Vindicated* [1879], p. 9; 参见: F. G. Mandley, *A Few Words on Popular Phrenology* (Manch., 1862), esp. p. 3; and J. P. Catlow, “On the Fallacy of Phreno-Magnetism, or Mesmero-Phrenology”, *North of Eng. Mag.*, 2 (May 1843), 428—436。
16. 这是通过清点 1848—1911 年的颅相学杂志而得出的结果。
17. Charles Shaw (b. 1832), *When I Was a Child*, p. 65。
18. 伯恩斯是重要的平民唯心论者和《人性》杂志的编辑, 关于他的情况, 见: *Human Nature*, 1 (1867), 51; and Barrow, “Socialism in Eternity”, pp. 41—42, 54—55, 67n。关于赖特, 见博德里亚图书馆约翰逊收藏室中有关他演讲的招贴, 收藏在“颅相学和手学”的箱子中。关于布里奇斯, 见附录。泰勒称自己是“保健医生、颅相学咨询顾问以及大脑、肺和胃的专家”; 见: “Directory of Phrenologists”, in *Popular Phrenologist* (1896), and his *Applied Psychology* (Morcambe,

- [1912]);福勒的颅相学学院于 1873 年在卢德盖特马戏团开张,雅泽布·英沃兹*的颅相学博物馆(以前是威廉·霍塞尔的颅相学库房和顺势疗法的医务所)于 1880 年在伦敦牛津街开张。
19. “Directory of Phrenologists”, 1896。也见:“Some Notes at Starmouth”, *Punch*, 17 Sept. 1887, p. 132。
20. *The Pelican Papers* (1873), p. 47。关于宪章派在运动崩溃时把注意力 390 转向理性主义的知识追求,见:Ben Brierley [the Oldam Chartist], *Home Memories* (Manch., [1886]), p. 49。也见:Prothero, *Artisans and Politics*, p. 338。
21. Stan Shipley, *Club Life and Socialism*, p. 45。希普利观察到(第 42 页),在俱乐部中,生理学是“个别最受欢迎的科学科目”。和先前一样,世俗论者没有垄断颅相学:奥尔德姆的约翰·H.豪沙尔牧师对自己职业的选择是建立在 1861 年福勒为他解读颅相的基础上;1882 年,他和他的教会委员会资助了福勒主讲的两门颅相学课程:*Phren. Mag.*, 4 (Jan. 1883), 40—41。关于平民文化的定义,见:L. Barrow, “Determinism and Environmentalism in Socialist Thought”, in Raphael Samuel and Gareth Stedman Jones, eds., *Culture, Ideology, and Politics* (1983), 193—213 at p. 194。
22. 第 308 页。也见:his *The Intellectual Destiny of the Working Man; an address delivered on the 28th May, 1863 to the members of the “Institute Chemical Society”*, Birm., 1863;关于他的“颅相学原理”的演讲,见:London Mechanics’ Institute Prospectus of Courses for June—Sept. 1848; NLS 6. 1697(23), and “The Study of Phrenology”, *J. of Health*, 13 (1864), 7—8。威廉斯是库姆创办的爱丁堡世俗学校的校长,见:*Annual Reports of Mr. William’s Secular School* (Edin., 1850—1854)。他给儿子起名为乔治·库姆·威廉斯。
23. “Farewell Entertainment to Mr. and Mrs. Fowler, and Presentation to Mrs Fowler”, *Dundee Advertiser*, 4 Apr. 1863。
24. *Diary of Epps*, p. 578, entry for 10 Nov. 1860。
25. “Bitter Fruit”, p. 214。

26. Holyoake, *Reasoner*, 6 (14 Mar. 1849), 161。关于巴克的颅相学出版物,见第五章注释 108。
27. *First Impressions of England and Its People* (Edin., 1889), p. 106.
28. F. B. Smith, "The Atheist Mission", p. 220。也见: Gay Weber, "Degeneration and Progress in early C19th Social Theory", paper presented to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Cambridge, 1976.
29. Joshua T. Woodhead [M. D. — "Anatomical Museum", Liverpool], *The Golden Referee; a guide to health, and the causes that prevent it . . . with the duties and obligations of marriage: practical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origin, and cause of local weakness and general debility; the injurious effects of solitary and sexual indulgence, etc.* (Liverpool [1874]), pp. 27—28; 关于类似的表述,见: John Stevens, *Man-Midwifery Exposed* (1849), p. 16。
30. 这是《扎德基尔杂志》第一卷扉页上的广告 (*Zadkiel's Mag., or Record and Rev. of Astrol., Phrenol., Mesmerism, and Other Sci.*, Jan. 1849)。关于 19 世纪晚期资产阶级集团中的反智论,见: Christopher Kent, *Brains and Numbers: elitism, Comtism, and democracy in mid-Victorian England* (Toronto, 1978), pp. 139 ff.。
31. *A Vindication of Phrenology*, pp. 46, 308.
32. 有关后者的例子,见: David Brewste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ge", pp. 7—13; Andrew Wilson, "The Old Phrenology and the New", *Gents. Mag.*, 244 (Jan. 1879), 68—85。关于颅相学界对布鲁斯特的回应,见前面第三章注释 80; 关于颅相学界对于威尔逊的回应,见: C. Donovan, *A Reply to Dr Andrew Wilson's Attack on Phrenology* (1879)。
33. 参见: Pierre Bourdieu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trans. R. Nice with a forward by Tom Bottomore (1977), p. 210 et passim; and Paul Feyerabend, "How to Defend Society against Science", *Radical Philosophy*, 2 (1975), 4—8。
34. 见: Barrow, "Socialism in Eternity"; idem, "Determinism"; idem,

- “Anti-Establishment Healing: spiritualism in Britain”, in W. J. Shells, ed., *The Church and Healing*, vol. 19 of *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 (Oxford, 1982), 225—247; idem, “Democratic Epistemology: mid-19th-century plebeian medicine”, *Bull. Soc. Social Hist. Med.* no. 29 (1981), 25—29; J. V. Pickstone, “Medical Botany (Self-Help Medicine in Victorian England)”, *Memoirs of the Manchester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Society*, 119 (1976/1977), 85—95; idem, “Establishment and Dissent in Nineteenth-Century Medicine”, in *Church and Healing*, pp. 165—189; R. J. Cooter, “Interpreting the Fringe”, *Bull. Soc. Social Hist. Med.*, no. 29 (1981), 32—36.
35. *Elements of Psychological Medicine* (1853), pp. 52—53.
36. 例如, J. L. McIntyre [爱丁堡的心理学和伦理学演讲者], “Phrenology”, in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vol. 9 (1917), 897—900。见: Frederick Bridges, *Phrenology Made Practical and Popularly Explained* (Liverpool, 1861), p. 1。
37. Gibbon, *Life of Combe*, II, pp. 365 ff.
38. 见: Henry Steel Olcott, *Old Diary Leaves: the only authentic history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5th ser., Jan. 1893—Apr. 1896 (Madras, India, 1932), p. 370; and Barrow, “Socialism in Eternity”, p. 67。
39. *Chart of Spiritual Gifts and Mediumistic Capabilities* (Sunderland, c. 1890)。除了伯恩斯的《人性》以外,还可参考威廉·卡彭特的一便士《灵魂使者》(1859—1859),该杂志由颅相学家、水疗法师、禁酒倡导者和素食主义者威廉·霍塞尔(1807—1863)出版,它不仅致力于招魂术、催眠术和心理学的研究,还致力于颅相学研究,认为颅相学是“能够吸引人类注意力的最高贵的科学”。
40. 关于贝格松,见: H. Stuart Hughes, *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Brighton, Sussex, 1979), pp. 113 ff.; 关于这个主题的相关思考: R. J. Cooter, “Medicinae Cultura e Alternativa”, *Prometeo*, 1 (Dec. 1983), 22—31。
41. 牛津博德里亚图书馆约翰逊收藏室关于“精神和改革的文学库”的散

- 页,第1盒。福勒的《查尔斯·布雷德洛的颅相学性格》(L. N. Fowler: *Phrenological Character of Mr. Charles Bradlaugh, M. P. . . . marvelously verified by his career up to the present time* [1880])在伦敦斯特兰德的圣马丁“反仪式主义仓库”中被出售。
42. *Scarbro' Gaz.*, 27 Aug. 1874, 引自: R. B. D. Wells, ed., *Phrenological Messenger* (Leeds, 1878), p. 3。也见: James Webb, “Phrenology in the Schoolroom”, *Phren. Mag.*, 5 (1884), 321—331; *Phrenology Made Easy; or, the art of studying character in relation to love, courtship, and marriage, showing the best means of cultivating character so as to arrive at early wealth, position, and happiness, being a complete guide to fortune* (1874), 该书售价仅1便士。关于颅相学作为达尔文主义的解毒剂, 见: Ambrose L. Vago, *The Alphabet of Phrenology* [1883], p. 4。
43. *The Ragged Trousered Philanthropists* (St. Albans, Herts., 1965), chap. 22, pp. 214—223.
44. Levison, *Mental Culture*, p. 102.
45. James Garth Wilkinson, letter to Henry James, Sr., 引自: Clement J. Wilkinson, *James John Garth Wilkinson: a memoir of his life* (1911), p. 89。
46. John Cleland[格拉斯哥的解剖学教授], “The Lingering Admirers of Phrenology”, *Popular Sci. Rev.*, 8 (1869), 378—388 at p. 379; 也见: William James, “The Phrenological Conception”, in his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1910), I, 26—30 at p. 28。
47. J. J. Spark, *Confessions of a Phrenologist; or, facts stranger than fiction* (1891), p. 3.
48. Bourdieu and Passeron, *Reproduction*, p. 9.
49. Chorover, *Genesis to Genocide*, p. 148。也见: 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 R. Price (Cambridge, 1977), at pp. 79 and 218n.
50. 见: G. B. Risse, “Vocational Guidance during the Depression: phre-

nology versus applied psychology”, *J. Hist. Behav. Sci.*, 12 (1976), 130—140; and Brian Evans and Bernard Waites, *IQ and Mental Testing: an unnatural science and its social history* (1981)。

51. 见: Chorover, *Genesis to Genocide*; Edward Yoxen, “The Social Impact of Molecular Biology”, Ph. D. thesis, Cambridge, 1978; and J. Crocker, “Sociobiology: the capitalist synthesis”, *Rad. Sci. J.*, 13 (1983), 55—72。
52. Marx to Ludwig Kugleemann, 11 Jan. 1868, *Letters*, p. 242。虽然马克思提及“我在这里(伦敦)的一个朋友对颅相学很精通”非常有意思,但毋庸置疑,这种评论是没有根据的,而且有点挖苦的意味。



手稿資料和公共文獻

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

Combe papers.

Edinburgh University Library

Letter book of the Phrenological Society, 1820—1840. Gen. 608/1.

Minute book of the Phrenological Society. Vol. I, 1820—1840; Vol. II, 1841—1870. Gen 608/2.

Names of members and visitors, inspecting the casts etc. belonging to the Phrenological Society, 1822—1846. Gen. 608 x (iii).

Catalog 2: unbound, marked “superceded, much corrected and annotated, etc”.

Catalog 3: in four parts; n. d., watermark 1828. Compiled by Robert Cox. Gen 608/5.

Catalog of skulls, busts, masks, etc. in the Edinburgh Phrenological Society's collection, arranged alphabetically; n. d. Gen. 608/4.

Cash book of the Edinburgh Phrenological Society, 1820—1870. Gen. 608/3.

Phrenological scrapbook [1858—61]. Gen. 608 x (iii).

Goyder, David George, *Heads of the People*, 1843: *measurements and manipulations of heads* [365 deliniations]. Gen. 608 x (v).

Bodleian Library

John Johnson Collection (Box of ephemera on “Phrenology and Chirolgy”).

Forster Papers. MS Eng. Letters c. 200 f. 181.

J. G. Spurzheim. MS Autog. f. 181—182.

J. G. Spurzheim. MS Top. Oxf. b. 23., f. 301(d).

Guildhall Library

London Institution. Collection of managers' and auditors' reports of lectures and other miscellanea, 1805—1894, 4 vols. AN. 16. 8.

London Institution. Syllabuses of Lecture Courses, 1819—1874. SL 50—52.

British Library

Collection of reports and private letters by W. J. Roberts on the Liverpool Mechanics' Institute, 1826—1840, 2 vols. 1866e. 7.

MS papers relating to Liverpool Mechanics Institution, 1777—1850 8364. b. 24.

Swedenborg Society of London

Charles Augustus Tulk, *Aphorisms on the Laws of Creation as Displayed in the Correspondences That Subsist between Mind and Matter* (n. d.). A/83.

Wellcome Institute, London

Pierre Henri Joseph Baume, *Autobiography*, 1838—1855.

Phrenology; Spurzheim Lecture (watermark, 1827). MS 4685.

Unpublished theses and papers

Baxter, P. "Combe, the Constitution of Man, and the Churches". Paper delivered to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Durham, 1979.

Baxter, P. "Natural Laws and Divine Judgments: some reflections on Scottish natural theology". Paper delivered to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Bath, 1980.

Corsi, Pietro. "Natural Theology,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ce, and the Question of Species in the Works of the Reverend Baden Powell". D. Phil. thesis, Oxford, 1980.

Grant, Alastair Cameron. "George Combe and His Circle: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hi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h. D. thesis, Edinburgh, 1960.

Harrison, J. F. C. "From the Margins: a view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George Eliot's England". Paper delivered to the George Eliot Conference at Rutgers University, November 1980.

Hinton, D. A. "Popular Science in England, 1830—1870". Ph. D. thesis, Bath, 1979.

Inkster, Ian. "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Science in England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 1790—1850". Ph. D. thesis, Sheffield, 1977. 2 vols.

Jones, R. Alun. "'Knowledge Chartism':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Chartism on nineteenth century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Great Britain". M. A. thesis, Birmingham, 1938.

Lineham, Peter J. "The English Swedenborgians, 1770—1840: a study in 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religious sectarianism". Ph. D. thesis, Sussex, 1978.

Nott, John William. "The Artisan as Agitator: Richard Carlile, 1816—1843". Ph. D. thesis, Wisconsin, 1970.

Porter, Roy. "Charles Lyell: the public and private faces of science". Typescript, 1980.

Pyenson, Susan Sheets. "Low Scientific Culture in London and Paris, 1820—1875". Ph. D. thesis, Pennsylvania, 1976.

Salt, John. "Isaac Ironside and Education in the Sheffield Reg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 A. thesis, Sheffield, 1960.

Waddell, Margot. "Scientific Naturalism and Philosophies of Nature and

- Man in the Novels of George Eliot". Paper presented to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London, 1972.
- Weber, Gay. "Degeneration and Progres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Social Theory". Paper presented to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Cambridge, 1976.
- Yeo, Eileen M.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Change: a social history of some aspects of social investigation in Britain, 1830—1890". Ph. D. thesis, Sussex, 1972.
- Young, Robert M. "Functionalism". Typescript, 1971.
- Young, Robert M. "Who Cares about Objectivity? — And Why?"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ndon, 1976.
- Yoxen, Edward. "The Social Impact of Molecular Biology". Ph. D. thesis, Cambridge, 1978.

Parliamentary Papers

Census of Great Britain, 1851: education, England and Wales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Extent,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Prevailing Vice of Intoxication among the Labouring Class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1834

Foundation Schools and Education in Ireland, 1835

Education in England and Wales, 1835

Arts and Manufactures, 1835

Education of the Poorer Classes in England and Wales, 1838

Public Libraries, 1849

Newspaper Stamps, 1851



1823. *Transactions of the [Edinburgh] Phrenological Society*: Edinburgh, 1 vol. only, ed. George Combe and others; continued as:
- 1823—1847. *Phrenological Journal and Miscellany*: Edinburgh, quarterly, Dec. 1823—Oct. 1847, 20 vols.; ed. Richard Poole, 1824, then George Combe, Andrew Combe, James Simpson, Robert Cox, and others, 1825—Sept. 1837 (4s); n. s. London, ed. Hewett Cottrell Watson, 1838—1840 (2s 6d); Edinburgh, ed. Robert Cox, 1841—1847.
1833. *Phrenologist*: London, 16 Feb. 1833—?, 1 vol. only, ed. Louis Henry Ehn (2d, unstamped).
- 1835—1838. *Christian Physician and Anthropological Magazine*: London, Sept. 1835—Oct. 1838, ed. John Epps, Charles Loosely; continued as:
- 1838—1839. *Phrenological (Anthropological) Magazine and Christian Physician*: London, Nov. 1838—Feb. 1839, ed. John Epps and Charles Loosely, organ of the Finsbury Discussion Society and of the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1841. *Illustrations of Phrenology: Comprising Accounts of the Lives of Persons Remarkable in Some Mental Respect, Whether Intellect or Feeling, and Accurate Delineations of Their Heads; Together with a Statement of the Various Measurem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Organs*: London, 1 issue only, ed. George R. Lewis (2s 6d).

- 1842—1844. *Phrenological Almanac; or, Annual Journal of Mental and Moral Science*; Glasgow, ed. D. G. Goyder, publish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Glasgow Phrenological Society; continued as *Phrenological Almanac and Psychological Annual* (below).
1843. *Phreno-Magnet and Mirror of Nature: A Record of Facts, Experiments, and Discoveries in Phrenology, Magnetism, etc.*: London, 1 vol. only, ed. Spencer Timothy Hall.
- 1843—1844. *Peoples Phrenological Journal and Compendium of Mental and Moral Science*: London, weekly, 2 vols., ed. W. John Vernon, 1843, then Luke Burke, 1844.
- 1843—1856. *Zoist: A Journal of Cerebral Physiology and Mesmerism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Human Welfare*: London, Mar. 1843—Jan. 1856, ed. John Elliotson and William Collins Engledue.
1845. *Phrenological Almanac and Psychological Annual*: Glasgow, 1 vol. only, ed. D. G. Goyder; continued as:
1846. *Phrenological Annual and Psychological Almanac for the Year 1846*: Glasgow, 1 vol. only, ed. D. G. Goyder.
- 1846—1852. *Journal of Health and Disease*: London, 1846—1849, ed. Walter Johnson and others (2s 6d); about one-quarter devoted to phrenology; continued as *Monthly Journal of Homoeopathy and Journal of Health and Disease* but with diminished phrenological content, 1850—1852.
- 1848—1853. *Ethnological Journal: A Magazine of Ethnography, Phrenology, and Archaeology, Considered as Elements of the Science of Races; With the Applications of This Science to Education, Legislation, and Social Progress*: London, June 1848—Mar. 1849, then n. s. (without “Phrenology” in title) to Jan. 1854, ed. Luke Burke.
- 1848—1867. *Journal of Health: A Monthly Magazine*: London, Aug. 1848—Aug. 1850, ed. R. B. Grindrod, 1849—?; not issued Sept. 1850—Apr. 1851; n. s. May 1851—1855; then became *Journal of*

Health and Phrenological Magazine to Jan. 1860, ed. Frederic Towgood; then became *Journal of Health and Vegetarian Magazine* to 1867, ed. Jacob Dixon, June 1862—1867.

395 1849. *Zadkiel's Magazine; or, Record and Review of Astrology, Phrenology, Mesmerism, and Other Sciences*: Jan.—Feb. 1849, ed. Richard James Morrison (1d).

1858—1859. *Spiritual Messenger: A Magazine Devoted to Spiritualism, Mesmerism, and Other Branches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cluding phrenology]: London, Sept. 1858—Mar. 1859, ed. William Carpenter (1d).

1867—1878. *Human Nature: A Monthly Record of Zoistic Science and Intelligence, Embodying Physiology, Phrenology, Psychology, Spiritualism, Philosophy, the Laws of Health, and Sociology: An Educational and Family Magazine*: London, monthly, Apr. 1867—July 1878, ed. J. D. Burns.

1878. *Phrenological Messenger*: Leeds, 1 issue only, ed. R. B. D. Wells (2d).

1880—1889. *Phrenological Magazine: A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Mental Science*: London, 5 vols., ed. Alfred T. Story, issued by L. N. Fowler; later ed. Jessie Fowler.

1888. *Phrenological Annual and Record for 1888*: London, ed. Alfred T. Story (4d).

1891—1893. *Know Thyself: A Monthly Magazine Devoted to Phrenology, Physiology, Pathology, Pathognomy, Physiognomy, Pleasure, and Profit*: 1 Sept. 1891—Dec. 1892, ed. Prof. Ida Ellis (1d, then 2s 6d); continued as *Phrenological Review*: Leeds, monthly, Jan. 1893—Nov. 1893, then Blackpool, quarterly, 1893, 1 issue only; ed. Ellis Family (1d); official organ of the Universal Phrenological Society.

1892—1893. *Phrenological Record; Being the Quarterly Abstract of the*

-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Phrenological Association*: London, 1 Jan. 1892—1 July 1893, ed. Bernard Hollander (3d).
1893. *British Phrenological Journal and Christian Worker*: Sheffield, May 1893 issue only, ed. Eli Ward (1d). [John Johnson Collection,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 1896—1897. *British Phrenological Year Book*: London.
- 1896—1904. *The Popular Phrenologist*: London.
1898. *Phrenologist and Physiological Register*: London.
- 1905—1906. *Phrenological Review* [of the British Phrenological Society Inc.]: London, Apr. 1905—July 1906, ed. Bernard Hollander.
- 1905—1922. *Ethological Journal*; London, Jan. 1905—June 1914; resumed Jan. 1922—Oct. 1922, ed. Bernard Hollander.
1907. *Phrenologist*.
- 1909—1911. *Gall Journal: A Resume of Lectures Delivered Before the Gall Society*: London, 3 vols.
- 1920—1921. *British Phrenological Annual*: Morecambe, ed. Taylor family.



文献索引

下列索引列出了注释中第一次引用某个资料时的页码和注释编号。著作根据其作者的姓名排列。但匿名著作、只有简称的著作以及百科全书、词典和非颇相学杂志中未署名的(颇相学)文章,都按照杂志标题排列。不同注释中引用同一个作者一部以上的著作,根据文献简称的关键词排列,或者根据杂志的发表日期排列。

说明:本索引 n 前面的数字代表原书的页码,也就是中译本的页边码;n 以及后面的数字表示注释的序号。

- Abercrombie, N., and B. S. Turner N.
阿伯克龙比和 B. S. 特纳 386n122
- Abernethy, J. J. 阿伯内西 312n50
- Ackerknecht, E. E. 阿克尔克内希特 321n53
- Aitken, William 威廉·艾特肯 371n4
- Akert, K., and M. P. Hammond K. 阿克特和 M. P. 哈蒙德 303n17
- Aldine Mag.* 《奥尔丁杂志》364n55
- Aldred, G. G. 奥尔德雷德 375n61
- Alexander, D. D. 亚历山大 314n67
- Alison, W. P., and P. Neill W. P. 艾利森和 P. 尼尔 325n18
- Allen, D. D. 艾伦 361n21
- Altick, R. R. 奥尔蒂克 325n13
- Annan, N. N. 安南 376n81
- Anthony, P. D. P. D. 安东尼 302n5
- Appleby, J. J. 阿佩尔比 305n7
- Armytage, W. H. G. W. H. G. 阿米蒂奇
Heavens 《天堂》383n84
Technocrats 《专家治国论者》331n80
- Arneman, J. 阿内曼, J. 307n20
- Arnstein, W. L. W. L. 阿恩斯

- 坦 367n75
- Aspiz, H. H. 阿斯皮兹 304n23
- Atkinson, H. G., and H. Martineau H. G. 阿特金森和 H. 马蒂诺 339n57
- Audubon, J. J. 奥杜邦 318n28
- Augustan Rev.* 《奥古斯都评论》 308n35
- Backstrom, P. P. 巴克斯多姆 381n46
- Bailey, J. N. J. N. 贝利 362n29
- Bailey, P. P. 贝利 306n15
- Bain, A. A. 贝恩
Autobiography 《自传》 335n92
Character 《性格》 389n9
Mill 密尔 348n43
- Bakan, D. D. 巴肯 364n53
- Baker, C. C. 贝克 346n29
- Balzac, H. H. 巴尔扎克 377n7
- Banks, J. J. 班克斯 321n48
- Barber, J., see Brindley, J. J. 巴伯, 见 J. 布林德利
- Barbour, I. G. I. G. 巴伯 335n28
- Barclay, J. J. 巴克利 309n42
 see also Combe, G. 也见 G. 库姆
- Bardsley, J. L. J. L. 巴兹利 330n68
- Barham, A. F. A. F. 巴勒姆 383n84
- Barker, J. J. 巴克
Life 《生平》 358n108
 “Phrenology” “颅相学” 328n45
- Barlow, E. E. 巴洛
 “Address” “致辞” 314n68
Apology 《辩解》 314n59
- Barmby, C. C. 巴姆比 378n17
- Barnes, B. B. 巴恩斯
Interests 《利益》 335n28
 ed., *Sociology* 《社会学》 301n1
 and S. Shapin, eds. 和 S. 沙平合编 304n25
 see also Mackenzie, D.; Shapin, S.
 也见 D. 麦肯齐; S. 沙平
- Barnes, H. E. H. E. 巴恩斯 337n38
- Barnet, M. M. 巴尼特 352n67
- Barrow, L. L. 巴罗
 “Anti-Establishment” “反权威” 390n34
 “Determinism” 决定论 390n21
 “Eternity” 永恒 343n2
- Barthes, R. R. 巴特斯
Image 《图像》 368n87
Mythologies 《神话》 327n33
- Bastian, H. C. H. C. 巴斯琴 306n16
- Bauman, Z. Z. 鲍曼 304n28
- Baume, P. H. J. P. H. J. 博姆
Autobiography 《自传》 372n22
 “Exhibition” 展览 376n74
- Baxter, J. L., see Donnelly, F. K. J. L. 巴克斯特, 见 F. K. 唐纳利
- Baxter, P. P. 巴克斯特 342n89
- Beale, L. J. L. J. 比尔 363n35
- Beard, J. R. J. R. 比尔德
Religion 《宗教》 342n92
Self Culture 《自学》 362n29
- Beecher, J., and R. Bienvenu J. 比彻和 R. 比安弗尼 337n42
- Bell, C. C. 贝尔 309n43
- Ben-David, J. J. 本一戴维 305n6
- Bentham, J. J. 边沁 307n21
- Bentley M. M. 本特利 302n10
- Berg, M. M. 伯格 347n40
- Berger, P. L. P. L. 伯杰 369n92
- Berman, M. M. 伯曼
 “Hegemony” “霸权” 331n80
Royal Institution 皇家协会 311n47
- Bestor, A. E. A. E. 贝斯特 381n50
- Bienvenu, R., see Beecher, J. R. 比安弗尼, 见 J. 比彻

602 文献索引

- Black, A. A. 布莱克 356n98
 Black, G. T. G. T. 布莱克 363n35
 Blackman J. J. 布莱克曼 363n41
Blackwood's Mag. 《布莱克伍德杂志》 308n35
 Bloch, E. E. 布洛克 375n57
 Bloch, M. ed. M. 布洛克编 359n119
 Bloomfield, J, ed. J. 布卢姆菲尔德 324n6
 Blyth, E. K. E. K. 布莱思 347n36
Bolster's Q. Mag. 《博尔斯特季刊》 343n3
 Boole, G. G. 布尔 349n47
 Bossy, J. J. 博西 323n71
 Bostock, J. J. 博斯托克 311n47
 Bourdieu, P. P. 布尔迪厄 391n49
 and J. C. Passeron 和 J. C. 帕斯龙 390n33
 Box, S., see Cotgrove, S. S. 博克斯, 见 S. 科特格罗夫
 Brande, W. T. W. T. 布兰德 311n47
 Braudel, F. F. 布罗代尔 359n1
 Bray, C. C. 布雷
 “Applications”“应用” 330n66
 Autobiography 《自传》 334n13
 Necessity 《必然性》 378n24
 Psychological 《心理学》, 379n26
 Bray, J. F. J. F. 布雷 371n4
 Brewster, D. D. 布鲁斯特 331n80
 Bridges F. F. 布里奇斯
 Criminals 《罪犯》 389n11
 Phrenology 《颅相学》 391n36
 Brierly, B. B. 布赖尔利 390n20
 Brigham, A. A. 布里格姆 363n35
 Brindley, J. J. 布林德利 380n35
 and J. Barber 和 J. 巴伯 380n35
British & Foreign Medical Rev. 《海内外医学评论》 312n52
British & Foreign Rev. 《海内外评论》 330n63
British Controversialist 《英国争论家》 355n90
British Critic 《英国批评》 308n35
 Brodie, B. B. 布罗迪 333n100
 Brooke, J. H. J. H. 布鲁克 342n85
 Brougham H. H. 布鲁厄姆 345n25
 Broussais, F. F. 布鲁赛 313n56
 Brown, J. J. 布朗 362n33
 Brown, J. P. J. P. 布朗 389n12
 Brown, P. P. 布朗 306n11
 Brown, S. S. 布朗 362n34
 Brown, T. T. 布朗
 “Villers”“行政区” 307n28
 “Zoonomia”“动物生理学” 307n29
 Browne, W. A. F. W. A. F. 布朗 317n18
 Browning, M. M. 布朗宁 380n37
 Buchannan, R. R. 布坎南 385n110
 Budd, S. S. 巴德
 “Faith”“信仰” 367n74
 Unbelief 《非信仰》 302n7
 Burke, L. L. 伯克 332n92
 Burn, J. D. J. D. 伯恩 344n6
 Burrow, J. W. J. W. 伯罗 316n9
 Bushnan, J. S. J. S. 布什南 331n73
 Bynum, W. F. W. F. 拜纳姆
 “Great Chain”“生命序列” 337n44
 “Health”“健康” 315n71
 “Offspring”“后代” 311n47
 “Skull”“头骨” 307n21
 Caldwell, C. C. 考德威尔
 Education 《教育》 326n25
 Phrenology 《颅相学》 311n47
 Campbell, G. D. G. D. 坎贝尔 362n29
 Campbell, T. C. T. C. 坎贝尔 375n66

- Canguilhem, G. G. 康吉扬 336n36
- Cannon, S. S. 坎农 301n2
- Cannon, W. F. W. F. 坎农 329n54
- Cantor, G. N. G. N. 坎托 308n34
- Capp, B. B. 卡普 328n42
- Cardwell D. S. L. D. S. L. 卡德韦尔
ed., *Artisan* 主编《工匠》356n98
Organization 《组织》346n53
- Carlile, R. R. 卡莱尔
Address 《致辞》372n26
“Mania” “狂躁” 372n21
“New Plan” “新计划” 374n53
“Phrenology” “颅相学” 372n22
“Physiognomy” “人相学” 372n22
“Spurzheim” “施普茨海姆” 373n27
- Carlisle, A. A. 卡莱尔 325n14
- Carlson, E. T., and P. S. Noel E. T. 卡
尔森和 P. S. 诺埃尔 322n58
- Carlyle, T. T. 卡莱尔
Letters 《书信》352n67
“Times” “时代” 335n27
- Carmichael, A. A. 卡迈克尔 319n31
- Carpenter, W. W. 卡彭特
Nature 《自然》340n64
“Noble” “贵族” 333n96
- Carpenter, W., ed. W. 卡彭特
编 383n82
- Carson, J. J. 卡森 388n4
- Catlow, J. P. J. P. 卡特洛 389n15
- Cavenagh, F. A. F. A. 卡夫纳 344n15
- Chadwick, O. O. 查德威克 304n27
- Chalmers, T. T. 查默斯 341n83
- Chambers, R. R. 钱伯斯
“Combe” “库姆” 388n54
Vestiges 《遗迹》339n63
- Chambers, W. W. 钱伯斯
Memoir (1882 ed.) 《论文集》
357n106
- and R. Chambers 和 R. 钱伯
斯 346n30
- Chambers' Journal* 《钱伯斯杂
志》357n106
- Chenevix, R. R. 切尼维克斯
Chemical 《化学》321n53
“Mesmerism” “催眠术” 321n50
“Phrenology” “颅相学” 303n15
Phrenology Article (of *For. Q.*
Rev.) 《外国季度评论》的颅相学
文章 321n51
- Chevalier, L. L. 希瓦利埃 302n13
- Chilton, W. W. 奇尔顿 373n37
- Chomsky, N. N. 乔姆斯基 301n1
- Chorover, S. L. S. L. 乔罗弗
“Brain” “头脑” 306n15
Genesis 《起源》303n19
- Christian Lady's Mag.* 《基督教女士杂
志》368n88
- Christian Observer* 《基督教观察
家》331n72
- Christian Remembrancer* 《基督教提醒
者》(1840)328n47; (1843), 342n88
- Church, R. R. 丘奇 326n24
- Clagett, M., ed. M. 克拉格特
编 329n54
- Clarke, E. E. 克拉克 306n13
and C. D. O'Malley 和 C. D. 奥马
利 302n10
- Clarke, H. H. 克拉克 332n92
- Clarke, J. F. J. F. 克拉克 313n54
- Clarke, J. G. J. G. 克拉克 379n32
- Clarke, James Freeman 詹姆斯·弗里
曼·克拉克 364n49
- Clay, W. L. W. L. 克莱 340n70
- Cleland, J. J. 克莱兰 391n46
- Coates, T. T. 科茨 349n45
- Cobbett, W. W. 科贝特 374n57

- Cockburn, H. H. 科伯恩 326n25
 Cockton, H. H. 科克顿 363n42
 Cole, G. D. H. G. D. H. 科尔
 Carlile 卡莱尔 375n66
 Chartist 《宪章派》387n125
 Co-operation 《合作》381n46
 Owen 《欧文》382n58
 Coleridge, S. T., see Summer, J. B S.
 T. 柯勒律治, 见 J. B. 萨默
 Collins, H and T. J. Pinch H. 柯林斯和
 T. J. 平奇 305n3
 Collins, P., see MacLeod, R. P. 柯林
 斯, 见 R. 麦克劳德
 Combe, A. A. 库姆
 “Barclay” “巴克莱” 309n42
 “Bell” “贝尔” 309n42
 Derangement 《错乱》314n62
 “Factories” “工厂” 365n59
 Phrenology 颅相学 333n98
 “Phrenology” “颅相学” 334n104
 Physiology 《生理学》362n33
 “Prichard” “普里查德” 311n47
 “Remarks” “评论” 370n103
 and G. Combe 和 G. 库姆 361n14
 Combe, G. G. 库姆
 Abram Combe 《艾布拉姆·库
 姆》334n5
 Andrew Combe 《安德鲁·库
 姆》317n18
 “Birmingham lectures” “伯明翰演
 讲” 384n95
 Constitution of Man 《人类体
 格》338n50
 “Converts” “皈依者” 327n40
 “Cranioscopy” 《颅检查术》309n40
 Criminals 《罪犯》340n68
 “Dialogue” “对话” 325n18
 Elements 《原理》308n31
 Essays 《论文》321n57
 “Female” “女性” 369n89
 “Jeffrey” “杰弗里” 309n44
 “Labouring Classes” “劳动阶
 级” 365n59
 “Lectures to Mechanics” “对技工的
 演讲” 345n24
 Moral Philosophy 《道德哲
 学》341n78
 “Owen” “欧文” 345n26
 “Parliamentary Reform” “议会改
 革” 341n78
 “Prejudices” “偏见” 320n46
 Prospectus 《内容简介》360n13
 Religion and Science 《宗教和科学》
 341n84, 343n94
 Responsibility 《职责》378n20
 Science and Religion 《科学和宗
 教》335n26
 “Servants” “仆人” 362n28
 “Stone” “斯通” 310n46
 System 《体系》335n20
 Testimonials 《证明书》312n52
 and J. Barclay 和 J. 巴克利 309n42
 R. Cox, et al. R. 考克斯, 等 354n89
 and C. J. A. Mittermaier 和 C. J. A.
 米特迈尔 340n68
 see also Combe, A.; Hurlbut, E. P.
 也见 A. 库姆; E. P. 赫尔伯特;
 Jolly, W.; Caldwell, C., *Education*;
 W. 乔利; C. 考德威尔《教育》
 Correspondence 《通信》
 Comstock, W. R. W. R. 康斯托
 克 343n95
 Conklin, R. J. R. J. 康克林 387n125
 Cook-Gomperz, J. J. 库克-冈珀
 茨 334n6
 Cooper, B. B. B. B. 库珀 317n18

- Cooper, R. R. 库珀 334n8
 Cooper, T. T. 库珀 356n100
 Cooter, R. J. R. J. 库特
 “Alienists” “精神病学家” 303n22
 “Alternativa” “抉择” 391n40
 “Body” “身体” 336n36
 “Fringe” “边缘” 391n34
 Copland, J., “Gall”, J. 科普兰, “高尔” 311n47
 Correspondence: *Hamilton, Spurzheim, and Combe* 《通信: 汉密尔顿、施普茨海姆和库姆》310n45
 Corsi, P. P. 科西 318n29
 and P. Weindling, eds. 和 P. 魏因德林编 301n1
 Cotgrove, S., and S. Box S. 科特格罗夫和 S. 博克斯 301n2
 Country Gentlemen 《乡村绅士》366n69
 Cowan, C. C. 考恩
 “[Flourens]” “弗卢朗” 333n97
 Phrenology 颅相学 328n44
 Cowan, I. R. I. R. 考恩 348n45
 Cox, R. R. 考克斯
 “Objections” “异议” 327n35
 ed., *Selections* 《选集》325n18
 see also Combe, G.; Caldwell, C., *Education* 也见 G. 库姆; C. 考德威尔《教育》
 Craig, E. T. E. T. 克雷格
 “Owen” “欧文” 387n125
 “Palmistry” “相手术” 361n15
Ralahine 《拉拉尼》381n45
Work 《工作》381n46
 Crane, J. W. J. W. 克兰 313n54
 Crichton—Browne, J. J. 克赖顿—布朗 306n14
 Critchley, M. M. 克里奇利
 “Aphasiology” “失语症学” 306n13
Brain 《头脑》302n12
 Crocker, J. J. 克罗克 391n51
 Crombie, B. W. B. W. 克龙比 333n16
 Crook, W. H. W. H. 克鲁克 357n105
 Crossick, G. G. 克罗西克
 “Aristocracy” “贵族” 368n87
Artisan 《工匠》360n9
 Crowther, J. G. J. G. 克劳瑟 344n15
 Cullen, A. A. 卡伦 380n39
 Dallenbach, K. K. 达伦巴赫
 “Function” “功能” 302n11
 “Phrenology” “颅相学” 305n4
 Darnton, R. R. 达恩顿 361n21
 Davey, J. G. J. G. 戴维
 “Combe” “库姆” 334n 104
 “Crime” “犯罪” 389n12
Insanity 《精神错乱》314n63
 “Localization” “区位” 306n16
 Davies, J. J. 戴维斯 344n15
 Davies, J. D. J. D. 戴维斯 304n24
 Dawes, R. R. 道斯 349n47
 DeGiustino, D. D. 德朱斯蒂诺
Conquest 《征服》304n24
 “Thieves” “小偷” 303n22
 DeMause, L, ed. L. 德莫兹 334n6
 Demerath, N. J. and R. A. Peterson, eds. N. J. 德梅拉思和 R. A. 彼得森编 337n38
 De Morgan, S. E. S. E. 德摩根 375n66
 DeMoscatti, F. F. 德莫斯卡蒂
 “Gall” “高尔” 315n2
 “Spurzheim” “施普茨海姆” 319n31
 Derry, J. J. 德里 375n67
 Deseret, P. P. 德塞雷特 361n16
 Deutsch, K. K. 多伊奇 336n33
 Deutscher, I. I. 多伊彻 364n46

- Deville, J. J. 德维尔
 “Account”“说明” 370n103
 “Convicts”“罪犯” 340n70
see also Jennings, J., *Inquiry* 也见 J. 詹宁斯《调查》
- Dewhurst, H. W. H. W. 杜赫斯特
Grammar《文法》 357n105
Letter《书信》 312n53
- Diamond, S. S. 戴蒙德 371n12
- Dick, T. T. 迪克 342n92
- Dickens, C., *Traveller* C. 狄更斯《旅行家》 349n49
- Dickson, D. D. 迪克森
 “Science”“科学” 305n7
 “Technology”“技术” 306n11
- Dircks, H. H. 德克斯 333n102
- D’Israeli, I. I. 迪斯雷利 307n23
- Dodd, W. W. 多德 361n17
- Dodds, E. R. E. R. 多兹 340n66
- Dolgin, J. L., et al., eds. J. L. 多尔金 315n71
- Donajrodski, A. P., ed. A. P. 多纳吉格罗德斯基 358m12
- Donnelly, F. K. F. K. 唐纳利
 “Destruction”“破坏” 325n14
 “E. P., Thompson”“E. P. 汤普森” 359n122
 and J. L. Baxter 和 J. L. 巴克斯特 360n6
- Donovan, C. C. 多诺万
Brodie 布罗迪 333n100
Ethnological《人种学》 331n80
Wilson 威尔逊 390n32
- Douglas, M. M. 道格拉斯
Cultural《文化》 302n8
Implicit《暗示》 334n11
Natural《自然》 326n25
Purity《纯洁》 315n71
- Draper, J. W. J. W. 德雷珀 342n92
- Dublin Penny, J.*《都柏林一便士杂志》 1832年7月, 385n100; 1832年8月, 302n10
- Dublin Q. J. Medical Science*《都柏林医学科学季度杂志》 333n96
- Dundee Advertiser*《邓迪广告人》 390n23
- Durbin, P. T., ed. P. T. 德宾编 301n1
- Durey, M. M. 杜里 325n14
- Durkheim E. E. 涂尔干 337n38
- Dyer, J. L. J. L. 戴尔 349n52
- Easlea, B. B. 伊斯利 303n16
- Eastlake, E. E. 伊斯特莱克
Journals《杂志》, 334n8
 “Physiognomy”“人相学” 333n102
- Eastman, G. G. 伊斯门 306n11
- Edinburgh Mag. & Literary Miscellany*《爱丁堡杂志及文学杂记》 1824年3月 302n10; 1824年5月 382n59
- Edinburgh Medical & Surgical J.*《爱丁堡内外科医学杂志》 307n19
- Edinburgh Monthly Rev.*《爱丁堡每月评论》 1820年, 330n61; 1821年, 325n20
- Egerton, F. N. F. N. 埃杰顿 334m3
- Eliot, G., *Letters* G. 艾略特《书信》 363n34
- Elkana, Y. Y. 埃尔卡纳
 “Culture”“文化” 304n28
 ed., *Interaction* 编《交互作用》 301n1
- Elliotson, J. J. 埃利奥特森
 [*Blumenbach*] [布鲁门巴赫] 313n54
 “[Godwin]” “[戈德温]” 376n73
 “Ignorance”“无知” 303n20

- “Magendie” “马” 310n47
Physiology 《生理学》 319n31
Principles 《原理》 313n54
 “Rush” “拉什” 364n44
 “Spurzheim” “施普茨海姆” 319n31
 “Term” “术语” 302n10
- Elliott, P. P. 埃利奥特 325n13
 Ellis D. D. 埃利斯 308n35
 Ellis J. A. J. A. 埃利斯 332n89
 Emblem, D. L. D. L. 恩布勒姆 309n40
 Emerson, R. W. R. W. 爱默生 361n23
Encephalology 《脑学》 307n24
Encyclopädisches Wörterbuch 《百科全书字典》 311n47
- Engels, F. F. 恩格斯
Anti-Dühring 《反杜林论》 372n17
Dialectics 《辩证法》 350n58
Working Class 《工人阶级》 349n45
 see also Marx, K. 也见 K. 马克思
- Engledue, W. C. W. C. 恩格尔杜
Cerebral 《大脑》 332n88
 “Education” “教育” 367n78
 “Forbes” “福布斯” 330n68
 “Physical” “身体” 366n71
 see also Prideaux T. S. 也见 T. S. 普里多
- Epps, J. J. 埃普斯
Diary 《日记》 308n31
Evidences 《证据》 328n44
Horae 《霍莉》 379n27
Manual 《手册》 354n80
- Erickson, P. A. P. A. 埃里克松 389n12
 Eros, J. J. 厄洛斯 370n111
 Evans, B., and B. Waites B. 埃文斯和 B. 韦茨 391n50
 Eysenck, H. H. 艾森克 305n4
- Facts in Favour* 《有利的事实》 309n44
- Falkner, A. A. 福克纳 350n57
Farrier & Naturalist 《兽医和自然主义者》 344n6
 Fellman, M. M. 费尔曼 369n97
 Femia, J. J. 费米亚 369n97
 Feuchtwang, S. S. 福伊希特万 359n119
 Feuer, L. S., *Ideology* L. S. 福伊尔《意识形态》 316n10
- Feyerabend, P. P. 费耶拉本德
 “How” “怎样” 390n33
Science 《科学》 302n6
- Field, C. D. C. D. 菲尔德 370n105
 Fielden, K. K. 菲尔登 358n113
 Fife, J. J. 法伊夫 349n51
 Figlio, K. K. 菲格利奥
 “Chlorosis” “变色病” 324n12
 “Metaphor” “隐喻” 336n36
- Fink, A. A. 芬克 303n22
 Firth, R. R. 弗思
Essays 《论文》 334n11
 “Sceptical” “怀疑的” 369n95
Symbols 《象征》 335n28
- Fish, F. F. 菲什 333n10
 Fisher, R. B. R. B. 费希尔 306n11
 Fletcher, J. J. 弗莱彻 345n25
 Flourens, M. P. J. M. P. J. 弗卢朗 311n47
 Foote, G. A. G. A. 富特 308n36
 Forbes, J., *Happiness* J. 福布斯《幸福》 333n104
- Forman, P. P. 福曼 318n25
 Forster, T. I. M T. I. M. 福斯特
Canning 坎宁 323n70
Facts & Enquiries 《事实和调查》 321n57
 ed., Locke 编《洛克》 323n69
Observations on Insanity 《关于精神错乱的观察》 322n64

- “Observations on Phrenology” “关于
颅相学的观察” 322n58
“Physiology” “生理学” 322n62
Recueil 《汇编》 321n57
Somatopychonoologia 《躯体心理
学》 323n73
“Wernerian” “沃纳的” 318n20
Fossati, J. J. 福萨蒂 315n2
Foster, J. J. 福斯特 359n117
Fowler, L. N. L. N. 福勒
Bradlaugh 布雷德洛 391n41
Marriage 《婚姻》 361n14
Fowler, O. O. 福勒 361n14
Fowles, J. J. 福尔斯 336n31
Fraser's Mag. 《弗雷泽杂志》 342n88
Free Church Mag. 《自由教会杂
志》 339n62
Frost, T. T. 弗罗斯特 380n35
Gall, F. J. F. J. 高尔
“Lectures” “演讲” 312n51
Medizinische 《医学》 315n1
and J. G. Spurzheim, *Anatomie* 和 J.
P. 施普茨海姆《解剖学》 303n20;
“Crane”; Functions “头骨” 308n39;
功能 364n45;
Les fonctions; Memoir 《功能》
303n20; 《论文集》 306n19
Gammage, R. C. R. C. 甘米奇 365n62
Gardner, M. M. 加德纳 305n2
Garnett, R. G. R. G. 加尼特
Co-operation 《合作》 381n48
“Craig” “克雷格” 381n45
Garnett, Richard 理查德·加尼
特 370n107
Gash, N. N. 加什 367n75
Geertz, C. C. 格尔茨
“Ideology” “意识形态” 304n28
“Religion” “宗教” 368n86
Genovese, E., *Slaves* E. 吉诺维斯《奴
隶》 341n76
Gentleman's Mag. 《绅士杂志》 (1819
年) 326n30; (1833年) 302n10
Gibbon, C. C. 吉本 317n15
Gibbs, F. W. F. W. 吉布斯 351n61
Gilbert, A. A. 吉尔伯特 370n105
Gillespie, W. W. 吉莱斯皮 342n88
Gillispie, C. C. C. C. 吉利斯皮
Genesis 《起源》 301n3
“Jacobin” “雅各宾” 329n54
Gillow J. J. 吉洛 323n71
Glover, R. M. R. M. 格洛弗 330n68
Glyde, J. J. 格莱德 348n45
Godard, J. G. J. G. 戈达德 347n41
Godwin, W. W. 戈德温 376n73
Goldmann, L. L. 戈德曼 315n71
Goldstein, K. K. 戈尔茨坦 306n13
Goodwin, B. B. 古德温 371n12
Goran, M. M. 戈兰 372n16
Gordon, H. S. H. S. 戈登 336n33
Gordon, J. J. 戈登 308n35
Observations 《观察》 308n39
Gorz, A. A. 戈茨 374n55
Goyder, D. G. D. G. 戈伊德
Acquisitiveness 《收获》 357n105
Autobiography 《自传》 331n74
Heads 《头颅》 362n27
“Marriage” “婚姻” 362n25
Sermons 《布道》 365n56
Graham, J. J. 格雷厄姆 303n14
Graham, S. S. 格雷厄姆 363n35
Gramsci, A. A. 葛兰西 324n6
Gran, T. T. 格兰 305n6
Grant, A. C. A. C. 格兰特
“Combe” “库姆” 305n10
“Election” “选举” 317n15

- “New Light” “新见解” 377n3
- Grant, B. B. 格兰特 365n58
- Gray, R. Q. R. Q. 格雷
Aristocracy 《贵族》 360n9
 “Hegemony” “霸权” 324n6
 “Styles” “风格” 355n94
- Greaves, J. P. J. P. 格里夫斯 383n84
- Green, J. D. J. D. 格林 326n24
- Greene, J. J. 格林 337n37
- Greg, W. R. W. R. 格雷格 310n46
- Greisman, H. C., and S. S. Mayes H. C. 格赖斯曼和 S. S. 梅斯 369n95
- Grobel, M. C. M. C. 格罗贝尔 344n15
- Guerlac, H. H. 格拉克 371n10
- Guillot, E. E. 吉约 369n89
- Gutteridge, J. J. 格特里奇 361n17
- Guttsman, W. L. W. L. 古茨曼 367n75
- Haggart, D. D. 哈格特 360n12
- Haight, G. G. 海特 378n22
- Haines, B. B. 海恩斯 336n37
- Halévy, E. E. 哈勒维
Hodgskin 霍奇斯金 381n50
Radicalism 激进主义 308n31
- Haley, B. B. 黑利 333n96
- Hall, J. Y. J. Y. 霍尔 315n5
- Hall, S. S. 霍尔 359n118
- Hall, S. T. S. T. 霍尔
Experiences 《经验》 350n58
Sketches 《概略》 380n41
- Hamburger, J. J. 汉伯格 335n19
- Hamilton, H. P. H. P. 汉密尔顿 344n11
- Hamilton, J. J. 汉密尔顿 328n44
- Hamilton, P. P. 汉密尔顿 323n75
- Hamilton, R. W. R. W. 汉密尔顿 330n70
- Hamilton, W. W. 汉密尔顿
Lectures 《演讲》 310n45
Testimonials 《证据》 317n15
see also Correspondence 也见《通信》
- Hamilton and Phrenology 汉密尔顿和颅相学 310n45
- Hammond, J. L., and B. Hammond J. L. 哈蒙德和 B. 哈蒙德 386n115
- Hammond, M. P., see Akert, K. M. P. 哈蒙德, 见 K. 艾克特
- Hanen, M., et al., eds. M. 哈宁等人编 315n7
- Hanna, W. W. 汉纳 342n89
- Hans, N. N. 汉斯 351n61
- Hanson, L., and E. Hanson L. 汉森和 E. 汉森 378n22
- Hardy, D. D. 哈迪 383n84
- Harris, F. F. 哈里斯 367n74
- Harris, M. M. 哈里斯 389n12
- Harris, N. N. 哈里斯 315n71
- Harrison, B. B. 哈里森 387n125
- Harrison, J. F. C. J. F. C. 哈里森
 “Adult” “成人” 356n98
Learning 《学习》 347n40
 “Margins” “边缘” 378n22
 “New View” “新观点” 377n3
Owen 《欧文》 377n2
 “Poor” “穷人” 383n81
Second Coming 《第二次来临》 318n25
- Harrison, R. R. 哈里森 337n38
- Harrison, Royden 罗伊登·哈里森 364n46
- Harwood, J. J. 哈伍德 330n48
- Hayek, F. V. F. V. 哈耶克 304n27
- Hays, J. N. J. N. 海斯
 “Brougham’s Society” “布鲁厄姆” 328n40
 “London Institution” “伦敦学

610 文献索引

- 院” 324n3
 “London Lecturing” “伦敦演讲” 351n61
 Hazlitt, W. W. 赫兹利特
 “Burke” “伯克” 369n93
 “Champions” “支持者” 312n48
 “Fallacies” “谬论” 337n40
 “Farrington” “法林顿” 378n16
 Head, G. G. 黑德 361n15
Heads of the People 《民众头颅》 360n10
 Heeny, B. B. 希尼 325n13
 Heilbron, L. J. L. J. 海尔布伦 361n21
 Hendrix, R. R. 亨德里克斯 374n44
 Hennell, M. M. 亨内尔 379n24
 Hering, D. W. D. W. 赫林 305n2
 Herrick C. J. C. J. 赫里克 305n2
 Hetherington, H. H. 赫瑟林顿 386n116
 Higham, J. J. 海厄姆 325n21
 Hill, C. C. 希尔
 “Harvey” “哈维” 335n29
Upside Down 《天翻地覆》 316n10
Winstanley 《温斯坦莱》 371n11
 Hillway, T. T. 希尔韦 304n23
 Hilts, V. L. V. L. 希尔茨 362n32
 Himmelfarb, G. G. 海默尔法伯 370n101
 Hinton, D. A. D. A. 欣顿 301n3
 Hirst, D. D. 赫斯特 336n35
 Hobsbawm, E. J. E. J. 霍布斯鲍姆
 “Aristocracy” “贵族” 360n9
Capital 《资本》 366n67
 “Religion” “宗教” 360n7
 Hodgkin, J. E. J. E. 霍奇金 302n10
 Hodgkin, L. L. 霍奇金 306n11
 Hodgkin, T. T. 霍奇金 348n44
 Hodgson, J. S. J. S. 霍奇森 342n88
 Hodgson, W. B. W. B. 霍奇森
Instruction 《教育》 326n25
Life 《生平》 334n13
 “Progress” “进步” 328n45
 Hoff, E. C., see Reise, W. E. C. 霍夫, 见 W. 赖斯
 Hole, J. J. 霍尔 349n45
 Holland, H. H. 霍兰 335n25
 Hollander, B. B. 霍兰德
Female 《女性》 369n89
Revival 《复活》 306n16
Soul 《灵魂》 388n4
 “Spencer” “斯宾塞” 336n37
 Hollis, P. P. 霍利斯
 ed., *Class* 主编《阶级》 381n50
Press 《出版物》 375n59
 Holm, J. D. J. D. 霍尔姆 384n94
 Holyoake, G. J. G. J. 霍利约克
Carlile 《卡莱尔》, 374n50
Co-operation 《合作》 346n31
 “Healthian” “健康” 363n41
Life 《生平》 370n108
Paley 《佩利》 373n38
 “Reminiscences” “回忆” 385n98
Secularism 《世俗主义》 363n39
Self-Help 《自助》 381n46
 “Socialism” “社会主义” 388n133
 Home, E. E. 霍姆 309n43
 Hone, J. A. J. A. 霍恩 373n29
 Hood, T. T. 胡德 307n22
 Hopkinson, J. J. 霍普金森 351n58
 Horton, R. R. 霍顿 337n41
 Hovell, M. M. 霍维尔 387n125
 Howe, P. P., ed. see Hazlitt W. P. P. 豪, 主编, 见 W. 赫兹利特
 Hudson, J. W., *Adult* J. W. 赫德森《成人》 333n103
 Hughes, H. S. H. S. 休斯
Human Nature 《人性》 365n55

- Humphry, G. M. G. M. 汉弗莱 338n47
 Hungerford, E. E. 亨格福德 304n23
 Hunt, H. H. 亨特 368n88
 Hunt, J. J. 亨特 388n1
 Hunter, R. R. 亨特 357n105
 Hurlbut, E. P. E. P. 赫尔伯特 341n78
 Huxley, A. A. 赫胥黎 359n2
 Huxley, T. H. T. H. 赫胥黎 340n64
 Hyam, R. R. 海厄姆 345n22
 Hytch, E. J. E. J. 海奇 362n28
-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伦敦插图新闻》 339n57
 Ingleby, D. D. 英格尔比
 “Ideology” “意识形态” 359n2
 “Mental” “精神的” 329n48
 Inglis, H. D. H. D. 英格利斯 344n7
 Ingram, J. J. 英格拉姆 337n37
 Inkster, I. I. 英克斯特
 “Askesian” “阿斯克西派” 322n59
 “English Mechanics’ Institutes” “英国技工学院” 331n76
 “Lecturers” “演讲” 351n61
 “Marginal” “边缘的” 324n10
 “Phrenology” “颅相学” 312n49
 “Science Instruction” “科学教育” 349n52
 “Sheffield Mechanics’ Institute” “设菲尔德技工学院” 349n45
 “Studies” “研究” 372n25
 and J. Morrell, eds. 和 J. 莫雷尔合编 324n8
- Inspector & National Mag.* 《观察家和国民杂志》 353n75
 Ironside, I. I. 艾恩赛德 382n73
- Jack, I. I. 杰克 304n23
 Jackson, J. W. J. W. 杰克逊
Ethnology 《人种学》 389n12
 “Superiority” “优越性” 369n89
 Jacob, M. M. 雅各布 323n69
 James, J. C. J. C. 詹姆斯 344n10
 James, W. W. 詹姆斯 391n46
 Jameson, E. E. 詹姆森 353n74
 Jastrow, J. J. 贾斯特罗 305n2
 Jay, M. M. 杰伊 302n8
 Jefferson, G. G. 杰斐逊 304n22
 Jeffrey, F. F. 杰弗里 309n44
 Jennings, J. J. 詹宁斯
Cyclopedia 《百科全书》 380n38
Inquiry 《调查》 326n22
Institutions 《协会》 324n5
J. Health & Disease 《健康和疾病杂志》 333n95
 Johnson, R. R. 约翰逊 340n76
 Johnson, T. B. T. B. 约翰逊 363n35
 Johnson, W. H. W. H. 约翰逊 338n54
 Jolly, W., ed. W. 乔利主编 339n57
 Jones, E. (1851) E. 琼斯(1851) 374n46
 Jones, E. (Freud) E. 琼斯(弗洛伊德) 327n38
 Jones, G. G. 琼斯 370n1
 Jones, L. L. 琼斯 376n79
see also Ludlow, J. M. 也见 J. M. 勒德洛
 Jones, P. P. 琼斯 368n84
 Jones, R. A. R. A. 琼斯 387n125
 Jones, R. F. R. F. 琼斯 329n54
- Kanner, B. B. 坎纳 369n89
 Kaplan, F. F. 卡普兰 319n34
 Kargon, R. R. 卡冈 355n92
 Kass, L. R. L. R. 卡斯 341n77
 Kay-Shuttleworth, J. P. J. P. 凯—沙特尔沃思 340n76
 Kearney, H. F. H. F. 卡尼 358n113

612 文献索引

- Kelly, A. A. 凯利 301n3
Kelly, T. T. 凯利
 Birkbeck 《伯克贝克》348n45
 History 《历史》348n45
Kennedy, C. J. C. J. 肯尼迪 342n88
Kennedy, J. J. 肯尼迪 310n46
Kent, C. C. 肯特 390n30
Kidd, J. J. 基德
 Adaptation 《适应》309n43
 Course 《课程》309n40
Kingsley, C. C. 金斯利 335n18
Kirby, R. G. R. G. 柯比 356n98
 and A. E. Musson 和 A. E. 马森 368n83
Kitson Clark, G. G. 基特森 367n75
Knott, J. J. 诺特 306n16
Knox, R. R. 诺克斯 308n32
Koestler, A. A. 凯斯特勒 388n134
Kolakowski, L. L. 科拉可夫斯基 340n66
Konstantinov, K. V., et al. K. V. 康斯坦丁诺夫等 343n95
Kurzweil, E. E. 库兹韦尔 340n71

Ladies Mag. & Literary Gaz. 《女士杂志和文学杂志》368n88
Laing, S. S. 莱恩 344n12
Lamarck, J. B. P. J. B. P. 拉马克 377n5
Lance, E. J. E. J. 兰斯 344n6
Lancet 《柳叶刀》
 (1824年), 312n52
 (1825年), 314n65.
 (1826年), 302n10
 (1832年), 329n51
 (1841年), 332n85
 (1842年), 332n89
 (1847年), 333n98
Landes, D. D. 兰德斯 343n96
Lane, M. M. 莱恩 384n92
Lange, F. A. F. A. 兰格 305n1
Lavater, J. G. J. G. 拉瓦特尔 302n14
Lawrence, W. W. 劳伦斯
 Fact 《事实》373n33
 Lectures 《演讲》312n50
Laycock, T. T. 莱科克 302n10
Layder, D. D. 莱德 318n25
Layton, D. D. 莱顿 301n3
Leek, S. S. 利克 361n23
Lefevre, G. G. 勒费弗尔 319n31
Leiss, W. W. 莱斯 326n26
Lenoir, T. T. 勒努瓦 316n10
Lesky, E. E. 莱斯基
 “Herder” “赫尔德” 315n6
 “Structure” “结构” 302n10
 Vienna 《维也纳》303n19
Leventhal, F. M. F. M. 利文撒尔 387n127
Levere, T. T. 莱弗里 315n7
Levidow, L. L. 利维多 305n5
Levison, J. L. J. L. 利维森
 Drunkenness 《放荡》362n32
 Mental 《精神的》366n69
Lewes, G. H. G. H. 刘易斯
 Biographical History 《传记历史》304n1
 Comte 《孔德》337n39
 “France” “法国” 388n2
 Goethe 《歌德》315n6
 Problems 《问题》339n64
Lewis, D. W. D. W. 刘易斯 303n22
Lewis, G. C. G. C. 刘易斯 333n102
Lichtheim, G. G. 利希特海姆 341n77
Lifton, R. J. R. L. 利夫顿 338n49
Linebaugh, P. P. 莱恩博 373n31
Lineham, P. J. P. J. 莱恩汉姆 315n7
Linton, W. J. W. J. 林顿

- Memories* 《纪念》385n107
Republic 《共和国》374n46
Watson 《沃森》357n107
 Litre, E. E. 利特雷 337n37
 Locke, J. J. 洛克 308n32
 Lockhart, J. G. J. G. 洛克哈特 368n84
London Investigator 《伦敦调查者》388n131
London Mag. 《伦敦杂志》
 (1822年), 330n61
 (1823年), 380n37
London Mechanics' Register 《伦敦技工纪事》347n42
London Medical & Physical J. 《伦敦医学与身体杂志》
 (1800年), 303n21
 (1809年), 307n19
 (1815年), 308n35
 (1826年), 307n20
London Medical Gazette 《伦敦医学公报》369n89
London Medical Repository 《伦敦医学丛报》
 (1815年和1817年) 308n35
 (1828年) 302n10
London Phalanx 《伦敦方阵》355n90
 Loudon, J. J. 劳登 368n88
 Lovejoy, A. O. A. O. 洛夫乔伊 337n44
 Lovett, W. W. 洛维特
Chartism 《宪章运动》387n126
Life 《生平》386n116
 Lowe, W. R. W. R. 洛 328n44
 Ludlow, J. M., and L. Jones J. M. 勒德洛, 和 L. 琼斯 349n45
 Lukics, G. G. 卢基奇 305n8
 Lukes, S. S. 卢克斯 370n111
 Lunn, E. E. 伦恩 339n62
 Lyon, G. G. 莱昂
 “Harmony” “和谐” 328n44
 “Liberty” “自由” 330n59
 Macalister, A. A. 麦卡利斯特 302n10
 Macaulay, R. R. 麦考利 329n54
 Macaulay, T. B. T. B. 麦考莱 320n43
 McCarthy, T. T. 麦卡锡 305n5
 McClelland, K. K. 麦克莱兰 347n34
 M'Cormac, H. H. 麦科马克 382n75
 McCulloch, J. R. J. R. 麦卡洛克 324n9
 MacFarlane, A. A. 麦克法兰 343n97
 McFie, J. J. 麦克菲 306n15
 McIntyre, J. L. J. L. 麦金太尔 391n36
 Mackay, C. C. 麦凯 334n8
 Mackenzie, D., and B. Barnes D. 麦肯齐, 和 B. 巴恩斯 329n54
 MacKenzie, G. S. G. S. 麦肯齐
Documents 《文献》314n61
Education 《教育》320n45
 “Essay” “论文” 320n46
Lectures 《演讲》320n45
 “The Split” “分裂” 332n89
 “Taste” “品味” 320n46
 and D. Stewart 和 D. 斯图尔特 309n42
 Mackenzie, W. L., and E. Matthew, W. L. 麦肯齐, 和 E. 马修 389n14
 McLaren, A. A. 麦克拉伦
 “France” “法国” 381n44
 “Medium” “媒介” 305n10
 McLean, H. H. 麦克莱恩 331n80
 Maclean, J. J. 麦克莱恩 328n44
 McLennan, G. G. 麦克伦南 359n117
 MacLeod, R., and P. Coffins, eds. R. 麦克劳德和 P. 科芬斯编 326n26
 Macnish, G. G. 麦克尼什 357n105
 Macnish, R. R. 麦克尼什
Introduction 《入门》318n20

614 文献索引

- Pythagorean* 《毕达哥拉斯》357n105
Macphael's Edinburgh Ecclesiastical J.
 《麦克菲尔爱丁堡教会杂志》339n62
 Magendie, F. F. 马让迪 310n47
 Magoun, H. W. H. W. 马古恩 302n10
 Malinowski, B. B. 马林诺夫斯基 326n28
 Mandelbaum, M. M. 曼德尔鲍姆 308n36
 Mandley, F. G. F. G. 曼德利 389n15
 Mandrou, R. R. 芒德鲁 326n26
 Mann, L. L. 曼 305n4
 Mannheim, K. K. 曼海姆
 Essays 《论文》318n23
 Ideology 《意识形态》359n123
 Mantell, G. G. 曼特尔 351n65
 Manuel, Frank 弗兰克·曼纽尔
 Freedom 《自由》336n36
 Newton 《牛顿》305n6
 Saint-Simon 《圣西门》337n37
 and Fritzie Manuel 和弗里齐·曼纽尔 375n58
 Marcus, S. S. 马库斯
 Engels 《恩格斯》350n58
 Victorians 《维多利亚人》327n39
 Marcuse, H. H. 马尔库塞
 Negations 《否定》315n71
 “Redefinition” “重新定义”304n28
 Marriott, J. J. 马里奥特 383n82
 Marshall, J. C. J. C. 马歇尔
 “Freud” “弗洛伊德”307n30
 “Minds” “精神”336n33
 Martindale, D., ed. D. 马丁代尔编 337n38
 Martineau, H. H. 马蒂诺
 Autobiography 《自传》334n13
 “Combe” “库姆”334n1
 Household 《家庭》339n57
 Peace 《和平》325n18
 “Representative Men” “典型人物” 364n48
 see also Atkinson, H. G 也见 H. G. 阿特金森
 Marwick, W. H. W. H. 马威克
 “Education” “教育”345n17
 “Mechanics' Institutes” “技工学院” 356n96
 Marx, K. K. 马克思
 Grundrisse 《大纲》374n56
 Letters 《书信》377n86
 and F. Engels, *Britain; Correspondence German; Manifesto* 和 F. 恩格斯《英国》349n45; 《通信》329n57; 《德意志意识形态》375n57; 《共产党宣言》347n38
 Mason, L. L. 梅森 328n44
 Mather, F. C. F. C. 马瑟 345n22
 Mathias, P., ed. P. 马赛厄斯编 301n2
 Maugham, R. R. 莫姆 324n5
 Mayes, S. S., see Greisman, H. C. S. S. 梅斯, 见 H. C. 格雷斯曼
 Mazlish, B. B. 马兹利什 335n17
 Medawar, P. P. 梅达沃 305n4
Medical & Physical J., see *London Medical & Physical J.* 《医学与生理杂志》, 见《伦敦医学与身体杂志》
Medical Times 《医学时代》332n88
Medico-Chirurgical Rev. 《医学—外科医生评论》
 (1817), 308n35
 (1823), 312n52
 (1835), 334n104
 (1836), 327n38
 (1837), 311n47
 (1841), 332n86, 334n104
 Mendelsohn, E. E. 门德尔松

- “Construction”“建构”305n6
 “Revolution”“革命”316n9
 Mercer, T. W. T. W. 默瑟 374n44
 Merton, R. R. 默顿 304n28
 Merz, J. T. J. T. 默茨 342n92
Metropolitan Q. Mag. 《首都季刊杂志》
 330n61
 Meyer, D. D. 迈耶 369n90
 Miles, L. L. 迈尔斯 368n88
 Mill, J. S. J. S. 密尔
 Autobiography 《自传》335n18
 Nature 《自然》340n65
 Millburn, J. R. J. R. 米尔伯恩 351n61
 Miller, H. H. 米勒
 Essays 《论文》318n22
 Impressions 《印象》390n27
 Miller, J. J. 米勒
 “Dog”“狗”336n32
 “Scandal”“丑闻”319n34
 Milligan, E. E. 米利根 310n47
 Mills, J. J. 米尔斯 357n105
 Minogue, K. R. K. R. 米诺格 347n34
 Moiler H. H. 莫伊勒 316n10
 Money, J. J. 莫尼 360n10
 Monro, A. A 门罗 310n45
 Montgomery, J. J. 蒙哥马利 376n73
Monthly Mag. 《月刊》
 (1802—1806), 307n20;
 (1825), 327n34
Monthly Rev. 《每月评论》(1815年),
 308n35, 322n64
 Moore, D. C. D. C. 穆尔 374n42
 Moore, J. R. J. R. 穆尔 343n93
 Moore, R. R. 穆尔 359n122
Moral Reformer, 《道德改革家》358n108
 Morell, J. D. J. D. 莫雷尔 304n1
 Morgan, J. M. J. M. 摩根
 Critics 《批评家》341n83
 Hampden 《汉普登》366n69
 Morgan, N. N. 摩根 388n8
 Morgan, T. T. 摩根 343n3
 Morin, G. G. 莫林 315n6
 Morley, J. J. 莫利 307n25
 Morrell, J. (see also Inkster, I.) J. 莫雷尔(也见 I. 英克斯特)
 and A. Thackray 和 A. 撒克利 316n8
 Morrison, R. J. R. J. 莫里森 362n26
 Morton, A. L. A. L. 莫顿
 “Pilgrims”“朝圣”359n4
 Owen 《欧文》384n94
 Utopia 《乌托邦》376n82
 and J. Saville 和 J. 萨维尔 378n17
 Mueller, I. W. I. W. 米勒 337n37
 Mulkay, M. M. 马尔凯 301n1
 Murphy, J. L. J. L. 墨菲 339n62
 Murray, H. A. H. A. 默里 327n38
 Murray, T. T. 默里 358n116
 Musson, A. E. A. E. 马森 381n46
 and E. Robinson 和 E. 罗宾逊 351n61
 see also Kirby, R. G. 也见 R. G. 柯尔比
 Myles, J. J. 迈尔斯 353n79
National Mag. & Monthly Critic 《国民杂志和每月批评家》327n35
Naturalist 《自然主义者》331n77
 Neale, R. S. R. S. 尼尔
 “Bourgeoisie”“资产阶级”367n75
 “Class”“阶级”324n11
 Needham, J., ed. 李约瑟编 342n92
 Neill, P., see Alison, W. P. P. 尼尔, 见 W. P. 艾莉森
 Neuburger, M. M. 纽伯格 302n10
 Neuman, R. P. R. P. 纽曼 334n6

616 文献索引

- Neve, M., and R. Porter M. 尼夫和 R. 波特 336n31
- New, C. C. 纽 344n15
- Newcastle Courant 《纽卡斯尔报》357n105
- New Edinburgh Rev. 《新爱丁堡评论》314n66
- Newham W. W. 纽汉 382n71
- New Monthly Mag. 《新月刊》344n6
- New Moral World (NMW) 《新道德世界》
(1838), 385n106
(1841), 381n43
(1842), 385n108
- Nichols, T. L. T. L. 尼科尔斯 344n6
- Nield, K., and J. Seed K. 尼尔德和 J. 锡德 369n97
- Nissenbaum, S. S. 尼森鲍姆 363n35
- Noble, D. D. 诺布尔
“Bacon”“培根”326n26
Brain 《大脑》308n31
Elements 《原理》333n96
Inquiry 《调查》332n91
“Insanity” “精神错乱”332n91
“True and False” “真和假”332n90
- Noble, J. A. J. A. 诺布尔 390n20
- Noel P. S. see Carlson E T. P. S. 诺埃尔, 见 E. T. 卡尔森
- Nott, J. W. J. W. 诺特 372n20
- Olcott, H. S. H. S. 奥尔科特 391n38
- Olla Podrida, The* 《奥拉·波德里达》385n100
- O'Malley, C. D., see Clarke, E. C. D. 奥马利, 见 E. 克拉克
- Orwell, G. G. 奥韦尔 371n9
- Osler, W. W. 奥斯勒 389n13
- O'Toole, T. T. 奥图尔 302n10
- Owen, R. R. 欧文
Dialogue 《对话》319n31
“Formation” “形成”378n21
Home Colonies 《家庭殖民》382n66
Life 《生平》381n50
Report 《报告》378n11
- Owen, R. D. R. D. 欧文
Autobiography 《自传》380n41
Neurology 《神经学》385n111
- Oxford Encyclopedia* 《牛津百科全书》330n62
- Paget, S. S. 佩吉特 306n16
- Panoramic Miscellany* 《全景杂记》316n8
- Parkin, F. F. 帕金 368n87
- Parkinson, J. J. 帕金森 373n28
- Parsons, T. T. 帕森斯 326n28
- Parssinen, T. M. T. M. 帕辛嫩
“Mesmeric” “催眠术的” 351n58
“Phrenology” “颅相学” 304n24
and I. Prothero 和 I. 普罗瑟罗 383n83
- Passeron, J. -C., see Bourdieu, P. J. -C. P. 帕斯龙, 见 P. 布尔迪厄
- Paterson, T. T. 佩特森
“Phrenology” “颅相学” 388n131
“Physiology” “生理学” 385n110
- Patterson, A. T. A. T. 帕特森 349n45
- Paz, D. G. D. G. 帕斯 358n112
- Peacock, A. J. A. J. 皮科克 367n74
- Peacock, J. L. J. L. 皮科克 343n96
- Pearson, K. K. 皮尔逊 389n14
- Peel, J. D. Y. J. D. Y. 皮尔 334n13
- Pelling, H. H. 佩林 370n105
- People, The* (1848) 《人民》(1848年) 358n109, 364n47
- Peterson, M. J. M. J. 彼得森 325n12

- Peterson, R. A., see Demerathi, N. J. R.
A. 彼得森, 见 N. J. 德梅拉蒂
- Petrie, G. G. 皮特里 373n34
- Philomathic J. & Literary Rev.* 《星相学家杂志和文学评论》324n5
- Philosophical Mag.* 《哲学杂志》322n61
- Phrenological Association: Report* 《颅相学学会: 报告》332n85
- Phrenology in Edinburgh* 《爱丁堡颅相学》307n26
- Phrenology Made Easy* 《简明易懂颅相学》391n42
- Pichanick, V. K. V. K. 皮查尼克 339n57
- Pickstone, J. V. J. V. 皮克斯通
“Botany” “植物学” 390n34
“Professionalization” “职业化” 324n12
- Pinch, T. J., see Collins, H. T. J. 平奇, 见 H. 柯林斯
- Piper, H. W. H. W. 派珀 315n5
- Pollard, S. S. 波拉德 381n46
And J. Salt, eds. 和 J. 索尔特编 356n98
- Polyani, M. M. 波拉尼 371n14
- Poole, R. R. 普尔 314n66
- Porter, R. R. 波特
“Globe” “地球” 336n31
“Lyell” “莱尔” 335n22
“Toulmin” “图尔明” 376n83
see also Neve, M.; Rousseau, G. S.
也见 M. 尼夫; G. S. 鲁索
- Portsmouth Literary Register* 《朴茨茅斯文学纪事》323n2
- Poupin, T. T. 普潘 303n14
- Powles J. J. 波尔斯 326n28
- Presbyterian Rev.* 《长老会评论》(1836), 342n88, 361n16
- Price, A. A. 普赖斯 303n22
- Price, D., see Spiegel-Rösing, I. D. 普赖斯, 见 I. 施皮格尔—勒辛
- Price, R. N. R. N. 普赖斯 355n91
- Prichard, J. J. 普里查德
Diseases 《疾病》311n47
Insanity 《精神错乱》311n47
- Prideaux, T. S. T. S. 普里多
“Essays” “论文” 361n22
“Fallacies” “谬论” 351n58
“Organology” “器官学” 366n69
Strictures 《责难》327n37
and W. C. Engledue 和 W. C. 恩格尔杜 333n96
- Prothero, I. I. 普罗瑟罗 347n41
see also Parssinen, T. M. 也见 T. M. 帕西农
- Pugh, J. S. D. J. S. D. 皮尤 368n88
- Punch* 《庞奇》389n19
- Pyenson, L. L. 派恩森 301n3
- Pyenson, S. S. S. S. 派恩森 301n3
- Quarterly Rev.* 《季度评论》308n35
- Radcliffe-Brown, A. R. A. R. 拉德克利夫—布朗 337n38
- Rainger, R. R. 雷恩杰 304n23
- Reese, D. M. D. M. 里斯 363n42
- Rees's Cyclopaedia* 《雷斯百科全书》303n21
- Reise, W., and Hoff, E. C. W. 赖泽和 E. C. 霍夫 306n13
- Rennell, T. T. 伦内尔 318n20
- Richards, D., see Woodward, J. D. 理查兹, 见 J. 伍德沃德
- Risse, G. B. G. B. 里斯 391n50
- Robertson, J. M. J. M. 罗伯逊
Freethought 《自由思想》341n81

618 文献索引

- “Revival” “复活” 306n16
- Robinson, D. D. 鲁滨逊 355n91
- Robinson, E., see Musson, A. E. E. 鲁滨逊, 见 A. E. 马森
- Robinson, H. C. H. C. 鲁滨逊
Diary 《日记》315n7
Gall's Theory 《高尔理论》303n21
- Roderick, G. W., and M. D. Stephens
 G. W. 罗德里克和 M. D. 斯蒂芬斯
 “Lecture Subjects” “演讲主题” 349n48
 “Science” “科学” 355n94
 “Ventures” “冒险” 324n4
- Rodman, B. S. B. S. 罗德曼 378n15
- Roger, P. M. P. M. 罗杰
 “Cranioscopy” “颅检查术” 302n10
 “Phrenology” “颅相学” 309n41
- Rose, H., and S. Rose H. 罗斯和 S. 罗斯 301n2
- Rose, S. S. 罗斯 305n4
- Rosen, G. G. 罗森
 “Elliotson” “埃利奥特森” 319n34
 “Enthusiasm” “狂热” 308n32
- Rosenberg, C. C. 罗森伯格
 “Bitter” “痛苦” 364n43
 “Decoded” “译解” 329n48
 “Sexuality” “性行为” 318n25
- Rosenberg, M. M. 罗森伯格 369n95
- Ross J. J. 罗斯
Explanation 《解释》320n41
Treatise 《论文》319n35
- Roszak, T. T. 罗萨克 301n5
- Rousseau, G. S. G. S. 鲁索 303n17
 and R. Porter, eds. 和 R. 波特编 301n1
- Royle, E. E. 罗伊尔
Infidels 《异端》372n20
 “Institutes” “学院” 347n40
- Royston, W. W. 罗伊斯顿 307n19
- Rudolphi K. K. 鲁道非 311n47
- Rumball, J. Q. J. Q. 朗鲍尔
Claims 《主张》331n81
 “Lectures” “演讲” 365n60
- Rushton, A. A. 拉什顿 342n91
- Russett, C. C. 拉西特 336n36
- Ryall, M. Q. M. Q. 赖亚尔 385n110
- Ryan, M. M. 瑞安
Manual 《手册》365n58
 “Physiology” “生理学” 314n70
- Sabine, E. E. 萨拜因 320n41
- St. Aubyn, G. G. 圣奥宾 334n13
- Saleeby, C. W. C. W. 萨利比 306n16
- Salt, J. J. 索尔特
 “Hall” “大厅” 356n101
 “Ironside” “艾恩赛德” 349n52
 see also Pollard, S. 也见 S. 波拉德
- Sampson, M. B. M. B. 桑普森 340n70
- Saunders, E. E. 桑德斯 357n105
- Saunders, E. S. G. E. S. G. 桑德斯 368n88
- Saville, J. see Morton A. L. J. 萨维尔, 见 A. L. 莫顿
- Scheff, T. J. T. J. 舍夫 334n6
- Schmidt, A. A. 施密特 341n79
- Schon, D. A. D. A. 舍恩 336n33
- Schwartz, H. H. 施瓦茨 306n12
- Scott, J. J. 斯科特 339n62
- Scott, W. W. 斯科特
Harmony 《和谐》342n88
Observations 《观察》372n21
Remarks 《评论》339n62
- Scull, A. A. 斯卡尔
 ed. *Madhouses* 编《精神病院》303n22
- Museums* 《博物馆》347n35
- Seed, J., see Nield, K. J. 锡德, 见 K. 尼

- 尔德
- Selbourne, D. D. 塞尔伯恩 358n114
- Selling, L. S. L. S. 塞林 305n2
- Semmell, B. B. 泽梅尔 370n101
- Sensemen, W. M. W. M. 森斯门 304n23
- Severn, J. M. J. M. 塞弗恩 389n9
- Sewall, T. T. 休厄尔 311n47
- Shapin, S. S. 沙平
- “Homo”“人类” 304n25
- “Knowledge”“知识” 304n25
- “Politics”“政治学” 304n25
- “Pottery”“陶器” 325n15
- “Teats”“奶头” 345n19
- “Uses”“用处” 342n87
- and B. Barnes, “Control” 和 B. 巴恩斯, “控制” 344n16;
- “Head”“头颅” 336n30
- and A. Thackray 和 A. 撒克里 301n4
- see also Barnes, B. 也见 B. 巴恩斯
- Shaw, C. C. 肖 356n98
- Sheffield Phrenological Society 设菲尔德颅相学学会
- (1845年), 327n38
- (1846年), 316n8
- Sheils, W. J. ed W. J. 希尔斯编 390n34
- Shields, S. A. S. A. 希尔兹 369n90
- Shipley, S. S. 希普利 377n85
- Silver, H. H. 西尔弗
- Education*《教育》348n45
- ed., Owen 编《欧文》377n6
- Simon, B. B. 西蒙 347n40
- Simpson, J. J. 辛普森
- “Bell”“贝尔” 309n43
- Brief Reports*《简报》346n29
- “Elementary”“初等的” 363n37
- Necessity*《必然性》344n11
- Philosophy*《哲学》356n97
- “Phrenology”“颅相学” 361n19
- Simpson, J. Y. J. Y. 辛普森 342n92
- Skæ, D. D. 斯克 333n100
- Skorupski, J. J. 斯科鲁普斯基 343n95
- Slade, J. J. 斯莱德 325n18
- Sleigh, W. W. W. W. 斯莱 320n43
- Smiles, S. S. 斯迈尔斯 363n35
- Smith, A. A. 史密斯 339n62
- Smith, C. M. C. M. 史密斯 374n46
- Smith, F. B. F. B. 史密斯
- “Atheist”“无神论” 367n74
- Linton*《林顿》356n100
- Smith, J. E. J. E. 史密斯 343n3
- Smith, J. T. J. T. 史密斯
- “Diffusion”“传播” 325n21
- Popular View*《流行观念》367n72
- Synopsis*《大纲》362n25
- Vindicated*《辩护》369n98
- Smith, S. S. 史密斯
- “Correspondence”“通信” 327n37
- Principles*《原理》363n40
- Smith, W. A. W. A. 史密斯 345n22
- Smith, W. H. W. H. 史密斯
- “Application”“应用” 378n18
- “Chartism”“宪章运动” 379n31
- Letters*《书信》387n125
- Tendency*《趋向》350n54
- Sohn—Rethel, A. A. 索恩—雷特尔 336n30
- Solly, S. S. 索利 317n17
- Somerville, A. A. 萨默维尔 344n6
- Southwell, C. C. 索思韦尔 379n32
- Spark, J. J. J. J. 斯帕克 391n47
- Spectator*《旁观者》338n55
- Spector, B. B. 斯佩克特 317n19
- Spencer, H. H. 斯宾塞
- Autobiography*《自传》336n6n37
- Ethics*《伦理学》339n59

- Psychology* 《心理学》336n37
 “Social Organism” “社会有机
 体” 337n38
- Spiegel—Rösing, I., and D. Price, eds.
 I. 施皮格尔—勒辛和 D. 普赖斯
 编 301n1
- Spoerl, H. D. H. D. 斯波尔 308n33
- Spradley, J. P., ed. J. P. 斯普拉德
 利 304n28
- Spurr T. T. 斯珀尔 368n88
- Spurzheim, J. G. J. G. 施普茨海姆
Anatomy 《解剖学》308n38
Appendix to Anatomy 《解剖学附
 录》309n43
 “Baillie” “贝利” 309n43
Education 《教育》319n31
 (1821 ed.) (1821 年版) 377n7
Insanity 《精神错乱》314n62
 “Lectures” “演讲” 313n56
Natural Laws 《自然法则》366n72
Outlines 《大纲》329n52
Physiognomical 《人相的》308n35
Prospectus 《内容简介》308n35
 see also *Correspondence*; Gall, F. J.;
 Chenevix, R., “Phrenology” 也见
 《通信》; F. J. 高尔; R. 切尼维克斯
 “颅相学”
- Stanley, O. O. 斯坦利 340n64
- Stansky, P., ed. P. 斯坦斯基 340n76
- Starr, M. A. M. A. 斯塔尔 306n16
- Stauder, J. J. 施陶德尔 341n76
- Stedman Jones, G. G. 斯特德曼·琼斯
 “Lukács” “卢卡奇” 305n8
 “Working-Class” “工人阶
 级” 369n100
- Steneck, N. H. N. H. 斯特内克 302n10
- Stepan, N. N. 斯特潘 389n12
- Stephens, M. D., see Roderick, G. W.
 M. D. 斯蒂芬斯, 见 G. W. 罗德里克
- Stern, M. B. M. B. 斯特恩
Fowlers 《福勒家族》330n61
 “Holmes” “福尔摩斯” 389n13
 “Poe” “坡” 304n23
- Stevens, G. A. G. A. 史蒂文斯 360n10
- Stevens, J. J. 史蒂文斯 390n29
- Stewart D., See Mackenzie, G. S. D.
 斯图尔特, 见 G. S. 麦肯齐
- Stoehr, T. T. 斯托尔
Hawthorne 《霍索恩》304n23
 “Physiognomy” “人相学” 330n65
- Stone, L. L. 斯通 344n16 .
- Stone, T. T. 斯通
Evidences 《证据》310n46
 “Sinus” “窦” 338n47
- Storella, E. A. E. A. 斯托雷拉 344n15
- Straton, J. J. 斯特拉顿 333n100
- Streeter J. S. J. S. 斯特里特 313n57
- Summer, J. B., and S. T. Coleridge J.
 B. 萨默, 见 S. T. 柯勒律治 366n69
- Sunderland L. L. 森德兰 338n46
- Swanston, H. H. 斯旺斯顿 338n53
- Symes E. S. E. S. 赛姆斯 311n47
- Tait's Mag.* 《泰特杂志》367n73
- Tawney, R. H. R. H. 托尼
Capitalism 《资本主义》343n96
 ed., Lovett 编《洛维特》387n127
- Taylor, A. A. 泰勒 344n9
- Taylor, B. B. 泰勒 378n17
- Taylor, G., and E. W. Walls G. 泰勒和
 E. W. 沃尔斯 318n28
- Taylor, J. (1642) J. 泰勒 (1642
 年) 360n10
- Taylor, J. (1912) J. 泰勒 (1912
 年) 389n18
- Temkin, O. O. 特姆金

- “Basic”“基本的” 317n18
 “Gall”“高尔” 304n24
 Tennyson, C. C. 坦尼森 307n22
 Thackray A. A. 撒克里
 “Manchester”“曼彻斯特” 324n8
 see also Morrell, J. J.; Shapin, S. 也
 见 J. 莫雷尔; S. 沙平
 Thelwall, J. J. 塞尔沃尔 373n28
 Tholfsen, T. T. 托尔夫森
 Radicalism 《激进主义》360n9
 “Stability”“稳定性” 370n104
 Thomas, K. K. 托马斯 370n102
 Thompson, E. P. E. P. 汤普森
 “Eighteenth-Century”“18 世纪” 324n7
 The Making 《形成》347n40
 “[Moore]”“穆尔” 359n122
 Morris 《莫里斯》384n88
 “Patrician”“贵族的” 345n16
 “Peculiarities”“特性” 304n27
 “Time”“时间” 359n121
 Thompson, F. M. L. F. M. L. 汤普森 367n75
 Thompson, W. W. 汤普森 370n2
 Thomson, C. C. 汤姆森 356n103
 Thomson, W. H. W. H. 汤姆森 306n13
Thought 《思想》373n33
Three Familiar Lectures 《三个通俗演讲》307n21
 Thurnam, J. J. 瑟纳姆 332n82
 Timson T. T. 蒂姆森 391n39
 Todhunter, I. I. 托德亨特 331n80
 Tomilson, J. C. J. C. 托米尔森 328n44
 Tomkins, S. S. S. S. 汤姆金斯 334n6
 Travers, B. B. 特拉弗斯 333n99
 Travers, T. T. 特拉弗斯 363n35
 Tressell, R. R. 特雷塞尔 391n43
 Tristan, F. F. 特里斯坦 327n40
 Turnbull, D., ed. D. 特恩布尔 304n25
 Turner, B. S., see Abercrombie, N. B. S. 特纳, 见 N. 艾伯克龙比
 Turner, F. M. F. M. 特纳 342n93
 Turner, H. H. 特纳 364n49
 Turner, V. V. 特纳 324n10
 Turton, T. T. 特顿 376n73
 Twist, J. J. 特威斯特 366n69
 Tylecote, M. M. 泰莱科特 344n13
 Tyrrell, A. A. 蒂勒尔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学” 358n112
 “Smiles”“斯迈尔斯” 356n98
United Presbyterian Mag. 《联合长老会杂志》342n88
 Ure, A. A. 尤尔 346n33
 Usselman, M. C. M. C. 乌塞尔曼 321n50
 Uwins, D. D. 尤温斯
 Homoeopathy 《顺势疗法》314n69
 “Phrenology”“颅相学” 314n68
 “[Spurzheim]”“[施普茨海姆]” 308n35
 Treatise 《论文》308n31
 Vago, A. L. A. L. 瓦戈
 Alphabet 《字母表》391n42
 Vindicated 《辩护》389n15
 Vaihinger, H. H. 费英格 315n71
 Valentine, W. L., and D. D. Wickens W. L. 瓦伦丁, 和 D. D. 威肯斯 303n14
 Verner, A. A. 弗纳 353n73
 Vincent, D. D. 文森特 344n15
 Volosinov, V. N. V. N. 沃洛希洛夫 359n118

622 文献索引

- Wace, H. H. 韦斯 351n61
- Waite, B., see Evans, B. B. 韦茨, 见 B. 埃文斯
- Waksman, S. S. 瓦克斯曼 305n4
- Walker, A. E. A. E. 沃克 302n10
- Wallace, A. R. A. R. 华莱士
Life 《生平》355n92
“Neglect” “忽视” 381n47
Revolt 《反叛》373n39
- Wallis, R., ed. R. 沃利斯 301n1
- Walls, E. W., see Taylor, G. E. W. 沃尔斯, 见 G. 泰勒
- Walsh, A. A. A. A. 沃尔什 319n31
- Walzer, M. M. 沃尔泽 334n11
- Ward, J. T. J. T. 沃德 367n75
- Warne, J. J. 沃恩
Family 《家庭》347n37
Harmony 《和谐》328n44
- Watson, H. C. H. C. 沃森
“Britannica” “英国” 309n41
“Hamilton” “汉密尔顿” 310n45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 346n30
Public 《公众》365n62
“Relation” “关系” 362n28
Statistics 《统计表》312n49
Strictures 《责难》309n41
Testimonials 《证明书》333n94
- Webb, J. J. 韦伯 391n42
- Webb, R. K. R. K. 韦伯
Martineau 《马蒂诺》318n21
Reader 《读者》338n53
- Weber, G. G. 韦伯 390n28
- Weber, M. M. 韦伯 343n96
- Webster, C. C. 韦伯斯特 388n7
- Weekly Medico-Chirurgical Rev.* 《医学—外科医生周刊评论》312n51
- Weindling, P. P. 温德林 322n60
- see also Corsi, P. 也见 P. 科西
- Wells, R. B. D., ed. R. B. D. 韦尔斯 编 391n42
- Welsh, D. D. 韦尔什 307n29
- Westfall, R. S. R. S. 韦斯特福 尔 338n51
- Wheeler, J. M. J. M. 惠勒 343n94
- Whewell, W. W. 休厄尔 339n64
- White, A. D. A. D. 怀特 342n92
- White, W. H. W. H. 怀特 306n11
- Whitfield, A. G. W. A. G. W. 怀特菲尔德 305n2
- Wickens, D. S., see Valentine, W. L. D. S. 威肯斯, 见 W. L.
- Wickham, E. R. E. R. 威克姆 370n105
- Wickwar, W. W. 威克沃 372n20
- Wiener, J. J. 威纳
Carlile 《卡莱尔》372n20
“Hibbert” “希伯特” 373n22
- Wigley, J. J. 威格利 376n73
- Wilberforce, W. W. 威尔伯福 斯 370n108
- Wildsmith, W. W. 怀尔德史密斯 364n44
- Wilkinson, C. C. 威尔金森 352n69
- Wilkinson, J. J. G. J. J. G. 威尔金森
Body 《身体》336n32
Science 《科学》349n47
- Willey, B. B. 威利 339n59
- Williams, G. G. 威廉斯
Artisans 《工匠》360n7
Detrosier 《德特罗西尔》373n36
- Williams, H. H. 威廉斯 319n34
- Williams, L. P. L. P. 威廉斯 371n10
- Williams, R. R. 威廉斯
Culture 《文化》335n27
Keywords 《关键词》308n36
Marxism 《马克思主义》359n118

- “Nature” “自然” 341n79
- Williams, W. M. W. H. 威廉斯
Destiny 《命运》390n22
Vindication 《辩护》353n78
- Willis, R. R. 威利斯 336n30
- Wilson, Alex 亚历克斯·威尔森 387n125
- Wilson, Andrew 安德鲁·威尔森 390n32
- Wilson, C. C. 威尔森
 “Man” “人” 323n76
Outsider 《局外人》362n26
- Wilson, J. J. 威尔森 369n89
- Wilson, J. B. J. B. 威尔森 304n23
- Winch, P. P. 温奇 302n8
- Winslow, F. F. 温斯洛 314n62
- Wood, C. T. C. T. 伍德
 “Campsall” “坎普索尔” 354n79
 “Cerebral” “大脑的” 366n66
 “Suffrage” “选举权” 365n61
- Wood, N. N. 伍德
 “Milligan” “米利根” 311n47
 “Warrington” “沃灵顿” 331n77
- Wood, W. W. 伍德 366n66
- Woodhead, J. T. J. Y. 伍德黑德 390n29
- Woodward, J. and D. Richards, eds.,
 J. 伍德沃德和 D. 理查兹编 324n10
- Wordsworth, W. W. 华兹华斯 338n51
- Wright, F. F. 赖特 384n92
- Wright, P. P. 赖特 305n6
- Wright, T. T. 赖特 355n93
- Wrobel, A. A. 弗罗贝尔 306n10
- Yelloly, J. J. 耶洛利 306n17
- Yeo, E. E. 约
 “Owen” “欧文” 356n98
 “Social” “社会的” 377n3
- Yeo, R. R. 约
 “Image” “图像” 326n26
 “[Turnbull]” “特恩布尔” 304n25
- Young, G. M. G. M. 扬
Early 《早期》345n22
Portrait 《肖像》370n107
- Young, R. M. R. M. 扬
 “Anthropology” “人类学” 359n118
 “Biology” “生物学” 341n79
 “Functionalism” “功能主义” 337n38
 “Gall” “高尔” 302n9
 “Impact” “影响” 304n26
 “Limits” “局限” 341n79
 “Lysenkoism” “李森科学说” 305n3
 “Malthus” “马尔萨斯” 341n83
 “Man’s Place” “人的地位” 304n27
Mind 《精神》302n11
 “Science is” “科学是” 305n9
 “Spencer” “斯宾塞” 336n37
- Yoxen, E. E. 约克森 391n51
- Ysabeau, A. A. 伊莎博 303n14
- Zangwill, O. L. O. L. 赞格威尔 306n13
- Zeldin, D. D. 泽尔丁 337n42
- Zilsel, E. E. 齐尔泽尔
 “Law” “法则” 340n65
 “Progress” “进步” 371n13
- Zoist 《活力论者》332n89

总索引

凡是已出版著作在文中被引用的著作者,以及所有 20 世纪的著作者,请参看文献索引。

说明:本索引的数字代表原书的页码,即中译本的页边码;n 及后面的数字表示注释及其序号。

- Abernethy, John 约翰·阿伯内西 29, 61, 322n63
see also Lawrence—Abernethy dispute 也见劳伦斯—阿伯内西的争论
alienists, phrenological 颅相学的精神病学家 32
Allen, Matthew 马修·艾伦 43, 153, 273
Andersonian University, Glasgow 格拉斯哥的安德森大学 32, 44, 96
Anthropometry 人体测量学 259
Antiaristocracy 反贵族统治 187, 367n75
see also phrenologists, and antielitist 也见颅相学家和反精英论者
antiintellectualism 反智主义
antiphrenologists 反颅相学家 42—48
aristocracy of labor 工人贵族 167
artisans, situation of 工匠的境遇 171—172
Askesian Society, London 伦敦阿斯克西学会 60, 61
Baconianism 培根主义 73
Baillie, Matthew 马修·贝利 46
Bain, Alexander 亚历山大·贝恩 162, 178—179, 258
Bally, William 威廉·巴利 150, 274
Banks, Sir Joseph 约瑟夫·班克斯爵士 53, 60, 62
Barber, Jonathan 乔纳森·巴伯 143, 274
Barclay, John 约翰·巴克利 27, 46, 318n29
Barker, Joseph 约瑟夫·巴克 163—164, 182, 260, 328n45
Barlow, Edward 爱德华·巴洛 32, 33
Barmby, Catherine 凯瑟琳·巴姆

- 比 228
- Barmby, Goodwyn 古德温·巴姆比 242
- base/superstructure 基础/上层建筑 167
- Baume, PierreHenri 皮埃尔·亨利·博姆 220, 274, 373n34, 375n61
- Beamish, Richard 理查德·比米什 80, 143, 274
- Beecher, H. W. H. W. 比彻 328n45
- Bell, Charles 查尔斯·贝尔 28, 46
- Bentham, Jeremy 杰里米·边沁 23, 228
- Bergson, Henri 亨利·贝格松 267
- Billing, Archibald 阿奇博尔德·比林 31, 43, 44, 45, 318n28
- biology, molecular 分子生物学 271
- Birkbeck, George 乔治·伯克贝克 146, 346n33
- Bostock, John 约翰·博斯托克 28, 49
- Brande, William Thomas 威廉·托马斯·布兰德 28, 97
- Bray, Charles 查尔斯·布雷 87, 105, 229—230, 257, 275, 382n56
- Bridges, Frederick 弗雷德里克·布里奇斯 258, 260
- Bridgewater treatises 布里奇沃特论文 46, 128, 212
- Brindley, John 约翰·布林德利 143, 149, 232, 275, 379n33
-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Astral and Other Sciences 英国星体和其他科学促进协会 383n85
-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英国科学促进协会 90—93, 371n9
- Broca, Pierre Paul 皮埃尔·保罗·布罗卡 21
- Brontë, Charlotte 夏洛蒂·勃朗特 7
- Brougham, Lord 布鲁厄姆勋爵 46, 139, 142, 146, 203, 348n43
- Brown, Thomas 托马斯·布朗 24—25
- Browne, W. A. F. W. A. F. 布朗 32, 43, 43, 152, 161, 276
- Buckingham, James Silk 詹姆斯·西尔克·白金汉 92, 332n89
- Bulwer—Lytton, Edward 爱德华·布尔沃—利顿 7, 314n68
- Burns, J. D. J. D. 伯恩斯 260
- Bushea, Henri 亨利·布谢伊 148, 155, 276, 379n33
- Butter, John 约翰·巴特 32
- Butterfield, Herbert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16
- Byron, Lord 拜伦勋爵 314n61
- Cabanis, P. J. G. P. J. G. 卡巴尼斯 5, 183
- Calvin, John 约翰·加尔文 118, 131—133
- Calvinism, Scots 苏格兰加尔文主义 104
see also Combe, George 也见乔治·库姆
- Cambridge network 剑桥网 53
see also Forster, Thomas 也见托马斯·福斯特
- Campsall SDUK, *see* Woods family 坎普索尔实用知识传播协会, 见伍德家族
- Carlile, Eliza 伊莉莎·卡莱尔 277
see also Sharples, Eliza 也见伊莉莎·沙普尔斯
- Carlile, Richard 理查德·卡莱尔 277
on Allegorical Christianity 论讽喻基督教 216—218, 220, 242

- atheist materialist interest in phrenology 无神论唯物主义者对颅相学的兴趣 208—209, 218
- and Forster 和福斯特 61, 208
- and Freemasonry 和共济会成员 218
- head of, read by Deville 卡莱尔的头颅, 由德维尔解读 208
- and Lawrence 和劳伦斯 208
- lectures by, on phrenology 所作关于颅相学演讲 208, 219
- and Locke 和洛克 207, 222
- and new plan of reform 和改革新计划 214—215
- and new radicalism 和新激进主义 210—212
- and Newton 和牛顿 205, 207
- as opportunist 作为机会主义者 216
- and orthodox phrenologists 和正统颅相学家 208—209, 215
- and Owen 和欧文 213—215, 220
- and Paine 和潘恩 207, 209, 218
- phrenology of, criticized 卡莱尔的颅相学遭到批评 219—220
- and radical pantheism 和激进的泛神论 218
- and Spurzheim 和施普茨海姆 209, 212
- and Taylor 和泰勒 216, 219
- Cartesianism 笛卡尔主义 5
- see also* mechanical philosophy; mind-body dualism 也见机械论, 身心二元论
- Central Society for Education 中央教育学会 346n29
- cephalograph 脑图 336n37
- see also* charactograph; psychograph 也见性格图; 心理描绘图
- cerebral localization 大脑区位 21, 259, 303n17
- chain of being, great 生命序列 116
- Chalmers, Thomas 托马斯·查默斯 128, 129
- Chambers, Robert 罗伯特·钱伯斯 72, 92, 106, 108, 141, 174, 335n22, 339n63
- Vestiges* 《痕迹》 10, 120, 130, 212
- charactograph 性格图 234
- see also* cephalograph; psychograph 也见脑图; 心理描绘图
- Chenevix, Richard 理查德·切尼维克斯 43, 57—59, 83, 84
- Chilton, William 威廉·奇尔顿, 212, 387n130
- Christianity, Allegorical, *see under* Carlile, Richard 讽喻基督教, 见理查德·卡莱尔条目下
- circonvolution de langage 语言脑回 21
- Clark, Sir James 詹姆斯·克拉克爵士 32, 43, 45, 318n28, 332n87
- Clarke, Henry 亨利·克拉克 277, 364n50
- Claxton, Timothy 蒂莫西·克拉克斯顿 162
- Cobbett, William 威廉·科贝特 96, 179, 214, 215
- Political Register* 《政治纪事》 109
- Cobden, Richard 理查德·科布登 23, 121, 132—133, 165, 343n99, 367n75
- Cockburn, Henry 亨利·科伯恩 142, 346n29
- Coleridge, Samuel T. 撒缪尔·T. 柯勒律治 41, 51, 62, 319n32
- Combe, Abram 艾布拉姆·库姆 103, 106, 213, 233, 235, 236
- Combe, Andrew 安德鲁·库姆 32, 95, 103, 177—178

- Combe, George 乔治·库姆 278
- adoption of phrenology by 接受颅相学 107—110, 119
 - and appreciation of his phrenology 人们对库姆颅相学的评价 139
 - and Calvinism 和加尔文主义 105
 - on capital and labor 论资本和劳动 125—126, 184, 238
 - Constitution of Man* 《人类体格》 108—109, 120, 129—132, 140—141
 - on criminals 论罪犯 124—125
 - and criticism of his phrenology 和人们对他的颅相学的批评 243—248
 - death of 库姆去世 266
 - and Edinburgh chair of logic 和爱丁堡逻辑学教授职位 44
 - family background of 家庭背景 102—107
 - and Gall 和高尔 377n9
 - and genealogy 和家系 107
 - influence of Paley, Malthus, and A. Smith on 佩利、马尔萨斯和 A. 斯密对库姆的影响 109—110
 - lecturing 演讲 345n24, 352n71
 - as man of his time 作为时代代言人 102, 105
 - marriage of 库姆的婚姻 104
 - on natural law 论自然法则 122—124, 128
 - and natural theology 和自然神学 128—129
 - on need-dependency of phrenology 论人们依赖颅相学的需要 370n110
 - and oligarchical error 和主张寡头政治的错误 185, 205, 379n28
 - and Owen 和欧文 227, 234—243
 - and Phrenological Association 和颅相学协会 93
 - and phreno-mesmerism 和颅相催眠术 351n58
 - on religion 论宗教 127—130
 - as secular Calvin 作为世俗加尔文教徒 132—133
 - and sex 库姆和性 104—105, 236
 - and socialism 和社会主义 238, 248
 - stated political views of 库姆的公开政治观点 341n78, 367n75
 - visits by, to New Lanark 库姆访问新拉纳克 232, 235
 - on working class 库姆论工人阶级 138, 147
- Combe, William 威廉·库姆 384n95
- Comte, Auguste 奥古斯特·孔德 18, 113, 217, 220, 242
- Conolly, John 约翰·康诺利 32, 43, 44, 45, 92, 318n28, 331n77
- Cooper, Sir Astley 阿斯特利·库珀爵士 29, 45
- Cooper, Robert 罗伯特·库珀 231, 241
- Cooper, Thomas 托马斯·库珀 162, 252
- cooperative individualism 合作个人主义 230, 234
- Copland, James 詹姆斯·科普兰 28, 49
- corpuscular philosophy 微粒子哲学 112
- Cotta, Carl B. 卡尔·B. 科塔 321n51
- Cowan, Charles 查尔斯·考恩 32, 45, 71, 231, 278, 330n68
- Cox, Robert 罗伯特·考克斯 105, 107, 251, 279
- Craig, E. T. E. T. 克雷格 156, 161, 233, 234, 250, 252, 254, 279
- craniological mania 头骨学狂热

- 135—137
- craniology, *see* head reading 头骨学, 见 头颅解读
- Crook, W. H. W. H. 克鲁克 153, 155, 279, 352n71
- “culture”, defined “文化”, 定义 2, 11
- Darwin, Charles, *Origin of Species* 查尔斯·达尔文, 《物种起源》10, 120, 130
- Darwin, Leonard 伦纳德·达尔文, 259
- Darwinism 达尔文主义 17, 20, 182, 37on1, 391n42
- declaration of expediency 应急宣言 94
- delineations, phrenological, *see* head reading 颅相学描绘, 见头颅解读
- determinism, *see* phrenology, and free will and necessity 决定论, 见颅相学, 和自由意志与必然性
- Detrosier, Roland 罗兰·德特罗西尔 203
- Deville, James 詹姆斯·德维尔 208, 279—280, 313n56, 339n57
- see also* Carlyle, Richard 也见理查德·卡莱尔
- Dewhurst, H. W. H. W. 杜赫斯特 153, 231, 280
- Doherty, Hugh 休·多尔蒂 379n28
- Donovan, Cornelius 科尼利厄斯·多诺万 155, 156, 158, 260, 280
- D'Orsay, A. J. D. A. J. D. 多尔赛 156
- Drummond, James L. 詹姆斯·L. 德拉蒙德 317n16
- Dudgeon, Thomas 托马斯·达吉恩 384n89
- Durkheim, Emile 埃米尔·涂尔干 113, 370n111
- Edinburgh (*see also* phrenology societies) 爱丁堡(也见颅相学学会)
- Association for Aiding Country Lectures on Science 乡村科学演讲援助协会 354n79
- Association for Providing Instruction in Useful and Entertaining Sciences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of 爱丁堡哲学学会 345n24, 350n55
- Reform League 爱丁堡改革同盟 341n78
- Royal Medical Society of 爱丁堡皇家医学学会 28
- Royal Society of 爱丁堡皇家学会 28, 45, 56
- School of Arts 爱丁堡艺术学校 140, 354n81
-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Moral and Economical Knowledge 爱丁堡道德和经济知识传播学会 356n97
- University of 爱丁堡大学 44
- Wernerian Natural History Society of 爱丁堡沃纳自然史学会 55, 60
-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爱丁堡工人协会 345n24
- Edinburgh Chronicle* 《爱丁堡纪事》164
- Edinburgh Review* 《爱丁堡评论》23, 24, 25, 28, 60, 142
- Eliot, George 乔治·艾略特 7, 229, 337n39, 363n34
- Elliotson, John. 约翰·埃利奥特森 29, 31, 44, 45, 52—53, 65, 93, 318n28
- Ellis, Sir William 威廉·埃利斯爵士 32, 45
- Ellis, William 威廉·埃利斯 144, 145, 346n29, 348n43

- Ellis family 埃利斯家族 357nl05
- Emerson, Ralph W. 拉尔夫·W. 爱默生 154, 175, 183, 339n57
- Engels, Frederick 弗雷德里希·恩格斯 150, 205, 251, 329n57
- Engledeue, William 威廉·恩格尔杜 45, 94, 189, 248—250, 257, 281
- Epps, Ellen 埃伦·埃普斯 188, 303n20
- Epps, John 约翰·埃普斯 31, 45, 105, 152, 185, 281, 330n68
- ethology 行为学 6, 271
- Everett, James, *Head-piece* 詹姆斯·埃弗里特, 《头颅篇》23
- Examiner* 《主考官》86
- exhibitions, phrenological 颅相学展览 150
- faculties, phrenological 颅相学官能 59, 115, 116
- see also phrenology, nomenclature 也见颅相学, 术语
- faculty psychology 官能心理学 108
- see also Brown, Thomas; Stewart, Dugald 也见托马斯·布朗; 杜格尔德·斯图尔特
- fatalism, see phrenology, and free will and necessity 宿命论, 见颅相学, 自由意志与必然性
- Ferrier, David 戴维·费里尔 21, 259
- Fife, Sir John 约翰·法伊夫爵士 32, 46, 148, 158, 282, 349n50
- First Cause, significance of 原动力的意义 211, 212, 217
- Flaxman, John 约翰·弗拉克斯曼 40, 218
- Forbes John 约翰·福布斯 29, 95, 96, 340n70
- Forster, Thomas 托马斯·福斯特 31, 59—64, 282
- see also Carlile, Richard; Gall, Franz Joseph; Spurzheim, Johann Gaspar 也见理查德·卡莱尔; 弗朗兹·约瑟夫·高尔; 约翰·加斯帕·施普茨海姆
- Fourier, Charles 查尔斯·傅立叶 115
- Fourierism 傅立叶主义 238
- see also Doherty, Hugh 也见休·多尔蒂
- Fowler, Lorenzo Niles 洛伦佐·奈尔斯·福勒 156, 258, 261, 262, 282
- Fowler, Orsen 奥森·福勒 156
- Hereditary Descent* 《遗传世系》262
- Fraser, William 威廉·弗雷泽 140
- frontal sinuses 前窦 26, 117
- function, concept of 功能的观念 3
- functionalism, roots of 功能主义的根源 113
- fundamentalism, phrenological 颅相学的原教旨主义 195, 226
- Gall, Franz Joseph 弗朗兹·约瑟夫·高尔 283
- antiquity of ideas of 高尔思想的古老性 302n10
- and antisensationalism 和反感觉论 5, 225
- on biological inequality 论生物学的不平等 225—226
- compared to Darwin and Newton 与达尔文和牛顿相比 205—206
- doctrine of 高尔的学说 3—7
- and Forster 和福斯特 64
- and idéologues 和思想家 5—6
- and Lamarck 和拉马克 226
- on materialism 论唯物主义 24
- and motives 动机 39—40

- nomenclature of 高尔的术语 30, 78—79
- and reaction to his doctrine in Britain 高尔学说在英国的反应 24—28
- on reform of society 论社会改革 226
- as revolutionary in psychology 在心理学方面的革命性 113—114
- works of, in Britain 高尔著作, 在英国 7
see also Combe, George; Spurzheim, Johann Gaspar 也见 乔治·库姆; 约翰·加斯帕·施普茨海姆
- Geological Society 地质学学会 60, 331n76
- Glasgow Total Abstinence Society 格拉斯哥戒酒总学会 351n66
- Godwin, William 威廉·戈德温 63, 219, 247
- Goethe, J. W. von J. W. 冯·歌德 40
- Gordon, John 约翰·戈登 23, 25—27, 44, 60, 75
- Goyder, D. G. D. G. 戈伊德 155, 156, 159, 176, 231, 283, 357n103
- Grainger, Richard 理查德·格兰杰 31, 44, 45
- Gramsci, Antonio 安东尼奥·葛兰西 67, 69, 152, 193, 369n97
- Greaves, James Pierrepont 詹姆斯·皮尔庞特·格里夫斯 242, 378n10, 387n130
- Green, Joseph H. 约瑟夫·H. 格林 31, 313n55, 315n7
- Greenhow, T. M. T. M. 格林诺 32
- Gregory, William 威廉·格雷戈里 44, 45, 284
- Hall, Samuel Carter 撒缪尔·卡特·霍尔 314n68
- Hall, Spencer Timothy 斯宾塞·蒂莫西·霍尔 150, 159, 232, 284
- Ham Common Commune 哈姆公社
see Greaves, James Pierrepont 见詹姆斯·皮尔庞特·格里夫斯
- Hamilton, A. J. A. J. 汉密尔顿 233, 236
- Hamilton, Mrs. 汉密尔顿夫人 157, 284
- Hamilton, Sir William 威廉·汉密尔顿爵士 28, 44, 56, 285, 318n28
- Harmony Hall 和谐大厅 250—251, 386n123
- Hawthorne, Nathaniel 纳撒尼尔·霍桑 7
- Hayes, Joseph 约瑟夫·海斯 31
- head and hand 大脑与手 171, 202
- head reading 解读头颅
 costs of 解读头颅的费用 156
 origins of 解读头颅的由来 4
 Owenites on 欧文主义者论头颅解读 232—234
 in phrenological societies 颅相学学会中的头颅解读 80
 reactions to 对头颅解读的反应 80, 320n44, 327n40
 for servants 通过头颅解读招募仆佣 258, 362n28, 385n100
 utility of 解读头颅的效用 258
see also anthropometry 也见人体测量学
- Henry, William 威廉·亨利 32
- Herder, J. G. von J. G. 冯·赫尔德 40
- Hetherington, Henry 亨利·赫瑟林顿 211, 250
- Hibbert, Julian 朱利安·希伯特 372n22, 375n61

- Hobbes, Thomas 托马斯·霍布斯 127
- Hodgskin, Thomas 托马斯·霍奇斯金 146
Labour Defended《受保护的劳动者》210, 237
- Hodgson, William Ballantyne 威廉·巴兰坦·霍奇森 105, 152, 286
- Holland, George Calvert 乔治·卡尔弗特·霍兰 45, 349n50
- Hollick, Frederick 弗雷德里克·霍利克 231
- Holm Henry 亨利·霍尔姆 29, 286—287, 332n87
- Holmes Sherlock 歇洛克·福尔摩斯 259
- Holyoake, George Jacob 乔治·雅各布·霍利约克 161, 196, 231, 246, 287, 374n46
- homeopathy 顺势疗法 88
- Hopkinson, James 詹姆斯·霍普金森 351n62
- Horsell, William 威廉·霍塞尔 156, 389n18, 391n39
- Howell, George 乔治·豪厄尔 387n127
- Hume, Joseph 约瑟夫·休姆 53
- Hunt, James 詹姆斯·亨特 7, 256—257
- Hunt, Leigh 利·亨特 344n11
- Huxley, Thomas Henry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 10, 123
- Hytch, E. J. E. J. 海奇 159, 288, 349n50
- idéologues*, see Gall, Franz Joseph 思想家, 见弗朗兹·约瑟夫·高尔
- ideology defined 意识形态定义 167, 168, 169
- Jameson, Robert 罗伯特·詹姆森 55
- Jeffrey, Francis 弗朗西斯·杰弗里 23, 28, 44, 49, 140, 142
- Johnson, James 詹姆斯·约翰逊 29, 31, 43
- John Street Institute, London 伦敦约翰街学院 251, 354n84
- Jones, Ernest 欧内斯特·琼斯 221
- Jones, Llewelyn 卢埃林·琼斯 32
- Jones, Lloyd 劳埃德·琼斯 221, 252
- Kay—Shuttleworth, James 詹姆斯·凯—沙特尔沃思 186
- Kidd, John 约翰·基德 27, 28, 46, 49
- Kingsley, Charles 查尔斯·金斯利 73, 345n22
Alton Locke《奥尔顿·洛克》163, 261, 387n125
- Knighton, Sir William 威廉·奈顿爵士 32
- Lacon, Joseph 约瑟夫·莱肯 152, 289
- Lamarck, J. B. J. B. 拉马克 226, 372n19
- Lancet, The*《柳叶刀》29, 31, 88
- Lange, F. A., on materialism and phrenology F. A. 兰格, 论唯物主义和颅相学 323n68
- Lavater, Johann Caspar 约翰·卡斯珀·拉瓦特尔 4—5, 75, 173
- Lavoisier, Antoine—Laurent 安托万—洛朗·拉瓦锡 203
- law, natural 自然法则 109—110, 247
 see also Combe, George 也见乔治·库姆
- Lawrence, William 威廉·劳伦斯 29, 31, 44, 45, 211
 see also Carlile Richard 也见理查德·卡莱尔

- Lawrence—Abernethy dispute 劳伦斯—阿伯内西辩论 46, 63, 64
- Leach, William Elford 威廉·埃尔福德·利奇 317n17
- Leo, Frederick 弗雷德里克·利奥 320n43
- Levison, J. L. J. L. 利维森 153, 156, 159, 289
- Lewes, George Henry 乔治·亨利·刘易斯 113—114, 123, 256—257
- Linton, James 詹姆斯·林顿 356n100
- Lion* 《英国狮》 219
-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societies, culture of 文学和哲学学会的文化 69—70
- in Cheltenham 切尔滕纳姆分会 80, 143
- in Emsworth 埃姆斯沃思分会 87
- in Liverpool 利物浦分会 89
- in Manchester 曼彻斯特分会 95
- in Newcastle 纽卡斯尔分会 352n71
- and phrenological societies 和颅相学学会 88
- in Southampton 南安普顿分会 158—159
- in Worcester 伍斯特分会 81
- Literary Journal* 《文学杂志》 22
- Liverpool (*see also*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利物浦 (也见文学和哲学学会; societies; mechanics' institutes; phrenology, societies) 技工学院; 颅相学, 学会)
- Anatomical Museum 解剖学博物馆 390n29
- Institute of Mental Geometry 精神几何学学院 260
- Philomathic Society 星相学家学会 152
- Royal Institution 皇家协会 324n4
- Livesey, Joseph 约瑟夫·利夫西 163
- Lombroso, Cesare 切萨雷·隆布罗索 259
- London (*see also* Askesian Society; John Street Institute; mechanics' institutes; phrenology societies; Royal Adelaide Gallery) 伦敦 (也见阿斯克西学会; 约翰街学院; 技工学院; 颅相学学会; 皇家阿德莱德画廊)
- Institution 伦敦学院 68—70, 75, 76
- King's College 国王学院 83
- Philomathic Institution 伦敦学问爱好者协会 68
- Philosophical Society 哲学学会 60, 61
- phrenology in 伦敦的颅相学 89, 93, 136
- Royal Institution 皇家协会 28, 57
- Royal Society of 伦敦皇家学会 28, 45
- London Encyclopedia* 《伦敦百科全书》 33
- Lovett, William 威廉·洛维特 241, 250, 252—253
- Lowe, William 威廉·洛 152, 231, 290
- Lyell, Charles 查尔斯·莱尔 101, 108, 316n9
- Lysenkoism 李森科学说 17, 206
- Macdonald, William 威廉·麦克唐纳 32
- MacGlashan, William 威廉·麦格拉尚 157, 163
- MacKenzie, Sir George S. 乔治·麦肯齐爵士 55—57, 91—92, 95, 140, 157, 290, 351n58
- Mackenzie, William 威廉·麦肯齐 44,

- 290, 350n52
- Mackintosh, John** 约翰·麦金托什 32
- Maclaren, Charles** 查尔斯·麦克拉伦 344n7
- M'Neile, Hugh** 休·麦尼尔 386n118
- Malthus Thomas** 托马斯·马尔萨斯 10, 109, 121
- Man, The** 《人》 203, 220
- Manchester, see**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societies; mechanics' institutes; phrenology societies 曼彻斯特, 见文学和哲学学会; 技工学院; 颅相学学会
- Marriott, Joseph** 约瑟夫·马里奥特 241, 252, 291
- Martin, Emma** 埃玛·马丁 241, 291
- Martineau, Harriet** 哈里雅特·马蒂诺 102, 105, 121, 196—197, 339n57, 345n22, 367n80
- Martineau, James** 詹姆斯·马蒂诺 196
- Marxism, vulgar** 庸俗马克思主义 6, 166
- materialism, see under** phrenologists; phrenology 唯物主义, 见颅相学家、颅相学条目
- mechanical philosophy** 机械论哲学 204
see also Cartesianism; mind-body dualism 也见笛卡尔哲学; 身心二元论
- mechanics' institutes** 技工学院
in **Aberdeen** 阿伯丁技工学院 349n48, 355n92
age and occupational statistics of members 成员的年龄和职业统计 161
in **Birmingham** 伯明翰技工学院 149, 245—246, 355n92
in **Cleckheaton** 克莱克希顿技工学院 159
in **Derby** 德比技工学院 158, 354n84
in **Dumfries** 邓弗里斯技工学院 150
failure of 技工学院的失败 160
in **Halifax** 哈利法克斯技工学院 354n84
in **Heybridge** 海布里奇技工学院 354n84
in **Hitchin** 希钦技工学院 148
in **Kentish Town** 肯蒂什镇技工学院 349n50
in **Lancashire and Cheshire, Union of** 兰开夏和柴郡技工学院联盟 348n45
in **Leeds** 利兹技工学院 84, 354
in **London** 伦敦技工学院 146, 159, 348n45, 349n50, 354n84, n86
in **Manchester** 曼彻斯特技工学院 150, 348n45, 349n48, 350n52, 354n84
in **Newcastle** 纽卡斯尔技工学院 349n50, 352n71, 357n105
New Manchester 新曼彻斯特技工学院 203
in **Rotherhithe and Bermondsey** 罗瑟希特和伯蒙德西技工学院 146
in **Sheffield** 设菲尔德技工学院 148—149, 150, 349n50
shifts in subjects and clientele of 技工学院的科目和追随者的转变 348n45
in **Sowerby Bridge** 索尔比布里奇技工学院 355n92
in **Spitalfields** 斯皮特菲尔德技工学院 348n44
in **Stalybridge** 斯特利布里奇技工学院 344n13
in **Walthamstow** 沃泰姆斯托技工学

634 总索引

- 院 356n100
in Warrington 沃灵顿技工学院 357n105
in West Bromwich 西布罗米奇技工学院 151
in Westminster 威斯敏斯特技工学院 354n84
in Yorkshire 约克郡技工学院 149, 355n92
Mechanics' Magazine 《技工杂志》 146
“mediation”, defined “调解”的定义 9
medical men, position of 医务人员的地位 70—71
see also phrenology, and medical profession 也见颅相学和医学专业
medicine, heterodox 医学, 异端医学 265—266
see also homeopathy; mesmerism 也见顺势疗法, 催眠术
Melville, Herman 赫尔曼·梅文维尔 7
Mesmerism 催眠术 4, 57, 88, 94, 202
see also phreno-mesmerism
也见颅相催眠术
metaphysics 形而上学 32—33, 47, 62, 72, 233, 325n18
see also Stewart, Dugald 也见杜格尔德·斯图尔特
Midland Institute of Phrenology, Leicester 密德兰颅相学学院, 莱斯特 266
Mill, James 詹姆斯·密尔 106, 107, 348n43
Mill, John 约翰·密尔 259
Mill, John Stuart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123, 247, 337n37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 188
Miller, Hugh 休·米勒 101, 120, 262
mind-body dualism 身心二元论 24, 62, 311n47
see also Cartesianism; mechanical philosophy 也见笛卡尔哲学, 机械论哲学
Montgomery, James 詹姆斯·蒙哥马利 219, 373n28
Moore, Edward 爱德华·穆尔 31, 32, 313n57
Moore, Joseph 约瑟夫·穆尔 31
Morrison, James 詹姆斯·莫里森 237, 383n83
Murphy, John Lowther 约翰·劳瑟·墨菲 246
museums, phrenological 颅相学博物馆 89, 156, 234, 260, 372n22
mutual improvement societies 相互促进协会 162—163
Myles, James 詹姆斯·迈尔斯 157, 174
National Hall, Holborn 霍尔本国民会所 252, 354n84
Naturphilosophie 《自然哲学》 58, 62
see also Goethe, J. W. von; Herder, J. G. von 也见 J. W. 冯·歌德; J. G. 冯·赫尔德
Neill, Patrick 帕特里克·尼尔 317n17
Newall, Walter 沃尔特·纽沃尔 233, 386n123
Newcastle, see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societies; 纽卡斯尔, 见文学和哲学学会;
mechanics' institutes; phrenology societies 技工学院; 颅相学学会
New Lanark 新拉纳克 215, 226
see also Combe, George 也见乔治·库姆
Nichol, John P. 约翰·P. 尼科尔 317n16

- Noble, Daniel 丹尼尔·诺布尔 32, 95, 96, 265, 292
- O'Brien, Bronterre 布朗特雷·奥布赖恩 222
- O'Connor, Feargus 费格斯·奥康纳 374n46
- O'Dell, Stackpool 斯塔克普尔·奥德尔 357n105
- O'Neill, Arthur 阿瑟·奥尼尔 252, 292
- Orbiston commune 奥比斯顿公社 233, 235, 236
- Overend, Hall 霍尔·奥弗伦 45, 292
- Owen, Robert 罗伯特·欧文
and Brindley debate 和布林德利的辩论 143
and Combeanism 与库姆学说 233
environmentalism of 欧文的环境论 227
head of, read by Hall 欧文的头颅, 由霍尔解读 380n41
at New Lanark 在新拉纳克 215
as radical communitarian 作为激进的共产主义社会提倡者 237
and spiritualism 和唯心论 384n89
see also Carlile, Richard; Combe, George; Spurzheim, Johann Gaspar 也见理查德·卡莱尔, 乔治·库姆; 约翰·加斯帕·施普茨海姆
- Owen, Robert Dale 罗伯特·戴尔·欧文 233, 243, 244, 247, 380n41
- Owenism (*see also* phrenologists, and Owenite socialism; phrenology, for socialism) 欧文主义(也见颅相学家, 欧文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颅相学)
diversity of 欧文主义的多样性 224—225; 241
and Hall of Science in Manchester 曼彻斯特科学会所 248, 250, 251;
see also John Street Institute 也见约翰街学院
and Hall of Science in Sheffield 和设菲尔德科学会所 162, 249
and phrenology 和颅相学 225—234
- Owenites (*see also* head reading) 欧文主义者(也见解读头颅)
and phreno-mesmerism 和颅相催眠术 249—250
- Paine, Thomas 托马斯·潘恩 120, 189, 375n67
see also Carlile, Richard 也见理查德·卡莱尔
- Paley, William 威廉·佩利 46, 109, 121, 127, 212
Evidences 《证据》333n53
pantheistic materialism 泛神论的唯物主义 216, 218, 387n130
- Pare, William 威廉·佩尔 241
- Parry, William 威廉·帕里 54—55
- Partington, Charles 查尔斯·帕廷顿 348n44
- Penny Cyclopaedia* 《一便士百科全书》140
- Pestalozzi, Johann Heinrich, influence of 约翰·海因里希·裴斯泰罗齐, 其影响 377n10
- Petrie, George 乔治·皮特里 211
- Phrenological Academy, Morcambe 莫克姆颅相学研究院 260
- Phrenological Association 颅相学协会 90—94
- Phrenological Depot and Homoeopathic Medical Dispensary 颅相学仓库和顺势疗法医疗所 389n18

636 总索引

Phrenological Institute, London 伦敦颅相学学院 260, 353n74

Phrenologists 颅相学家

and antielitist antiintellectualism 与反精英主义的反知性主义 73, 83—84, 263,

see also antiaristocracy 也见反贵族统治

and antiphrenologists compared 和反颅相学家比较 42—48, 84

and Frances Bacon 与弗朗西斯·培根 33, 73

and bourgeois political economy 和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143—144
and common sense 和常识 183, 364n55

on criminality 论犯罪 340n70

on dead languages 论无感觉的语言 73, 326n25

on deviants 论不正常者 79, 82

in education of adults 成人教育中的颅相学家 148

on female inferiority 论女性的次等性 113, 226, 368n89

see also phrenology, and women 也见颅相学, 和妇女

in hospitals, asylums, and dispensaries 医院、精神病院和诊所中的颅相学 31—32, 314n63, n68

as materialists 唯物主义颅相学家 366n66

and metaphysics 和形而上学 32—33, 62, 72

and murderers 和谋杀者 360n12

and Owenite socialism 和欧文主义者社会主义 142—143, 238—239

and persecution rhetoric 和迫害的花

言巧语 82—84

and polarization of reality 和现实的大众化 85—86

and religious beliefs 和宗教信仰 45—46

as revolutionary friends of the people 作为人民的革命朋友 184—188

on royal societies 论皇家学会 83, 320n46

on sexuality 论性 173, 179, 262, 263

phrenology (see also head reading) 颅相学(也见头颅解读)

in advertising 广告中的颅相学 173

alternativeness of, as science 颅相学作为科学的可选择性 206

and astrology 和占星术 175—176, 180, 181, 258, 264, 328n42

and Richard Carlile 和理查德·卡莱尔 208—209 215, 218, 219—20

and Church of Scotland, see Chalmers, Thomas; Ross, John; Welsh, David and George Combe 和苏格兰教会, 见托马斯·查默斯; 约翰·罗斯; 戴维·韦尔什和乔治·库姆 93, 107—110, 119, 139, 243—248, 370n10

as crisis knowledge 作为危机知识 85

and democracy 和民主 182

as desensualizing force 作为感觉迟钝的力量 118

see also sensations 也见感觉

as entertainment 作为娱乐 173

and eugenics and race 和优生学及人种 259, 262

and financial costs, profits, and commercialism 和财政成本、利润及商业化 135—136, 148—150, 155—

- 156, 159, 188, 352n71, 353n72, 386n120
- and free will and necessity 和自由意志及必然性 180—182, 225—230
- and head as image, sign symbol, and metaphor 和作为图像、符号象征和隐喻的头颅 72, 75, 110—119, 190, 267
- and health reform 和健康改革 177—180
- lecturers on 关于颅相学的演讲 68, 151—158
- in literary and medical press 文学和医学出版物中的颅相学 22—23, 29
- in London 伦敦的颅相学 89, 93, 136
- and materialism 和唯物主义 5, 25, 62—64, 94, 323n68,
- see also* Gall, Franz Joseph; Lange, F. A. 也见弗朗兹·约瑟夫·高尔, F. A. 兰格
- and medical profession 和医学界 28—33, 257
- in medical schools 医学学校中的颅相学 31—32
- and Methodism 和卫理公会 194—197
- in mutual improvement societies 相互促进协会中的颅相学 162—163
- as mystified mediation of bourgeois ideology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神秘中介 192, 375n57
- and naval discipline 和海军纪律 53
- newspapers in support of 支持颅相学的报纸 344n7
- and Newtonianism 和牛顿学说 174, 258
- nomenclature of 颅相学的术语 25, 30, 78—79,
- see also* faculties 也见官能
- and occult 和神秘之事 40, 72, 218
- and Owenism 和欧文主义 225—234
- and Paracelsianism 和帕拉塞尔苏斯主义 258
- practical professors of 颅相学的实践教授 80, 152—156, 257, 260
- and prison discipline 和监狱纪律 340n68, n70
- reception of, in Britain 英国对颅相学的接纳 22—28
- and religion, harmony with 与宗教的和谐 54, 80—82, 147—148
- as religion 作为宗教的颅相学 190, 247, 359n120
- and religionists 和宗教家 239
- Revisionist historians on 研究颅相学的修正派历史学家 19—22
- sales of works on 颅相学著作的销售 163, 357n105
- for self-improvement 颅相学对自我修养的作用 175—180, 261
- for socialism 颅相学对社会主义的作用 231
- and structuralism 和结构主义 258
- study groups 颅相学研究群体团体 158—160
- Whig historians on 研究颅相学的辉格派历史学家 16—19
- and women 和妇女 157, 190
- as word 颅相学词语 60, 94
- phrenology societies 颅相学学会
- in Bath 巴斯学会 32
- in Belfast 贝尔法斯特学会 90
- in Blackburn 布莱克本学会 90
- in Dublin 都柏林学会 89
- in Dumfries 邓弗里斯学会 150
- in Dundee 邓迪学会 137, 157, 177

638 总索引

in Edinburgh 爱丁堡学会 89, 330n69, 332n85
in Glasgow 格拉斯哥学会 89, 331n74
in Liverpool 利物浦学会 88, 89
in London 伦敦学会 52, 89
in Manchester 曼彻斯特学会 95, 96, 343n99
in Newcastle 纽卡斯尔学会 88
Scottish 苏格兰颅相学学会 331n77
in Sheffield 设菲尔德学会 89, 355n89
in Warrington 沃灵顿学会 90
in Warwick 沃里克学会 90
phreno-mesmerism 颅相催眠术 150, 153, 159
see also Combe, George; Owenites
也见乔治·库姆; 欧文主义者
physiognomy 人相学 217
see also Lavater, Johann Caspar 也
见约翰·卡斯珀·拉瓦特尔
Pilgrim's Progress 《天路历程》171
Poe, Edgar Allan 埃德加·爱伦·坡 7, 87
Porter, John P. 约翰·P. 波特 317n14
positivism 实证主义 18, 376n81
see also Comte, Auguste 也见奥古斯特·孔德
Prichard, James Cowles 詹姆斯·考尔斯·普里查德 28, 46, 293, 377n4
Prideaux, T. Symes T. 赛姆斯·普里多 152, 175, 293
prosopography, limits of 人学的局限性 48—50
psychograph 心理描绘图 233, 234
see also cephalograph 也见脑图
psychometrics 心理测验学 259
Queenwood community, see Harmony

Hall 昆伍德公社, 见和谐大厅
Ralahine community, see Craig, E. T.
拉拉尼公社, 见 E. T. 克雷格
Redburn, Richard 理查德·雷德伯恩 251, 354n84
“religion”, defined “宗教”的定义 368n86
Robertson, J. M. J. M. 罗伯逊 257
Robertson, Joseph 约瑟夫·罗伯逊 146
Roget, Peter Mark 彼得·马克·罗热 27, 49, 58, 95, 140
Ross, John 约翰·罗斯 53—55
Rowbotham, S. S. 罗博特姆 379n33
Royal Adelaide Gallery, London 伦敦皇家阿德莱德画廊 154, 355n92
royal institutions, see Liverpool; London 皇家协会, 见利物浦; 伦敦
royal societies, see Edinburgh; London 皇家学会, 见爱丁堡; 伦敦
Royal Yacht Club 皇家游艇俱乐部 157
Rumball, James Quilter 詹姆斯·奎尔特·朗鲍尔 45, 184, 231, 294
Sabine, Sir Edward 爱德华·萨拜因爵士 54—55
Saint Simon, Henri de 亨利·德圣西门 113, 372 n16
Sampson, Marmaduke Blake 马默杜克·布莱克·桑普森 94, 152, 294
Saul, William Devonshire 威廉·德文希尔·索尔 233—234 371n7, 372n22
scala naturae, see chain of being, great 《自然的度量》, 见生命序列
science and working-class radicals 科学和工人阶级的激进分子 202—204
“scientism”, defined “科学至上主义”,

- 定义 305—306n11
- Scotsman* 《苏格兰人》 57, 344n7
- Scott, William 威廉·斯科特 129
- Scottish Common Sense philosophy,
see metaphysics; phrenologists,
and metaphysics; Stewart, Dugald
苏格兰常识哲学, 见形而上学; 颅
相学家, 和形而上学; 杜格尔德·
斯图尔特
- SDUK 实用知识传播学会, 49, 139,
142, 165, 328n40, 344n15, 363n38
- secularism 世俗主义 254, 388n133
- secular schools 世俗学校 253, 390n22
- Sedgwick, Adam 亚当·塞奇威克 91,
339n63, 393n85
- sensations 感觉 326n22
- Sharpies, Eliza 伊莉莎·沙普尔斯 216,
217, 242
see also Carlile, Eliza 也见伊莉莎·
卡莱尔
- Sheffield, see mechanics' institutes;
Owenism, Halls of Science; phre-
nology societies 设菲尔德, 见技工
学院; 欧文主义, 科学大厅; 颅相学
学会
- Sibbald, John Robertson 约翰·罗伯逊·
西博尔德 314n60
- Simpson, James 詹姆斯·辛普森 94,
137, 143, 152, 162, 240, 295
- Sleigh, William Willcocks 威廉·威尔
科克斯·斯莱 31, 320n43
- Smiles, Samuel 撒缪尔·斯迈尔斯
120, 178
- Smith, Adam 亚当·史密斯 109—110,
121, 126, 127
- Smith, James E. 詹姆斯·史密斯
345n22, 383n83
- Smith, Joshua Toulmin 乔舒亚·图尔
明·史密斯 295, 325n21, 330n70
- Smith, William Hawkes 威廉·霍克
斯·史密斯 149, 228,
296, 387n125
- Social Institution, John Street 社会学院
see John Street Institute 见约翰街
学院
- Solly, Samuel 撒缪尔·索利 95, 317n17
- South, John Flint 约翰·弗林特·索思
31, 44, 45
- Southwell Charles 查尔斯·索思韦尔
231, 252, 386n120, 387n129
- Spark, J.J. J.J. 斯帕克 270
- Spectator* 《旁观者》 120, 135, 150
- Spencer, Herbert 赫伯特·斯宾塞
105, 113, 175, 230, 256—257
- spiritualism 招魂术 265, 266—267
- Spurzheim, Johann Gaspar 约翰·加斯
帕·施普茨海姆 296
background of 施普茨海姆的背景
51—52
at Cambridge 在剑桥 84
and George Combe 和乔治·库姆
108—109
and Forster 和福斯特 60, 323n64
and Gall 和高尔 51, 116
at London Institution 在伦敦学院
68, 75
and Robert Owen 和罗伯特·欧文
226—227
and Oxford 和牛津 83
and phrenological nomenclature 和
颅相学术语 77—79, 116
refutes Gordon 反驳戈登 60
see also Carlile, Richard 也见理查
德·卡莱尔
- Stebbing, J. Rankin J. 兰金·斯特宾
158, 296

640 总索引

- Stewart, Dugald 杜格尔德·斯图尔特 25, 27, 44, 56
- Streeter, John S. 约翰·S. 斯特里特 31
subordination, real and formal 从形式到内容的真正的从属 144
- Swedenborg, Emanuel 伊曼纽尔·斯威登伯格 302n10, 303n17
- Swedenborgians 斯威登伯格信徒 41, 315n7
see also Flaxman, John; Greaves, James Pierrepont 也见约翰·弗拉克斯曼; 詹姆斯·皮尔庞特·格里夫斯
- Taylor, Robert 罗伯特·泰勒 216, 219
- Thelwall, John 约翰·塞尔沃尔 209
- theology, natural 自然神学 46, 81
see also Combe, George; Paley, William 也见乔治·库姆; 威廉·佩利
- Thompson, Cordon 科登·汤普森 32, 45
- Thompson, William 威廉·汤普森 202, 213, 237
- Tilloch, Alexander 亚历山大·蒂尔科克 60, 107
- Timson, Thomas 托马斯·蒂姆森 266
- Transactions of the Phrenological Society* 《颅相学学会学报》 79
- Trevelyan, Arthur 阿瑟·特里维廉 143—144, 158, 242
- Trevelyan, Sir Walter 沃尔特·特里维廉爵士 316n13, 322n89
- Trotter, John 约翰·特罗特 23
- Tulk, Charles A. 查尔斯·A. 图尔克 315n7, 316n13
- Turley, Edward 爱德华·特利 81, 297
- Turner, Henry 亨利·特纳 182
- urban-rural dichotomy 城市—乡村二分法 354n79
- Ure, Andrew 安德鲁·尤尔 112, 125, 144, 194
- Uwins, David 戴维·尤温斯 33—34, 43, 321n51
- Vernon, W. John W. 约翰·弗农 154, 298, 366n65
- Villers, Charles 查尔斯·维勒斯 24, 307n28
- Vincent, Henry 亨利·文森特 387n125
- vitalism 活力论 46, 64, 204, 218, 225, 267
- vivisection 活体解剖 83
- Wade, Thomas 托马斯·韦德 23
- Wakley, Thomas 托马斯·韦克利 29, 46, 150, 194
- Wallace, Alfred Russel 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 161, 212, 234, 350n58
- Watson, Hewett Cottrell 休伊特·科特雷尔·沃森 29, 45, 95, 105, 185, 298, 327n37
- Weir, William 威廉·韦尔 32, 44, 298
- Wells, Sam 萨姆·韦尔斯 258
- Welsh, David 戴维·韦尔什 129, 209, 308n31
- Wernerian Natural History Society, see Edinburgh 沃纳自然史学会, 见爱丁堡
- Whately, Richard 理查德·惠特利 317n16, 328n45
- Wheatstone, Charles 查尔斯·惠特斯通 44, 45
- Whewell, William 威廉·休厄尔 60,

- 62,73,91,123
- Whitman, Walt 沃尔特·惠特曼
7,330n61
- Wilkinson, James John Gath 詹姆斯·
约翰·加思·威尔金森 154
- Williams, William Mattieu 威廉·马蒂·
威廉斯 261,264,299,354n87
- Wilson, W. J. Erasmus W. J. 伊拉兹马
斯·威尔森 31,45
- Winslow, Forbes 福布特·温斯洛 31,
32,43
- Winstanley, Gerrard 杰拉德·温斯坦
莱 203
- Witham, Henry T. M. 亨利·T. M. 威
瑟姆 162,300
- Woods family 伍兹家族 240,353n79
- Wooler, Thomas 托马斯·伍勒
374n44,381n50
- Wright, Edward 爱德华·赖特 31
- Wright, Francis 弗朗西斯·赖特
243,247
- Wright, "Professor", 赖特, "教授" 260
- Zadkiel's Magazine* 《扎德基尔杂
志》 362n26



译后记

译介此书，缘于 2001 年在南京大学做博士生期间有幸参加罗杰·库特教授的史学讲座。当时，他讲授医学社会史专题，对于我们来说几乎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因为国内鲜有医学社会史的研究，更何况是有关英国的颅相学历史。虽然当时听得云里雾里，但我们深深为其独特的分析所吸引。在与库特教授的交流过程中，译者感觉到如果能有机会把《大众科学的文化意义》译介成中文或许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作者也热情地赞许这项工作。在 2002 年 5 月的南京国际学术会议上，经与商务印书馆接洽，正式决定着手翻译工作。然而，由于我们各自的学业和工作任务比较繁重，译介工作一再耽搁，断断续续，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大众科学的文化意义》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言，是交叉学科的产物，是科学史和社会史的结合。在对颅相学的研究过程中，作者无疑受到托马斯·库恩、米歇尔·福柯以及像葛兰西这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极大影响。通过把 19 世纪在英国甚至欧洲风行一时的颅相学置于社会史的分析框架之下，作者使我们看到了在英国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中，科学与非科学或伪科学之间的争论是非常激烈的，而这种争论背后带有明显的意识

形态色彩。作者声言“我的目标不是赞美颅相学知识,而是对颅相学的产生及其在大众中(尤其是在工人阶级激进分子中)的应用进行详细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说明,以便从总体上展示科学经过意识形态调和的起源和功能”。(参见中译本前言)

颅相学的主题似乎与中国的现实没有特别的联系,但透过库特教授详实而深邃的分析,“自下而上的历史”又一次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无论哪国历史,民众的力量永远是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当今,欧美医学社会史的研究机构不断增加,其成果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最近几年,罗杰·库特教授一直活跃于学术界,先后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以及伊朗和德国等地作演讲,有关的论著也不断问世。

此书是罗杰·库特教授进入医学社会史研究领域的费神费力之作,读者从附录及其注释中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作者的学术功力。翻译此书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一方面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另一方面,作者的用词遣句偏于晦涩,增加了翻译的难度。本书译稿初成后,仅校对就断断续续花了三年时间。虽然我们与库特教授进行了必要的沟通,许多难点直接请教于作者,减少了不少错误,但是,译文存在的瑕疵仍无可避免,这是译者的责任,希望读者多加指正。这本译作也是合作的产物,施义慧翻译第三部分(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张卫良翻译其余章节、附录以及索引等内容。谢济光对第三部分进行了一校,其余部分的一校以及全书的最后总校对由施义慧完成。